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第5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刘绪贻 李存训 著

人民出版社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2000



VOL.1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1775

VOL.2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860

VOL.3 AMERICAN CIVIL WAR AND GILDED AGE 1861-THE LATE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VOL.4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VOL.5 THE AG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1929-1945

VOL.6 POST WW II AMERICAN HISTORY 1945-2000

美国通史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第5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刘绪贻　李存训　著

人民出版社

美国通史

总主编（按姓氏笔划）　刘绪贻　杨生茂

策划/编审　邓蜀生

第一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著　　者　李剑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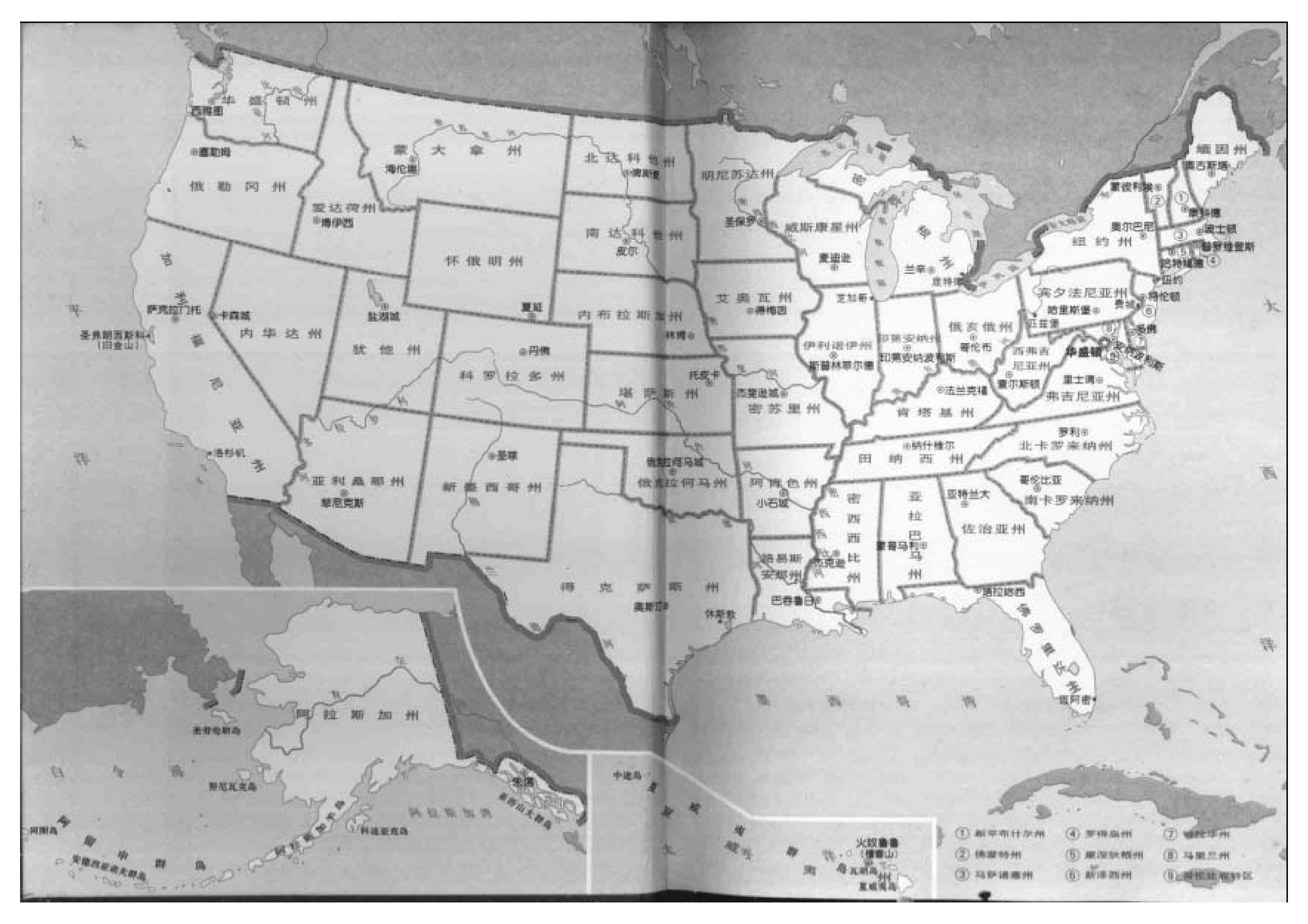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著　　者　张友伦（本卷主编）　陆镜生　李　青等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　　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　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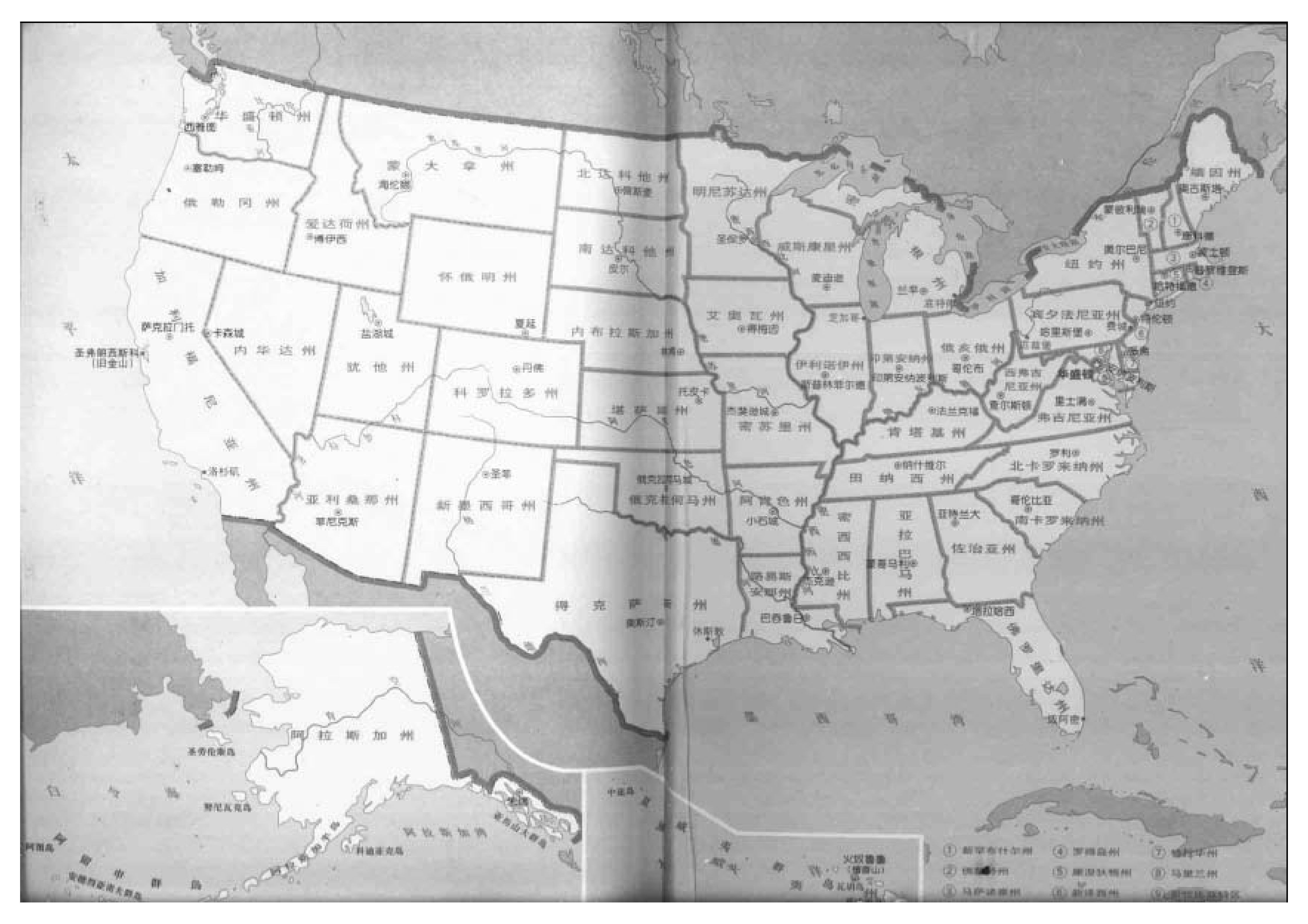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著　　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　晓

第五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著　　者　刘绪贻　李存训

第六卷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著　　者　刘绪贻（本卷主编）　韩　铁　李存训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塞勒姆
俄勒冈州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纽约州
奥尔巴尼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纽约
特伦顿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费城
多佛
华盛顿
怀俄明州
夏延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塔拉哈西
佛罗里达州
坦帕
墨西哥湾
大西洋
太平洋
阿拉斯加州
朱诺
白令海
阿拉斯加湾
阿拉斯加半岛
阿留申群岛
中途岛
夏威夷群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⑨ 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州
西雅图
俄勒冈州
塞勒姆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奥尔巴尼
纽约州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特伦顿
多佛
安纳波利斯
华盛顿
怀俄明州
夏延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里士满
弗吉尼亚州
兰辛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卡森城
内华达州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堪萨斯州
托皮卡
杰斐逊城
密苏里州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城
俄克拉何马州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塔拉哈西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墨西哥湾
太平洋
大西洋
阿拉斯加州
圣劳伦斯岛
努尼瓦克岛
阿拉斯加湾
科迪亚克岛
阿留申群岛
中途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④ 罗得岛州
⑦ 特拉华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⑧ 马里兰州
⑥ 新泽西州

著者说明

本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写 1929—1933 年美国空前严重经济大危机以来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的美国历史。全书共 12 章；除第 9、10 两章为李存训撰写外，其余全部由刘绪贻撰写。附录 3 种，由刘绪贻编写或编制、其中索引有周世英、李存训、刘东参加。周世英还抄写了全部书稿。

书的初稿在分册主编编辑加工的基础上，由刘绪贻、杨生茂两位主编进行统稿，并由分册主编进行最后加工。

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朱庭光、张椿年两位研究员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如：John H. Franklin、William E. Leuchtenbug、Stanley I. Kutler、Robert H. Bremner、Carl N. Degler、Paul W. Bamford、Vera Lasca 和社会学家 Adrian Aveni 等，为帮助我们掌握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最新动态及成果，不断赠给我们书籍。我们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美国友人 Harold L. Posner 和美籍华人胡绍安、钱芷若夫妇赠书 200 余册，其中大部分对研究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非常有益，尤其令我们感动。

对本书不足之处与缺点，诚恳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改正。

1994年7月13日

本卷收入《美国通史》(六卷本)时略有改动。

2002年9月

引　言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是美国遭受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美国人一般称为大萧条），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为克服这一危机，顺应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要求，背弃自由放任主义，迅速地、大规模地将美国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是美国政府为维护和扩大其根据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取得的国际优势，参与绥靖法西斯主义势力，最后为保持资本主义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不得不逐渐与英、苏结成战时同盟，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与法西斯主义，亦即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殊死战斗的时代；是上述国内国际形势的交互发展引起美国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独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促成它战后近1/4世纪的经济发展，还在凯恩斯主义配合下，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找到一条克服经济大危机、避免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可

---

* 我们其所以将1929年罗斯福任纽约州长起，到他1933年3月就任总统这一时期包括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里，是因为他任州长时执行的政策，是他后来实行的“新政”政策的发轫，是新生事物，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行途径，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不是一次一般的经济危机，而是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不能再仅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得到解决的。这也就是说，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美国如果要避免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就必须由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生产关系，使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向“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但是，胡佛总统的生活经历限制了他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他顽固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即使被迫干预，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使他的干预不能沿着改善工农群众政治经济处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方向发展，因而使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不满。这样，比较关心工农群众，积极提倡公营廉价电力，并因经济危机逐渐升级而日益主张政府（包括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帮助危机受害者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民愿意委以重任的政治家。1932年，他先后击败民主党内和共和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那些拥护过时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代替胡佛当选为美国总统。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的“新政”，其总的目标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局部改进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迅速向“福利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

现"[①]，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阶级斗争，适度减轻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挽救陷入空前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大体具有3方面内容：一是复兴和加强陷入空前严重危机的经济；二是救济和安置大规模失业者和贫民；三是革除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35年以前为第一阶段；1935至1939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着重在复兴，第二阶段着重在改革，救济则贯彻始终。

一般说，"新政"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了的。但是，"新政"在1935—1936年间已达到高潮。从1937年起，民主党内反对"新政"的保守派与共和党人，利用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斗争以及中产阶级对声势强大的静坐罢工运动的不满，日益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使"新政"声势日益减弱。到1938至1939年，罗斯福为集中注意力于反法西斯斗争，"新政"更退居守势。直到1944年初，同盟国对打败轴心国充满信心时，罗斯福才又向国会发表了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将进一步推行"新政"。

"新政"实践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工作，同为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互相影响，但从根本上说，罗斯福实行"新政"是因为他认识到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有此必要，而且也受到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推动，因此，他的"新政"实践虽与凯恩斯主义相吻合，但他没有充分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制订与执行"新政"政策。这就是美国产生1937—1938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政"在大规模战时生产开始前未能完全克服大萧条的原因。

---

① 《斯大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35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战胜国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包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是一种酝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装和平状态，极不稳定。在这个体系中，英、法、美等国占有优势，总希望维持它。意、日、德等国在占有殖民地、原料产地、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方面落后一步，感到不满，总想乘机冲毁它。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袭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所有这些国家采取的克服危机的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国情不同，这两类国家建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美、英、法建立的，是以罗斯福"新政"为典型的"福利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要求在国内保存资本主义民主，在对外关系上以基本维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目的。德、意、日建立的，是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法西斯主义，它要求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国外进行侵略扩张，是处心积虑要冲垮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1]。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中，虽然罗斯福政府和胡佛政府的外交，都是在国内矛盾总和的影响下，在各种国际矛盾和斗争中纵横捭阖，力求保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争夺世界霸权，但是，由于两位总统和两个政府的内政政策不同、外交政策思想和识见不同，由于法西斯侵略势力膨胀程度有异等原因，罗斯福政府和胡佛政府执行的具体外交政策是有区别的，而且有时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在对苏关系方面，胡佛

---

① 从这一全局看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不从"九一八"事变算起，至少也应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才比较科学。

只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他看不到在日苏、德苏间建立均势外交的远景，无视在30年代初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美苏贸易关系缓解经济危机的好处，因而顽固反对与苏联建交。罗斯福则和他相反，在就任总统的头一年，便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对拉美关系方面，胡佛迷恋武装干涉拉美和高关税政策的眼前利益，虽然侈谈"睦邻"外交，但直到他下台，也未放弃武装干涉政策。罗斯福则认识到只有互惠才能扭转美国与拉美贸易的颓势，而且还考虑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稳定后院的问题，所以他逐渐放弃了对拉美的武装干涉，还和拉美国家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在对欧经济关系方面，胡佛既昧于时代的变化，又只顾美国眼前利益，他的对欧经济政策不独促进了欧洲金融危机，也加深了美国大萧条程度。罗斯福不独认识到胡佛这种完全不关心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难于让对方接受，到头来反而会害了自己，他还认识到放弃金本位的必要性，所以他在上任前一直拒绝与胡佛合作处理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对待法西斯势力膨胀方面，胡佛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厌恶法西斯，但由于他所崇拜的"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不过是"用某些文明规则改良了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他只是口头上叫嚷维持国际和平，却不愿为维持国际和平承担任何责任。他不像提倡和实行"新政"的罗斯福那样，感到"新政"国家和法西斯国家间，不独有争夺原料产地、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的问题，还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斗争的问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法西斯国家的无限制膨胀，就意味着"新政"式国家的灭亡。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罗斯福上台之初，就已感到这种斗争的严峻性，所以他虽然也曾像胡佛一样对法西斯势力实行过绥靖，但他一般是被迫的，而胡佛则是自愿的。

罗斯福把建立“新政”式国家看成是与法西斯国家斗争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新政”帮助工农群众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措施，是可以避免极权政体的。他曾解释过，他有时向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或其他势力屈服从而对法西斯势力实行绥靖，乃是为了争取选票，当选总统，以便继续施行“新政”。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之初，曾进行过迎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希特勒威胁的尝试，只是由于国内外势力的掣肘，他才未加紧进行。但是，他不断教育国人认识法西斯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危险，而且只要可能，他就从事备战活动，对法西斯国家发出警告，适当帮助受害国家。罗斯福后来把美国变为民主国家兵工厂，在反轴心国战斗中作出巨大甚至举足轻重的贡献，决不是偶然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美国社会经历过大萧条磨炼，通过实行“新政”迅速而大规模地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垮了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独挽救了美国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种经济基础的转变，自然会引起美国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减、构成与分布方面，表现在家庭结构、产业结构和公民社会地位的变化方面。上层建筑的变化非常复杂，本书着重讨论了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权分立制中总统与行政部门权力的显著扩大；联邦制由二元联邦主义转变为合作联邦主义；政党制中两大党由地区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政党，民主党更成为一个带改良主义色彩的资产阶

级政党，共和党则倾向于保守。在教育方面，总的趋势是有所发展的，但大萧条和战争都曾造成危机，降低过教育质量和在校学生人数，也引起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改革。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受到约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的实用性与社会性。但末流所及，也有缺点，于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经过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两位校长的倡导，主张以完整课程体系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人们逐渐取得胜利，使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宗教方面，从大萧条开始，全国教徒总数增长缓慢，到1937年才增长稍快，美国参战后增长更快。3大宗教中，新教徒仍占优势，其次是天主教徒。在这一时期，宗教中较显著变化是：新正教在美国的传播；社会福音运动的复兴。

关于学术思想的变化，我们着重讨论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7个学科。哲学方面，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学派，其次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此外，还流行过强调“万物皆流变”的过程哲学。经济学方面的主要变化，是反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新经济学派，逐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学派中带头的是制度学派，到3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政治学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常被称为关于科学主义争论的时期。新政治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梅里亚姆。这一运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全盛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奠定了基础。在政治哲学方面，杜威和查尔斯·比尔德则为“新政”的推行作出了贡献。在法学方面，罗斯福时代的主要变化是：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没落，社会学法学跃居支配地位。对社会学而言，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是它的领域标准化的年代；社会学中的相互作用、交流、社会过程、竞争、冲突、同化、适应、人格、集体行为等概念，都是在这一时

期获得其社会学意义的。除出现某些特殊研究方向外，在方法论上，还出现了计量社会学。在美国人类学发展史上，弗朗茨·博亚斯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为关于种族与文化决定论的现代人类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强调文化的概念。到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倾向。在这一时期，以查尔斯·比尔德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取代边疆学派，在历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虽然也出现过保守的修正派和企业学派，比尔德自己后来甚至也逐渐淡化了经济决定论，转而皈依多元史观与历史相对主义，但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史学家还是以比尔德等人史学思想马首是瞻的。

对文学艺术而言，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文学方面，30 年代左翼文学成为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文学取而代之。除主流外，还有支流：20 年代的迷惘文学仍然继续发展；南方文学在小说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从 20 年代黑人文艺复兴中涌现出了黑人文学。在文学评论方面，反唯心主义、清教主义与“优雅传统”的现实主义评论取得胜利。维护传统观点的新人文主义评论虽一度反攻，但由于它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久便渐渐败下阵来。30 年代左翼文学评论很活跃，但它的严重教条主义影响激起了内部分裂，还使一度消沉的唯美主义评论复兴一个时期。在艺术方面，罗斯福时代形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或形式主义）之间的尖锐斗争。有些现实主义艺术家，也难免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构成这一时代最优秀、严肃而又富有创造性内容的，乃是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美国的现代主义艺术，主要来源于逃亡到美国的欧洲艺术家的实践活动；美国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则对罗斯福“新政”政策的实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我们考虑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如我们将在第5章第5节中所论，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结果并非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就表明，罗斯福政府推进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实行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以为：要实事求是地阐明罗斯福时代美国社会发展史，就必须发展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于是，我们提出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还提出了30年代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①] 这本书具体论证了第1条新规律（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后美国史》具体论证了第2条新规律）。为此，本书前3章和第9章比类似书籍更详尽而明确地论证了美国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发展；第4、5两章论证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后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第6、7、8章论述了实行“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政府的外交及其与胡佛外交的不同；最后两章论述了“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

① 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2章。

起的美国上层建筑的变化。

二、实行“新政”意味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意味着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带根本性的，对这些变化性质的争论是很激烈的。但以往有关史学书籍中对这些变化和争论或者未涉及，或者语焉不详、不全面、不准确。而且，由于这些变化和争论涉及“新政”整体，我们在第2、3两章中也未论及或充分论及，这是我们用第4、5两章专门论述这些带根本性问题的原因。

三、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们注意了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思想、他的“新政”政策和他的外交政策的关系；罗斯福外交政策与胡佛外交政策的区别。关于希特勒进攻苏联前的美苏关系，我们也尽可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因实行“新政”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与之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过去，类似历史书籍、特别是我国的，对这方面的论述既少而且零碎，因而使我们对美国“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全面。所以我们用最后两大章对罗斯福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论述。

目　　录

第　一　章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不是一次一般的经济危机，而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严重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学者为了区别于其他历次危机，特称之为大萧条。这次危机虽然和19世纪初年以来的历次危机性质相似，但有它的特点。首先，它的程度比历次危机深，生产倒退、失业和人民遭受的贫穷痛苦比历次危机严重；其次，它牵涉方面比历次广泛，不仅工业、农业、金融业，而且对外贸易等都发生危机；第三，它涉及地区广，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第四，它持续时间长，至少有3年半时间，危机停止后陷于特种萧条，没有恢复到繁荣阶段又出现新危机；第五，它引起的阶级斗争最尖锐，斗争浪潮遍全国，少数人煽起法西斯的恶浪，部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思想激化，有的人甚至要求“学习俄国佬”。总之，这是一次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它的基本矛盾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经济危机，它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推到崩溃的边缘，对美国社会各方面影响至深。如果不对它的生产关系作某些改变，它的生产力就很难再发展。它使许多明眼人认识到，亚当·斯密

所描述的自由市场已永远消失，它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亦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性的认识与要求。要克服这种经济危机，再完全靠以往美国政府、特别是12年来共和党政府坚持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让市场机制去自我调整，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引起危机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造成这一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美国的生产社会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次经济危机其所以空前严重，则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当时的特定矛盾有关；也就是说，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新的发展，与以往不同，它已达到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允许的程度。

〔国民生产的大幅度提高〕 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1923至1929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大多数美国学者称为“繁荣的年代”。在这10年间，美国发生一次技术革命，工业管理水平也急剧提高，国家发出的专利证比美国历史上任何10年都多。20年代初，19世纪末弗雷德里克·W·泰勒发起的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所谓科学管理方式或“生产合理化运动”，已被工商业几乎每一部门不同程度地接受；亨利·福特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装配线流水作业法，已在许多工业部门站稳脚跟。无论工业和农业，日益使用半自动化、自动化的机器。电力占工厂主要动力的比重，从1914年的39%增加到1927年的78%。工业研究日益发展，到1927年，至少有1000家公司或者独立或者联合进行研究工作，以改善生产或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发展副产

品和新产品等。汽车工业、建筑业、收音机与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公用事业等飞跃发展。

与此同时，20 年代美国还出现一次企业合并的浪潮。在 1919 至 1929 年间，工矿界约有 8000 家独立的公司合并为 1268 家联合公司。不仅千百个小公司被合并，许多大公司也纷纷联合成为规模更大的公司。1920 年至 1929 年间，有 49 家大公司（每家资本都在 5000 万美元以上），通过股票的控制或财产的购买等方式，同其他大公司合并。

这样，20 年代美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就急剧提高。1919 至 1927 年，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53%左右。1920 至 1930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约 26%。1919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 742 亿美元（按 1929 年美元计），1929 年，它又第一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达 1031 亿美元。

〔资本过剩、工农群众购买力严重不足〕　美国 20 年代虽然一般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迅速，但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过度贪婪，工农群众斗争火力不足，联邦政府放任，作为基本消费者的工农群众的收入过低，再加上垄断造成的生产迅速增长情况下的价格稳定[①]，很容易形成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农业方面看，农业危机虽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在 20 年代，由于战时过度扩张和战后欧洲市场急剧缩小，由于农业生产

---

① “1929 年时……许多产品价格一直通过合伙经营稳定在高水平之上。比如，有铜与棉花联营、加拿大的小麦联营、巴西的咖啡联营、古巴的糖联营、澳大利亚的羊毛联营。这些联营保持的高价格已导致生产过剩，时间愈久愈危险，这些商品的积累速度完全超过消费，终于使这些联营不再能维持市场；而当最后清算的一天来时，价格就惨跌”。见弗雷德里克·L·艾伦：《仅仅是昨天》，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6，第 381 页。

调整的速度不能适应美国人民食物爱好的变化，由于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减慢，由于来自世界各地日益剧烈的竞争，美国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下降更快。从1920至1929年，农场总收入指数从209降为163，雇农工资指数从239降为170[①]。反之，农场财产税却增加1倍。1929年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为750美元，而按农业人口平均收入则只有273美元。由此可见，20年代美国农民购买力的下降是十分显著的。

在工业方面，虽然1920至1929年之间，总产值增加50%以上，但发展很不平衡。工人就业总人数一般说几乎没有增加，煤矿、交通运输、纺织、造船、制革等业还有所减少；新技术、新机器、新管理方法排挤了大批工人[②]，在业工人平均工资，10年来有升有降，但1929年的平均工资还低于1920年的，1920年工业工人周平均工资为26.30美元，1922年为21.21美元，1926年为24.65美元，1929年为25.03美元。公用事业、贸易部门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多，从1920至1930年，仅服务业就增加240万人，但他们的工资一般很低。反之，20年代工商业家不独由于技术革命和企业合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而且通过1921、1924、1926和1928年4次税收立法，大大降低了他们和高收人

---

① 两者均以1910—1914=100。

② 关于20年代失业人数估计，各家说法分歧很大。根据《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至1957年》(华盛顿，美国普查局，1960)第73页，1920年的失业率为4%，1929年为3.2%。杰弗里·佩雷特根据大量资料，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估计没有计入转入服务业的工人，没有考虑每年将50余万劳动力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增长，也未计入大量离开农场到城市找工作的人，因而是很不正确的。实际上"即使在就业情况最好之时，失业率也高于10%。"(杰弗里·佩雷特：《20年代的美国》，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82，第323页)1928年，巴尔的摩市派警察沿家调查，发现全市失业率为42.5%；美国劳工联合会声称全国工会会员失业率为18%，如此等等(同上书，第321—322页)。

阶层的纳税负担。因此，到1929年，国家财富的3/5由2%的人所拥有；36000个高收入家庭的进款总和大致等于1100万个低收入家庭的进款总和。从1920至1929年，按全国总人口平均的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即纳税后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为693美元，约提高9%。但在同一时期，占总人口的1%的最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却从7492美元增为13114美元，提高约75%。也就是说，美国1%的人占有全国可供自由支配的年平均总收入，在1920至1929年间，估计从12%上升为19%。美国国民收入从594亿美元增为872亿美元，但分配极不平均，成为利润也就是潜在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多，而作为工薪也就是消费支出的部分，却相应地减少，这就加深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且，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20年代的商业资本家大规模利用分期付款方式和骗人广告推销商品。据估计，1926年约有70%的小汽车是这样推销的。从1924年至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约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到20年代末，分期付款的销售额约占全国零售总额的15%。这种大量预支购买力的趋势，促使20年代末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

此外，由于资本积累与集中速度高，而生产能力又只能利用70%—80%，投资出路日窄，20年代便有大量资本进入投机市场。加之当时社会风气特别鼓励人们发财致富，人们的盲目乐观，广告商的花言巧语，又令人多少感到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可能[①]。因此，不独大资本家进行疯狂投机活动，一般中等收入者和部分工人也争购股票，到1929年夏，约有100万以上股票市

---

① 约翰·拉斯科布在《女士之家杂志》上题为"每个人本应富起来"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人只要每月储蓄15美元，并将之购买可靠的普通股票，利滚利，到20年之后，就将有至少8万美元和每月至少400美元投资收入，这是举手之劳，发财的大门敞开着。（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前引书，第345页）。

场顾客。从1925年1月1日至1929年10月，列人纽约证券交易所价目表的股票，从4.434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据估计，20年代的股票市场交易，约有90%是投机性的。评价股票价值的传统基数是10倍收益，但到1929年，有些股票是以50倍或更高价值出售的。这种趋势，最后必然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

〔形成大萧条的国际原因〕　在2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1928年顺差额最大，达10亿美元以上。共和党政府一面力图维持这种顺差，一面又实行高关税政策，减少甚至阻止外国商品进口，从而使美国出口下降。因此，美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只有靠对外贷款维持。再者，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占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对加拿大、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出口，也占一半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不仅经济十分困难，黄金储备接近枯竭，而且仅战债就欠美国115亿美元以上。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也超过它们偿还能力，美国的这种对外贸易顺差必然使它的债权国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大大增加其对外贷款的风险，更加限制了美国剩余资本的出路。1928年6月或7月以后，美国证券市场开始出现恐慌，投资者开始减少对外贷款，立刻使美国输出锐减。这种情形，当然加剧了20年代晚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再者，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帝国主义向国外转嫁危机，愈来愈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比如，1922年4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和其他帝国主义一道，要求苏联将收归国有的一切外国工厂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偿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取消苏维埃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遭到了苏联的坚决拒绝。又比如，西亚、北非盛产石油，又是战略要地，美国一直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西亚、北非

各国人民掀起了反对英、法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的斗争，猛烈冲击着那里的殖民体系，美国一时也难插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20年代美国虽然积极进行扩张活动，比如在中国，它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把对华贸易从1913—1914年占中国总贸易额的7.5%，增加到1930年的16.5%，在拉丁美洲，它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主宰。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拉美人民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都对美国的经济扩张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逐步改变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从赤裸裸的经济侵略改为互惠贸易——就是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结果。

二、危机的过程

一般认为，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从1929年10月下旬股票市场崩溃开始的。诚然，这次崩溃是引起美国经济各个组成部分连锁性迅速解体的导火线，但是如前所述，这次危机是20年代以美国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中心的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股票市场崩溃前局部的、程度较轻的萧条〕　比如，农业萧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就开始的；棉纺业、造船业、制鞋和皮革工业、铁路运输业等，在1920至1921年经济衰退以后一直未恢复；烟煤采掘业自1923年以后即陷入半萧条状态；就是作为20年代经济繁荣支柱的建筑业和汽车工业，也分别于1926年和20年代末发展到了顶点。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K·加尔布雷思指出：“早在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初夏时期，美国经济

已经变衰弱。”[①]

由于上述削弱工农群众购买力、增加商品与资本输出困难从而使生产和资本过剩等因素，垄断资产阶级所获高额利润用于工农商业投资绰有余裕，乃大量用于证券等投机活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额，从1923年的2.36亿股增加到1926年的4.51亿股。到1927年，股票市场就掀起第一次巨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额，从1926年的4.51亿股，增加到5.75亿股。1928年的最初数周，证券市场已有崩溃之势。由于柯立芝总统和财政部官员的欺骗宣传等原因而稳定下来。1928年3月初，一批最大投机商又大量买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无线电公司股票，投机狂扩散着，证券市场价格已形成狂涨之势。

这次投机浪潮持续到1928年6月中，此时股票价格稍降。在以后的16个月中，有时回升，有时下降，但常能恢复到原来水平，而且上升到新的高度。

〔*1929年10月证券市场大崩溃*〕　到1929年初，股票市场狂热已失去控制。是年夏天，股票价格远远超过前冬暴涨的水平，直上蓝天，9月3日达到高峰，一度下降后，又于9月19日达到更高水平。从下面几个数字可以看出近几年股票市场投机活动的疯狂程度：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列全部证券的市场价格，从1925年的270亿美元，于1929年10月1日跃至870亿美元；普通证券平均价格，增长几达300%；证券上市数量，从1925年的4.54亿股，增为1929年的11亿股；用于资助投机的证券经纪人放出的贷款，从1926年1月的35亿美元，增为1929年9月30日的85亿美元。

---

① 约翰·K·加尔布雷思：《1929年大崩溃》，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1，第179页。

9月26日，由于英格兰银行为停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或银行利率6.5%；9月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回数亿美元，使得美国股票市场这次价格下跌比以往的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短时期回稳后，到10月15日，开始出现抛售现象。由于大投机者抛出较审慎，开始时尚缓和。到10月24日那个“黑色星期日”上午，证券市场就完全陷入恐慌之中[①]，成交额达12,894,650股，价格下跌之速，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赶不上。11位著名投机者自杀。

就在这天下午，摩根公司和其他一些银行巨头，为防止股票市场崩溃和保护自己的贷款与投资，拿出2.4亿美元联合基金，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股票，股票行市逐渐稳定下来。以后两天，股票市场情况也还不错。于是，美国财政部官员、一些首要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大城市报纸都出来向公众保证：股票价格下跌问题不大，还可腾出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对美国经济是有益处的。10月25日，胡佛总统还发布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②]

但是，胡佛文告刚发布3天，股票价格再次惨跌。而且，最坏的情形还发生在第2天——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这一天，“大量股票投入市场，不计价格地抛售……不仅无数小商号抛售股票，大商号亦然……而且简直没有人考虑买进，……开盘后半小时，成交额已超过300万股……鸣锣收场时，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16,410,030股。收场时股票价格虽有所回升，但根据《纽约时报》统计，此时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40

---

①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从当天出现的纷扰、恐惧、慌乱来看，10月24日应被看作1929年恐慌期的第一天。见所著《1929年大崩溃》，第103—104页。

② 威廉·迈尔斯与沃尔特·牛顿：《胡佛政府实录》，纽约：斯克里布纳公司，1936，第23页。

档。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市场——外国股票交易所、美国较小交易所、谷物市场，价格惨跌也接近恐慌程度。”①

到11月中旬初，股票价格又一次惨跌。“柯立芝—胡佛繁荣……处于垂死状态。在这种惊慌的冲击下，许多一向不受人注意或被证券市场乐观情绪掩盖的病害，开始围攻整个经济驱体，好像当某一关键性器官不再起正常作用时，病毒渗入整个人身一样。”② 这些病毒是：“资本生产过剩；企业公司过份扩张；由于分期付款购买和股票市场利润购买造成的商品生产过剩，对许多商品保持人为价格；对欧洲贸易的不景气状况。不管有多少高级财政人员声称百事顺逐，不管胡佛总统怎样热心地用好听的话语和白宫会议来弥补已造成损害，一次重大的萧条不可避免地开始了。”③

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股票行情间或回涨，但总的趋势是下跌的。当1933年7月股票价格跌到最低点时，大约有740亿美元（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3倍），或者说1929年9月价值的5/6消失了。

〔1929年10月到1933年3月的全面萧条〕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说：“证券市场的崩溃，虽未立即彻底摧毁、但却严重动摇企业界的信心，削弱金融制度，减缓工业发展速度，而且紧缩美国海外购买与投资。这种减少国际市场美元开支的结果，实际上是挖国际经济的墙脚，又在1931年造成欧洲严重金融危机。欧洲人对付这种危机的办法，只是采取一些最后摧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政策。欧洲金融崩溃，又进一步造成美

---

① 弗雷德里克·L·艾伦：前引书，第371—372页。

② 同上书，第376页。

③ 弗雷德里克·L·艾伦：前引书，第376页。

国银行的紧张，并加深工、商业萧条。"[1] 虽然这段话对证券市场崩溃加深经济萧条的迅速而剧烈的程度还刻画不足，但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的第 8 天，即 192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股票市场之外也传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美国经济的根基似乎在腐烂。"1 星期以来铁路货车运输量比 1 年前减少很多。钢价从上星期起大降。更严重的是，这种惨跌已延伸到一般商品市场。以前，这些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反应不是推波助澜的。但本星期三它们有自己的苦恼。几星期来，这一天棉花成交量虽最大，但棉价剧跌；小麦市场在中午时价格直线下落，人们提出了'恐慌'的问题。"[2] 直到 12 月底，经济情况继续恶化。

1930 年前 3 个月，经济健康似有恢复之望，但到 4 月，这种希望又开始破灭，物价下降，生产指数下降，股票市场发生一系列风险，人心惶惶。到 12 月末，物价跌到惊人程度。以小麦为例，1929 年最后数日 1.35 美元的冬小麦，到 1930 年最后数日降为 0.76 美元；同一时期的夏小麦售价，从 1.37 美元降为 0.61 美元。与农产品价格惨跌同时，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到 1930 年末，企业下降到低于正常情况的 28%，失业者约 600 万人。股票价格在 1930 年夏天稍有起色之后，到 12 月末，比一年前恐慌后水平还低得多。1930 年倒闭的银行，达1,000 家以上。

1931 年初出现微弱的好转迹象，但自 3 月份起，由于德国酝酿德奥海关合并，作为德奥政治合并的一个步骤，法国银行家们要求立即支付他们手中握有的大批德、奥短期票据，于 5 月间

① 见所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中册，第 9—10 页。

② 约翰·加尔布雷思：前引书，第 131 页。

迫使奥地利的最大银行——维也纳银行破产，从而威胁到德国主要私营银行与保险公司，造成德国黄金再一次大量外流，到6月间已无力偿付战争赔款，更无力偿还短期债务。接着，这些法国银行家又开始撤回他们存在英国银行的大量黄金，使英格兰银行在1931年9月21日不再支付黄金，英国政府也放弃金本位制。

这次欧洲的金融危机，终于摧毁了资本主义世界现存国际汇兑与贸易制度，引起西欧显著的萧条，同时大大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因为，第一，1931年春季，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和银行要求支付他们原存美国的价值15亿美元黄金的大部分，迫使将这笔存款贷出的美国银行大量收回国内贷款；第二，美国银行由于担心自己手中10亿多美元的德国短期商业票据和银行承兑票据到时不能兑现，更加要求偿还贷款以积聚流动储备金；第三，欧洲的金融恐慌促使外国人在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投放大量证券，加深美国证券市场危机；第四，汇票的贬值和丧失作用，终于阻滞了对外贸易，对商品市场造成灾难性影响。

1931年夏，欧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的这些影响，和其他因素一道，使1月以来出现的美国经济的微弱好转迹象消逝得无影无踪，反而陷入更严重的萧条。1931年秋至1933年4月，是这次经济危机最悲惨的时期。

下面一些统计材料，揭示出1929至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总趋势和严重程度。在工商业方面，代表美国人民购买工业、铁路、公用事业及其他股票和债券的新资本发行额，从1929年的100亿美元减为1932年的10亿美元多一点。外资投放量以及政府和公司投资，从1928年的15亿美元高额，降为1932年8,800万美元。从1929年到1932年春，工商企业破产的达109,371家，

其负债额近30亿美元，而全部私营公司纯利润，则从1929年的84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34亿美元。[①] 作为20年代经济繁荣支柱的钢铁、汽车、建筑等业衰退情况，更是惊人。铁产量从1929至1932年间骤减79.4%，倒退了37年。钢产量同期减少76%，倒退了28年。钢铁业巨头美国钢铁公司开工率，只达19.1%。汽车产量在1929至1932年间下降74.4%，由5,358,000辆下降到1,370,000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如施图茨、奥伯恩、科德、爱德华·皮列、皮尔斯·阿多、杜森贝克、富兰克林、杜兰特、罗科摩比等等，都逐渐消失了。建筑合同（按37州材料计算）从1928年最高点降到1933年最低点，下降81.5%。与此相应，失业数字逐月逐年增加。根据官方统计，1930年4月美国失业人数近320万人，到1933年3月、上升到1,500万人，4月，每3个工人中有1人失业。威廉·福斯特所引美国劳工研究协会在《美国劳工实况》第2卷中所载数字，1933年美国失业人数为1,700万人。[②] 半失业者则无法计算。幸而找

---

① 也有这一种说法："就全国公司来看，1929年利润为100亿美元，而在1932年，不仅没有赚钱，实际上反而亏损了大约13亿美元"。见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707页。

② 见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313页。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H. N. 沙伊贝、H. G. 瓦特、H. U. 福克纳：《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史》也认为这个数字较合理，见该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反之，官方数字很不可靠。据欧文·伯恩斯坦研究，1930年4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有关机构和人士的督促下开始统计失业人数，当月宣布为3，187，947人，胡佛总统极不满意这个数字，毫无根据地改为1，900，000人，私家统计则为4，400，000人。后来，国会在自由派议员促进下通过法案，规定由劳工统计局统计失业人数。胡佛虽被迫签署此法，但拒不执行，并自己任命一个就业统计咨询委员会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也被束之高阁。由此可见，胡佛政府是一直反对统计与公布实际失业人数的，它所公布的数字大大低于实际失业人数。见伯恩斯坦：《困乏的年代，1920—1933年美国工人史》，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第268—269页。

到工作的人，则深感工资削减之苦。1931 年秋季以后尤甚。从 1929 到 1933 年，劳工总收入从 530 亿美元减为 315 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陷入不景气的农业，1929 年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后，情况更惨。农业产量虽然基本保持稳定，1932 年产量甚至比 1929 年为多，但农产品价格比伊丽莎白时代以来任何时候的都低。因此，1929 至 1932 年间，农场平均净收入从 962 美元降为 288 美元，每个农民纯现金收入，从 162 美元降为 48 美元，农业总收入从 119 亿多美元降为 53 亿美元，抵押农场被取消赎回权的比率，增加了 1 倍。

在金融业方面，25 种有代表性的工业股票价格，从 1929 年平均最后成交价格每股 366.29 美元，降为 1932 年的 96.63 美元。1929 至 1932 年间，破产银行达5,761 家，其储蓄额近 35.53 亿美元，使千百万美国人存款成为泡影。

进出口贸易的下降更是惊人。进口的货物和原料总值，从 1929 年的近 45 亿美元，降为 1932 年的 13 亿美元；出口总值从 53 亿美元，降为 17 亿美元。

表明经济中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29 年的 1,044 亿美元下降到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整个国民收入从 1929 年的 878 亿美元，降为 1933 年的 402 亿美元，和生活费联系起来计算，平均每人收入由 681 美元减为 495 美元。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解体〕　美国金融实力在 1931 年夏欧洲金融崩溃之后进一步下降，银行资产从 1931 年 6 月 30 日的 702.09 亿美元降至 1932 年 6 月 30 日的 572.451 亿美元，银行存款减少约 90 亿美元，各种解体力量开始危及美国资本主义的根基，逐步酿成金融恐慌。挤提存款和退款数量之大，使银行无法应付。第一个危机迹象出现在 1932 年 10 月 31 日，当时内华达州州长宣布该州银行休业 12 天，以防止许

多重要银行破产。到1933年2月14日，密歇根州州长也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休业8天，说是“银行放假”。这时，全国18，568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9亿美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美元提款，而且库存黄金每天减少2,000万美元，为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低价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歇根州银行垮台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骤增至3,700万美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美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到2月24日深夜，马里兰州州长又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

2月26、27日，100多个城市的银行宣布限制提款数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签署1个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到3月2日，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即将停业，据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数字，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2.26亿美元，由于财政部没有钱，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3月3日，银行挤兑风暴，在各州肆虐17天之后，向着美国两大金融堡垒——纽约和芝加哥猛吹。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的3月4日凌晨，包括纽约和芝加哥在内的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所有银行停止付款，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各州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都正式关门。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的统治，几告崩溃，全国经济生活陷入严重混乱和窒息状态。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1932—1933年冬季就像是“世界末日”[①]。1933年2月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召集企业界领袖开会，征询他们对危机的看法和对策。大多数人除平衡预算这个不能解决

---

① 转引自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第18页。

问题的老办法外，提不出新见解、新办法，少数人甚至认为没有挽救之策。2月尾，企业界、金融界头面人物J. P. 摩根认为："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①] 政界人士也再无法假装乐观。1933年初，前总统加尔文·柯立芝死前4天说："在其他萧条时期，总可以看到能够寄托希望的事物，但现时举目四顾，却看不出任何希望。"[②] 就是一向比较乐观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当2月24日马里兰州银行垮台时，也曾大声惊问，到总统就职之日，这整座用纸板搭成的房子，会不会已经倒塌？[③] 前总统胡佛在罗斯福就职翌日说："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已无能为力。"[④] 3月7日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长威廉·伍丁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⑤]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说："美国人民现在面临的紧急状态比战争还要严重。"[⑥]

至于知识分子，如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由于20年代的实利主义使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这时最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已到了尽头"的感觉[⑦]。1931年著名作家罗伯特·舍伍德就曾写道：当前整个一代人处于一个弹痕累累的无人地带、一种"介乎两个时代之间的荒凉黑暗的间隙"。前面只是"漆黑的疑团，间或射出不祥的闪光，让人瞥见那些令人不安的

---

①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第102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28页。

③ 1933年2月26日海勒姆·约翰逊给查尔斯·K·麦克拉奇的信，约翰逊手稿。

④ 约翰·布卢姆等：《美国经历》，第3版，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73，第629页。

⑤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109页。

⑥ 威廉·Z·福斯特：前引书，第277页。

⑦ 小阿瑟·M·施莱辛格：《旧秩序的危机》，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7，第205页。

事物。后面……除一些怕人的焚毁桥梁残骸以外，一无所有。"[①]著名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说："我对自由主义感到伤心的是：它使人看不见希望……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②]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写道，"这个伟大、古老、一直是成功的社会的成员们正在自问：西方生命及其成长的长期历程，是不是在他们的时代很可能将到终点。"[③]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正如史学家艾伯特·林德利所说："罗斯福先生是正当美国旧制度一败涂地之时就任总统的"。[④]

三、经济大危机的社会影响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这一点，许多美国学者也不讳言。有些人还认识到，这种影响震撼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有位历史学者说：当时"美国经济和人民遭受的普遍经济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有过恐慌衰退和通货膨胀，但大萧条对人民生活而且最终对美国政治制度性质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⑤]。虽然胡佛政府及其御用宣传工具当时尽量粉饰太平，但从留下来的材料，也可看出这次危机对美国人口、家庭、教育、道德信念、特别是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严重影响。

〔对人口、家庭、教育、道德信念等的影响〕　大萧条期

---

①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05页。

③ 见所著《国际事务概览：1931》，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2，第1页。

④ 见所著《罗斯福革命》，转引自约翰·布雷曼等编：《联邦新政》，美国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第7页。

⑤ J．约瑟夫·胡特马赫尔："大萧条"，欧内斯特·科尔梅茨编：《美国历史研究》，美国康涅狄克州，杜什金出版社，1974，第2卷，第376页。

间，结婚的人数急剧减少。1929 年，美国结婚的人有1,233,000对，到 1932 年，减为 982，000 对。生育率在 20 年代末约为20‰，1933 年减为 16.6‰。而且这期间出生的孩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萧条的一代”，其特征是身材小，对劳动力产生不良影响。就是那些不是出生于这期间的青少年，由于营养不良，在 8 年后服兵役时，检查身体有 40% 不合格。

大萧条对家庭的严重影响，可从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1932 年 11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得知梗概。这份报告说：“失业与失去收入已经破坏了许许多多家庭，使这些家庭成员精神颓丧，失去自尊心，摧毁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与可雇佣性，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许多家庭解体，幼小子女寄养在朋友、亲戚家或者慈善团体，夫妻、父母子女暂时地或永远地离散……

“许多家庭外表上依然未变，但道德上崩溃了。他们感到没有安全，没有立足点，没有前途。储蓄耗尽，债台高筑而无还清之望。于是在经济上采取权宜之计，妇女儿童都参加劳动，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家庭的稳定。申请慈善机关帮助的人大量增加。但慈善机关资金不足，食物供应量减少，人们常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赶出住处。物质的匮乏使身心都受到损害。家庭的平静与和谐消失了，对儿童的影响虽各家不同，但都是有害的。”①

由于家庭蜕化变质，出现许多罪行：偷窃、殴打、甚至凶杀，卖淫显著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急于补贴家用的已婚妇女中间，男女乱交盛行。尽管有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喝酒和酗酒的人增多。

由于地方政府大部分税收用于教育，税收危机必然使中小学教育受到影响。到 1931 年 9 月，甚至大城镇也开始削减教员薪

---

① 转引自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 321—322 页。

水，平均每个教师教的学生大量增加。校舍建筑开始推迟，少数社区的学校关了门；1933年3月，约有33万儿童失学，有些州特别严重，佐治亚州关闭了共有17万学生的1，318所学校；亚拉巴马州白人农村学校81%的儿童被迫休假；阿肯色州有300多所学校全年只开学60天或不到60天；1933年2月，新墨西哥州人口稀少地区，有8,000多学龄儿童到处游荡；西弗吉尼亚州1，000多所学校静悄悄地停学了。就是教育一向很先进的俄亥俄州，各校也都缩短学期，有些县立学校只开学7个月，代顿市学校每周只上3天课。

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学生家就餐。堪萨斯州乡村教员每月月薪只有35美元，而且1年只发8个月。阿克伦市欠教师薪水33万美元，扬斯敦市欠50万美元，底特律市欠80万美元，芝加哥市的情形更是典型，该市从1931年5月至1932年5月，只发给教师月薪5个月，所欠教师薪水超过2，000万美元，市政府还裁掉1，000个教师。留下的教师中，有759人被房东赶走，有些人拿保险单共借支1,128,000美元，并以42%的年息向高利贷者借了232,000美元，不过即使如此，他们还掏腰包养活11,000名小学生。

戴维·香农说："永远没有人能计算出，由于大萧条期间美国儿童所受教育太差，美国文明付出了多少代价"①。

公私立高等学校的预算都有所缩减，一般说，州立高等学校受打击最严重，州政府拨款减少31%，私立大学所得捐款只减少19%。不过，高等学校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中学毕业生上不

---

① 戴维·A·香农编：《大萧条》，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0，第93页。

起大学，1931 至 1934 年之间，全国高等学校总入学人数减少 8.5%。一般说，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中间，大都有严重贫穷问题，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和学习。

大萧条最严重的社会影响，是美国人民的道德与信念发生动摇。精神消沉比经济萧条更严重。一度宛如玫瑰花一样美好的前途，看不见了，官方号召振奋起来的呼吁，听起来不过是安慰人的空话。1932 年，当胡佛夫人请求人们“对那些偶遭不幸的人友好和亲善时”，她得到的只是嘲笑，胡佛总统要求喜剧演员逗人们嘻笑，但大部分笑话是针对他的。比如，当一位喜剧配角说“企业正在取得进展”时，喜剧演员问道：“胡佛死了吗?”

人们道德信念崩溃的例证是很多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施瓦布说：“我担心每个人都心怀忧惧”。失业的人已失去活力，闲暇成为痛苦。青年人无所适从，而且麻木不仁，认为再也不会找到工作。需要自力更生的人失去了自力更生的意志。一个宾夕法尼亚州失业者写信给该州州长吉福德·平肖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1933 年，有 40 个有经验的速记员在失业至少 1 年以后被召回工作岗位，但他们在雇主面前听口授时，情绪老是稳定不下来。精神病医生报道，人们的心理健康恶化。1929 年，1 万人中只有 14 人自杀，1930 年增至 15.7 人，1931 年增至 16.8 人，1932 年达 17.4 人①。

〔工人和城市人民的极度贫困〕　除失业情况前面已有所提及外，在股票市场崩溃后的第 1 年里，由于胡佛要求企业界维持原工资的政策产生一定效果，比较稳定，但到 1930 年下半年，情形开始改变，特别是胡佛政府提倡“有工大家做”的政策，迫使工人减少工时，工时一缩短，周工资和年工资就会减少。根据

① 参阅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 331—332 页。

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统计，制造业的平均周工资，逐步从1929年第3季度的28.63美元，降为1931年第3季度的22.23美元。阿勒格尼烟煤区挖煤工的平均工资，从1929年一个有代表性的半个月的52.91美元，降为1931年5月下半月的34.89美元。玻璃工人平均周工资从1929年的30.39美元，降为1931年的20.06美元，家具工人的则从24.52美元降为16.88美元，机械工人的从32.06美元降为24.22美元。年工资下降也很剧烈，制造业全国平均年工资从1929年的1,315美元，降为1931年的1,110美元[①]。

1931年秋季经济危机剧烈升级后，不独失业人数猛增，在业工人工资也迅速下降。制造业生产工人平均周工资，从1931年的20.87美元，减为1933年的16.73美元，下降19.8%；煤矿业从17.69美元，减为14.47美元，下降18.2%；铁路业从26.76美元，减为23.09美元，下降13.7%。由于生活费用同时

---

①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主要由于需求不同和工会力量有强有弱，各业工资下降情况很不相同。据利奥·沃尔曼计算，大萧条前两年每人每年周工资变化百分比见下表：

业　　别	1929—1930	1930—1931
烟煤业	－12.3	－19.1
金属矿业	－6.6	－18.3
制造业	－7.2	－11.3
无烟煤矿业	＋1.8	－14.4
铁　　路	－1.9	－3.5
贸　　易	＋1.3	－2.8
公用事业	＋2.2	＋1.0

材料来源：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261页。

第二，由于生活费有所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不及名义工资下降迅速。根据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材料，制造业的名义周工资从1929年9月到1931年8月下降28.8%，而实际周工资则只下降13.1%。

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幅度不及名义工资的幅度大。

从上面这些统计数字，还看不出1932至1933年极低工资的情况。比如底特律的布里格斯制造公司，只付给男工每小时10美分，女工每小时4美分。有人调查355名芝加哥百货公司女职工，其中294人每小时工资少于25美分（一半以上少于15美分，1/4的人少于10美分，24人少于5美分）。也有人提到没有工会的煤矿区矿工每日工资平均为1.5美元。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城的工资率大体与此相同。宾夕法尼亚州劳工部发现有的锯木厂工资为每小时5美分，砖瓦厂为6美分，建筑业为7.5美分。康涅狄克州劳工局长报道，该州100多个血汗工厂女童工每周劳动55小时，所得工资在60美分至1.1美元之间。

失业的人这么多，在业的人工资这样下降，据《幸福》杂志1932年9月号估计，除农村受难的1,100万户人口不计外，全国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工人缺衣少食、健康水平下降的严重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描述当时城市里贫困状况道："城里的妈妈们在码头上徘徊，等待扔出来的腐烂水果蔬菜，以便及时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在码头装上卡车后，她们就跟在后面跑，时刻准备着拾起掉下来的任何东西。中西部地区一位旅馆厨师把一桶残羹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10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66岁的内科医生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临窗刮脸，往外一看，有3个干瘦憔悴的老年妇女，在垃圾桶上从里面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找骨头和西瓜来啃。芝加哥市一个寡妇去拾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免得看见蛆虫。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饭店

附近来回踯躅，把垃圾箱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食物。'"[①] 宾夕法尼亚州矿工吃野草根和蒲公英，肯塔基州矿工则以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萵苣等果腹。1932 年底，宾夕法尼亚针织工人工会宣称，该州"有数以千计的家庭处于饿死的边缘。"[②]

连糊口都这样困难，穿和住的问题当然更无从谈起。靠救济维持生活的家庭的家长，常常是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帽子像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破球鞋贴满了橡胶补钉。由于交不起房租，纽约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其他城市也一样，许多人家踯躅街头。后来交不起房租的人太多，只好让失业者缓交房租，但房屋及室内设备长期失修，居住条件日益恶劣。

这样的生活当然容易引起疾病。米尔班克纪念基金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合作，在 8 个城市调查了7,500 个家庭的健康状况。1932 年，每人年收入少于 150 美元的家庭，其犯病率较每年收入 450 美元或更多的家庭，约高 40%。那些 1929 年以来收入骤降的家庭，犯病率最高。失业者家庭的犯病率，较非全日工家庭的高 27%，较全日工家庭的高 66%。工人子女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1932 年 12 月 18 日《纽约时报》载有劳工部儿童局局长格雷斯·艾博特一篇文章，题目是：《儿童与萧条：一个全国性研究与警告》。其中说："去年，公私机构可能花了 10 多亿美元作为救济失业之用。虽然此数约为平时救济费的 8 倍，但是，凡到过大城市、单一工业市镇和矿区失业者家庭的人，都报道说：为了使所有贫困儿童有地方住、有衣服穿、又有合适食物，这个数目是不够的……

---

① 见所著：前引书，第 56—57 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 《国会记录》，参议院，1932 年 12 月 30 日，第 1113 页。

“虽然〔婴儿与儿童〕死亡率尚低，但有许多证据表明：许多儿童的健康已受到长期萧条的有害影响。比如根据医院和诊所的报道：儿童中犯软骨病的日多；纽约市的失业救济工作比起任何其他大城市来，也许是较为接近于满足需要的，但据市卫生部报告，1932年接受检查的学童，有20.5%营养不良。……

“在极端萧条、救济工作十分薄弱的地区，营养不足的现象更是普遍。这些地区是矿区、[①]‘单一工业市镇’，那里的人们几年来便没有工作或很少工作；还有那些除萧条外又遭受水旱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地区。”

比这种缺衣少食、健康下降的情况更惨的是：饿死人的事并不稀奇。《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有许多记载。“仅纽约一市，1931年记录在案的饿死街头事件，就有2,000起”[②]。1932年，纽约《晚画报》报道了一系列饿死人的事件。

1932年12月24日，后来罗斯福智囊团著名人物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冬天，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人，没有不深感不安的。我的确认为，在现代，从来还没有过这样普遍的失业现象，和如此令人伤感的真正饥寒交迫的苦难。”[③]

照艾博特的说法，其他各大城市的失业救济工作，一般不及纽约市的好；纽约市尚且如此，其他各城市工人状况，恐怕难比纽约的好些。专门研究1920至1933年美国工人状况的著名学者

---

① 比如，1931年9月9日鲁思·福克斯医生在致《民族》周刊编者的信中谈到西弗吉尼亚矿工子女健康时指出：这些儿童高度较标准高度低12%；由于食谱关系，加上断奶后未喝牛奶，他们对传染病抵抗力弱；他们没有鞋穿，冬天不上学；有个市镇水源污染，伤寒与痢疾流行。整个矿区儿童死亡率很高。

② H.B.西瓦切夫、E.Φ.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中译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第77页。

③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9页。

欧文·伯恩斯坦评论道："在1931年秋至1933年春之间，压在工人身上的经济社会负担，在美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①

〔愈来愈悲惨的农民生活〕 据戴维·香农的看法，"究竟是城市失业工人还是农民受萧条之害更严重，很难说清楚，两者均为贫困所苦……"② 不过，也正如他所说，农民没有享受过20年代的繁荣，他们的处境早已被公认为不能忍受，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使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虽然他们一如既往地从事长时间的、艰苦的劳动，产量也没有减少，但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卖不出，或者只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1932年一位观察家报道："从南、北卡罗来纳起，一直伸展到新墨西哥，地里的棉花都没有采摘……。葡萄园里还有未摘的葡萄，橄榄园里挂满正在溃烂的果实，柑桔以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③ 西部牧场主牲畜销不掉又养不起，只好宰了抛进峡谷。这就说明，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劳动，而大量劳动却成为白费气力，通常还要亏本。另一方面，抵押借款利息却没有减少，而且自1914年以来，赋税负担又增加了1倍。再加上农民必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不像农产品价格下降得那样剧烈。从1929至1933年，农产品价格下降63%，工业品价格只下降15%。所以，农产品购买力只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半。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农民处境的悲惨是可想而知的。德国作家卢特威描写当时美国农民状况说："美国农民的人口，约占全国1/4，易言之，即有3,000万人民，敝衣恶食，无力付债息，更无购买的力量。"④ 1931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份农村地区调查报告表明：营养不足的儿童，平均增

---

① 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333页。

② 戴维·香农编：《大萧条》，第16页。

③ 《新共和》杂志，第20卷（1932），第221页。

④ ［德］卢特威：《罗斯福传》（中译本），上海西风社，1941，第155页。

加25%；第4类学区的考察表明：80万学生中，有21.6万人营养不良；自1929年以来，肺病诊疗所的新病人几增1倍。不仅如此，许多农民还失去了多少世代以来属于他们家庭的农场。在每1,000个农场中，因无力偿还各种债务而出售的农场数，1929年为19.5个，1931年为26.1个，1932年为41.7个。据美国劳工研究会所编《美国劳工实况》第2卷统计，从1929至1933年，约有1,019,300户农民由于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丧失了他们的财产。

处境最悲惨的，还是南部棉花地带的分成制佃农，大部分为黑人。根据亚拉巴马州国会众议员乔治·赫德尔斯顿1932年1月5日在参议院拉福莱特—科斯蒂根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所述，由于农场主破产，不能照常向分成制佃农提供生活必需品，因此，“这些佃农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黑人佃农，在此冬深之际，无衣无食，而且一无所有，他们怎么生活呢？棉花地带许多县没有慈善组织。他们是贫穷的人，而且财源枯竭。县里没有基金。所以这些佃农无处可去，没有多少有点钱的人可以向之求助。

“许多白人处境与此相似，他们向邻居乞讨，而邻居也穷，无可为助。他们只好到处漂泊。

“认为没有饥饿、无人饿死，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人挨饿的任何想法，都是十分荒唐的。目前，实际上已有成千成千的人在挨饿。不仅我提到的这些地方如此，而且全国皆然，我自己那个地区亦然。我不是说他们一无所有、坐以待毙，而是说他们过的是一种拼命挣扎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衣不蔽体、缺乏燃料、没有营养，时刻有死去的危险，而且许多人处于垂死状态。”①

〔中等收入者的沦落〕　美国社会科学著作中经常提到中

---

① 转引自戴维·香农编：前引书，第29页。

产阶级这个名词，但没有精确而一致的定义。大体上说，中产阶级指的是中等收入者。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期间，整个说来中产阶级虽没有像工人、农民那样大量陷入极度的贫困，但也有许多人遭受苦难。

1932年7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包括哥伦比亚、哈佛在内的东部9个大学的毕业生，在7月26日组成大学毕业生失业者协会。该会发表的声明指出：自1929年6月以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困难。[1] 由于他们生活与教育水平较高，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更深。美国大学教职员协会向美国各地54所高等学校所作调查表明：这些大学现时有21,974个毕业生失业。这个统计数字肯定是不完全的。它只包括那些向母校职业介绍部门求援的毕业生。许多大学没有参加这个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大学，对没有和它们取得联系的大量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一无所知。可以肯定地说，现时有数十万大学毕业生失业，其中许多人是很有能力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他们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

1932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向纽约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失业救济委员会登记申请工作的455位合格化学家中，约有109人无以为生，130人需要救济，158人还可以维持一个短时期生活。截至1932年5月21日止，只有121人得到安置，而其中74人的安置还是暂时的。在这些人中，有的人是从来不必找工作做的，可也有人一直成夜成夜地睡在地下铁道里。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个委员会因资金不足，只能再继续工作5个星期。

---

① 1930年11月成立的费城失业救济委员会，就特别制订出救济失业中产阶级的计划，雇佣具有各种技能人员研究城市交通问题、建筑师和绘图员调查殖民地时期的地面文物、印刷专家为盲人创制盲文、音乐家举行音乐会等等。1931年4月，西弗吉尼亚烟煤矿区缺乏衣、食、住的贫困状况，不独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存在，也在从没尝过贫穷味道、也从来不曾屈尊寻求救济的人们中间流行。

由于中产阶级失业者日多，所以，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中，都有一些敬畏上帝的、衣冠楚楚的人。参加流浪大军并被控犯有流浪罪的，也有中产阶级。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多年土木工程师。还有个被告是20年代最有名的厨师之一，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阅读自己的菜谱，越读越伤心。

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中，有好些原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密苏里州某银行行长。在艾奥瓦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面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2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乞讨的，可能几个月或1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到1932年，不少著名文化人也进入赤贫的行列。《愤怒的葡萄》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肥皂洗衣服，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因无钱找牙医，牙齿一颗颗烂掉。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4年只灌过4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从5,000万美元跌到25万美元。舞星萨莉·兰德靠她那些著名扇子舞勉强维持生活。记者问她为何要跳这种舞。她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威廉·曼彻斯特写道："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

的份儿。"[1]

〔流浪大军〕　在美国社会中，流浪者是早就有的。但到1929年，由于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那种厌恶体力劳动的长年游民日益减少。1929年证券市场大崩溃、特别是1931年秋天以后，大萧条使越来越多急于找到工作的人变成流浪者。据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他们的数目，"没有人确切知道。看起来合理的估计是：1932年在全国流浪的有150万或200万人。"[2] 在截至1932年9月底止的1年中，芝加哥的情报交流所登记了5万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1932年它驱逐了683,457位无票乘车者。1932年春季，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逻人员统计，在每一车站，每周搭便车进入该州的男青年，平均为150人。

除长年游民外，大萧条造成的新流浪者中，有一无所有的分成制佃农，有因破产而离乡背井的农场主，有大学毕业生，有失业医生、药剂师、律师和教师，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有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儿，没有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和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中年汉子。总之，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青年人大约在20至25万之间。

由于流浪者的目的是找工作，而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容易找到工作，他们的流浪一般说是没有目标的，要说有目标，就是：某一个别的地方。有人称之为"失望的迁移"。更为难堪的是，各州各市由于自己的救济负担过重，都不愿接纳他们。在一些小地方，人们干脆告诉他们离开。某些大城市有暂栖之所，让他们住一夜，吃一两餐。只有加利福尼亚州为他们提供了劳动营，虽无工资，但供给他们食物、衣服、住处、医疗服务。不过只能容纳

---

①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46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51页。

3,300多人，杯水车薪，作用不大。一般说，他们像皮球一样，在力求驱逐他们的社区之间被踢来踢去。亚特兰大市更把他们不欢迎的流浪者用链条锁成一串，强迫劳动。怀俄明州的夏延市尤其冷酷，往有警察拿着棍子、有时用手枪把他们追赶出车站。

有时，他们还被判犯流浪罪。不过，他们不怕坐牢。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R. S. 米切尔在国会作证时告诉参议员爱德华·科斯蒂根，在路警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浪者时，他们大都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①]

为什么流浪者宁愿坐牢呢？因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屈辱的。他们经常挨饿，有的女孩子为了糊口，往往冒着怀孕危险，10美分卖淫一次。有的时候，他们连躲避风雨之所也找不到，衣服极易破损，破了又难再制；保持清洁是不可能的；除非急救，就缺医少药。性生活很乱，性病流行；孩子们失学，尤其普遍。

如前所说，在流浪中途，他们像瘟疫一样，到处不受欢迎，有时还不免牺牲性命。据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统计，1929年由于无票乘车而发生的事故达259起，死103人，伤221人；1931年372起，死125人，伤247人；1932年305起，死911人，伤214人。

流浪者的聚居之地，有的在城市，有的在野外，往往与长年游民在一起。据1932年2月《纽约客》杂志报道，纽约的流浪者聚居地由窝棚和茅屋组成，都是用包装盒、废桶板、废铁以及连拾废品的人都不要的东西搭成的。他们住在那里，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人驱逐他们。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这种聚居区的

---

① 美国第72届国会参议院第2次会议制造业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证词：《失业流民的救济工作》，5121，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33。

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人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在加利福尼亚内地，一个东部来的火车乘客对附近的流浪者聚居区感到惊讶，铁道旁货摊主人向他痛心地评论道："老兄，在那儿生活，精神上已经死亡。如果你在这儿留1星期，我将让你看到关于美国的某某些令人恶心、也许是可怕的东西。看来是有什么事情出了毛病……"[①] 在芝加哥市，有200名妇女在两个公园露宿。他们既无窝棚、又无铺盖。其他什么保暖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一直到天亮。

〔老年人的孤苦〕　　在美国争取老年津贴运动的历史上，1929年是个转折点。到这时，美国老年人数增加很快。根据1920年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有4,933,000。到1930年，这类人口增加到6,639,000。1920年，他们占总人口的4.7%，1930年增到5.4%。与此同时，由于不少人从自耕农变为工业工人、现代机械化生产速度快，再加上雇主歧视，老年人受雇机会日少。许多人离开劳动岗位后无以为生。据I. M. 鲁比诺估计，1930年，65岁以上的人，190万没有财产，240万没有收入，120万既无财产，也无收入，经济危机日深，这样的老年人必然日多。传统的赡养老人的方法——由子女和济贫院照顾——不能解决问题。许多上年纪的人没有子女，或者有子女，但不愿照顾他们。全国的县济贫院没有办得好的。有的县济贫院把老年人和精神病患者、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一样看待。多数的县济贫院简直是火坑。即使有少数大公司实施老年工人津贴计划，但由于经费不足，管理不善，往往计划无法实施。由于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带头，从1930年起，有些州就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有大量老年人处于孤苦无告的境地。

---

① 转引自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327页。

四、胡佛及其政府对付经济大危机的政策

面对这种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震撼美国资本主义根基的社会影响，胡佛总统及其政府采取了哪些对策呢？效果又如何呢？

虽有少数美国史学家为胡佛总统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辩护，但自30年代起，大多数美国史学家都认为胡佛及其政府对待大萧条的政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错误的[①]。至于这些政策的失败，史实俱在，不容否认，就是那些少数为之辩护的人，也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来，说它们可能成功。

为什么胡佛及其政府对待大萧条政策错误并且失败呢？从根本上说，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彻底办法是社会主义，任何改良主义的办法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②] 被美国进步舆论界称为百万富翁政府的胡佛政府，当然反对也不可能采取这种彻底解决办法。那么，胡佛及其政府采取的是些什么样的政策呢？研究大萧条到"新政"这段历史的埃利奥特·罗森说："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1922）这本小册子[③] 中，这位美国最突出的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使20年代刻上了他个人经历和气质的烙印。胡佛总统任期及其应付大萧条的对策，只有通过这种背景，才容易理

---

① 参阅艾伯特·U·罗马斯科：《胡佛—罗斯福与大萧条：一种历久不衰的比较研究的史学考察》，约翰·布雷曼等编：《联邦新政》，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75，第3—26页。

② 作者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来谈的，着重在"彻底"二字，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没有推迟或缓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本书讨论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③ 美国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佩奇公司出版。

解。”①

〔胡佛生活经历与其大萧条对策〕　胡佛1874年生于艾奥瓦州的西布兰奇，父亲是个铁匠，在他6岁时去世，3年后母亲也亡故，使他成为一个贫穷的孤儿。1884年，他前往俄勒冈州的纽贝格，寄居在舅父家里。1888年，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夜校。1891年进斯坦福大学，1895年毕业，成为采矿工程师。他进入社会时，正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即将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他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发迹机会，巧取豪夺，被有的美国学者称为“经营大企业的十足天才。”② 到1914年，他已蜚声国际，并积累大量个人财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年，作为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人们认为他干得很出色，芬兰语中甚至添了“胡佛”这个动词，意思是“帮助”。美国参战后，他被召回国任战时粮食局长。到1920年，已有人认真考虑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的这种靠个人奋斗而青云直上的生活经历：短短三十几年由一个贫穷孤儿成为一个有钱有势、誉满西方世界的“伟大工程师”，使他深深相信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相信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证个人自由和公民的机会均等，并因此坚决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张自愿主义或联邦政府鼓舞下有组织的公民集团的合作，发挥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外交上，他主张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一种平衡的力量，参与世界经济事务，但反对卷入欧洲的纠纷。

1921年，他被哈定总统任命为商业部长，直到1928年。为

① 埃利奥特·A·罗森：《胡佛、罗斯福和智囊团：从大萧条到“新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第41—42页。

② 胡佛政府末期，出现一些野史之类的书籍，考察胡佛在远东和身居政府高位时的活动，谴责他窃取英国公民身份，欺骗中国政府，迫害苦力，从事奴隶贸易，在比利时领导救济工作时贪污，等等。

了贯彻他的上述思想，他在 1922 年发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一书加以鼓吹。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在联邦政府中的特殊地位[1]，极力使哈定和柯立芝两位总统的内外政策体现这些观点。因此罗森说："大萧条的原因太复杂，不能只归罪于赫伯特·胡佛或他的经济思想的作用，但断言胡佛在任商业部长和总统时的政策刺激了大萧条、后来又加速了经济螺旋线的下降，似乎也是公平的。"[2] 下面我们来看看事实。

［*胡佛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政策*］　如前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美国农业即出现生产过剩、价格下跌的不景气现象。但是，在 1921 年，胡佛就以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私营经济领域、干预正常供需过程为由，坚决反对作为麦克纳里—霍根法案先声的诺里斯输出计划；后来在 1927、1928 年他又两次怂恿柯立芝总统否决麦克纳里—霍根法案，将之称为"社会主义"，因为此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干预下，通过向外倾销以稳定美国农产品价格，促成农工产品平价，通过农作物耕地定额分配以控制农产品产量。

农业不景气使中西部和远西部日益背叛共和党，胡佛对此深感不安，1929 年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就要求第 71 届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履行他竞选时许下的"实行稳健的农业救济"的诺言。农业界领袖们认为，只有麦克纳里—霍根方案才能克服农业不景气，但胡佛置之不理，却敦促国会通过 1929 年 6 月 15 日的农产品销售法。他说此法不会破坏个体农民的首创精神，也不会使政府卷入任何物价管制计划。它规定建立一个超党派的联邦农

---

① 胡佛任商业部长时，权力很大。商业部的工作人员众多，且有效率，部分驻在国外，使他领导下的商业部常常侵占国务院的职能。他对哈定和柯立芝的影响很大，使得两位总统常常得听从他的意见。

② 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 53 页。

业局并拨给5亿美元资金，贷与农产品销售合作社，以便它们更有利地销售农产品，并在价格下跌时存贮农产品。后来，为取得参院支持，胡佛同意了参院的修正案。据此，从1929至1931年，联邦农业局把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者组成全国性合作社，并建立公司，以便通过大规模市场活动来稳定农产品价格。该局将国内农产品价格维持在稍高于世界价格的水平上，直到1931年夏季。但是，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使外贸市场对美国农产品需求锐减，而苏联、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倾销又使价格猛跌。从此以后，联邦农业局宣布自己无能为力，放弃了维持农产品价格的努力，转而致力于处理其存贮农产品。

早在1931年1月，联邦农业局便提出警告，如果农民有意超过需要进行种植，它就无法保护农民。仲夏，农业局长与农业部长发起自愿减少耕地面积的运动。但是，几个月后，联邦农业局就承认，由于美国农民的“个人主义特性”，这种自愿办法不起作用。而胡佛总统不独反对由联邦政府出面干预农产品产量，他还宣称1929年农产品销售法规定的由联邦政府“间接买卖商品是绝对违反他的政府理论的”。这就是说，他是由于争取参院支持才勉强同意此规定。

这样，到1932年夏，联邦农业局终以在市场活动中损失35,400万美元而停止活动，胡佛稳定农业价格的计划彻底失败。

胡佛运用关税政策克服农业不景气的计划，失败得更惨。1930年6月17日，国会通过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规定提高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制造品的关税率。当时上千名职业经济学家反对这种经济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认为最后对美国也会不利，但胡佛认为此法符合美国民族最高利益，坚决予以捍卫。结果引起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仅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就有48个主权国家增加关税，26个国家实行定额入口和公开禁

运。其中，英国在1932年实行保护关税和帝国优惠制，德国在1933年实施一种严重损害世界贸易的闭关自守计划。这就必然减少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加剧美国的农业萧条。

〔胡佛根据自愿原则对付大萧条的政策〕　大体上说，从1929年10月到1931年末，胡佛主要是根据自愿原则对付大萧条的。1929和1930年，胡佛一再说：萧条是由于投机行为失去控制使证券市场“不得不崩溃”造成的；即使证券市场的崩溃不可避免，证券投机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健全的美国经济的一次不必要的放任行为，只要使美国经济的其余部分不受证券市场崩溃的影响，就可以制止萧条。

1929年10月下旬证券市场崩溃后，胡佛及其政府除反复散布乐观气氛以稳定人心外，开始还采取过提高购买力和增加生产投资的减税政策。如加尔布雷思所说，这一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减税率低，作用不大[①]。胡佛的主要政策，是从1929年11月19日起，召开一系列会议，根据自愿原则，劝告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们，金融、工业、贸易、建筑界的领袖们，维持生产投资和现行工资，同时要求劳工界领袖合作，放弃增加工资要求。另外，他还呼吁州、市政府和联邦政府一道增加公共工程开支。

胡佛劝说雇主们维持生产和现行工资的政策，在最初几个月是有一定结果的。1929年12月为99的工业就业指数，在1930年头4个月，只降低两分半；1930年向劳工统计局提出报告的公司中，只有7%削减工资。但是，这种全凭自愿的政策，敌不过经济规律的作用。当雇主们感到这种政策妨害他们取得利润时，他们就不愿听从胡佛的劝告。1930年5、6月起，雇主们就开始缩减生产，紧接着又削减工资，加速了萧条进程。1930年

① 约翰·K·加尔布雷思：前引书，第142、188页。

10月，胡佛任命一个总统紧急就业委员会，根据自愿原则，吁请城市与私人机构加倍努力进行救济。他还停止移民，请求国会增加公共工程拨款。1930年，联邦公共工程开支总额达49,300万美元，较1929年增加10,900万美元；州和市的公共工程开支总额为30亿美元，较1929年的多2亿美元。此外，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3月，国会进步派要求胡佛政府放弃自愿主义，由联邦采取行动，并不顾总统否决，通过一项法案，提前发给退伍军人退役金约10亿美元。这样，1931年头几个月经济危机略有缓解。

据小施莱辛格研究，在这一阶段，胡佛“各种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公私建筑。总统说这是‘我们经济制度能够提出来的争取稳定的最重要办法’，要求各级政府像私人工业一样负责。”①但是由于全凭自愿，1930年各级政府公共工程开支总额虽较1929年约增3亿多美元，而私营企业建筑费则下降20多亿美元。到1930—1931年冬天，私营企业建筑费继续急剧下降，地方政府财源日益枯竭，除非联邦政府大规模增加公共工程开支，否则胡佛的这种“争取美国经济稳定的最重要办法”，便将失败。因此，当时各方面要求联邦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压力很大。但是，由于国民收入继续下降，税收减少，联邦预算日益展现不平衡的趋势，国债似乎成为复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1930年12月，胡佛宣称：“政府发行公债多少，就会剥夺工农业多少自用和雇佣工人所用的资金，繁荣的恢复，不能用挖空国库的办法。”② 他要求政府节约，增加税收。由此可见，胡佛重视扩大公私建筑，主要是劝说私营企业和州、市政府投资；对联邦政府

① 小阿瑟·M·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30页。

② 小阿瑟·M·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32页。

公共工程开支，则要求保持在最低限度。其结果，1931 年私营企业建筑费又减少 20 亿美元。后来，到 1932 年，私营企业建筑费几乎下降到 1926 年的 1/4；公共工程开支，联邦政府的虽略有增加，但各级政府开支总和，较 1930 年却下降约 10 亿美元。

从 1930 年 10 月起，由于萧条日益严重，胡佛感到过去论点——萧条源于国内证券市场失去控制的投机活动——太把责任放在美国企业界身上。尽管 1930 年外贸差额只下降6,000 万美元，他却一则说，萧条根源"只有部分在国内"；再则说"造成萧条的主要因素现在在国外"。到 1931 年 6 月，由于欧洲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影响，美国经济危机逐渐进入更惨重的阶段，胡佛又一次指出：萧条"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①]。于是，从这时起，胡佛和他财政部主要顾问奥格登·L·米尔斯曾一度致力于挽救国际金融危机。1931 年 6 月 21 日，胡佛提出所有国际债款——战争赔款和战债——停付 1 年的建议，但作用不大。1931 年 9 月 21 日，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到 1932 年 1 月，放弃金本位制国家达 40 个。胡佛虽然冒外国货币贬值而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危险，坚持金本位制，并力促英国等恢复金本位，以稳定国际金融，但是，他却把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共同体和贸易共同体对立起来。他在 1930 年不顾广大专业经济工作者意见签署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通过高关税大大减少了欧洲国家出口额，实际上使他这时挽救国际金融危机的活动归于无效。

实际上，1931 年下半年胡佛对付萧条的主要政策，根据的仍然是自愿主义。比如，1931 年 9 月，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

---

① 威廉·S·迈尔斯编：《赫伯特·胡佛的国务文书和其他政府文件》，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34，第 1 卷，第 376、429、574 页。

拉德·斯沃普从垄断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出发，向胡佛提出一个稳定工业和维持就业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1. 所有雇员在50或50人以上并从事州际贸易活动的工商业公司，都应实行统一工人补偿法、人寿与残废保险、老年津贴和失业保险，保险金和津贴费由参与计划的公司及其雇员负担。2. 所有这类公司应采用标准化会计制度（一业一个标准）。凡具有25或以上股东、其活动范围超出1州的公司，应向其股东提供季度收入说明、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说明。3. 以上规定将由一联邦监督机构和贸易联合会监督，所有参与此计划公司，都应参加有关贸易联合会。4. 减轻反托拉斯法限制。由于这个计划要求联邦干预较多，胡佛不仅反对，而且感到吃惊，甚至说它是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反之，10月间，由于美国金融结构面临更大威胁，胡佛却召集30位纽约主要银行家和保险公司总经理，举行秘密会议，劝说银行建立起5亿美元紧急信贷备用金，并成立全国信贷公司来经营，劝说保险公司在债权人真有困难时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这些要求虽被勉强接受，但遭到消极抵制，不久就失败。在此情形下，对美国商会提出的一份斯沃普计划修订本，胡佛还是反对，先说它将导致垄断，后说它将导致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胡佛勉强采取的联邦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　直到卸任总统以前，胡佛应付经济危机的政策没有脱离自愿主义。但从1931年夏天起，美国经济危机逐步进入最严重阶段。银行倒闭数虽从1930年的1,352家增为1931年的2,294家，1931年10月胡佛煞费苦心劝建的全国信贷公司却垮了台；失业人数据官方估计到1931年底也超过1,000万，但救济力量十分不足。另一方面，经过1930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众院占了多数，参院共和党议员虽较民主党人多1席，但有1名无党派议员和少数进步派

共和党议员是和胡佛唱反调的。此外，1932 年大选年就要到来，胡佛也不能完全无视广大群众不满。这样，到 1931 年底，胡佛就不得不被迫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联邦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

1931 年 12 月初，胡佛向第 72 届国会提出一份复兴计划大纲，建议大幅度削减行政开支，发展联邦公共工程；扩大联邦农业贷款银行的贷款能力；建立住宅贷款银行体系，以防止取消抵押房产的赎回权；建立一个巨大的紧急复兴公司，以加强整个经济。

复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1932 年 1 月 16 日国会特许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这个公司有资金 5 亿美元，并有权借贷免税证券，其额可达 15 亿美元。其任务是向银行、铁路公司等贷款。在开始工作的前 5 个月，这个公司的贷款活动是保密的；共贷出 10 亿美元，80% 落入银行和铁路公司手中。这是很自然的。“1931 年秋天胡佛说过：‘政府的惟一职能，是创造便于私营企业有利发展的条件’。胡佛认为，让企业复兴，美国其他各界——工人、农民、失业者——的处境就会在适当时候好转。”[①] 不过，还有许多贷款就是用这种理由也难解释。比如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查尔斯·C·道斯在 1932 年 6 月 7 日被迫辞职，不到 3 星期，以他为首的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就得到复兴金融公司贷款 9,000万美元。克利夫兰的联合信托公司得到贷款1,400 万美元，因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约瑟夫·R·纳特。道斯的继任者艾特利·波默林任董事的克利夫兰保卫信托公司，也得到贷款1,230 万美元。底特律的联合保卫信托公司得贷款1,300 万美元，因为商业部长罗伊·D·蔡平是这个公司董事。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38 页。

1932年7月21日，国会通过紧急救济与建设工程法，将复兴金融公司资金从20亿美元增为38亿美元，并允许它向州、市贷款，用于救济、以工代赈和自负盈亏的建筑计划，资助剩余农产品出口和农业信贷公司等。

1932年全年，复兴金融公司共贷出23亿美元，预付现金16亿美元。这16亿美元中，53%贷予银行，17%贷予铁路公司（其中半数以上用于偿还银行债务），9%贷予大农场主。

除复兴金融公司外，1932年1月23日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给联邦土地银行增加股本12,500万美元，扩大其对农民贷款额。1932年2月27日通过格拉斯—斯特高尔法，规定政府公债和一些新的商业票证可以代替联邦票据，还发放10亿美元黄金以对付外国提款。1932年7月22日通过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法，规定建立8至12家住宅贷款银行，共有资金12,500万美元，使那些建筑与贷款公司、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必取消房产赎回权，就可获得现金。

在当时生产极度过剩的情况下，大银行、大公司一般决不会将借到的款项去进行生产投资、雇佣更多的工人。因此，这种主要用增加纳税者负担[①] 去喂饱饿狼似的大银行、大公司的复兴计划，自然无助于提高广大群众购买力、解救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1932年胡佛及其政府虽然被迫实行比美国过去危机历史上规模更大的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美国的经济危

---

① 1931年，美国出现20亿美元赤字，坚决主张平衡预算、不管人民死活的胡佛政府，实行增税。国会根据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胡佛总统的意图，通过1932年税收法，大大增加了销售税、个人及公司所得税、财产税、邮政税，还恢复了馈赠税，是美国和平时期增税最多的一次。

机仍然日益严重，因为这种干预的主要方向错了。[①]

〔胡佛及其政府坚决反对联邦救济〕　胡佛及其政府虽然被迫救济大银行、大公司、特别是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垄断资本家，但他们却坚决反对由联邦政府救济失业者。胡佛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都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聪明能干的人总会在美国社会里出头，而一般群众则只有感情，没有头脑，不会想办法，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②]。一般群众如此，失业的群众当然更是罪有应得。胡佛还认为，失业救济应由失业者自己想办法，所以他提倡"有工作大家做"，不管这样是否会减少工人收入。他经常鼓吹失业救济应根据自愿原则，由地方负责。首先是家庭、邻里、农场主和资本家。因为他们对需要救济的情况最了解，他们的救济资源加起来最雄厚。其次是社区：有民间救济组织，它们在大多数城市里与社区金库有联系；在某些市里有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其资金来源为税收。第三，在紧急情况下，可由州提供援助。至于联邦政府，一定要避免卷入。1930

---

① 有些美国史学家见不及此，认为凡是联邦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都会加剧萧条，而不是胡佛的这种干预才会加剧萧条，是不正确的。1963年美国新泽西州D·范诺斯特兰特公司出版的默里·罗思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是一个例子。该书认为造成经济危机周期的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而是金融界的货币与信贷扩张，它认为20年代美国政府的信用膨胀、低利率和维持工资率政策造成了1929年证券市场大崩溃，胡佛政府同样政策加剧了1929—1933年危机，它甚至认为虽津贴大银行、大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失业救济和支持农产品价格等方法以提高工农购买力的罗斯福"新政"式政府干预，也和胡佛联邦干预政策一样，未免皂白不分。也有人认识到这种区别。道乐赛·刘易斯指出："胡佛认为由联邦政府出钱对个人给予直接救济是可耻的，在道义上也会起腐蚀作用。他集中力量帮助公司，而对于平息受害的人们越来越大的愤怒并没有做什么事情。这就是胡佛和罗斯福、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主要不同之处。他们同样担心资本主义前途，对于为了确保这种前途政府必须做出什么事情他们意见不同。"见所著"从'新政'到新边疆"，《国际问题译丛》，1963年第5期，第1页。

② 参阅前面提到的他在1922年发表的《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一书。

年12月13日胡佛说，把这种地方义务转给联邦政府，会损坏"州、市、工业界和一般社区的负责精神"。1931年2月3日他又声称：联邦救济将摧残美国人民"品格"，并毁坏"自治根基"①。

前面提到，1930年10月，胡佛政府也曾被迫成立总统紧急就业委员会，致力于鼓励地方负起失业救济的责任。但该委员会毫无重大建树，第2年被撤销。1931年8月，在进步派共和党人敦促下，胡佛又装模作样地成立总统失业救济组织。由于任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沃尔特·S·吉福德为该委员会主席，故又称吉福德委员会。但是，吉福德完全不了解美国当时失业情况，只是闭着眼睛说地方与州的失业救济计划可以满足需要；联邦帮助失业者既无必要，而且危险，因为那样做会损害地方责任心，使失业者处境更坏。1932年7月，国会拒给该委员会拨款，它就静悄悄地夭折了。

实际上，到1931年后期，如我们在前节中所说，美国失业者靠家庭、邻里救济是不可能了。企业家们自己尽管偷税漏税，干着各种违法活动以饱私囊，却不愿拿出钱来救济失业者。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就说过：慈善捐赠是创造力的麻醉剂，主动精神的毒药。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的6%，于是有3000万人左右要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但是不幸，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赤字。它们的主要收入税收由于富人偷税、穷人无钱纳税而日益减少。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的救济事业不过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1/4获得某种形式救济。就是得到救济的人家，救济金也少得可怜。费城4口之家每周只有5.5美元，纽约市2.39美元，

---

① 威廉·S·迈尔斯编：前引书，第470、496页。

密西西比州 1.5 美元，底特律只 0.6 美元。1931 年 10 月 15 日，芝加哥失业者达 62.4 万人，私人救济机构与市政府财源枯竭，完全无力救济。据欧文·伯恩斯坦研究，“到 1931 年秋，胡佛总统由地方负责失业救济的理论，已完全破产。”[①] 但是，胡佛和一些大企业家担心增加大企业税负，还是反对联邦救济。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朗就说过，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胡佛向记者们声称：“实际上并没有人在挨饿。比如，那些失业游民现在比他们一向吃得还好。纽约有一位流浪者在一天之内吃了 10 餐。”[②] 所以，胡佛认为问题出在心理上，并不是美国经济有什么毛病；只要喜剧演员多向人们说笑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胡佛等人的这些胡说八道当然掩盖不了严峻的事实。1931 年 12 月 28 日至 1932 年 1 月 9 日，参议院制造业小组委员会举行大规模听证会，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揭露出失业严重和地方救济极端不足的情况。2 月，共和党进步派参议员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和爱得华·P·科斯蒂根联合提出法案，要求联邦拨款37,500 万美元，给各州作救济失业之用。民主党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等人担心胡佛否决，提出了一个较温和的代替法案。2 月 15、16 两日，两个法案均遭失败。

1932 年 4 月 15 日，《观察》杂志发表 37 个大城市福利专家的报告，说是“彻底崩溃在即”。5 月 9 日，参议院制造业小组委员会再次举行听证会，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沃尔特·韦斯特说情况已“极端紧迫”。6 月 1 日，28 个大城市市长承认：他们已失去控制，需要联邦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参院民主党领袖约

---

① 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 310 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42 页。

瑟夫·T·鲁宾逊代表一批有势力的民主党保守派，于5月11日宣布他赞成由联邦举办失业救济，建议发公债23亿美元：3亿作各州失业救济费，20亿贷与各州、市举办自负盈亏的建设工程。此后经过一系列斗争，参众两院不顾胡佛反对，于7月7日和9日接连通过瓦格纳—加纳法案：规定联邦拨款21亿美元举办建筑工程和失业救济。7月11日，胡佛加以否决，并发表1篇措词严厉的咨文，称之为“前所未有的滥用国家巨款”的法案。后来经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进行修订，才于7月21日得到胡佛签署，称为1932年紧急救济与建设工程法。此法规定由复兴金融公司贷款3亿美元与各州作失业救济与以工代赈之用，利息3%，1935年7月偿还，不过到1932年年底，总共只贷出3,000万美元。宾夕法尼亚州有100多万失业者，如果有救济费6,000万美元，要维持1年，每人每日只能领13美分食物。该州担心难获批准，只申请贷款4,500万美元。复兴金融公司考虑再三，只批准1,100万。该法还规定由财政部拨款32,200多万美元直接用于公共工程，并增加了复兴金融公司用于自负盈亏工程贷款的金额。然而，联邦政府的直接救济，只限于通过红十字会分配4,000蒲式耳小麦和50万包棉花。真是杯水车薪。

〔残酷镇压失业退伍军人〕　　也正是在胡佛步步为营地抵制由联邦救济失业者的1932年7月尾，胡佛政府又使用联邦军队和警察残酷镇压退伍军人，激起广大群众义愤。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退伍金法案，规定对所有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按其服役期限给予退伍金，20年后支付[1]。1930—1931年冬，国会通过法案提前发放约10亿美元。后来经济危机

---

[1] 原来只是残废军人才有退伍金。根据这一法案，在1925年可以领400美元的参战退伍军人，到1945年可以领1000美元。

进一步加深，使更多退伍军人失业，他们无以为生，要求全部提前支付。1932年初，得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提出一个法案，要求立即全部支付这笔退伍金。虽然由于反对力量强大，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小，但成千上万失业退伍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了摆脱眼前绝望之境，怀着极其渺茫的希望，有的人离家出走，有的人带上妻子儿女，向华盛顿进发。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1个西弗吉尼亚州摩根镇矿工，曾在霓虹师服役，已失业1年半，由父母维持生活。1个佐治亚州哥伦布市薄金属板工人、原第1师步兵，已失业3年。1个费城卡车司机，曾在第15工程兵师服役，已失业两年，由他的妻子抚养孩子。1个曾在第39师服役的芝加哥波兰人，已失业3年，妻子死去，由他在印第安那州居住的母亲照管孩子，他则通常和其他退伍军人一道，在小客栈寄宿。布雷斯纳汉夫妇和1个3岁男孩，从加利福尼亚偷乘货车，在路上走了3个月。亚伯拉罕·林肯族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林肯1918年曾入伍，但未去法国，他以写招牌和写歌词为业，8个月没有工作，即将身无分文，所以希望用退伍金养活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

退伍金远征军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从1932年5月中旬起，他们从全国各地出发，前来首都。退伍金远征军是他们自己的命名，总共来了多少人，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自称有8万人，显然有些夸大，比较谨慎的估计在2万至2.5万人之间。他们一般身无分文，有的携家带口，在市内公园、垃圾堆积处、无主货栈、歇业铺子，找个地方住下。从6月初起，在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的安排下，他们多数人住在华盛顿东南阿纳科斯蒂亚营地。6月中旬，有数百人在警察局长的默许下，住进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准备拆除的房子里。阿纳科斯蒂亚营地乱七八糟，到处是旧报纸、纸板箱、水果箱、白铁片、粗麻布和柏油纸搭成的

窝棚、帐幕、破屋，旧汽车，印第安式圆锥形帐篷；卫生条件"极端糟糕"，很难想像有人住得下。《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德鲁·皮尔逊描述这些退伍金远征军的情况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然，愁容满面。"

即使处境如此困苦，退伍金远征军也很有纪律，既不行乞，也不闹事，而且限于觉悟水平，使共产党人难于在其中开展活动。除偶尔举行请愿游行外，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等待，要求国会通过赖特·帕特曼法案。著名演员威尔·罗杰斯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成群结队的饥民当中，这些退伍军人是最守规矩的。6月17日，参议院否决帕特曼法案，胡佛总统又不愿接见他们的代表，少数人离开了华盛顿。但是，大多数留了下来，准备长期住下去，而且妻子和孩子来的日多。因为他们回家去既无工作，又无法维持生活，还不如留在华盛顿可以勉强活下去。7月中旬，从加利福尼亚州又来一批退伍军人，在国会广场举行了游行，这下激怒了胡佛政府，他们决心把退伍金远征军全部赶出华盛顿，必要时使用武力。7月28日，先由警察迫迁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退伍军人，起初很少人反抗。后来，住在阿纳科斯蒂亚的退伍军人赶来增援，用砖头反击警察，警察开枪打死1人，伤3人。胡佛总统命令陆军部派军队前往镇压。陆军部派出4连骑兵、4连步兵、1个机枪分队、6辆快速轻型坦克、5千枚瓦斯弹，由四星将军、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在下午7点多一点的时候，将全部住在城内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赶跑了，并放火烧了他们的营房。这些撤退的退伍军人非常狼狈，老婆抱着孩子，丈夫提着破行李，还不断受到瓦斯弹的袭击，大量伤员进了附近的加林格医院。

随后，麦克阿瑟又率领军队，分两路赶到阿纳科斯蒂亚营地，用刺刀、马刀、瓦斯弹强迫退伍金远征军撤离华盛顿，伤亡

100余人，并在晚10时许放火焚烧他们的营地，火焰高达50英尺。到晚11时15分，又由小乔治·S·佩顿少校率领的骑兵，对该营地进行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

撤离华盛顿的退伍军人的确很惨，没有一个州准许他们逗留。除沿途散伙的部分人外，载着他们剩余部分的那列火车究竟最后在什么地方停留，历史上无记载。人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退伍金远征军已融合到流浪大军中去了。

胡佛克服经济危机政策的失败，特别是他反对联邦政府救济失业者、反对提前发放退伍金的顽固态度，使他极不得人心，不断成为笑柄。有人说，胡佛有一次向梅隆借5美分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说，“这是10美分，你给你所有的朋友都打个电话吧。”另有人说，胡佛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师：“在两年多一点时间里，他使美国空空如也，陷入深沟，堕入地狱。”胡佛这个字成为一种带恨的前缀：流浪者住的窝棚叫“胡佛村”，裹身取暖的报纸叫“胡佛毯”，骡拉破汽车叫“胡佛马车”，翻过来的空口袋叫“胡佛旗”，用以充饥的长耳大野兔叫“胡佛猪”，如此等等。

〔胡佛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说，胡佛是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早期，在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保护伞下，充分发挥个人主义而迅速发迹、成为大富豪和“伟大的工程师”的。因此，他热爱和无限相信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和早期垄断资本主义。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相当发展，胡佛并不喜欢。战后，乘其他帝国主义削弱之机，借助美国技术革命，他以商业部长的身份，帮助甚至操纵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极力削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潜力发展到了顶点，造成所谓20年代的繁荣，从而更巩固了他对这种制度的信

心。但是，这种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也使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极端，因而产生了1929—1933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有许多问题，比如失业救济问题、维持金融制度信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垄断资本的弊端问题、适当提高工人群众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问题、适当缩小工农产品差价问题、等等，都是不能再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解决的。然而，胡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弊病，如经济危机以及造成经济危机的各种矛盾，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外来的，不应由这种制度负责；即使产生了，也可以根据自愿原则，由各公民集团、特别是企业家组织和地方政府负责纠正、解决，用不着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否则，就会削弱地方政府责任感，特别是损害企业家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甚至发展为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①]；就会扩大联邦政府机构的开支，引起通货膨胀，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而且他认为，美国过去历次经济危机，都是在联邦政府放任的情形下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得到克服的。所以他认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他和他的政府的责任是尽力保护自由放任的美国经济制度，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即使不得已而为之，也要尽力限制干预的深广度和时间。他不会辩证地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认识这次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性，因而也就不懂得这次危机是不能再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得到克服的。这也就是说，他不认识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要避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解决办法，就必须由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使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① 胡佛和许多美国政客和学者，不分青红皂白，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

规律。就由于胡佛见不及此，死死抱住自由放任主义教条，他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政策，就必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好像火上加油，使大萧条日益严重。我们同意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意见，胡佛是美国旧时期最后一位总统，不是新时期第一位总统。那些因为胡佛比以往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多采取了一些联邦措施、因而认为他开罗斯福“新政”之先河的少数史学家，是没有从胡佛政策的本质看问题的原故。

五、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

如前所述，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广大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处境极端痛苦，甚至绝望，而胡佛政府又拒不采取有效措施，甚至用提高销售税、所得税、邮政税等税收的办法搜刮民财，大量贷款与大银行、大公司，这就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在这种群众自发反抗的基础上，再加上美国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鼓舞和领导，美国人民群众在大萧条期间、特别是胡佛政府后期，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和斗争。

〔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人采取了各种各样斗争方式，其中以失业工人的斗争最为激烈。由于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等的阶级合作路线和不罢工政策，大萧条期间，劳联等领导的工会活动陷入低潮。在业工人的罢工数，虽然1930年仍有637次，1931年810次，1932年841次，但比起前5年（每年平均914次）还有所减少。一些声势较大的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都是由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统一同盟领导的。其中有几次新英格兰纺织工人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参加的约有75,000人。1932年10月俄亥俄州共和钢铁工厂1,500人罢工，很重要也很成功。其次是各个大城市缝纫工人、食品工人等的许多次小

罢工。工会统一同盟领导的最重要一次罢工，是 1931 年 5 月开始的匹兹堡区42,000 煤矿工人（其中6,000 名为黑人）大罢工。罢工是在与暴力斗争下进行的，坚持了 4 个月才失败，不过又引起 1932 年 1 月 1 日8,000 名肯塔基矿工的罢工，这次罢工酿成游击战争状态，最后虽遭失败，但锻炼了矿工的斗争意志。

对于失业和饥饿，美国工人自发地进行了广泛的斗争。1930 年 3 月 19 日，站在曼哈顿岛鲍厄里旅馆附近一条救世军面包线里的1,100 名群众，突然奔向给该旅馆运送食品的卡车，把食物抛到地上，让饥饿的失业者争抢。"到 1932 年，有组织地掠夺食物成为全国性现象。费城社会工作者海伦·霍尔告诉一个参院委员会：很多家庭打发儿童到批发市场行窃，为婴儿抢夺牛奶，从手推车上偷东西换食物。纽约一位记者告诉路易斯·阿达米克[1]：30 到 40 人的一些团伙，往往突袭市场，勒索食物……底特律的失业者在夜晚打碎商店橱窗行窃，儿童们攫取一包包东西像顾客一样离开市场，大人们干脆不付钱就拿着货物走出连锁商店……"[2]

这种公开违法活动，方式很多，从根本上动摇着私有财产制，有的人抗税，有的人不交房租，有的人不经许可在别人土地上种庄稼，等等。但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无烟煤矿区矿工擅自开采公司煤层的活动最突出。从萧条一开始，那个地方的矿工就擅自挖煤作为家用，个别地方的矿工还挖煤卖。到 1931 年，矿工违法开采的煤量，约达 50 万吨，出售于附近社区。1932 年又增为 150 万吨，大约有1,000 人买了卡车，将无烟煤运往东海岸大城市出售。到 1933 年，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的违禁售煤活动

---

① 当时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

② 欧文·伯恩斯坦：前引书，第 422—423 页。

已有很大规模，其收入达3,000至3,500万美元。1934年阿达米克访问该区时，从事该项违法活动的达15,000至20,000人，运输工具达3,500至5,000辆，好几个市镇依此为生。而矿主则无可奈何。

大量失业工人是播种革命种子的良好土壤。美国社会党虽然早在1929年5月就号召各城市建立失业理事会，以鼓吹失业救济和公共工程，但由于路线错误，而且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活动，无何成果。美国共产党则把主要力量用于组织和领导失业工人运动。1928年总统竞选时，它就把失业问题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并从各方面支持失业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更加勇敢、更加积极，但也更有组织，目标更明确。1930年1月，共产党组织工人为被警察杀害的面包工史蒂夫·卡托维斯送葬，约有5万人参加，大部为失业者。2月11日，共产党人煽动3，000失业工人冲击克利夫兰市政厅。2月15日，费城失业工人理事会率领250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1星期以后，1，200名失业男女向芝加哥市府进军。2月26日，洛杉矶市政厅前3，000名示威失业工人在催泪毒气袭击下才散去。不久，纽约市政厅前又出现示威失业工人。激进分子路易斯·布登兹甚至率领俄亥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州首府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并提出口号：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3月6日，全国失业工人举行示威，事前，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工会统一同盟联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示威中心要求是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特别着重黑人要求，反对削减工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动员口号是：“工作或者工资”；“不要饿死——起来战斗！”示威规模很大，参加者纽约有11万人，底特律10万人，芝加哥5万人，匹兹堡5万人，密尔沃基4万人，费城3万人，克利夫兰2.5万人，等等。总计约有125万人。

这次示威虽然遇到当局残酷迫害，但却使全国震惊，并使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成为美国活生生的政治问题。

在这次示威鼓舞下，1930年7月4日，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各党派工人代表会议，成立全国失业理事会，全国几十个城市跟着成立了地方失业理事会，并在劳联内部成立了得到大量支持的劳联争取失业保险和救济委员会。理事会的斗争目标是：失业保险，立即实施现金救济和以工代赈，公共工程按工会所定标准支付工资，免费给小学生提供伙食，反对驱逐房客和歧视黑人，等等。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是：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纠察、饥饿进军等。他们一共领导了上百次地方性和全国示威。1931年2月25日全国失业保险日示威，有40万人参加。1932年2月4日全国各地的群众集会，约有50万人参加。他们3次将有100多万人签名的群众请愿书送交国会。在许多州的工业中心，失业工人举行过向首府的饥饿进军。还有两次到华盛顿的饥饿进军：一次在1931年12月7日，参加者有1,800人；一次在1932年12月6日，参加者3,000人。

1929至1933年间，在共产党、失业理事会和工会统一同盟领导的斗争中，据美国劳工研究协会统计，有23个工人被警察和公司武装所杀害。

大萧条期间，美国共产党的另一重大成就就是渗人工农群众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南部地区。这主要是从1930年8月30日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出版《南方工人》报开始的。虽然当时南部到处是恐怖组织，共产党还是临危不惧，领导了弗吉尼亚到佐治亚地区及其他各地失业纺织工人的示威活动，肯塔基和田纳西黑、白矿工的罢工，并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地区黑、白钢铁工人和矿工中积极开展活动。

共产党在南部进行的一次最有影响的活动，是拯救9名无辜

黑人少年的国际性斗争，亦即斯科茨博罗事件。1931 年 3 月 15 日，流浪大军中 9 个黑人少年在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博罗被监禁，罪名是在一列货车上强奸两名白人妇女。虽然如前所说，当时流浪大军中性生活很随便，但正如当事人之一的白人妇女鲁比·贝茨后来公开作证时所说，她们两人并未被强奸。即使如此，由于种族主义的猖獗，这 9 个黑人少年除 1 名 13 岁的以外，全部被判决用电椅处死。共产党迅速把这个案件传遍全国，传遍全世界，争取广大群众同情和支持，再加上长期法院斗争，终于使这 9 名黑人少年先免于死刑，后又陆续被释放。

由于斯科茨博罗事件引起的安吉洛·赫恩登事件，是共产党初入南部时的另一次重要斗争。赫恩登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由于支持斯科茨博罗黑人少年和参加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 7 月 11 日在亚特兰大被捕，并被判处 18 至 20 年监禁。共产党领导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斗争，经过长期法院控诉，并取得无数群众集会和巨大请愿运动支持，最后才在 1937 年交保证金 1.8 万美元被释放。[①]

〔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说："西部和中西部的农民在反对经济危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不稍弱于失业工人和黑人。他们已到了绝境。"[②] 戴维·香农则认为"在萧条早期，最严重的阶级暴力出现在上中西部的农民之中，而不是在失业的工人中。"[③]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 20 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就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第 72 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众院劳工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奥斯卡·

---

① 参阅威廉·Z·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第 44 章第 3 节。

② 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 308 页。

③ 戴维·A·香农编：前引书，第 123 页。

阿默林格作证说，有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告诉他：美国应当有一次像俄国那样的革命；等到兵力足够时，东进将东部从西部切开；西部有吃的，东部除西部土地的抵押契约以外一无所有。阿默林格又说，他还听到一些以前日子好过、态度严肃的人的许多这种谈论。他认为有发生革命的危险，因为他每天都听到人们说：首都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只是把穷人口袋里的钱刮来送进富人口袋里。1931 年，全国农民同盟选出一位新领袖约翰·A·辛普森。他说："我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残忍、阴险和贪婪。"① 同年，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告诉访问者："乡下人骚动不安，共产主义正在取得立足点。就在密西西比，有些人正准备领导群众暴动。实际上，我也变得有点粉红色了。"② 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告诉华盛顿官员：明尼苏达是个左翼的州，国民警卫队只招收共产党人。1932 年初，威斯康星州农民同盟主席 A. N. 扬在参院农业委员会作证时提出警告："当前的情况是：威斯康星州农民中的实际赤色份子，比你们想像的多……他们时刻准备着，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纠正不平等情况。虽然我不愿意说，但我衷心相信，他们有的人如果有钱买飞机，就会飞到华盛顿来把你们都炸光。"③ 1933 年 1 月，美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第三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④

这样的警告，并不一定是危言耸听。且让我们看看 1931 年

---

①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65 页。

② 希尔顿·巴特勒："比尔博——双锋剑"，载《北美评论》，1931 年 12 月号。

③ 第 72 届国会第 1 次会议参院农林委员会听证会上证词，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176 页。

④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 60 页。

秋天起由艾奥瓦州开始的农民斗争。由于华盛顿一再拒不采取有效措施，该州农民同盟前主席米洛·雷诺要求地方采取行动。早在1927年他就说过：如果不能通过立法得到公平，农民就只有组织起来，拒绝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城市运送农产品。1932年春，在他的领导下组成农民休假联合会，宣布将停止向市场运送农产品30天，或者在取得生产成本以前不向市场运送农产品。不久，农民们把通往苏城的10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中心，不准人们把农产品运送苏城。如《哈泼斯》月刊的玛丽·希顿·沃尔斯所描述，这个运动来势很猛："苏城周围的突击活动很快就不再是地方事件。它跃过密苏里河，越过大苏城区。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道路上，也像艾奥瓦州的一样，出现了农民纠察队。不久，明尼苏达州也步它们后尘，道路上出现农民纠察活动。北达科他州的农民组织起来；南部佐治亚州的农民，把运往城市的牛奶倒在公路上。有几天，纽约市的牛奶供应受到威胁。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的农民组织起来。长岛农民通过'休假'提高了土豆价格。这种农民结伙互相保护的活动遍地皆是，不过中心仍是艾奥瓦及其附近诸州。

"牛奶生产者联合会和农民休假联合会采取联合行动……成百成百的卡车被迫向后转……农民们……还把县行政司法长官的徽章和手枪抢来丢在玉米地里……"①

艾奥瓦州州长下令停止纠察，农民置之不理。在政府武装面前，他们也不为所动，有的人被捕，他们就向监狱进军，迫使政府将被捕者迅速释放。发生最剧烈冲突的第20号公路，被称为

---

① 玛丽·希顿·沃尔斯："谷物地带的造反活动：美国农民锻犁作剑"，载《哈泼斯》月刊，第116卷（1932年12月）。

第 20 号邦克山。[1] 有个老头对玛丽·沃尔斯说：有人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对我来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是非法的[2]。

由于采取直接行动有成效，农民们也用这种办法夺回他们被取消赎回权的土地。在堪萨斯州，有个律师刚刚宣布取消 1 个 5 百英亩的抵押农场的赎回权，便被农民杀害。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发生过反取消赎回权的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激烈：身着黑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查尔斯·布雷德利从法官席上拉下来，蒙上眼睛，送到偏僻的十字路口，要他答应以后再不签署取消赎回权的文件，由于他坚不同意，便被打翻在地，并用绳索绑着他的脖子，拴在路标上，虽然他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事后还不敢提起公诉。

法院签署了取消赎回权文件后，常有大批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把出价竞买的人推到一边，自己用极低价格强把拍卖品买下交还原主。有一次，1 个县行政司法长官主持拍卖，1 匹马、1 头荷尔斯太因公牛、3 头猪，都只卖得 5 美分，两只小牛 4 美分，全部财产拍卖完，一共只得到 1．18 美元。购买者将土地交还原主后，还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其有 99 年产权。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常被绑架，甚至面临被绞死的威胁，使得保险公司只好让步，暂缓扣押土地。

也有的农民采取直接行动赖债。内布拉斯加州夏延县有 20 万农民负债累累，他们的头头声称：如果州立法机关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就要集合起来踏平议会大厦。

---

① 美国波士顿市附近小山，1775 年独立战争时美军曾在此打败英军。

② 1773 年波士顿人抗英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 342 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奏，这位老头言外之意是：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是为了正义事业，不能认为非法，他们现在封锁公路也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是非法的。

美国共产党也参与领导农民斗争。1930 年，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统一同盟领导加利福尼亚州帝国谷7,000 名农业工人大罢工。1931 年 1 月，500 个黑、白分成制佃农向堪萨斯州的英格兰进军，迫使种植园主和商人给他们食物。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拉普萨县发起组织分成制佃农同盟，并帮助其提出一个紧急纲领，要求减低一半租金和赋税，停付一切债务和抵押金 5 年，政府对小农发放现金。7 月 16 日，当同盟在坎普希尔召开会议时，被白人暴民袭击，发生枪战，黑人虽遭到毒打、逮捕、甚至杀害，但分成制佃农同盟组织扩大了。1932 年底达1,500 人，他们在后来"新政"期间的佃农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1932 年工会统一同盟领导的科罗拉多州18,000 甜菜工人罢工，也很重要。

共产党除积极支持农民群众斗争外，主要由于它的倡议，还于 1932 年 12 月在华盛顿组成农民全国救济会议，出席的有 26 州的 248 名代表。这个会议到"新政"期间仍在起着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向左转〕　如小施莱辛格所说，大萧条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面对当时政治与经济现实，感到"折中办法再也不够了；这是个激变的时代，与特权和愚蠢妥协，将不战而败……

"特别是那些较年轻的人，一想到将被抛入他们完全未参与塑造的一种世界中沉浮，便感到厌恶。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写道：'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一团糟，我们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碰不得的，不管一切宿命论者怎么说，人不是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用的牺牲者……人能掌握制度并加以引导。'许多老老少少的人开始渴望可能出现一种历史的新转折，将消灭失业与困苦，并保证人类能得到其所向往的像样的生活。"[①] 这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05—206 页。

就是说，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向左转了。支持美国社会党的著名知识分子有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赖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莫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而且，有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党已成为改良主义政党，他们更倾向共产主义。1931 年，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他的《自传》，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学习苏联，他收到数千封同情的信件。1932 年，29 岁的约翰·张伯伦又出版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为《别矣改良：美国进步思想起源、兴旺和没落的历史》，本书概括了斯蒂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不满于美国实证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改良主义只能为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1933 年初英国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在美国出版。此书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背叛历史的结果；在这次危机中，共产主义提供着人类文明得以维持的解决办法；而苏联则无限美好。

这些著作进一步加强了知识界的激进倾向。比如，在胡佛时期，学校里的教科书一般是不提苏联、地图上也不标明苏联的。但是，在有些文教界著名人士中，“俄国已成为明智计划与统一信仰的象征，在俄国终于有一个‘致力于公共目的而不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政府’（罗伯特·莫斯·洛维特）、‘俄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消灭了失业的国家’（马克思韦尔·S·斯图尔特）。”[1] 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赞扬苏联人人有工作。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称苏联为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名记者埃德蒙·威尔逊也说苏联虽有许多缺点，仍是世界道德的顶峰。甚至宗教界也称颂苏联。早在 1930 年 9 月 30 日，新教激进主义杂志《世界的明天》就评论道：共产党人尽管信奉无神论，但很快就会发现，由于建立一种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12 页。

彻底的集体生活，他们是在为现实的上帝王国奠定基础。到1933年，哈里·F·沃德牧师在其所著《取代利润》一书中说：苏联的重要性，在于它使群众生活有一个中心目标。莱曼·P·鲍威尔牧师说："看起来，俄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发展一种真正合乎人道的四海一家精神如此迅速，以至于可能有一天，我们基督教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拜俄国为师，重新学习耶稣社会教义的更深意义。"①

不少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所吸引。在哥伦比亚大学，许多学生读着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著名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回忆耶鲁大学学生生活时说："马克思主义极强的逻辑性使当代一切事情如此明朗清晰……你想的事情它都想到了。"② 埃德蒙·威尔逊对自由主义感到失望，他说："如果美国激进派和进步分子……希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那就必须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拿过来，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相信它，并断然肯定其最终目标是生产工具的公有制。"③

小说家中倾向共产主义的更多。西奥多·德莱塞在共产主义中发现了新希望。坚信"对金钱和地位的欲望毒化了所有生活"的舍伍德·安德森，在1932年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约翰·多斯帕索斯公开拥护共产主义，此外还有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等。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阅读马克思著作，并写道：为了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文艺界开始出现

---

① 莱曼·鲍威尔："一个牧师看俄国"，载《评论之评论》1934年10月号。

② 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征求一种值得为之斗争的信仰"，载《大西洋》月刊，1941年5月号。

③ 埃德蒙·威尔逊："向进步分子进一言"，载《新共和》杂志，1931年1月14日。

一个无产阶级文学新流派，为阶级斗争服务。

人民群众不断的反抗和斗争，虽然震撼着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使美国政府在 1931 年为了国内安全反对裁减军备，1932 年不必要地大规模镇压退伍金远征军；使许多城市的企业家组成委员会，以便在铁路和电话被切断、周围公路被阻时，应付难以形容的恐怖，但是，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却认为：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有钱有势的人都在他们一边。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成立了，接着又出现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民族主义党等右翼组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M·巴特勒公开对学生赞美极权主义制度；堪萨斯州长艾尔弗雷德·兰登声称宁可实行独裁统治也不可让国家瘫痪；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认为，如果美国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墨索里尼，那就是现在。这是一些法西斯主义的星星之火。

六、结　语

综上所述，1929—1933 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哈佛大学商学院长查尔斯·施瓦布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1] 埃德蒙·威尔逊则感到资本主义已走完它的全程，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马克思的预测正在成为事实，阶级斗争方兴未艾。埃尔默·戴维斯甚至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

---

①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 56、57 页。

已经死亡。"[1] "人们常常谈到社会革命。成千成万的人的确认为：被剥夺者和饥饿的人们将反抗把他们带进这种绝望境地的政府和经济制度。"[2] 一位洛杉矶银行家在横贯大陆的火车上说："肯定会发生革命。农民将反叛、工人亦然。赤色分子或者法西斯分子将统治美国。"[3]

埃尔默·戴维斯和这位银行家的话固然有点夸张，但却表明：美国社会自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它的基本矛盾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到30年代初已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非改变生产关系不可。胡佛及其政府既不愿改变生产关系，又想把现行经济制度继续下去，结果危机程度愈益加深，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濒于解体。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形势必将更险恶。这就使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再让这种一方面生产大量过剩、一方面千千万万人民饥寒交迫，一方面银行库存约100亿美元、一方面许多城市因通货不足不得不发行小额临时纸币的经济制度继续下去，是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的。要克服这种经济危机，挽救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反对胡佛自由放任、至少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某种变革。至于学习苏联，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虽然如前所说，有不少人向往，不少人议论，但是，不仅资产阶级学者，就是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Z·福斯特，也认为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工人们仍然相信资本主义；虽然他们在日常斗争中跟随着共产党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到大批参加战斗的共产党组织的地步，正好像他们还不想投共产党

①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56、57页。
② 戴维·A·香农编：《大萧条》，绪言。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旧秩序的危机》，第4页。

的选票[1] 一样。"[2] 因此，要变革，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之内进行改革，也就是由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前所说，当时美国虽有极少数人提到美国需要一个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主义。但是，由于美国自建国以来具有较深厚的民主自由传统；经济基础较德、意、日等国雄厚，垄断资产阶级认为还不必孤注一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像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那样面临迫切的无产阶级革命危机；美国中产阶级与农场主不像德国的中产阶级和地主那样倾向于垄断资产阶级极右翼；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像德、意、日垄断资产阶级那样迫切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等等，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法西斯式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独裁干预。1928 年大选时，共和党正得人心，柯立芝政府副总统查尔斯·G·道斯就因为被人们认为"具有法西斯倾向"[3] 而得不到共和党提名。

这样，剩下的一条变革之路，就只能是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舍弃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生产关系。这就是 1932 年大选罗斯福大胜胡佛并在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的基本原因。

从此，美国正式进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

---

① 1932 年大选时，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只得选民票 102，991 张。

② 威廉·Z·福斯特：前引书，第 312 页。

③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 年》（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 465 页。

第二章

第一次“新政”

如前章所说，大萧条使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变革；至于怎样变，美国的统治阶级反对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大多数人民群众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准备。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抛弃自由放任、全凭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自我调整的政策（也就是前 3 位共和党总统着意实行的政策）。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加速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得以出现于美国历史舞台的原因。

“新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曲折，而这种曲折更证实了它的必然性。

“新政”是应付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产物。但有其历史与思想根源。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新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即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与管理，要求限制垄断资

本与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中小资产阶级处境[1]。然而，由于对调节与管理的方法有各种不同的主张，罗斯福对这些不同的主张不愿、而且也感到难于立即明确表态，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鲜明的“新政”纲领。在实行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罗斯福政府往往对自己的政策作出重大的修改，使得许多评论家甚至称罗斯福是个机会主义者，称他的“新政”是实用主义的[2]。不过，从“新政”拟订过程和实行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它的总目标，即：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局部改进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3] 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适度减轻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阶级斗争，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它大体上具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恢复陷入空前严重危机的经济；二是救济大规模的失业者和贫民；三是革除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大体上，“新政”可分为两个阶

---

① 新左派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在评论“新政”措施时说：“它们有一定的方向，即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阻止大萧条、帮助穷人和禁止大企业的残酷无情的经营活动。”见所编：《新政思想》，纽约：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66，绪言第XX—XXi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认为：如果说“新政”是“实用主义的”意味着新政派慎重考验各种思想的后果，那是用词不当；如果意味着新政派不相信各种乌托邦和各种一劳永逸解决办法，放手进行实验，而且不相信权势集团的各种教条，那么，“新政”就是实用主义的。见所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第344页。保罗·康金则认为，从严格的哲学意义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同时，他认为罗斯福的理想是行得通的，因而不是机会主义者。见所著《新政》，纽约：托马斯·Y·克罗韦尔公司，1972，第11—13页；第14页。

③ 《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352页。

段：1935年以前为第一阶段；1935至1939年为第二阶段[①]。第一阶段着重在复兴，第二阶段着重在改革，救济则贯彻始终。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第一次“新政”。

一、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竞选总统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美国总统选举极不重视，认为每次选举都不过是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意义不大。这是不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的。美国1932年的总统选举，虽然也是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但却不能说没有政治、经济意义。大体上说，这是一场反对与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斗争，或说是一场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斗争。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是以赫伯特·胡佛为代表的保守派，其中也有民主党人。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是以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其中也有共和党人[②]。这两派的斗争，既存在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也存在于民主党内部。罗斯福竞选的胜利，意味着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和大踏步向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

〔民主党内的斗争〕　民主党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失败

---

① 自从雷蒙德·莫利在《7年之后》（纽约，1939）中提出这种分法，并经巴兹尔·劳赫作为所著《“新政”史》（纽约，1944）一书主题之后，美国史学界通常把“新政”分为两个阶段。但也有人将之分为更多阶段的。另有少数人则对两次“新政”的命题不予重视。还有个别史学家认为只有一次“新政”，没有两次“新政”。见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115页。

② 社会党人托马斯·诺曼等人也是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

后，党的办事机构处于瘫痪状态。192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建议召开一次民主党会议，以医治1924年创伤，加强党内团结，并把党推上进步主义轨道，但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杜邦公司一通用汽车公司重要人物共和党人约翰·J·拉斯科布，却乘机在民主党领袖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和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之间搭桥，资助史密斯在1926年竞选纽约州长取得胜利。史密斯虽然是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却有保守思想。他在1924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曾"保证：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重申州权，不再扩大联邦的税收、法律和义务。"[①] 这种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张和他反对禁酒的坚决态度，给他和拉斯科布及皮埃尔·杜邦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从1928年初起，他们拉拢数十名权势显赫的大富豪，着手操纵民主党的财政与未来命运。"192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史密斯同意拉斯科布与伊雷内·杜邦的意见，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减少政府对大企业的干预……这意味着通过高关税和减少州际商业委员会对铁路公司管理与经营的控制[②]，以保护企业与工资收入者。拉斯科布断言，"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惟一区别是：民主党反对禁酒，共和党主张禁酒。"[③] 同时，史密斯还任命直到此时为止仍为共和党人的拉斯科布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样，就使得1928年民主党的竞选政纲和它的候选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共和党的大同小异。1929年起，原来支持史密斯竞选总统的罗斯福日益自立门户，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编：《美国民主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67页。

② 杜邦财团从铁路公司取得巨额回扣，攫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参阅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编：《进步运动，1900—1915》文件之三：艾达·M·塔贝尔论美孚石油公司的手段。

③ 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28页。

准备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同时，从1928年竞选纽约州长起，特别是在1931—1932年第二届州长任内，罗斯福关于内政政策的言行，日益类似于他后来任总统时实行的“新政”[①]，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帮助“破产的”、“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而史密斯则进一步向右转。当他听到罗斯福呼吁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时，他咆哮道：“这不是煽动家的时代。”因此之故，两人关系日益破裂。至于罗斯福和拉斯科布，“表面上两人维持着十分正常的关系，但实际上则成为民主党内对美国未来具有对立思想的两翼的领袖。”[②] 1931年3月，史密斯—拉斯科布一伙企图利用他们掌握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1932年竞选事前制定一份以反禁酒为中心课题的保守政纲，因为受到许多民主党重要人物反对，没有成功。接着，他们因担心史密斯在1932年竞选时敌不过罗斯福，从1931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和威尔逊时代的陆军部长、甚至是威尔逊的法定继承人的牛顿·D·贝克接触，尽量为他拉拢支持者，打算在必要时用他代替史密斯去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以遏制罗斯福。不过由于罗斯福的家世、教育、政治技巧等，以及他自1910年以来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的形象，[③] 特别是他近两年来作为纽约州长通过国家干预抑制大萧条的言论和措施，使他到1932年时已处于明显的优势。经过许多激烈的明争暗斗，到1932年6月27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前夕，民主党内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形

---

① 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传》，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57，第149页。

② 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29页。

③ 罗斯福早期智囊团人物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当罗斯福1910年作为纽约州参议员带头反对纽约市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厅时，“他立即成为坦慕尼厅头号敌人，因此之故……他成为一个进步主义者，而且从此以后，一直不曾失去这个名声。”见所著《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77页。

势如下：拥护罗斯福的票数最多，但没有达到当时取得提名的2/3的多数；拥护史密斯的票数其次，但不足以遏制罗斯福；受到威廉·C·麦卡杜和赫斯特报系支持的众院议长约翰·N·加纳掌握着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大州的选票，他们的态度具有关键性。

史密斯—拉斯科布一伙的斗争策略是：在前几轮投票中尽量阻止罗斯福得到2/3的多数票，到形成僵局时，就推出牛顿·贝克来作为折中候选人，以击败罗斯福。罗斯福一方为取得2/3的多数票，史密斯一方为防止罗斯福取得2/3的多数票，都极力拉拢麦卡杜和加纳。麦卡杜是威尔逊女婿，1924年曾是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要人物之一，10年来一直是党内头面人物。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他根据党内老进步主义者的意见，认为目前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要人物中，一个也难有当选希望；而且前两届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是纽约佬，给党带来惨痛的失败，这次史密斯和罗斯福又是纽约佬，还是与坦慕尼厅有纠缠的反禁酒派，都难被大规模农业区、牧业区、铁路业、石油业所接受。而他自己呢，则是个老进步派，继承着平民党人、威廉·J·布赖恩的传统，主张禁酒。根据这些背景，他认为自己在1932年有资格竞选总统，并有代表进步主义力量和“小人物”利益参加竞选的必要。但是，到全国代表大会前，由于罗斯福和史密斯的实力较大，他只希望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斗争形成僵局时，自己被推出来作为折中候选人。大会前夕，他对于罗斯福和史密斯两方拉拢都不拒绝。但作为进步派，他是比较倾向罗斯福一方的。后来，他了解到史密斯一伙准备的折中候选人是牛顿·贝克。而贝克在本世纪前20年虽是个进步派，但像史密斯一样，他的进步主义只限于行政管理方面，提倡行政效率与节约、司法与刑法改革、以及劳工补偿之类的社会立法。他从来

没有接受先进进步派主张的由国家统制经济的前提。特别是1921年回到克利夫兰市经营律师事务所以后，更积极为铁路公司、公用事业公司服务，反对工会，提倡开放工厂，已经变成一位保守派。“贝克的世界观同胡佛的一样，是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如个人自由主义、竞争、自愿和私人的活动等派生出来的。”他“对于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职能的看法与赫伯特·胡佛的很相似。”① 因此，麦卡杜不愿支持贝克。在第3轮投票中，罗斯福得683票，还不到2/3的多数。罗斯福竞选班子急切地和麦卡杜接触，说他们再不能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如果得不到他的帮助，原来支持罗斯福的力量可能解体，史密斯一伙便将推出贝克来攫取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样，麦卡杜便在第4轮投票前公开出来支持罗斯福，并宣布把加利福尼亚的44票全部投给他。在他这一行动的影响下，罗斯福得到945票，大大超过2/3的多数。美国史学家对造成这次麦卡杜转变态度、罗斯福取胜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都太注重人的因素。② 实际上，这是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并制止大萧条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罗斯福一派，战胜了反对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和制止大萧条的、违反历史潮流的史密斯—拉斯科布一派。

〔罗斯福和胡佛的竞选〕　在上一章中，我们论述了胡佛由于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对大萧条的政策遭到彻底的

---

① 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242页。

② 埃利奥特·罗森举出了好几种解释。但他似乎认为，麦卡杜的态度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他觉察到罗斯福如果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当选总统，进步主义才最有希望在可怕的经济萧条中复兴，所以他在关键时刻支持罗斯福。见所著前引书，第265页。

失败。因此，“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胡佛的计划似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是太偏向上层阶级的。”[1] 可是，1932 年 6 月重新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即使经济危机进入最惨重阶段，胡佛的竞选主题，却仍然是“促进自愿主义、个人自由主义、联邦不对市场进行经济干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解除 30 年代初期的危急”。[2]

在竞选期间，胡佛发表过 9 次主要演说。其中，1932 年 8 月 11 日在首都所作接受提名演说，包括了他全部演说的主要内容。他认为，促成大萧条的是他不能控制的一些情况和事物：世界大战后遗症、投机、经济的过度膨胀、1931 年欧洲的崩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金融的影响和消费的下降。他重申他的基本信念：在解决国家遭受的经济危机方面，联邦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帮助私人和地方政府克服他们不能控制的因素，联邦权力只应起补充作用。“解除个人对其邻居的义务，解除私营机构对公众的义务、或者地方政府对州政府的义务、或者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义务，不是〔联邦〕政府的职能。”

胡佛还重申他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中的一些信念：有秩序的自由、机会均等、发扬首创精神等。他反对他称为“随意的试验”，认为不应该“由于我们的困难特别惊人，由于有些人胆小得怀疑我们的信念与制度的有效性，我们为了医治苦难，就必须转向一种国家控制或国家指导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政治，那是灭绝自由、希望与机会的专制官僚主义统治下人的规范化。……真正的文明是趋向自由，而不是趋向规范化，这是我们的理想。”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中册，第 30 页。

② 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 297 页。

作为一个维护坚决限制政府职能的旧秩序的战士，胡佛要求美国人民不要被“蛊惑家”和“口号”（指罗斯福和“新政”）弄得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否则，美国的民主制度便可能由于大萧条的暂时压力而遭到毁灭。由于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他也谈到金融与证券改革、铁路立法的修订、自然资源的保护等，但很含糊，没有说服力。

此外，在竞选期间，他除强词夺理地一再宣传他与大萧条作斗争的事绩和成就外，还向全国保证：如果共和党人获胜，就会有富饶；并提出告诫：如果罗斯福当选，则“千城百镇”会长出草来。

罗斯福在击败史密斯—拉斯科布一伙取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为了表示他将雷厉风行地改变胡佛强调美国传统和经济规律但却无助于缓解大萧条的政策，他打破惯例，不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几星期后正式通知他，就在提名后第二天乘坐当时还不太流行的交通工具——飞机——到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去发表接受提名演说。他说他这样做“是无前例而且不寻常的，但这是无前例而不寻常的年代，我通过打破这种荒唐传统……已开始从事摆在面前的任务”。[①]“从今以后，请把打破那些愚蠢的传统作为我们党的任务。我们将破坏愚蠢的传统，让共和党领导人去破坏他们的诺言吧！他们对那种艺术是远为熟练的。”[②]

1932年9月23日，他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所作的一次带方向性的演说[③]中，指出美国面临新的情况；“新情况对政府及其领导人提出新的要求”。所谓新情况，就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

---

①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纽约：兰敦书屋，1938，第1卷，第647、第648页。

③ 同上书，第742—756页。下面引文，参考或采用了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译文。

制”和金融势力的“不负责任与贪婪（如果不加控制）会使众多的个人陷于饥饿和贫困”，使“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机会均等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正在稳步走向经济寡头制，甚至已经进入了经济寡头制”，“形成为一种威胁”。

面对这种新情况，美国政府必须加强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职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罗斯福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全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决不能偏袒个别的小集团”。所以，政府应该限制垄断资本。他说，“金融界和工业界的负责人必须同心协力达到共同目标，而不能自行其是。他们必须在必要的地方牺牲这种或那种个人利益；通过相应的自我克制来谋求普遍的利益。”“如果他们拒绝合作来谋求公益，看来又打算把工业引回到无政府状态，要求政府出面加以限制就是适宜的。同样，如果作为一个集团，他们运用集体的力量去损害公益，政府也必须迅速出面来保护公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应该给他们提供条件，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总的财富中取得足以满足其需要的一份”；政府应设法“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综上所述，罗斯福与胡佛虽然都是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但仍然有显著区别。胡佛在空前严重经济危机面前，仍然坚决主张放任那些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崩溃边缘的垄断资本家自行其是，致使大萧条日益严重，这说明他是一个维护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统。罗斯福则主张联邦政府以“总资本家”身份，对美国经济实行干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协调美国社会各阶级关系，这说明他是一个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要使美国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罗斯福得选民票22，821，857

张，占总票数的57%以上。胡佛虽得到大部企业界和金融势力的支持，却只得到选民票15,761,841张。罗斯福得总统选举人票472张，在42个州中取胜；胡佛只得到59张，仅在6州中取胜。在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也取得大胜：参院以59票对37票占多数，众院以312票对123票占多数，州长选举中，只有8个共和党人当选。这次选举“意味着对这种竟能容忍如此普遍的人类灾难的经济制度必须作重大的改进，而且，一个不能也不愿采取足够措施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政府必须撤换掉”，也意味着“公众理解到，只有联邦权力才是足以对付这种国家灾难的惟一源泉，也才使公众接受大幅度地增加并使用这种联邦权力。”①

二、“新政”是长期酝酿、研究的成果

1932年7月2日，罗斯福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的结语中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誓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第二天，著名漫画家罗林·柯尔比在报纸上画了一副漫画：当一架机翼标有“新政”二字的罗斯福座机在天空飞过时，一个迷惘而满怀希望的农民倚锄仰望。不久以后，“新政”二字便成为一种新鲜而生气勃勃的政治口号。②

1932年7月2日罗斯福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到“新政”时，虽然还没有在文字上形成一个鲜明而全面的“新政”蓝图，但也决不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新政”是一系列权宜

①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上卷，第37、39页。

② 这篇演说中“新政”二字并非初创，许多美国史书对此有所说明，小阿瑟·施莱辛格著《旧秩序的危机》第532—533页第32章注30的说明较详细，可参阅。

之计。[1] 如前所说，罗斯福纽约州长任内的社会经济政策，已具“新政”雏形[2]。

1932年3月至1933年3月间，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在罗斯福的指导与合作下，为拟订“新政”纲领，“参考了上千种书籍，借鉴了大量以往政治经验。”[3] 他们不独有明确的方向，还有些政策的设想[4]，并在此后罗斯福竞选演说中逐一提出来。所以罗斯福在1933年7月24日第3次炉边谈话中回忆说：“3月4日以来，所有提案与立法并非仅仅是一系列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互相连接的、合乎逻辑的整体的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5] 罗斯福的这种说法是基本可信的。莫利在1966年出版的《第一次“新政”》和罗森在1977年出版的《胡佛、罗斯福与智囊团》中，用相当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令人比较信服地证实了“新政”、尤其是第一次“新政”对早期智囊团研究成果的继承性和总的一致性。当然，有些史学家指出：罗斯福竞选演说有时含糊其词、前后矛盾、具有保守色彩，这也是事实。但据罗斯福的著名传记作者弗兰克·弗雷德尔说：“有些很有力的理由，使得罗斯福没有事前详细具体地宣布他的计划。首先，他还没有制订出

---

① 这种说法的典型著作，是1948年出版的约翰·弗林的《罗斯福神话》一书，此书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贬抑罗斯福，认为罗斯福是没有经济知识和基本哲学的人，只凭权宜之计治国；罗斯福纯粹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的大量政策都是急就章。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1卷的内容，是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时的公文与演说，题为《“新政”的发轫》。

③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3页。

④ 1932年12月10日，由莫利起草、罗斯福署名在《自由》杂志上发表了“释‘新政’”一文，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罗斯福实行“新政”的途径；在莫利档案中，有许多智囊团的建议表明他们对于“新政”立法有着具体而详细想法，其中有一份阿道夫·伯利在1932年11月10日写的备忘录，内容非常全面，还提出一些根本性立法。

⑤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2卷，第295页。

来。另外，他不想失去（那些不喜欢“新政”的人的）支持。”[①]罗斯福曾经对塞缪尔·罗森曼说：“你知道一个总统为了使好的立法通过首先要做到的事吗？他必须当选。假如我现在回到海德公园去，作为一个平民坐在走廊里，对于我目前从事的任何工作，几乎无能为力。所以，除非有某种强有力的理由，不要莽撞行事，免得丢了选票。你必须先有选票，然后才能做出有意义的事业”。[②]

罗斯福当选后，基本上仍然“依靠为他起草竞选演说的智囊团制订具体立法计划。……给他的学术与职业专家们分派任务，对于希望他们探索的问题给予简要指示；认真听取他们建议。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的人，他也听取各种压力集团的意见。通过调解各种互相冲突的压力集团的意见，并将这些调解结果告诉立法起草人，罗斯福能酝酿出一种可行的纲领，使工业区域与农业地带，华尔街和小城镇都接受。这种纲领要得到有产者的支持，可是也给无产者以希望。”[③]

为了得到牛顿·贝克一派的支持，罗斯福除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认可他未曾参与制订的、并不能体现“新政”内容的民主党政纲外，还应贝克要求，通过广播演说公开向全国予以承认。他在与胡佛竞选中途降低“新政”调子，略向右转，据詹姆斯·M·伯恩斯推断，可能是为了对付胡佛右的攻击。[④]不过，不管罗斯福如何掩饰，胡佛当时是了解“新政”内容的。所以在他竞选失败后，曾于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1月中旬和1933

---

① 弗兰克·弗雷德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发动新政》，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3，第60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与罗斯福共事》，纽约：哈珀出版社，1952，第30页。

③ 弗兰克·弗雷德尔：前引书，第63—64页。

④ 见詹姆斯·伯恩斯著：《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6，第143页。

年2月中旬至3月初，两次以邀请合作制止危机为名，企图诱使罗斯福放弃"新政"，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他的这种用心，在他1932年2月20日写给国会参议员戴维·里德的私人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说，假如罗斯福按他的建议作出声明，罗斯福"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的全部主要计划；那就意味着放弃90%的所谓'新政'。"[①] 罗斯福拒绝了胡佛的建议。虽然如某些美国史学家所说，这里面可能有党派斗争和私人成见，但这一期间罗斯福及其助手们正紧张地秘密准备他的"新政"计划[②]，胡佛想要他放弃90%的"新政"，他当然不会接受。

三、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

如前章所说，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濒于崩溃。人们担心银行继续倒闭，挤兑风潮愈加疯狂，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的统治，接近解体。罗斯福为稳定人心，在就职演说中提醒国人说："首先让我申述我坚定的信念：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事是恐惧本身——那种阻滞我们作出必要努力以便变后退为前进的无名的、没有理由和根据的害怕。"[③] 不少美国史学家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恢复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仅仅用语言鼓舞人心是不够的。胡佛要求美国人民相信美国经济制度的话不知说了多少，但越说越使美国人民丧失信心。罗斯福由于有在纽约州实行"小新政"的纪录，由于他在竞选演说中勾画出的"新政"轮廓，

① 转引自雷蒙德·莫利：《第一次新政》，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66，第143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前引书，第60页。

③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2卷，第11页。

由于他坦率承认“当前黑暗现实”并允诺打破传统“立即采取行动”，他呼吁人们要有信心的话，才能使“全国在收音机前听他演说的人激起振人心弦的希望。[1] 在此后数日内，有近 50 万人写信到白宫”[2] 向他致意。有的人说：你的就职演说“似乎给全国人民和我以重新生活的勇气”；有的甚至说：“人民仰望你几乎像仰望上帝一样。”

〔挽救银行危机〕 经过紧张准备，他采取了胡佛迟迟不愿也不敢采取的行动，于 3 月 6 日命令全国银行停业 4 天，以便通过立法，进行整顿。3 月 9 日，国会根据他的要求召开特别会议，并在 4 个小时之内通过紧急银行法。此法表明：罗斯福政府既没有像某些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将银行国有化；也没有像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建议的那样，将银行业务交给邮政储金系统。它保持了银行的私人所有制，但开始加紧了国家对银行、货币、信贷的控制与管理。为解决银行货币荒，它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

财政部按照紧急银行法迅速采取行动，根据相对健全程度将银行划分为 4 类，其中具有全国存款 90% 的银行被认为健全，并允许它们在 3 月 13、14、15 日复业。对基本健全的银行则进行扶持。从 1933 年 3 月至 1935 年 7 月，对6,468 家这样的银行

---

① 1933 年 3 月 11 日著名编辑威廉·A·怀特向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说：“罗斯福说什么关系不大，使美国人民高兴的是他的所作所为”，1933 年 3 月 11 日怀特给伊克斯的信。见怀特手稿。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9，第 1 页。

提供30余亿美元资助。在同一期间，还清理和关闭了2,352家无偿付能力的不健全银行。

为取得广大群众对紧急银行法的支持，罗斯福3月8日在活泼亲切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3月12日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用通俗的语言号召人们给予支持。

此外，3月20日，国会还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节约法，缩减政府开支和退伍军人津贴5亿美元。此法虽然有损于罗斯福提高购买力的要求，但有助于恢复企业界的信心和安抚保守派。3月15日以前参、众两院还通过啤酒法，预计每年可增加税收1亿至1．5亿美元。

经过这些紧急措施，证券市场也于3月15日复业。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已有10余亿美元回流到银行，储蓄超过提款；储藏者也陆续将黄金送返联邦储备银行。银行基本得救了。长期浸没于淡漠与沉闷气氛之中的首都的鲜明行动意识，正使全国复苏。特格韦尔称之为"一个黑暗时代之后的重生期"[①]。原来反对罗斯福任总统的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赞道：只是"在一星期之内，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失去信心的美国，重新信任政府和自己了。"[②] 许多原不同意"新政"人士，如胡佛政府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报业巨子威廉·R·赫斯特、国会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牛顿·贝克、红衣主教威廉·奥康内尔等人，也写信或者发表言论，赞扬罗斯福取得的成绩。

〔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与管理〕　银行基本稳定以后，为了防止参院有关调查小组当时揭露出来的骇人听闻的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营私舞弊活动，为了使1929年灾难性投机不

---

① 小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第19页。

② 见李普曼在1933年5月号《评论之评论》上的文章。

再出现，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提供证券实情法，并于5月27日签署。此法虽允许私人经营证券，但强制证券经纪人提供关于准备出售的证券的真实价值和出售证券办法的完整资料。这项法律虽然遭到金融界普遍反对，但1934年国会又通过证券交易法，并据此法建立一超党派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委以防止投机诈骗、操纵市场的行为，并协助对此种行为进行惩罚。小阿瑟·施莱辛格说，由于此法、银行法和黄金政策的实施，"对国家经济前途带有根本性的决策，不是由政府官员本着对人民负责精神作出，而是由曼哈顿银行家们在董事会会议室作出"的"这种情形结束了。"[①]

1933年6月银行法，即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主要有两项内容：为防止银行利用存款或联邦储备系统资金进行投机，将商业银行和它的投资机构完全分开，并规定联邦储备系统对其成员银行有更大节制权；为保证广大群众小额存款安全，防止今后再发生灾难性挤兑，建立了一个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为数达2，500美元存款予以保险。[②] 由于有了这个公司，此后7年银行停业总数较1933年1年还少8%。

为缓解通货紧缩、提高物价和减轻债务者负担，罗斯福虽然在竞选中未敢公开支持有控制的通货膨胀论，但实际上人们认为他是倾向这种主张的。反对通货膨胀的国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即因此故，拒绝出任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就任总统后，罗斯福首先试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使美元贬值。继紧急银行法之后，他于4月5日发布行政命令：所有金元、金条或黄金证券，均须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其他硬币或纸币。两周以后，财政部即宣布不再发黄金出口许可证。这就使美国在国内放弃了

---

① 见所著：《新政的到来》，第247页。

② 1935年提高到5千美元，二次世界大战后提高到4万美元。

金本位制，但仍保留货币的黄金储备，允许政府在国际汇兑中支付有限黄金。6月，国会又通过一项联合决议，禁止在任何公私合同中使用黄金支付。

5月间，国际汇兑中美元含金量已跌到以往的85%，对美国出口有利，国内批发价也略有上升，要求继续实行通货膨胀的呼声日益得到国会明显多数的支持。这种情况，使罗斯福对美国代表团在伦敦经济会议上的使命难以确定。因为决定在6月12日召开的这次会议，其主旨在于降低关税和稳定货币，以促进国际贸易。罗斯福虽然4月底5月初模糊地向英、法领导人保证合作，但由于通货膨胀似乎对美国经济复兴有利，到会议开始时，他日益皈依所谓商品美元论，认为复兴的希望在于将美元继续贬值，使之降到它1926年购买力的水平。最后，罗斯福拒绝在稳定货币方面进行合作，使会议不欢而散。1933年10月下旬，罗斯福训令复兴金融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购买黄金，起初定为每盎斯31.36美元。此后数月，总统不断提高金价，直到实现商品美元价为止。这时，他才开始稳定美元含金量，并于1934年1月31日将金价定为35美元1盎斯，美元含金量为它1933年以前价值的59.06%。

“新政”早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复兴的作用，美国史学界议论不一，但有控制的通货膨胀对罗斯福政府在必要时实行赤字开支、刺激经济复兴是必要的。

通过以上措施，罗斯福政府维护并加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但也加强了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管理与控制。

四、国家干预下的农业救济与复兴

除银行危机外，农业危机问题的解决也刻不容缓。这是因为

如前章所说，由于生产过剩、价格猛跌造成的长期农业不景气，到罗斯福就任总统前后，使得美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的斗争，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暴力行为，阶级斗争形势逼人。其次，从进入政界开始便较关心农业和农民选票的罗斯福似乎认为：农民购买力的猛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①，提高农民购买力是复兴的一大关键。第三，1933 年春播即将开始，要影响今年春播，就要尽早行动。所以，在 3 月 8 日银行尚在休假期间，罗斯福就同意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农业部助理部长特格韦尔着手准备一个农业法案。但是，如何确定法案内容，各农业组织领袖、国会议员、知识界的意见很不一致。因此，这个法案到了 3 月 16 日才提交国会。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说，这种“挽救农业的办法”“对我国经济的复兴具有明确、肯定的重要性”，它“力求提高我国农民购买力和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水平。”② 但国会没有像罗斯福等人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通过，辩论不休。保守派担心由国家控制农业生产与销售将导致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农业集团代表则要求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抵押农业财产的赎回权和至少能收回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

与国会辩论农业法案同时，“整个中西部与大平原区农民积怨满腔，大有沸腾之势。要求挽救抵押农业财产与迅速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压力，日益无法控制。芝加哥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阿瑟·E·霍尔特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艾奥瓦和南、北达科他州考察归来后，于 4 月 11 声称：“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发现农民们谈到联合起来反抗现状的具体行动步骤。农民中正在形成一种阶

---

① 当时农村市场通常消费国内货物与劳务的 1/4，见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 536 页。

② 1933 年 7 月 2 日小亨利·摩根索日记，摩根索文件集，藏纽约州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

级觉悟，除非罗斯福的农业救济法案立即生效，定会发生一场农民总罢工。"[1] 4月底5月初，由米洛·雷诺等领导的农民休假联合会为迫使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正式下令于5月13日举行全国农民罢工。至于零星暴动，则发生多起。4月27日，艾奥瓦州勒马斯约有600个愤怒的农民，把判决取消抵押田产赎回权的法官从审判席上拉下来，打得人事不知。

面临这种严重形势，罗斯福于3月27日发布命令，将8个联邦农业信贷机构，合并为农业信贷局，以提高农业信贷效率，节约200余万美元开支。4月，国会通过紧急处理农场抵押问题法，总统于5月12日签署。[2] 紧接着又制订出贷款给家禽饲养农场的法令。后来到1934年6月28日国会又通过弗雷泽—莱姆基农场破产法，使农民得以十分宽大条件收回其已失去赎回权的抵押财产[3]。

第一次"新政"期间具有深远影响的农业法，是上述正在国会中进行辩论、后来总统于5月12日签署的农业调整法。此法与以往农业法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农业调整要在联邦农业部指导之下进行。据此法成立的农业调整局属于农业部，内分两大部门：一个部门负责农业生产的调整；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农产品加工与销售。调整的目的是：在农业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和维持平衡，以便农业收入具有它在1909至1914年那个稳定时期所享有的同样的相对购买力。为实现这种所谓平价，此法对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猪、棉花、烟草、牛奶、大米——实行各种调整。主要是对自愿减少耕地农民给予津贴，其次是对与政府

---

① 弗兰克·弗雷德尔：前引书，第318页。

② 此法规定用紧急贷款挽救即将失去抵押财产的农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农业信贷局对美国全部农业抵押的1/5提供了资助。

③ 重新赎回价格由联邦法院决定，利率1厘。

合作农民给予商品贷款，与农作物加工者签订销售合同，并规定销售定额和出口补贴。实行这些调节的经费，来源于对农业商品加工所征税收和对某些列举商品所征关税。

此法还附有一个托马斯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但不要求）用6种不同方法增加货币供应。其中包括：印发30亿美元纸币；按16比1比例自由铸造银币；降低联邦储备金额；降低美元的含金量至50%。此修正案目的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其他物价，减轻农民债务负担。

由于农业部接到报告，1933年夏、秋两季将丰收，华莱士与农业调整局局长乔治·N·皮克向南部和西南部派出大量代表，说服农民耕掉1000万英亩（或1/4）棉花，以换取津贴，农业调整局还购买22万头大猪和600多万头小猪，立即宰杀作为紧急救济食品。毁掉部分小麦的计划，由于接到报告该种作物将大大减产，才未执行。

棉农耕掉他们答应少种的棉花后，却又通过加肥使1933年棉花总产量较1932年增加4.5万包。因此，1934年4月21日国会通过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授权农业调整局规定棉花销售定额，并对超定额出售棉花课以寓禁税，结果使1934年棉花减产340多万包。同年6月又通过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

此外，农业调整局还运用它的巨大权力以其他方式限制生产与提高价格。除为1934年主要农作物规定生产指标，并派出10万代表去说服农民签订合同外，还于1933年10月18日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使棉花与玉米生产者可以用他们收成作担保贷款，并将收成储存起来以待善价。

通过以上国家控制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各种措施，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当然，1933、1934年的干旱，对基本商品粮的减产也帮了大忙。农业净收人，从1932年的192,800万美元，增为1935年的

460,500万美元。农业品价格与农民购买制造品所付价格之比，以1909至1914年平价期流行比例为100，从1932年的58增为1935年的88。农民在反破产的斗争中，也日益守住阵地，甚至还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改变了农业抵押贷款不断上涨趋势，将它从1930年的963,076.8万美元，降为1935年的758,445.9万美元。

这就说明，国家作为总资本家调整农业和提高农民购买力，对挽救美国资本主义农业起了显著作用。但是，由于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措施，不可避免地对人民群众也具有一些有害影响。对农产品加工者征收的加工税，很容易被他们转嫁给广大消费群众；农业调整计划的得益者主要是生产商品的农场主，至于佃农、分成制农民和雇农则很少得益，甚至受害。比如在南部，由于棉田大量缩减，还使30多万黑、白佃农、分成制农民失去工作。特别是在大批群众不免于饥寒的情况下毁掉大量农产品，更显出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

五、国家指导的工业复兴及其失败

林克、卡顿在《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说："大概罗斯福政府上台时最有兴趣而清楚的事实，是除货币贬值外，它没有任何工业复兴的计划。"[①] 这未免言过其实。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制订与主要内容〕　据莫利说，罗斯福上台前，曾将许多工业复兴方案交给他分类整理。他用了大半年时间与有关人士会谈。1933年2月10日，美国商会主席亨利·哈里曼交给他《一份经济计划》。哈里曼曾就此计划在1932年与罗斯福多次长谈。其主旨在于：通过同业公会消除企业间自我毁

① 林克、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第48页。

灭性竞争和致力于全国性经济计划，以刺激复兴与就业。3月，莫利将一批工业复兴计划交给詹姆斯·沃伯格整理，沃伯格于4月4日交回一份综合计划，莫利认为不合要求。总之，到1933年3、4月间，莫利手上的许多方案之中，他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曼计划。与此同时，商业部助理部长约翰·迪金森和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也在拟订类似的计划。

胡佛政府后期，由于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的激烈斗争，美国劳工联合会倡议将工业工时限制为每周30小时，以便缓解失业问题。国会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据此倡议提出一个法案，于1932年12月提交国会，并于1933年4月6日由国会通过。罗斯福认为，此法案不过将现有工作分给更多的人做，并不能增加工资总额，提高工人群众购买力；应该有一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法案。他立即委派一个以珀金斯为首的内阁委员会提出一个代替法案。作为布莱克法案修正案的珀金斯法案提出后，企业界竭力反对，认为此法案是主张由国家"广泛而全面地控制工业，并由劳工部长扮演独裁者角色。"4月11日，罗斯福授意莫利与首都研究企业界与政府合作问题的各有关方面接触。4月25日，莫利将有关资料交与智囊团的休·约翰逊，请他提出一个工业复兴计划。由于争论较多，5月10日，罗斯福成立一个包括罗伯特·瓦格纳、约翰逊、唐纳德·里奇伯格、迪金森、珀金斯、刘易斯·道格拉斯等人的委员会[①]，责成其拟出一个满意的法案。5月13日，他们提出一个各方基本满意的法案，并于5月17日提交国会。国会通过后，6月16日由罗斯福签署，称为全国工业复兴法。[②]

---

① 罗伯特·瓦格纳是国会参议员，出身贫苦，同情工人和工会，坚持在工业复兴法中要有保证工人组织工会权利的条款；里奇伯格是铁路工会的劳工律师；道格拉斯是预算局长。

② 参阅雷蒙德·莫利：《第一次"新政"》，第283—291页。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主旨在于：对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业中已明显表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也就是由国家对处于“自我毁灭性竞争”状态的企业界、极度贫困的劳工以及矛盾异常尖锐的劳资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①]

该法分为两大部分。第1部分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暂停部分反托拉斯法条款的实施，并规定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在它的认可和监督下，由资方、劳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订分别适用于各行业的法规。法规要求禁止垄断，但可根据公平竞争原则，限制生产使符合实际需要，固定物价使维持可以获利水平。法规还规定禁止16岁以下童工，要求保证劳工的合理工时，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等，从而提高工人购买力。各行业法规都需要由总统批准，总统有权修改或补充；在行业内部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总统可以强加一个他自己的法规。经总统批准的法规，具有法律效力。

这一部分的第7条第1款，亦即著名的劳工条款，对劳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目的是要“最后解决现代经济史中两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劳工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问题；和各州政府根据治安权与联邦政府根据州际商务管理权和征税权设法废除童工，制定最低工资，限制工时和为了社会安全，管制工业中对妇女剥削的问题。”[②]

该法第2部分授权总统建立公共工程局，拨款33亿美元，举办公共工程。（这方面情况将在下一节叙述）

〔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成就与失败〕　6月20日成立的国家

---

①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朗达·莱文认为，此法宗旨为：重新调整资产阶级各阶层关系与劳资关系，以适应无法继续进行的美国资本积累过程的需要。参阅莱文：《阶级斗争与“新政”》，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88，第4章。

②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543页。

复兴管理局由休·约翰逊任局长，他上任后立即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在工业复兴法通过3星期之后，纺织工业法规即得到总统批准、许多行业都要求制订自己的法规。1月之内，国家复兴管理局接到200多份申请。约翰逊为应付此紧急需要，建议在各业法规订出之前，先拟订一个一揽子法规，称为"总统颁布的再就业协定"。几星期之中，就有雇佣1600万工人的233.3万雇主签署这个法规。这些雇主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约束，通过行业内部合作以调整生产、提高价格，但也要保证不雇佣16岁以下童工，提供固定最低工资，避免不必要的提高物价，工厂工人每周劳动35小时，其他工人40小时。实施此法规的效果迅速而显著。到8月间，自我毁灭性竞争有所收敛，生产有所好转，物价有所提高，246.2万工人重新就业，10月间更增到近300万。

由于约翰逊千方百计地进行宣传，并发起蓝鹰运动[①]，到1933年年底以前，提出来要求批准的法规达1，000份。到1935年初，国家复兴管理局共批准557个基本法规，208个补充法规。

但是好景不常，由于国家复兴管理局没有实现其就业与复兴目标，也往往不能使企业按法规要求承担起对劳工的义务，到1933年后期，不满之声四起，消费者抱怨物价猛涨，工薪增长赶不上物价上升；劳工界虽然在组织工会会员、就业、工时、工资等方面得到些益处[②]，但比起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的

---

① 对所有符合法规规定的企业发给蓝鹰徽章，悬挂在企业的营业地点或印在它的产品上，作为它与政府合作的证明。蓝鹰徽章虽无法律意义，但没有这个标志，便可能引起公众对它实行抵制。

② 失业率从1933年占总劳动力的24.9%，降为1935年占总劳动力的20.1%；所有工业的平均周工时，从1933年6月的43.3小时，降为10月的37.8小时；周平均工资从1933年的16.73美元，增为1935年的20.13美元。

规定来，还相去甚远，因此抱怨政府偏袒资方，执法不力[1]；中小企业埋怨法规偏袒大企业，促进垄断，使它们无力和大企业竞争。至于大企业，除少数较有远见者外，一般只是为了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以加强企业内部的垄断联盟，借联邦政府之力调节生产、稳定物价以挽救自己的极端困境，才暂时答应对劳工作出一些让步，多少收敛一些自我毁灭性竞争，到经济情况略为好转，特别是国家复兴管理局加强法规实施时，他们便指责法规"无法实施"，公开抗拒。洛雷纳·希科克在全国访问数月之后，写信给哈里·霍普金斯："呵！我一直在欺骗自己，以为至少在大工业中法规在起作用，比如在纺织业中，大约60%的人遵守法规。但令我惊异的是，我现在敢断言：99%的美国大企业正试图撕毁法规，并取得成功；而小企业则连假装遵守都不干。他们不能。整个该死的企业界，只是从政府推动和公众对总统信任而得到改善的企业活动中抢夺他们能够抢夺的一切，他们毫无贡献。"[2] 进步派共和党人指责复兴管理局助长了垄断，是小企业的压迫者。有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甚至哀叹"联邦政府把希特勒主义移植到美国的每个角落"[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程度不

---

① 由于实施全国工业复兴法引起了激烈的劳资冲突，罗斯福于1933年8月5日建立一个与国家复兴管理局合作的全国劳工委员会，由罗伯特·瓦格纳任主席。1934年春，紧接一阵罢工浪潮之后，总统撤销该委员会，建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它有权举行选举以决定各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它的作用也不大。因此，第一次"新政"只在取缔童工、实行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方面较有成绩，其他目标由于总统不坚决，成就很小。

② 1934年4月11日洛雷纳·希科克致霍普金斯的信，见霍普金斯文件集，藏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

③ 1933年8月10日卡特·格拉斯致沃尔特·李普曼的信，见格拉斯手稿，第4盒，藏弗吉尼亚大学。

同，罗斯福和胡佛犯有同样错误。他们都认为让企业组织起来"自我调节"，它们就可以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为社会普遍利益服务。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从理论上说，政府规定制订法规的委员会和执行法规机构，要由资方、劳方、消费公众3方代表组成，并受政府监督。但实际上，政府却容许这些机构受大企业代表控制，致使法规的制订与执行对大企业有利；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过是一种伙伴关系[①]，监督极其无力。1934年春，当休·约翰逊发现这些问题，组织起自己专家班子，试图强迫法规执行机构履行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广泛目标时，国家复兴管理局便和企业界领袖日益发生频繁而剧烈的冲突。为缓和这种不满，罗斯福于1934年2月9日建立全国复兴检查委员会，由著名刑法学家克拉伦斯·达罗主其事。一般认为，达罗的调查报告像起诉书，只是罗列罪名，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没落。在日益增强的抨击下，罗斯福被迫要求约翰逊辞职，进而取消国家复兴管理局，并于9月27日成立由资方、劳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全国复兴委员会，放宽了某些法规，放弃了某些固定价格的规定。1935年5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就谢克特家禽公司控诉美国政府一案作出判决，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而结束了这次局部调整工业生产关系的实验。

六、联邦救济工作的迅速增长

如前章所说，在胡佛政府时期，美国失业人数达1,700万，到处流浪的人达150至200万，其中青年人约20至25万。人民

① 雷蒙德·莫利：前引书，第290—291页。

群众、特别是失业工人斗争十分激烈。“惟一的希望在于代议制度似乎无力提供的、具有力量和意志的政府领导。有些人以羡慕眼光看着莫斯科，有些人看着柏林和罗马。”① 即使在这种情形下，胡佛仍然坚持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害怕具有力量与意志的政府领导将导致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顽固反对联邦政府认真干预。罗斯福虽也像胡佛一样相信平衡预算，不主张赤字开支；认为救济工作首先是公私慈善机构，地方、州、市政府的责任。但是，罗斯福是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进行救济；为了“不让一个人饿死”，应当实行救济。因此，当公私慈善机构，地方、州、市政府无能为力时，不管是否出现预算赤字，也应由联邦政府负起救济责任。1932 年 10 月 19 日，罗斯福在匹茨堡的竞选演说中谈到联邦预算问题时曾经指出：“假如我们公民中任何一部分人陷入饥饿或极度贫困，因而有必要增加拨款以至预算失去平衡，我也将毫不迟疑地把全部实情告诉美国人民，并请求他们允许我得到那笔增拨款项。”②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民间资源保护队〕　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自己提出一个平民垦殖队计划。经过征求计划涉及的陆军、农业、内政、劳工各部及部分参议员意见后，于 3 月 21 日提交国会。国会通过有关立法后，3 月 31 日建立民间资源保护队，4 月 5 日开始活动。其主旨在于：一方面将大批“流浪的野孩子”和城市失业青年投入有报酬的劳动，养家糊口；一方面致力于自然资源保护，

---

① 小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第 3 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 1 卷，第 811 页下面注。参阅 1932 年 10 月 31 日罗斯福在波士顿竞选演说，同上书第 351—353 页；特格韦尔：前引书，第 250—251 页。

植树造林。资源保护队成员主要来自领取救济家庭里的青年，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能从事艰苦的劳动。除食宿外，每月工资30美元（其中25美元寄给他们家庭），并容许8%的成绩优良者每月得36美元，5%每月得45美元。黑人青年所占比例，与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体一致。

民间资源保护队队员的征集由劳工部负责，管理由陆军部负责，但没有军事训练，只有文化学习和职业训练。农业部负责造林和水土保持工程，内政部负责监督所有国家公园、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开垦计划方面工程。

该队第一次领得拨款3亿美元，雇佣25万青年，在大约1500个营地劳动。到1935年，雇佣青年达50万。到1942年结束时，共有275万青年在它里面劳动过。这个队承担的工程种类，有建立电话线、防火地带、卡车道、防土壤侵蚀或分洪堤坝、供野生动物需要的蓄水池、植树、扑灭森林火灾、控制虫害与鼠害等。仅在最初的18个月中，国家森林面积就增加500万英亩，国家公园增加67，000英亩，植树1，500万株，修卡车道34，570英里，防火地带23，000英里，筑防土壤侵蚀堤坝609，000个。[①] 据洛克滕堡记述，该队队员们"修整树林400万英亩，放养鱼苗近10亿尾，建起3万多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开挖了许多引水渠和运河，修复了独立革命与内战战场。他们捕杀西部森林里的云杉锯蜂和摩门蟋蟀、中西部的蝗虫和东部的舞毒蛾。他们修建起瞭望塔、公路和山路网，以便侦察火情，趋救较易。最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全部公私造林成果，一半以上出自民间资源保护队之手。"[②] 一般说来，队员离队时，都以健

①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518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74页。

壮体格和对生活的新态度进入了私人企业。

〔联邦紧急救济〕　由于州、市、地方政府财源枯竭，无力救济，而胡佛又顽固反对联邦直接救济，各州救济名册上近600万人的生存面临威胁。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除吸收失业青年参加民间资源保护队外，也十分关心这些人。国会响应总统呼吁，于3月27日开始讨论联邦直接救济事宜，不久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总统于5月12日签署。此法规定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拨给经费5亿美元，一半直接给予各穷困州，另一半给其他各州，条件是：州、市每开支救济费3美元，即由国家津贴1美元。任何1州所得数额，不得超过总数15%。

总统选择纽约州临时紧急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任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霍普金斯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精明干练，对人民苦难具有深刻同情心，他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当一位联邦紧急救济署助手持一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救济计划来见他时，他说，“人民不是‘总有一天’才吃饭，他们天天都得吃。”[①] 所以他就职后，雷厉风行，到任次日，就用电报与各州州长建立了联系。到傍晚以前，他已批准对科罗拉多、伊利诺伊、艾奥瓦、密歇根、密西西比、俄亥俄和得克萨斯等州拨款。工作进展极为迅速。各州除以食物、住房、衣服、电灯以及燃料等进行直接救济外，还实行以工代赈。救济机关购买剩余商品加工后分给穷人，并给农村贫穷家庭安排工作，让其以劳力换取食物、牲畜和工具。除维持生活外，救济机关还建立幼儿园、农村教育推广训练班和成人教育班，资助势难维持的学校，并用助学金帮助大、中、小学的

---

① 内森·米勒：《富兰克林·D·罗斯福全史》，纽约：新美国丛书出版社，1984，第338页。威廉·曼彻斯特说法与此略有不同，见所著前引书，第119页。

男女学生。

1933年9月，春、夏的虚假复苏已经结束，千百万家庭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无就业之望，1934年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就要开始，霍普金斯抓住这次危机，于11月初会见总统，力促其发起巨大的以工代赈紧急计划，用以救济大量失业者及其家庭。总统立即同意，于11月8日设立民政工程局，任命霍普金斯为局长；并从公共工程局资金中拨款4亿美元，不到30天，民政工程局的业务便兴旺发达起来，使400多万人及其家庭有了谋生之道。不到4个月，就开办了18万项、几百种不同类型的简易工程，所花经费超过95,500多万美元。[①] 这些工程举办起来容易，可以救急。例如：清除公路上、下水道障碍、修改坡度、铺路、翻修路面、消灭急转弯、修理沟渠和路标、修筑停车场等；学校建筑方面的小型建筑工程、油漆和泥水工作。自来水工程、修建各种运动场、修筑道路、园林和围墙等；公用事业方面的修理煤气管、旧汽车道改道、安装火警电铃和避雷针等。霍普金斯的这种非正统作法和高速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浪费，因而日渐引起共和党人、民主党保守派的激烈指责。罗斯福老友、负责监督所有新政机构的全国非常会议主席弗兰克·沃克到全国巡视归来后对总统说："那些人批评民政工程局和它的工作，我认为不值得重视。霍普金斯和他的同事们工作得很好，取得了辉煌成绩。……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民政工程局及其工作人员感到骄傲。我的

---

① 1933—1934年冬天很冷。到1934年1月中旬，约有2000万人要靠联邦救济，而拨给民政工程局的4亿美元所剩无几，霍普金斯在总统同意下于1934年2月又向国会请得拨款95,000万美元。他将45,000万美元用于民政工程局，5亿美元用于紧急救济署，不过民政工程局实际开支有所超过。

结论是：他们扭转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危机之一。”[①] 罗伯特·舍伍德举例说：“民政工程局各项计划实施不到几星期，全国的鞋店就开始报告它们的货物已销售一空，鞋厂纷纷重新开工。”[②] 民政工程局的具体成绩如下：兴建和扩建学校4万所；铺设污水管道1,200万英尺；建造飞机场469个，扩建529个；修理和建造公路25.5万英里；为成人教育和因缺乏教师无法开学的乡村学校雇佣教师5万人；兴建和修整操场和运动场3,700个。

受惠的420多万人中，有3,000名作家和艺术家，许多人对此进行攻击，霍普金斯说：他们是人，他们也要吃饭！

即使取得如此显著成绩，攻击还是有增无已。由于中期选举等原因，罗斯福不得已只好让霍普金斯停办民政工程局。这样，1934年其余时间的救济负担，就又完全落在联邦紧急救济署的肩上。

〔公共工程局〕　　前面已经提到，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第二部分规定建立公共工程局，拨款33亿美元，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这原是罗斯福政府用来和国家复兴管理局一起刺激那些不景气的、主要是建筑业的复兴措施。但是，由于总统担心休·约翰逊不牢靠，不能很聪明地花钱，便任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兼任公共工程局长。伊克斯是个谨慎的、诚实的人，决心不让他掌握的33亿美元有1分钱被窃或浪费掉。他坚持仔细审阅所有工程细节，因此，公共工程局的工程进展非常缓慢，在1933年不独未能成为经济复兴的巨大刺激力量，也未对是年联邦承担的重大经济任务作出多少贡献。这是1933年11月霍普金斯力劝罗

---

① 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50，第54—55页。

② 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50，第55页。

斯福建立民政工程局的重要原因。不过，由于伊克斯精明而严格的领导，公共工程局对美国的基本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33至1939年，它帮助建造了全国新校舍的近70%，县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工厂的65%，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的35%。它使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实现电气化，费城第30街车站得以建成。在纽约，它帮助建筑了特里博罗桥、林肯隧道和贝尔维尤医院的精神病房。它给得克萨斯州建起布朗斯维尔港，将基韦斯特和佛罗里达州腹地连结起来，建造了设计极佳的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架设了俄勒冈州海岸公路的桥梁。在它的部署下，海军建造了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企业号，重型巡洋舰温森斯号，和许多轻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炮舰及战斗机；陆军航空部队得到制造100多架飞机和修建50多个军用飞机场拨款。

公共工程局对提供低成本住宅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在它存在的前4年半中，只建筑了25,000套住宅。不过，联邦政府在1933年6月13日成立了房主贷款公司。它有权借款475,000万美元，用以帮助即将失去房产赎回权的房主。在它存在的3年之中，向100多万房主共贷款30多亿美元，约等于全部城市房产抵押贷款的1/6。其次，为刺激近于停工的房屋建筑业，国会于1934年6月28日建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在1934年至1940年之间，发放长期低息的修理住房贷款230万次，合计94,500万美元；建筑新房屋贷款554,000次，合计23亿美元。

通过以上活动，美国联邦政府增加了国有企业，刺激了私营企业，也起着为垄断资产阶级养活和培训劳动后备军的作用。

七、第一次“新政”的得失

关于第一次“新政”的得失，历来聚讼纷纭。但是，如果我

们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 1933 年 3 月 6 日罗斯福下令全国银行休假，到同年 6 月 16 日铁路协调法的诞生，这 100 天中间，国会共通过 15 项主要立法（总数共 70 项），基本上扭转了罗斯福上台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濒于崩溃的局面。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2 月末，我们是一些乌合的受惊暴民与宗派团伙。在 3 月至 6 月这 100 天中，我们又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相信我们保证自己安全和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了。"[①] 哈罗德·伊克斯说，"这不仅是一次'新政'，这是一个新世界。人民又感到自由了。他们能够自然地呼吸。好像是离开一个阴森可怕的场所走向开阔的树林地带。"[②]

当然，整个第一次"新政"的成就尚不仅此，如洛克滕堡所说，20 年代的历届政府，是一种只代表企业界的单一利益集团政府，而到 1934 年，早期"新政"模型开始形成；比起 20 年代政府来，它标志着一种重要进展。"它使 20 年代大批被排斥的农业界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在政府中有了发言人。即使工会在早期'新政'中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也有了鸣不平的新论坛，和瓦格纳参议员这样一些为其利益斗争的战士。瓦格纳认为，利益集团政府就包含有政府鼓励工人组织工会的意思……此外，'新政'……还使一些多年在官僚机构中工作但并不墨守成规而又桀傲难驯的人[③] 掌了权……最后，罗斯福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凌驾于任何私人集团之上的公众利益。他在 1934 年谴责银行家们说，'以往那种认为银行界与政府平起平坐、相互独立的错误看法过时了。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政府必须是领导者，必须是包括银

①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第 22 页。
②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第 23 页。
③ 这是指知识分子。

行界在内的社会所有集团的相互冲突的裁判者。'"[①]

对于洛克滕堡这里描述的第一次"新政"引起的美国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是这样看的：虽然第一次"新政"期间美国政府仍然是代表企业界亦即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比起它以前的几届共和党政府来，它在扶助工农、抑制资本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而且取得一定成绩。它不仅通过资助、调节和管理加强了垄断资本，稳住了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并使工业生产从 1932 年低点回升；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会地位，使数百万[②] 失业者重新得到工作，大批失业工人得到救济。它还使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大量农民抵押财产得到保护，农民经济地位有所改善，直接引起农民暴动的农业严重不景气现象有所缓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大垄断资本家的某些极端弊病得到一定程度抑制。但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积极反抗，由于罗斯福的妥协，第一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和复兴，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因此，也影响救济与复兴的深度，而且得益者主要是大企业主和大农场主。工人的就业、救济和组织工会问题，小农、佃农、农业工人、老年人等的贫穷问题，还解决得很不彻底。所有这些，就引起综错复杂的阶级斗争。

---

①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 89 页。其中所引罗斯福的话，见罗森曼编：前引书，第 3 卷，第 436 页。

② 各家估计不一。罗斯福说从 1933 年至 1934 年 5 月，有 4，711，000 人就业。见塞缪尔·罗森曼编：上引书，第 3 卷，第 3 页；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说 1935 年比 1933 年就业人数增加 400 万。见所著《20 世纪的美国》，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印书馆，1978，第 228 页；也有人的估计较上述估计为低。

第三章

第二次“新政”

第一次“新政”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帮助金融界、企业界谋求经济复兴，并对它们的某些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极端弊病进行节制；同时也扶助工农，使其有生存之道，并提高其购买力，以挽救垂危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从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政策。在资本主义面临崩溃之时，垄断资产阶级是暂时接受的。但在崩溃危机逐渐消失时，除少数较有远见企业家外，大多数垄断资本家便不能接受，甚至激烈反对。另一方面，罗斯福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由于不能摆脱“健全财政”的旧信条，力图保持预算平衡；而且错误地认为，企业界能够从全社会利益着想，诚心和联邦政府合作，因而对其监督不力。这样，就使得第一次“新政”在抑制垄断资本和“扶助工农”这方面成绩很有限，广大劳动群众、失业者、贫苦无告老人十分不满，通过各种形式，要求进一步改革。到1934年底，这种综错复杂的阶级斗争，使罗斯福对企业界逐渐感到失望；而且认为，无论从人道主义考虑，或从维持自己政权考虑，都有不顾企业界反对，大力实行社会改革以改善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处境的必要。与此同时，1934年11月中期选举民主

党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国会中支持将“新政”向前推进的力量。所以，到1935年，罗斯福就逐渐抛弃那些保守的顾问，聚集一批急于改革的朋友，开始发动“重点在于为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实行大规模政府干预”① 的第二次“新政”。

这次“新政”的高潮出现于1935年第74届国会开会晚期，1936年又有所补充。它的确加快了社会改革的步伐，促进了社会改革的深度；在帮助劳动人民、失业者、贫苦无告老人方面，在限制垄断资本方面，做出一定成绩。不过与此同时，也激化了保守派的反抗。他们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国会里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联盟，以及他们的政治组织和舆论工具，进行干扰和抵制，所以在1936年大选中，虽然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都不能使他在1937年初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扩大“新政”的计划，得到实现，只取得部分成果。到1939年，由于国际形势要求罗斯福更多地注意外交事务，由于他为了取得南部民主党人对他外交政策的支持，不得不暂时停止社会改革，罗斯福和“新政”派只得致力于保持已取得成果，不再提出新的“新政”计划了。

一、1934至1935年初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

我们说这时期的阶级斗争错综复杂，是因为既有形形色色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右的方面反对“新政”的斗争，也有美国共产党从左的方面反对“新政”的斗争，还有形形色色人民群众要求扩大“新政”、大踏步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

---

① 弗兰克·弗兰德尔：《20世纪的美国》，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公司，1976，第189页。

〔各种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反对“新政”的斗争〕

1933年4月银行基本稳定、证券市场恢复后，金融界已有人开始反对1933年5月的提供证券实情法和6月的银行法，但整个说来，1933年这种反对的规模和程度有限。企业界虽有少数人对国家复兴管理局不满，1933年大体也是支持“新政”的。全国新闻界一般也支持罗斯福，只在某些方面对“新政”提出一些批评。可是，到1934年初，当经济危机的最险恶阶段日益消逝时，垄断资产阶级中多数人便对“新政”中出现的一些进步趋势，日益展开尖锐而粗暴的抨击。[1] 除前章中提到的1934年春对国家复兴管理局和民政工程局的攻击外，特别对1934年2月9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制订管理证券交易立法的咨文和同年6月6日签署的证券交易法，十分不满，如威廉·洛克滕堡所说，“到1934年夏天，包括所有利益集团的罗斯福联盟趋于解体。企业家们日益感到‘新政’意味着对企业的广泛管制。证券交易法已经够糟的了，但还不仅如此，1934年，国会还通过了建立联邦通信委员会以管制无线电、电报和海底电报的通信法，为铁路员工提供退休金的铁路职工退休法，以及对授与联邦合同实行严格控制的航空邮件法，更加引起不安的是日益增长的预算赤字。不仅国会恢复了根据节约法缩减的预算，罗斯福本人还开支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2]

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934年纪念林肯诞辰的演说中甚至说：“我已经看到一位独裁者正在成长，他已使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土耳其的凯末尔十分妒嫉。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已成往

---

① 威廉·福斯特特别强调“新政”期间工人斗争与工会势力的增长引起大资本家的反对。见所著《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50—352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91页。

事，个人自由不过是记忆而已。"[1]

1934年8月，一小批狂热保守政客、金融家、大企业家和公司律师，正式组成一个反"新政"的小集团——美国自由同盟。这个同盟的头面人物，主要来自反对在1932年提名罗斯福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那个集团，有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约翰·拉斯科布、伊雷内·杜邦及其两兄弟皮埃尔和拉莫特、约翰·戴维斯、朱厄特·肖斯[2] 等人。肖斯被选为同盟主席。财政支持主要来自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大垄断组织。

同盟初成立时，慑于罗斯福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曾发表愿意"协助"政府声明，同时以"捍卫与维护宪法"为幌子，散发一份由许多著名律师签名的环形签名声明书，认为大多数"新政"立法违宪。但是，这些手法是骗不了人的。这个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憎根"新政"的小集团，在州一级很好组织起来以后，便开始对"新政"进行猛烈攻击；攻击它的财政政策、救济政策、劳工政策。它还谴责罗斯福是独裁者，栽诬各种"新政"机构中的律师、教授是"亲共产党分子"。一句话：它反对罗斯福通过"新政"把美国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除这个小集团外，1934年还出现各种牌号的、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但以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的法西斯运动。[3] 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认为：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已无可挽救或值不得挽

---

① 见美国第73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2595号《国会纪录》（1934年6月18日）中J.W.泰勒的发言。

② 约翰·戴维斯是摩根家族律师，1924年曾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朱厄特·肖斯是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管。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它的阶级基础是旧下层中产阶级，即主要来自农民、店主或手工业工人。见所著《动荡的政治》，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第69页。

救。代替它的将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亦即罗斯福“新政”；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者比较起来，他们又倾向于法西斯主义。西华德·科林斯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1933年主编《美国评论》杂志，公开吹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到1934年，他说，“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个人自由，”[①] 而他则公开把自己描绘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科林斯自己虽不喜欢法西斯的赤裸裸的暴力活动，但因他在知识界中和者廖廖，到后来还是卷入了暴民活动。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认为高利贷是罪恶之源，而马丁·范布伦总统以后的美国，已为高利贷者所控制，高利贷不仅引起压迫与贫穷，也使文化堕落。要挽救美国，自由主义无能为力。高利贷这种“世界性癌症，只有法西斯主义手术刀，才能把它从美国身上割掉。”[②] 1934年，他和美国法西斯组织——银衫团有过来往。1935年，他认为美国早期优良传统可在意大利找到，而不在“马萨诸塞州或德拉华州”。他谴责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意大利的拉帕洛当寓公去了。

科林斯和庞德及其他知识界法西斯主义者，在美国政治中影响不大，比较有影响的是劳伦斯·丹尼斯，1932年，丹尼斯发表《资本主义的末日到了吗?》一书，认为企业界糊涂，自由主义无用；攻击那种让投资金融家决定资本用途与分配的政策必然破坏公共福利。后来，他日益感到资本主义存在不下去了，美国面临的选择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混乱。但是，他倾向法西斯主义，认为美国的大企业制度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他还为美国法西斯政权勾画出一个轮廓。不过，由谁来进行这场法西斯

①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71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73页。

"革命"呢？他认为是向下沉沦的中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亦即小资产阶级。1935年，他认为休伊·朗可作为这次"革命"的领袖。然而结果是：对他说来，像对科林斯一样，"拯救文明的中坚分子，到头来却是一些跌跤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人主要由于一种臆想的犹太人阴谋引起的无穷优虑而团结在一起。"[①]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褐衫团窃取退伍金远征军继承者的名义，在阿尔特·J·史密斯"将军"的领导下，设总部于费城。它的纲领包括，取消国会，支付退伍金，按照16比1比例调整白银价格，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海、陆军。史密斯头戴华美头饰，身穿卡其军服和马裤，外罩饰有4颗星的褐色仿麂皮外衣，不断发表政治呓语，向他的信徒出售卡其军服和靴子。

史密斯仿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提议在1933年10月12日——哥仑布纪念日率领150万退伍军人进军华盛顿。但在7月间，当激进派试图破坏褐衫团在纽约郊区的一次动员会时，他们杀死了一位批评史密斯的激进派，史密斯向警察伪指另一激进派为杀人凶手，社会党人负起了为被告辩护的责任。

哥仑布纪念日前夕，警察搜查了褐衫团总部，搜出许多武器。史密斯携款潜逃。12月，在对纽约杀人案审理中，一个褐衫团员承认是自己开枪打死了那个批评史密斯的人，史密斯因伪证罪被判6年徒刑，从此默默无闻了。

威廉·D·佩尔利自称是加利福尼亚人，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与不动产推销业务；20年代时曾死而复生，复生后写了《在西天的7分钟》一文。1933年，在希特勒任德国总理的第2天，佩尔利开始建立银衫团，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它是同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78页。

类社团中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佩尔利蓄着灰色山羊胡子，眼闪凶光，身穿银衫和马裤，对无知者和心神不安的人具有诱惑力。他对所谓犹太人国际阴谋忧心忡忡，发行《解放》杂志，其内容是占星术、唯灵论、放射疗法，反犹太主义和纳粹主义大杂烩。1934年3月它发表声明："在美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迫使犹太人离职。"① 银色军团的第1号特别公报说："这支伟大的基督教国民军在全国都有附属机构，准备有朝一日立即成为一种活跃有力的警戒组织，……自己成员取代各种官职。"②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银衫团成员是武装的，并有打靶场进行实弹射击和演习。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位加入银衫团的退休企业家让一位青年记者看他为共产党革命时期准备的罐头仓库，并说，如果上帝让我成为这些野兽手上的殉道者，我将在我这个基督徒的家里，为保卫我亲爱的妻子而死。

堪萨斯州原教旨主义牧师杰拉德·B·温罗德，也以基督教保卫者身份号召人们反对犹太人和"新政"。他把"新政"看作一场犹太人的共产主义闹剧。1934年，他的德国之行使他相信希特勒的正义。同年，他的《保卫者》杂志发行到4万份。但是，由于他非常害怕共产主义革命，经常生活于恐惧之中。

像史密斯·佩尔利和温罗德这样的人自然还有。不过，如小施莱辛格所说，"1934、1935年间，美国的法西斯分子，大都是些在贫穷困苦人们中做工作的怪人。然而观察家们不安地评述道，人们一度正是这样谈论希特勒的啊！"③

除史密斯等这类代理人外，垄断资本家有时还亲自出马。比如共和国守卫队这个组织，便是美国几个最有魔力的金融家资助

---

①②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81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的。它反对童工修正案、社会保障法，并主张取消宪法中普遍福利条款。它的主席亚历山大·林肯认为犹太人的威胁是真的。

更轰动一时的是退休将军斯梅德利·D·巴特勒的故事。他是两枚国会勋章获得者，1933年告诉众院一个委员会说，有个纽约公债推销人杰拉德·G·麦圭尔向他提供18，000美元，让他在美国军团大会上保卫金本位制，他拒绝了。于是，麦圭尔受健全货币与美元委员会的委托，到欧洲去考察法西斯退伍军人运动。一位记者证实，他回国后曾对自己说：美国需要一个法西斯政府；而具有建立此种政府爱国心的，只有军人，斯梅德利·巴特勒则是他们理想的领袖。这些人可以先和罗斯福合作，然后再像墨索里尼对待意大利国王那样对待他。

麦圭尔不承认关于他的大部分传说，但国外战争退伍军人总司令、后来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詹姆斯·E·范赞特证实了巴特勒的故事，并说华尔街的代理人也和他联系过。众议院以约翰·麦科马克为首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则声称：除了麦圭尔直接向巴特勒将军提建议这一细节以外，它能证实巴特勒将军所说的一切，而且认为麦圭尔自欧洲写回的报告，多少肯定了这种说法。

最右势力的报纸发行人威廉·R·赫斯特早期支持“新政”，但到1934年，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1934年7月旧金山总罢工，他变了。他说罗斯福政府比共产党人还要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同年他访问德国，对希特勒自称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德国印象特别深刻，认为是伟大成就。这年11月，他声称美国只有真正有必要防止共产主义时，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因此他发动一场提醒美国警惕共产主义危险的十字军运动，他甚至派私人侦探装扮成学生，到大学里去设法给教授们戴红帽子，他的报纸也干同样勾当。他甚至谴责保守的众议员、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反共立法赞助人约翰·J·麦克斯温实际上是个精神上的共产党人和叛国

者。

由于他的这种把水搅浑的运动，使得有些美国人皂白不分，简直就把不同政见者、自由主义者或外国人当成共产党人。1934年出版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赤网：爱国人士备用激进主义人名录与手册》，甚至把牛顿·贝克、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夫人、甘地等和美国联邦教会理事会、美国劳联、美国消费联盟、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等当作是与共产主义阴谋有牵连的人和组织！[①]

〔美国左翼政党和工人群众的斗争〕　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美国共产党发展较快，从1933年的14,000人发展到1934年3万多人。[②] 在厄尔·白劳德的领导下，它激烈攻击“新政”。1934年4月，白劳德在美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说：“罗斯福的纲领和全世界金融资本的纲领是一样的，这是一种饥饿、法西斯化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纲领……在政治本质和方向上，和希特勒的纲领相同。”[③] 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攻击得更激烈。1933年评论道：“罗斯福自己是个富足的棉花种植园主……喜欢用毁掉棉花的办法赚钱……这就是赤裸裸的‘新政’。罗斯福政权的一举一动，都加强了剥削者用以将群众打倒在地的强有力手段。”1934年评论道：“难道这种骗术不是这个华尔街工具、这个在拥抱人时常在背后插一刀的总统的标志吗？他对贫穷、饥饿儿童的空洞关心是多么假情假义……〔他〕以一个华尔街忠实走狗的冷酷，为战争和利润耗费数10亿美元，却看不起

---

① 该书所列与接管美国的共产党阴谋有牵连的组织约500个，人员约1,300。

② 小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197页，福斯特说1934年4月上旬共产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时，登记党员数为24,500人，见《美国共产党史》，第307页。

③ 厄尔·白劳德：《美共中央委员会在第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纽约出版，第20—21页。

穷人。”1935 年初又说：“新政为了使工人处于工业奴役的状态，正在努力走向法西斯和战争。”①

对第一次“新政”期间立法，美国共产党也攻击得不遗余力。关于国家复兴管理局，它的评论是：“蓝鹰的爪子是寄生富人的贪婪之手。”全国工业复兴法第 7 条第 1 款，则是“劳工的新锁链。”而一次“新政”的农业政策，乃是“一直试图把农民和收成一起埋葬掉。”②

美国社会党继承第二国际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1932 年大选时，在 43 州得选民票 882，000 张。它的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在教会和大学里较有影响，但它这时的党员只不过 15，000 人，而且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诺曼·托马斯对初期“新政”具有一定同情，但他认为罗斯福只是致力于“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到 1934 年，他已认为“新政”从根本上说作用不大，而且感到群众中有一种日益失望的情绪。至于其他社会党人，尤其是那些富于战斗性的，则更直截了当。1935 年 3 月，有个社会党人写道：“在所有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中，最大的骗局是‘新政’。它没有哲学基础，只是极端机会主义。”③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我们在后面将较详细叙述，这里只想说明，这一时间美国工人罢工运动十分激烈。这和美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有关，但主要是不满于全国工业复兴法第 7 条第 1 款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引起的。工人斗争主要目标是组织工会权利和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

〔政治蛊惑家利用人民群众不满进行的各种运动〕　由于

---

① 这三段引文，见 1933 年 7 月 10 日、1934 年 1 月 2 日和 1935 年 2 月 9 日《工人日报》（纽约）。

② 三段引文俱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 191 页。

③ D·P·贝伦堡，“乌托邦”，《美国社会主义季刊》，1935 年 3 月。

第一次“新政”只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渡过最危险阶段，基本上克服了美国人民的绝望情绪，但并未使美国经济完全复兴：1934年国民收入虽远较1933年为好，但仍较1929年的低近400亿美元；1935年1月，城市消费者收入仍较1929年同月的低13%；农民现金收入自1933年以来虽大有提高，但仍较1929年的低28%；特别令人不安的是，1934、1935年仍有1,300多万人失业。[①] 在这种形势下，又加上第一次“新政”势头日益减弱，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不满，虽然如前所说，有些人支持法西斯组织，有些人支持共产党，但为数有限，大量的不满群众则是跟着一些提出异想天开的救世药方的政治蛊惑家或激进派走的。

这种政治蛊惑家或激进派煽起的群众运动，有的影响只限于个别的州，比如厄普顿·辛克莱发起的“消灭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运动、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领导的农工党运动，等等。我们这里因篇幅关系，只举几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例子。

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弗朗西斯·E·汤森医生平生坎坷，在1933年66岁失业时，手中只存不到100美元积蓄，谋生困难，加上当时贫苦无告老人很多，于是，他在1933年9月提出一项计划，建议联邦政府征收2%的营业税，[②] 每月付给所有60岁以上失业者150美元（后改为200美元）津贴，并要求将该款于当月在国内花光。这样，既可以让更多青年人就业，又可以刺激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缓解生产过剩危机。这个计划提出不久，虽然有人指出难于实行，因为它要求将全国全年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付给约占人口总数9%的老人。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在全

---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21页。小施莱辛格提供数字为1,000万（占全体劳动力1/5），见《动荡的政治》，第2页。

② 后改为个人及公司所得税。

国穷苦老人中像野火一样传播，还得到一些希望摆脱养老责任的青年人的支持。1934年1月，成立了老人周转金公司，3月又开始在各地组织地方俱乐部。1935年1月出版《全国汤森周刊》，汤森自称有信徒500万，另“据某些估计，签名请愿支持这个计划的多达2,500万人，”“比较保守估计”也“有1,000万。”①

汤森运动后来具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其成员大都来自盎格鲁撒克森后裔的下层中产阶级，有的人甚至声称汤森是耶稣基督化身，同时，运动的目标也有所升华：它不仅是为老年人争取养老金，而且是通过老年津贴计划克服萧条、争取繁荣。汤森说：“这样的时候到了，美国公民必须监督政府，丢掉在一个富庶的土地上却容许匮乏与饥饿的哲学。”② 它不仅谴责罗斯福“新政”忽视老年人，还曾成功地把支持他们的人选进国会，反对不支持他们的政客。

到1935年，这个运动已成为一支相当有力的政治力量，它把照顾老年人问题带进了美国政治生活领域。

查尔斯·E·库格林是底特律郊区的天主教神父，生于加拿大，20年代来到美国。他声如洪钟，热情而富有感染力，在当地电台讲道拥有大量听众，随着大萧条的开始，他讲道的政治气味愈来愈浓。不久，他对胡佛政府、银行家（特别是国际银行家）和大公司的谴责，就比他的宗教启示更得人心，到30年代初，他煽动人心的演说估计吸引了3,000—4,000万听众。他收到的信件之多，全国无人能与之相比，一般每星期8万封，有时达100万封；每年所收捐款，平均约为50万美元。为了处理这些

---

①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译本），上卷，第102页。威廉·曼彻斯特也说汤森有1,000万追随者，见所著《光荣与梦想》，第111页。

②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35页。

事务，他有个150人的秘书班子。他拥有自己的广播网（60个电台），办有自己的企业，出版自己的宣传品。

库格林神父在大学读书时，从中世纪教会文件中学习到，利息是掠夺性的、不道德的；从教皇利奥十三世1891年通谕中，学习到天主教徒应当鄙弃经济个人主义，帮助弱者与无力保护自己的人，而且在尊重私有财产的同时，要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作为建立社会正义的工具。后来，他还深受平民党传统的影响，由于这种思想基础，他认为大萧条是华尔街和国际银行家造成的，最危险的共和党人是披着保守主义羊皮、热衷于保持贪婪政策的狼；他提倡工业和信用的国有化计划，开始他是支持"新政"的，1932年提出口号：不选举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直到1934年4月，他还说："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这种思想：'新政'就是基督之政。"[1] 但是，由于第一次"新政"期间没有将银行国有化，罗斯福拒绝了白银集团的要求，特别是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公布的白银投机者名单以库格林的秘书为首，使得库格林很不高兴。也是在1934年4月，他却说："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中间，希特勒的政策、墨索里尼建议和斯大林的教条，比华盛顿和杰斐逊思想更受到尊重。"[2] 此后，他对罗斯福和"新政"是时捧时骂。到这年11月，他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已腐朽，应当进历史博物馆，于是自己组成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盟员750万。该同盟组成许多打手队，每队25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1935年初，他发表了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纲领，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同时又和罗斯福决裂，谴责"新政"是犹太人纲领，总统是

---

① 1934年4月5日《纽约时报》。

② 转引自小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24页。

撒谎的人、反对上帝的人。有一次在辛辛那提市讲演，还公开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汤森医生虽有上千万追随者，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目的，库格林神父有大量听众，但他追求的目标不太明确。休伊·P·朗才是个真正本领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一切条件：选民、政纲，而且本能地了解该在何时如何夺取政权，只有他这个敌手真正使罗斯福感到害怕。”[①]

朗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贫穷地区的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他只用8个月时间就学完杜伦大学法科3年课程。21岁执律师业，在联邦最高法院出庭，用1页发言大纲辩明了下级法院判为违宪的一条法律符合宪法，从此名声大震。

1928年秋，35岁的朗被选为州长，他一上任，就迅速打破大公司势力，大力兑现他竞选时诺言：取消人头税，开征营业税，免贫民的普通财产税；债务人可以按政府规定延期还债；给学生发免费教科书，并由学校派车接送学生，还对成年人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在3年之内，为本州修筑柏油路2,500英里、碎石路6,000英里，桥梁12座；同时，他还是南方惟一平等对待黑人州长。有一次，三K党领导人威胁说要到路易斯安那州进行反朗运动，他对记者说，告诉他们我说，不准那个帝国杂种[②]走进来半步：我称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骂人，只是点明他的出身。

1930年，朗当选为国会参议员，由于他让自己亲信占据了该州所有重要职务，他虽身在华盛顿，却牢牢遥控着该州一切权力。他办的虽是好事，但往往用暴力对付反对他的人。当选参议

---

①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158页。

② 三K党最高领导人称为“帝国法师”。

员前夕，他的女秘书丈夫扬言要控告他破坏他们夫妻感情，他却派人把这人带上飞机，在天空打转，直到投票完毕才让他降落。

朗不独成为路易斯安那州主人，他在国会参议院也很霸道，并逐渐成为全国性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写过一本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的书，准备在1936年竞选总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曾秘密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朗如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夺去罗斯福400万张选票。

朗在1932年是支持罗斯福的。但后来他不赞成罗斯福政府将银行归还原主，认为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是向华尔街公开卖身，再加上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审查，联邦拨款对他照顾不够等原因，他转而反对“新政”。他认为美国一切社会经济不幸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他从1932年起就提出了共享财富的决议，后来逐渐修订；1934年1月又建立共享财富社，提出共享财富计划。到1935年7月，据说共享财富社有社员700万，共享财富计划内容包括，限定私人财产不得超过500万美元，超过部分由国家没收；每个家庭至少可以有5,000美元，拥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一架收音机和一部洗衣机；任何人每年收入不能超过180万美元，也不应少于2,000美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退伍津贴；少年免费入学，青年经智力测验合格免费上高等学校，劳工工资定有最低标准。这项计划通过小册子与演讲向全国宣传，影响很大。1935年7月《幸福》杂志评论道：朗对有钱人的攻击言论具有广大市场，受到民意测验的一半人认为，政府不应允许个人有超出100万美元投资。

“从全国来说，朗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是下层阶级抗议第

一次‘新政’妥协的主要宣传鼓动者”,[①] 他日益成为下届总统竞选时对罗斯福的重要威胁。由于1935年9月8日朗被刺身亡，这种威胁虽然解除了，但向朗的遗体献的鲜花铺满了3英亩土地，约有25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二、第二次“新政”的肇始

由上所述，从1934年，特别是该年夏、秋起，罗斯福“新政”面临几方面的反对或挑战。有大垄断资本与两党保守派恢复自由放任政策的要求，有垄断资本代理人鼓吹的法西斯运动，有左派力量学习苏联、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宣传与活动，有工人群众争取组织工会权利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运动，有政治蛊惑家利用下层人民群众不满兜售的各种万应灵方，也有民主党内部不满第一次“新政”妥协性的人提出的各种激进改革方案，特别是将“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改为“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的方案。

在所有这些反对派或挑战者中，罗斯福是一向愿意和企业界及两党保守派合作的，但对他们恢复自由放任政策，亦即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退回到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认为是一种“允许财富与繁荣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1/3的人口却继续缺衣少食，住房不足”[②] 的政策，不能同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能再是“伙伴关系”，政府应居于领导地位，以抑制企业的弊端，改进社会下层人民处境。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国国会众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册，第64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3卷，第5页。

议院1934年3月曾建立一特别委员会，对“非美活动”进行调查，揭露出威廉·D·佩尔利及其银衫团，调查了斯梅德利·巴特勒的指控，也传讯了共产党领导人。但一般说来，罗斯福和“新政”派只觉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令人厌恶”，[①] 因为罗斯福说：“在我国，我们不仅面临共产主义的危险，也面临所有权力（经济的和政治的）集中在古希腊人称为的寡头统治集团手中的同等危险。”[②] 它们会摧毁他们所信奉的资产阶级民主。然而从政治影响来看，它们对罗斯福政府的威胁，却远不及工人罢工运动、参议员朗、库格林神父等人领导的运动那样严重，因为跟着它们走的人并不太多。而且，罗斯福和“新政”派还认识到：除企业界和两党保守派的反“新政”运动外，其他各种运动的兴起和加强，都是由于第一次“新政”在改革方面不深入，使广大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农、佃农、雇农不满的原故，问题在于推进和加强“新政”。鉴于中期选举在即，罗斯福在1934年6月8日致国会的咨文中，6月28日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保证，他的政府在下届国会期间，将制定具体措施，解决美国人民的住房问题、生计问题、并实行社会保险；在同年9月30日的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保证：“我国必须有这样一条原则：我们将不允许失业大军存在；我们将调整我国经济，使之尽快结束现有失业，然后采取英明措施，使失业现象不再出现。我不愿设想任何美国人永远靠救济为生。”[③]

1934年11月的中期选举结果表明，美国大多数选民对罗斯福“新政”仍然是信任的。在一般情况下，中期选举往往使执政

---

① 这是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话，较有代表性，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92页。

② 1930年5月14日罗斯福给威廉·西罗维奇的信，藏罗斯福图书馆。

③ 塞缪尔·罗森曼编：同上书，第420页。

党的势力减弱，可是这次选举却使民主党获得空前多数。35个竞选席位中，共和党失掉26个。参议院中4个共和党右翼领袖落选，民主党参议员较共和党的多44人。众议院民主党多数从313席增为322席，共和党则由117席降为103席。民主党所得选民票比例有所增加。在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人只剩下7席；从1874年以来一直由共和党人担任的宾夕法尼亚州长，也输给了民主党人。

由于阶级斗争形势要求罗斯福大力推进“新政”，加深社会改革，由于1934年中期选举加强了他推进“新政”的信心，也由于他政治策略的变化，[①] 1934、1935年之交，罗斯福不顾企业界和两党保守派恢复自由放任政策的要求、大力加强社会改革的决心增大了。1934年11月16日，他在纪念独立革命将领乔治·克拉克演说中说：“我们以往建立起来的惯常生活秩序，不能应付我们现今不得不面对的危机与问题。又一次，仅仅为了生存下去，也要求我们创建新的秩序。”[②]

紧接中期选举之后，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1份扩大以工代赈计划。有一天，哈里·霍普金斯告诉他联邦紧急救济署的朋友们说：“伙计们，现在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一切——工程计划、社会保障、工资与工时。一切——现在就干，否则，永远也干不成。”[③] 感恩节过后不久，霍普金斯往见罗斯福，显然争取他批准了“一切”。然后，总统在1935年

---

① 莫利指出，自1934年中期起罗斯福的亲密政治顾问路易斯·M·豪健康日益恶化，爱德华·弗林逐渐取代了他，并说服罗斯福把他和豪原定的争取农民的竞选战略，逐渐转为争取城市中约700万对两党都无好感的少数民族、少数宗教信徒和工人。这也是罗斯福发起第二次“新政”的重要原因。见雷蒙德·莫利：《第一次“新政”》，第525—527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同上书，第457页。

③ 转引自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中册，第65页。

1月4日致国会年度咨文中，提出了第二次“新政”。

他说：“尽管我们作了努力并发表了谈话，但我们还没有清除享有过多特权的人，也没有有效地提高无特权者的地位。这两种不公平现象阻滞了幸福的实现。”① 因此，美国应以社会正义为目标，按照自由主义传统和宪法精神，实行变革；美国人民要求断然放弃那种通过过分利得以攫取财富从而使私人权力足以控制公共事务的思想。他建议，把救济名册上350万有工作能力的人，安排到清理贫民窟、建筑住宅、农村电气化和扩大公共工程等项目中去劳动，制订一个综合社会保障计划，以减少失业者、老年人和需人赡养者的生活苦难。此外，他还提到“巩固联邦对一切运输工具的管制，更新和澄清全国工业复兴法总目标，加强对犯罪和罪犯的预防、侦破和惩治，清除控股公司的恶行以恢复公用事业领域的健全经营，逐渐减少政府的紧急信贷活动，以及改进税制”②。

三、第二次“新政”的高潮

第二次“新政”虽然开始于1934、1935年之交，但当时并没有大规模行动起来，有时还走回头路。这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里要求深入改革的力量虽然很强大，可是除保守派日益高涨的阻力外，罗斯福政府还面临司法部门废除“新政”立法的威胁。与此同时，“新政”派内部也意见分歧。首先是：有的人要求继续与企业界合作，暂缓改革；有的人要求大力进行改革，不惜与企业界决裂。要求大力进行改革的人，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要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4卷，第16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同上书，第23页。

求像西奥多·罗斯福那样，把经济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政府实行统制；有的人要求像威尔逊总统那样，由政府来恢复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内部意见分歧，当然更增加了罗斯福决策的困难。特别是智囊团首要成员莫利，影响更大。如前章所说，莫利是第一次"新政"时期的重要幕僚，参加过一次"新政"所有立法的制订。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他力主两者之间的合作，反对与企业界决裂；力主两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反对政府控制企业。1934年春天，他曾宣称"新政"实际上已经完成。所以在1936年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劝阻罗斯福再向前推进"新政"，实行新的社会改革。莫利的这种主张，在"新政"派内部有人支持，当然更得到国会两党保守派的赞许。

这种情况，使得罗斯福举棋不定，既怀疑企业界合作诚意，却又仍然试图取得企业界支持。1935年初的几个星期内，他在重大劳资争议中站在资方一边，支持把土地改革派赶出农业调整局，在公共住宅争议中支持私房利益集团头目，反对以工代赈法中的"通行工资"修正条款。除督促国会在4月8日通过紧急救济拨款法外，他的这种保守倾向一直持续到4月末，使他的进步追随者十分不安。

罗斯福虽然频送秋波，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回心转意。4月底5月初，美国商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和罗斯福决裂，并谴责"新政"，罗斯福对此十分气愤，并在5月3日记者招待会上评论道："自然，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所有这些发言中，没有一个发言是为人道、为老年、为失业者着想的。"[①] 特格韦尔说：这次商会会议"从政治上说，也许是我们遇到的最好事件之一，总统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162页。

一定会开始把工农群众中本来会支持他的力量团结起来。”[①] 会议散后不几天，罗斯福召集一批进步人士到白宫，其中有内阁的伊克斯和华莱士，参院的小罗伯特·拉福莱特、乔治·诺里斯、伯顿·惠勒、爱德华·科斯蒂根和海勒姆·约翰逊，以及未在政府任职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20年代进步派戴维·K·奈尔斯。这些人一致认为：企业界决不会支持总统；罗斯福表现出领导魄力的时候到了。弗兰克福特还告诉罗斯福，路易斯·布兰代斯传话来说，已到了最后关头。

正当罗斯福反复考虑进步人士意见的时候，5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就谢克特公司控诉美国一案判决：不管是由于它授予总统以实质性的立法权，或由于它干涉州内贸易，全国工业复兴法都是违宪的。这一判决，使政府与企业界联合的原则遭到致命一击，也使罗斯福与企业界合作通过全国性规划复兴经济的幻想完全破灭。6月13日，他召开一次国会两院领袖会议，拍着桌子要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一批深入改革的法案。

在这次政策转变的过程中，第一次“新政”智囊团逐渐失势，有两派顾问日益得势。一派由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领导，以弗兰克福特及其两高足本·科恩和汤姆·科科伦为核心。他们反对大企业垄断，反对与大企业合作，主张恢复竞争性小企业。他们认为大企业是操纵金融形成的，政府可以通过金融体制的下列改革来阻止大企业进程：实行累进税制；制定管理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和控股公司的立法；加强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维持转售价格和其他公平贸易措施。此外，鼓励和扶持劳工运动和合作运动以与大企业抗衡，也有作用。另一派初露头角，其主要人物是马里纳·S·埃克尔斯。他们主张通过政府赤字开支

① 特格韦尔公文集，特格韦尔1935年5月19日日记。

谋求复兴。由于布兰代斯派渴望有一种代替第一次“新政”的复兴办法，就与这一派结成了联盟，并成为第二次“新政”的主要谋士。

〔紧急救济拨款法与工程振兴局〕 1935年4月8日通过的紧急救济拨款法，是第二次“新政”主要立法之一。5月6日，罗斯福根据此法发布7034号行政命令，建立工程振兴局及其联合机构，由霍普金斯任局长。该局的任务是，将救济名册上200多万无力工作的人交给各州直接救济，350万可以就业的人由联邦给予工作。1935—1936财政年度，该局得到拨款近50亿美元，并被授权开展小型工程项目，计划将500万无业男女投入劳动。他们的工资因工种不同而有差别，但一般比私人企业通行工资为低。

实际上，工程振兴局的工人名册从来没有达到500万人。从1935到1941年，平均每月约为211.2万。1938年11月人数最多，达323.8万。和其他合办单位一起，该局共耗资113.65亿美元，主办过25万个工程项目：修筑飞机场近1，000个，运动场13，000个，修筑或改建医院2，500多座、学校5，900所，修复了查尔斯顿的港埠街剧场，建起俄勒冈州胡德山顶漂亮的滑雪旅馆，制成大量盲人读物，供应千百万份学校午餐，教文盲读书写字，开办成千上万诊疗所与牙科医院，还出版了旅游丛书。

工程振兴局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根据专业人员也要吃饭的理论，主持了几项计划，对文化人实行以工代赈，并发挥他们才能。联邦剧院计划的负责人是哈莉·弗拉纳根。她曾对欧洲戏剧作过比较研究，对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印象特别深。这项计划注意实验和创新：有的戏完全由黑人班子演出；有的演出不用布景，只用灯光造成效果；有的戏用法语、意第绪语、西班牙语演出；还用“活报剧”形式品评当代社

会政治问题。它培养出一批新人。其次，这个计划注意把戏剧送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有60%的演出是在以往没看过正规剧团演出的乡镇进行的；夏夜，他们还在城市公园里为儿童巡回演出木偶戏。4年之内，这项戏剧活动共有观众约3，000万。再次，这项计划具有相当进步性。除演出辛克莱·刘易斯反法西斯的《这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外，还生动揭露了农民及城市贫民窟的悲惨情景，并对权势集团的人物与价值进行嬉笑怒骂。这是这个计划1939年被国会处以死刑的主要原因。

联邦艺术计划由霍尔格·卡希尔主持，为成千上万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就业机会。本世纪中期有些名噪一时的画家，如威廉·德库宁、杰克逊·波洛克、艾伦·博罗德、本·香恩、斯图尔特·戴维斯等，都是由它聘用而开创他们事业的。它雇有不少人在全国各地主办讲习班，对成年人讲授绘画、编织、工艺设计等，还有不少人参加编纂《美国设计索引》，保存了殖民地初期以来各个时代的美术设计与工艺。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复兴了已消失75年之久的壁画艺术。画家们深受墨西哥壁画大师们的影响，其作品反映出人民生活和地方风情。纽约哈莱姆区医院原始医术与现代医术鲜明对比的壁画，首都司法部大楼描绘经济公寓住户生活的壁画，圣路易斯邮局重现密苏里河历史的大型壁画，都是这些画师的作品。全国学校、邮局和其他公共建筑都装点上具有美国特色的壁画，虽然并不尽是伟大艺术作品，但大大密切了一般美国公民与艺术鉴赏之间的关系。

联邦作家计划在普罗文斯敦剧院经理亨利·阿尔斯伯格的主持下，出了近千种出版物。其中有51个州和准州、30个城市、20个地区的旅游指南，有为数达150卷的《美国生活丛书》，这一计划不独发挥了知名作家的作用，也培养了新人。出版商乐于出版这个计划的著作，其中很多种非常畅销。

由于青年失业情况更严重，6月26日，罗斯福政府在工程振兴局中设立一个全国青年处，并将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拨款增加1倍，开始一项长期的、有利青年人的计划。在它成立后的7年内，全国青年处给60多万大学生和150多万中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机会。他们从事的工作一般为打字、整理资料、实验室和图书馆助理、家庭教师等。康涅狄格大学女生编了1部社会福利法规，内布拉斯加大学学生造了1座天文台和望远镜。在同一时期内，全国青年处还帮助了不在校无业青年260万人。让他们建造传染病隔离室、修理汽车、美化公园、整修校舍等。

此外，为进行改善分成制农民、佃户、雇农处境的试验，罗斯福还于5月1日用紧急救济拨款建立了重新安置局。它是农业部内的一个独立机构，由特格韦尔领导。在其独立存在的两年中，它购买了500万英亩瘦地，作为植树、种草、建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等之用；它计划将50万户农民从瘦地重新安置在腴地之上，但因经费不足，只安置了4，441户；它还建立了3个绿带镇，也就是在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为低收入城市工人建立市郊计划社区，作为试验。

工程振兴局由于未能解决所有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它所主办的工程项目中又难免有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因而引起左右两方的攻击，但是，从社会的观点看，它大大减缓或消除了从前领失业救济金的几百万人及其家庭的不满。从经济角度考虑，它的大规模开支，对1935至1940年间走向复兴的实质性进程，作出重大贡献。从政治上看，它有助于加强民主党对国家的控制。在这方面，的确有些地方政客曾经利用工程振兴局的人员和资金，但霍普金斯是反对这样做的；民主党地位的上升，主要还是因为它确实为“被遗忘的人”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国会在1939年8月通过哈奇法，除决定政策的高级官员外，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参

加政治活动。

〔社会保障法〕　工程振兴局的工作虽然是第二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但比较起来，1935年6月13日以后通过的一些法案，才更为持久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社会保障法案是1934年由一个超党派的经济保障委员会起草，并于1935年1月提交国会的，根据弗朗西丝·珀金斯记载：罗斯福在1933年指示她准备这个法案时，他要的是一个使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保障的法案，但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①] 后来，以她为首的内阁经济保障委员会拟出一个主要包括失业保险与老年保险的法案。保守派多方攻击，有的人甚至认为是社会主义；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不充分、不完善。争来议去，直到1935年8月才由国会通过，是月14日由总统签署。

社会保障法的失业保险部分由联邦和州政府合办。它向雇主强征失业保险费，1936年开始时为全体职工工资总额的1%，1937年以后上升，长期保持在3%的水平。雇主可将该费的90%付给经过批准的州失业补偿委员会，10%上缴联邦财政部。所有各州都在两年内建立了失业保险体制，给大约2800万工人提供了保障。失业保险赔偿费各州标准不一，最高为每周15至18美元，赔偿期1年内为12至26周。

老年人根据社会保障法可得到两种补助。第一，除政府雇工、家庭佣工、农场工人及临时工、商船海员、教育、宗教与慈善机关雇员外，其他工资在6，000美元以下的所有雇工，都必须参加全国性老年保险制度。资金由雇主与雇工平均分担，开始时为工资的1%，尔后逐渐增加，付款从1940年开始。参加者近

---

① 弗朗西丝·珀金斯：《我所认识的罗斯福》，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46，第282—288页。

5，000万人。第二，联邦和州共同负责照顾65岁以上未参加老年保险体制的人员。到1940年，约有200万人据此得到帮助。联邦和州的津贴加在一起，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为20美元。

此外，社会保障法还在对等的基础上，为了照顾跛者、盲人以及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母亲与儿童，为了公共卫生事业，向各州提供联邦援助。

此法还规定建立一个超党派的社会保障局，以经管整个体制。

这个立法虽然还不完善，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类立法，但以后逐渐得到改进。多数美国史学家认为：社会保障法是所有"新政"立法中最重要立法，它使美国走上通往福利国家的道路。

〔全国劳工关系法或瓦格纳法〕　这个法案是国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1925年2月提出的。正式名称是瓦格纳—康纳里全国劳工关系法。它的核心是：将企业为了不让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而先成立的公司工会视为非法，并规定工人有通过自己选择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劳工领袖们因国家复兴管理局执行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不力，强烈支持此法，而总统和劳工部长则不予支持，说是宁可通过修订全国工业复兴法以使劳工获得保护。1935年5月16日，参院批准了瓦格纳法。如果众院也批准，总统可能否决。但是，5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作为答复，总统改变了对瓦格纳法的态度，并说服众院进行讨论。在众院迅速批准后，于7月5日签署。

此法虽是重新肯定新近废除的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确定的原则，但它对该条款模糊无力的地方规定得明确而坚定。它使公司工会的组织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而且使一些所谓不公平

惯例——干涉雇工行使自己权利、解雇或将参加工会活动的雇工列人黑名单、歧视对公司起诉的雇工等——为违法。这样，该法就剥夺了雇主们最厉害的反工会的武器。由于该法规定成立一个由 3 人组成的超党派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并授权它听取工人申诉、发布停止争执命令和强迫雇主服从，此法便有其执行机构。最后，由于该法清楚明白地规定：一个工会得到——一般是通过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下举行的秘密选举——一个产业、公司、商店或行业中的工人多数的支持，雇主就必须承认它是惟一的谈判代表，这就使那些谋求迫使雇主真诚谈判的工会有联邦政府权力的支持。

瓦格纳法在法院内外曾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有 58 名律师联合美国自由同盟提出一个动议，说该法可以被认为违宪，建议他们的法律委托人不必遵守，并尽可能找同情他们观点的法院发布禁令不予施行。因而有一年半之久，该法的实施受到这种禁令的阻碍。后因最高法院干预，才消除了滥发禁令的弊端。

除以上 3 项改善工农经济处境、提高劳工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立法外，二次“新政”高潮中还制定了 3 项限制垄断资本的立法。

〔1935 年银行法〕　第一次“新政”期间“银行法主要是一些旨在复兴的努力，而 1935 年的银行法则是以改革为目的。”[1] 这个法案是由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提出的。埃克尔斯 23 岁任银行董事长，40 岁时成为地方金融巨头。大萧条期间，他的事业仍然兴旺，但他的良心日益不安，认为自己在谋求个人得救时却牺牲了社会。他是个未和凯恩斯见面却具有与凯恩斯相似经济思想的人，认为只有政府实行赤字开支才能使萧条转为复

---

① 拉尔夫·德·贝茨：前引书，第 126 页。

苏。1934 年 11 月，罗斯福任命他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任。他一到职便帮助起草新的银行法案，准备对 1913 年建立的联邦储备体制进行彻底修改。他希望减少私营银行家的影响，将联邦储备体制的管理权交给白宫，并由储备委员会有意识地管理金融活动过程。他在 1935 年 2 月提出的银行法案，反映了他和他的某些属员、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劳克林·柯里的思想。5 月初，众院顺利通过该法案，但在参院遇到卡特·格拉斯等保守派的阻挠。格拉斯还拉拢当时控制着联邦储备体系的纽约银行家们一起上阵，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也为他们帮腔。

开始，罗斯福没有出面，只让埃克尔斯孤军奋战。直到 6 月，总统才将之列为“必须通过”的法案。加上众院领袖艾伦·戈尔兹巴勒和一些“宁要政府管理而不要‘纽约银行帮’统治”的银行界巨擘们的帮助，8 月 23 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总统于翌日签署。

该法虽然由于格拉斯等人的强烈反对进行了大量修改，仍保留了原法案所有基本内容。它授权总统任命联邦储备系统的所有 7 位新设董事，任期 14 年。新董事会可对地区银行实行更直接控制，因为这些银行主要官员的任命必须经它同意。该法还授与新董事会以控制储备银行再贴现率和必需储备的更大权力，并扩大了储备银行可凭之以向会员银行贷款的合法票据的范围，还规定将公开市场证券交易的权力转移到政府手中。最后，该法为将所有大的州银行置于董事会管辖之下，要求它们必须于 1942 年 7 月 1 日以前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这样，罗斯福就完成了确立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管理计划。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　公用事业公司层层上升为控股公司，势力遍及多州，祸害无穷。它们发行的证券往往带有欺骗性，经常向立法者行贿，为了养肥整个控股公司金字塔式的结

构，消费群众付给控股公司下层营业公司的费用迅速上升。它们的投机倒把活动，各州无力控制。罗斯福在任纽约州长的第1年，就曾提倡国营电力，得到舆论界广泛支持。1934年夏，他曾任命一个国家动力政策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1935年3月，他将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处理问题——送往国会，并在咨文中指出：控股公司“越出美国法律与企业传统”，“它是一种给予极少数掌握公司内幕的人以控制别人钱财的不应有和不可容忍的权力的发明”①，并表示他反对这种公司。后来，科恩和科科伦拟订、由众议员萨姆·雷伯恩和参议员伯顿·惠勒分别在众院和参院提出的法案，包括逐步消灭控股公司的条款，被公用事业院外活动集团称为“死刑判决书”。

公用事业公司强烈反对这个法案。他们院外活动集团的人员比国会议员还多。公用事业公司的强有力盟友纽约证券交易所甚至在首都租下一栋楼房，作为反对该法案的作战指挥部。经国会调查，电力公司用了100多万美元宣传费，宾夕法尼亚州公用事业利益集团有计划地伪造签名打电报给许多国会议员，企图阻止此法案通过。6月，参院仅以1票多数通过“死刑条款”，众院却加以否决。纽约州的27名民主党人，16名投了反对票。

最后，罗斯福虽然没有达到完全取消控股公司的目的，但以惠勒－雷伯恩为名、总统于8月26日签署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却取消了所有凌驾于营业公司两层以上的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并规定所有公用事业联合企业都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证券交易委员会如发现其违反公共利益，有权取缔营业公司以上的所有控股公司。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被授权监督公用事业公司一切金融业务。

---

① 两段引文见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100、101页。

虽然作了妥协，但这次布兰代斯式的反对大企业的斗争仍然是个巨大胜利。3年之内，所有公用事业帝国均将解体，其余大企业虽未被取消，也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反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斗争，只是罗斯福提倡公营电力的一个侧面。公营电力运动战士莫里斯·库克欣喜地写信给友人说："如你所知，总统是坚决支持公营电力的。"[①]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单独论述罗斯福提倡公营电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工程，这里只附带提一下，在哥伦比亚河上，陆军工程兵正在建筑规模宏大的邦纳维尔大坝；密苏里河上游的佩克堡，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土坝；华盛顿州东部大古力坝的工程将使河水倒流，发出电来加速西北部太平洋岸工业化，并开垦100万英亩以上土地。

〔1935年税收法〕　1935年6月19日，总统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激进税制咨文，目的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使保守派大为震惊。论者认为：财政部顾问们力促"抢先做休伊·朗答应做的事"，和弗兰克福特的纠缠不休，是提出这份咨文的直接原因。[②] 总统极力主张征收联邦遗产税、征收馈赠税、对"非常巨大的个人净收入"和公司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在第74届国会立法中，1935年税收法或财产税法遭受攻击最多。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指示其报纸编辑人员称之为"向成功者敲竹杠"法案，并用"苛政"代替"新政"；企业界及富人则干脆称为"敲诈有钱人"法。鉴于反对激烈，罗斯福直到7月中旬才表示：不通过

---

① 1935年1月16日莫里斯·L·库克给L. D. 罗斯的信，罗斯手稿，藏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② 罗斯福还说过，重新分配财富是当代世界新思想，要在美国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保存资本主义，就要注意这种新思想，通过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见小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325—326页。

税收法，他不会提议国会休会。经过反复斗争，到8月底才获通过。8月31日罗斯福签署的1935年税收法，取消了联邦遗产税，却提高了馈赠税与财产税，略增了公司所得税，并对利润超过15%的企业征收过份利得税。此外，对5万美元以上个人所得征收附加税。5万美元以上征收31%，以后逐步提高，超过500万美元的征收75%。

除上述规定外，1936年税收法又对未分配的公司收益征税，因为大股东为免缴沉重个人所得税，往往要求大量积累。

此两法虽引起企业界及高收入者的强烈不满，但政府税收并未增加多少，对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也不显著。

〔1935、1936年其他立法〕 1935、1936年其他一些不大著名立法，大都是国会对最高法院判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的反应。1935年初最高法院判决全国工业复兴法中为石油工业建立特殊管理的第9条第3款无效后，总统在1935年2月批准康纳利法，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装运违反州际合同生产的石油。由于1935年8月通过格非—斯奈德煤炭保护法，政府用一种不同形式重建国家复兴管理局煤炭法规的权威。1935年的酒精管制法，重新制订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关于酒精饮料的法规。1936年8月30日，总统支持并签署沃尔什—希利法，试图间接为制造与建筑业建立公平劳动标准。1936、1937年，国会为保存国家复兴管理局法规中禁止毁灭性物价竞争以保护中小企业的条款，还通过了鲁滨逊—帕特曼法和密勒—泰丁斯法。1936年1月农业调整法被判违宪后，2月国会通过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绕过法院反对的加工税和合同协议等问题，继续补助农民少种商品作物，把土地留下来供土壤保持和种植土壤保护作物之用。

此外，1935、1936年间，还制订一些重要改革法案。1935年联邦动力法，扩大了联邦动力委员会的管辖权和价格决定权。

1935年机动运载工具法和后来1940年的运输法，将货车运输公司和内河运载工具交州际商业委员会管理。1936年的商船法建立了新的海运委员会，并授权它帮助建立美国商船队。

〔第二次“新政”与1936年大选〕　由于第二次“新政”重点在于通过国家干预抑制垄断资本，扶助“被遗忘的人”，美国的许多垄断资本家对罗斯福和“新政”恨之入骨。他们甚至不愿提罗斯福姓名，只称他为“白宫的那个家伙”。美国钢铁公司主管工业关系的副总经理阿瑟·扬告诉美国经营管理协会说：与其遵从瓦格纳法，倒不如去坐牢。该协会授予他一枚奖章。1935年秋，美国银行家协会全国会议否决自己的提名委员会所提担任第二副理事长人选，因为他是马里纳·埃克尔斯的业务副手，而另选盐湖城的奥瓦尔·亚当斯。亚当斯提议银行家停止与政府谈判，并坚称：“美国银行家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平衡的预算、合情合理税收方案的条件下，才能与联邦政府恢复谈判。”[①] 1936年1月25日，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一次自由同盟宴会上说：如果“新政”派想把自己打扮成诺曼·托马斯、卡尔·马克思、列宁等，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们打起杰斐逊、杰克逊和克利夫兰的旗号招摇过市，他后来还退出了民主党。

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如此忌恨罗斯福，但社会下层群众则与此相反。德国著名作家、对罗斯福及“新政”进行过长期观察的埃米尔·卢特威说：“我在俄克拉何马时，曾遇见几位赫赫有名的油田主人，他们一提到罗斯福，总是诅咒谩骂，没有一句好话，我和这些百万富翁同餐之后，复在油田附近的酒店，和那些

---

① 1936年2月19日格兰特·麦克法伦给埃尔伯特·托马斯的信，埃尔伯特·托马斯手稿，第14箧，藏罗斯福图书馆。

油井工人谈话，他们却对罗斯福表示非常信任。”[1] 的确，“到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建成一个新的政治联合体，它以北部大城市群众为其坚实基础，在国会中则由新型政治人物——以纽约市罗伯特·瓦格纳为代表的北部城市自由派民主党人为领导；”[2] “差不多一切进步人士都汇入罗斯福阵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除支持总统以避免回到胡佛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是因为‘新政’特别是第2次百日‘新政’似乎实现了进步的改革派如简·亚当斯和弗洛伦斯·凯利的希望。”[3] “新政”使“少数民族、城市居民、天主教徒、小企业主、农民、黑人都和‘新政’民主党打成一片。”[4]

这种政治形势的形成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虽然罗斯福“新政”仍然面临不少困难，但如威廉·洛克滕堡所说，到1936年，罗斯福可以向全国人民指出：“新政”在3年内使600万人有了职业，1936年国民收入比1933年增长50%；他上任以来工业产量几乎翻了1番；1936年秋底特律开出的汽车比任何1年（1929年除外）都多；1936年5月，《纽约时报》的商业活动指数从1930年以来第1次上升到100；1933年20亿美元的公司赤字，到1936年变为盈利50亿美元；从1933年第1季度到1936年第3季度，农场净收入几增至4倍。[5]

为了扩大这种有利形势，罗斯福在1936年6月27日对10余万群众作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进一步抨击“通过对物质财富的集中控制、建立起新王国”、使“现代生活的整个结构”

---

① 〔德〕卢特威：《罗斯福传》（中译本），上海西风社，1941，第195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84页。
③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90—191页。
④ 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20世纪的美国》，第251页。
⑤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94页。

都被迫为其服务的“新特权阶层”、“经济保皇派”，宣称美国公民不仅应有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有经济上的平等；坚决主张“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政府对公民负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的人提供援助。”

在1936年大选中，虽然共和党，美国自由同盟，库格林、汤森、朗的继承人杰拉尔德·史密斯等支持的联盟党，以及大城市中3/4的报纸反对罗斯福，《文摘》杂志根据电话簿与汽车登记表上的人名所作民意测验预示共和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将当选，[①] 但是，罗斯福却深得广大人民群众之心。为想见到他，近15万群众把波士顿公园挤得水泄不通；密集的人群挤在长达30英里的纽约市街道两旁，看他的车驶过；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拥挤的群众争睹他的风采。正是这些人，使罗斯福得到美国有史以来最多选票。除缅因与佛蒙特外，他在所有的州取得了胜利，他的选民票比兰登的多1，100多万张，总统选举人票多514张。其他小党失败更惨。联盟党只得选民票88．2万张，社会党18．8万张，共产党8万张。

国会选举民主党也大胜，在众院几获得3对1的优势：参院96个席位中民主党占75席，共和党只16席。在33个州长的竞选中，民主党赢得26个，包括兰登的堪萨斯州。

这次大选中，有两点发展很重要，影响到日后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一是在有组织的劳工中发展着一种强有力的参政意识，主要工会作出全面努力以选举民主党人；二是北部和中西部各州大多数黑人领袖和报纸从林肯的党转向民主党，1936年，大多

---

① 《文摘》杂志过去用这种办法所作民意测验都正确，但这次家无电话和汽车的人大量投票，它的民意测验就不灵验了。

数美国黑人选民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四、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之争

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局部改变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美国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美国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从 1933 到 1936 年，对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的行政与立法部门，开始是非常支持、后来也是基本上支持的。但是，它的司法部门的情况有所不同。20 世纪以来，由于共和党长期执政，美国司法系统主要掌握在共和党手里，[①] 而且与企业界、美国自由同盟关系密切。联邦最高法院在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时，它的 9 个法官中，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威利斯·范迪范特和皮尔斯·巴特勒 4 人，是生活在 19 世纪极端个人主义气氛中的顽固派，坚信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被大众称为四骑士。[②] 自由主义法官只有 3 人：路易斯·O·布兰代斯、本杰明·N·卡多佐和哈伦·F·斯通，是少数派。在他们两派之间，则有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法官欧文·J·罗伯茨。一次“新政”期间，由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形势紧迫，他们对于国会通过的那些支持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案，是不得不接受的。1934 年 1 月和 3 月，最高法院还以 5 对 4 票支持明尼苏达州延期偿付抵押借款的判决和纽约州确定牛奶最低价格的判决。但是，随着经济危机最深重阶段的结束和

---

① 1933 年，266 个联邦法官中，民主党人只占 28%。

② 这个名词出自《圣经·启示录》，指战争、饥馑、时疫和死亡。

“新政”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全国保守势力捍卫自由放任政策的最后堡垒，最高法院再也不能忍耐了。

〔最高法院对“新政”的进攻〕　1935年1月7日，最高法院在巴拿马炼油公司控诉瑞安公司一案中，判决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第9条第3款无效，其理由是授予总统以不适当的管理石油工业的立法权。3月，最高法院虽同意国会废除私人合同中要求用黄金支付的条款，但认为政府否定政府公债中的黄金条款为违宪。5月6日，它又在铁路职工退休委员会控诉奥尔顿铁路一案中，以5对4票判决铁路职工退休法违宪，其理由是：政府强迫铁路公司对其雇员支付养老金，是不经法律程序剥夺公司财产；国会有权控制州际贸易，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干涉劳资关系。

最严重情形发生在1935年5月27日、所谓“黑色的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扼杀了3项“新政”立法。在路易斯维尔合股土地银行控诉雷德福一案中，它废除了弗雷泽－莱姆基农场抵押法，理由是该法不经法律手续剥夺债权人财产。在威廉·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控诉美国一案中，判决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是国会的事，不是总统的事。最致命的是关于谢克特案的判决。前已提到，这个9名法官一致同意的判决，使全国工业复兴法无效。

罗斯福对此十分愤怒，他在5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最高法院在援引宪法州际商业条款作出此判决时，仍然狭隘地认为州际商业只指运输中的货物，这是根据制宪时期的情况来解释州际商业条款，完全不能解决“新政”时期州际商业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1936年，最高法院不理会总统的批评，继续扼杀“新政”立法。1月6日，在美国控诉巴特勒一案中，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宪。理由是：农产品的生产是地方活动，不是州际贸易，国会不

能运用征税权来管理农业。城市破产法，本是应全国各地一些濒于破产的城市的要求提出的，也被判违宪，理由是不适当地侵犯了州权。5月18日，最高法院又作出甚至更加明确重申谢克特判例的判决。在卡特控诉卡特煤炭公司一案中，认为煤炭开采不是州际贸易，国会不能运用征税权以管理其根据宪法不能控制的工业，因而判决格菲－斯奈德煤炭保护法违宪。6月1日，法院保守的多数派一致认为，各州无权管理工时与工资，并在莫尔黑德控诉纽约一案中，判决纽约州的妇女与儿童最低工资法无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证的订立合同的自由。

根据以上这些判决，“新政”派感到，最高法院很快就可能判决社会保障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违宪；他们只有冒被法院推翻之险，才能继续制订改革立法。更有甚者，低级联邦法院也在积极作出废除“新政”立法的判决，并阻止新法通过。1937年以前，它们颁布约1600道禁令，以遏阻联邦行政官员；还断断续续地使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一些重要“新政”机构瘫痪过。

这样，联邦最高法院便成为一道严重障碍，使罗斯福政府以“总资本家”身份，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和劳资间关系，以进一步克服经济危机的工作无法继续。正如自由派法官斯通日记中所说：“我们的最新成就是以一次不一致的表决判定，一个州无权规定妇女的最低工资，既然上个星期最高法院说全国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地方的事情，如今又说地方政府不能这样做，纵然这是地方的事情，我们看来已经把山姆大叔结结实实地捆起来了。”①

〔罗斯福的反击〕　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曾经引起广泛

① 转引自拉尔夫·德·贝茨：前引书，第146页。

的批判。罗斯福和他的政府成员，也一直在酝酿对付最高法院的方法。罗斯福开始赞成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但考虑到这种办法旷日持久，便放弃了。1936 年 11 月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罗斯福在 1937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年度咨文中严肃认真地批评最高法院，赢得国会雷鸣般掌声。他说："新政"谋求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复兴，而将是一种避免产生以往灾难的根源的复兴"，这种复兴"必须使我们沿着给予普通人生活以更大满足的方向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使我们的法律结构和我们的司法解释适应我们这个现代世界上最大进步民主国家的现实需要"。他认为美国当时并未做到这一步，而问题不在于美国宪法，却在于对宪法的解释；"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了，但问题并未解决，仍然存在"。所以，"人民要求司法部门尽它的职责，使民主政治取得成功。我们不要求法院给予我们不存在的权力，但我们有权期望我们已被承认的或在法律范围之内的权力，将成为我们争取公共福利的有效工具。""我们不能容许：由于否认自由政府的基本权力，使我们民主政治的程序受到损害。"①

怎样才能使最高法院按照当前政治经济形势解释宪法呢？这就要扩大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势力。

2 月 5 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一个司法改革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只要 1 个现任法官年届 70 岁以后 6 个月还不退休，总统就可任命 1 个新联邦法官；但增加法官数不能超过 50 人，进入最高法院的不能超过 6 个。罗斯福在所附咨文中说明了他要求扩大联邦法院的原因：由于人员不足和体弱之故，案件积压，审

① 以上引文，俱见罗斯福：1937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年度咨文，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 5 卷，第 634—642 页。

判工作拖拉；低级联邦法院颁发的成百上千禁令造成严重混乱；法院需要新鲜血液和现代观点。

罗斯福的这一法案，由于以下原因，一直没有提交国会投票。1936年选举大胜可能使罗斯福过于自信，以致一改以往那种办事谨慎、多方征求意见的作风，在提出法案之前，没有取得民主党领袖信任，内阁成员、甚至与国会联系的助手也不知道。这使他们感到突然，也感到总统不尊重他们。其次，总统其所以提出此法案，本是觉得最高法院太保守，但他却说是它的工作效率太低。这既不能使人信服，也很容易地被首席法官休斯致参议员伯顿·惠勒的一封信驳倒了。更重要的是，总统的言行，使许多仍想保持最高法院尊严的人感到担心。国会议员们接到纷至沓来的信件，对最高法院命运表示深切的忧虑。一向支持"新政"新闻界名人威廉·艾伦·怀特说："假定（完全不是不可能）有一位反动的总统，像罗斯福一样富于魅力、能言善辩而不可抗拒，具有改变法院权力，而他又决定用他很容易称之为紧急立法的立法来删削《人权法案》，那我们就得由这位魔王摆布了。"①

由于以上几种原因，这一法案很难取得进展。一个多月以后，最高法院态度的骤变又使这一法案的必要性日益减弱。3月29日，最高法院在西海岸旅馆诉帕里什一案中，支持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仅在1年前，罗伯茨法官和"四骑士"一起判决纽约的1项类似法律无效，现在他却和休斯及自由派一起支持这项立法。4月12日，罗伯茨再次和自由派一起，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控诉琼斯与劳克林钢铁公司一案中，支持瓦格纳法。这就事实上推翻了最高法院在谢克特等案中的判决。5月24日，

① 1937年3月23日怀特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信，见威廉·艾伦·怀特手稿，第187箧，藏国会图书馆。

最高法院又在3次判决中，批准了社会保障法，僵局打开了。6月1日，范迪范特法官在参议员博拉与惠勒的劝导下正式退休，总统可以任命1位新法官。这样，总统的司法改革法案似乎就没有必要了。但是，总统还是进行着徒劳的斗争。直到8月，他才接受副总统加纳的转圜，于是月26日签署加纳提出的司法程序改革法，以代替他的司法改革法。该法规定：当那些涉及联邦法律是否违宪的案件在地区法院初审时，授权司法部长参与；将控告政府的案件从地区法院直接转到最高法院，并严格限制联邦法官中止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利。

〔斗争的性质与结局〕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的斗争，主要是扩大与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斗争，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①。如我们在前两章所说，在大萧条年代，美国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时代要求和必然趋势。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扼杀"新政"立法的活动，像胡佛和罗斯福竞选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

1937年初最高法院态度的大转变，特别是欧文·罗伯茨的转变，虽然未说明原因，但历史学家们的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林克和卡顿说："在国会争论达到高潮时，如果最高法院的意见没有产生非常变化，罗斯福可能使他的法案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通过。"② 拉尔夫·德·贝茨说："罗伯茨必定清楚地知道人民授予罗斯福和罗斯福领导的极大权限。最高法院的法官不是生活在政治真空里。看来还有着颇为重要的证据说明，是首席法官休斯影响

---

① 参阅刘绪贻："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斗争的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70—179页。

②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中册，第79页。

罗伯茨改变观点的，休斯忧虑和担心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反动方向可能意味着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结构中的权力和影响会发生某种严重的削弱。"[①] 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彻底改变态度是迫于形势，是感觉到自己阻挡不住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洪流。

罗斯福后来自己说，这是一场"赢得了战争的一次失败的战斗"。仅从与法院斗争本身说，这是正确的。司法改革法案虽然夭折，但"新政"立法得救了。而且，在该法夭折后两年半之内，罗斯福任命了5位自己指定的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斯坦利·里德、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威廉·O·道格拉斯和弗兰克、墨菲。人们称新法院为"罗斯福法院"。它在解释宪法时的变化，既深刻而又迅速。它扫除一切关于先进的社会与经济立法是否合乎宪法的怀疑，成为社会问题的法理学的主要实行者；它给与州与联邦管理机构以比他们原来享有的更大的自由；并为保护公民自由、劳工与少数民族提供了强有力的新保证。"[②]

但是，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损害了罗斯福在民主党里和国会里的阵地。以往在"新政"高潮面前保持沉默的党内反对派，利用这场斗争团结起来，不少原来诚心支持"新政"的人物的同情心，也被这场斗争冲淡了。特别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过去害怕选民不答应，不敢公开反对罗斯福和"新政"，现在也利用选民害怕过于削弱法院的心理，来掩护他们不批准"新政"立法的活动，他们逐渐和他们声气相通的中西部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成联盟，成为国会的保守核心。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联盟和社会上

---

① 拉尔夫·德·贝茨：前引书，上卷，第151页。

② 林克与卡顿：前引书，中册，第105页。并请参阅罗伯特·库什曼编："最高法院十年：1937—1947"，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41卷（1947），第1142—1181页；第42卷（1948），第32—67页。

的保守派一起，是促使“新政”势头逐渐减弱的强大因素。

五、“新政”的势头逐渐减弱与退居守势

由于在大选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在第2次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他进一步改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说：“我们已开始使私人独断专行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屈从于大众的政府，”“我们摆脱萧条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那还不是你们和我们所指的事务的新秩序”，“我看到1/3的国民居室简陋，恶衣恶食”，因此，“我们下决心要使全体美国公民都成为国家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我们要使美国“作出示范，在民主政府之下，把国家财富转化为越来越多的人空前美好的生活条件，把最低生活水平也提高到远远超出仅仅餬口的程度。”①

罗斯福这里说的“新秩序”，当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但即使是这样的新秩序，在罗斯福忠诚地加以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或有可能，要不折不扣地实现，是十分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它就不可能“使私人独断专行的权力”完全“屈从于大众的政府。”

从前面论述我们知道，“新政”是在不断和极力维护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保守派作斗争中展开的。这些保守派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扑，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斗争，给了他们一个加强团结和活动的机会。除此之外，劳工运动的进展，特别是劳工静坐罢工的斗争方式，使原来支持工人运动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害怕起来，福利费和救济费的大幅度增加，使健全财政论者和廉价黑人劳动

---

① 以上引文，俱见罗斯福《第2次就职演说》，见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6卷，1941，第1—6页。

力的雇主们日益反感；后期“新政”的得益者主要是城市人民，使具有农村背景的人日益不满。所有这些，都壮大和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

保守派除在社会上活动外，在政府内，当他们看到最高法院这个最后壁垒逐渐崩溃时，他们就日益加强他们在国会内的地位和活动。所以从1937年起，“新政”立法势头日益减弱。1937—1938年经济衰退后期对“新政”虽有所促进，但1939年起，国际形势分散了罗斯福政府注意力。“新政”难于进展，只好退而巩固原有阵地。

〔1937年的“新政”立法〕　由于最高法院反“新政”立法的活动，罗斯福在1937年初提出新立法时是较谨慎的。1月6日年度咨文中，他只请求国会考虑公共住宅法，对佃农帮助和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为实行“新政”的需要，1月12日，他提出改组行政部门的计划；2月5日，提出司法改革计划。由于司法改革计划占去了他的主要精力，他就再没有提出新计划。3、4月间，最高法院态度改变后，他又于5月24日敦促国会制订新法以确定最低工资与最高工时，7月12日要求国会重新制定农业调整法，以代替1936年的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

由于保守联盟的反对，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两个法案均未通过。1937年7月31日，参议院虽然通过政府的工资与工时法或公平劳动标准法，但众院法规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保守派阻止了众院对它的投票。关于新农业调整法的建议，则未被国会置理。这样，1937年1至9月第75届国会的第1次会议除司法程序改革法和包括格菲—斯奈德法大部条款的格菲—文森烟煤法外，就只通过两个较重要法案，班克黑德—琼斯农场租佃法和瓦格纳—斯特高尔国有住宅法。

1937年2月，总统农场租佃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表明，

南部一半以上，北部近1/3与西部1/4的农民，是分成制农民或佃农，还有成千上万农业季节工人与被排挤出西南部并迁往加利福尼亚的棉农。为扭转这种变为佃农的趋势，报告建议将重新安置局改组为农场保障局，帮助佃农成为土地所有者，资助小农保存其土地，或撤出瘠地，并帮助农业季节工人。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农场租佃法，体现了这些建议。农场保障局从1937年到二次世界大战末，共建立了30个营地，每1营地可收容流动家庭12，000至15，000。它还帮助农民清除债务，组织医疗队和牙医队，主办佃农与小农合作租地与购买机械，并继续执行重新安置局开始的安置移民定居的计划。到1944年6月，它已借给87万家农民短期复业贷款8亿美元，从1937至1946年，借给41，000家农民购买农场贷款近2.6亿美元。40年为期，利息3%。

1937年9月1日批准的瓦格纳—斯特高尔国有住宅法，是各种政府机构数年计划与调查的结晶，反映出罗斯福政府全面解决住宅问题的思想，而不只是公共工程和复兴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此法，在内政部建立美国住宅管理局，资金100万美元，并有权借贷5亿美元，1940年共有资金16亿美元。该局通过在所有重要城市设立的国有住宅代理机构进行工作；它发放可高达全部住宅建筑成本的长期贷款，它确定建筑成本及建筑标准，它规定住户必须是收入属于最低的1/3的那一部分人。直到1941年以前，它完成建筑工程511项，住宅161，162套。这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却是给美国城市贫民提供适当住宅的长期运动的开端。

1937年后期，罗斯福又一次作出努力，于11月15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要求通过几项“必不可少的”立法，如新农业调整法、工资工时法、行政部门改组法等，但一无所成。

〔1937—1938年经济衰退与“新政”〕　第二次“新政”实

施后，美国经济显示出明白无误的恢复迹象。国民收入由1933年的425亿美元，上升到1935年的571亿美元。所有其他经济指数，都有增长。1936年至1937年初，增长速度加快。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就业指数由96.4增加到112.2，高于1929年的最高数；同一时期工资总额指数则从84增为109，工业生产指数从101增为117。按1952年美元计算，每人可以自由处理的收入，从1935年的906美元，增为1937年的1，048美元，较1929年高3美元。

与此同时，1935至1937年证券价格出现上涨高潮，这种涨风与20年代末期的不同，是建立在投资与生产的增长以及由于较高工资和较大公共开支而出现的较大购买力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联邦储备系统董事会认为又在酝酿一次失控的证券价格暴跌，罗斯福也害怕通货膨胀过度。1937年初，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必需准备金增加50%，各联邦储备银行自己也采取断然措施防止信用膨胀；罗斯福则大刀阔斧地缩小工程振兴局和公共工程局的开支，[①] 削减农业补助；政府的新预算规定将财政赤字从1936年的43亿减到27亿美元，并要求在1939年财政年度达到平衡预算。此外，第一次征收的社会保险金20亿美元，也加剧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

原来，健全财政论者预言，只要政府努力平衡预算，企业界就会恢复信心、增加投资。但是，政府的这种违反第二次“新政”以来赤字开支的紧缩政策，并未能促使企业界增加投资，却导致经济的迅猛衰退。从1937年8月起，“到12月，《纽约时报》的企业指数从110猛跌到85，将1935年以来取得的全部进展一扫而光。3个月内，钢的生产的设备利用率从80%下降到

① 1937年1至8月之间，工程振兴局的雇工从300万人减为150万。

19%，市场上抛售浪潮泛滥；1天之内，700多万股股票易手……；曼哈顿的夜总会停止营业；展销室里新汽车堆积起来；黄金外流。在（9月）劳动节和年底之间，200万人失去工作。"①

经济衰退引起政府内部对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论。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等仍主张采取紧缩政策以诱导企业界投资；以哈里霍普金斯、哈罗德·伊克斯、马里纳·埃克尔斯为首的一批自由主义"新政"人士主张大量增加政府开支；以利昂·亨德森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主张政府应拿出魄力来大力节制垄断资本，因为垄断资本操纵的高物价妨碍经济复苏。至于罗斯福，则如小摩根索所说，是在"等着瞧"。②

但是经济情况继续恶化，1938年头几个月，美国又增加400万失业者。美国人再次从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许多主要城市的救济金发放一空。芝加哥关闭了所有救济站，工程振兴局局长霍普金斯报告，南方17个州都有人挨饿。新闻工作者开始写起"罗斯福萧条"来。伯纳德·德沃托甚至声称："汤姆·科科伦的萧条，比赫伯特·胡佛的更糟得多。"③

1938年是中期选举年。经济衰退如果长期不扭转，显然对民主党不利。到3、4月之交，罗斯福已接受霍普金斯等人意见，并于4月14日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宣布放弃信用限制，要求断然恢复赤字开支。对经济恶化趋势感到惊慌的国会，迅速作出决定，拨款约30亿美元扩大工程振兴局的工程规模，并增加其他各"新政"机构的活动。这些措施见效迅速。到"1938年7、8月间，制造业生产、工资与就业指数开始上升。到1939年底，

---

①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243—244页，第249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243—244页，第249页。

③ 1938年6月15日德沃托给加勒特·马丁利的信，见德沃托手稿，第2筷，藏斯坦福大学。

几乎恢复到接近繁荣的1937年的水平。”[①]

新农业调整法与工资工时法等在1938这个选举年通过，也与1937、1938年经济衰退有关。前面提到，1937年7月和11月罗斯福曾两次要求国会通过新的农业调整法，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38年2月中，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的趋势大有使农业区域选民背离民主党危险，国会民主党人才开始团结起来，通过新的农业调整法。此法对棉花、小麦、玉米、烟叶、大米等5种主要作物的生产者规定生产定额，并对那些耕种定额土地而又遵守土壤保持方法的人，给予津贴。为了防止生产人量过剩时价格猛跌，政府还给予贷款，以便农民将准备出售的农产品暂时贮存起来，等待价格上升。这就是农业部长华莱士所说的“常平仓”计划。假如2/3的农民投票赞成，就可以确定销售定额，违者罚款。此外，该法还规定进行农产品运费率和新用途的研究，并购买剩余农产品作为救济之用。

虽然直到美国参战才真正解决美国农产品过剩问题，但此法给1938至1941年的美国农业带来稳定，并在1940年帮助农民恢复到1937年近于繁荣的水平。农业现金收入，1937年是91.76亿美元，1938年是81.3亿美元，1939年是86.58亿美元。1940年则回升到91.2亿美元。

早在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就在致国会咨文中指出：“一个自立更生和自我尊重的民主国家，没有理由容许童工存在，也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削减工人工资和延长工人工时。”[②] 但由于南部民主党人、农场主、劳联的反对，罗斯福的工资工时法长期不能通过。选举年工资继续普遍下降，迫使政府千方百计促使工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中册，第88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6卷，第210—211页。

资工时法或公平劳动标准法于1938年6月中旬通过。该法规定：最低工资为1小时25美分，立即生效，并逐渐增为40美分；工时每周为44小时，3年内减为每周40小时；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任何全部或部分由16岁以下儿童制造的货物；在劳工部建立工资工时处，以监督此法实施。虽然此法最后文本因对南部与劳联作出让步使许多工人未能受益，但它却取缔了可怕的血汗工厂，并基本上结束了对童工的剥削。到1934年4月，有近1,300万人得到工资工时处保护；而且，当1939年10月最低工资由25美分增为30美分时，主要是南部的70万工人立即增加了工资。

1938年春、夏，在那些认为垄断资本家应对经济衰退负主要责任的一批“新政”派人士活动下，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发起了一场规模很大，收获不多的反托拉斯运动。耶鲁大学法学院瑟曼·阿诺德教授被任命为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由于得到大量新拨款和增加许多工作人员，他在短时期内发动215次调查，并进行92次反托拉斯起诉，但收效甚微。[①] 总统还于4月29日致国会特别咨文，要求彻底调查研究经济力量集中情况及其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影响。6月16日，国会建立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从1938年12月1日到1940年4月26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41年3月31日提出一份最后报告，但当报告最后发表时，政府更关心的是备战，而不是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

〔“新政”退居守势〕　到1939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对“新政”发展十分不利。1937年末，霍普金斯曾召集一次自由主义者会议，参加的有伊克斯、科科伦以及总统儿子詹姆斯·罗斯

① 参阅科温·爱德华兹：“瑟曼·阿诺德与反托拉斯法”，载《政治学季刊》，第58卷（1943），第333—335页。

福等，探讨清除民主党内保守派可能性。1938年1月，热心“新政”派、众议员利斯特·希尔在亚拉巴马州民主党参议员预选中大胜保守派汤姆·赫夫林；5月3日，罗斯福坚决支持者、克劳德·W·佩珀又在佛罗里达州取得决定性胜利，击败反“新政”的詹姆斯·威尔科克斯。这就使霍普金斯等人受到鼓舞。在他们力促下，6月24日，总统宣布亲自参与民主党初选，并在以后两月中真正投入斗争。但是，反对派诬蔑他的这种做法类似于独裁者的清除异己，结果十分糟糕。除少数成就外，他反对佐治亚、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的3位反对“新政”最力的国会参议员沃尔特·乔治、米勒德·泰丁斯和科顿·史密斯的活动，都失败了，这更增加了民主党的裂痕。

1938年的中期选举，使罗斯福和“新政”派又受到一次打击。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81席，在参院获得8席，并夺得13个州长席位。虽然共和党的这种复兴并没有成为国会的多数派，但1937年以来他们和民主党保守派的联盟，却得到进一步壮大，具有阻止罗斯福在1939年再提出新的改革立法的力量。

除国内政治上的倒退外，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对“新政”不利。1938年9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取得胜利。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的武汉和广州；1939年3月，希特勒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后又占领中国南沙群岛，积极准备南进。这种情况，使罗斯福感到有执行更强有力外交、并对未来一切世界范围的冲突进行准备的必要。但是，除非罗斯福在国会取得多数人的支持，要扭转体现在1935、1937年中立法中的严格不干涉政策，是不可能的，而民主党人在外交政策上却意见分歧。1937和1938年之交国会对两个法案的表决，就明显体现出这种分歧的苗头。1937年12月的勒德洛宪法修正案，是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的，它要求：除非

美国或其领土受到侵略，作出战争决定时，必须在全国公民投票中得到多数人赞成。1938 年 1 月 10 日，在总统强烈要求下，众议院以 209 票对 188 票否决了它。但是，总统已从对待这个法案的态度上看出了力量重新组合的意义：3/4 的共和党人和中西部及西部多数民主党人支持这个法案，而占压倒多数的南部和东部民主党人则投票反对。与此同时，反私刑法案的斗争在参议院也达到顶点。南部参议员用冗长发言阻止了对这一法案进行表决。

1938 年选举后，这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更加明显。“中西部和西部民主党人，热烈支持第二次‘新政’的国内政策。但是他们像他们地区的共和党人一样，坚决回避可能会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东部的民主党人一般支持进步立法，而且，除爱尔兰裔美国人地区代表外，是愿意支持强硬外交政策的。南部民主党人是最喧嚣的主张加强防御并与英、法合作的斗士。但是，他们日益深深害怕政府的先进改革措施，将冲击他们地区的种族关系。”[①] 面对这种形势，罗斯福为取得国会对于较强硬外交政策的支持，就不得不置中西部和西部民主党人的反对于不顾，而试图建立一新的南部民主党人与关心国际事务的东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这对于发展“新政”来说，自然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1939 年 1 月 4 日，罗斯福在致 76 届国会年度咨文中说：“在我们发起社会改革计划的过程中，现在已越过了内部冲突的阶段。”[②] 实际上，除要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外，罗斯福对这届国会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这个国会也只在 4 月 3 日通过 1938 年未获通过的联邦行政部门改组法。6、7 月间，众参两院

---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中册，第 89 页。

②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 8 卷，第 7 页。

同意对社会保障法作些改进。根据改组法，罗斯福于9月8日发布第8248号行政命令，建立总统行政办公厅，下辖白宫办公室、预算局（从财政部移来）和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并设6个行政助理。根据新规定，享受社会保障法保护的人数大大增加；领取救济金的人如果死亡，其遗属可领取津贴；发给老年人的月生活费有所提高；第一次发生活津贴日期，从1942年1月提前到1940年1月；联邦政府向各州增加拨款，用于失业补助、母婴保护和帮助不能独立生活的儿童。

由于以上情况，历史学家们往往说，到1938或1939年，“新政”就结束了，消失了。这种说法不太恰当。因为1939年罗斯福只是没有再提出“新政”立法。但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原已通过的“新政”立法和措施，他和“新政”派是有计划地加以维护的。1939年1月4日致国会年度咨文中，在提到“新政”改革“已越过内部冲突阶段”后，紧接着就说：“为了维护我们的改革，现在我们的全部精力可以用来加紧复兴过程。”[①] 当时支持‘新政’的民主党领袖詹姆斯·法利认为，罗斯福最聪明的办法是：“收拾残局，巩固和改进已取得成果，不再发动新的改革。”[②] 罗斯福的确是这样做的。洛克滕堡写道：罗斯福“在1939年杰克逊纪念日发表了1篇战斗性演说；他任命了一批自由派官员——哈里·霍普金斯为商务部长，弗兰克·默菲为司法部长，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威廉·道格拉斯为最高法院法官。……当那些反对‘新政’的顽固派试图修订瓦格纳法时，他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如果说罗斯福不能使国会通过重要立法……那些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前引书，第8卷，第7页。

② 理查德·波伦堡：“1937—1939年‘新政’的衰落”，约翰·布雷曼等编：《联邦新政》，第260页。

保守派也不能完全摧毁已经取得的成就。"[1] 由于罗斯福和"新政"派有计划地进行维护，所以在 1939 年国会攻势面前，罗斯福只勉强放弃了一再受到削弱的未分配利润税，[2] 联邦戏剧计划，和几个群众支持不足的"新政"机构；其余所有主要"新政"立法和机构都保存了下来。所以实际情况是：1939 年"新政"只是退居守势，并未消失。

①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 274 页。

② 这是 1938 年税收法中规定的。罗斯福未签署此法，只是默认。

第四章

“新政”综论

在以上两章里，我们扼要地叙述了两次“新政”的起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和一些具体成果，但对于涉及整个“新政”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进行阐述，或者阐述得不够全面，也不够鲜明。比如，“新政”是如何影响美国两个主要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对美国的劳工运动起了何种重大作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国家职能方面，“新政”是否有所创新？“新政”对于美国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黑人问题的作用如何？“新政”大规模地、全面地推进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止一种、它推进的是哪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政”取得的根本成就如何？它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怎样？人们对“新政”和罗斯福总统有哪些评价？正确的评价是什么？“新政”的理论基础又是怎样的？上述这些问题，对认识“新政”的实质具有关键意义，但我们在上两章里或者未涉及，或者语焉不详。在这一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将阐述这些重大问题。

一、“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

艾伯特·布卢姆指出，“新政”以前，资方对劳工的态度，“一般说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严厉镇压工会运动；二是自己尝试改善工人处境。许多公司两种方式兼用，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改善工人处境的原因之一，是增加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以便对付工会。个别公司或同业公会则通过庞大公共关系计划，运用工人间谍、黑名单、‘黄狗契约’（工人与雇主订立的为取得与保持工作宣誓不参加工会的契约）、破坏罢工者、工贼以及……催泪弹与军火武器以对付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等办法，严厉打击劳工组织。对许多董事、总经理来说，工人是像机器一样的商品，他们对待工人也就像对待商品一样。”①

对于这样的劳资关系，当时的政府由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一般说是不管的；如果管，也是站在资方一边。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低潮期。据欧文·伯恩斯坦研究，1920 至 1933 年期间，“是工会走向衰落和集体谈判几无影响的时代。”②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劳工运动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③ 当时一位主要劳工运动学者乔治·巴尼特甚至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美国工会将使自己革命化……到一种程度，从而在未

---

① 艾伯特·布卢姆：《美国劳工运动史》，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1972，第 13 页。

② 伯恩斯坦：《困乏的年代：1920—1933 年美国工人史》，序，第 vii 页。

③ 艾伯特·布卢姆：前引书，第 21 页。

来的10年中，变为比过去10年更有影响的社会势力。”①

工会虽然软弱，但广大工人群众活不下去总是要起来反抗的。如戴维·米尔顿所说，“在1930、1931、1932年间，当现存工会运动处于最低潮而工会会员剧减时，失业、工资削减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得陷于职业结构底层的千千万万工人激进起来”②，站在最前线的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失业工人组织。这种情况，我们在第1章第5节中已有所阐述。不过，美国劳资关系真正有所改变，劳工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的时期。

〔为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而斗争〕　宣称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罗斯福政府，尽管像胡佛政府一样，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但它对劳资关系与劳工运动的态度，是与胡佛政府不同的。比如，胡佛政府一直暗中反对并公开冷落反禁令法③，罗斯福却早在1930年任纽约州长时，就于是年4月9日带头批准了纽约州的反禁令法。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

---

① 转引自罗伯特·齐格尔：《1900—1985年美国工人与工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第26页。

② 见所著《从大萧条到“新政”期间美国的劳工政治》，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2，第27页。

③ “新政”以前，除铁路业外，美国基本上没有规定劳资关系、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成文法。1842年，根据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例，虽然承认工会合法，但工会追求的目标及其所用手段是否“合理”、“合乎道德”，则要由法院决定。一般说，法院承认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活动是合法的，但却反对工会用于获取这些目标的手段。19世纪80年代以来，法官们用以反对这种手段的方法，就是发布禁令，即发布禁止工人采取或威胁要采取某种行动（如罢工等）的法院命令。其结果，“新政”以前，在劳资纠纷中，禁令简直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无案不用的反对劳工运动的武器，对劳工运动具有极大抑制作用。因此，要加强劳工运动，就必须反对禁令。经过美国劳工联合会，进步派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人及一些法学界人士数年积极斗争，1932年3月上旬，美国国会通过了诺里斯—拉瓜迪亚反禁令法。

后，他的政府实行的“新政”，更是改变了“新政”前旧的劳资关系，促进了美国的劳工运动。这是从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制订与实施开始的。此法是美国联邦政府制订的第一个适用于各行各业的、认可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的立法，它还要求资方保证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与改善劳动条件。根据此法，资方不能干涉工人组织工会和行使集体谈判权，也不能以加入公司工会作为雇佣条件。这就使“新政”前资方那种运用各种手段遏制工会运动的行为，违反联邦法律。

全国工业复兴法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如齐格尔所说，“尽管国家复兴管理局无疑是倾向企业界的，但它的建立给千千万万工人带来希望；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答应给予工人的保护，也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①]

借助全国工业复兴法积极进行工会组织活动的，首推以约翰·刘易斯任主席的美国矿工联合会。刘易斯曾参与制订工业复兴法的劳工条款，并相信该条款“能够提供动力以促进他的工

① 罗伯特·齐格尔：前引书，第29页。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对美国劳工与工会的严重影响，已开始使劳联逐渐认识到它的不依靠政府的自主政策的局限性。劳联所属工会和少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中的激进工会工作者一直在要求政府帮助无业者和贫民。就是劳联主要领袖，也开始提出同样要求。1931年，印刷工人工会乔治·贝里声称：“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组。”同年劳联大会上，传统主义者与改革者就是否需要联邦政府对失业采取行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32年，劳联公开赞成联邦政府提供失业补偿金，这是与劳联实行半世纪的自主政策的明显决裂。1932年选举后，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声称：“我们一直在不可抗拒地被迫采取新立场……并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秩序。”两月以后，他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如果国会不为劳动人民制订法律，劳工运动将号召“总罢工”。当一位参议员抗议他是威胁要进行阶级战斗时，他说：阶级战斗吗？是的，“那是许多雇主惟一理解过的语言——力量的语言”。

会、而且也许是整个劳工运动的复兴。”[①] 他派出组织人员到全国各矿区宣传，并将罗斯福总统声望和他们发展会员活动联系起来，说是“总统要求你们参加工会。”他们取得很大成功，有时矿工们自动组织起来。其次是受美国共产党影响的纺织工人联合会、国际女装工人工会和混合成衣工人工会。它们发展会员的活动也遍及全业。因此，在全国工业复兴法实施的两年中，这些工会会员增加最快。另外，还有橡胶工人、电气工人、西部铜矿工人、石油工人、天然气工人、记者、旅馆和饭店服务员以及其他各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也都纷纷加入工会。全国所有工会（包括独立于劳联的工会）的会员数，由 1933 年的2,973,000 人，增为 1934 年的3,608,600 人，1935 年的3,888,600 人（估计数）。

劳工条款的实施虽然增加了工会会员的数量，但比起当时美国3，000 至4，000 万工人的总数来，比例很小；而且会员增加并不保证工会得到资方承认、可以自选代表与资方举行集体谈判。资方有计划地拒不承认工会，而且往往运用残暴狡猾的手段

---

① 罗伯特·齐格尔：前引书，第 29 页。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对美国劳工与工会的严重影响，已开始使劳联逐渐认识到它的不依靠政府的自主政策的局限性。劳联所属工会和少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中的激进工会工作者一直在要求政府帮助无业者和贫民。就是劳联主要领袖，也开始提出同样要求。1931 年，印刷工人工会乔治·贝里声称：“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组。”同年劳联大会上，传统主义者与改革者就是否需要联邦政府对失业采取行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32 年，劳联公开赞成联邦政府提供失业补偿金，这是与劳联实行半世纪的自主政策的明显决裂。1932 年选举后，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声称：“我们一直在不可抗拒地被迫采取新立场……并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秩序。”两个月以后，他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如果国会不为劳动人民制订法律，劳工运动将号召“总罢工”。当一位参议员抗议他是威胁要进行阶级战斗时，他说：阶级战斗吗？是的，“那是许多雇主惟一理解过的语言——力量的语言”。

和组织公司工会[1] 等办法，以防止工人成立独立自主的工会。如朗达·莱文所说："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授与劳工组织工会权利的劳工条款，极少得到联邦政府或个体资本家的贯彻执行。该法中通过制订工业法规以管理工资工时的其他条款，也是一样。"[2]这样，工人们为了获取劳工条款授予他们的权利，只好采取罢工方式。为此，美国共产党1933年7月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向全党"着重指出有必要集中力量在基本工业中建设党的组织和工会，以及用全力来支持日益增长的群众性罢工运动。"[3]全国工业复兴法签署以后的6个月中，共发生罢工1，695次，参加工人数达1，117，000。这年上半年的任何一月，损失工作日均未超过603，000，但7月间增至1，375，000工作日，8月间增至2，378，000工作日。

1933年下半年的罢工中，有些取得了成功。比如，1933年8月费城1万纺织工人因要求承认工会展开的罢工，很快得到刚成立的全国劳工委员会的仲裁，于8月10日达成协议，即所谓"雷丁公式"（Reading Formula）：工人停止罢工，全国劳工委员会支持工人秘密投票选举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资方同意了。又比如，1933年8、9月间，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罢工以及威胁要举行的总罢工，罗斯福总统在该州州长的劝告下，不顾矿主的反对，于9月21日强加给烟煤业一个公平竞争法规，授与美国矿工联合会自1890年成立以来一直为之奋斗但迄未获

---

① 据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调查，在3，314个制造业和矿业公司（雇工总数为2，585，740）中，653个（雇工总数为1，163，575）有公司工会；而承认工会的公司，则只有416个（雇工总数为240，394）。另据劳工统计局调查，公司工会会员数从1，263，000增为1935年的2，500，000。转引自朗达·F·莱文，前引书，第112页。

② 朗达·莱文：前引书，第112页。

③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18页。

得的合同，而且这个合同还适用于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东肯塔基、田纳西、印第安那以及伊利诺伊州的所有主要烟煤产区。10月末，由于罗斯福的干预，钢铁业也不得不停止抗拒，承认了该业附属各烟煤矿场的工会。

但是，罢工并不能总是取得成功。1933年10月，有些公司就拒绝出席全国劳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11月1日，全国制造商协会对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资方选择当时全国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出来和日益加强的罢工浪潮对抗。到1934年3月，通用汽车公司头头威廉·努森虽然面临罢工威胁，但拒不承认任何工人组织，也不承认全国劳工委员会有权在该公司任何工厂指导工人选举代表与公司举行集体谈判。劳联领袖宣称将于3月21日举行罢工。罗斯福总统这一次在强大公司压力面前，作出了有利于资方的决定，竟称："政府并不支持某一特定工会或特定形式的雇工组织或代表人"。这样，全国工业复兴法劳工条款规定的工人通过自选工会与资方进行谈判的权利，就被否决了。

这一否决表明：工人不能完全依赖法律与政府使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要取得组织工会并与资方举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就得显出自己的力量。如伯恩斯坦所说，罗斯福这次对汽车业劳资纠纷的决定，是"1934年春、夏把全美国卷入旋涡的巨大罢工浪潮的主要原因。"①

1934年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有决定意义年份之一，共发生罢工1，856次，参加罢工的约有150万工人，大多数罢工原因是要求资方承认工会。在这些次罢工中，有4次特别重要，体

① 欧文·伯恩斯坦：《汹涌澎湃的年代：1933—1934年美国工人史》，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1，第185页。

现了美国共产党的影响。[①] 有3次是左派领导的；它们针对的是强有力的顽固反对工会的公司势力。首先是俄亥俄州托莱多的汽车零件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2月底劳联所属的一个新成立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分会要求电动车灯公司增加工资并承认其组织开始的。在美共、美国工人党及其所属失业工人组织和兄弟工会的大力支援下，于5月间达到高潮。罢工者置法院禁令于不顾，并抵抗州政府及公司武装镇压达数周之久。最后，在总罢工的威胁下，电动车灯公司于6月4日接受了工会增加工资要求，并承认了该工会。"这是按照〔公平竞争〕法规订立的第一个没有公司工会代表参加的合同。整个汽车工业工会化的历程开始了。"[②]

其次是旧金山码头工人罢工。1919年以来，由雇主组成的旧金山工业协会几乎完全控制了旧金山的劳资关系，工会运动基本停止。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封闭工厂城市变成了开放工厂城市。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后，那里的海岸码头工人又组成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旧金山分会。1934年5月9日，由于它得不到雇主承认，所提要求得不到满足，发起罢工。到5月下旬，劳联的10多个未得雇主承认的工会参加了进来，整个西海岸航运完全停顿。尽管劳联保守领袖破坏，州、市政府应雇主请求实行镇压，但在共产党支持下，7月14日，115个工会代表决定实行总罢工，到16日，参加罢工的有160个工会的127，000工人，整个旧金山港湾区不能动弹了。这时，在攻击和镇压美共的红色恐怖中，保守的劳联工会攫取了领导权，总罢工坚持4日后停止了。从7月21日起，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旧金山分会及各海员

---

① 美国共产党原来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但从1934年年中起看到该法鼓舞工人组织工会的作用，便逐渐放弃双重工会政策，并于1935年8月解散其所属工会统一同盟，鼓励党员和党控制的工会到劳联中去发挥作用。

② 阿尔特·普赖斯：《劳工的巨大步骤》，纽约：伯恩芬德，1972，第23页。

工会陆续接受仲裁。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虽未取得全部要求，但组织得到承认，所有罢工者重新被雇佣，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还接近于恢复了封闭工厂。应该说，这次罢工对全美国劳工运动起了鼓舞的作用。

再次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该城是明尼苏达州的著名开放工厂城市，基本上控制在雇主组成的公民联盟手中。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各种卑鄙残酷的手段阻止工人成立工会。但是，1933年下半年，在劳工条款的鼓舞下，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卡车司机工会，其中第574分会在激进分子领导下，为取得雇主承认及劳工条款规定其他权利，于1934年5月15日领导5，000工人罢工，经过与公民联盟近4个月的流血斗争，各卡车运输公司才于8月21日在联邦调停下被迫承认卡车司机及公司内勤人员有权组织工会，并由自选工会代表与雇主举行集体谈判。莱文说："如果没有左派的领导才能，卡车司机能否敌过公民联盟巨大的人力物力，是令人怀疑的。"①

最后是东海岸纺织工人罢工。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以前，纺织工人中工会力量微弱。全国纺织工人工会几不起作用，劳联的纺织工人联合会很保守，在纺织业公平竞争法规制订前只有15，000至20，000会员，而该业雇员总数则为40至45万。全国工业复兴法和纺织工业公平竞争法公布后，到1934年5月，纺织工人联合会仅在棉纺织业中就有30万会员。8月14日，该联合会决定于9月1日举行全行业总罢工，主要目标是要求资方承认工会。9月4日，参加罢工人数已达376，000。但是，由于该联合会拒绝左派政治团体帮助，不能形成全市或全州罢工，资方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进行镇压，力量大都超过各地纺织工人联合

① 莱文：前引书，第123页。

会分会，联邦政府派出调解人员往往偏向力量较强的资方一边。结果，这次规模最大的罢工反而失败了。

1935年，罢工浪潮仍然继续，共发生罢工2，014次，参加工人达1，170，000。罢工原因也大都是要求承认工会。

与罢工浪潮澎湃的同时，瓦格纳参议员和他的助手认识到全国工业复兴法中关于劳资关系的条款不够明确而有力，又没有强有力的机构保证其实施，因而不能保证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而没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与资方抗衡，就无法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这既不公平，也不能提高广大工人群众购买力，促进复兴。因此，他们应工会要求，从1934年起便着手草拟一个代替劳工条款的立法。这就是1935年7月初的全国劳工关系法。如第3章第3节所说，该法对劳工权利具有更明确而有力的规定，还规定成立较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新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以代替1934年成立的那个软弱无力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因此，劳资关系有所改变，劳工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在支持该法的舆论大大加强的情况下，工会会员数从1933年的300万[①]，增加到1936年的470万……"[②]

〔为建立产业工会和争取基础工业的工会化而斗争〕　全国劳工关系法通过后，争取承认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的斗争并未结束。有的资方仍然大胆地抵制劳方组织工会的权利。不过，这时劳方争取组织的工会，不是劳联所属的那种行业工会，而是将一个企业的所有工人都组织在一起的产业工会[③]；工人要求与之

---

① 此就整数而言，实际为297.3万。

② 卡蒂·洛凯姆编：《"新政"的形成：知情者言》，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第206页。

③ 美国工人争取组织产业工会的运动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大都被镇压下去了。见米尔顿：前引书，第17—21页。

进行集体谈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一般企业，而是一贯反对工会的、大规模生产的基础工业（如钢铁、汽车、橡胶等）中的强大企业。

大萧条以来，受害最深、最需要加入工会以争取和保护自身权利的，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1933年全国工业复兴法实施后，奋起组织或加入工会的，大都是这些工人。这些工人组织的工会，当然是产业工会。由于劳联是当时全美最大的工会，这些新组织的工会一般都希望加入劳联。这些工人加入的也大都是劳联的工会。他们的加入也将逐渐改变其工会的行业工会性质，而变为产业工会。但是，包括主席威廉·格林在内的大多数劳联领导人是保守派，他们害怕这类工人大量拥入劳联会动摇他们的领导地位，所以力图维持劳联的行业工会性质，对产业工会极不热心；① 对1934年及1935年早期的罢工浪潮，不愿支持，而且往往加以破坏，还积极反对大力支持工人罢工与组织产业工会的左派组织，特别是美国共产党。不过，也有少数劳联领导人，比如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斯、混合成衣工人工会主席西德尼·希尔曼和国际女装工人工会头头戴维·杜宾斯基等，他们认识到，要和联合起来的强大资方势力抗衡，就必需广泛吸收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基础工业中的工人组成强大产业工会，刘易斯还认识到要接受具有组织这些工人的巨大热忱与经验的共产党人的帮助。1934年10月，由于刘易斯等人的强烈要求，劳联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号召在钢铁、汽车、橡胶、水泥等大规模生产的基础工业中，组织行业或产业工会。但是，劳联执行委员会

---

① 当1933年组织新工会的活动开始时，劳联领导人试图将新会员按行业分类，然后把他们分到各行业工会去。这一办法没有成功，于是把他们组织到各式各样的称为联合工会的直属分会之中，并予以歧视。到1934年10月劳联大会时，这样的直属分会约有2，000个。

对此决议或者敷衍应付，或者拒不执行。于是，在1935年10月劳联代表大会上，刘易斯明确而坚决地提议在基础工业中组织产业工会。在被大会否决后，刘易斯和8个工会领导人于11月10日在大西洋城集会，组成以刘易斯为首的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制订出在基础工业中发展产业工会的计划。刘易斯并于23日辞去劳联副主席职务。

1936年1月，劳联主席和执行委员会进行反击，命令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解散。刘易斯置之不理，同时还按计划大力开展组织产业工会的活动。是月，他前往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向那里群情激愤的橡胶工人①发表演说。他系统揭露橡胶公司的剥削行为，指出劳资关系是敌对关系，鼓励工人们组织起来和资方斗争。

10天以后，该城3大橡胶公司之一的费尔斯通公司工人发动了一种新的、在建立产业工会中立过大功的斗争方式——静坐罢工②，迫使资方让一名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复职，并吸引400脱离劳联的工人重新加入工会。2月17日，该城最大轮胎橡胶公司——古德伊尔——的数千工人，为抗议资方开除137名工人，在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第二天即发展到1万人，这1万人也重新加入了工会。他们得到阿克伦人民群众的支持，置法院禁令于不顾，坚持罢工达1月之久，古德伊尔公司最后只好承认橡胶工人联合会，召回被开除工人，承认工人工龄，并将每周劳动时间减为36小时。该公司虽仍保留公司工会，但该工会的许多会员却自动脱离转而加入橡胶工人联

---

① 这些工人在1935年一整年中，依靠劳联谈判与政府仲裁，始终未能使他们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组织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要求得到满足。

② 即工人在机器旁坐下来，占领工厂，自己不生产；并在厂外设纠察线，不准资方派人来代替他们生产。

合会。从这次罢工起，到1936年年底止，该城橡胶工人至少举行过180次静坐罢工，而且几乎每一次工会都有所获益，并增加了会员。莱文评论说，"橡胶业中工人们的胜利，表明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产业工会组织，是能够在与大规模垄断工业资本的重大战斗中，赢得胜利的。橡胶业中的胜利，激起了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所属工会的巨大攻势。"[①]

这种攻势首先是对准汽车业和钢铁业的。前面我们提到，在1934年罢工浪潮中，因劳联领导不力，罗斯福政府偏袒资方，汽车工人罢工毫无所得。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成立后，派阿道夫·杰默前往底特律去协助组织汽车工人。1936年4月17日，在劳联汽车工人联合会主持下召开的各派代表大会上，美共领导的进步工会工作者集团使自己的候选人控制了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由于担心这第一个汽车业的产业工会受到更多攻击，共产党人温德姆·莫蒂默将主席一职让与前浸礼会牧师霍默·马丁，自己任第一副主席。7月2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加入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有会员4万人，为全汽车业的工会化奠定了基础。是年夏、秋两季，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各厂工人中组织产业工会的活动，深入而且成功。1936年12月，马丁在基层组织的压力下，邀请通用汽车公司负责人举行谈判。当公司发言人拒绝时，设在克利夫兰的费希尔车身工厂工人于12月28日在他们的机器旁坐下来了。几天之内，静坐罢工扩展到通用汽车公司所有重要工厂，其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巨大，都是空前的。1937年1月11日，当警察试图阻止将食物送给设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第一费希尔车身工厂藐视法院禁令的罢工者时，发生了一场激战。罢工者虽有伤亡，但把警察赶走了，重新打通了送食物

---

① 朗达·莱文：前引书，第141页。

路线，并继续占据着工厂。

通用汽车公司吁请密歇根新任州长弗兰克·墨菲使用国民警卫队把静坐罢工者赶出工厂。但是，墨菲是靠汽车工人之助当选的民主党人，不愿使用武力，只试图调解。由于调解未成，巡回法院法官保罗·V·加多拉应公司请求，于1月30日颁布法院禁令，罢工者仍置之不理，加多拉法官命令县行政司法长官拘捕他们。县行政司法长官不听，并向墨菲州长呼吁。在数日紧张谈判之后，通用汽车公司于1937年2月11日屈服。除只雇佣汽车工人联合会会员这一条外，其余全部要求得到满足：取消了加多拉法官禁令；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为工人惟一谈判代理人，并得以与公司举行集体谈判以取得关于工资与工时等的协议。

在取得对通用汽车公司胜利后，工会领袖们把矛头转向较小的克莱斯勒公司。1937年3月8日，在8个克莱斯勒工厂进行静坐罢工，并大规模设置纠察线。经墨菲州长大力调停，结果签订总的来说有利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协定，公司于4月6日同意通用汽车公司最近同意的那些条件。

1937年，除福特汽车公司外，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其他较小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内组织工会的活动，都是成功的。到1937年9月，汽车工人联合会已有会员30多万人。福特汽车公司直到1940年才屈服。

莱文说，"通用汽车公司的静坐罢工导致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在汽车业以外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钢铁业中。"[①] 1933至1934年，钢铁业为遏制工人组织工会，将90%的雇工组织在公司工会之中。但是，从1934年罢工高潮起，基层钢铁工人就在左翼活动分子的领导下，自己起来组织产业工会，但未能得到资

---

① 莱文：前引书，第143页。

方承认。1936年6月，刘易斯派他矿工联合会的副手菲利普·默里到钢铁工人中去，组成大体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到11月，各地钢铁工人纷纷脱离公司工会，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已有会员82，315人。过去，钢铁公司总是依靠各州政府的军事帮助和联邦政府的道义支持，来阻止这种趋势。现在，联邦政府支持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甚至作出诺言：如果发生罢工，州政府将予以救济。此外美国参议院的拉福莱特公民自由委员会从6月起，已开始调查各公司侵犯公民自由和不适当干预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的严重情况，引起公愤。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们权衡利弊，为避免一次时间长代价大的罢工，宁可屈服。12月开始，公司董事长迈伦·泰勒和约翰·刘易斯进行一系列会谈，达成协议：公司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结果，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子公司——董事长本杰明·费尔利斯于1937年3月2日签订了也许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合同，因为这个合同标志着：自1901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在基础工业中阻止组织工会运动的公司的屈服。不久，所有美国钢铁公司的子公司，都签订了类似合同。它们都同意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增加工资10%，每周工时减为40小时，加班时工资加一半。

最大的美国钢铁公司屈服后，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原以为其他各钢铁公司也会屈服的。但是，组成小钢集团的伯利恒钢铁公司、共和钢铁公司、扬斯敦钢板钢管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内陆钢铁公司等拒不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5、6月间，工人举行罢工。除内陆公司外，其余各公司、尤其是共和钢铁公司，全力进行反击。到7月间，共造成18个工人死亡，160人受伤，数百人被捕。死亡的18个工人中，有10人是在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公司工厂外面被警察射杀的。

由于当时舆论既谴责小钢集团这种暴行，也对静坐罢工迅猛发展表示担心，[①] 罗斯福政府对这次罢工未予支持，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没有获得小钢集团承认。到 1938 年春、夏，参议院拉福莱特公民自由委员会对这次罢工的各方面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指出钢铁公司、地方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多次违反瓦格纳法，侵犯罢工者的公民权利。于是，在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请求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采取了行动，并于 1941 年迫使小钢集团各公司承认工会，和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真诚地谈判。到是年底，有会员 60 万人的钢铁工人工会在整个钢铁业取得了胜利。

当 1937 年 3 月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在汽车和钢铁业同时取得胜利时，它已有会员 180 万。这时，劳联把它所属 10 个工会开除了。同年 10 月，刘易斯和劳联和平谈判，但未能达成使他满意的协定。于是，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宣布脱离劳联独立，并改组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

除上述成就外，到 1941 年，产联工会还在大多数其他基础工业中取得代表工人谈判的权利。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得到电业界承认，纺织工人联合会在北部的纺织厂中组织了工会，哈里·布里奇斯把太平洋沿岸码头工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产联工会。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产联约有 500 万会员。而且由于它的斗争，劳联会员也增至 460 万，另一些独立工会，共有会员 100 万。全体工会会员数达 1，060 万，占所有非农业工人的 28.2%，而在 1933 年时，这个比例为 11.5%。这样，在“新政”期间，美国劳工运动不独使工会会员数增加了 760 万，

---

① 仅从 1936 年 9 月到 1937 年 5 月，就约有 50 万工人直接参加静坐罢工，并迫使其他雇有 60 万工人的一些工厂关闭。罢工高潮发生在 1937 年 3 月，当时有近 20 万工人参加静坐罢工。

而且还使工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基础工业，大大发展了产业工会。

〔国家、企业、劳工相对关系的变化〕　由上所述，足见“新政”期间，美国国家、企业、劳工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很显著的。从劳资关系来看，如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所说，“新政”前，资方把劳工看成“机器一样的商品”，对待劳工的办法是，镇压与安抚相结合，劳工对资方则只能服从。“除一些残存的企业-行业工会外，劳工被排除于20年代的企业社会之外，被看成是非美国的事物”[①]，他们无权组织工会，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直到30年代，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基础工业中的〕中层经理们在作出〔雇佣、开除、提升、工资、工时与劳动条件的〕决策时，很少被迫认真考虑工会的要求。”[②] 总之，在20年代，工人是受资本家任意摆布的。实行“新政”以后，所有工人（不仅是少数行业工人）、包括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都有组织工会、通过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就是说，虽然资方对劳方仍是一种剥削的关系，但对剥削的程度与剥削的方式，工人有了发言权，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让资方任意摆布了。同时工人在国会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并能通过自己组织进行院外活动，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有一席之地。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劳资关系，决不像某些自由主义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更不像某些保守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有时劳方比资方还霸道。实际上，这种关系仍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因为它的最终界限是不能破坏利润制度。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期

---

① 戴维·米尔顿：前引书，第21页。

②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第494页。

间，劳方的谈判地位更为脆弱。

从国家与劳、资两方关系看，"新政"以前，在劳资纠纷中，国家一般是不干预的；而当国家干预时，国家一般是站在资方一边，压制劳方。"新政"期间，罗斯福政府认识到：如果像前几届共和党政府一样，完全让垄断资本自行其是，而不对其过分剥削、压迫行为进行限制；如果让工人群众经济、政治处境继续恶化，不提高他们购买力，资本主义的继续运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要限制垄断资本的过分剥削、压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群众处境，只有国家才能做得到。因此，"新政"时期的国家便不再执行自由放任政策，却站在"总资本家"的立场，逐渐摆脱与垄断资本的伙伴关系，从垄断资产阶级的总体与长远利益出发，限制各个垄断集团的过分剥削、压迫行为，并支持劳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群众经济、政治处境，以达到维持垄断资本主义继续运行的目的。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这种新的国家与劳、资双方的关系，有一种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新政"时期的国家，已凌驾于垄断资产阶级之上，而成为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国家。前些年，我国极少数学人把战后"新政"式福利国家说成是"社会资本主义"，好像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为全社会谋利益的，实际上，这是受了上述资产阶级学者论点的影响。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新政"只是根据新的情况调整国家对垄断资本的关系，以便垄断资本能够继续剥削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它可以凌驾于个别垄断集团之上，对其不利于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极端行为进行限制，但它决不可能凌驾于整个垄断资产阶级之上。这从它与劳工的关系看得很清楚。因为，"新政"国家虽然可以为了垄断资本能继续攫取利润而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处境，但这是有明显界限的，那就

是不能容忍工人群众按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采取行动，对垄断资产阶级继续剥削劳工剩余价值的制度构成重大威胁。

罗斯福虽然在任纽约州长期间，便曾着手改善劳工处境，但是，他喜欢一种家长式作风，即由自己掌握改善劳工处境的政策，而不大愿意由工人自主。1933 年全国工业复兴法中的劳工条款，不是由他指导法案起草人提出来的，而是在工会领袖们的强烈要求下、得到瓦格纳参议员等人支持，临时加上的。1935 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他原来并不支持，只是由于那年前几个月他对与企业界合作强化实行“新政”感到失望，觉得需要工人群众的支持，再加上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全国工业复兴法，他才改变态度的。1936 年大选时，他遭到大部分他称为“经济保皇派”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城市 3/4 的共和党与保守报纸的反对，却得到劳工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才部分放弃了家长式作风，与产联结盟，并支持产联在汽车、钢铁等基础工业中大力发展产业工会。不过，在这个联盟中，罗斯福与约翰·刘易斯的动机是很不相同的。如前所说，罗斯福支持劳工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目的则是利用产联来支持自己重新当选。刘易斯呢？他与罗斯福结盟是为了大力发展产业工会，成立独立于民主党的工人政党，使工人群众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①

---

① 1936 年 4 月，刘易斯与西德尼·希尔曼组织劳工非党派联盟支持罗斯福竞选时，就坚决认为产联与劳工运动必须独立于民主党，具有自己的政治影响。6 月间，他和罗斯福会晤，罗斯福答应支持他在钢铁业中组织工会，他就告诉报界完全支持罗斯福政纲。但一周以后，他却参加小罗伯特·拉福莱特主持的会议，制订建立独立的农工党的计划。8 月间，他向劳工非党派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演说时，强调“劳工保持自己自主的政治组织是绝对必要的。”10 月末，他在支持罗斯福竞选的演说中号召劳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以便从肆无忌惮的经济专制的魔掌中解放出来。”（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约翰·L·刘易斯传》，纽约：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68，第 251 页。）

就由于这种结盟动机的不同，1937 年上半年，罗斯福在和联邦最高法院斗争中需要产联支持时，他继续支持产联战胜了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大企业。但到 1937 年下半年，产联会员已超过劳联，成为一支重大社会力量；它的会员约有一半受美共控制或受美共影响，所运用的静坐罢工方式，震撼着美国社会。这时，各种反“新政”势力便利用群众中对 1937 年经济衰退、罗斯福法院改革法案和静坐罢工等不满的机会，进行反攻。“全国的公司组织起精心策划的关厂活动，以摧毁有组织的劳工新近占领的桥头堡”[①]，国会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结成联盟，配合企业界院外活动以废除或阉割有利于劳工的“新政”立法。在这种情况下，产联受到挫折，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刘易斯为首，主张通过斗争求发展，支持静坐罢工；要求产联独立于民主党，得到左翼领袖们的支持。一派以希尔曼与默里为首，主张通过与掌权者协商以取得合法的集体谈判权，不赞成静坐罢工；也不要求产联独立，却要求与罗斯福和民主党建立良好关系，得到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领袖们的支持。不愿意产联脱离民主党独立，成为一个自主的、具有较强工人阶级意识政治实体的罗斯福，早就想拉拢希尔曼作为他在产联的代理人。加上这时他的声望有所降低，担心为支持产联的战斗性树敌过多，所以“到〔1937 年〕7 月末，罗斯福已决定打击产联的政治力量；他开始了一种双重策略：一面操纵劳联反对产联；一面从内部破坏产联的团结。”[②]

1938 至 1939 年间，劳联、国会保守派联盟和公司代理人联合起来，制造红色恐怖气氛，迫使参议院大大削减支持产联的、

---

① 戴维·米尔顿：前引书，第 110 页。

② 戴维·米尔顿：前引书，第 113 页。

由共产党人任法律顾问的拉福莱特公民自由委员会的拨款，并在众议院成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与拉福莱特委员会对抗。罗斯福屈服于这种压力，使积极实施瓦格纳法以支持产联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沃伦·马登被迫辞职，法律总顾问、共产党人内森·威特被开除。此后，罗斯福又利用劳联、天主教会等反共、反激进劳工运动的组织，产联中的民主党人，和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帮助希尔曼—默里集团，首先排挤走产联最重要工会——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中的共产党人和左派，攫取了该工会领导权。接着又用同样办法夺取了产联的领导权。这样，产联就完全从属于民主党了。

综合上述，结论是：在“新政”期间，为了挽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国家不再干预劳资纠纷，而是以“总资本家”身份，在激进劳工运动的配合下，迫使垄断资产阶级承认劳工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工处境。同时，一面保证劳工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适当改善经济、政治处境，一面磨损劳工运动的激进锋芒，将其纳入民主党改良政策的轨道，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使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运行。这种国家、劳方、资方的相对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二、独立的国营公司——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由于早期移民的滥垦，田纳西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大片森林，到19世纪末，变成童山濯濯的贫瘠地区。20世纪初，这里的居民普遍陷入贫困，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显著的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曾对这里的综合治理发生兴趣。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指定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

建筑水坝，作为政府利用水力资源生产硝酸盐基地。但根据1916年国防法在那里建起的工厂尚未投产，战争就结束了。哈定政府曾企图将这种国有企业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积极活动，未能得逞。20年代后期，在诺里斯参议员等的推动下，国会曾两次通过由国家在马瑟肖尔斯建设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先后为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否决。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向对造林和水土保持深感兴趣，而且一直致力于国营电力生产以反对私营电力公司的垄断。他当选后，于1933年1月，在诺里斯的陪同下，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1933年4月10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并于5月18日签署。

〔地区性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管理的地区，包括整个田纳西河流域，即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7个州中的4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一种地区性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巧妙地安排一整个流域及其居民命运的有组织尝试。"[①] 它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在防洪方面，从1933至1952年，该局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20座新水坝，改建5座原有水坝，使美国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田纳西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通过阻遏田纳西河及其支流河水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在发展航运方面，该局开凿了一条长650英里、最浅9英尺的内陆水道，将南部内地和大湖区、俄亥俄河及密苏里—密西西比河水系连结起来。到1977年，河上驳船年运货量达2，700万吨以上。在防止土壤侵蚀方面，该局与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合作，在千千万万英亩的宜

① 卡尔·德格勒编：《新政》，芝加哥：四边形图书公司，1970，第103页。

林谷地重新造林。在教育农民方面，该局举办示范农场、试验站和流动图书馆，提供职业教育设施，帮助农民改良土壤、试用新肥料、改进耕作方法、学会科学种田[①]。从1929到1949年，美国其他地区农场收入增加170%，田纳西河流域农民收入增加200%。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该局利用它的大量湖泊和水坝组成的巨大水系，使得钓鱼、野营直到划船等无所不包的旅游业兴旺起来。在卫生保健方面，通过防疟计划，到1952年，该局消灭了田纳西河流域的疟疾，而在1933年时，这一流域的某些地区，患疟疾的人却占总人口的30%。该局还进行了制定文化规划的尝试，改变了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提高了文化水平。

然而，该局最大的成就，还是利用水力生产和出售肥料与电力、特别是电力。到40年代初期，田纳西河流域每人每年耗电量达1，180度。而全国平均每人每年耗电量，却只有850度。到6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的耗电量已3倍于全国平均数。由于电力应用范围扩大，不独促进了农业，很多工业从旧西北地区向南迁移，许多新的轻重工业也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使这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到1940年，而且是在战争开支产生影响之前，该地区7个州的人均收入比1933年增长73%，而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只增长56%。……1933年至1939年之间，该地区银行存款增加76%，全国只增加49%；商品零售总值增加81%，全国只增加71%。”[②] 不仅如此，按照该局负责人之一戴维·利连

---

① 共有6，000个农民互助社，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各种试验。

② 出自戴维·利连撒尔：《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进》一书，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萧条、复兴与战争，1929—1945》，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6，第123页。

撒尔的说法，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得“在那个流域里，人民和他们的机构，在10年之内完全把这个区域的面貌改变了。……土地的生产力增加了许多倍。为青年男女提供的机会已经增多了。……人民现在掌握了现代的工具，正塑造着一个新的流域。”①

此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还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配合下，将电力输送到广大农村，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著名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写道，以往“缺乏电力使美国分为两种民族：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无电动机械之利，在19世纪式的世界里辛苦劳动；农妇们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星期六晚邮报》上城市妇女有洗衣机、电冰箱、真空除尘器的图像，却像前工业时代的农妇一般干她们那腰酸背痛的家务劳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帮助〕农民们……把电线接到农村。最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到来：在大雾山的山坡上，在上密歇根半岛的田野里，在大陆分水岭落基山脉的斜坡上，农民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夜里聚在一起，把大发电机开关一打开，就看到他们的家宅、仓房、学校、教堂在耀眼的灯光下突然显现。……到1941年，美国的农场10家已4家有电；到1950年，10家就有9家有电。”②

然而，罗斯福政府未能克服南部的种族偏见，却让协同管理局工作的地方机构有计划地将黑人排斥在外，不许他们参与其事并分享收益。其次，这个政府也未能克服垄断资本的阻力，使它提出的其他6个地区发展规划③得到国会的积极支持。

〔具有私营企业灵活性的独立国营公司〕　实施整个田纳

① 转引自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573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57—158页。

③ 这6个地区为：大西洋海岸；大湖区和俄亥俄流域；密苏里河与北部雷德河；阿肯色、雷德与格朗德河流域盆地；科罗拉多河盆地；以及哥伦比亚河流域。

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计划，牵涉到7个州，要求所有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国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适宜机构；而且，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的规定，虽然该局应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纯收益，并向亚拉巴马与田纳西两州缴纳部分出售电力收入，但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改变田纳西河流域的贫穷落后面貌，消除阻遏整个美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降低全国电价，普及电力使用，以促进生产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纯粹以谋利为目的的私营公司不愿干的。所以该法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一个超党派的国家机构。它的3位正、副局长在参议院的同意下，由总统任命。他们在任职期间不能从事任何其他事务，也不能与公用事业公司、肥料制造公司、以及任何其他与该局经营电力与肥料发生利害冲突的企业发生财务关系。

但是，为了避免国家机构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而且如利连撒尔所说，“国营企业应当像它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一样，产生与其成本同等或更大的收益和价值。”[①] 因此，从它采用的具有灵活性经营方式来说，它是个像私营公司一样的公司。“它代表现代政府中一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它将不受那些不相干的国家界限的禁制，而且将是独立经营的、政府所有的公司。一旦开始运作，它将指挥自己的经营活动，偿还国会投资，并将其‘利润’投入进一步开发工作。它的逐年的经费筹措（与管理）既不依靠州议会，也不依靠国会。而这乃是政府企业经营活动的一般特点。”[②]

① 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125页。

② 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98页。这是编者为所选第18篇文献《合作共和国：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法》所写按语中一段话。

从所有制来看，这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既创造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如防洪、发展航运、教育农民、改造落后地区以促进全国发展，使国家起一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又大规模地经营电力、肥料等，并致力于降低电价，打破私营电业垄断，扩大电力使用，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使国家具有经济基础的属性，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史学家林克和卡顿评论说：“它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

美国私营电力工业在20年代已发展为120亿美元的垄断资本。它为了逃避国家干预，保证电力的垄断价格以谋求超额利润，开展了顽强而耗资巨大的宣传，甚至更改学校教科书，收买报纸，资助专业人员和组织。电业的控股公司投机诈骗，坑害人民。塞缪尔·英萨尔掌握的、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王国，包括150家各种公用事业公司（其中也有电力公司），有雇员325万。1932年元旦，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美元以上。由于投机诈骗活动败露，几天之后，其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使大量持股人受到惨重损失。同时，电力垄断资本为维持垄断价格，还长期拒绝将电力输往农村。这种情况，早已引起广大群众的公愤，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但是，哈定、柯立芝、胡佛3个政府执行的政策，“使政府不仅不参加企业而且也不管理企业，让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在经济领域内为所欲为，并且把他们引进政府内部来制订政策。”② 所以如前所说，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中卷，第101页。

②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396页。

虽然进步派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阻止了哈定政府将马瑟肖尔斯的国营水利工程售与私人，但却未能防止国家在马瑟肖尔斯扩建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被柯立芝和胡佛否决。

罗斯福在任纽约州参议员和州长时，就已充分表明他对廉价电力的热情和铲除有势力的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胡作非为的决心。他还具有将电力输往农村的强烈愿望。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就乘全国大多数人支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并在该法中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可以建设通往农村的输电线，特别是有权根据该局电力经营，确定电价“标准”，用以衡量私营电价是否合理。这种不利于私营电力公司垄断电价的规定，当然会受到私营电力公司反对。所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开始工作，亚拉巴马电力公司就有一群股东诉请阻止该公司将某些财产售与该局。1935 年 2 月，保守的伯明翰联邦地区法官在判决此案时，认为该局无权蓄意生产与出售电力，而且禁止 17 个城市购买该局威尔逊水坝生产的电力。这个判决，1936 年 2 月在阿什旺德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只认定出售威尔逊水坝生产和经营的电力合乎宪法。见有此空子可钻，19 个公用事业公司又于 1936 年 5 月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要求颁布指令，禁止该局除威尔逊水坝外再在其他地方生产和出售电力。由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一系列“新政”立法的余波犹在，1936 年 12 月，这些公司暂时胜诉。但是，从 1937 年 3 月起，联邦最高法院已逐渐转而支持“新政”立法。到 1939 年 1 月，在田纳西电力公司控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局的合法性，并进而判决私营公司无权抱怨政府的竞争。这样，19 家公司联合行动的领袖、共和国和南方公司董事长温德尔·威尔基才放弃了

斗争，并于是年8月将该控股公司下属的田纳西电力公司的全部设备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停闭，标志着田纳西河流域公用事业中私营企业的末日。许多较小的公司，或者已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或者不久就走上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道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生产者。1933至1978年间，它的实际发电量从15亿瓩小时，增为1180亿瓩小时，增加近79倍。由于发电量大幅度增加，到4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居民交付电费每度只2美分多一点，而全国平均电费则为每度4美分多。到6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电费平均每度2美分半，而该地区则不到1美分。40年代初，全国平均电费降低22%，而在管理局建立及其电费标准制定以前同样长的时间内，电费只降低2%。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战胜田纳西河流域私人电力垄断资本和降低全国电价的斗争，是“新政”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有助于我们认识罗斯福“新政”正在开创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

三、“新政”与黑人

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新政’特别扶植少数民族和少数教徒集团。罗斯福任命了第一个意裔美国人和第一批黑人为联邦法官。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地位，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得到承认。据塞缪尔·卢贝尔说，在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任命的214位联邦法官中，只有8个天主教徒和8个犹太人。罗斯福任命的196个法官中，就有51个天主教徒和8个犹太人。罗斯福深深关注着加速将少数民族、少数教徒融人国家生

活的所有领域。”[①]

在美国的所有少数民族中，作为奴隶后裔的黑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他们极其贫困的处境，使他们的问题最突出，成为“难于解决而又同样难于置之不理”[②] 的问题。对于黑人，“新政”是怎样扶植的呢？扶植的程度如何呢？

〔*初期“新政”与黑人*〕　在就任总统以前，罗斯福有反对歧视黑人的纪录，也有歧视黑人的纪录。1932 年竞选总统期间，他曾答应将黑人“绝对地和没有偏见地”包括在他为被遗忘的人们实行的“新政”之中[③]。但是，初期“新政”的各项计划中，有的黑人得益很大，有的得益极少，甚至受害。这和负责执行计划的联邦官员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密切相关。如第 2 章第 4 节所说，农业调整法的实施，得益者主要是农场主，佃农、分成制农民、雇农很少得益，甚至受害。而“在 30 年代，一半以上黑人住在农业地区，但不足 20%的黑人农民有自己耕种的土地”，[④] 所以“很少受益甚至受害”的主要是黑人农民。比如农业调整局规定：每少生产 1 磅棉花，政府津贴地主 4.5 美分，其中给予佃农的只半美分。而且，这半美分并不直接发给佃农，都一起发给地主；地主还负责保管全部佃农所得津贴的 1/9。由于各县负责实施农业调整法的机构基本上都掌握在歧视黑人的白人大地主手里，他们就利用各种可能欺骗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农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 425 页。

② 冈纳·米达尔：《美国的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政治》，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第 1 卷，绪言，第 XII 页。

③ 1932 年 9 月 24 日《巴尔的摩非洲裔美国人报》。

④ 雷蒙德·沃尔特斯：“‘新政’与黑人”，载布雷曼等编：《新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第 1 卷，第 171 页。

民。农业调整局棉花处的负责人担心南部大地主不合作，对他们的作弊行为大都睁只眼闭只眼。其结果，如农业部长办公室的莫迪凯·伊齐基尔所说："无疑农场主……在筹备与执行农业调整局各项计划时占着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他们在某些商品、特别是棉花减产计划中所得津贴特别多。"① 农业调整局自己所作研究也承认："有相当多的例子表明佃农未得到他们应得的津贴……他们是否得到津贴……有赖于地主的慈悲。"②

更有甚者，农业调整局执行的政策，还导致地主大量驱逐佃农和分成制农民。局领导人知道，减耕40%的棉田而不减少棉田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在1934—1935年与地主订立的棉花减产合同中只写道：**希望**地主不要驱逐佃农。这种**希望**当然只是泡影。南部各地观察家报道，从1934年起，许多地主即开始驱逐佃农，以便顺利地、节约地减少棉花耕地。主要由于这种原因，从1930年至1940年，南部黑人佃农、分成制农民共减少192，000人（见下表）。

南部黑人佃农、分成制农民减少情况 （单位：千）

年　　代	黑人佃农数	黑人分成制农民数
1930	306	393
1935	261	368
1940	208	299

资料来源：冈纳·米达尔：前引书，第253页。

从理论上说，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保

① 1936年2月5日莫迪凯·伊齐基尔致亨利·华莱士备忘录，见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农业部档案。

② 加尔文·胡佛："南部减少耕地中的人道问题"，农业调整局档案中1935年打字文稿。

护童工女工、工人有组织工会并与资方举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对黑人是有好处的，但因负责实施此法的国家复兴管理局未能摆脱种族歧视，黑人得益不多。比如，该局虽然不同意南部要求对黑人、白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但它允许制订按职业与地区分类的复杂工资体系，而这种体系却使黑人工资大大低于白人工资。当然，这里也有个难题：如果该局坚持提高黑人最低工资，南部那些主要靠低工资黑人工人维持的工厂，便会被迫破产，使黑人失业；或者增加不变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工资，这就会导致白人抢夺黑人工作的后果。两者都对黑人不利。

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成立的公共工程局，显然与国家复兴管理局不同。该局局长由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兼任，他一向关心种族问题，到任后立即以同情黑人的白人克拉克·福尔曼和罗伯特·韦弗（黑人）为特别助理，[①] 并鼓励一些特殊地区负责公共工程的地方委员会任用黑人，以便即时了解黑人情况，提出解决歧视黑人问题的建议。“由于与黑人一起努力以改善黑人处境，公共工程局给予黑人工人以巨大利益。”[②] 在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期间，公共工程局用于修建黑人学校与医院的款项，超过 1300 万美元。这一数字，比此前 70 年间联邦政府用于黑人的资金还多。到 1940 年，公共工程局和继承该局住宅处的美国住宅管理局建筑的 14 万套住宅中，有 1/3 分给了黑人居住。美国政府的 367 项住宅建筑工程中，133 项是完全为黑人建筑的，40 项是为黑人和白人共同居住的。[③] 在南部，由联邦津贴建筑的住宅，也

---

① 国家复兴管理局只有一个黑人女职员，还靠边站。

② 雷蒙德·沃尔特斯：“‘新政’与黑人”，载布雷曼等编，前引书，第 186 页。

③ 尽管许多黑人对于用政府资金为黑人建筑隔离住宅抱有保留态度，但大多数黑人知道：如果拒绝这种援助，将是愚蠢的，因为有隔离住宅可住，总比没有房子住好些。

有 58.7%分给了黑人。这就表明，如果联邦行政官员采取坚决措施，即使在实行种族歧视的地区，也很能有所作为。

公共工程局在就业问题上实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政策，遇到的问题较多，甚至在由政府授予合同的工程中，也有严重种族歧视。比如，从公共工程局开始运作以来，耗资 16，600 万美元的博尔德水坝工程雇佣的 4，000 多工人中，只有 11 个黑人。伊克斯局长下令禁止种族歧视也不起作用。于是，到 1933 年晚期，公共工程局住宅处就在政府合同中加上一个条款，要求黑人熟练工人受雇份额，相当于他们在地方劳动力中百分比的一半。必要时，也在合同中加上类似条款，以保护黑人的非熟练工人。一般说来，这一措施是有效的。到 1940 年 12 月，付给熟练工人的工资总额中，有 5.8%是付给黑人工人的。这一百分比，大于 1930 年职业普查时黑人在手工业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哈里·霍普金斯一向关心黑人问题，由他任署长的联邦紧急救济署中设有黑人助手，对黑人救济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33 年受救济的黑人超过 200 万，占黑人总人口的 17.8%，几为白人受救济人口百分比（9.5%）的两倍。到 1935 年，黑人受救济人口增为 350 万，几达黑人总人口的 30%。

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队长罗伯特·费克纳，是个具有种族歧视观点的人，他坚决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极不愿施加压力以便雇佣黑人，或委派黑人任黑人营地管理人员。其结果，民间资源保护队开始时受益者几全是白人，第一批 25 万队员中，黑人不足 3%。

如前所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但是，虽然该局明文禁止种族歧视，要求吸收一定比例的黑人就业，而

实际上则在住宅、就业[1]、培训方面，均实行种族歧视。该局局长阿瑟·E·摩根还为该局歧视黑人政策进行辩护，说什么黑人在种族融合的社会中不会幸福；黑人对该局的批评会激起更坚决地向黑人进攻的反黑人情绪。

〔黑人斗争和黑人选票〕　由于"新政"初期有些"新政"机构忽视黑人问题，使黑人未得多少益处，甚至受害；有些"新政"机构虽然重视黑人问题，使黑人受益，但因黑人处境极其贫贱，他们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因此，黑人群众便认为罗斯福总统背弃了自己竞选时诺言，展开了群众性斗争。黑人工人在美国共产党的鼓舞与领导下，在争取组织产联的罢工斗争中，往往站在斗争前列。到1933年底，黑人比例很大的煤矿工人已有90%加入了矿工联合会。其他各种产业工会也逐渐向黑人开放。黑人农民也在胡佛时期斗争基础上进一步奋起。1934年，黑白混合的分成制佃农同盟组织摘棉农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有些地区得到成功。同年7月，阿肯色州有个地方成立了南部佃农联合会，要求联邦政府制止地主夺佃，并将根据缩减耕地而补偿给农民的津贴，直接发给佃农。联合会曾多次领导摘棉农罢工，获得成功。1936年会员增至3万人，黑人占1/3。

1931年以来，广大黑人群众参加了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声援被判处电刑的9名无辜黑人青年的斗争，于1933年夏迫使法院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经过不断斗争，使9名黑人青年陆续获释（参阅第1章第5节）。

失业黑人还组织起来开展谋职运动，波及到圣路易斯、匹茨

---

① 该局声称黑人占其劳动力的10%，大体相当于黑人在田纳西河流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但该局承认黑人所得工资额的百分比较低，因为黑人劳动力集中在非熟练建筑工人中。

堡、芝加哥、克利夫兰及其他一些中西部城市。纽约的运动最红火。1933 年黑人在该城组成一个争取公平对待公民联盟，试图说服白人商店雇佣黑人。当他们第一次失败后，就在商店附近布置纠察队，呼吁黑人“不到不能去工作的商店购物。”人们情绪愈来愈激烈，最后有几百名黑人在哈莱姆商店以及电话、电气、公共汽车公司等公用企业中得到工作。

黑人领袖也发起猛烈的批评。“他们指责国家复兴管理局排除黑人产业工人，提高物价更甚于提高工资。一位作家争辩说……国家复兴管理局只有一种含义：‘黑人再度倒霉’。他们反对农业调整局把黑人佃户和分成制佃农赶出土地，而让白人地主把政府支票装进自己口袋的政策。黑人既不能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模范小镇诺里斯，也不能住在自给宅地社区阿瑟戴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机关刊物《危机》在 1935 年写道：黑人‘现在应该认识到，罗斯福政府中当权的人们对他们没有作什么事情。’

“黑人领袖也因‘新政’国会未能制定民权立法而责难罗斯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总统的立场感到恼火，于 1935 年 4 月 27 日与他决裂。霍华德大学副院长查尔斯·豪斯顿问道：‘民主党是否决心使自尊的黑人在 1936 年不支持它呢？’”[①]

广大黑人群众的批评和斗争，罗斯福政府是不能不被触动的。特别是，民主党日益体会到黑人选票对民主党政权的重要性。美国著名黑人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说，黑人“对林肯的党真正不满是在 1928 年开始的。那时，共和党人企图在南方恢复一个由白人领导的强大的党。……而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总部不让出席会议的黑人代表当选而让白人代表当选……巴尔的

---

①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 185—186 页。

摩的《美国黑人》、诺福克的《杂志和指南》和波士顿《前卫》等刊物以及所有的黑人报纸都宁愿支持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而不支持赫伯特·胡佛。"[①]

胡佛就任总统后，有许多歧视黑人的恶行。57个黑人被私刑处死，他坚决拒绝进行谴责，反之，他却坚持任命一个公开提倡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南部法官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默认由政府出资送"金星"母亲到欧洲去为一战期间阵亡儿子扫墓的船只实行隔离，他在政治上尽可能地不与黑人接触，他还不顾黑人死活，反对实行联邦救济。

这样，民主党的经纪人就有个极好机会将黑人选票从共和党那里拉过来。首先借此东风的民主党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格菲。1932年，他一听到《匹茨堡信使报》黑人编辑罗伯特·L·范恩谴责共和党人对黑人漠不关心时，就劝说詹姆斯·法利在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中设一个黑人部，并由范恩负责。后来，格菲还说服罗斯福总统任命范恩为司法部长助理。格菲在宾夕法尼亚州取得一个特别协定，使黑人享受10%的民主党优惠。他还坚持该州公平分配政府救济，并支持一个民权法案，规定旅店、餐馆、戏院拒绝接待黑人为刑事罪。总之，他使宾州的这些措施成为吸引黑人选票的考验。其结果，1932年宾州和匹茨堡黑人投罗斯福票的，比以往投给任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都多。但是，改变传统是有个过程的，1932年民主党在该两地区得到的黑人选票还未超过共和党，胡佛在宾州所有黑人选区和匹茨堡两个黑人选区之一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表明：格菲的这些吸引黑人选票办法是有效的，但还需要继续努力。

---

①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457页。

由于黑人斗争和黑人选票的影响，再加上罗斯福总统、伊克斯部长、特别是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等人对黑人处境的同情，使后期“新政”日益对黑人有利。

〔第二次“新政”与黑人〕　黑人对农业调整局的批评与斗争，罗斯福政府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1936年起，棉花减产合同作了修改，至少1/4的政府津贴直接付给佃农，1938年增为1/2。但是，因为合同中保证佃农不被地主驱逐的条款没有改写，地主就更频繁地驱逐佃农。另一方面，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支持参议员约翰·班克黑德设立农场保障局的建议，该局将向佃农提供非常优惠的购置农场贷款（年利3%，40年分期偿还），并提供资金作为复兴农业、农村救济及农民重新安置之用。虽然农场保障局的计划也由地方管理，但它的资金的23%分配给了黑人。这一比例，大体相当于南部人口中黑人人口的比例。该局与农业调整局不同的是，后者认为只要种植园经济复兴，繁荣就会向下渗透到佃农，无须特别注意黑人问题；前者则作出尽可能多的努力以保证黑人得益。农场保障局其所以特别关注黑人问题，是和它的第一任局长威尔·W·亚历山大以及他任用的黑人助手和顾问们分不开的。

为加强加速以工代赈工程1935年春天建立的工程振兴局，取代了公共工程局和联邦紧急救济署某些职责。它是真心关注黑人问题的。局长哈里·霍普金斯任命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为其行政助手，以协调黑人顾问们的活动。他的一些白人助手也关心黑人特殊困境。因此，黑人所得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局的救济费，超过了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33年，黑人受救济的人口为200多万，为黑人总人口的17.8%（白人受救济比例只9.5%）。到1935年，黑人受救济人口达350万，几为黑人总人口的30%。另外有20万黑人在工程振兴局工作。两者加在一起，

几达全国黑人总数的 40%。虽然黑人所得益处仍未能满足其需要，但“联邦紧急救济署与工程振兴局的救济与以工代赈的工作，在帮助黑人度过萧条难关方面是极其重要的。”①

从第二次“新政”起，对黑人青年的援助加强了。在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劳工部、内政部官员的压力下，南部黑人青年进入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逐年增多。到 1936 年，其比例相当于全部青年总数中黑人青年的比例。总的来说，在民间资源保护队存在的 9 年时间中，它所雇佣的 250 万青年里，黑人青年占 20 万。不过，该队仍然实行种族隔离制，在职业训练和提升方面还存在着歧视。

1935 年成立的全国青年处处长是奥布里·威廉斯，其祖父曾释放 1，000 名黑奴。他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一开始就力图避免民间资源保护队曾采取的种族歧视政策。他任命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W·约翰逊为该局顾问委员会委员；更为重要的是，任命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主席玛丽·M·贝休恩为黑人事务部门负责人。贝休恩及其黑人助手又说服大多数州的下属机构负责人任命黑人为行政助手和委员会委员。其结果，该局任用的黑人职员，比其他任何“新政”机构都多。而且，从一开始，黑人便获得该局拨款的 10%，而且逐年增加，到 40 年代初，增为 20%。

该处最大缺点是运作范围太小，不能满足黑人需要。同时它也实行过种族隔离，而且在给黑人青年提供工作时在工种上有所歧视。

“新政”的各个项目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二次“新政”时期的社会保障计划。它否定了美国社会一向强调的个人负责和自助

① 雷蒙德·沃尔特斯：“‘新政’与黑人”，载约翰·布雷曼等编：前引书、第 190 页。

的思想，确定由政府负责向老年、失业者、病残者以及无依靠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制度。虽然开始实施时对黑人不利，比如65%的美国黑人工人为农业工人和家庭佣工，但社会保障法却不保障这两种工人；同时，失业保险费和部分老年保险费由雇主支付，雇主提高物价以便将此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更减低了黑人购买力。但是，社会保障计划“给许多贫穷、病残和无依靠黑人提供了直接好处；而且，在随后的40年中，经过无数骚动以及与联邦政府协商，老年和失业保险条款一再修改，日益对黑人有利。”①

〔“新政”与黑人的政治、社会地位〕　由于“新政”标榜关怀社会底层被遗忘的人，由于黑人选票力量日益显现，“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约翰·富兰克林说，罗斯福总统执政后，一反胡佛歧视与疏远黑人的态度，“经常接见黑人来访者。……匹茨堡的罗伯特·范恩、波士顿的朱利安·雷尼、堪萨斯市的威廉·汤普金斯和印第安那波利斯的F·B·兰塞姆在民主党的委员会中都居于高位。罗斯福还访问黑人组织和机构，并给它们写信。……埃利诺·罗斯福对黑人特别友好。人们都知道她同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关系密切。她曾邀请由贝休恩夫人担任主席的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成员到白宫喝茶。她访问了黑人学校，视察过联邦工程，并向许多黑人团体发表讲话。”②她还和两名霍华德大学黑人后备军官训练队学员一起拍照。当美国革命女儿会拒绝让天才的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在宪法大楼举行演唱会时，她公开退出该会，并立即通过哈罗得·伊克斯部长邀请玛丽安在林肯纪念碑前演唱。

① 布雷曼等编：《新政》，第1卷，第196页。
②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前引书，第461页。

罗斯福总统任用黑人顾问和专家与以往总统不同：以往总统即使任用黑人顾问，也不过少数几个人，有点做样子，罗斯福任用的黑人顾问和专家，数目相当大，遍及政府各部门，而且认真听取他们意见。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黑人有：司法部长特别助理罗伯特·范恩；先后任内政部长助理法务官、陆军部长文职助理、维尔京群岛总督的威廉·里斯蒂；先后在内政部、联邦住房管理局、战时人力委员会任职的罗伯特·韦弗；在商业部担任黑人事务顾问的尤金·金克尔·琼斯；在劳工部任黑人劳工司司长的劳伦斯·奥克斯利；前面提到的玛丽·M·贝休恩；政府雇员联合会主席、民间资源保护队黑人事务顾问埃德加·布朗；内政部种族问题顾问威廉·特伦特等等。联邦在职人员名单中黑人雇员数，从1933年的约5万人，增为1946年的将近20万人。

"新政"时期，除少数黑人被选入国会外，"在30和40年代，黑人在州的立法机构获得席位的人数日益增加。1932年以后，在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堪萨斯、肯塔基、新泽西、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黑人担任州议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都有。"[1]一些城市也把黑人选为或委派为法官。

综上所述，"新政"的各个项目带给黑人的助益虽有大有小，但整个说来，则如《匹茨堡信使报》社论所说，"失业黑人工人大军曾在公共工程局、民政工程局、工程振兴局、民间资源保护队、联邦紧急救济署以及其他各种项目中找到了工作……批评者会指出对黑人分成制农民、黑人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歧视……这都是事实。否认这些是没有用的。……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

[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前引书，第462—463页。

有哪一个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呢……？答案自然是：没有。”[1]

虽然如此，罗斯福解决黑人问题的局限性，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为了他的整个“新政”计划和外交政策，他不想、也不敢和白人种族主义彻底决裂。如雷蒙德·沃尔特斯所说：“他不想触怒国会的南部议员；这些人尽管有些疑虑，但通常是‘新政’联盟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投票支持‘新政’内政法案，而且在战争威胁到来之时，又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国防计划。罗斯福不反对为黑人权利进行工作的人，而且有一次告诉沃尔特·怀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长〕说，‘干吧，只要你能做的事你就做。你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我都没意见，但我就是不能做。’他甚至授权其夫人‘〔为支持反私刑法案〕想说什么就说……’但是，总统自己不会做什么事情。他解释说，‘假如我现在出来支持反私刑法案，〔南部人〕将阻止我向国会提出的使美国免于崩溃的每一个法案。我就是不能冒这个险。’”[2]

---

① 1936年1月11日《匹茨堡信使报》。

② 雷蒙德·沃尔特斯：“‘新政’与黑人”，见约翰·布雷曼等编：前引书，第1卷，第200—201页。

第五章

“新政”综论（续）

四、对“新政”评价

如前所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濒于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革的产物。这种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纲，是和美国早期的立国思想——一种“历史悠久的、没有受到官僚主义污染的、由自我管理的个人组成的大体无政府的社会”[①] 相违背的。当然，它更不同于美国共产党人及其他左派主张的社会主义。因此，这种政纲的提出与实施，必然引起维护传统立国理想的人们、提倡社会主义的人们和主张“新政”的人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就是对“新政”的评价众说纷纭而且特别持久的原因。下面我们对几种主要评价作一简单介绍。

〔“新政”是否对克服大萧条有作用〕　维护传统的人们或者说保守派，是不相信“新政”能克服大萧条的。胡佛总统是他们的主要代表。根据罗斯诺夫的分析，胡佛及其追随者认为：直

① 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绪言，第1页。

到大萧条期间，美国的经济仍然是"基本健全的"；克服大萧条的根本办法，首先是要恢复企业界的信心。这种信心论认为："如果政府停止干预，如果'新政'停止其具有破坏性、摧毁性的拙劣修补活动，那么，复兴的'自然力量'将迅速恢复繁荣……

"这种信心论还认为，投资是复兴的必要条件，而〔企业〕信心则刺激投资的胃口。'新政'政策破坏了〔企业〕信心，妨碍了投资，从而推迟了复兴。"[①]

这种论点，不独由共和党的胡佛、阿瑟·范登堡、艾尔弗雷德·兰登、奥格登·米尔斯、伯特兰·斯内尔等一大批人表达过，也由民主党的卡特·格拉斯、哈里·伯德、刘易斯·道格拉斯、乔赛亚·贝利等人附和过。在两党保守派起草的1937年《保守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30年代整个保守集团都皈依这种既作为理论、也作为政纲的信心论；在他们对"新政"的全部批评中，都顽固地坚持这种论点。[②]

但是，保守派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事实。1933年夏和1934年春的经济小回升，特别是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的明显复兴迹象，是有目共睹的。保守派对此无法否认，只好说这是一种由大量政府开支诱发的"虚假繁荣"。战后，美国经济长久上升的总趋势使虚假繁荣论有所收敛，但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滞胀现象时，保守派又怀疑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对历次经济衰退的扭转，是否是真正的扭转。

激进派也有人不相信"新政"能克服大萧条，这和他们机械

---

① 西奥多·罗斯诺夫：《教条、萧条和"新政"》，纽约州肯尼卡特出版社，1975，第35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36页。

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有关。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评论，又加强了这种理解。他说，"显然，现在的情况是从工业的最低点，从最深刻的工业危机过渡到萧条，但不是过渡到普通的萧条，而是过渡到特殊的萧条，它不会导致工业的新的高涨和繁荣。"① 这一评论，为1932至1935年间各国共产党对"新政"的评论定下了调子。当时美共主席厄尔·白劳德攻击"新政"是"饥饿纲领"，指责实行"新政"的罗斯福"就像他以前的胡佛一样，不过对群众的生活水准进行着更凶恶的打击。"② 直到60、7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者还说，"因为1929年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而不是存在于其中的危机，所以〔试图挽救它的〕'新政'不得不失败。"③ 30年代时，我国左派政论界也有人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失败了！……尽管罗斯福还想继续挣扎，我敢说，资本主义决不会从他手里挽救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健康了"④。到60年代，我国也还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⑤

我们认为，如果说"新政"不能永远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13卷，第258页。

② 转引自小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190页。

③ 利奥·休伯曼：《我们人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修订版序言。

④ 钱亦石："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1935年7月），第72、69页。

关于当时我国政论界对"新政"的评论较详细情况，请参阅杨玉圣："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第86—117页。

⑤ 顾学顺："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历史教学》，1960年6月号。

机，那是对的。但即使对“新政”作出这种评论，也应同时指出它在克服大萧条中所起的作用，才比较全面。如果说“新政”对克服大萧条完全不起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到1938年，美国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了30%，1939年增加了60%。按1958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1，415亿美元，到1939年增为2，094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893美元，增为1940年的1，259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

也有些共产党人在1935年夏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纠正了过左路线、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后，根据“新政”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正确评论。美共前主席福斯特后来说，“垄断资本主义不能够终止周期性危机。但是，如果忽视了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采用各种努力，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和‘管理经济’来影响或减轻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严重性，就会是一种基本的错误。”[①] 1945年4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社论“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中说，罗斯福“用大无畏的精神推行新政……他渡过了危机，安定了国民生活。”近年来我国对“新政”的研究更深入，认识更清楚。邓蜀生说，“‘新政’……在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渡过1929—1933年大危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种评论是简明扼要的。[②]

在这个问题上，居美国学者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的评论是比较合乎事实的。他们一般都认为“新政”对克服大萧条可以而

---

① 威廉·Z·福斯特：“美国的管理经济”，《国际问题译丛》，1956年第10期，第40页。

② 见所著《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小引，第11页。

且起了作用。不过，有的人认为它没有使美国完全摆脱大萧条，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有数百万人失业；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才实现繁荣与充分就业。也有些人认为，"新政"是可以完全克服大萧条的。德·贝茨说，"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政府有魄力有决心贯彻'新政'的策略，那么即使没有战时经济活动的帮助，国家也能重新繁荣起来。不管怎么说，经济之所以得到复兴，确实是由于'新政'打下了坚固的基础。"[①] 其他著名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等，也都有类似看法。

〔"新政"的性质〕　"新政"初期，胡佛攻击它是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工商界攻击它是"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美国共产党和劳联攻击它是法西斯主义。除美共外，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联邦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过多。罗斯福当然不同意这种评论。1944 年第 4 次竞选时，他在波士顿的竞选演讲中说，1929—1933 年期间，"我们人民很可能求助于外来的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但后来并没有这样。[②] 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与罗斯福评论类似。沃尔特·拉费伯等的评论是比较典型的。他们说，"大萧条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灾难性影响。它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间苦痛，因而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关于政府的社会责任的理论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在短短的几年内，这种严格限制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失败得很惨。不过，那种以为失去幻想的美国人会向左转向革命或向右转

---

① 拉尔夫·德·贝茨：前引书，上卷，第 240—241 页。

②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上册，第 71 页。

向独裁制度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①]

1935年夏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以后，美共逐渐清除其左倾宗派主义，改变了对"新政"的态度，以便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它虽然反对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观点，[②]认为"'新政'并不是像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但是，如威廉·福斯特所说，它也认为罗斯福在1934至1935年之间受到左右两方高压时，"终于被迫采取比较肯定的立场，来反对那些想逼着美国走希特勒的道路前往法西斯主义的金融（注：原文译为"财政"，似不贴切）资本家而支持那些赞成温和的改良措施和稍微对工人阶级让步的金融资本家。罗斯福仍然遵循中间路线，但是现在照他的说法是'中间略为偏左'"。[③]美共机关刊物还称"新政"是"我国历史上最进步篇章之一。"[④]

罗斯福"新政"既未实行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当然谈不上共产主义。它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保存了资产阶级民主，不同于季米特洛夫在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报告中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⑤]

---

① 沃尔特·拉费伯、理查德·波伦堡：《美国世纪》，纽约：威利父子公司，1975，第163页。

② 白劳德1938年5月在美共第10次代表大会上说，"民主思想按照今天的情况的一贯的应用，这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党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转引自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63页。

③ 以上两段引文见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14、352页。

④ 《政治》月刊，1962年12月号，第11页。

⑤ 关于"新政"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还可参看约翰·加勒蒂的"'新政'、国家社会主义与大萧条"，载《美国历史评论》1973年10月号，第907—944页；约翰·迪金斯：《美国人看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第280页。

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新政”究竟是怎么样的政体呢？威廉·洛克滕堡说，“1933至1938这6年，标志着美国制度上的剧变”①，但“即使是那些最打破前例的‘新政’计划，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尊重企业界的感情……

“罗斯福的纲领是依据这种假定：把福利国家政权硬加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社会。‘新政’派的改革者们没有向私人利润制度发起决定性的挑战。”②威廉·福斯特也说，罗斯福“这一堆常常自相矛盾的改革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想对病危的经济制度打一剂强心针。”③

以上评论说明，罗斯福“新政”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空前重大的资本主义改革，有的学者称之为“一种有控制的资本主义。”④

〔“新政”的成就与不足〕　保守派讳言“新政”的成就，只攻击“新政”造成大政府、大劳工和巨大赤字开支，扼杀个人自由，挫伤企业积极性，降低州与地方政府及个人责任感，甚至到70年代末，当他们不得不承认“新政”的某些成就时，也只是附带提一提，仍以攻击为主。⑤

批评“新政”造成大政府和巨大赤字开支，降低州与地方政府及个人责任感，是有一定道理的，许多非保守派学者也有类似

---

①② 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前言第Vii页，正文第165页。

③ 见所著前引《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314页。

④ 〔法〕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14页。

⑤ 新保守派罗伯特·J·林格说：“诚然，罗斯福的‘新政’也许使每户人家的锅里添一只鸡；但其长期后果，正如一切社会主义改革的后果一样，是逐渐地破坏了个人的自由。”见所著《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83页。

评论。但说“新政”扼杀个人自由，实际主要是埋怨“新政”限制垄断资本随意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说“新政”挫伤企业积极性，实际主要是为垄断资本推卸对大萧条应负的责任辩解。

新左派对“新政”的评论是比较严峻的。霍华德·津恩认为：“‘新政’的成就是：重振在萧条中大栽跟头的中产阶级，使一半失业者找到工作，并给予最下层阶级仅足以建立一种善意感的援助（一份公共住宅、最低社会保障）。在从事所有这些工作时，‘新政’派接触到的建议非常多，但他们只接受了使传统社会机制重新运转、并使人们意识到一种真正影响深远的重建工作将是怎样的那些建议。”[1]

津恩认为，“新政”的缺陷，是它没有解决下列根本问题：如何使巨大自然财富和令人吃惊的生产潜力为所有美国人造福。这个问题必然引起的政治问题也没有解决，即如何把普通人民组织起来将此危机造成的惨状更为微妙情况传递给国家领导人，如何使非紧急时期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千百万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们的日常痛苦被觉察到。到1939年左右，萧条结束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弊病依然如故。罗斯福不独无视马克思主义，就是自由放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那一个大领域，他实行的“新政”也只对之进行过局部的探索。[2]

自由主义者对“新政”一般是同情的，但有的评价未免太高。我们这里举一些比较公平的评价为例。威廉·洛克滕堡认为，“新政”不独大大发挥了国家的作用，还“运用政府的权力，不仅管制企业界，而且支持成立工会，给上年纪的人发养老金，救

---

① 霍华德·津恩：《新政思想》，绪言，第XVi—XVii页。

② 参阅同上书，绪言，第XVi页、第XXViii页。

助伤残人，救济贫苦人，向被遗忘的人们伸出救援之手。”① “罗斯福政府给予这种援助，不是作为施舍，而是作为政府职责。”② “‘新政’通过承认大部分在政府里没有代表人的那些集团的地位，实现了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③ 还“负起了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最低生活水准的责任。”④

洛克滕堡还认为，“新政”使美国“受到如何避免另一次重大萧条的锻炼。”⑤ 罗伯特·舍伍德则认为，“资本主义经过他（指罗斯福）的手术，得到的不是死亡，而是变得比过去更强壮，并取得新的生命。”⑥ 一位英国观察家还夸张地说，“〔罗斯福〕奋斗的勇气、力量和规模，值得每个国家热烈同情；而他的成功，足以使全世界沐浴一种更轻快而温暖的阳光。”⑦

洛克滕堡认为，“新政”的不足，在于“它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引起一些麻烦的新问题。它不曾证实它能在和平时期实现繁荣。……它〔却〕增强了自称为千百万人说话、但有时只代表一个很小的少数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它没有找出一条保护没有这种发言人的人民的道路，也没有引申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惩戒利益集团的方法。……仍然是一种半途革命；它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但将许多美国人——分成制佃农、贫民窟居民、大多数黑人——留在新形成的平衡之外。”⑧

---

① 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③ 同上书，第347页。
④ 同上书，第332页。
⑤ 同上书，第347页。
⑥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上册，第114页。
⑦ 《柯里尔》双周刊1933年9月23日“社论”。
⑧ 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第346—347页。

五、“新政”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新政”的根本作用是什么？历史地位如何？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述有时也庶几近之。比如舍伍德说，“新政”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的生命；胡特马赫尔说，“新政”是“我们用来研究如何解决美国资本主义独特问题的20世纪和平时期的惟一模式”，[①] 就大体指的是“新政”的根本作用和历史地位。但这些论述既不完整，也不精确。近年来，美国社会学家朗达·F·莱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见解。她认为，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表明，美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出现了3种障碍：一是资本剥削率过高，群众购买力过低，生产过剩，利润的实现成为问题；二是业主之间无节制的竞争使物价下降过度，投资成为问题；三是政治结构职能不足，不能适应资本积累过程的迫切需要。“新政”是用来克服这些障碍的；它的根本作用是调整政治、经济秩序，为美国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②]

这种论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根据和发展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可以作出更透彻更科学的分析。

〔“新政”的根本作用〕　列宁认为，美国是19、20世纪之交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按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规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由于垄断代替了竞争，这种基本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严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烈。换言之，已经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从20世纪前30年情况来看，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完

① J. 约瑟夫·胡特马赫尔：“大萧条”，《美国史研究》，第2卷，第379页。
② 参阅朗达·F·莱文：《阶级斗争与“新政”》，第8章。

全符合美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在这30年中，美国经济危机已由19世纪的10年一次，加快到6年一次。从总的趋势看，程度也日益深刻。人民群众斗争日益发展，到1918至1923年，出现了美国革命高涨的年代。随后几年，虽然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由于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特别是由于加强劳动强度与效率的生产合理化运动，美国出现过一段暂时繁荣时期，但也酝酿着更加尖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果然到1929—1933年，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推到崩溃的边缘。

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并不是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有问题。1920年7月6日列宁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列宁没有认为他在《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他是个彻底辩证唯物主义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根据这种新情况，列宁发展了他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他说，“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① 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② 这里列宁不再说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

① 《列宁全集》（中译本），1959年版，第26卷，第365页。

② 《列宁选集》（中译本），第3卷，第164页。

不过，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如有的人称为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时，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说，“无论美国或德国，‘经济调节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①] 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如我们在第1章第4节中所说，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所倒退，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历届共和党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潜力发展到顶点，也使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无政府状态发展到极端，酝酿成1929—1933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不能再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解决的。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出路只能是由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改变生产关系，改造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当时世界形势看，现成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像当时苏联那样，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一条是像德、意那样，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但是，如我们在第2章开始时所说，当时美国大多数人民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准备；他们既要求放弃造成大萧条的自由放任主义，又要求避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存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的原因。“新政”体现了列宁不曾见到的一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我们曾将这条规律表述如下：垄断资

---

① 《列宁全集》（中译本），1959年版，第25卷，第323—324页。

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但是，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①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界人士和学者所称道的"福利国家"道路。我们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②

按照马列主义观点，"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既然还是资本主义，它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但是，"新政"自实施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美国社会制度的特点和根基，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所发展。它不独基本克服了30年代经济危机，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所以说，它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③。这就是"新政"的根本作用。

〔"新政"的历史地位〕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

---

① 见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41页。

② 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第5章"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中曾对我们采用此术语的理由专门作过分析，请参阅。

③ 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

西斯型，即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实行积极扩张的类型；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因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日、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①]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1933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②]

一份英国报纸说：如果“新政”成功，“它将传播到每个文明国家，而且将真正出现一个新世界。如果它失败，则不仅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将完全从新开始。”[③]

到1936年，罗斯福初步总结“新政”说：“我们美国正在打一场伟大而成功的战争。这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

---

① 日本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第2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第125—129页。

② 转引自小阿瑟·施莱辛格：《动荡的政治》，第656页。

③ 转引自卡尔·德格勒编：《新政》，第24页。

景气的战争，而且更是一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我们正为挽救一种伟大而珍贵的政府形式而战；既是为我们自己，也为全世界。”[1] 1937年，他对一位德国作家说：“我的工作，正和罗马、莫斯科背道而驰。……要知道我们美国人，是较欢迎劝导而较不喜命令的”。[2]

如前所说，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3] 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4] 1935年3月至1937年10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年5月到1937年6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3月22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5卷，第236页。

② 〔德〕卢特威：《罗斯福传》（中译本），上海西风社，1941，第155页。

③ 阿朗索·L·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纽约：朗曼公司，1981，第4页。

④ 〔加〕威廉·J·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30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未发表博士论文。

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这里引起反响。……"[1] 同年，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1935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1945年7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邱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1987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2]。它的作者西奥多·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5年9月18日及10月22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训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

---

① 查尔斯·T·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论坛》杂志，第LXXXIX卷(1933)，第348页。

② 此书的日文本为两卷本，1983年出版。英文版作者未完稿即去世，由其友人赫伯特·帕辛编辑，美国自由出版社出版。

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1]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F·布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订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及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C·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1380/15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特、马丁3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主要是个‘新政’文件。在理论上讨厌‘新政’的麦克阿瑟，却赞美这个具体的文件。”[2]

科恩说，由于麦克阿瑟的大力支持[3]，由于一些负责起草该训令的人成为贯彻该训令的关键人物，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不管最后历史评价如何，对日占领在日本历史发展

---

① 西奥多·科恩：《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第4页。

② 西奥多·科恩：前引书，第48页。

③ 当然，麦克阿瑟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削弱日本的军国主义，减少甚至消除其对美国的威胁，对美国有利。

过程中，引起了或者标志着一种决定性变化。”[1] 科恩认为主要的是：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2]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1067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1942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时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斯·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2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1944年8、9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10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1067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1936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像一般地

---

① 赫伯特·帕辛：《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前言，第XV页。

② 赫伯特·帕辛：《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前言第Vi—Vii页。

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①]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惟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六、罗斯福与“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时代的要求，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产物；有不少“新政”改革并非出自总统。那么，罗斯福究竟对美国实行“新政”起过什么作用呢？美国著名史学家亨利·康马杰和理查德·莫里斯指出：“自华盛顿以来，没有哪一位总统像罗斯福那样主宰他的政府和他的时代。如果说，罗斯福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很多改进确实是他不能控制的环境迫使他作出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他也在极大程度上以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影响了这些事务。”[②] 保罗·康金甚至认为：“‘新政’是一种非常具有个人特点的事业。只是由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个性，‘新政’的各种各样互不相干的计划，才联合成为一体。”[③]

〔罗斯福早年经历与“新政”〕　罗斯福为什么能如此掌握

---

① 威廉·洛克腾堡：前引书，第208—209页。

② 见两位史学家为威廉·洛克腾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一书所写编者序，第IX页。

③ 保罗·康金：《新政》（中译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3，第1页。

他的政府与时代，使“新政”具有鲜明特点呢？这是和他童年生活和学生生活分不开的。1882年，罗斯福出生于一个17世纪40年代荷兰移民后裔的富有家庭，父方以经营工商等业、母方以航海业致富。父亲既是纽约海德公园镇大庄园的庄园主、又曾是个金融家、几个公司董事长，在煤矿和铁路方面有大量投资，还参与过几次旨在实行垄断的企业活动。他家在海德公园过着非常优裕典雅的生活，有一座大厦，有丰富的图书和乐队、有私人列车、游艇和别墅。富兰克林作为独子，童年时期无忧无虑，有保育员、家庭教师以及许多仆人和亲戚照管，不断收到礼物、玩具和玩赏动物，经常和父母到欧洲休养地旅行。他从来没有感到生活的艰难，也没有感到为了保持尊严需要费什么气力。他只是生活在宠爱之中，具有独生子女俯视群伦的神情。

但是，这也不是说富兰克林对贫困一无所知，认为人在社会中生活只应享受，没有责任。他的远祖艾萨克参加过独立战争和起草纽约第一部宪法；他的祖父是黑奴解放运动积极分子，曾以自己住宅作为“地下铁道”交通站；他的父亲年轻时是进步的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曾在欧洲参加过几次意大利争取解放和统一运动的战斗，被人看作激进分子。他现在一面经营产业，一面参加民主党地方政治，并作为长老会教区委员，为社会尽义务。总之，“他的家族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牢固传统，他的父母深感自己对不幸的人们负有义务，而且把这一种义务感深深地刻印在孩子的脑海中。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使他对下层社会产生了特殊的同情，他对造成人们贫困的非正义行为无比愤恨。”[①] 他的父母还经常以“尽责任、诚实、光明磊落”这样一些维多利亚式的

① 奥尔登·哈奇：《罗斯福外传》（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8页。

德行教导他。[1] 他们一家感觉到：足够的财富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但不是适宜的人生目标。

罗斯福的长辈们这种优裕、幸福但关心不幸人们处境的生活态度，使富兰克林难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以谋求经济权力为惟一目的、置公平厚道于不顾的种种卑劣行径。他既不理解、也讨厌那些只顾一己私利的"为富不仁者"。

1896年，他进入格罗顿学校。该校"把他在海德公园已经养成的诚实、公正和助人为乐等德行发展到顶点。"[2] 格罗顿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关心穷人。"格罗顿的校训是'为彻底的自由服务'。它表达了皮博迪博士努力向学生灌输的信条：获得受教育的优越机会同时意味着负有为祖国服务的义务，以及为不够幸运的同胞们福利服务的义务。"[3] 实现这些义务的主要途径是从政。格罗顿学校的创办，是有意模仿英国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少成为英国的首相和内阁大臣。皮博迪校长在教育学生笃信基督教、注重道德和公民义务的同时，还力劝学生从政，以便实现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格罗顿对富兰克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后来一直把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活统一起来，认为他的政治活动是实现上帝的意志。[4]

1900至1904年，富兰克林在哈佛大学只用3年便学完4年课程。但他并未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成绩平平。他十分热心

---

① 据哈奇说，他的父亲给他"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的形象。这种人追求新思想，欢迎任何美好的革新。但仍不失为一个保持旧传统的绅士。"见《罗斯福外传》，第33页。

② 保罗·康金：《新政》（中译本），第4页。

③ 奥尔登·哈奇：前引书，第24页。

④ 参阅R·G·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32—33页。

课外活动和社会工作，关心政治。校外，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波士顿城去拜访那些士绅之家，广交上流社会朋友，有时候在某个俱乐部里教穷人家孩子读书。校内，“罗斯福显然想干出个样子来。他的这种抱负，无疑主要是急于得到一般级友、特别是那些社会台柱的尊敬。大学 4 年，他参加过各种各样组织。”① 在运动方面，由于体格不行，他的最高成就只是被选为一个二流足球队队长。于是，他努力为哈佛《绯红报》工作，往往一天为它花费几小时，终于成为该报编辑，并在三年级时成为主编。

罗斯福参加过半打以上学生俱乐部。哈佛大学学生俱乐部具有很强排他性：有些高级俱乐部，不是任何人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要被邀请才能参加。富兰克林参加了高级的旗帜俱乐部，但未能进入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参加过的那个最高级俱乐部。据他的亲戚说，这是他平生最痛苦的时刻。

富兰克林所学课程，除英国和法国文学、拉丁文、美术、演讲术等外，主要为社会科学，包括 12 种历史课、美国政府、宪政政府、美国立法趋势、国际法、货币立法以及运输、金融和公司经济学。伯恩斯认为，从这个课程表来看，非常适合于把富兰克林教育成一个未来政治家，但可惜的是，这些课程的理论不联系当时实际。② 然而据特格韦尔仔细分析，富兰克林学习这些课程就是为以后从政作准备的，而且和他后来实行“新政”有关③。此外，富兰克林还协助组成一个政治俱乐部，并通过它摹拟美国政治制度的各种活动——包括初选、核心小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立法等等。在哈佛实际政治生活中，富兰克林成就

---

① 詹姆斯·伯恩斯：前引书，第 17 页。

② 詹姆斯·伯恩斯：前引书，第 19 页。在下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斯这种说法是不确的。

③ 参阅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 52—56 页。

不大，只被选为班级委员会的常任主席。

富兰克林在学生时代非常崇拜西奥多·罗斯福。但是，他虽然主张建立大海军，并试图参加美西战争，但他不赞成合并夏威夷，主张让菲律宾独立。他还支持南非布尔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并领导一个委员会，为布尔人提供救济。在内政方面，他很推崇十分关注他的西奥多。20 世纪头 10 年，美国的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弊端愈益显著。富兰克林在哈佛期间，揭发黑幕运动十分活跃，此后 6 年，改革思潮达于极盛。他在哈佛曾写文章呼吁南方大学像哈佛一样招收黑人学生，并赞扬自己祖先的民主精神，理解自己环境优越就必然会有的对社会的责无旁贷的义务。1901 年 9 月继任总统的西奥多，在此气氛中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治原则中挣脱出来，在任职 7 个月后要求解散新成立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后来还陆续提倡劳工补偿法、童工法、纯洁食物与药品法、对铁路实行更严格的国家管理、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全面的环境保护措施。富兰克林对这种被称为“公正施政”的改革十分赞赏[①]。“1907 年的一天，他告诉他在法律事务所的同伙说，他已选定了他的事业：先是在州议会占有一个席位，然后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再被选为纽约州州长——然后是总统职位。”[②] 这正是西奥多走过的道路。

1905 年，富兰克林和西奥多的侄女埃利诺·罗斯福结婚。由于这位夫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与不幸十分敏感，总是热心帮助受苦受难的人。这就更加促进了富兰克林对改革事业的热忱。

由于以上这些开明资产阶级的教养与熏陶，1910 年竞选纽约州参议员获胜后，富兰克林便不顾初出茅庐的不利条件，带头

---

① 不过，富兰克林当时对西奥多扩大总统权力感到不理解，也不同意。

② 詹姆斯·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第 25 页。

反对腐败却强有力的、控制着纽约州民主党组织的坦慕尼厅。当时国会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坦慕尼厅党阀们内定其喽啰、政治品质败坏的大亨威廉·希恩为联邦参议员，一批年轻州参议员不服，推举罗斯福为领袖，经过3个多月斗争，终于迫使坦慕尼厅改变了主意。而且，这场战斗还给当时争取直接选举参议员宪法修正案运动赋予了新的动力。与此同时，他在州议会成为纽约州北部农民代言人，并积极支持土壤保护、州政府经营电力、直接预选、人民选举参议员、妇女选举权、工人补偿金、以及确立16—21岁青工最高工时为每周54小时等进步立法。

1928年竞选纽约州州长获胜后，特别是由于大萧条的影响，如我们在第2章第1节所说，他关于内政政策的言行，日益类似于他后来实行的“新政”。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从小就是个资本主义的宠儿，相信资本主义。如他自己所说：“在美国，没有人比我更坚决相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①] 史学家评论他说，“1933年3月4日，危机是如此紧迫，国会议员和人民群众是如此惊恐，使罗斯福得以拥有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如果他怀有做皇帝的野心，国会可能让他实行专制统治。如果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可能把银行实行国有化，并把美国引上极端集权主义道路。然而，罗斯福既非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他只是个旧式的美国人——如他一次所说，只是个‘基督教徒和民主主义者’。……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值得挽救的。”[②]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5卷，第534页。

② 林克与卡顿：前引书，中册，第42页。

不过与此同时，他被培养成一个十分热心政治，积极赞成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克服其弊病，并通过抑制资本、扶助工农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民主党人。这就是必然促成他实行“新政”的生活背景。

〔*罗斯福的人品与“新政”*〕　罗斯福不仅具有实行“新政”的愿望，从人品来看，他还具有实行“新政”的优越条件。作为资本主义信徒，他虽然不能清楚认识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他看到了这种基本矛盾的后果：生产过剩和工农群众购买力不足；也看到了这种后果对资本主义的危险性。1932 年 4 月 7 日，他在竞选总统演讲中警告说，“没有一个国家有一半人破产还能维持下去。”[1] 1933 年 3 月 4 日在就职总统的演说中，他谴责并警告那些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说“他们只知道追求私利者一代的法则。他们没有远见，而没有远见的人民必将灭亡。”[2] 同时，他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危机此时已发展到仅靠市场机制不能挽救的地步，必须由国家进行积极干预。由于以上这些认识，他才积极提倡和实行“新政”以挽救资本主义。这些我们在第 2、3 两章中已一再论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应补充的是：除认识到挽救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外，罗斯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也推动他实行“新政”。他反对美国社会重视制度甚于重视人，把劳动当成货物或商品，他认为在美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群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 1 卷第 625 页，第 2 卷第 12 页。

② 同上。

众。他热爱各种类型的人。[1] 当一位经济学家建议他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对待大萧条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时，他脸色苍白，大声叫道："你要知道，人并非牲畜。"[2] 特格韦尔对他的这种思想感情概括得很好："他有一种升华为责任感的强烈人道主义心肠。那些受压迫和受苦难的人激起他的义愤，日久弥烈。这是了解他整个生活方向的重要线索。这说明他在获得权力后使用权力的作为。他总是倾向于制止邪恶、纠正不公平、帮助身处逆境的人求得解脱、并改善穷人处境。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贫穷是穷人自己的过错，失业是由于人们不愿意工作——这是自有上层阶级以来就习见的上层阶级社会哲学。罗斯福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制度决定的，人们的逆境是制度造成的。因此，他要求改革的动机日益强烈。"[3] 就因为有这种人道心肠，罗斯福虽然坚信平衡预算的所谓"健全财政"，但在出现大量失业和饥寒交迫的人群时，他仍然不顾强大政敌的反对，藐视经济规律，实行大规模赤字开支。

除实行"新政"的认识和感情外，罗斯福还具有实行"新政"的能力。实行"新政"，首先要当选公职，尤其是总统，其次要取得有关各方对自己政策的支持。从根本上说，罗斯福及其"新政"之得到支持，是由于适应时代要求，比起其他资产阶级

---

① 弗朗西斯·珀金斯：《我所认识的罗斯福》，第 71 页；莫利：《第一次"新政"》，第 7 页。即使是对于罪犯，罗斯福也很关心，在任纽约州长第一年内，"他要造就一种局面，使 94% 的定谳犯人，日后得再回到社会去，使他们变成为'正常的人类'，对于一种他们已经偿付罪责的制度，毫无怨尤。"见〔德〕卢特威：《罗斯福传》（中译本），第 95 页。罗斯福还拿出自己 2/3 的财产组建佐治亚温泉基金会（后改为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收治无依无靠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并曾一度亲自指导他们治疗。

② 参阅卡尔·德格勒编：《新政》，第 6 页。

③ 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 50—51 页。

政治人物及其政策来较有利于大多数美国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仅只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老谋深算、纵横捭阖。罗斯福在这方面也是十分出色的。“敌友双方都高度评价罗斯福的政治技巧，人们也相信他在一定程度上喜用计谋和策略。……他的属僚兴高采烈地详细描述他在政治交易和争取选票中的灵活手腕、他的竞选活动的有效性、他单刀直入地抓住问题要点的高超本领。”[①] 唐纳德·里奇伯格评论道：“有的时候，他好像是个无所畏惧而且没有污点的骑士巴雅[②]；有的时候，他会像个汲取和实行马基雅维里[③] 全部学说的王子的化身。”[④]

实行“新政”的必要条件，是国家与政府能够有效地干预经济、社会生活，这就要求加强总统的职责与权力。洛克滕堡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使现代总统职位恢复了生气。他就任总统时，总统职位已在前12年中丧失了许多威信和权力，而他则赋予它以重要性，而且远比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所赋予的多。……在罗斯福时代，白宫成为整个政府中心——思想的源泉、行动的倡议者、国家利益的代表。”[⑤] 又说，在罗斯福时代，“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联邦政府第一次成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机关。比起州和地方政府来，它更成为直接关心他们福利的政府。

---

① 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46页。参阅詹姆斯·伯恩斯：前引书，第284—287页。这里，伯恩斯综合罗斯福的政治技巧如下：紧紧掌握舆论；适时而动，适时而止；注意政治的细微末节以收买人心；注意各集团内部动向，以便与该集团内部各个派系都保持友好关系；区别对待反对派领袖及其组织与群众；向反对派的最弱点进攻，在反对派最极端与荒谬之处应战；个人魅力与政治技巧相结合。

② 法国著名骑士。

③ 全名为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所著《君主论》一书主张为了好的政治目的，如有必要，可以不择手段。

④ 见所著《我的英雄》，纽约，1954，第279页。

⑤ 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31页。

它是救济费的来源；它直接向他们收费作为养老金之用；它甚至给他们上学的儿童供应热午餐。随着国家由中立仲裁人变为‘社会福利的强有力的促进者’，人民对华盛顿事务感到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

“富兰克林·罗斯福变成了作为保护者的国家的化身。”①

联邦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评论罗斯福的这种作用时说：“他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人民的总统，因为他使人民感到：有他在白宫，总统的职位就有他们的份。共享总统职位的感觉，使那些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也有一种逼真的亲密感。”②

实行“新政”需要大胆创新，罗斯福及其政府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除前面提到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外，他们第一次顶着垄断资本的反抗规定了对华尔街的管制，他们顶着保守派和农产品加工业者的反对把巨额款项分配给数以百万计的生产主要农业品的农户，他们不顾人们嘲讽建造由两亿株树组成的防风林带，他们不理保守势力和企业界反对一次拨款50亿美元计划使500万人就业，他们帮助广大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与资方抗衡，他们打破惯例使国会在立法方面唯自己的马首是瞻，他们为全国小额银行存款保险，如此等等。如洛克滕堡所说，“如果我们确定好政府的标准不是一张完善组织系统图，而是具有创造性，那么，罗斯福就不仅是一位好行政官，而且是个足智多谋的改革者。他建立的那些新机构，使华盛顿精神振奋，这是那些因循守旧的政府各部决不能做到的。”③

实行“新政”需用新人。12年来，共和党人几乎垄断了熟

---

① 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31页。

② 威廉·O·道格拉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纽约，1948，第83页。

③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28页。

练的行政官员，而这些人的大多数，却以惊愕与怀疑的心情看待“新政”。因此，为实行“新政”，罗斯福必须任用新人建立一个完全新的政府。罗斯福对于具有献身精神与卓越才能的人们富有极强感召力。他以满怀希望的热情、昂扬斗志、强烈的使命感以及生动的实验召唤他们。“1933 年春天，华盛顿加紧了新动员的狂热步伐。从州立农学院和大学校园，从法学院和社会工作学院，青年人群集华盛顿参与这种新动员。不管他们的信仰和专长如何，他们都为政府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并且以他们有感染力的昂扬气概和献身精神，使所有的人为之感动。”[①]

罗斯福的品格中还有一点对实行“新政”十分重要，我们下面将进行集中而扼要的叙述。

〔密切联系群众〕　既然“新政”主旨在于节制垄断资本，扶助工农，经济大危机的最困难日子逐渐逝去后，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便日益背离罗斯福和“新政”。由此可见，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实行“新政”是不可想像的，而罗斯福则恰恰是个信赖群众并得到群众信赖的人。这里再谈谈他关于国家对人民责任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应向全体人民负责，特别是那些不幸的人。1931 年 8 月 28 日，他向纽约州议会特别会议说：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致不靠别人帮助连最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个文明国家都承认的，这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种社会责任。[②]

还应提到的是，他的夫人的人道主义心肠更突出。她认为行善必须言行一致，不能只说不做；她总是期待着做好事，凡是请

---

①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 63 页。

② 参阅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 1 卷，第 458—459 页。

求她帮助的，她总是有求必应。[1]

除关心人民群众外，罗斯福也十分注意联系与动员人民群众。他青少年时虽出自富豪之家，有些俯视群众的神情，但他也和海德公园的小农民、小工匠以及园丁、养马人的孩子们交游。在格罗顿和哈佛学习期间，他一面和上层阶级子女交朋友，一面坚持教穷人家孩子读书。1910 年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他租乘一辆当时还不大流行的汽车，比以往竞选者访问了多 10 倍的选民；每天演讲 20 次，与数百农民握手。成为参议员后，他在 1911 年元旦将自己新居敞开 3 小时，接见选民。1912 年再次竞选时，他因病卧床，于是请路易斯·M. 豪为他发给选区农民数千封私人信件，并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传他为选民提出的或将提出的具体法案。后来埃莉诺回忆说，罗斯福当时的兴趣是他称为的“如何了解与影响人民”的“政府科学”。

在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罗斯福和海军将领、劳工领袖、主张“建立大海军”人士、地方政客、威尔逊政府中领导人物、甚至对他的上司海军部长和威尔逊总统抱敌对态度的人，同时保持良好关系。

1921 到 1928 年因患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而在野期间，他仍然在路易斯·豪和埃莉诺的帮助下，和全国进行着广泛的政治接触和通讯联系。

1929 年任纽约州长和 1933 年任总统后，他联系群众更加密切。1931 年第 2 次州长就职典礼时，因当时群众生活困难，他把经费从 21，000 美元减为 3，000 美元。从任州长起，他就通过无线电广播直接和人民群众进行炉边谈话。他善于抓住人民群

---

① 参阅约瑟夫·P·拉希：《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纽约：W.W. 诺顿公司，1971，第 36 章：良心政治。

众极其关注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亲切的语气表达出来，造成一种特殊同情与关心，或者是一种同舟共济感，或者是联合起来支持一种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有时像个教练激励运动员，有时像个传道人进行质朴而坦率的说教，有时像个军事指挥员鼓舞疲乏的战士，他往往使那些甚至是敌对的听众产生一种共同感。

罗斯福的记者招待会，到任总统时已形成制度，每周两次，每次约120人。记者们拥挤在他的办公桌前，不打招呼就可以提问。总统只叫他们名字不道姓，和他们开玩笑。他的随和、愉快、亲切态度使记者们心醉。有的人认为，这是总统精心设计用以取得人们支持他的计划而又不引起怀疑的巧妙办法。①

"罗斯福经常举行招待会。即使你是一个每年收入只有2，600美元的青年律师，你也将被邀请到白宫去会见总统和总统夫人。她会有礼貌地把你引入群众之中，而你则在参加白宫招待会。这些招待会并非只招待地位高的人，也招待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使你感到你是招待会的组成部分。"②

他还经常接见来访群众，他说，"我经常与之谈话的人有：来讲讲他们的观点的；有掌管我国大工业和金融机构的；有代表农场主和工人的；也常有并不身居高位但来到这幢房子找我的普通公民。我经常试图看到比白宫的大门更远一些，比首都的官场更远一些，看到普通家庭男女的希望和恐惧。"③

除每天读6种以上报纸并经常阅读州、市、地方政府等送来大量情报资料外，罗斯福还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在胡佛时期，一

---

① 欧文·坎汉："民主政治的加码"，《文摘》，第CXIX卷（1935年1月5日），第6页。

② 卡蒂·洛凯姆编：前引书，第139页。

③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7卷，第247页。

个秘书便足以处理白宫收到的所有信件。在罗斯福时期，则需用一个50人组成的班子处理每周成千上万封来信，并将其中100封重要来信摘要让总统过目。他特别爱读那些工人、农民写的文字朴素的来信。

除到各地作竞选演说外，他还多次巡游全国。在这种场合，他总记得用那些戏剧性的、华丽的、引人注意的姿态或言词。他心计灵活，能够自由地运用几乎无数政治小手腕——记别人名字、回忆个人或地方历史珍闻以奉承人，诚恳地关心每个人的请求，听取、理解和赞扬人们的各种想法。

他联系的群众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他总是喜欢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各种对立论点互相交锋，看谁是谁非、谁优谁劣。[①] 他有时兼容并蓄各种观点，以便在作出决定时，让人们感到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决定。罗斯福是个能使人民群众向他吐露心事的人，也是一个能掌握人民群众心事的人。1977年3月4日，一大群过去的"新政"派聚在一起，纪念1933年3月4日罗斯福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两位罗斯福的亲密顾问——托马斯·科科伦和本杰明·科恩——作主旨发言时，中心思想就是：罗斯福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广泛联系群众，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理解群众心事，动员群众的热情与精力。[②]

下面，我们引两段文字来看看他引起的群众的热情。"罗斯福在就职的第一年间，变成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当时有数千农

---

① 比如，在30年代，罗斯福夫妇除和反苏反共的人们讨论苏联和共产主义以外，并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白宫午餐，和她通信，交换关于苏联的意见。见约瑟夫·P. 拉希：前引书，第591—592页。

② 参阅约瑟夫·P. 拉希：《实干家与梦想家：对"新政"新看法》，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88，前言第5—8页。

民到华盛顿去列队向他致敬，在他的诞辰，全国共有6，000处举行祝寿宴会，并捐集100万美元充温泉跛者的医药费。还有许多惊人的大寿糕，12英尺长4万人签名的贺电，各种荒唐怪诞的事，无不有之。"①

"1936年罗斯福在全国旅行竞选时，成千上万的男女挤到铁路线上，以一瞻总统为快。……他能听出人们喊着：'他救了我的家'，'他给了我职业'。在底特律卡迪拉克广场，欢呼声如狂，几乎无法控制。在新英格兰诸州，人们不但在城镇的街道上夹道欢迎，而且队伍一直排到了乡间。"②

七、"新政"的理论基础

战后以来，特别是到50年代，美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总统没有经济理论。研究美国改革运动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说法是较有代表性的。他说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他没有确切的纲领或基本理论，他的"新政"立法几乎全是政治压力逼出来的和即兴之作③。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弗朗西丝·珀金斯也相信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甚少，没有读很多经济学著作。④ 到70年代，仍有些史学家认为罗斯福"较喜欢满足于常识和直接任务"，"无力更深入地探索并提出少数基本问题"，"不能形成一种连贯而可行的政治经济哲学"⑤。

---

① 〔德〕卢特威：前引书，第166页。

②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193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美国的政治传统和形成这种传统的人们》，纽约1948年版，1954年重印，第12章。

④ 珀金斯：《我所知道的罗斯福》，第34页。

⑤ 保罗·康金：《新政》（中译本），第7页。

〔罗斯福自己的“新政”理论〕　　根据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对罗斯福经济思想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得出这些结论，是由于没有研究过罗斯福图书馆中大量的通信及其他文件、罗斯福的丰富藏书和他的一些最亲密顾问提供的证言的原故。他指出：“仔细考察一下罗斯福所受教育，他的信件、演说及其他文件，可以看出，他具有的经济思想与知识，是与历史学家们一般看法颇不相同的。”[①] 富斯菲尔德从罗斯福图书馆找到一本罗斯福进格罗顿学校那年——1896 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这个课程的学习，除教师讲授外，还注重讨论，而且是从讨论当时“银与金的比较”这一重大经济问题开始的。[②] 第二次讨论的是资本问题，几乎涉及到当时正统经济学中所有基本概念，也是结合当时经济问题，特别是当时的经济危机进行的。课程结束时，讨论的是广大群众关心、两大党激烈争论的关税问题。这是罗斯福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开始；所学内容主要来源于戴维·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等著名经济学家。

在哈佛大学二年级时，罗斯福又学习了经济学概论一课。第一学期主要学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并辅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哈德利当时的修正观点。第二学期学的是国际贸易与关税、银行、托拉斯、劳工与社会保险等 4 方面的问题。他的教师 A·P.安德鲁讲的是正统经济学，但具有改革思想。在哈佛最后一年，他选修 4 门经济学课程：运输经济学、公司经济学、银行与主要银行制度史、货币：近代货币立法、经验与理论概述；还学了一

---

① 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与“新政”起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绪言，第 4 页。

② 1896 年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赖恩主张自由铸造银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利赞成金本位制，反对自由铸造银币。

门与经济学有关的历史课，即著名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美国史：西部的发展。据富斯菲尔德研究，罗斯福对这些课程学习的心得如何不清楚，但他在4年级时选修这些与当时经济问题紧密联系的课程，是值得重视的。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主张改革的；他们都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但也不主张政府干预过多。他们主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弊病，就由政府出面管理。在"自由放任国家"、"管理国家"和"福利国家"间，他们是主张"管理国家"的。特格韦尔相信，罗斯福毕生的奉献，是在哈佛大学奠基的。[1]

哈佛毕业后，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所学课程，如美国宪法、比较宪法、公用事业法以及关于公司、市政公司等课程，继续充实着他的经济知识，发展着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如何逐渐加强政府管理经济以进行改革的思想。

除结合实际学习书本知识外，罗斯福更重视在实际工作中结合书本知识发展自己的经济思想。"当他不得不处理某一具体经济问题时，他广泛阅读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种书籍和期刊，并与这一领域专家进行讨论"[2]。比如，1929至1932年他任纽约州长时，为了克服大萧条，他阅读大量群众来信中的建议，如归土运动、缩短工时运动、规定一家人只能有一份工作的建议、运用丰富的木材制作家具的建议，等等。他浏览或阅读的著作，可考的有：乔治·佩什的《复兴之道》；阿瑟·索尔特的《复兴：第二次努力》；诺曼·隆巴德的"失业、企业萧条与货币、信贷间的关系"；欧文·费希尔的《繁荣与萧条》；乔治·沃伦和弗兰克·A.皮尔逊两教授在《农业经济》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和《价格》一

---

① 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52页。
② D·R·富斯菲尔德：前引书，绪言，第4页。

书。他除留心各公私团体和个人提出的克服萧条的方案和建议（比如“为了国家委员会”的建议和大企业家杰拉尔德·斯沃普的建议）外，还自己组织稳定工业委员会和召开州长会议，研究克服萧条的办法。

又比如，在1932年竞选总统时，他为了说明胡佛政府对大萧条应负的责任，分析大萧条的原因，并提出克服大萧条的纲领，他和他的智囊团参考了1，000多种书籍，和各方面人士反复研究了当时各种主要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在研究过程中，罗斯福表现出具有丰富的实际知识与书本知识，始终指导着研究的方向。[1]

富斯菲尔德根据自己研究断言：罗斯福“关于基本经济问题的观点是很清楚的，特别是在劳工、大企业、福利立法、环境保护、动力、地区规划等方面。……纪录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具有发展程度很高的基本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来源于进步主义，是他的政治纲领的基础。纪录也表明：为了达到目标，他很愿意推迟行动、变通立场、实行调和。但是，目标总在望，而且罗斯福对这些目标是了然于怀的。”[2] 威廉·洛克滕堡也认为：“到罗斯福就任总统时，他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发展了、或者说熟悉了一套理论，比一般认为的更有系统、更有条理得多。”[3]

那么，这种理论是怎样的呢？弗雷德尔认为最能清楚而正确地说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思想的，是他1932年12月10日在《自由》杂志上发表的“释‘新政’”中的一段话：

“代表着各种人口与利益的美国经济生活，可以通过华盛顿

---

① 请参阅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前引书，第15章：智囊团。

② 丹尼尔·富斯菲尔德：前引书，绪言，第4—5页。

③ 威廉·洛克滕堡：前引书，第33页。

政府英明、公平而适中的全国性领导，达到和谐之境。在美国生活中，曾经有的政府只代表这个巨大利益联合的一部分，而且不幸的是，有时只代表一种非常特殊而狭隘的利益。最近一次选举的特点清楚表明，我所受委托真正是全国范围的。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劳动与工业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得到好处；不同时让劳工享受更多合法的繁荣成果，资本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任何一种被忽视的集团，不管是农业的、工业的、矿业的、商业的或者金融的，都可以感染整个国家的生活，并产生广泛的苦难。我的政府将致力于：使当代美国生活这一重大中心事实、亦即这个大国所有派、系、利益集团的相互依赖，具有实际力量和立法形式。我相信一种更高形态的保护；它力求给人民群众提供工作与经济安全，以便他们自由地生活并丰富个人经历，而又不伤害其同胞。”

富斯菲尔德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将罗斯福的经济理论概括为：“私营企业——个人利润经济不应消灭，应当保留。可是，这种经济的营运，并不总是有利于、并不总是促进普遍福利。因此，只要是必要，这种营运就必须由各州和联邦政府作出努力，加以改进和补充。”[①]

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至少是早期“新政”的理论基础。

虽然如埃里克·戈德曼所说，罗斯福入主白宫时的思想，大体上是前半世纪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和20年代同业

① 丹尼尔·富斯菲尔德：前引书，第251页。详细论述见该书第17章。

公会活动思想组成的综合体，[1] 但由于这种思想的形成经过长期酝酿，导源于他的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兼收并蓄着建国以来、特别是19世纪后期平民党运动以来许多政治人物和学者的思想成分，吸收了以进步运动为主的各种改革运动以及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验，尤其是深深渗透着他的时代的舆论气候的影响，包罗万象，因而不大可能把它和某一特定学术体系紧密联系起来，这大约就是许多人认为他没有经济理论的原因。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 既然罗斯福有自己的“新政”理论，为什么有许多学者认为“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呢？这是因为，作为对付垄断资本主义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美国人称为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的各种措施中，最能显出直接效果的，是通过政府的赤字财政以促进就业、加强救济、扩大有效需求，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摆脱大萧条困境。“罗斯福经济理论最强有力部分是关于长期改革的，尤其是福利立法和土地利用规划；而其最薄弱部分，则是对于应付萧条带来的危急情况的政策的探索……

“在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中，的确有全面克服萧条的思想的胚芽，这就是他的萧条源于消费不足的理论。他认为提高农民购买力，并给失业者提供较有效的救济体制，是增加消费者购买力的办法。如果他把这种消费不足理论发展下去，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提倡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但他没有这样做。”[2] 再加上他相信平衡预算的“健全财政”，所以他从来不主张赤字开支。

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提倡通过政府赤字

---

① 埃里克·F. 戈德：《应运而兴：现代美国改革史》，纽约：A.A. 克诺普夫公司，1962，第254页。

② 富斯菲尔德：前引书，第254页。

财政创造有效需求的政策的，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理论最有系统、最有说服力。因此，有些只看到表面现象、对两者关系未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便认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这种说法不确。因为罗斯福虽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要说是有理论指导，那就是他的“现代文明国家政府有责任对不幸者提供援助”的论点，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即使为克服1937—1938年经济衰退，为阻止民主党在1938年中期选举中的声望下降，他恢复了1937年初中止的赤字开支，但这种赤字开支也没有达到凯恩斯主义要求的那种大规模。实际情况是：“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两者也相互影响。”①

前面已经论述过罗斯福“新政”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产物，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向“福利国家”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这里不再重复。

那么，凯恩斯主义呢？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占优势地位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为代表的，它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② 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说以及据此制定的经济对策，应付30年代以前的经济危机，尚可勉为其难，但应付30年代这一次空前严重经

---

① 刘绪贻：“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载《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第73页。详细论述请参阅该文。

② 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第211页。

济危机，就完全无能为力。1929至1933年初美国胡佛政府应付经济危机理论和对策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产生于英国，但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在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一种思潮。这种思潮之所以获得凯恩斯主义的名称，乃是因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有效需求"的理论，对"福利国家"型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进行了最为系统而有力的论证。这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是当时同类经济理论的典型。

罗斯福早期智囊团成员特格韦尔对"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关系的分析，是较有见地的。他说，"为什么凯恩斯理论与富兰克林政策之间在学者们看起来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从这方面说，他们都是异端、先锋。他们的思想来自对一些特殊问题的研究，而这些特殊问题，乃是在已经过时的思潮之中达到技术上成熟的工商业体制引起的。……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读过原著，但他对这些变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和智囊团对萧条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强了。"[1] 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新政'的社会经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同凯恩斯的药方不谋而合。"[2] 中外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除为同一历史社会背景产物外，根据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还互相影响。1929年以来，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1932年，他在《大西洋》杂志5月号上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

---

① 特格韦尔：《民主主义者罗斯福》，第385页。

② 西瓦切夫、亚济科夫：《美国现代史》，（中译本），第114页。

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只要强调紧缩与节约的气氛不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凯恩斯又在《繁荣之道》中更加有力地详细论证运用政府开支以摆脱萧条的道理，说明用于公共工程的赤字开支每直接雇用一人，便可间接雇用两人。他还批驳罗斯福主张的预算平衡政策，鼓吹减税。1933年7月3日罗斯福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电报，大大鼓舞了凯恩斯。因这次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罗斯福事前曾对此作出含糊保证，而凯恩斯则是反对的。他在1931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总统恢复金本位制的活动，1933年又在《耶鲁评论》6月号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已于4月18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与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他和智囊团都认为大萧条原因在国内，不能通过稳定汇率来摆脱萧条，所以和凯恩斯一样，不同意伦敦会议的主旨。6月12日会议开始一星期后，他越过不理解他此时意图的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派雷蒙德·莫利前往伦敦，并同意莫利到伦敦后往见凯恩斯，[1] 以便就美国政府货币政策思想教育美国代表团。由于莫利也未能完全按照他的政策思想行事，罗斯福于7月3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制，要求美元贬值。一时之间，各国代表和舆论界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而凯恩斯则在《每日邮件》报上写文章，盛赞"罗斯福总统做得极其正确"。同时，他

---

① 莫利说他读过凯恩斯的许多著作，并把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最后一章推荐给别人看，见所著：《第一次"新政"》，第487页。

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拟了一份提纲，并和莫利、沃尔特·李普曼[①]等人一道，据此提纲起草了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的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

如果我们了解放弃金本位以便政府调整和管理货币是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研究“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关系时，就不能无视这件事的意义。

9月间，凯恩斯和当时在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罗斯福重要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来往频繁，后者改变了他平衡预算的意见，相信了凯恩斯的补充性财政政策，并于12月将凯恩斯定于年底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致罗斯福公开信事前寄给总统。这封信指出：“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②]

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带着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信到白宫会见罗斯福，冀图说服他放手实行赤字开支，但根据各种材料，这次会见并不成功。不过，经特格韦尔周旋，凯恩斯拜访了一些较年轻人物，告诉他们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进萧条深渊；3亿美元赤字将使萧条维持在现有水平；4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写的“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章说，最大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

---

① 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他于6月23日到伦敦采访，24日会见凯恩斯，两人共进午餐。凯恩斯说工业化国家应放弃金本位制，将通货贬值1/3，以提高物价，刺激投资。李普曼曾将此论点作为6月29日专栏文章重点。凯恩斯还向李普曼详细阐述了他后来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主要论点。从此，李普曼就放弃了他原来坚持的平衡预算的意见。

② 这封信还批评了总统购买黄金的政策。1934年初，罗斯福停止购买黄金。这两件事有否因果关系，未见证据。

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至4倍。

此后，舆论界迅即将1934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但小施莱辛格认为："无疑凯恩斯加强了总统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意向，无疑他告诉了政府中较低级年轻官员们如何将一种权宜之计转变为政策的途径，但是，不能说没有凯恩斯的干预，罗斯福政府就不会增加开支；也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1] 不过，有一件事是应当一提的。1934年11月，罗斯福任命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任。他虽未读凯恩斯著作，但有与凯恩斯类似思想。1935年2月，由他主持制定的银行法提交国会。此法目的在于将控制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力进一步从纽约银行家手中夺交联邦政府，以便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联邦储备体系控制金融机制。此法不独反映埃克尔斯的思想，也反映他的主要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的思想；而柯里则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信徒。所以反对此法的前财政部顾问詹姆斯·沃伯格斥此法为"柯里式的凯恩斯法"、"加了大量劳克林·柯里教授制作的酱油的一大块夹生凯恩斯面团。"此法后来虽经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修订，但主旨仍保留下来，并于1935年5月成为第二次百日"新政"的主要立法之一。

由上所述，足见即使在1936年以前，我们也不能说凯恩斯主义对"新政"没有影响。反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与"新政"有关。美国6位著名史学家在其书中说：在"新政"第二阶段，"通过运用联邦预算来复兴经济的新理论开始在政府内冒头。这种新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将埃克尔斯

---

① 见所著：《动荡的政治》，第408页。

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1]

珀金斯说，“1937年，当我们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指凯恩斯〕预言我们将又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2] 1937年秋，美国经济衰退日甚，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5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埃克尔斯·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准备提出现有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现在，他们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作为武器，有了新的信心和团结。”[3] 这“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挥霍派（亦译开支派或花钱派）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

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从英国寄来长信，力劝罗斯福实行大量赤字开支。此时，“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强，罗斯福只好屈从。4月……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5] 虽然这种开支还未达到凯恩斯主义要求的水平，但到6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

综上所述，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相互影响的说法，看来是可以成立的。

---

① 以上两段引文，见约翰·布卢姆等：《美国经历》，第402、403页。

② 见所著：《我所认识的罗斯福》，第225页。

③ 埃利斯·霍利：“新政与企业”，载约翰·布雷曼等编：前引书，第72—73页。

④ 约翰·布卢姆等：前引书，第403页。

⑤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第235页。

第六章

萧条时期的美国外交：胡佛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它们共同宰割战败国、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调整彼此间利害关系的体系。它不仅包含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包含着帝国主义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战胜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因此，它是一种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是极不稳定的。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地位最具优势，举足轻重。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也大大加深了上述各种矛盾和斗争。1929至1933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就是在国内矛盾的影响下，在上述各种国际矛盾和斗争中纵横捭阖，力图保住和扩大自己根据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以克服国内危机，争夺世界霸权。罗斯福政府和胡佛政府外交虽然有所不同，有时还显著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罗斯福政府较有远见，较注意垄断资本的长远利益。它们都和其他帝国主义一道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或彻底的民族解放

运动。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它们有时也和英、法等国合作以对付共同竞争者，但主要是抑制这些战胜国以夺取更多的原料产地、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为上述两种目的，它们都纵容、有时甚至扶持德、日、意法西斯主义，亦即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日益引起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活动，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渐解体，最后彻底破产，使人类又遭到一次浩劫。

在这一章中，我们先论述胡佛政府的外交。

上面我们已经勾画出萧条年代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轮廓。但是，如埃利奥特·罗森所分析，由于胡佛不顾时代潮流的变化，坚持 1922 年他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小册子中论述的个人主义思想、亦即“用某些文明规则改良了的 19 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他过分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只是为了追求美国利益才参与世界事务，却不愿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由于他认为只有美国的社会制度最好，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失败得很惨的社会主义癌症”，应予以抵制，欧洲的社会制度也毛病不少，容易引起动乱，不应卷入它们的纠纷，[①] 这样，胡佛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无视大萧条引起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包含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急剧尖锐化；不是在缓解、而是在促进这些矛盾和斗争。其结果，这种政策不独无助于、而且强化了国内萧条，也加速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瓦解。

一、顽固反对苏联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苏联的生产

---

① 参阅埃利奥特·罗森：前引书，第 42—48 页。

增加了67%，靠工资生活的人数从1，150万增至2，280万，工资增加了一倍，失业已完全消灭。”① “1929年至1932年，苏联的进口增加了26%。”② 如果和苏联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增加贸易往来，无疑有助于缓解美国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胡佛顽固反对苏联。1931年8月，他在会见《旧金山新闻报》记者时甚至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苏联。③

〔继续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 苏联建国后，直到胡佛政府，美国一直未予承认。1929年4月，亨利·史汀生国务卿在答复一位苏联副主席的信中宣布：“本政府不承认俄国现存制度的政策不会改变。”④ 1930年4月，纽约一位银行家通知胡佛，苏联领导欢迎同总统进行小范围会晤。胡佛冷冷地回答道：“目前还没有任何可能改变我们的政策。”⑤ 1931年3月，当国务院中有人希望和苏联改善关系时，胡佛立即告诉国务院通电所有美国驻外使馆：“本政府改变态度承认俄国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⑥ 1932年准备大选期间，国会中有人提出承认苏联的问题，史汀生代表国务院出来澄清。他断然否认要同苏联建交的说法。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继续同俄国前临时政府的外交官乌格特保持官方联系。他的“俄国大使馆”继续受到国务院青睐。他

---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第295页。

② 〔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上卷，第299页。

③ 威廉·A·威廉斯：《美俄关系（1781—1947)》，纽约1952年版，第225页。报上刊出胡佛这一狂言后，许多人要求白宫核实。总统秘书曾出面说总统似未说过此话，但胡佛自己并未澄清，许多史学家认为是可靠的。

④ 转引自武汉大学未发表的张大化的硕士论文《从不承认到建交—论1917—1933年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第30页。

⑤ 罗伯特·P·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纽约1953年版，第7页。

⑥ 转引自前引张大化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第30页。

每年夏天前往巴黎参加所谓“俄国大使会议”。国务院对他每次行程都正式迎送。国务院串演的这场滑稽戏直到美苏建交才结束。

〔发起反苏运动〕　除拒绝承认苏联外，胡佛政府还纵容甚至操纵国内反共势力发起反苏运动。1929年初，苏联国内开展了一些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个别地方青年人采取过某些偏激行动。1930年2月，罗马教皇公开号召进行“十字军远征”，得到美国教会的积极响应，并在美国掀起2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苏运动。全美各地举行各种大型集会、反苏祈祷和示威游行，抗议“俄国宗教迫害”。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反苏文章，有些国会议员也积极参与，叫嚷联合所有文明国家敦促苏俄政府停止宗教迫害。国会还通过决议，要求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活动。

教会反苏运动之后，紧接着又兴起反对所谓“苏联商品倾销运动”。1930年12月胡佛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声称：所有的祸根都源于苏联的贸易方式，说这种方式将从饥饿的老百姓那里搜括来的农产品向世界市场倾销，旨在延长经济危机；并建议对苏联商品实行制裁。财政部长梅隆指责苏联以低于成本价格在美国市场出售火柴，以损害美国火柴业。农业部长在向报界发表谈话时煽动农民：正是苏联小麦倾销应对他们贫困负责。美国劳联领导也煽动美国工人，说苏联的劳改营占去了10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配合这些反苏宣传，胡佛政府对苏联许多商品规定了所谓“反倾销”特别关税。1930年7月，美国政府以所谓“犯人劳动”为借口，禁止苏联木材输入美国。同年11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禁止“使用犯人劳动”和“强制劳动”生产的商品输入美国的法令。美国政府还对苏联商品采取许多其他限制和歧视，如提高苏联船只的人港税，对苏联进口食品进行特别卫生检查，等

等。

实际上，如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P·布劳德所说，并不存在任何“苏联倾销”，关于倾销说法是从那些产品和苏联产品竞争的制造商那里引起的。[1] 比如，1932年2月，在仔细审理了美国制锰业协会的起诉后，梅隆宣布：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锰矿石在美国倾销的判决是没有根据的。美国海关法庭也驳回了关于苏联火柴以低于成本价格在美国倾销的起诉。

然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反倾销”运动最后也害了美国。“1932年苏联由美国的进口与1930年相比，减少了7/8。”反之，“在苏联进口中，〔美国潜在的敌手〕德国所占的份额从1930年的23.7%，增加到1931年的37.2%和1932年的46.5%”[2]，占了苏联进口额的第一位。

胡佛政府时期的另一次反苏事件是所谓惠伦揭发案。1930年5月，新闻界公布了纽约市警察局长格罗弗·惠伦轰动一时的年初揭发材料，证明苏联政府向美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并直接操纵美共企图颠覆美国政府。虽然这些揭发材料很快被揭穿是伪造的，但国会还是立即授权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组织一个调查共产党活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7个月调查后，在1931年1月向国会所作报告中，虽然充满反苏言论，但仍不得不承认：所有材料不足证明惠伦文件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美共领取苏联津贴以及苏联设在美国的苏美贸易公司与阴谋破坏活动有关。尽管如此，胡佛政府还是采纳了菲什委员会的一些建议，如对苏联公民前往美国实行更多的限制、禁止发给与国际共运有关人士前往美国签证等。

---

① R.P.布劳德：前引书，第89页。

②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苏〕安·安·葛罗米柯等主编：前引书，第307页。

在这种反苏气氛中，美国还有些军人叫嚷：准备和苏联狂热分子一战；在未来战争中，美国确切的敌人是苏联，等等。[①]

除在国内掀起反苏活动外，胡佛政府还在国际上发动反苏攻势。1929年7月，中苏因中东铁路发生纠纷时，国务卿史汀生企图纠集英、法、日等国建立国际调解委员会进行干预，[②] 国务院内还酝酿将中东铁路交"中立"国代表管理。[③] 1930年，胡佛政府积极破坏墨西哥与苏联的关系。是年1月，墨西哥新任总统帕斯库亚尔·奥尔蒂斯·鲁维奥访美，受到美国压力，回国以后，便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攻击苏联在墨西哥组织颠覆活动。此外，美国还配合以法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计划。1930年5月，美国的一个航空大队在希腊机场举行特别演习后，飞往罗马尼亚与苏联接壤的康斯坦察，在那里驻扎了一个时期。同年秋，美国派3艘战列舰到波罗的海，并处于一级战备状态。7月6日，战列舰驶入德国基尔港，接着，其中两艘开往波兰的但泽港停泊。1932年秋，以美国总参谋长麦克阿瑟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一系列苏联的欧亚邻邦：波兰、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麦克阿瑟多次到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视察那里的军事设施，观看军事演习。这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对欧政策

胡佛政府对欧洲政策的总目标是：维持和扩大其在凡尔赛—

---

① 见前引张大化未发表的硕士论文：《从不承认到建交》，第35页。

② 罗伯特·菲雷尔：《大萧条中美国外交》，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53页。

③ 威廉·威廉斯：前引书，第221页。

华盛顿体系中的经济优势和军事优越地位，争夺世界霸权。为此，它扶植德国，抑制共产主义运动，削弱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并遏制法国，不让其在欧洲称霸。

〔力争美英海军地位平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美英矛盾日益尖锐。在经济上，美国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到大萧条以前，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几达260亿美元（其中私人投资为150亿），盟国欠美国战债超过100亿美元，外贸年年顺差。英国已落在后面。但在军事上，美国并未超过英国。比如，根据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美国只在主力舰与航空母舰方面取得与英国的同等地位，在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方面，英国仍占优势。对此，美国是不甘心的。胡佛前任柯立芝总统早就表示过，要保证美国有权建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胡佛政府上台后，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压力，它不得不打着扩大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亦称巴黎公约）影响的幌子，致力于进一步限制海军。实际上，它是想利用此机会取得美国海军完全与英国海军同等地位，并在以后逐渐超过英国海军。1929年经过反复磋商后，10月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拉皮丹河畔，由胡佛与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谈判。作为清除英美间危险性摩擦的代价，首相同意了美国海军取得与英国海军同等地位的建议。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日、法、意诸国代表会晤，形式上是制订限制建造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及其他轻型舰只的协议，实际上是各自为谋。讨价还价结果，签订了伦敦条约，规定1936年底以前，建成的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的总吨位，英国应为541，700吨，美国应为525，700吨。这样，英国在巡洋舰、驱逐舰、潜艇方面的对美优势，基本上已经结束。条约还规定，如果有未参加该约的任何国家有实施造舰计划可能时，该约各签

字国可解除所承担的义务。这当然对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更为有利。

〔有意修改凡尔赛条约以绥靖德国，加深了法美矛盾〕在这次会议上，法国代表鉴于法、意关系尖锐化和德国复仇主义高涨，坚决要求就法国在欧洲安全加以补充保障，否则将拒绝就伦敦条约主要条款签字。但是，史汀生宣称：美国不能承担使用本国武力反对侵略者的道义责任，胡佛也反对使美国与任何安全保障协定有所牵连。这样，美法矛盾也逐渐加深。

1931年10月22日，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访问美国，力图缓和法、美矛盾，并就下一年的世界裁军会议与美国交换意见。他到达美国后，不独发现说服胡佛总统参加协商公约、确认法国在欧洲方面的安全保障不可能，而且了解到史汀生国务卿认为，下一年的裁军会议应有比裁军更重要的任务，即谋求欧洲和平；而要取得欧洲和平，就必须解决各国间、尤其是法、德间的根本问题。这样，就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在波兰走廊及其他问题上对德国作出让步。而这，恰恰是不利于他访美的主要目的——谋求法国的安全保障——的。

紧接赖伐尔之后，意大利外交部长迪诺·格兰迪伯爵也到美国访问。胡佛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利用格兰迪作为法国人陪衬。根据史汀生记载：在与格兰迪谈话时，“总统……概括了一般美国人的态度。150年来，我们置身于欧洲之外；后来在1917年被拖入一场大战。我们在战争中花掉40亿美元，战后又贷出10亿美元。现在，我们每年为残废军人耗资10亿美元。可是，欧洲目前情况比战前更糟。他说，这使普通美国人对欧洲和欧洲事务感到失望，他们现在只是希望不要再卷入其中。这是美国公众的

一般态度；他看不出美国怎样能发挥领导作用。”[①]

1932年2月2日，世界裁军会议在日本进攻上海声中于日内瓦开幕。法国首先提出的计划强调安全保障，主张各国军备维持现状，并要求建立一支由国联行政院指挥的常设国际警察部队，对破坏国联盟约的国家进行制裁。美国随后提出的限制军备的九点计划，却完全没有涉及欧陆的安全保障问题。这样，会议迅速陷入僵局：法国要求通过安全保障达到裁军目的，美国则要求通过裁军以达到安全的目的。4月中，史汀生前来日内瓦，他告诉法国代表，美国已限制海军，裁减陆军，空军到不了欧洲；关于保障法国安全问题，美国爱莫能助，法国应与英国协商。但英国代表约翰·西蒙坦率表明：英国将不会再承诺给予法国以武装援助，因为英国舆论对此不会支持。这样，英法间也形成僵局。于是，史汀生再往见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后者说美国代表休·吉布森在会议上一次演说中，忘记了海、陆、空三军的相互依存性（其意为：除非英、美限制海军，法国才限制陆军）。史汀生指出，海军强国已在10年前华盛顿会议上限制了它们的海军。“而且，鉴于目前远东的形势以及我们对这种形势的关联，这不是我们进一步限制海军的时候……”。[②] 就这样，裁军会议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当德国代表团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时，美国代表团却表示支持。1932年12月11日，美、英、法、德、意5国承认德国及其他根据凡尔赛条约被解除武装的国家有军备平等的权利。德国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公开走上了军备竞赛的道路。

---

① 史汀生关于胡佛与格兰迪谈话备忘录，1931年11月18日史汀生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② 1932年4月21日史汀生日记。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其缩微胶卷。

〔力图保持和扩大美国经济优势及其后果〕　　除拒绝裁减海军外，胡佛政府还力图保持经济优势。但是，凡尔赛体系确定的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中的固有矛盾，到大萧条期间愈益突出。道斯计划实施不久，德国便借口经济困难，要求修改，重新确定赔款总额与期限，并要求取消外国对德国财政监督。在美国支持下，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欧文·扬为首的审议道斯计划专家委员会于1929年2月召开，参加的有美、英、法、日、意、比、德等国代表。6月间通过的扬计划确定：将德国赔款总额削减约14%，连本带息总数为1，139亿马克（合268亿美元），在59年内付清；由美、英、法、意、比5国共同建立一国际清算银行，负责将德国赔款及时转划给美国，以偿付英、法等国所欠美国战债。

扬计划还取消了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监督，并规定1930年6月以前协约国从莱茵区撤退占领军。

"但是，这种和解的经济基础，像它的政治基础一样，具有结构上的缺陷。德国赔款与协约国战债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其支付体系完全依赖于源源不断的美元外流。美国的贷款人借钱给德国政府，德国政府以之付英、法等国赔款，英、法等国政府付战债。在此过程中，虽然某些美国债权人从他们带息的德国债券得到利润，但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公民间接为向自己国家支付战债提供资金。"① 如果美国私人停止向德国政府贷款，这个支付体系就会动摇。

如本书第1章第4节所说，胡佛政府对付大萧条政策之一，是在1930年大大提高关税。这种政策不独导致关税战，减少美

---

① 阿诺德·奥夫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17—1941年美国外交政策与世界政治》，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6，第66页。

国和欧洲国家出口，也降低美国私人资本向德国的输出量，还使大西洋两岸银行家迅速收回短期贷款。这当然会削弱赔款与战债机制的运转。1931 年夏的欧洲金融危机（见第 1 章第 2 节），又使德国黄金储备锐减 4/5，整个信用体系濒于崩溃边缘。

1931 年 6 月，德国宣布无力偿付赔款，要求延期。英国也要求美国削减战债并延期偿付。6 月 20—21 日，胡佛总统提出所有赔款与战债延期偿付 1 年的建议。8 月，美、英、法、比、意、日、德 7 国正式达成协议。由于企图利用延期偿付之机彻底解决赔款问题，德国政府于 1932 年 1 月宣布：因为经济困难，今后不再偿付赔款。6 月 16 日，英、法、意、比、德 5 国代表在洛桑召开研究赔款问题的国际会议。英国主张战债和赔款一并取消，法国主张只取消战债。7 月 9 日签订协议，规定德国一次交付 30 亿金马克，作为免除其赔款任务的补偿。但后来德国并未交付此款。洛桑会议后，英、法达成口头协议：既然两国放弃赔款要求，美国也应放弃战债要求，胡佛政府坚决反对。但事实上，法国于 1932 年 10 月停止偿付战债，英国于 1933 年以后步其后尘。继英、法之后，除芬兰外，其他国家也都停止偿付战债。凡尔赛和约关于战债和赔款的规定，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处理赔款与战债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与德国的特殊关系。开始，德国政府官员认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赔款不合法，甚至不愿征税支付赔款，只依靠借外债，而且所借外债往往大大超过赔款需要，并用剩余外债更新本国装备，提高生产力，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垄断资本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向德国进行经济渗透。到 1929 年，美国资本占德国外债总额的 70%。“在危机的时期里，美国垄断资本与德国工业巨头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希特勒执政前，美国贷给德国银行和企业公司的贷款在 22 亿美元以上。……美国垄断资本家

还对德国给以直接的军事一技术援助。早在希特勒执政之前，美国就向德国空军提供飞机的发动机了。”[①]

大萧条期间，德国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加深了萧条的严重程度，致使人民群众中不满情绪普遍增长。为此，他在外交上力图摆脱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束缚，以求得人民群众谅解。这样，他就大大鼓励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前译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党），使它在1930年9月国会选举中，从1928年的28席增为107席。与此同时，共产党也由53席增为77席。在此情形下，害怕共产主义革命、害怕失去其在德国经济利益的美国垄断资本，便进一步扶持希特勒的反动势力。“1930年秋，美国金融公司的代表极力设法使德国总理布吕宁让纳粹党人参加政府。”[②] 美国统治集团也日益以同情态度对待德国复仇主义分子。1932年11月，美国驻柏林大使写信给国务院领导人说：“德国共产党员的数目增加得这么厉害，因此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了，即此刻有一个多少带点军事性质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是多么重要。”[③] “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持人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主张对凡尔赛体系作有利于德国复仇主义分子的修订，不但在东部疆界的问题上是如此，在德国重整军备方面亦复如此。”[④]这种态度，无疑对后来德国公开废止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重整军备起了重要作用。

---

①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243—244页。

②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前引书，第244页、第246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汇编（1932）》，华盛顿，1947，第2卷，第318页。

④ 同注②

三、对中国和日本政策

胡佛政府上台时，西太平洋的形势是：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力图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紧侵略中国，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继续发展；苏联在远东势力增强；英国力图利用日美矛盾保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在这种形势下，胡佛政府的远东政策是：继续收买和控制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革命运动，扩大其在华利益；一面纵容日本侵华反苏，一面尽力拉拢英、法，与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

〔收买和控制蒋政权以扩大在华利益〕　1927年，蒋介石在美、日等国怂恿与威胁下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同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积极投靠美国。1928年3月，美国率先承认南京政府，并于7月25日与之订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还敦促其他列强就治外法权问题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以提高蒋政权在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作为回报，蒋政权除积极反共反苏外，还授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1929年2月，任命美国人E.W.凯默勒为财政部设计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币制专员，参与南京政府财政事务。同年5月，又任命一位美国人（满台尔）为铁路顾问，参与铁路管理。1930年7月9日，美蒋缔结中美合办中国航空公司合同，使美国获得上海—重庆、南京—北京和上海—广州3条航线的权利。

为利用蒋政权在整个中国与其他列强竞争方面取得优势，美国还支持蒋政权打败其他列强在中国代理人汪精卫、阎锡山等，并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美其名曰帮助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九一八事变初期的对日姑息〕　1931 年，早就妄想吞并满蒙、进而占领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在我国东北面临民族资本日益增长、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美国积极渗透；在远东面临苏联势力日益增强局面，① 悍然置华盛顿体系和巴黎公约于不顾，于 9 月 18 日借故发动不宣而战的对华侵略战争。在蒋政权不抵抗政策下，短短 3 个月里占领东北全境，造成震撼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美国虽然不愿放弃在华传统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但它当时外交活动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一是严重经济危机束缚胡佛政府手脚，使它难于抽出足够时间与精力应付远东危机；二是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盛行，政界中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东北确有“特殊利益”，不便干预过多；三是美国在我国东北直接利益不大，美国与日本贸易额却不小，犯不着太与日本为难；四是美国海军较日本的处于劣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进行武力干涉；五是美国许多官员认为，日本政府（特别是外务省）与日本军部对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政策，存在着巨大分歧（即侧重经济侵略的币原外相的“和解”外交和侧重政治军事压力的田中义一的“积极”外交之间的分歧），可以利用；六是是否要拉拢英国并与英法为首的国际联盟合作。②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九一八”事变初期，美国“劝中国政

---

① 参阅〔苏〕B. 柯瓦林著：《帝国主义在满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第三时期第 6—8 节和第四时期第 1—2 节。

② 详见高二音：“‘门户开放主义’与‘大陆政策’——围绕‘九一八’事变的美国外交”，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第 258—263 页。

府采取妥协步调"[1]，不给日本民族主义煽动者以可乘之机，俾币原外相有可能实行“和解”外交。为此，国务卿史汀生姑息日本，迟迟不愿采取行动。当国联就“九一八”事变探询美国态度时，史汀生一面表示愿与国联合作的诚意，一面又拒对东北事件是否已牵涉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作正面回答。直到9月24日，才向日中两国发出与国联要求双方撤军内容几完全相同的照会，表示对国联的支持。后来，史汀生逐渐了解到，日本军部势力日益猖獗，所谓币原“和解”外交不过是幻想；日本政府虽对东京外交界尽量掩盖其侵略意图，但实际上是支持关东军在东北侵略活动的。10月6日，他在日记中表示坚信：在处理日、中纠纷中，美国应与国联合作，但要防止国联把球踢给美国。胡佛总统不独强调这一点，甚至还宣称："美日两国关系素以长期而牢固的友谊为特色，因此我们应该友好评价日本的政策。假定说，日本公开向我们声称：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投到中国境内秩序尚未确定这件事上来。……目前，由于中国境内未建立秩序之故，我们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加之，我们北方既有赤化的俄国，而在我们的侧面又有可能成为赤化的中国，最终将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要么是九国公约的各签字国和我们一起去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否则，我们就作为一种自卫行动去完成这件事。如果日本作这样的声明，美国自然不会附和这一建议，但我们却不能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2]

---

① 1931年11月27日美驻日大使威廉·福布斯向日本外相币原面述并留交的文件中说："本国政府……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并承认以日本政府提案为部分基础的〔国际〕行政院提案，……。"见《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文件汇编（1931）》，华盛顿：1946，第3卷，第596页。

② S.R. 史密斯：《1931—1932年满洲危机》，纽约：1948，第149—150页。

在这种纵容日帝侵略行为的思想指引下，此后美国虽与国联合作，派员参加国联理事会有关会议，但因采取措施既不道德（不分侵略者与受害者），也没有制约作用，日本还是不断扩大侵略活动，并于11月18日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切断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翌日，史汀生向日本外务省发出强硬声明，公开指责日本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币原11月21日告诉史汀生，日本政府将命令尽快从齐齐哈尔撤军。但22日史汀生又接到报告：日军正计划进攻锦州。这就使史汀生感到事态更加严重：日本并不以占领其有所谓“特殊利益”的东北为满足，还企图侵入华北，进一步威胁美国在华利益；日本一向宣称的反苏战争准备，不过是放烟幕，它不是北进反苏而是南下反美。[1] 于是，史汀生通告日本政府，进攻锦州将被认为是“完全不正当的侵略行为”，还训令驻日大使与英法驻日大使协商，共同提议反对日本恶化锦州局势的任何行为。11月27日，他前往白宫，要求胡佛重新考虑对日禁运或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总统不同意。[2]

12月12日，币原任外相的内阁倒台，新任犬养毅内阁以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内阁中军国主义势力大增。1932年1月2

---

① 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对日本主要战犯的东京审判的材料（1946—1948）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就想进攻苏联。”见安·玄·葛罗米柯等主编：前引书，第317页。根据日本人招供，“本来，日本陆军建军以来的传统使命就是戒备北部边疆的忧患，关东军就是执行这一使命的先锋。满洲事变把日本对苏防线的前沿推进到满洲国境线，日本的战略态势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就全力以赴地加强对苏战备和日满联合防苏的国防体制。”见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第1册，第9—10页。

② 罗伯特·费雷尔：《大萧条中美国外交》，第147—148页。

日，日军占领了锦州。[①]

〔没有实效的"不承认主义"〕　锦州被占后，史汀生很生气。但他想去想来，也只是采取了一种阿Q式政策。1月7日，他向日中两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会损害美国或其在华公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既成事态的合法性，它也无意承认日中两国政府或其代表签订的会损害美国或其在华公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它也无意承认运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日本、中国、美国都参加签字的巴黎公约条款与义务的方法造成的任何事态、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②]

这个不承认日本用武力造成的任何事态或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的声明，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在历史上很有名，胡佛还和史汀生争夺它的创制权，但是，不独当时未取得英国的支持，15年后，史汀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一种失败。[③]

对这个声明，日本的实际回答是：1月12日宣布它将成立伪满洲国；1月28日武装入侵上海。这时，"美国和英国虽然向上海调来陆海军增援部队，但只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④] 1月26日和29日两次内阁会议上，胡佛坚持认为：与日作战将是"荒谬"的；美国应试用调和办法结束上海战争。

史汀生再次拉拢英国，提议双方联合援引九国公约来解决中日纠纷，甚至实行某种形式制裁。但英国不愿对日实行制裁，未

---

① 关于胡佛政府这种既不道德又不起作用的外交政策，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锦州被占领后，史汀生大怒，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史坦利·霍恩贝克告诉他说：锦州只是一套碟子中最后一只；你已看着日本打破一只又一只，为什么在日本打破最后一只时，你却如此发怒呢？史汀生怒不可遏。见费雷尔：前引书，第153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日本部分（1931—1941）》，华盛顿，1943，第1卷，第76页。

③ S.R.史密斯：前引书，第92页。

④ 阿诺德·奥夫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100页。

予同意。于是，史汀生取得胡佛同意，在2月23日发表致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参议员公开信，除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及不承认政策并建议其他国家也执行后者外，还指出：如果日本侵犯中国完整，根据华盛顿诸条约，美国也可自由建造战舰，并在太平洋岛屿上无限制设防。

3月间，在美、英姑息政策下，上海虽然实现了停火和撤军，但东北危机仍然存在。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势力刺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政党内阁统治。9月，日本承认伪满洲国。10月2日，国联公布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它虽然否认了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自卫手段”，认为日本应对占领满洲和在那里建立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的制度负责，指责日本破坏自己在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但却又认为：中国主权虽应保留，但东北应获得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应予承认。这是帝国主义既要绥靖日本，又想分沾利益，变日本独占为列强共管我国东北的罪恶意图。

1933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宣布热河是满洲国领土。国联为挽回威信，于2月24日通过决议，认为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是非法的。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成为远东肆无忌惮地摧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

四、对拉丁美洲政策

胡佛政府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就其要点而言是：一方面打起睦邻的旗号，口头上宣传不再进行武装干涉，并将门罗主义引申的武装干涉理论作些修改，以缓和拉美诸国的反抗情绪；另一方

面，在实际行动中仍然进行武装干涉，不过有所收敛而已。

〔胡佛就任前去拉丁美洲的“睦邻”旅行〕　从美西战争直到柯立芝政府时期，除经济渗透外，美国对拉丁美洲一直进行公开武装干涉。到20年代末，由于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美运动的高涨，美国国内和平主义运动和政府内部反武装干涉倾向的增强，这种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特别是，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在拉美人民对美国积怨的影响下，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拉美贸易战中的优势，遭到英、德、日、意等国的严重威胁，英国在有些拉美国家已取得明显优势。这种情况，作为柯立芝政府商业部长的胡佛，早就了如指掌而且十分担心。加之，拉美人民还怀疑胡佛应对美国对拉美的不公平贸易负责。[①] 所以在1928年当选总统后，胡佛于是年11月19日到1929年1月6日，前往拉美10国作了为期10周的旅行。他说，“我在就职总统之前作这次遍历拉美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存在于拉美各国对我国政府意图和政策所抱的恐惧和敌对态度。”[②] 他在这次旅行中作了25次内容相似的演说，一再使用“睦邻”[③] 一词讨好拉美人民，但他只是空泛地表示美国保证放弃对拉美内部事务

---

①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粗暴干涉影响它对拉美的经济渗透，事例很多。比如，1927年美国干涉尼加拉瓜时，拉美各国纷纷集会抗议，致使波士顿银行和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忧心忡忡，认为这种情况损害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胡佛曾表示：“我作为商业部长时，已逐渐对我们的拉美政策不满。”见埃德加·罗宾逊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第99页。

② 威廉·迈尔斯：《1929至1933年赫伯特·胡佛的外交政策》，纽约：斯克里布纳公司，1940，第251页。

③ “睦邻”这个词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年。当时，它是“国际交往用语中最习见的陈词滥调之一。”见阿瑟·P·惠特克：《西半球概念》，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4，第135页注。胡佛这次南美之行中虽常用此词，但除极少数史学家外，未引起史学界重视。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中用此词时，是就全世界政策而言。只是到后来，人们才称他的拉美政策为睦邻政策。

的干涉，却不涉及拉美各国的具体要求，还为美国过去的干涉政策辩解，说是“事实上……我国尽管有干涉的表现，可没有一个干涉政策。”[①] 因此，他的睦邻旅行的诚意是受到一些拉美人怀疑的。这些人表示希望，未来胡佛政府会“证明其声明不只是一场吹过潘帕斯草原的风。”[②]

〔胡佛拉丁美洲政策评估〕 在胡佛政府头几个月任期内，它并未对拉美采取任何睦邻行动。不过“在1929年，国务院正式发表了门罗主义的诠释、即所谓克拉克备忘录[③]。这个备忘录从门罗主义的历史结构中删去了‘罗斯福引申’，并指出：美国不再负责监督各美洲共和国必须为自己对待外国人行为负责或挨‘大棒’。虽然还要防止不是来自美国的干涉，但不是‘〔罗斯福〕引申’。”[④]

胡佛政府发表克拉克备忘录，当然多少缓解了一下对“老罗斯福引申”极为憤恨的拉美各国的情绪。但是，正如美国史学家所说，“克拉克备忘录既未对过去罪行进行道歉，也未放弃从国家主权属性推导出来的干涉权。”[⑤] 当拉美国家“跟那些‘威胁美国安全’的欧洲国家互相勾结”时，美国还是要干涉的。[⑥]

事实上也是如此。1929年，胡佛在他第一次致国会的年度

---

① 布赖斯·伍德：《睦邻政策的制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第126页。

② 罗伯特·费雷尔：前引书，第217页。潘帕斯是阿根廷的一个草原。

③ 这是1928年美国副国务卿小J·鲁本·克拉克奉当时国务卿之命写的一份备忘录，目的在于缓解拉美各国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引申（即大棒政策）的积怨与反抗，但当时未发表。1930年才由国务院审批后公布。

④ 塞缪尔·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6，第538页。

⑤ 塞利格·艾德勒：《1921—1941年间变化不定的巨人——两次世界大战间美国对外政策》，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5，第106—107页。

⑥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前引书，第250页。

咨文中谈到美军对尼加拉瓜和海地的占领时说：我们不希望再在国外以那种方式出现。但是，与海地的撤军谈判从胡佛上台起，一直拖延到 1932 年 9 月，由于美国提出的撤军条件过于苛刻：既只字不提是否放弃美国在强加给海地的宪法中所拥有的干涉权，又规定美国仍可继续监督海地的财政，遭到海地拒绝。因此，胡佛在职时，美国的军队一直留驻在海地。

胡佛政府从尼加拉瓜撤军是被迫的，并不是它自愿放弃武装干涉。胡佛上台时，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已给美军以沉重打击。其盛时，这支游击队控制了尼加拉瓜 16 个省中的 8 省。1931 年 4 月 15 日，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企业主和商人是“一群被纵容惯了的人”；他们总以为一有危险就“有权召来军队保护自己”，殊不知美国军队早已疲劳不堪，无暇顾及他们了。[①] 这一年，美军虽然被迫退出战斗，但仍赖在尼加拉瓜不走。他们曾监督 1928、1930 年尼加拉瓜选举；现在还要监督 1932 年选举，以扶持亲美独裁政权。直到 1933 年 1 月，由于美国国会不许将 1932—1933 年度海军军费支付给驻尼加拉瓜海军陆战队，胡佛政府才从尼加拉瓜撤军。

还有一件事证明：胡佛在实际行动上是坚持武装干涉政策的。1932 年 9 月，阿根廷外长萨维德拉·拉马斯发起一个反战公约。其中规定：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不管是用外交或军事手段。这个公约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得到许多拉美国家参加。但当发起者试探性地邀请美国参加时，胡佛政府一直不表态。直到 1933 年 3 月 3 日，即胡佛政府下台的那一天，史汀生终于托词拒绝参加。

有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把胡佛政府对拉美国家实行新的承认政

---

① 转引自布赖斯·伍德：前引书，第 43 页。

策作为它睦邻的例子。因为自威尔逊政府以来，美国只承认“根据法律建立的正当政府”，实际上是只承认亲美政权，不承认革命政府；而胡佛政府则在 1930 年 9 月宣布：任何拉美政权只要实际上控制了国家，并愿意遵守国际义务，便可得到美国承认。胡佛政府的这种新承认政策，也是时势使然。因为大萧条引起的经济、政治困境，到 1933 年，已使拉美国家发生过 50 多次革命。过去那种只承认亲美政权，不承认革命政府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

虽然如上所述，胡佛政府的拉美政策也不能说毫无新内容。比如，在柯立芝时期，美国政府敢于公开引用老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引申，以西半球国际警察身分，在拉美肆意进行武装干涉。但在胡佛时期，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把老罗斯福这套大言不惭的干涉理论收起来，对今后美国干涉拉美的范围也作了限制。这表明胡佛的拉美政策至少进入了一种过渡时期。

第 七 章

“新政”时期的美国外交

前章提到，罗斯福政府外交和胡佛政府外交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具体执行起来则有所不同，有时还显著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两人的外交政策思想有所不同；两人克服大萧条的对策几乎是背道而驰。罗斯福不像胡佛那样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国际交往中虽然强调美国的支配地位，但不是完全不关心别的国家，因为他认为那样到头来还是会害了自己。他认为在当代世界上，各国间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而复杂，美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生活之外；他迷信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自诩美国可以在世界上起某种有益作用，应当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因此，罗斯福政府虽然也像胡佛政府一样对日本和德国执行绥靖政策，但胡佛是自觉的，而罗斯福则往往是被迫的。

一、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思想

罗斯福在格罗顿学校毕业时，就“坚信美国能在世界事务中起某种有益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年代里，国际事务中将会出现许多危机’，这个国家将不

可能‘不发出重要的或许甚至是支配性的声音来’。”1920年竞选副总统时，他认为美国应“看到当代文明世界已经变得这样复杂，使这些文明人同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建立……种种体面的和亲密的外交关系”；“通过国际联盟，我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的政府在和平的局面下互相贡献我们的精神力和潜在实力。”1928年，罗斯福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应该同国联合作……而且，如果不参与欧洲政治，我们则应积极地、热忱地和正式地参加会给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一切活动。对于国际法庭，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他还在文章中指责共和党人政府“打算在借给欧洲政府的100亿美元贷款基础上收回220亿美元”，使美国成为“一个可恨的收债人”①。

1928年以后，由于打算在1932年竞选总统，罗斯福一直避谈对外关系问题，因为他既不愿放弃原来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引起威尔逊主义者的反感；又害怕坚持这种立场，引起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使他难以参加1932年的总统竞选。1932年元旦，报业巨头、顽强而有力的孤立主义者威廉·R·赫斯特发表广播讲话称：任何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要想得到他的支持，就必须放弃国际主义。他还公开点了罗斯福的名，并说他自己是支持众院议长约翰·N. 加纳的。罗斯福宣布竞选总统后，曾派出代表向他私下保证：他现在已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赞成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但是，赫斯特不满足于这种私人间的保证，要求罗斯福公开表态。1932年1月21日，他给E.D. 科布

---

① 以上6段引文，见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4，上册，第6—7页，第17页，第19页，第24页，第24—25页。

伦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指罗斯福〕过去说他是个国际主义者，而且即使牺牲我国某些主权也赞成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时，曾作过许多声明。

"他现在应当公开声明，他改变了主意，赞成保持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赢得的国家独立；现在不赞成美国加入国联或国联的法庭。

"我必须坦白地说，如果罗斯福先生不愿意公开声明他改变了主意，而只想私下向我声明，我不会相信他。

"……

"如果一个人对公众隐瞒自己观点，而只向需要其支持的人表明这些观点，我将认为他既不勇敢，也不可靠。"[1]

面对这一严重挑战，两天以后，亦即2月2日，罗斯福在向纽约农民协进会演说中声明：他1920年赞成加入国联，是为了防止战争，促进国际友谊，他对此仍然心安理得。但是，这些年来国联的主要职责往往偏离世界和平的广泛目标，只讨论欧洲国家的政治难题；它已不是威尔逊设想的那种国际联盟，所以现在美国不应参加。

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也提到战债问题。他说偿债问题牵涉到债务国荣誉；考虑到当前世界金融状况，延期一时偿付是可以的，但应就何时开始偿付和偿付额达成协议[2]。

显然，这是罗斯福为了取得总统竞选胜利的权宜之计，并不一定是他的真正外交思想。两党孤立主义者虽然欢迎他的声明，

---

① 1932年1月31日《纽约美国人报》。这封公开信发出10天后才见报。详情请参阅查尔斯·比尔德：《1932—1940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过程》，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第67—74页。

② 这篇演说原文，见《纽约州第48位州长富兰克林·D. 罗斯福第2任期间1932年公文集》，1939年纽约州出版，第551及下页。

但有的人不免讥笑他言不由衷。威尔逊式国际主义者则猛烈攻击他不讲原则。因此，在此后的所有竞选演说中，罗斯福都有意回避了外交关系问题。即使接触到与外交事务有关的保护关税问题时，他虽然谴责共和党的高关税政策，但他并未允诺通过国会立法大减关税，只是提议根据互利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查尔斯·比尔德认为，这对罗斯福在1932年大胜胡佛是有帮助的[①]。最有权威的罗斯福传记作者弗兰克·弗雷德尔根据多年研究总结他的外交思想道："从他任总统期间总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来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从他相信美国的幸福有赖于其他各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保障来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②] 达莱克写道，罗斯福"相信，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要依靠国外正常经济的恢复，这种经济恢复是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贸易强国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他也看到在繁荣与和平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③]

由此可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思想，是美国在国际交往中应占支配地位；是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并在此前提下适当照顾其他国家利益。否则，美国利益也难有保障。

这是垄断资产阶级开明派的看法。

二、罗斯福外交政策思想的初步运用及其挫折

如第5章第7节所说，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都认为：造成大

① 查尔斯·比尔德：前引书，第101—116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美国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90，第106页。

③ 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28页。

萧条主要原因不像胡佛说的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因此，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称："虽然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非常重要，但就时间性和必要性而言，比起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来，却是次要的。……我将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经济调整来恢复世界贸易，但国内紧急状况不能等到完成那件事后再来解决。"①

众所周知，罗斯福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大力抓紧"建立健全国民经济"的同时，罗斯福并未忘情于他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在当选后至就任前以及就任后几个月内，他试图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以抗击萧条，并迎击日本军事领袖与德国新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遥远威胁。"② 就职前，他两次拒绝与胡佛政府公开合作共同解决战债、裁军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等外交问题，不是他不重视国际关系，而是因为他不尽同意胡佛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它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政策，更不愿把自己即将建立的政府与丧尽民心的胡佛政府联系起来。他不独任命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经济战的科德尔·赫尔为国务卿，国际主义者威廉·菲利普斯为副国务卿，还在 1932 年 12 月下旬邀请采取超党派政治立场的国务卿史汀生私下会谈，并会见了两位著名国际主义者：美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代表诺曼·戴维斯，和长期居住欧洲并结识许多欧洲领导人的威廉·布利特，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上述各种外交问题的办法。

〔试图宽容对待债务国〕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摆在他面前与抗击萧条密切相关的重要国际事件，有战债问题、裁军问题和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问题。现将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分述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 2 卷，第 14 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第 106 页。达莱克也说罗斯福虽感到这样做有困难，但"在因竞选胜利而来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中，他决心试一试。"见达莱克：前引书，第 28 页。

如下。战债问题其所以与抗击萧条密切相关是因为，如果取消或大大削减战债，可以缓解欧洲金融危机，有利于欧洲经济恢复，还可增加美国产品出口，减轻美国萧条程度。但是，不仅罗斯福为应付赫斯特挑战曾公开宣称不取消战债，而且当时美国公众和国会参议员大多数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副总统加纳还在 1933 年 1 月间向罗斯福提出过警告：国会决不会同意延期偿付和削减外国债务。因此，罗斯福本人虽然主张宽容对待债务国，但在胡佛邀请他共同处理战债问题时，他十分谨慎；他在 1933 年 1 月间采用与债务国使节会谈办法，提示他们只需象征性支付一定数额，以便解除他所受政治压力[1]。英、法使节对此提示也不同意，并以德国停付赔款为理由，要求停付战债（法国已未付 1932 年 12 月 15 日到期战债）。这使他感到英、法只取不予，难以打交道。但是，为了免给已深陷大萧条困境的世人又一次失败印象，他一直设法使谈判的大门敞开着，不过未取得任何成果。1934 年 1 月 11 日，参院通过了海勒姆·约翰逊法，禁止购买拖欠美国政府债款的各国政府债券或向其贷款。

〔*积极促进裁军活动*〕　　裁军是又一个与抗击萧条有关的问题，因为削减下来的军费可用于复兴经济。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拖了 13 个月之久的日内瓦裁军会议已奄奄一息。他获悉情况后，于 3 月 14 日建议休会 5 至 6 周，以便即将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诺曼·戴维斯与各国代表进一步协调意见。3 天以后，他向报界表示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这次裁军会议取得切实成果。为表示诚意，他首先决定进一步削减只有 14 万人的美国陆军。

---

① 他曾向英国大使提出一个方案，英国 42 亿美元战债可减为 12 亿美元，50 年还清。

3 月 16 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向裁军会议提交了一份安全与裁军方案，基本内容是：欧洲各大国之间相互协商，共同抵制潜在的和已发生的侵略行动；对各国军队和武器装备数量加以限制，以削减各国军事力量，并允许德国在 5 年内像法、意、波等国一样都有 20 万陆军。罗斯福对此方案坚决支持，并向 4 月间访美的麦克唐纳和爱德华·赫里欧保证：为支持此方案，美国将放弃传统的中立政策；在欧洲各国宣布某国为侵略者而美国也持同样看法时，美国将制止侵略者的任何破坏集体努力的行为[①]。

5 月，德国在裁军会议上要求重振有限军备，并随意试制样品武器，英、法断然拒绝，会议陷入僵局。此外，来自柏林消息证实：希特勒正千方百计重建德军，并将于 5 月 17 日向国会发表好战演说，阐明这一目标。为此，罗斯福先发制人，在 5 月 16 日向参加裁军会议的 54 国首脑发出呼吁，再次要求裁军，先着手实施英国提出的方案。与此同时，各国军备应维持在现有条约规定的水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保证不将军队派往国外。显然，这些建议是针对希特勒的。希特勒为了迷惑世人以掩盖其扩军活动，对此作了和解的回答。

由于法国提出罗斯福建议中没有包括对它的安全保证，罗斯福让诺曼·戴维斯在 5 月 22 日向裁军会议代表们声明：如果和平遭到任何威胁，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对策；一旦出现事实上的侵略，美国将制止企图破坏集体努力的任何行动，以惩罚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致公认的侵略者。

罗斯福这一保证，正是法国一直追求的，而且“在 4 个星期之内使人强烈地感到，罗斯福已经成为一心为促进国际和睦的世

---

① 但是，罗斯福强调指出，在美国承担这一义务之前，必须先就真正裁军达成国际协议，并制定一项能自动持续地检查监督的有效计划。

界领袖……也是日内瓦谈判的核心人物。”[1] 但是，它却使美国国会中强有力的孤立主义者们惊愕不置。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告诉罗斯福，该委员会只有按照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意见修改之后，才能通过众院对侵略者实行武器军火禁运的法案，而约翰逊的修改意见是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不加区别的。当时，罗斯福担心与参院孤立主义者争执过多会影响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新政”立法的通过，只好不再要求国会通过众院武器军火禁运案。这样，罗斯福就不能取得对侵略者宣布武器军火禁运的权利。5 月 29 日，赫尔向报界承认了这一事实。

7 月，罗斯福接到布利特及美国驻意大使布雷肯里奇·朗报告，说是法国因无美国保证，坚不同意裁军。8 月，罗斯福派诺曼·戴维斯带着他给英、法政府首脑信件前往欧洲，再作周旋，但未能使裁军会议有任何起色。10 月 14 日和 19 日，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破产。于是，罗斯福转而要求英国合作，迫使日本停止要求海军力量与英、美对等。但是，英国更担心的是德国重振军备而不是日本的扩军，不愿合作。结果，日本于 1934 年 12 月通报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这样，罗斯福的一切裁军努力都付诸流水。

〔结合国内外形势筹划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策略〕
世界经济会议与抗击萧条的关系更加密切。但罗斯福与胡佛对待这次会议的任务看法不同。胡佛认为要在会上讨论战债、裁军、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罗斯福则不同意在会上讨论敏感的、容易使会议陷入僵局的战债问题。关于稳定货币、恢复金本位制问题，也与他倾向通货膨胀的思想矛盾。不过，英、法要求讨论战债问题，而准备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 66 个国家中，除英、日两

---

[1] 达莱克：前引书，第 63 页。

国外，都认为稳定国际货币是复兴经济的首要条件，因此，回避这方面问题不大可能。罗斯福为使国际谈判之门敞开，在1933年4月忙于第一次百日“新政”期间，挤出时间“邀请所有债务国派代表前来白宫与他讨论债务问题，为6月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但他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利用债务问题，以便通过裁军寻求经济复兴与和平。”[①] 4月19日，美国因国内形势需要，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为使这一措施与伦敦经济会议的准备工作不相抵触，他在那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企图使记者们相信：美元贬值是一项积极措施，目的在于促使各国政府加速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物价；当各国这方面工作有了成效，世界物价显著上升，那时将在新的基础之上重建金本位制。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互惠贸易法案；批准赫尔国务卿发表美国决心扫除一切国际贸易障碍的声明；批准提交世界经济会议的建议，即实行临时关税休战、主张各国按同等标准削减关税。

雷蒙德·莫利认为，罗斯福以上这些作法，是与他正在和即将实行的、纯粹是调整国内经济的“新政”政策互相矛盾的。“罗斯福同莫利看法有所不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内外政策之间存在多大的矛盾。‘为应付当务之急’，他固然同意实行经济自卫的方针，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可靠的长远之计。他说，到头来，‘它终归会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外贸工业带来危害。’……因此，罗斯福希望民族主义的金融和经济政策能迅速奏效，以便使他支持在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稳定货币和关税问题的协议。在此期间，他还设法消除国际上的失望情绪，

①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110页。

力求重新唤起国际合作的希望，从而为达成这种协议奠定基础。"①

但是，罗斯福虽然具有国际合作热忱，却未能提出解决国内外政策矛盾及保证世界经济会议成功的具体办法。麦克唐纳和赫里欧虽然表现出合作愿望，但得不到英、法政府支持。它们坚持取消战债，对临时关税休战持保留态度，还要求对美元实行紧急稳定措施。在国内，国会和他的顾问们都施加压力，促使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这样，到5月中旬，罗斯福就感到有必要在国际合作问题上降温。他鼓励莫利著文提醒人们不要对伦敦经济会议抱过高希望；他暂时放弃了赫尔积极主张的由国会通过互惠贸易法案的要求，而同意农业部长华莱士希求的在高关税保护下的经济复兴。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为使人们保持对国际合作的希望，他重新提出了伦敦经济会议的任务和开会方法。他认为会期至多不能超过8周；会上只限于发表一些原则性声明，然后组成一些委员会去研究具体细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会议保持一般化，不致陷入意见分歧争论，成为僵局。至于像稳定货币、关税休战、恢复金本位制等等难题，都可留给各委员会去解决；这些委员会待各国复兴计划奏效后，再就这些问题达成国际协议。后来，由于会议未能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而失败，我们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了。

〔迎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挑战〕　关于迎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挑战，罗斯福总统开始时是很积极的。1933年1月9日，他在海德公园与史汀生会谈时，完全赞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是以经济制裁等为后盾的，这样的不承认主义

---

① 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55—56页。

很可能导致对日作战[1]。莫利和特格韦尔两位顾问未参加这次会谈，他们看到报载1月17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此事的谈话后，非常担心，第二天问罗斯福为什么同意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罗斯福回忆了他的祖先从事对华贸易的事实后说，“我一直深深同情中国人，你们怎么能期望我不同意史汀生对日政策呢？”[2]

弗雷德尔还提到罗斯福曾考虑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他说，“罗斯福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并在未来诡谲的年代企图避免战争，但是，由于他曾在海军部任职多年，他时不时地考虑到战争的可能性。1933年1月，他说现在〔对日〕作战可能比以后好，使他的两位顾问——莫利与特格韦尔——感到惊骇；在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提醒大家对日作战是可能的。”[3]

“1933年整个春季，罗斯福都在致力于对抗日本的活动；他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是谨慎而静悄悄的，免得公众惊慌。他倾向于禁运作战物资，而且使众院通过一项决议，授权他自由决定对侵略者禁运”。[4] 此外，“从就职之初，他就支持建设海军，以便帮助复兴国家并在军事上同日本抗衡。”[5] 1933年6月，他从公共工程局专款中拨出23800万美元，建造总计12万吨的32艘舰艇。

---

① 不承认主义虽由胡佛首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但将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正式提出来的是史汀生，所以又称为史汀生主义（见罗伯特·费雷尔：《大萧条中美国外交》，第155—157页）。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逐渐与胡佛的不承认主义具有不同性质。胡佛的不承认主义纯粹是道义性的，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则以经济制裁等为后盾。罗斯福赞同的是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见查尔斯·比尔德：前引书，第134—143页、第156页。

② 雷蒙德·莫利：《7年之后》，第94—95页。

③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109页。

④ 同上。

⑤ 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5页。

这个数字，和国会已同意建造的总计1.7万吨的5艘舰只加在一起，是1916年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海军建设计划。

罗斯福的这些活动，虽然是“谨慎而静悄悄地”进行的，但如前所说，参院孤立主义者还是要求删去众院授予他的自由决定对侵略者实行武器军火禁运的权力。因而，他在公共外交场合，总是避免对日采取强硬路线，并将执行这种消极路线的责任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声明，“政府的目的是避免在远东主动采取任何行动。”① 当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在1933年3月底指出一项抵制日本的武器禁运法有赖于美国采取行动时，赫尔说他不打算接受本来就是国联的不容推卸的责任。5月，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要求美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时，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强烈反对。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受害最大的是英、法等国，美国所受损害不大，因此，应由国联或英、法采取主动。他还说服了罗斯福：“日本军队战线过长，是一只‘纸龙’，将不得不撤退。东亚冲突种子是在发芽，但如此其缓慢，罗斯福应对危机迫在眉睫的欧洲给予多得多的注意。”②

〔迎击希特勒的初步尝试〕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欧洲领导人由于希特勒口蜜腹剑，一般认为他的扩军活动是有限度的；只要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凡尔赛条约中不公平因素得到纠正，希特勒就会变得有理性起来。“罗斯福尽管一开始便不存在幻想，但他倾向于首先试试希特勒是否会对和平建议作出反应。如果不，罗斯福就会尽可能采取更为果断的安全措施。他谋求和英、法一道提出倡议，恳求德国人不要重整军备；作为交换条件，其他国

---

① 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109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110页。

家将削减军备至仅足自卫的水平。”[1]

据弗雷德尔研究，罗斯福 1933 年 4 月间邀请麦克唐纳、赫里欧访美，不过是以讨论经济和战债问题为烟幕，其主要目的乃是制止纳粹的军事威胁。他在邀请法国领导人时对法国大使说：“情况是令人担心的。希特勒是个疯子，而他的顾问（有些我认识）甚至比他更疯。

“法国现在不能裁军，也没有人要求它裁军。”[2]

如前所说，到 5 月间罗斯福又结合裁军会议一再努力阻止希特勒扩军，但未成功。

奥夫纳指出，“罗斯福自己对于用绥靖办法和纳粹德国打交道是否有用，深感怀疑；而且早在 1934 年春天，就要求国务院考虑：如果德国拒绝让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据传它违反凡尔赛条约裁军条款的情况，就对它实行多国贸易抵制。但是，莫法特和菲利普斯劝止了他，说是贸易制裁实质上是战争行为，与中立政策不符。”[3]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总统早期谋求国际合作抗击萧条和迎击德、日扩张侵略的活动，是不成功的。这当然和德、日法西斯势力决心打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关，与英、法政府和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眼光短浅、只顾本国利益有关，也和罗斯福的国际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总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而且经常屈服于孤立主义势力有关。

---

① 弗兰克·弗雷德尔：上引书，第 113 页。

② 克洛德尔 1933 年 4 月 5 日致保罗—邦库尔的信，《法国外交文献》，第 1 辑，第 3 卷，第 148—149 页。

③ 阿诺德·A·奥夫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 108—109 页。莫法特全名为杰伊·P·莫法特，当时任国务院西欧事务司司长。

三、改善对苏联和拉美的关系

罗斯福在从事上述外交活动时，也注意到改善对苏联和拉美的关系；而且，在上述外交活动屡遭挫折之后，他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外交活动。

〔结束16年的不承认政策，与苏联建交〕　罗斯福和他的夫人都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他们认为人们信仰共产主义是由于贫困，所以制止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他们都“对自己和美国民主政治挽救世界的力量很自信，并不害怕和共产党人讨论问题。”① 他们都认为不承认苏联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一位美国外交家说，“众所周知，罗斯福感到：只要我们不承认一个具有如此潜力的国家的存在，〔世界〕就不会稳定。”②一位苏联作者说，“罗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态度及其倾向性来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美、苏关系建立在睦邻、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③

1932年9月，一位在苏联企业工作的美国专家拜访了罗斯福，两人经过长谈后罗斯福说，“如果他当选为总统的话，他将与苏联进行以建立贸易关系、予以承认等等为目的的谈判。”④1933年就任总统后，由于扩大与苏联贸易的要求更加迫切⑤，由

---

① 约瑟夫·拉希：《埃莉诺与罗斯福》，第592页。

② 查尔斯·E·波伦：《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纽约：诺顿公司，1969，第17页。

③ 〔苏〕亚·鲍·恰科夫斯基：《未完成的画像》（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3页。

④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240页。

⑤ 1933年夏，苏联代表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提出10亿美元订货后，这种要求尤其强烈。

于考虑到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和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1]，由于开明与进步势力的推动，罗斯福积极准备和苏联建交。他鼓励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克劳德·斯旺森就承认苏联问题发动全国讨论。为时不久，他虽然发现美国对苏联债权人委员会、白俄领袖、美国天主教会、一些工会领导人、一些保守组织、甚至他的母亲反对承认苏联，但也有许多团体和人士，特别是产业界比如美国商会、美国出口商协会、全国信贷商协会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通用电汽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杜邦公司、福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这样一些大公司，都赞成承认苏联。产业界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国会。著名国务活动家共和党人威廉·博拉、乔治·诺里斯、史密斯·布鲁克哈特、小罗伯特·拉福莱特和民主党人约瑟夫·罗宾逊、雨果·布莱克、罗伯特·瓦格纳、艾尔本·巴克利、亨利·雷尼、托马斯·沃尔什等，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言中，都曾公开提出承认苏联的问题。

但是，负责建交准备工作的国务院是有反苏情绪的，特别是它的东欧司。它在 1933 年 7 月向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反对承认苏联。赫尔国务卿虽然在罗斯福影响下同意与苏联建交，但他试图把承认作为一种武器，迫使苏联按东欧司提出要求作重大让步，使建交工作难以进展。10 月初，罗斯福绕过国务院，让他的老友、即将任代理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和布利特同苏联驻美商务代表鲍里斯·斯克维尔斯基接触，并通过他告诉苏联政府，他愿意接待一个政府特使，探讨两国间所有重要问题。11 月 7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抵华盛顿。在最

---

① 参阅查尔斯·波伦：前引书，第 16 页；恰科夫斯基：前引书，第 103—104 页，第 121—122 页，第 137 页；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 171—173 页；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前引书，第 321—322 页。

初两天中，国务院代表与李维诺夫会谈形成僵局，10日起，罗斯福亲自与李维诺夫会谈，首先就共产党宣传与居住苏联的美国人信教自由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债务问题，双方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国务院计算的十月革命前俄国所欠美国6亿美元债款，将由苏联政府偿还1.5亿美元。11月17日凌晨，罗斯福与李维诺夫同时签署3份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终于结束了16年来美国不承认一个国土占地球1/6的大国的荒唐历史。

〔建交后的美苏关系〕　承认苏联的问题解决得固然较顺利，建交以后的美、苏关系却摩擦不断。威廉·布利特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驻苏大使。他出身显贵，性情豪放，颇有名士风度，1919年曾被巴黎和会派往苏联了解情况，对列宁印象很好，而且像约翰·里德一样，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将给俄国带来新的、较美好前景。初到苏联时，受到热烈欢迎。他选择莫斯科市公园中心一块俯瞰全城、风光绮丽的台地作为大使馆馆址时，虽遭李维诺夫拒绝，却在克里姆林宫晚宴席上得到斯大林首肯。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希望美国售予苏联25万吨钢轨，作为西伯利亚铁路铺复线之用，以便苏联更容易地打败日本人。但是，美国由于要绥靖日本，没有满足斯大林这一要求。接着，李维诺夫在解释关于债款的君子协定中提到的美国对苏贷款时，布利特认为有违原意。[①] 于是，苏联拒绝偿还那1.5亿美元债款，美国也拒绝贷款给苏联。1934年3月，莫斯科市苏维埃不同意将市公园15英亩土地让与美国，斯大林也予以默认。布利特很不高兴。到是年复活节时，他报告罗斯福：美、苏间蜜月气氛已完全消失。起初，罗斯福并不重视；后来，指责苏联的报告日多，罗斯福才通

---

① 李维诺夫认为协定中写的是贷款，苏联可以自由使用。布利特认为结合全部条文看，这种贷款实际上是信贷，必须用来向美国市场购买商品。

知布利特："我想我们应在这里对苏联人以牙还牙。"[1] 1935年，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布利特又借机生事，指责此事违反建交协议，致使两国互相指责，几致断交。从1935至1939年，苏联对美国纵容法西斯扩张侵略活动感到失望和气愤，美国对苏联清党活动具有反感，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冷淡状态。在贸易方面，虽然1937年8月相互承认了最惠原则，但由于美国阻挠，双方贸易额甚至低于建交以前。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入侵芬兰和吞并波罗的海3国，更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对拉丁美洲的早期睦邻政策〕　前面我们提到，胡佛政府已试图改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但成绩不佳。到罗斯福上台前，美国与拉美的经济、政治关系更形紧张。拉美当时是美国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但美国对拉美的输出额，从1929年的9.117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1.944亿美元，美国从拉美的输入额，几乎减少4/5。拉美各国欠美国银行债款，本利合计达27亿美元，除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外，先后宣布无力偿还。

美国对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墨西哥及其他各国的蛮横干涉，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愤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智利、巴西、古巴等国，反帝运动发展到巨大规模。1932年7月，智利甚至建立了存在11天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英国还利用拉丁美洲对美国的恶感，操纵国际联盟插手拉美边界纠纷，企图扩大自己和削弱美国对拉美的影响。[2]

罗斯福对当时美国丑陋的国际形象早就比较清醒。1928年

---

① 唐纳德·G·毕晓普：《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第231页，转引自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176页。

② 在1932年发生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争夺查科地区的查科战争中，和秘鲁与哥伦比亚争夺莱蒂西亚村的莱蒂西亚纠纷中，美国都曾操纵国联与美国争夺仲裁权。

10月2日，他在佐治亚州曼彻斯特为史密斯竞选时说，“10年来，……在我们边界以外，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喜爱美国。这不是夸张，这是事实。

“欧洲人民说我们见钱眼开，只顾自己，并且认为我们只关心自己钱包。

“我们南边拉丁美洲的19或20个共和国不只是轻视我们，他们恨我们。他们看到我们在海地、尼加拉瓜和圣多明各〔的所作所为〕。他们看到他们称为的我们的帝国主义。”①

因此之故，罗斯福上台前，就让他最亲信的拉美问题专家萨姆纳·韦尔斯制订了一份关于美洲国家关系备忘录。此备忘录所体现的拉美政策与胡佛拉美政策不同的是：它更重视美国与拉美关系，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它主张推行“集体责任制”，不主张美国独断专行；强调恢复与拉美的正常贸易关系；对武装干涉问题更加谨慎，即使是保护美侨生命安全，也“决不应导致美国在另一个姊妹国家的武装干涉。”②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在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方面，我将使我国奉行睦邻政策。”③ 4月12日，他在泛美联盟理事会的泛美日纪念会的演讲中第一次发展了这种睦邻思想。他在这篇讲演中提倡美国与拉美各国互相理解、合作互助，尊重各国权利与独立，消除一切阻碍正常贸易发展的人为障碍。但是，关于武装干涉问题，罗斯福只说“不能不对任何邻国间的武装冲突感到不安”，却未明确表示美国放弃对拉美的武装干涉。5月间，他任命韦尔斯为驻古巴大使。韦尔斯插手古巴内

---

① 查尔斯·比尔德：前引书，第59—60页。

② 这份备忘录原文，见唐纳德·多泽尔：《门罗主义的现代意义》，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普夫公司，1965，第123—126页。

③ 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2卷，第14页。

政。8月间，人民群众极度愤恨的号称“屠夫”的古巴独裁总统赫拉尔多·马查多被迫辞职后，他扶植一位亲美人士为总统。9月5日，这位总统被怀有不满情绪的士兵推翻，建立了以颇负声望的大学教授拉蒙·格劳·圣马丁为临时总统的左翼政府。由于这个政府实行的某些改革，比如没收美国糖业公司财产、停止向美国银行偿债等，妨害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韦尔斯一再要求罗斯福政府派兵干涉。罗斯福虽然不同意派兵登陆，但还是派了30艘舰艇到古巴海面，进行威胁，同时又听信韦尔斯谎言，不相信新总统受人民拥护，坚决不承认新政府，迫使新政府于1934年1月15日辞职。

由此可见，直至1933年8、9月间，罗斯福政府是在不完全放弃武装干涉的前提下，实行睦邻政策的。但是，罗斯福对此十分担心，害怕这样会进一步激起拉美各国反感，最后对美国不利。当时，他和赫尔国务卿私下都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当考虑使用哪怕是有限的干涉”。“如果我们同意了他〔指主张派兵登陆的韦尔斯〕，灾难性的反应就会遍及拉丁美洲。”[①] 自此以后，罗斯福对武装干涉的态度，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逐渐有明显的转变。

〔放弃武装干涉为中心的拉美政策〕　从经济上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后，英、法等国由于有帝国特惠制或类似制度保护，在关税战、贸易战中比美国占优势。1932至1933年，世

---

① 朱利叶斯·普拉特：《1933至1944年的科德尔·赫尔》，纽约：斯摩尔出版社，1964，第145页。

实际上，除古巴格劳·圣马丁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武装威胁外，拉美许多国家报刊也猛烈抨击美国。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公开警告罗斯福政府：如果美国借口普拉特修正案派兵在古巴登陆，不仅会使美、古关系、也会使美国与整个拉美关系产生有害结果。

界贸易出口值下降13%，而美国则下降19%。20年来，美国外贸总值第一次低于英国。但是，拉美各国由于仇视美国，却更热衷于与欧洲扩大贸易，这对迫切要求与拉美改善贸易关系的美国来说，是必须十分重视的。从政治上说，1933年10月10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巴拉圭、乌拉圭6国共同签署了胡佛政府拒绝参加的阿根廷反战公约，并邀请其他拉美国家及全世界国家参加。这对罗斯福政府是否公开放弃对拉美的武装干涉政策，当然是一种严重挑战。由于这些情况，11月11日，罗斯福下令成立一权力跨内阁各部之上的贸易政策执行委员会，决心重振美国外贸，并分别和阿根廷、哥伦比亚谈判，试图订立削减关税和互惠贸易协定，还积极准备在将于12月召开的蒙得维的亚第7届泛美会议上推进这方面活动。11月24日，罗斯福利用承认古巴卡洛斯·门迪埃塔政府之机，暗示将放弃强加给古巴的、据之可以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的普拉特修正案，为12月泛美会议作政治准备。

1933年12月2日至26日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第7届泛美会议，是一次关键性会议。在赫尔的积极努力下，美国在这次会议上签署了阿根廷反战公约和包括“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别国内外事务”条款的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①]，拉美各国也接受了赫尔提出的关于互惠贸易计划的决议草案。12月28日，罗斯福为了巩固赫尔在泛美会议上取得成果，又在威尔逊基金会上说：“从今以后，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反对武装干涉。”[②]

1934年，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德国在经济和

① 不过，美国作了某些保留。比如，加上了“任何美洲国家的外国人应受到与该国公民同样待遇”的内容。

② 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第2卷，第545页。

政治上成功地渗入了拉美。这更促使罗斯福政府具体放弃武装干涉拉美政策。这年5月，美国与古巴签订新约，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还放弃了一些干涉古巴经济、外交的权利[①]。这件事受到拉美各国的普遍赞扬。8月，美国军队撤出海地。1934至1935年，罗斯福顶住了美国天主教会和国会的强大压力，坚决反对干涉墨西哥的宗教政策。1936年3月，美国与巴拿马签订新条约，取消对巴拿马"独立与自由"的保护权，将巴拿马运河使用租金从25万美元增为43万美元。同年12月，美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泛美和平特别会议上签署了关于不干涉的特别议定书，同意"缔约国的任何一国不得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缔约国中另一国的内外事务。"[②] 自此以后，罗斯福的确放弃了对拉美的武装干涉政策，只以政治、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其在拉美的利益。1937、1938年，对玻利维亚、墨西哥大胆没收美国资本的经济国有化措施，美国也未进行武装干涉。在改善贸易关系方面，美国国会于1934年6月制订了互惠贸易法。到1939年欧战爆发前，美国已和11个拉美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双方贸易迅速发展。1939年拉美各国进口总额中，美国商品已占40.6%；出口总额中，输往美国的占35.2%。同年，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已达40亿美元。自1920至1938年，美国从拉美榨取了103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此外，睦邻政策是多少有利于拉美的经济发展与国有化运动的，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洲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但是，同时也扶植了拉美的亲美独裁政权。

---

① 但保留了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② 墨西哥代表指出"间接干涉"指非武装干涉，美国只在口头上有所保留。

四、对欧洲法西斯的绥靖政策

罗斯福政府虽然在改善与苏联、拉美的关系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它太强调美国和自己政权的利益，对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过于迁就，因而对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呼吁无动于衷，纵容、甚至助长了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

〔孤立主义高潮〕　在本章第2节中，我们曾提到罗斯福迎击日、德法西斯势力[①]的外交活动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阻挠。实际上，从美国广大群众来说，1933—1934年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国内萧条问题，对怎样迎击日、德法西斯势力这类外交问题，大都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阻挠罗斯福迎击日、德法西斯扩张侵略活动的，主要是国会、内阁甚至顾问们中的孤立派。

但是，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在群众中具有深广的影响。一旦气候适宜，便可能汹涌澎湃。2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在欧洲档案公开后，重新研究战争根源，发现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卑鄙争夺，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密切相关；美国人民是被骗去为一场毫无价值的事业战斗的。在此思想影响下，出现大量揭露军火商和反战出版物；同时，以妇女、牧师和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和平运动，在30年代蓬勃发展，其盛时有1200万拥护者，4500至6000万听众。1932—1933年间，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和其他一些和平团体一再要求对军火工业进行调查，并控制国际军火贸易。1933年，美国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

---

①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一书论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都是法西斯主义，可参阅。

的调查。1934 年 4 月起，参院又成立了以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亦称奈委员会。调查结果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美国参战既不是为拯救世界民主，也不是为保卫美国利益，而是投机牟利者施展的阴谋诡计。

这些耸人听闻的揭露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后，30 年代中期以后几年美国人民的孤立主义情绪更加顽固、更加狂热，形成一种孤立主义高潮。在这种情况下，1934 年罗斯福不独放弃了重新提出只针对侵略者的军火禁运法案，还决定在 1935 年 1 月国会复会之前，也不提出 1923 年以来呼声遍全国的参加国际法庭的法案。1935 年 1 月 16 日，由于事前了解到参院 2/3 以上议员赞成参加国际法庭，而这样做又可被世人看作是美国拥护世界和平象征，罗斯福于是要求参院批准加入国际法庭。但是，在库格林神父和赫斯特报系等的煽动下，群众中掀起一片反对浪潮，结果赞成的参议员没有达到 2/3，这种只具象征性的参与国际合作的行动也失败了。

如林克、卡顿所指出："到 1935 年，群众情绪如此强烈，某种中立法已不可避免；剩下的问题只是国会要不要把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从总统手里夺过来。"① 是年 2 月，墨索里尼向意属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 1934 年 12 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的侵略；3 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 5 倍，共 50 万人，并恢复征兵。正在这些引起美国人民战争恐惧的事件陆续到来的几乎同时，沃尔特·米利斯的《通向战争之路：1914—1917 年的美国》出版了。此书立即畅销全国。它认为，如果美国当时执行真正的中立政策，本来

① 林克、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册，第 137 页。

是可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它进一步鼓舞人们要求制订一项真正保持中立的法案，防止美国再次卷入战争。

罗斯福在希特勒宣布扩军的第二天，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纲要，希望英、法、意、比、荷、波兰甚至俄国达成一个为期10年的裁军协定；如果德国拒绝签字，就从东、西两面封锁它，美国也参加行动。4月间，罗斯福继续谈论着美国应如何用它的影响来促使其他国家维护和平的各种手段，但都没有结果。

反之，到3月末，国会两院议员提出一系列决议案，主张严守中立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罗斯福一直希望实行对侵略者与受害者区别对待的中立，但他意识到当时要让国会通过这样的中立法是不可能的，因而要求皮特曼把他提交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但是，全国各种和平运动组织要求制订严守中立法案的呼声此起彼伏，到6月下半月，国会领导人认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时，正是第二次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担心对中立法案的辩论会影响"新政"立法的通过，乃于7月底表示支持一项允许总统实行区别对待的中立法。几经折冲，到8月20日，霍默·博恩、贝内特·克拉克、奈等一批孤立主义参议员开始阻挠通过任何法案，并声称要这样做到参院通过一项无区别对待的严守中立法案为止。21日，参院通过了皮特曼提出的一项妥协法案，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哪些属于军需品和何时实施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授权总统不保护乘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建立一个军火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后来，众院将此法的有效期定为6个月。罗斯福考虑到只是意大利有能力从美国购买军火，埃塞俄比亚无此能力，就勉强同意了。

〔对意侵埃的纵容〕 1935年1月3日，埃塞俄比亚向国联提出控诉，要求国联制止意大利对它的侵略。但是，法国为换

取意大利支持其欧洲政策，并将意大利侵略矛头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引开，决定在非洲对意大利让步。英国虽因苏丹与埃及赖以生存的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不愿意意大利吞并埃全境，但同意割让一部分。因此，英法控制的国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控诉，并未认真对待。

罗斯福思想上同情埃塞俄比亚。他在8月31日签署中立法时声称，“历史充满不可预料的事件，需要对之采取灵活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出现如下情况：采取中立法第一节硬性规定……也许会把我们拖进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①] 9月12日，由于第二次百日“新政”已经告一段落，而英国此时已操纵国联对意大利采取较强硬态度，罗斯福让赫尔响应国联宣言，要求任何企图实行武力对抗的国家，应以和平手段解决纠纷。25日，他批准赫尔建议，公布一项禁运军事装备的初步清单；同时保留权利，即将清单扩大到包括禁运某种对意大利战争机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料，以削弱意大利的作战能力。

10月3日，墨索里尼拒绝国联调解，大举进攻埃塞俄比亚。第二天，正在太平洋上旅行的罗斯福电告赫尔，宣布实施中立法，以剥夺意大利获得美国武器的机会。此外，为阻止美国私人对意大利的任何支持，他提出公布从美国乘意轮的美国人名单和向交战国航运货物、特别是原料的清单。后来，罗斯福虽然接受赫尔劝告，同意暂不公布名单和货单，但10月10日当国联大会准备对意大利实行国际制裁时，罗斯福制订了一个反对罗马的扩大行动方案：要求国务院根据中立法确定增加美国可以禁运的

---

① 埃利奥特·罗斯福编：《富兰克林·罗斯福1928至1945年私人书简》，纽约，迪尤尔、斯隆与皮尔斯公司，1947—1950，第1卷，第506—507页。

这里提到的中立法第一节硬性规定指对一切交战国实行武器军火禁运。

"商品"，只要国联也把这些商品列入制裁项目；为保证美国运往其他中立国禁运物资不致落入罗马之手，要求对这些物资必须作出决不转船运输的严格保证；重新劝阻美国人不要与交战国通商，否则就要公布他们姓名。

罗斯福的这个扩大行动方案对遏制意大利是有作用的。但是，国联到10月31日才同意从11月18日起开始对意实行制裁，而且禁运物资中没有包括对意战争机器具有关键性的石油、煤炭等[①]；更重要的是，在英、法影响下，国联没有对意实行有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海上封锁。而在国内，罗斯福任何与国联合作的行为，都会受到孤立主义势力的攻击；早于国联采取制裁行动，更会危害罗斯福政府的威望和领导能力。而且，罗斯福知道，共和党人正在伺机抓他同国联合作的把柄，并以之作为借口，在下年大选中煽动孤立主义分子、特别是美籍意大利人来反对他。因此，当国联10月21日要求美国对国联制裁措施表态时，罗斯福批准赫尔通知国联说：美国政府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协助防止战争延长。更有甚者，罗斯福还同意赫尔意见，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赫尔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

"道义"禁运自然禁不住惟利是图军火商。1935年10月同1934年10月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微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内，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11月6日，国联协调委员会投票决定：如果非会员国合作，将把石油等基本原料包括在经济制裁范围之内。11月15日，罗斯福让赫尔发表强硬声明，指出

① 墨索里尼后来在1938年对希特勒说，如果国联向意大利禁运石油，他将不得不在一周内从埃塞俄比亚撤退。

为战争目的而出口的石油、铜、卡车、拖拉机、废钢铁的数量大大增加，而这类贸易直接违反政府政策，也不符合最近中立法总的精神。这一声明引起了孤立主义者的纷纷警告，而自11月25日起，英、法两国因害怕墨索里尼倒向希特勒一边，力阻国联对意实行石油禁运，并由两国外交负责人秘密协议，将2/3埃塞俄比亚国土割让给意大利，以换取它停止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反对，这一肢解埃塞俄比亚的协议虽未实施，但罗斯福深感不安。他在答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信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事态表明，国际伦理规范就不过如此而已。"[1] 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将进入一场大战的新时代。

1935年中立法将在1936年2月29日失效。罗斯福想乘国会制订新中立法之机，使总统取得更大处置权。1936年1月3日，他向国会提出一个给予总统以重要处置权的新中立法案。此法案引起孤立主义者、特别是美籍意大利人的强烈反对。[2] 2月18日，国会批准了稍加修改的1935年中立法。除重申以前有关武器和旅行限制外，还禁止给交战国贷款；对新加入现行战争的国家，总统应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而不能行使自由处置权；如果美洲国家同非美洲国家作战，则不执行中立法。

由于接受1935年中立法的同样原因，罗斯福也接受了1936年中立法。因为这一中立法并不规定美国向交战国禁运石油，国联在3月2日和3日重新讨论石油制裁时，再次推迟了行动。因此，在1936年3至5月当墨索里尼伪装对和平谈判感兴趣时，

① 埃德加·尼克松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外交事务》，3卷本，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第3卷，第130页。

② 各种美籍意大利人团体组织了100次会议、75次无线电广播、150篇文章，还派出发言人参加国会两院意见听证会，寄给国会大批邮件，要求延长1935年中立法，或对意、埃免于执行新的中立法。

意大利人摧毁了埃塞俄比亚有组织的抵抗，并于5月9日宣布将埃塞俄比亚、意属索马里以及厄立特里亚合并为意属东非。

〔与西班牙内战〕　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后不久，7月17日，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企图推翻由左翼共和党、共和同盟、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1936年2月通过合法选举建立的、以左翼共和党人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叛乱分子主要由贵族地主、大资产阶级、天主教僧侣、王党、军人组成，早与德、意法西斯领导人有联系，并获其支持。他们打着“反共”幌子[①]，实际是要恢复20年代的军事独裁制，取消人民阵线政府实行的经济、政治改革。共和国政府保卫者称为效忠派，他们自称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得到西班牙和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

叛乱初期，西班牙革命人民武装平息了许多重要城市叛变，叛乱分子只在少数几个孤立据点站住脚。加之，共和国海军大都拥护政府，使叛乱头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控制的西属摩洛哥陆军无法前来西班牙本土，叛乱有被消灭危险。到7月30日，德、意法西斯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它们出动大量舰艇和飞机，为叛乱分子运输军队和武器弹药，轰炸西班牙城市，协助佛朗哥攻击共和国军。

除苏联外，法国在叛乱开始时支援了共和政府少量飞机。7月25日法国总理访问英国时，英国出于反共考虑和担心战争扩大为欧洲战争，迫使法国单方面撕毁了西、法通商协定[②]，并于8月2日建议所有欧洲国家严格执行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政策。

---

① 当时共产党人在共和国政府中占绝对少数，人民阵线当选的473名议员中共产党只占17名，影响甚微。

② 据此协定，西班牙每年可向法国购买1亿法郎武器。

9月3日，包括英、法、德、意、苏[1] 等在内的27个国家签订了不干涉协议，并于9月在伦敦成立不干涉委员会，由英国财政大臣任主席。1937年3月，该委员会还实行了海军封锁。

美国虽未参加不干涉协议和不干涉委员会，但支持英、法奉行的不干涉政策。8月7日，赫尔通知美驻意大使：无论西班牙出现什么情况，美国政府绝不要进行干涉。8月10日，罗斯福在答复格伦·L. 马丁公司询问可否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出售8架军用飞机时说：这一类买卖不符合政府政策。但是，佛郎哥叛军却可以通过德、意、葡得到大量美国军火武器。因为德、意虽大力协助佛朗哥，却未公开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宣战。英、法冀图说服德、意遵守不干涉协议，对苏联呼吁制止它们破坏协议行为不予重视。美国为表示与英、法合作避免战争扩大，也不对德、意实施中立法，继续让它们购买大量军火武器转运给佛朗哥。达莱克评论罗斯福说，“这时候他对帮助西班牙政府摆脱法西斯统治已经兴趣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兴趣了。和伦敦一样，他惟一的目的就是避免使西班牙战争发展成全面欧洲战争。”[2]

美国人民中也有支持佛朗哥的。比如天主教徒的多数就是如此，只有25—30%的天主教徒支持共和政府。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都支持共和政府。他们陆续组成许多支援西班牙民主的工人、青年和妇女组织。除募款外，迄1937年初，全国共有500个点收集支援效忠派的物资。有的组织还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政策。美国共产党警告说，西班牙民主力量的失败，将加强法西斯在欧洲的地位，并加速第二次

---

① 苏联认为，如果各国真正实行不干涉政策，共和政府是可以平息叛乱的。

②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上册，第182—183页。

世界大战的来临。1937年1月，一支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队伍和3000名美国志愿军，前往西班牙参加政府军作战。后来，1800名林肯纵队和华盛顿纵队的美国青年，为西班牙的民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罗斯福对群众情绪和舆论是很敏感的。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美国人民同情共和政府情况下，他仍坚持不干涉政策呢？一个主要原因是：1936年是大选年，他要重新当选。他认为他实行“新政”是为了防止极权政治，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8月间，他给美驻德大使威廉·多德写信说：今年的大选，从某种意义说来，是在同德国较量。因此，在大选的最后阶段，他采取了一系列争取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天主教徒选票的措施；一再表示要争取和平，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特别要避免卷入另一次欧洲战争。达莱克在具体描述了这些措施后不无讥讽地评论道：“由于为和平而作的这一点努力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所以在国内也几乎完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罗斯福在第二次参加竞选的最后几个月中，一定感到这种做法特别有意思。”[①]

选举胜利以后，罗斯福主要关心的是改组美国法院的问题。他认为要保持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须维护“新政”立法，这就要改组1935年以来陆续废除了若干重要“新政”立法的联邦最高法院。为此，他接受了代理国务卿沃尔顿·穆尔和参议员皮特曼的意见，要求国务院在1937年1月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禁止向在西班牙交战各方出售武器，并禁止美国人以志愿军身份前往西班牙援助政府军。[②] 但是，从1936年11月起，意、

① 达莱克：前引书，第188页。

② 罗斯福知道，这一决议案容易在国会通过，可以避免一场争论，以便国会集中讨论司法改组法案。

德不独向佛朗哥增运军火武器和援军，而且还承认了佛朗哥政府。当时曾任美驻西大使的克劳德·鲍尔斯后来写道："中立法的运用，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①

1937年3、4月间，意、德直接参加佛朗哥作战的明显证据一再引起美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情绪，但是，1937年5月1日，为代替已满期的1936年中立法，美国国会又通过一"永久中立法"。此法将禁运军火、武器的对象扩及任何发生内战的国家，并规定今后根据"现购自运"的原则进行贸易。它虽然受到美国进步力量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但此时罗斯福正被反对派谴责为破坏宪法和法院的冷酷独裁者、企图夺取制造战争权力的阴谋家；而且，"现购自运"原则对具有强大海军的英国有利，他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个穆尔称为"了解当前局势的人所能期望参议院通过的一个最好的中立法。"

6月，罗斯福曾一度想承认德、意参加西班牙内战事实②，并对两国实行武器军火禁运，但到7月，由于英国反对，他在美驻英、意大使劝告下，又退却了。达莱克评论说："的确，在西班牙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政策是在鼓励侵略，而这种侵略是他如此渴望去加以防止的。"③

1938年，由于效忠派势力日渐减弱，美国国内要求援助它的呼声逐渐加强，奈参议员还向国会提出一决议案，要求取消对西班牙共和国禁运。由于国会无动于衷，罗斯福只好设法绕过国会和英国人，偷偷援助效忠派。是年春，法国暗中准许越过它的边界向效忠派运送军火武器。通过此渠道，与总统亲属G·霍尔·

---

① 转引自〔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386页。

② 德、意曾先后派出30万正规军以志愿兵名义协助佛朗哥作战。

③ 达莱克：前引书，第203页。

罗斯福有联系的共和政府代理人，在3、4月间向效忠派运送去30批战略物资。6月间，总统还设法售与效忠派150架飞机，但在霍尔到达巴黎之前，英国已说服法国对军火运输关闭边界，效忠派没有得到这批军援。

7月5日，不干涉委员会达成协议，要求在国际监督下从西班牙撤出非西班牙军事人员。10月，国际纵队撤出，但德、意进行拖延。11月、12月以及1939年1月，罗斯福3次修改中立法以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努力失败后，佛朗哥和墨索里尼军队于4月3日攻占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终被扼杀。罗斯福虽然承认了向西班牙共和国禁运军火武器是个严重错误，但在马德里陷落后，美国也承认了佛朗哥政权。

〔对德绥靖政策〕　1935年3月上半月希特勒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扩军时，离罗斯福提出的参加国际法庭法案被参院否决之后不过月余，他感到十分沮丧；加之当时国会和公众中孤立主义情绪日益强烈，群众中的和平运动甚嚣尘上，害怕卷入战争。驻英大使罗伯特·宾厄姆又写回报告说，预计4月间在斯特雷萨召开的大国会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让法意发发牢骚，英国并不愿孤立或惩罚德国。有的人甚至推测，英国认为德国扩军有利于反苏反共，并平衡法国力量，加强欧洲均势。因此，美国国务院甚至连抗议照会也不愿向德国提出。3月22日，赫尔还发表希望继续的谈判将取得“总的缓和”，罗斯福则到佛罗里达州海面钓鱼去了。

6月18日，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英德海军协定签订，允许德国建立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实力35%的舰队。美国国务院官员讨厌英国创造一个第六海军强国，“但他们断言美国关注的主要是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而且一般说来这个协定构成‘欧洲与世

界安定的建设性因素'。"[1] 罗斯福这时正推动第二次百日"新政"立法，只是认为英国铸成一个长远性错误。

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2] 不过，只要有机会对德国施加一点压力而又不太妨害他竞选，罗斯福还是愿意干的。6月30日，他让摩根索对德国单独实施反倾销税，使德国很快就停止对出口美国的货物给予津贴。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1936年是总统选举年；到7月后，罗斯福又配合英国防止西班牙内战发展为全欧战争，一直不对德、意禁运军火武器，罗斯福对德意是实行绥靖政策的。

1937年2月，罗斯福同意摩根索征求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意见：为了减轻军备竞赛引起的财政负担，为维护世界和平，英、美可以采取何种勇敢的外交倡议。张伯伦认为，美国能够采取的最好办法，是修改中立法，并协助稳定远东局势。这当然是苦罗斯福之所难。5月，诺曼·戴维斯在英与已升任首相的张伯伦会谈，冀图找出一种满足德国人民经济需要又不致引起战争和德国在欧洲独占鳌头的、总的政治、经济解决办法，遭到张伯伦拒绝。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10月5日的防疫演说主要是针对日本的，但也涉及德国和意大利。10月6日，他又从隔离侵略者的立场后退，同意现已升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的意见，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制定"基本规范"或"国际行为准则"，以解决世界上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赫尔认为这种会议会麻痹正需

---

① 阿诺德·奥夫纳：前引书，第116页。

② 达莱克：前引书，第179页。

要武装自已的民主国家的意志，只会达成一些轴心国家视同儿戏的毫无价值的协定。罗斯福又将这一计划放弃了。

1938年1月12日，罗斯福又将稍加修改的韦尔斯计划通知英国，张伯伦担心它将妨碍他上年11月开始的与德意的和谈；他在这种和谈中答应德国改变凡尔赛条约造成的现状的要求，希望德国充当反苏先锋，还准备正式承认意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罗斯福虽然怀疑张伯伦的这种绥靖政策是否能起作用，尤其反对他不是作为整个和平计划的组成部分来承认意对埃的征服，但是，他也不想阻止张伯伦的绥靖活动。

鉴于英美的这种纵容态度，德国于2月间进一步与日勾结，承认伪满洲国。3月，希特勒合并奥地利。虽然美国公众与官方表现极大的愤慨，但美国官员们像张伯伦一样没有准备；张伯伦则告诉议会：除非我们和其他国家曾经准备运用武力，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4月初，英、法、美分别撤销驻奥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实际承认了德奥合并。只有苏联对德国进行了谴责。同月16日，英国正式承认意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美国在国务院的坚持下也照章办事。

5月上半月，希特勒准备以武力支持捷克斯洛伐克300万日耳曼人的纳粹领袖在苏台德区实行自治的要求。由于捷人民的反对和英、法、苏声明以武力援捷[1]，希特勒暂时让步。经过反复酝酿，英法于9月21日强迫捷答应将日耳曼人占50%以上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割给德国。但当次日张伯伦带着这份不光彩的厚礼送呈希特勒时，希特勒又提高了要价：在一些日耳曼人并不占居民多数的地区，也应通过投票决定归属；捷还应将一些领土割

---

① 法、苏与捷克订有互助条约；英、法希望通过它们之手，以和平出卖捷克为代价，全面调整与德国关系，使德充当反苏先锋。

给波兰和匈牙利。

在英法迫捷割让领土的过程中，美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是赞成对德让步的，驻法大使布利特害怕战争会导致共产主义胜利，也主张迫捷让步。罗斯福虽然直觉地感到张伯伦不对，但当听到英法迫捷割让日耳曼人占 50% 以上地区时，他却密召英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并对他说：这是历来要求一个国家作出的最可怕而残酷的牺牲。但接着又说，要是英国能成功，他是第一个感到高兴的；他不想鼓励捷克人进行无效的抵抗。9 月 26 日，当希特勒以武力威胁捷克在 10 月 1 日前移交苏台德区，英法基本按照希特勒要求迫捷割让领土时，罗斯福致电德、英、法、捷首脑不要使谈判破裂。28 日，当张伯伦应希特勒邀请前往慕尼黑时，罗斯福致电称他是"好人"。

29 日，在德、英、法、意 4 国首脑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上，通过了德国事先拟好的建议书。30 日，4 国首脑签订了以此建议书为基本内容的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立即割让苏台德区与德国（包括军事设施、厂矿企业与运输工具等），并于 3 个月内满足波兰与匈牙利领土要求，使捷克损失约 1/3 的人口与领土。对此，美国除少数外交家感到愤怒与不安外，副国务卿韦尔斯于 10 月 3 日发表广播讲话说：现在有了个建立基于正义与法律的新秩序的更好机会，罗斯福则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共庆避免了战争，并函张伯伦说，他和他一样希望建立世界新秩序，他赞成和希特勒一同处理那些仍未解决的问题。

希特勒受到慕尼黑协定的鼓舞，1939 年 3 月中旬吞并了整个捷克，大大加强了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英法两国仍然执行绥靖政策，不愿履行慕尼黑协定附件规定的保证捷克新边界的任务。墨索里尼眼红，于 4 月 7 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两国并于 5 月 22 日建立军事同盟。罗斯福除谴责德国外，还公开要求修改中

立法。在国会讨论修改中立法的过程中，罗斯福于4月14日致电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要求他们保证在10年内不进攻31个欧洲国家与近东；作为交换，美国将展开外交谈判以削减军备，并打开为所有国家同样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国际贸易渠道。墨索里尼对此电予以嘲弄，希特勒在4月28日嘲弄此电时，还宣布废除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苏联建议召开英、法、苏、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共同制止希特勒的侵略。但主要由于英国仍不能忘情于绥靖德国以东引祸水，使英、法、苏谈判拖延数月之久，到8月21日以破裂告终。与此同时，从5月到8月底，英国一面与德国进行多次密谈，一面继续与苏联谈判以提高向德国的要价。德国一面与英国密谈，一面积极进行入侵波兰的准备工作。苏联为使自己不致成为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接受了希特勒多次提出的要求，于8月19日与德签订俄德贸易协定，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罗斯福对苏联的这一行动不理解，曾于8月11日通过苏驻美大使进行劝阻。此外，他还于8月23日向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呼吁防止战争，24日直接向希特勒与波兰总统呼吁通过谈判或调停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罗斯福的这些电信，正如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所预言，其作用像某人为了赢得好感送给丈母娘的一份过时礼物的一样。①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继中国抗日战争之后，欧洲也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

① 达莱克：前引书，第256—258页。

五、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卢沟桥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1933年5月3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力量剿共，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向日本敞开了华北大门。为同日本的扩张相抗衡，并帮助蒋介石政权围剿中国红军，美国于6月间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翌年，国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利用任何其他国家势力以抵抗日本的任何企图；反对任何外国以技术或财政援助名义采取的援华抗日联合行动。这一声明，无异于否认了门户开放政策。4月23日、29日，英、美两国先后提出了抗议，日本虽在美国提出抗议之前，已经口头上表示支持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但到1935年，由于英美忙于应付德意扩军、侵略活动，而美国还出现孤立主义高潮，无暇东顾，日本又借故寻衅，控制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并策划华北自治，迫使中国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主任，企图使华北5省在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受日本控制。同年10月底，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时，还提出所谓对华政策三原则：中国与日本联合镇压亚洲共产主义；中国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国承认"满洲国"，并实行中日经济合作。11月，美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前译詹森），警告说，接受广田三原则将"使中国几乎完全受制于日本"，但美国无所作为。[①] 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占领全中国。……威胁到了全国人

---

① 阿诺德·奥夫纳：前引书，第146页。

民的生存。"[①] 但国民党政府仍低三下四地与日本谈判。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部以荒木贞夫为首的、主张以武力夺权并实行征服的皇道派发动政变。政变被镇压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主张注意策略以实行断然改革的统制派占据军部领导地位。3月，在东条支持下，前外相广田组成听命于军部的法西斯内阁。8月，该内阁通过基本国策，要求促进日、满、华北的军事、经济一体化以加强对俄防御，并谋求外交国防相辅相成，在确保帝国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就是日本南北并进、先攻中国的狂妄计划。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向宋哲元提出中日经济合作具体计划。宋拒绝后，日本法西斯积极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面对这一新形势，日本军内外侵华战争论调甚嚣尘上。1937年5、6月，华北日军举行频繁军事演习，终至在7月7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由此可见，七七事变前，这3个法西斯国家已经勾结在一起，致力于彻底摧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七七事变后，他们又于11月6日签订议定书，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因此，从七七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乃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美国对日本的纵容〕　1935—1936年间，罗斯福虽一再争取区别对待的中立法，一再警告有发生新

---

① 《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1卷，第129页。

的世界大战危险，但由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势力强大，美国只在南京政府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并使中国币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美国集团，而对日本侵华活动，除稍稍提高日货关税外，别无所为，还允许军火商向日本出售军火武器。仅 1936 年 1 年，美国运日军需品价值即达 1500 万美元。

七七事变引起的形势变化，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牢记心头的罗斯福[①] 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当时罗斯福在国内正处于困境之中：由于他提出司法改革法案时作法欠妥，加强了反对他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保守派的联盟；他未能制止强大的工人静坐罢工运动疏远了支持“新政”的中等收入者阶层；1937—1938 年经济衰退正在萌芽。因此，到 7 月 16 日，罗斯福才让赫尔发表一个并非谴责日本侵略的声明，只说是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为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利和义务，并不分皂白地劝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制。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增派 1，200 名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保护美侨，但不久又在和平团体强烈要求下号召在华美国人撤离，否则自担风险。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宣而战，罗斯福认为实施中立法对无力现购自运的中国不利，迟迟没有实施。8 月底，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使中国购自美国的 19 架飞机无法由美国政府货船运回。这件秘密泄露后，孤立主义者与和平团体公开要求实施中立法。9 月 14 日，罗斯福宣布不准官方船只运送军火、武器给中国和日本，其他美国船只不限，但需自担风险。这对有能力现购自运的日本当然有利。

---

① 他关注日本渔民侵入阿拉斯加水域，终于将之关闭。他调查过是否有大量日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甚至中美洲定居。

10月5日，为抵消全国盛行的孤立主义思想，也为了公开表达美国对法西斯国家、尤其是日本侵略行动的愤慨，并着手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到美国不能自保安全，罗斯福公开号召中立国家联合起来，以某种非战争方式惩罚侵略者，乃在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他指出，当前国际上无法无天状态已发展到严重威胁文明基础的地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像隔离瘟疫那样隔离侵略者、隔离那些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国家[①]。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日本的在华行动不符合国际关系原则。苏联和其他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欢呼罗斯福演说。到8月，谨慎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发表了响应的声明。

在国内，"防疫"演说最初反应大体上是好的，但不久就引起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把"隔离瘟疫"与"战争"混为一谈。赫斯特系报纸指责罗斯福"为英帝国火中取栗"，许多企业界人士和共和党人说罗斯福是用国际问题转移公民视线，使他们不去关心经济衰退引起的困难。因此，虽然10月8日总统曾考虑到说服各国向日本关闭港口，不给日本财政援助，还想到对日海军封锁的问题[②]，但在赫尔、韦尔斯等人劝说下，他完全退却了，没有采取任何隔离行动。

10月6日，正在试图采取某种反对日本的具体行动的国联，发表公报谴责日本侵略，并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开会讨论。英国害怕日本损害其在远东利益，非常赞成此建议。赫尔也同意，并

---

① 据弗雷德尔，罗斯福在公开演说中，虽未指明在何处实行隔离，实际上是指在太平洋地区隔离日本。而且他相信，如果这样做，不会引起战争，日本将会屈服，不会发动报复性攻击。见所著《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263页。

② 弗雷德里克·马克斯第三：《沙漠之风：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70页。

建议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前，英、法就要求美国带头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之类的强硬措施，而美国国会、国务院和舆论界大都坚决反对这样做。日本拒绝参加会议，罗斯福为了笼络它，又频频和它暗中表示友好[①]。所以，会议虽然从11月3日开到24日，其结果不过是重申九国公约中的一些原则而已。

日本看到布鲁塞尔会议不过是放空炮，12月12日，它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②]。同日，它还在南京附近长江中炸沉美国炮舰帕内号和标准石油公司3艘油轮。3人遇难，43人受伤。在日本飞机进行轰炸时，天空晴朗，4艘船桅上美国旗十分耀目，特别是帕内号船顶甲板上还绘有两幅长18英尺、宽14英尺美国旗。显然这是一种有意挑衅。罗斯福了解到此情况时，虽然谈到对日本禁运石油和棉花以及英、美共同封锁日本，但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反应温和得出奇，而且强烈要求撤退所有驻华美军[③]。此外，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国会还提出了第3章第5节中谈到的孤立主义的勒德洛宪法修正案，要求表决。因此，罗斯福又退缩了。日本人只是道个歉，并于23日付了一笔赔偿费，这个严重挑衅事件就不了了之。

占领南京后，日本担心其实力在中国消耗过甚，无法与大力援华的苏联抗衡，乃通过德、美两国诱降国民党政府。1938年1月中旬，因诱降不成，遂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妄图速战速决，并不断侵犯英美在华侨民与财产。罗斯福政府或则考虑联合英国在太平洋显示海军实力以遏制日本，或则考虑配合英国绥靖德国，以诱使日本按照九国公约停止对中国侵略。正在他举棋不定之

① 马克斯第三：前引书，第63页。

② 据统计，日军当时屠杀的中国人达30余万。

③ 1938年1月，美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70%被询问的人说他们赞成美国完全从远东撤退。4个月以前，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有54%。

时，德国于2月20日承认伪满，进一步与日勾结。7月，德国又应日本要求，撤回在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允许日本在太平洋行动自由，以换取日本支持其在欧洲扩张。日本则对中国狂轰滥炸，并于10月攻陷武汉和广州。11月3日，日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建立以日本、伪满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并公开否认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决心创建一个东亚集团，保证它拥有与英美一样的自足经济。

12月，国民党政府撤到重庆。

〔绥靖为主、反击为辅的对日政策〕　1938年，美国官员们“对中日战争看法开始转变。认为这场冲突不能再被看作中日两国间事件，必须看到它对美国利益和世界政治均势的长远意义。……

“即使一向是如此谨小慎微，美国政策制订者们现已开始考虑可以减缓日本侵略的一些措施。是年春，中国人第一次被允许用售银给美国的收入购买军需品……。6月，赫尔国务卿宣布政府将劝阻出售飞机给那些用它们轰炸平民的地区——从而开始了向日本禁运飞机与零件的工作。”①

日本宣布东亚新秩序促进了财政部长小摩根索的援华活动。摩根索从6月起，就和农业部长华莱士、内政部长伊克斯、国务院高级顾问霍恩贝克、驻法大使布利特等人致力于对华贷款，但因赫尔认为这件事政治性太强，怕得罪日本，坚决反对。日本宣布东亚新秩序前后，摩根索一再向罗斯福说明：美国只需一艘战列舰代价，就可维持中国抗战；如果中国停止抗战，美国就需用更多的钱建设海军。而且，目前只有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这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与苏联对中国控制。此外，向中国提供桐油

---

① 阿诺德·奥夫纳：前引书，第155页。

贷款，让中国购买美国汽车与石油，这有利于美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罗斯福有所松动。11 月底赫尔因公离开华盛顿后，摩根索就与代理国务卿说服罗斯福于 11 月 30 日批准了对中国 2，500美元桐油贷款，并于 12 月 9 日具体落实。[①]

1939 年，美、日关系继续紧张。日本在 1938 年第一次北进尝试——张鼓峰事件——中失败后，展开南进序幕，于 1939 年 2 月占领中国海南岛。3 月，又占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 10 万平方英里中国海域，威胁着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一带主要航道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利益。然而就在此时，罗斯福于 3 月 1 日决定用一艘巡洋战舰将 2 月去世的日驻美大使斋藤博骨灰送回日本，表示友善。[②]

6 至 7 月，日本狂炸重庆，平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美国大使住宅几未能免。7 月 24 日，英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克雷吉—有田宣言，以保留天津英租界为条件，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与日军在占领区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公众与国会又要求对日禁运军火武器与限制贸易[③]。因此，罗斯福于 7 月 26 日决定通知日本：美国将在半年后废除 1911 年两国通商条约。这里应当提到的是：此前美国为了绥靖日本与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利润，1937 年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

① 此贷款详细过程可参阅任东来：《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1946)》，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1988 年未发表博士论文，上册，第 21—33 页。

② 不过，当日本人准备隆重欢迎时，赫尔却电驻日大使格鲁不要接受日方超常接待与高贵礼物；罗斯福于骨灰抵日前，宣布美舰队将回到太平洋，并在夏威夷演习；骨灰抵达后一日参议员皮特曼向参院提出一决议案，允许罗斯福割断与日本一切贸易。

③ 1939 年春夏民意测验表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并抵制日货；国会也提出若干决议案，迫使总统限制同破坏 1922 年九国公约的国家进行贸易。见达莱克：前引书，第 276 页。

汽油、铜、铅，分别比1936年增加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和64.7%。从1937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

日本对美国宣布将废除1911年日美商约反应强烈。8月，它恢复了与德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直至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才终止。9月，日本第二次北进尝试——从5月开始的日本与苏联在我国东北和外蒙边界间的军事冲突，以日本失败而告结束，欧战开始。美国担心英法无暇东顾，向日本屈服，牺牲中国，退出远东，10至12月间，又让格鲁作了一次改善日美关系尝试，但未有结果。于是，美国将1938年上半年对日实行的飞机道义禁运扩及铝、钼和制造高辛烷燃料的技术情报。然而对中国一再要求的贷款，因为不愿关闭与日本谈判之门，始终未予应允。

第八章

从备战到参战

如第 5 章第 5 节中所说，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经济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推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但是，由于转变性质不同，这些国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武力扩张的类型；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类型。前者是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者是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前提下的“福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在对外关系上虽总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但特别强调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因此，这两类国家之间不独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原料、市场、投资场所这类一般矛盾，而且存在着社会体制的冲突。前一类型国家不受遏制地发展，意味着后一类型国家的灭亡。所以从根本上说，罗斯福的“新政”国家是会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法西斯的凶相日露，它的反对也会日益强烈。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前章所述，从罗斯福就任总统起，法西斯国家就逐渐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摧毁着有利于美国的旧有国际结构。这不仅威胁到美国垄断资本的国际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还逐渐威胁到西半

球和美国的安全以及美国的社会制度。

罗斯福是意识到这种威胁的。我们上章中提到的他上台后早期迎击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就是证明。他的政府中的一些人，后来也逐渐感觉到这种威胁。所以他的政府在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只要条件许可，就避开政府中和社会上强大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势力的反对，对法西斯势力进行反击，并从事扩军备战。到 1938 年慕尼黑协定后，罗斯福政府已逐渐改变对内对外政策方向，力图摆脱绥靖政策。1939 年 9 月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政策虽然是尽力防止自己卷入战争，但基本上是适应备战和支援英、法、中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需要的。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投降后，罗斯福采用战争外一切方法援英。1941 年 6 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美国正式加入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英、苏、中一起为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奠定了基础。

不过，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也不是完全放弃了绥靖政策，对日本尤其如此。但这种绥靖活动，虽然使我国和亚洲人民受到严重损害，基本上是一种战胜轴心国策略；美国并未公开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和对日战备。当然，这不是像某些美国学者说的“对中国友好”、“坚持国际道义”，而是要保持和发展美国在远东利益。即因此故，最后导致珍珠港事变，使美国正式参战。

一、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及其对美国利益与安全的威胁

如前章所述，罗斯福执政以来，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在英、法、美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日益膨胀，到 1938—1939 年，除明显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外，甚至威胁到西半球和美国的安全。

〔美国日益面临欧亚法西斯势力的直接威胁〕　在法西斯

势力扩张初期，像罗斯福这样一些较有远见的美国人，虽然意识到它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但是，在地理上有大西洋、太平洋作为屏障；在军事上，远东有中国的抗战，欧洲、非洲有英、法，还有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都是轴心国家的敌对势力。因此，当时法西斯势力对美国的威胁还是比较间接的。到 1938 至 1939 年，日本除无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断在中国占领区侵犯美国利益外，还将蒋政权逼处重庆，使中国抗战形势岌岌可危。同时，由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和南沙群岛，不独威胁着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一带航道，还有了进攻西南太平洋上西方国家属地的基地，而这些地方乃是美国重要战略原料橡胶、锡、奎宁、马尼拉麻的主要产区。如美国学者所说，当时日本有在西南太平洋发动战争的征候，“这就会威胁美国主要的资源供应和交通线，并将包围菲律宾。”[①]

在欧洲，希特勒在英法绥靖政策卵翼下积极扩军备战的结果，德国除海军外，其陆军和空军比英法陆空军占有优势[②]；并在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梅梅尔后，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缓解了东线威胁。1939 年 9 月第一周，希特勒摧毁了波兰空军和大部分地面部队，完成了对华沙包围。这时，“据罗斯福接到的一份报告说，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保罗·戈培尔希望在几天之内摧毁波兰，迅速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粉碎性空袭，并最终从内部征服美国。”[③] 意大利也表现出建立环绕地中海罗马帝国的野心，墨索里尼的主要新闻喉舌甚至叫嚷：“巴

① 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第 36 页。

② 详细比较请参阅〔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上册导言。

③ 达莱克：前引书，第 289 页。

拿马运河是法西斯主义的边界。”[①] 佛朗哥则企图重温“再建西班牙帝国”的旧梦。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日益直接面临来自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威胁。1939年12月中旬，罗斯福致函威廉·艾伦·怀特说，“目前的事情对我们自己的未来隐含着严重的威胁，而我们对此却估计非常不足。……重要的是，要警告美国人民，他们应该想一想欧洲和远东的情况最终将给我们造成什么后果。”[②]

〔*法西斯势力的蔓延及其对拉丁美洲的渗透*〕 法西斯势力的威胁，还不仅来自德、日、意3国。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乱及其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以及对许多欧洲国家出现的‘红色’革命的恐惧”的产物；[③] 或如朱庭光所说，“是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一种国际范围的反动的历史现象。”[④] 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右翼利用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狂热运动以克服经济危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企图；它反对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政策。除德、意、日外，其他有些国家也具有产生这种毒菌的土壤。因此，在德、意的影响下，30年代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奥地利等国，都存在着法西斯政党或政权；甚至在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较深厚的英、法两国，也有过法西斯运动和政党。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还产生过影响较大的法西斯运动和政党。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不引起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传统自豪的美

---

①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第554页。

② 达莱克：前引书，第303页。

③ 〔英〕F. L. 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第4页。

④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第10页。

国领导人的警惕。但是，更使美国人担心的，则是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对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渗透。

拉丁美洲各国居民的构成，给法西斯渗透提供了社会基础，因为这些国家住有大量法西斯国家的少数民族。巴西有 80 万德国人，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南部，有 300 万说意大利语居民，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西有 40 万日本人，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地约有 400 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轴心国家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再加上希望恢复它在拉美日益没落的地位的天主教会的帮助，它们向拉美渗透的速度是很快的。

从经济方面说，1934 至 1938 年拉丁美洲各国输出中，德国所占份额从 7.9%增至 10.5%；输入中，德国所占份额从 9.9%增至 16.2%。同期内，美国在拉美输出中所占份额，仅从 29.4%增至 30.2%；在输入中所占份额，仅从 30.1%增至 33.9%。到 1939 年，在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进口中，德国已压倒美国而占第一位。在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圣多明各、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萨尔瓦多、委内瑞拉诸国的输入总额中，德国已压倒英国而居第二位，和美国的非常接近。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海地的输入额中，德国份额虽居第三，但其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英、美。1939 年 9 月前，德国在拉美的投资大大增加：巴西有 1 亿美元；阿根廷有几千万比索；委内瑞拉的瓦伦西亚—加拉加斯铁路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秘鲁和智利也有相当数量的德国资本。到 1938 年，德国已在拉美经营好几家航空公司；到 1939 年，进出于拉美的船只，美国的只约占 5%，而德国则约占 9%[1]。

---

① 〔苏〕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1939—1959）》（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第 68 页。

赫尔评论说，德国“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与拉美的贸易关系。”① 1939年，美国《时代》周刊称德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能手②。

1936年，日本派出的经济代表团几乎访问了全部拉美国家，并进行了加强经济关系的谈判，使日本得以利用倾销政策迅速向拉美市场渗透。比如，到1938年，日本已掌握厄瓜多尔进口额的7.4%。在巴西，日本资本为数达2，500万美元。日本资本在秘鲁尤其占有稳固地位。

意大利的经济代表团也遍及拉美各国。特别是它的航空公司，在控制拉美商业航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政治方面说，德国的纳粹党在拉美各国德侨中建立了它的海外分部，还组织当地的纳粹党。欧战爆发前巴西的80万德国人中，就有10万是纳粹党徒。德国驻拉美各国外交机构组织起类似德国冲锋队的各种“第五纵队”，刺探情报、阴谋破坏、实行恐怖活动。从军事方面说，德国参谋总部派出许多军事代表团到拉美各国，训练这些国家的军队，并培养它们本国的指挥人员。许多拉美国家的参谋总部，实际上成为柏林参谋总部的支部，是间谍活动的中心。希特勒分子窃取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其他一些国家警察机关的重要职务。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德国间谍网遍布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在文化方面，德国在拉美各国的外交机构大力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到欧战前夕，德国仅在阿根廷就有203所学校、301个德国社团；在巴西有2，000所学校和2，300个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团

---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两卷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8，第1卷，第496页。

② 1939年10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

体。

据李春辉说，日本和意大利从1933年起，也和德国一样，采取各种手段，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向拉美各国发动一系列攻势[①]。

据乌拉圭政府1940年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对法西斯叛乱阴谋进行的调查，叛乱者拥有军火库，准备在各飞机场和铁路枢纽站进行破坏，并组织突击队首先在乌拉圭，然后在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建立德国的保护国。[②] 此外，1935年智利曾发生法西斯组织发动的政变，1938年5月巴西的法西斯党——整体党——谋刺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巴西政府在粉碎这次政变时搜査整体党总部，发现了德国插手的确证。同年，阿根廷建立了具有法西斯性质独裁统治。

威廉·福斯特评论道，“这一个成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轴心的险恶的第五纵队的巨大的法西斯运动，对于美洲各国人民所有的民主自由是一种可怕的威胁。”[③] 罗斯福是深深认识到这种威胁的。1937年11月，罗斯福私下承认：“除非世界舆论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危险，我们是无法阻止它的蔓延的。”[④] 1939年5月19日，他向众议院领袖们“警告说，德国和意大利起码有一半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会乘胜向拉丁美洲进行渗透。那么，‘无需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西半球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此外，总愿意跟大汉们玩耍的日本人，很可能同德、意结成牢固的联盟’。假如美国对这一威胁‘掉以轻心’。3个

---

① 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上册，第226页。

② 参见根室著：《拉丁美洲内幕》，纽约1941年版。

③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中译本），第557页。

④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290页。

轴心国将情不自禁地‘动手，跟我们打另一场速决战’。”[①]

由于轴心国家的这种协同扩张行动日益放肆，美国人民也日益感到拉丁美洲前途充满凶险，连孤立派头面人物、参议员罗伯特·雷诺兹在数次访问拉美之后，也严肃警告其同僚说，“居住在大洋对岸的那些希望在〔拉美〕站住脚的人们……正通过广播……不断地轰炸其人民……我致意参议院：我们应该注意美洲事务，并将这些外国制造的任何运动消灭于萌芽之中。”[②]

二、欧战前美国采取的一些反法西斯威胁的措施

如前所说，美国和轴心国家虽然都是急剧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两者的社会制度有所不同，最终必然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罗斯福早就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在就任总统初期就进行过迎击德、日法西斯威胁的尝试。由于这种尝试受到国内外绥靖势力的掣肘，他乃在国内努力实行“新政”，用“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轴心国家的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竞赛；在国外，他积极与苏联建交以牵制日、德，并执行“睦邻政策”以巩固后院。与此同时，他还“背着公众策划各种计谋对侵略者施加战争以外的各种压力，并武装潜在的受害者。”[③] 比如，1935 年，他密令海军占领太平洋上豪兰、贝克和贾维斯等小岛，并在 1936 年宣布它们属于美国，作为对抗日本的一连串基地。1936 年 6 月，他在国会的制约下不得不

① 达莱克：前引书，第 269 页。

② 美国第 75 届国会第 3 次会议《国会纪录》，第 376 页。转引自塞利格·艾德勒：前引书，第 114 页。

③ 弗兰克·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 290 页。

对希特勒占领莱茵区的行动采取“不干涉”政策时，却悄悄应法国莱昂·布卢姆人民阵线新政府之请，与英国商议后，协助法国使法郎贬值，缓解经济困难，并于9月间达成协议。1937年初，他悄悄着手改善同苏联关系，希望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共同对抗德国和日本，于1月间派约瑟夫·戴维斯出使莫斯科，以赢得斯大林信任。6月，他又撤销了国务院积极反苏的东欧事务司。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被迫宣布不准官方船只运送军火武器给中国和日本以后，又密告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中国仍可采购美国军火，并先运至越南和香港，然后再转运到内地。”[①] 1938年3、4月间，如前章第4节所说，罗斯福还秘密伙同法国给西班牙共和政府运送去30批战略物资，并准备运送飞机150架。

慕尼黑协定后，罗斯福虽然也期待着“会带来‘以正义和法治为基础的新秩序’，但他对此却不抱什么信心。他主要把慕尼黑会议看成是战争威胁中的一个插曲，民主国家必须面对威胁，重整军备。有些人也持同样看法。”[②] 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力量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勾结。10月1日，代表着21个组织的美国少数民族大会向罗斯福发出一份电报，指出慕尼黑协定将怂恿法西斯强盗去奴役各国人民，增强侵略者的战略地位，并促成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同日，纽约举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费城和圣路易斯举行了声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集会。10月2日，反对慕尼黑勾结的群众性活动，在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奥尔巴尼等地仍继续不断。这样，罗斯福政府虽仍然执行绥靖政策，但也逐渐公开采取一些反法西斯威胁的重要措施。

---

① 任东来：前引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上册，第19页。第20页还提到，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内，美国购买中国白银价值达1.38亿美元，其中4，800万美元用于购买战争物资。

② 达莱克：前引书，第247页。

〔援助英法等国，争取废除或修订中立法〕　上章最后一节已提到这一时期中美国的援华贷款，这里我们着重谈美国对英、法等国的援助。1938 年 9 月慕尼黑会议之前，罗斯福考虑到英、法可能因帮助捷克而被迫参战，曾着手制订支援它们的计划。9 月 12 日，英驻美大使报告英国外交大臣说，罗斯福为德国蛮横外交所激怒，曾向他声明：除军队和贷款外，英国可指望得到美国任何援助。19 日，罗斯福在秘密召见英驻美大使时对他说，英、法应打防御战，不要打进攻战，因为这种哀兵战术可能打动美国人的心，同意给它们运送军火武器，并最终使美国"以某种方式"参战。慕尼黑会议后，10 月 14 日，罗斯福批准法国派遣代表团来美国商谈购买飞机以及在加拿大建造飞机装配厂等事宜。11 月 14 日，罗斯福为了强调以飞机支援英、法的必要性，对他的军政要员们说，德、意现已拥有上万架现代化飞机，并具有年产 14，000 多架飞机的能力。这约为英、法拥有飞机的 3 倍，并比它们目前年产量多 5，600 架。① 12 月中旬，法国代表团向美国政府提出购买飞机，罗斯福立即同意，并责成摩根索负责谈判。摩根索不顾军界首脑们泄露重要军事机密的担心，主张售与法国以最先进的飞机。但是，到 1939 年 1 月，美国飞机生产能力证明，法国所购最新式的美国 P－40 型战斗机要到 1940 年 5 月才能交货。于是，法国取消了 P－40 型战斗机定货。

与此同时，美国航空部队违抗罗斯福命令，拒绝让法国人参观道格拉斯 DB－7 型攻击轰炸机。罗斯福断然拒绝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警告，明确表示要从速使法国政府得到所需任何类型飞机。航空部队虽然遵从了总统指示，但 1939 年 1 月 23 日一架道

① 罗斯福的这些估计数字的根据是英法方面的情报，一般认为很可能夸大了德意当时的空军实力。

格拉斯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失事，试飞驾驶员身亡，一位法国观察员受伤。这件事引起了报界质询和参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为平息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忿懑，罗斯福把委员们请到白宫，并向他们说：一旦一个国家控制了欧洲，它就可以转向对全世界的控制。他一一列举德国的周边国家并继续说：如果英、法、荷的殖民地落入德国之手，其结果将不堪设想。这就是我们必须关心莱茵河边界安全的原因。当一位参议员问他，他是否说美国的边界在莱茵河时，他说不是。不过他认为，如果莱茵河边界受威胁，世界的其余部分也就受威胁；一旦莱茵河边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国将到处挑起战争。有一位参议员向记者透露了这次谈话，于是，全世界都知道罗斯福说美国的边界在莱茵河。

尽管受到孤立主义参议员的无情攻击，罗斯福帮助英、法的政策未变。"莫内[①] 订购了600架飞机，并获得坚决保证，1940年初再买1500架。他订购的轰炸机架数，为法国工厂能够生产的数量的两倍。到9月战争爆发时，法国已得到原订购飞机的相当一部分。尽管罗斯福尚未实现其给法国人提供压倒性空军力量的目标，但他已开了个好头。"[②]

除援助英、法外，1938—1939年冬，罗斯福为使西班牙共和国不致被饥馑拖垮，任命了一个西班牙平民救济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教友会一起，从事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平民的救济工作。1939年夏，他乘纽约世界博览会举行之机，邀请斯堪的纳维亚各皇室成员访问美国，表示对这些受到威胁的统治者的政权的支持。

---

① 法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全名为让·莫内。他由美驻法大使布利特向罗斯福推荐，并受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之命，前来美国洽谈购买飞机等事宜。

② 弗雷德尔：《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312页。

1937年中立法规定，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就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这对轴心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重整军备计划已进行很长时间，而英、法等国则刚刚开始。如果废除或修改中立法以取消禁运，则英、法等海洋强国战时能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因此，从1938年秋起，罗斯福就想废除或修改中立法。他委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负责此事。皮特曼身体虚弱而且酗酒，工作难有进展。直到1939年3月20日，他才提出一项中立法修正案，取消武器禁运，规定所有贸易都可按现购自运原则进行。这就保证了英、法在战时可利用其控制的大西洋航运，获得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罗斯福认为此修正案对中国不利，因为中国没有资金和货船进行现购自运贸易，加上此时民意测验对修订中立法有利，因此，罗斯福要求彻底废止中立法。3月28日，他给赫尔和韦尔斯写信说，现购自运原则用于大西洋是十分正确的，而用于太平洋则是完全错误的。他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是深信现行中立法应完全彻底地予以废止。同时，他还指示韦尔斯起草一份广播稿，将此意向全国广播。但是，皮特曼回答说，废止中立法是不可能的。参院外交委员会连皮特曼的修正案也未予通过。4月7日，意大利在德国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梅梅尔后，占领阿尔巴尼亚。此时，欧洲的各条边界都集结了军队，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4月8日和11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反复申述了这种不受遏制的侵略给美国造成的危险，说明国家需要丢开那张“不参战的保证书”，挺身而出，明确与英法结盟。同时，他又与赫尔共同活动，决定先从众院打开修订中立法缺口。5月19日，罗斯福邀请众院一些领导人在白宫开会，和赫尔一起向他们说明取消武器禁运对维持和平与在战争中战胜轴心国的重要意义。5月27日，国务院草拟的修改中立法的建议的副本分别送交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

席。29日，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所罗门·布卢姆提出一项含有赫尔建议要点的法案，规定取消军火禁运。虽经外交委员会通过，但提到众院后，众院于6月30日通过一项修正案，完全否定了政府的意图。7月11日，参院外交委员会决定将中立法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再讨论。

罗斯福由于深信只有美国立刻表示愿意支援英、法等国，才能防止战争，于7月14日将赫尔的一项强硬声明送交国会。声明指出：武器禁运不利于世界和平和美国的更高利益与安全，要求国会重新考虑它的决定。18日，总统和赫尔邀请参院一些领导人来白宫开会。他们和不愿修改中立法的参议员们辩论达3小时之久，也未能说服他们相信战争即将发生。当赫尔提到国外来的消息不妙时，博拉参议员傲慢地说，他有自己的、比国务院情报更可靠的情报来源。其他在场的参议员们则认为，在本届国会中不可能集结起足够力量修改中立法。这样，直到8月5日休会时，国会仍维持着1937年中立法。

为什么在欧战爆发前夕、美国人民对法西斯侵略日益反感时，美国国会仍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呢？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认为，是由于国会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担心罗斯福滥用其自行决定一切的大权，使美国卷入战争；是愤恨英法迟迟不偿还战债，不信任英法对轴心国家政策；但最主要的是共和党人担心罗斯福可能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急于要贬低并削弱他的声望①。

修改中立法的努力失败后，当纳粹对波兰威胁日益严重时，罗斯福使他政府中人士完全明白：美国只是按照中立法字面实行

---

① 阿诺德·托因比等编：《大战前夕，1939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下册，第1017页。

中立法。后来，在欧战爆发后，他还延迟了两天宣布实施中立法，以便英法赶忙将战争物资运出美国边界。

〔对轴心国态度日益强硬〕　虽然美国孤立主义者与英、法绥靖派认为，对轴心国家态度愈强硬，愈易引起战争，但罗斯福看法与他们的相反。所以，慕尼黑会议前不久，1938 年 8 月 16、18 日，罗斯福与赫尔就在他们的演说中向希特勒提出隐约的警告：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自有主意。罗斯福还对一批加拿大人说，美洲不再是遥远的大陆，大洋彼岸的争端与它休戚相关；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巨大丰富的资源、蓬勃发展的企业和我国人民的力量，使我国成为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因素。后来英、法对德绥靖，如前章第 4 节所说，罗斯福却又跟着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慕尼黑会议后，10 月 9 日，在希特勒宣布扩充德国兵力以制造恐怖气氛时，罗斯福立即宣布增加 3 亿美元国防经费。11 月间纳粹分子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时，罗斯福除进行严厉谴责外，还召回驻德大使休·威尔逊。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并捷第三天，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无法无天”，并表示不承认德国占领的合法性。同时，美国中止了上年使捷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并自 3 月 18 日起，对原捷克商品像对德国商品一样，除征收全额关税外，再加征 25% 的附加税，使德国商品几在美国绝迹。

3 月 22 日，罗斯福在接见意新任驻美大使科隆纳亲王时说，墨索里尼掌握着防止战争的大好时机，并终将在会议桌上获得“合理的让步”，但如果他继续站在希特勒一边，就终将成为那位元首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如前所说，墨索里尼并未听信这一警告，却于 4 月 7 日占领阿尔巴尼亚。翌日，赫尔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强暴侵略”是对世界和平的又一威胁。4 月 11 日，罗斯福还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他警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美国

将在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的斗争中站在民主国家一边。6月，罗斯福通过英王乔治六世警告德国：只要伦敦开始被轰炸，美国就参战；法国驻东京使节也预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参战较迟，但这次欧战一开始就会参加。

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较强硬态度，上章最后一节中已大都提到。这里可以补充的是：1939年4月15日美国与英国商定，为阻止日本在太平洋进一步冒险，罗斯福命令一月份以来驻大西洋美国舰队主力部分立即返回太平洋基地；3月和5月，日本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鼓浪屿加紧制造紧张局势，美国与英国共同派遣军舰，并于5月17日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使日本对上海和鼓浪屿提出的要求未能得逞。

〔重整军备与加强西半球防务〕　为迎击法西斯侵略活动，美国重整军备是从罗斯福执政早期就开始的，但到慕尼黑会议后才特别积极起来，并具有全面的计划。上章第2节我们已提到为迎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1933年罗斯福已开始加强海军建设。1934年，他全力支持文森—特拉梅尔法案，计划使美国海军力量在1942年达到1922和1930年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所允许的最高水平。1938年5月通过的文森海军扩充法，又规定增加海军吨位20%以上，并建立一支拥有3，000架飞机的海军航空队。[①] 空军建设开展较迟。1938年1月，当法国派人来购买1，000架最现代化军用飞机时，罗斯福表示热烈欢迎，并打算借此机会使美国工业和法国战争机器相联系。但是，当时美国航空工业不能满足法国订货要求。慕尼黑会议后，他决心使美国航空工业成为

---

① 这一新计划要求到1948年建成一支拥有1，157，480吨的作战舰队，亦即拥有不超龄的战列舰18艘、巡洋舰45艘、驱逐舰150艘、潜水艇56艘、航空母舰8艘。此外还有些虽超龄但仍可使用的舰只。

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工业。陆军的建设也较海军落后，比规定的28万士兵人数相差甚远。1935年，国会开始一系列拨款，计划到1939年将士兵增加到16.5万人、军官1万人，国民警卫队则立即增加到21万人，并为加速训练后备军官作了安排。

此外，在慕尼黑会议前，美国还调查了两万多家企业，陆军部据此制订出工业动员方案，以储备制造作战物资所需原料，积累当工业转入战时生产后需用的战争物资库存并做好工业转入军工生产的准备工作。

1939年1月4日，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发出了重整军备的号召。他指出，法西斯势力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日益严重，美国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增加防御性武器以震慑轴心国。5日，他将1939—1940财政年度预算送交国会；预算中包括国会已通过的11.26亿美元当年重整军备计划所需开支。1星期后，他又为这项新计划要求国会通过2.1亿美元额外拨款。1月12日，罗斯福在致国会一篇特别咨文中列举一系列新建议，再要求国会在3年内追加5.25亿美元额外开支，大部分用于扩充空军。

总共，1939年全年国防拨款达16.14亿美元，构成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数字。此外，国会还通过一些其他国防计划，共需款6.4亿美元。

重整军备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大体相当于英国海军规模；一支40万人以上陆军，正规军和国民警卫队各半，在非常时期能迅速扩充；拥有9，000架飞机的海陆两军的空军部队。海陆空三军具有组织良好的工业体系作后盾，能迅速转入战时生产。①

---

① 关于重整军备计划的较全面叙述，请参阅戴维·H·波珀："美国防务政策"，《外交政策报告》，1939年5月，第15卷，第34—48页。

这些计划的实施紧跟在立法之后积极进行；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走到了立法的前面。

慕尼黑会议前后，国务院和军方担心轴心国家可能利用拉美国家大量的德、意、日裔居民，像在捷克苏台德区那样，阴谋制造突然袭击事件，以便在西半球获得一个扩张据点。1938 年 4 月，罗斯福批准成立由副国务卿、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参谋长组成的常设联络委员会，除国内任务外，并负责向拉美的防御组织提供武器，大体上为以后同拉美各共和国的军事合作打下基础。罗斯福还鼓励将全国军事计划转变为西半球防御计划。11 月，上述常设联络委员会探讨了门罗主义受到一个或几个法西斯国家侵犯时可能采取的几项行动方针；它在 1939 年 5、6 月间提出的 5 项彩色作战计划的第 1 项，是用来防止破坏门罗主义的。

为取得拉美各国对这些防御计划的支持，罗斯福于 12 月促使赫尔前往利马参加第 8 次泛美会议，并在会上谋求拉美各国正式承担义务，共同“抵御任何非美洲国家直接或间接对它们的和平、安全与领土完整造成的威胁”。由于阿根廷不愿签订一项强硬的、具有约束性的公约，赫尔经过艰苦努力后，只得以签订一项非约束性的宣言而了结。宣言虽指出“美洲各国将按各自的立场独立行动”，但也指出：一旦任何一个美洲共和国的和平、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美洲诸国将予以“共同关心”，并将使它们的团结发挥效力。

三、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6 月美国的“中立”

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思想上虽站在受害者一边反对法西斯侵略，但是，由于美国人民、特别是孤立主义者害怕卷入战争，由于有 1937 年中立法的束缚，由于国力尚不够强大，也由于苏联

入侵波兰、芬兰等国的活动，美国只是在经过许多波折后，才逐渐摆脱绥靖政策，和英苏联合起来反击法西斯主义。

〔实施和修改中立法〕　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后，罗斯福在当晚一次著名炉边谈话中说，美国将保持中立，但他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在思想上也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他希望并相信有可能不卷入战争，但美国必须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安全。9月5日，他宣布实施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国输出军火武器。8日，他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紧急状态，以便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防法规定的管理经济的权利。为了保证西半球的安全和互助，为了改变容易招致轴心国家渗透的拉美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在宣布中立的那一天，美国还向21个拉美国家外长发出邀请，准备在巴拿马城召开会议，谋求西半球的中立。会议于23日开始，会期11天，通过了一份包括16项决议案的计划，重申美洲国家间的团结；声明中立并规定中立国的一般权利与义务，还成立一个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以使美洲诸国不致卷入战争；为谋求金融稳定，扩大本半球贸易以弥补同欧洲贸易的损失，还成立了一个美洲国家间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会议最受人注意的结果是，在第14号决议案即巴拿马宣言中提出建立一个安全区，由21个共和国划定，在加拿大以南大西洋岸周围300—1，000英里的区域内，不许有任何非美洲交战国的任何敌对行动，以此作为一项“大陆自卫措施”和保持中立的“天赋权利”。这种安全区亦称中立区，将由各共和国进行巡逻。

后来事实证明，虽然这种安全地带未能如罗斯福所愿起到完全隔离战火的作用，但美国巡逻舰艇却因而能向英国提供德国海军在西大西洋活动的情报，起到一定的遏制希特勒的作用；而当时希特勒切望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也大体默认罗斯福的中立区，命令德国潜艇在此区内活动降到最少的程度。

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不能仅靠这种安全区，却更有赖于英法两国的继续存在，这是当时美国战略思想的一项公认原则。因此，在1939年7月18日参院拒绝修改中立法后，罗斯福一直没有停止争取修改中立法以援助英法的活动。欧战爆发后，美国舆论大都反对纳粹而同情英法，国会对修改中立法的情绪也起了变化。到9月11日，罗斯福已看出，批准修改中立法的惟一障碍，只是参院中某些用冗长演说妨碍议事进程的孤立派参议员。于是，罗斯福除秘密[①]援助英法外，并于13日宣布召开修改中立法的国会特别会议。这时，在参议员博拉、克拉克、奈、范登堡以及库格林神父和查尔斯·林白上校的领导下，孤立主义者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对修改中立法的攻势。仅在3天之内，就有100万份电报和信件涌向国会，有些参议员一天就收到4，000份。据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准备散布流言：如果对总统不加限制，他将把美国推入战争。9月份前3周民意测验也表明，尽管有80%以上的公众同情交战中的盟国，有50%—60%公众一贯赞成援助英法，但这第二部分人中的大多数明确表示希望美国避免参战。因此，罗斯福把两党合作和决心使国家避免战争定为争取修改中立法的基调。他争取到著名共和党人兰登、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等的合作，和他们一起向公众反复说明，现行中立法帮助了侵略者，并使美国易于卷入战争；而修改中立法，撤销武器军火禁运，才能帮助英法顶住纳粹侵略，并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同时，帮助英法还可以扩大就业，加强国防，增加黄金库存，也就是帮助了自己。

国会特别会议召开后，为对付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又在国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而小心翼翼的活动，直到

---

① 不过，在官方是公开的秘密。

10月27日和11月2日，参院和众院才分别以63对30票和243对181票批准修改中立法，撤销武器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并禁止美国船只与交战国贸易、美国人乘交战国船只旅行。11月4日，罗斯福签署了新中立法。

〔关于"虚张声势战争"期间美国反苏性质活动的问题〕

英法对德宣战后，虽然两国为了通盘掌握联合作战行动，建立起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但因军备不足，作战意志不强，两国并未根据条约义务援助波兰，致使希特勒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便占领了这个国家。后来，虽然10月间英国派出远征军进入法—比边境阵地，与法军共同作战，但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挪威这7个月中，"除了在〔法国〕东北边境的真空地带有几次不引人注目的小接触和多次不见敌机踪影的空袭警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①，"甚至在……盟国比德国无可争辩地强大得多的海上领域内，……盟国也并没有建立起显著的优势。"② 所以，人们称这段时间盟国的作战活动为"虚张声势的战争"，亦称"奇怪的战争"、"假战争"。

以往苏联学者大都认为，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目的"，是"力图把欧洲的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并且借助于法西斯德国及其他国家去消灭苏联。"③ 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认为"虚张声势战争"期间美国的主要外交活动都具有反苏性质。④ 他们说，欧战爆发后，美国报刊主张英法与德国议和，是美国统治集团向希特勒暗示将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改变为反苏战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未免以偏概全。的确，美国统

① 〔法〕亨利·米歇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译本），上册，第79页。

② 同上。

③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420页。

④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前引书，第426—428页。

治集团中有些人，像极端反共反苏、同情德国的美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那样，也许有这种企图，但他们不能代表美国整个统治集团。9月11日，罗斯福回答要求他出来倡议和谈的肯尼迪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本政府首倡的任何以巩固和挽救一个暴力和侵略政权的和平倡议。10月初，肯尼迪警告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意味着英国的失败，意味着美国人的希望和为之生存的一切彻底瓦解。罗斯福对摩根索抱怨说：肯尼迪过去是、将来仍是个绥靖主义者；他真是个令人厌烦的家伙。

9月15日，罗斯福会晤了与德国有广泛联系、为赫尔曼·戈林充当中间人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威廉·戴维斯。会见后总统宣称，如果有关国家的政府正式向他提出要求，他愿意考虑进行调停的可能性。但是，这是因为总统从戴维斯那里了解到，戈林渴望防止同英法全面开战，戈林本人或德国陆军还可能迫使希特勒下台。而且，当时张伯伦也正在寻求这种可能性。所以，"罗斯福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和谈本身，而是推翻希特勒。"[①]

10月6日，希特勒为迷惑敌人在国会提出和平试探后，的确有许多美国人主张由美国出面调停。9日，还曾有人建议，参议院应停止关于中立法的讨论，并休会3天，由罗斯福举行谈判。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69%的人盼望和平谈判[②]。但是，这些主张美国调停的人，并不都是想把当时欧洲战争改变为反苏战争，而是根本就反对战争。而且，"罗斯福和赫尔都极力抑制这种不合时的热衷于和平谈判的情绪，并否认曾接到任何交战国提出任何正式请求。虽然确实没有接到正式的请求，德国却通过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力山大·柯克作了非正式接触。10月7日，柯克

① 达莱克：前引书，第298页。

② 《新闻纪事报》，1939年10月30日。

电告，德国已向他建议，罗斯福可以利用希特勒的演说作为提出和平倡议的基础。两天后他又说，据告希特勒将欢迎美国主张休战与和平谈判的提议。罗马尼亚、比利时和芬兰政府也通过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布鲁塞尔和赫尔辛基的代表，建议罗斯福提出和平倡议。美国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确认在当时提出任何这种建议都是不合时宜的。"[①]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欧战初期并没有劝英、法与德国媾和以共同反对苏联。

苏联学者批评美国在对待苏芬战争问题上具有反苏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有责任的。德国入侵波兰后的第 17 天，苏联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附属秘密议定书入侵波兰，并于 9 月 28 日将这个国家瓜分。自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苏联又强迫波罗的海 3 国与之订立互助条约，向其提供军事基地，实际上控制了这 3 个国家。罗斯福在苏侵波时并未对它实施中立法，向它禁止武器军火禁运；在苏联控制波罗的海 3 国时，罗斯福将之解释为矛头指向柏林的行动，仍然承认 3 国名义上的独立，以避免提出外交上的抗议。11 月 30 日，苏联在强迫芬兰作出领土和军事上的让步不成之后，对之不宣而战。这件事确实激怒了罗斯福。因此，美国政府在 12 月 2 日宣布对输往苏联的军事物资实施道义禁运[②]，并于 12 月 10 日贷给芬兰 1000 万美元。

苏联上述这些行动固然是为了建立缓冲地带，预防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也是英、法长期以来拒绝苏联集体安全的倡议、谋求"东引祸水"的结果，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

---

①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合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下册，第 747—748 页。

② 实际上除铝和钼两种金属外，其余物资仍大量涌向苏联。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2 月这 3 个月中，苏联在美购货量比前一年增加一倍。

的行动，引起国际上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①]。

苏联学者还认为，1940年2–3月间罗斯福派迈伦·泰勒和副国务卿韦尔斯赴欧执行和平使命，也具有反苏性质，这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但为什么如此，据美国学者研究，乃是由于美国担心德苏两国联合控制世界，严重危及美国文明与安全。德国占领波兰后，美国驻英法大使不断发回报告，担心英法有战败危险。肯尼迪更悲观，他预言德国在经济与军事上较盟国有持久力，如果再打一年，整个欧洲将处于经济崩溃状态，社会秩序将面临共产主义或某种其他激进变革。副国务卿伯利和美驻柏林总领事雷蒙德·盖斯特也提出警告："俄国同柏林彼此配合进行扩张，这将构成对美国严重威胁。"[②] 苏联对芬兰的进攻，更使罗斯福不安。

罗斯福的担心并非完全无据。苏芬战争期间，德国一直在从事西线进攻的准备工作；德苏两国虽有些摩擦，"然而，这都不过是些细微末节，希特勒在向西方进攻前，他是把赌注全部押在同斯大林取得协议上面的……因此，尽管两国之间过去宿怨极深，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它的性质很不自然，但德苏条约这场赌博正在转变成持久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③]

因此，在苏联进攻芬兰后不几天，罗斯福就和伯利谈到过谋求某种防止苏—德势力进一步扩张的和平安排的打算，还在致罗马教皇的圣诞节贺信中提到：美国人民懂得，只有通过世界各地争取和平人士的友好协作，才能制服恶势力；他愿意派私人代表到梵蒂冈，以便协同努力争取和平。1940年1月3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更公开表示了他的忧虑。他说，如果世界被一小撮人

---

① 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苏联边界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喀尔巴阡，向西推进了200—300公里，人口增加2，300万。

② 达莱克：前引书，第307页。

③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译本），上册，第58页。

统治的话，未来世界将是一个危险而龌龊的栖身之处，甚至对美国人说来也是如此；他希望美国人中鸵鸟式人物少一些，因为鸵鸟把头钻进沙里对它的生命安全没有好处；他以为美国不必与其他国家一道参战，但起码要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促成一种能减轻世界危难的和平，从而也造福于美国①。

罗斯福虽然觉得他的和平努力只有千分之一的成功机会，他还是于2月间派泰勒任驻梵蒂冈大使，并派韦尔斯出使意、德、法、英4国去了解其政府“在当前实现某种公正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看法。”罗斯福对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解释此行目的时说，这也许起码能推迟德国春季攻势，从而使盟国有机会加强防御；他还希望韦尔斯能劝阻墨索里尼不要参战。

后来，韦尔斯在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和平倡议都遭到拒绝，墨索里尼虽表示相信有可能为实现真正持久和平而举行成功谈判，但他所谓的和平，乃是为德国在中欧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和意大利在地中海摆脱英国控制的保证。所以，当3月底韦尔斯从欧洲回国时，深信目前没有丝毫为谋求持久和平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罗斯福也就放弃了他的和平倡议。

由此可见，如果说罗斯福这次和平倡议具有反苏性质，那也和当时苏德合作不无关系，虽然苏联与德国合作有其不得已苦衷，而且是暂时性的。

〔扩军备战，支援英、法、中等国以反对轴心国〕　1940年4月，希特勒终于发动计划已久的攻势。9日进攻丹麦和挪威，4小时内占领丹麦全境。英法联军虽一度登陆挪威，不久又被迫撤出。6月10日，德军全部占领挪威。挪威上空战云犹在，

① 参阅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1940年卷，第1—6页。

德军又于5月10日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绕过马奇诺防线进入法国，当天就占领了卢森堡。英国张伯伦政府倒台，邱吉尔接任首相。5月15日，荷兰投降。5月下旬，比利时投降。6月4日，33万英法、军队抛弃全部装备，从敦克尔克撤到英国。5日，德军集中攻法。10日，墨索里尼一再拒绝罗斯福劝阻，对法宣战。14日巴黎陷落；16日，亨利－菲利普·贝当组成卖国政府，于22日与德签订投降协定。

德军占领丹麦后，罗斯福立即冻结丹麦在美资产2.67亿美元，使其不致落入德国手中，并由副国务卿伯利与丹麦驻美公使秘密合作，筹划丹麦的继续生存。荷兰投降后一天，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增拨11.8亿美元国防费，并建议每年至少生产5万架飞机，建设一支拥有5万架飞机的空军，同时要求国会不要做任何“阻碍或拖延向英法交付美制飞机”的事情[①]。5月22日，在英法一再紧急呼吁下，罗斯福尽管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都是现在美军进行训练所需，仍将之宣布为“剩余武器”，以便根据中立法规定移交私营公司转卖给英国。[②]

5月下半月，由于同盟国处境日益危殆，30年代一直对军费十分吝啬的美国国会，变得慷慨起来，在3周多时间内，共增拨国防费17亿美元，还同意将陆军正规军从28万人扩大为37.5万人，同时授予总统征召国民警卫队服现役的权力。

6月5日德集中攻法后，罗斯福在5至7日悄悄批准向法出售并迅速交付50架海军航空兵的旧俯冲轰炸机和93架老式陆军

---

① 但是，当时美国军备很落后，就陆军而言，能投入战斗的仅有5个师8万人，军械不足装备50万人的作战部队。就空军而言，只有160架驱逐机和52架重轰炸机，据信比美国国防基本需要还少83架。

② 自1940年6月至10月，约有97万支步枪、20.05万支左轮手枪、8.75万支机枪、895门75毫米口径火炮、316门迫击炮和大量军火，运往英国。

航空兵战斗轰炸机[1]。10日，他还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抨击了孤立主义的观点，谴责了意大利的战争行动，表达了援助英法的决心。15日，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

紧接着，坚主抗德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和邱吉尔一再向罗斯福发来紧急呼吁，要求美国发表在必要时参战的声明，以免法国投降派停止战斗，以及法国舰队落入希特勒之手。罗斯福估计当时国会和公众还不允许他作这样的声明，为了竞选胜利，他只答应“决心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但不能越过国会发表必要时参战的声明。17日，贝当取代雷诺的第2天，摩根索问总统：是否要像以前援助英法那样继续援英时，总统说：绝对必要。尽管他一时还找不到办法满足邱吉尔一再提出的提供旧驱逐舰的要求，但他批准将法国订购军火的合同转给英国，还指示军方首脑向英国提供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东西。

19日，总统邀请共和党头面人物、坚主扩军备战以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部长，以代替内阁中两个强硬的孤立主义分子哈里·伍德林和查尔斯·爱迪生，从而加强两党合作以巩固国防和援英活动。

28日，主要为了对付法西斯的间谍活动，国会通过了史密斯法，规定任何团体在美国提倡或教导用暴力推翻政府是非法的；任何人参加这种团体是违法的[2]。

6月18和26日，由于英国抵御入侵和保护海上贸易的能力严重削弱，邱吉尔和英王乔治六世又分别向罗斯福紧急呼吁，要求提供旧驱逐舰。但是，6、7月间，罗斯福找不出转让这些驱

---

① 6月7日，罗斯福回答一位要求他加强对同盟国的援助并作公开声明的朋友时说：我比你抢先了，许多飞机已经在运往同盟国的路上；我之所以对此不愿多讲，是因为某些报纸肯定会对我的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扰乱人们的思想。

② 但不幸后来此法的锋芒却用来对付国内那些批评美国政体的进步力量。

逐舰的办法。因为美国自己将100多艘旧驱逐舰编入现役，用于大西洋巡逻，不能说是剩余兵舰；而且，万一英国战败，这些驱逐舰不独不能用于西半球防务，反而被德国用来攻击美国，所以军方决策人反对出售这些军舰。此外，出售这些驱逐舰还有法律和政治上障碍，极难取得国会同意。

所幸的是，7月间英国顶住了德国大规模空袭；7月3日英国还成功地使大批法国战舰失去战斗力，未落入德国之手。这加强了罗斯福对英国抗击德国的意志和能力的信心。与此同时，5月17日成立、不久就在全国发展600多个分会的"援助盟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有效地盖过了孤立主义势力，发动大多数公众支持向英国转让旧驱逐舰。于是，罗斯福在8月2日内阁会议上根据前一天亲英的世纪派建议，表示赞成以租借英国西半球基地为条件而出让这些驱逐舰。对于反对这样做的人，他反复从3方面加以解释：纳粹领袖们首先要奴役欧洲，然后统治全世界；如果德日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霸主，将严重危害美国利益与威胁西半球安全，因此需要援助美国前卫——英国；坚决反对法西斯就是保卫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他还特别强调取得英国西半球基地对保护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重要意义，使人们感到用这些旧军舰交换这些基地是特别值得的。最后，在希特勒准备9月中入侵前残酷空袭英国声中，罗斯福找到了解决难题办法，于9月2日签订一个协定：美国将50艘驱逐舰交给英国，英国则正式保证决不放弃它的舰队，并将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海地区英国领土上的海空军基地租给美国99年。在此期间，罗斯福在8月27日至9月14日，争取到国会击败了各种修正案，以多数票通过一项选征兵役制法案，规定21至35岁男子均在选征之列。

11月5日大选胜利后，罗斯福更加强了援英言行。7、8两日，他表示要将新生产军需品的一半分给英国，包括最新式轰炸

机。但是英国在战争开始时65亿美元储备总额，已在美国用掉45亿，而这时又要求20亿美元订货，英国财政面临崩溃危险。罗斯福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12月9日，邱吉尔来信要求罗斯福让美国船舶和海军帮助保持北大西洋航道畅通，并找到办法解决英国即将无能力给美国供应物资付款的问题。12日，罗斯福宣布成立以威廉·努森为首的生产管理局，以协调和加强军用与民用生产。17日，他向记者们谈了一个故事，内容是一个人先不收钱将他花园浇水管借给邻居，帮助邻居扑灭火灾。29日，他在炉边谈话中声称：英国及其舰队横梗在西半球和纳粹侵略之间；英国要求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大兵；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1941年1月10日，他向国会提出了财政部起草的租借法案，虽经国会孤立派和最强有力的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罗斯福于3月11日签署，并立即请求国会拨款70亿美元，作为生产与输出租借物资之用，也得到国会同意。

租借法的实施，实质上使美国由中立国变成非交战国。但是，从1940年5月至年底，纳粹共击沉英国、同盟国、中立国船舶3，139，190吨，英国造船能力大大落后于其损失船舶吨位数。到1941年春，情况更加严重。3月25日，纳粹扩大其战区，将格陵兰、冰岛和丹麦海峡间水域包括在内，以阻止从美国港口源源运输军需品前往英国。从3月到5月，共摧毁商船1，691，516吨。这个问题不解决，英国抗德战争便会失败。史汀生力劝总统下令海军对英国与同盟国商船进行全程护航。罗斯福深信公众与国会孤立派不允许他这样做，乃于4月10日决定将中立巡逻延伸至大西洋西经25度处。在美国海岸与西经25度之间出现德国潜艇时，巡逻舰只将向英国舰只发出警告。同一天，罗斯福还将红海地区从禁止美国船只进入的作战地带的名单

上抹去。由于国会孤立派谴责罗斯福扩大巡逻区实际上就是护航，总统在25日公开宣布这件事时，特别强调了扩大巡逻区与护航的区别。

5月中旬，由于德国在东南欧与北非的节节胜利，由于东京表示愿意继续讨论日、美间争议，而法国维希政权在德国使用中东与非洲基地方面与柏林积极配合，罗斯福下令将1/4太平洋舰队调到大西洋，还指令海军参谋长制定一项占领亚速尔群岛的计划。5月19日，他向一位孤立主义众议员写信问道："你们是想使国家继续享有自由而毫不含糊地采取甚至不惜开枪的行动呢？还是为了不牺牲一个美国人而甘心受奴役？"[①] 看来，此时罗斯福已得出最终不得不参战的结论。但在23日内阁会议上，他说"我不想开第一枪。"如伊克斯所指出，他在等待德国人制造一起"事件"。因此，他克制着自己，只在27日发表一篇强硬演说，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他说，纳粹正在发动一场旨在称霸世界的战争；如果我们坐等德国人来到家门口，那就是自杀。他还要求美国必须帮助英国控制海洋。

罗斯福的演说发表后，最初虽有95%的人表示赞成，但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且，6月11日据报，在大西洋南部非交战区内，美国货轮"卢赛·穆尔号"被德国潜艇无故击沉，罗斯福也只冻结了德、意及其统治下国家的财产，命令所有德国领事馆人员离开美国，却并未断绝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未支持霍普金斯开始正式护航的意见。

罗斯福的这种温和反应，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不愿把战争强加于公众，一方面也因几个月来不断传闻希特勒正准备进攻苏

---

① 埃利奥特·罗斯福编：《富兰克林·罗斯福1928至1945年私人书简》，第2卷，第1159页。

联。果然6月22日，这种传闻成为事实。

1939年11至12月间，英、法无暇东顾，为保护它们在远东的地位，它们准备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英国驻美大使洛德·洛西恩11月12日及以后曾说，它的政府支持中国和日本“在对双方都是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只有中日双方都作出让步方能实现。”[①] 法国也倾向于这一想法。

美国政府不愿放弃自己在中国利益，当时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告诉洛西恩：美国政府不能也不愿做任何事情对中国施加压力，要它缔结一项不公平的或给予日本在中国优先地位的和平条约。12月15日，赫尔以同样意思对洛西恩说，美国政府已尽最大努力促使远东问题公平解决，但日本是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巨大满洲国，美国政府不能考虑这样一种政策，也不愿背离自日本开始征服亚洲以来它所捍卫的立场和原则。不过，由于欧洲形势紧张，美国当时对日采取的是一种拖延的、态度模糊的政策：既不采用会触发危机的制裁手段，也不就美国将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向日本提出任何保证。因此，1940年1月26日日美商约到期时，美国既不续约也不订新约，但允许像条约有效时那样与日本进行贸易。其后，由于日本不断攻击中国在印支的供应线，并于3月在南京炮制一个鼓吹与日合作的汪精卫伪政权，美国乃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并谴责南京伪政权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用武力把自己意志强加于邻国的又一步骤。”

4月德国占领丹麦后，英国占领了冰岛，这引起了美日对荷属东印度的关注。5月荷兰对德投降后，英国占领了荷属西印度，美日对荷属东印度的关注更进一步。6月，日本政府乘英法

---

① 赫伯特·菲斯著：《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中译本），第45页。很显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受害者，要双方都让步就是要中国作出牺牲。

受挫之机，重新要求同盟国撤出中国，迫使法国关闭印支边界，威逼英国封闭中国经香港和缅甸的供应线，并宣称南海地区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① 的一部分。美国仍坚持中间立场，认为对日强硬固然可能引起太平洋危机，绥靖也会使日本提出新要求。英国则对日屈服，于7月17日与日订约，中止从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运入战略物资。

由于日本从6月起突然加紧从美国进口作战物资，7月25日，罗斯福根据一向主张对日制裁的摩根索的请求，批准财政部声明，宣布将对所有石油和废金属出口实行限制。26日，日本近卫文麿政府提出当前国策是：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亦即大东亚共荣圈，将南进政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同日，美国正式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润滑油和头等废金属。②

8至9月，尽管美国屡次提出口头抗议，日本仍用最后通牒迫使法属印度支那作出让步，给予日军通行权、建设机场并与日本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对东印度群岛虽未发出最后通牒，但要求它5年内每年供应石油300万吨。这大约是前几年东印度群岛输往日本的数量的5倍，约占日本常年总供应量的3/5；即使美国停止输出，日本也能战斗下去。

日军是9月24日进入印支的。与此同时，关于拟议中的日德联盟的报道也得到证实。于是，美国又于25日宣布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并于26日发布总统命令，禁止输出各种型号的废钢铁，还抽回美国在日本投资。邱吉尔受到鼓舞，于10月8日

---

① 1940年6月29日日本外相广播演说中提出的概念。

② 但是，由于8月24日至9月6日，英国在德国空袭中损失惨重，英、美对大西洋控制没有把握，担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务院将航空汽油解释为高级辛烷航空燃料，仍不禁止适用于日本飞机的中级辛烷汽油。

重开滇缅公路。

9月27日，秘密酝酿多时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公布。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和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日、意保证：在三缔约国之一受到一个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中日冲突中的国家攻击时，将相互给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的援助；条约不影响缔约各国与苏联现有重大政治关系。

显然，这一条约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立即引起美国对日政策的再次激烈争论。史汀生、摩根索、诺克斯等人主张立即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因为禁运废金属作用微不足道，也为时太晚。史汀生还促请总统同意邱吉尔请求派舰队赴新加坡，同时派一舰队赴荷属东印度。赫尔、韦尔斯和参谋长们认为这样会刺激日本进攻，使美国措手不及，并削弱美国对付德国威胁的能力。罗斯福思想上虽同情强硬派，但行动谨慎，既未禁运石油，也未派出舰队。不过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参谋人员已悄悄在伦敦和新加坡互换情报和交流战略合作意见，并提出在太平洋共同作战的构想。总统在10月12日演说中也说，“无论欧亚两洲独裁国家怎么联合，都不会阻止我们向我们自己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前进。

“无论欧亚两洲独裁国家怎么联合，都不会停止我们对正为阻遏它们而战斗的几乎是最后的自由民族的帮助。

……

“美国人民、所有美洲国家的人民都反对绥靖主义。”①

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罗斯福于当天宣布贷

---

① 塞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1940年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1，第466页。

给将政府1亿美元，并决定购买6,000万美元的中国黑钨、锑和锡。12月，又从英国订货单上调拨100架驱逐机给中国，用来保卫滇缅公路。

从1940年末到1941年上半年，日美双方都已清楚，彼此矛盾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但是，日本南进除担心苏联外，尚未完成偷袭珍珠港的准备工作；美国正一步步卷入欧战，不具备两洋作战军事实力和心理准备，而且根据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达成的ABC-1协定，美国的军事努力主要应用于大西洋和欧洲战场，其次才是对付日本，因此，就出现了双方以争取时间为目的的秘密谈判。1940年12月，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斯·沃尔什和詹姆斯·德劳特神甫在东京与松冈洋佑外相等许多日本领导人会晤，认为两国都希望改善关系。1941年1月，他们回到美国后，见到总统与赫尔，提出许多建议，其中之一是由总统与近卫首相会晤，以便达成最后协定。

2月14日，总统接见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时，鼓励他坐下来与赫尔"回顾和重新审查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方面"，看两国关系能否改善。从3月8日起，野村与赫尔会谈约50次，迄无进展。

2月间，日本还派青年军官集团领导成员岩畔秀夫大佐和一位娶有美国夫人的银行家井川忠雄前来美国，与沃尔什和德劳特合作。赫尔、野村和这些非官方谈判人员也保持接触。4月9日，这些人提出一份协议草案。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个文件为使日本停止南进要求美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不能接受。赫尔态度较温和，他在14日接见野村时，只说是想知道日本政府是否将以此文件作为协商第一步。两天以后，传来松冈已于13日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表明日本南进已无后顾之忧。于

是，赫尔给野村一份反建议，其中提出4点原则[①]，作为会谈基础，请日本考虑。松冈返日后，于5月7日提出反建议，由日美签订中立条约。赫尔认为这是让日本攫取英、法、荷远东属地的全权委任书，立即加以拒绝。5月12日，松冈又提出新建议，要求美国停止援英，力劝重庆政府与日本妥协，恢复与日本正常贸易关系，并取消禁止日本移民法令。美国表示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并由赫尔于5月31日、6月6日与21日一再表明美国自己的立场。6月21日还附有一口头声明说，日本政府中某些有影响成员最近公开强调日本对德国义务，这是不容忽视的，并且令人怀疑是否还值得去和日本达成任何协议。

在与日本谈判的同时，为了显示力量，1941年3月美国曾派海军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允海军军官公开参加英、荷、澳、新西兰、印度高级将领4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会议。同月，罗斯福还批准美国军人为参加筹建陈纳德上校飞虎队而提出辞呈，并宣布中国应得到5,000万美元贷款，而且有资格获得租借法的援助。

6月22日德攻苏，解除了苏联对日威胁，并鼓励日本领导人决定占领整个印度支那，也许准备进攻新加坡。

〔加强西半球防务〕　欧战爆发后，罗斯福一直关注法西斯对西半球的威胁。1940年4月9日德国占领丹麦后，他于18日宣布丹麦北美属地格陵兰受到门罗主义保护，除在其首府设领事馆、给它提供军需品外，并由海岸警备队建立一支格陵兰巡逻队。1941年3月下旬德国扩大战区后，美国于4月9日与丹麦公

---

① 4点原则如下：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平等原则，包括贸易机会均等原则；除了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外，不允许打乱太平洋现状。

使达成协议，在格陵兰建立海、空军基地。

“1940年夏季，罗斯福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纳粹对拉丁美洲的威胁。当希特勒大军……席卷西欧的时候，罗斯福一再接到关于纳粹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墨西哥搞颠覆活动的警报。……迄5月末，罗斯福得出结论：如果纳粹继续获胜，柏林将试图推翻目前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并把荷兰和法国在西半球的属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 5月23日，他批准邀请美洲各国派出军官同美国军官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的建议。不久之后，又派遣一艘重巡洋舰访问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与此同时，他签署了一项国会决议案，准许以现金向美洲国家出售海防大炮和舰艇。7月，他要求国会给进出口银行增加5亿美元资本，并取消对其业务活动的某些限制，主要为管理和有顺序地销售拉美国家的部分过剩产品提供资金。

为防止欧洲国家的美洲属地落入德国之手，罗斯福在5月命令军事首脑制定一项占领那些可能被德国宣布为战利品的属地计划。6月，政府在国会支持下发表声明，反对欧洲国家之间转让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权，并决定在哈瓦那召开泛美会议，以争取美洲国家的支持。

由于德国使节提出警告，反对在哈瓦那达成任何针对柏林的协议，包括巴西、阿根廷、智利在内的9个国家拒绝派外长出席。但是，由于赫尔强调美洲国家团结一致反对纳粹颠覆阴谋的必要性，他仍使美国方案得到与会国的支持。会议声明反对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旨在改变欧洲国家在美洲殖民地宗主权的活动，并同意这些受到威胁的属地能够实现独立或将它们交还原宗主国之

---

① 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339页。

前，由美洲国家托管。

四、美国与英、苏联合反对法西斯

由于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在以后的一年半中间，俄国同美国的关系低落到了沟底。”[①]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初期，有些美国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希望坐山观虎斗，[②] 公众对援苏与维护美国利益的关系也不充分理解，使得罗斯福政府的反应较谨慎。但由于进步人民群众的要求，由于罗斯福一向反对法西斯，特别是由于反对穷凶极恶的轴心国家侵略势力的实际需要，美国不久便与英、苏联合起来，从事反抗法西斯的战争。

〔德国攻苏初期美国政府的反应〕　　由于美国主要军事专家对苏联抗德能力估计不足，由于考虑到在此“喘息时期”最好把有限物资用来援英和加强美国在北大西洋防务，由于舆论主流不同意全力援苏，罗斯福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初期，对援苏问题不像邱吉尔那样坚决，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国务院23日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不独未提援苏的事，还谴责了苏、德两国的国内独裁政治。24日罗斯福虽在记者招待会上保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援助，但又指出莫斯科尚未正式提出要求，从而避免承担义务。不过，罗斯福虽“不信任他们〔苏联人〕，但认为和德国人

---

① 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苏、美冷战史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第12页。

② 哈里·杜鲁门是个很好例子。作为国会参议员，他虽然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看到希特勒胜利，但又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赢，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赢，我们就必须帮助德国，尽量让它们互相厮杀。”见1941年6月24日《纽约时报》，第7页。

相比，他们并不想征服欧洲。他认为他们抵抗德国人进攻时间，将较任何人预测的为长，这将有助于英国，而且也许会使美国不致卷入。”[1] 他的近僚如霍普金斯、伊克斯、摩根索、史汀生、诺克斯、赫尔等人，也有类似看法。一向反对卷人战争的美国共产党[2]，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也发出号召，要求美国人民团结在反希特勒联盟之内，并开展声援一切战斗着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广泛运动。美国工会则“坚决主张给予英国、苏联和中国以无限信贷，并加速用美国武装船舶把军事物资运送给这些国家。”[3] 因此之故，罗斯福实际上是主张大力援助的。24 日，他撤销了对价值为 3，900 万美元的苏联资产的冻结。25 日，他宣布不对苏联实施中立法，以便美国船舶能驶往苏联港口。30 日，韦尔斯考虑了苏联提出的 18 亿美元的物资援助。7 月 8 日，总统和英国人一起向梵蒂冈解释英、美援苏立场，并要求阻止天主教潜在的反对势力。10 日，他向苏联大使说，他想在 10 月 1 日前将 6 月 30 日苏联要求的物资运抵俄国。但是，由于物资和运输力量不足，资金无把握，职责不集中等原因，虽经总统一直检查督促，7 月间运往苏联物资，其价值仅达 650 万美元。

与援苏同时，罗斯福采取坚决行动加强对北大西洋航道的控制。7 月 7 日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冰岛，并于 7 月 26 日开始由美国海军护航队在大西洋岸和冰岛之间护送美国和冰岛的船只。为建立强大地面部队，总统允许马歇尔将军于 7 月 3 日请求国会延长去秋征募的 90 万名士兵的服役期，并且删去上年选征兵役法

---

① 阿诺德·奥夫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 206 页。

② 德攻苏以前，美国共产党对苏共一步一趋，置 1935 年季米特诺夫在第 7 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将法西斯式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加以区别的报告于不顾，认为 1939 年开始的欧战只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反对卷人，是不对的。

③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 456 页。

中禁止派遣被征入伍者到西半球以外地方去的条款。8月12日，国会通过了延长服役期6个月的法案。

〔美、英、苏逐渐走向联合〕　自从法国投降、美国大力援英以来，罗斯福常常想到有必要就援英与反对法西斯的问题和邱吉尔当面商谈。1941年3月租借法实施后，美英结成非正式同盟。如何使这种关系有效地反对法西斯，有些问题需要与邱吉尔直接交换意见。德攻苏后，他更感到这种会晤不独可以引起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还可向舆论界澄清他们在战争紧要关头对各种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到7月，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伙伴关系，而一般美国人都认为苏联是个独裁国家，难与合作；与此同时，英、苏在战后和其他较小的盟国将进行经济和领土交易的谣言纷纷流传。这样，罗斯福更觉有必要阐明反法西斯斗争的目的。7月中旬，他曾试图将纳粹主义和民主主义作鲜明对比，并说明"俄国独裁政权"的威胁小于德国独裁政权的威胁。他还私下要求邱吉尔发表声明，"没有就战后和平时期的领土、人口和经济等问题作出承诺。"7月13日，霍普金斯奉派前往伦敦，双方商定罗斯福与邱吉尔于8月9日在纽芬兰的阿根舍对面的普拉森舍湾会晤。

霍普金斯在英期间，由于英美双方对苏联抗德情况及需要没有全面而真实的了解，他接受邱吉尔建议并征得罗斯福同意，于7月30日至8月1日访问了莫斯科，并和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亲密的个人会谈。舍伍德认为"这确实是英美和苏联战时关系的转折点。"[①] 阿诺德·托因比等则评论说，"霍普金斯本人是一位对盟国事业贡献很大的杰出人物，他取得了这场战争中一项最重大

①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上册，第463页。

突破。他突破了俄国人层层设防的保密措施，从一切资料的最终源泉取得一份对苏联情况和前景的详细说明。霍普金斯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他说服了斯大林这个多疑的人相信美国（和英国）愿意帮助，他还须说服英美两国政府相信俄国政府有决心并且有能力打胜，尽管英、美政府仍然先入为主地认为俄国的抵抗不久就会崩溃。这是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英俄美同盟的基础。”①

霍普金斯离苏后，又返英与邱吉尔一同前往纽芬兰参加大西洋会议。根据罗斯福提出的这次会议的主要甚至惟一目的，是发表一个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将提出一些世界文明的基本准则，以鼓舞受到危害的各国和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动员美国人民，并使英国作战目标为美国所接受。经过反复讨论，声明最后提出 8 点主张：英美两国决不进行任何扩张；反对强加于人的或不民主的领土易手；包括被强行剥夺权力的人民在内的所有各国人民，都应有主权和自治权；在平等条件下，“但适当考虑他们目前的义务”，同所有国家，不论大国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进行通商和享有世界的原料；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保证提高劳动水平，加速发展经济，改善社会治安；战后和平应保障各国安全，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海上通航自由；“在建立起一个更为广泛、持久、普遍安全体制之前”，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削减爱好和平的各民族的沉重军备负担。

第 4 和第 8 点曾引起激烈争论。第 4 点因与授予英联邦国家以贸易特权的渥太华协定相矛盾，英方不赞成，罗斯福最后同意邱吉尔要求，在该条加上“适当考虑他们目前的义务”这句话。

---

① 阿诺德·托因比等合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下册，第 713 页。

第8点邱吉尔原来提出的草稿中有建立“有效的国际组织”这句话，罗斯福担心引起孤立主义者的怀疑和反对，因而主张删去，但为了安抚国际派，同意最后“建立一个更为广泛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

上述声明，就是后来人们称为的《大西洋宪章》。9月24日，苏联驻英大使伊凡·迈斯基在圣詹姆斯宫中举行的同盟国间会议上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这样，美、英、苏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就有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除共同原则基础外，美英共同援苏抗德还有个共同战略问题。霍普金斯在莫斯科期间曾告诉斯大林：要英美愿意将坦克、飞机和高射炮这类重型武器送到苏联前线，必须3国政府事先举行会议，就每一战场的相对战略利益和3个国家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和充分的商讨。斯大林表示欢迎。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罗斯福和邱吉尔又联名打电报给斯大林，重申此议。9月初，德军威胁列宁格勒，斯大林于3日急电邱吉尔，再次要求在巴尔干或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并迅速大量增加援苏飞机、坦克等。结果，虽然孤立主义者、天主教徒和反共派极力反对，由美国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国威廉·比弗布鲁克为首的代表团，还是于9月28日到达莫斯科。当日即举行会议，至30日结束。苏联代表提出的需要物资清单大部分得到满足。其中包括70个以上的主要项目和80多个项目的医药物资。根据10月1日英、美、苏3方协议，到1942年6月30日为止，英美将供应苏联各项物资150万吨，价值大约10亿美元。其中，包括每月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外加1,256门反坦克炮、5,000辆吉普车等。斯大林很满意。他请美国代表向总统转达他个人谢忱，还应美国要求取缔了《无神者》杂志。10月间，由于苏联资金逐渐枯竭，罗斯福又说服国会同意将租借法适用于苏联。10月30日，他通知斯大林，

价值10亿美元的租借法援助物资立即可以动用——作为一项无息贷款，战后5年开始，分10年偿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珍珠港事变，运苏物资价值总额只有6,500万美元。比起战时援苏总额100亿美元来，真是微不足道。

美国人民同意大规模援助英苏有一个希望：避免美国卷入战争。因此，大西洋会议期间，当邱吉尔一再要求美国参战时，罗斯福只同意不宣而战①。实际上，大西洋会议后，罗斯福也是小心翼翼地逐步使美国与德国人在北大西洋不宣而战的。8月下旬，他已悄悄让英国和同盟国船只在美国与冰岛之间与美国护航队同行。9月4日，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追逐德国潜艇时受到攻击，他在邱吉尔的压力下，就利用这个"挑衅"事件，在11日的广播演讲中说：这是纳粹控制大西洋准备进攻西半球计划的组成部分，现在积极防御的时间到了；此后，美国的船只和飞机将保护美国和冰岛之间水域里的所有船只。他还说，他已命令陆海军射击在美国巡逻区内的所有德意战舰。

这就是不宣布的对德意海战。罗斯福采取这种迂回手法的苦心，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是理解的。他向邱吉尔汇报时说，长期困扰着罗斯福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有70%的人希望不参战，又有70%的人希望采取一切措施打败希特勒，即使这样做意味着战争；罗斯福要在这两者间找出一条路来。"他说，如果他要求宣战，他不会得到批准，舆论还会反对他。因此，他意在做他尽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来帮助我们，而宣战则不合时宜。"②

---

① 大西洋会议前后的民意测验表明：75%的人不愿与日德作战，但大体有60%的人愿意跟着罗斯福逐渐走向不宣而战。

② 约瑟夫·拉希：《1939—1941年间的罗斯福与邱吉尔：挽救了西方的伙伴关系》，纽约：诺顿公司，1976，第422页。

虽然孤立主义者指责罗斯福关于格里尔事件的说法歪曲了事实，但是，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公众同意他采取的不宣而战的措施。后来，当罗斯福10月9日请求国会修改1939年中立法时，大多数人也不反对。他要求允许武装美国商船，并且暗示国会应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战区和交战国港口。对于总统的这些建议的争论正在进行时，德国潜艇于16—17日夜间攻击美国卡尼号驱逐舰，11人丧命；31日击沉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115人丧生。于是参、众两院分别于11月7日和13日批准武装商船，并允许其通过战区前往交战国港口。

由于在修改中立法的投票中，赞成与反对的票数十分接近，罗斯福更加相信，要国会通过宣战，仅仅是格里尔、卡尼、鲁本·詹姆斯号等事件是不够的，还必须发生比这些事件更加引人注目的事件才行；他于是仍然集中力量援助英、苏。

五、美日谈判与珍珠港事件

德国进攻苏联后，美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解除了北顾之忧，准备积极南进，美国态度转为强硬，暂时中止了断断续续的美日谈判。在近卫首相的坚持下，8月底恢复谈判。由于日本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坚决反对，谈判进入僵局，终至促成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

〔美日谈判的中断与继续〕　德国突袭苏联后，松冈外相力主根据三国条约与德国要求进攻苏联。但近卫首相和军方认为：进攻苏联并不能获得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锡等作战物资，应暂缓北进。6月25日，内阁与军方联席会议规定了南进纲领，其核心内容是：在法属印度支那特定地区建立或使用空军基地和港口设施，并在其南部进驻日军；如果通过外交手段不能

达到此目的，则将使用武力。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1、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将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2、继续努力解决中国问题，并为确立本国自卫自存的牢固基础而迈步南进，不惜为此而与英、美作战，然后再根据形势发展进而解决苏联问题；3、排除一切障碍以实现上述纲要。决定作出以后，虽然不管美国如何反应，日本仍将坚持，但日本政府大多数人仍希望避免与美国作战，所以要考虑如何答复21日赫尔交给野村大使的关于美国立场的声明。7月10日和12日召开了联络会议，松冈力主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并停止与美国会谈。结果，松冈被撤职，由主张与美国继续谈判的丰田贞次郎继任外相。不过，日本的南进政策未变。

7月8日，美国从破译的日本密电[①]中了解到2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引起强烈反应。15日，美国政府了解到日本要求法国维希政府让它在印支取得8个空军基地和金兰湾及西贡两大军港。21日，美国了解到维希政府已向日本屈服。23日，代理国务卿韦尔斯约见野村大使。并对他说，美国政府只能将日本行动解释为日本要征服南海其他地方的最后的预备步骤。他还指出，赫尔要他说明，他已看不出他和大使曾进行的会谈还剩下任何继续的基础。24日，日军开始进入印支南部。25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实际上将在美的日本权益有关的全部金融、进出口贸易等，均交由美国政府管制，同时禁止日船通过巴拿马

---

① 仅日本外务省与日驻美大使馆之间1941年7月1日至珍珠港事变这一期间的密电，被美国破译的就达217份，几乎所有重要的电报都搜罗进去了；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所发出的军事情报，全被截听和破译（见〔日〕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20页）。据此可知，到1941年下半年，美已确知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为此不惜与美作战的决心，而美国又决不愿放弃其在远东地区利益，双方谈判都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已。

运河；26日成立陆军远东司令部，由菲律宾军事顾问麦克阿瑟将军任司令官，并召集菲律宾民兵服现役。8月1日，总统禁止向日本输出一些关键性物资，包括能炼成航空汽油的石油[①]，英荷政府也实施类似制裁。

由于海军领袖们不愿冒险与美国作战，近卫内阁设法寻找一种办法：既可由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又可与美国维持和平。8月7日，近卫建议与总统亲自会晤以讨论解决紧张形势的办法，同时制定一份进一步向南扩张的计划。美国虽然通过破译日本密电了解到这一计划，知道日本谈判建议并不诚恳，但总统为了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在从大西洋会议回国后，还是于17日接见了野村，并在致日本备忘录中说：如果日本再展开任何侵略活动，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保证美国安全；不过，如果日本诚意希望按照美国已提出原则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愿意恢复被日本占领印支打断的探索性谈判。28日，野村提交了日本对17日罗斯福备忘录的复文，其中说，一俟中国问题得到解决，日本就从印支撤军；除非受到攻击，日本将不向南扩张或与苏作战；同时承认美国备忘录中所提原则是“真正和平的首要条件”。后来在9月4日一个澄清性备忘录中，日本甚至提议：如果美国卷入对德防御战，日本将不认为受到三国条约的约束。

罗斯福对此复文十分高兴，准备立即同意与近卫会晤。但在赫尔劝告下，他于9月3日答复日本政府说，他高兴和近卫会谈，但是基本分歧、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基本分歧，必须先澄清。3日至6日，日本领导集团举行了高级会议，表明日美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坚持，近卫同美国解决重大问题的时间，只能到

---

① 后来事实上成为完全向日本禁运石油。

10月中旬；如果到那时还不能达成协议，日本就准备向英、美、荷宣战。22日和25日，日本答复美国的文件中所提条件之一，是不许英、美插手日本如何最后解决“中国事变”。这时，不独中国反对美日谈判，总统主要顾问也劝他不要做任何进一步削弱中国抗战情绪的事情。美国大多数公众也愿冒与日作战危险以阻遏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干脆尽量拖延谈判。10月1日，他对英国代办说，谈判虽无任何进展，但赢得了有用的时间。

10月中旬，近卫仍希望继续谈判，并要求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满足美国提出的从中国撤军的要求。东条坚决反对，并促使近卫于10月16日辞职。在东条答应继续进行会谈之后，天皇任命他为近卫继承人。东条任首相后，日本陆军与各反战集团之间的争论一直继续到11月5日。这一天，陆军首领们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与美国和解，但他们也取得天皇同意，如果到11月25日谈判仍无结果，就准备立即进攻。同日，日海军也发布作战命令，如外交失败，就在12月初行动。

〔走向珍珠港事变〕　　东条组阁后，中英两国再次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但是，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报告罗斯福：德国是主要而最危险的敌人，任何太平洋战争将大大削弱大西洋战争。于是，罗斯福继续拖延，以便美国陆、海军有足够时间加强菲律宾防务，阻止日本南进；以便美国增加和加速租借法援助，和加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军。11月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告诉赫尔：不要做任何促进危机的事情。7日起，美、日在华盛顿再开谈判，野村将东条准备的甲种建议交给赫尔，10日又交给总统。其内容为：1、日本将以贸易平等原则适用于世界各国为条件，同意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中国；2、在三国同盟关系上，希望不过分扩大自卫权的范围，日本政

府将独立自主地决定这一条约的适用范围；3、日本预计在25年内，仍将把部分军队驻扎在华北、内蒙的某些地区和海南岛，其他地区驻军在日中和平实现后两年内撤完；一旦日中事变解决，日军将立即全部从印支撤出。美国认为这一建议既未规定日本放弃三国条约义务，又未保证从中国撤军，不能同意，但却未给予明确答复。11日，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再次提醒野村，25日是最后限期，并催促他再作努力使美国马上答复。12日至15日双方进行的会谈，表明美日两国政府仍像以前一样各执己见。17日，日本应野村请求派来协助他谈判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拜会了罗斯福总统，但他口才再好，碍于日本既定政策，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说服总统。18日，他对赫尔说，根据当时情况，要日本废除三国条约或使之不起作用不可能。赫尔回答说，只要日本仍同德国结盟，美国公众舆论就反对同日本达成任何协议。谈判陷入僵局。20日，来栖和野村根据国内指示，向赫尔递交了早已准备好的乙种建议。赫尔对其中第6点“要求美国停止援华”感到“极为惊异”。他说，只要日本仍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新秩序，美国就继续援华。22日，东乡通知野村将最后期限从原来的25日改为29日。同日，赫尔同澳、英、中、荷外交代表会晤，给他们看了日本的乙种建议和国务院拟定的以3个月为期的暂行解决办法草案。[①] 由于赫尔没有说明美国将在向日本提出这一草案时，同时提出全面解决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内容包括日

---

① 其内容为：1、日、美同意除非受攻击，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从拥有军事设施的各自据点越过太平洋地区任何国际边境进军；2、日本立即从印支南部撤军，并限制在印支北部驻军最多为25000人；3、美、日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4、美国立即同英、荷联系以促使两国同日本签订一项类似协定；5、美对中、日进行和谈，或对日、中在和谈期安排休战“不表示反对”，只关心这类谈判以构成日、美当时会谈的主要精神的基本和平原则为基础和范例。

本承认国民党政府和从中国撤出全部日军。因此，这个暂行解决办法遭到中英坚决反对，荷澳半心半意支持（实际上反对）。25—26日夜间，邱吉尔复电罗斯福说，这个暂时解决办法使中国处境困难；“如果中国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①]与此同时，华盛顿接到日本军舰离开台湾的消息。于是，总统放弃了这个暂时解决办法，赫尔并于26日拒绝日本20日提出的建议，还给予日本一份通牒，分为“相互政策声明”和“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采取的措施”两部分。前者重申赫尔多次阐释过的那些原则；后者共10点，基本内容是以恢复两国正常经济关系换取日本从印度支那与中国撤军，和日本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通牒虽非最后通牒，但意味着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可改变的。这样，日本面临的抉择是：要么放弃几年来在远东作战所获得一切利益，要么在经济上被慢慢扼杀。当然日本不会接受这个通牒。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作战。

据托因比等分析，罗斯福让赫尔提出这个强硬通牒的原因虽然较复杂，但真正的动机似乎是担心被指责为姑息日本和准备制造一个远东慕尼黑事件。

与此同时，日本一支航空母舰特遣队于25日离开千岛群岛，远程奔袭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巨大海军基地，而大量陆军则在印支南部待命突击马来亚。美国领导人从截获的电报中，只知道日本立即要向某地进攻，但未想到将袭击珍珠港。当12月6日大量日军向马来亚推进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罗斯福虽曾向日本天皇发出紧急呼吁，劝日本悬崖勒马，但当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率领的航空母舰特遣队从西北方接近夏威夷时，却无人知

---

① 转引自阿诺德·托因比等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下册，第1097页。

晓。

12月7日晨7时55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下午1时，野村才向美国递交日本对美国11月26日通牒的答复。答复冗长而充满仇恨，最后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想通过继续谈判来达成一项协议是不可能的。下午2时，袭击初步报告到达华盛顿。后来的消息则提到日本进攻菲律宾、香港、威克岛、中途岛、泰国和马来亚，以及日本向美英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的损失是：瓦胡岛上所有飞机不是被毁，就是受损。珍珠港内8艘战列舰都失去了战斗力——其中俄克拉何马号和亚利桑那号被摧毁或击沉。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受到严重损失或被摧毁。2,323名陆海军人员死亡。

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同日下午，美国向德意宣战。

多年来，法西斯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绥靖政策的纵容下，不独企图冲垮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企图奴役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也在日益觉醒，逐渐联合起来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现在，这场斗争正式地、全面地开展起来了。

第九章

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美国经济与政治

美国参战后，面对的是极其凶恶狡猾的敌人，形势十分严峻；而且战线长，任务重，虽然可以投入战斗的潜力巨大，但并未很好地动员组织起来。所以当务之急是：以军事需要的名义，运用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迅速而有效地将全国人力、财力、物力动员和组织起来。与盟国一道，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

罗斯福政府的确是这样作的。其结果是：美国经济逐渐地完全摆脱了大萧条，不独消灭了几百万失业大军，还出现空前战时繁荣，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成功地在世界上首先造出原子弹；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投资建立许多军事工厂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生产和资本进一步积累集中，军界和工业界通过承包军事合同结成同盟，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艾森豪威尔后来警告美国人民时所说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作为一个实行“新政”上台、并认识到“新政”对于延长资本主义生命的必要性的总统，罗斯福虽然为了动员和团结企业界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尽量不再推进“新政”改革，但却继续努

力保护“新政”已取得基本成果，而且在战争胜利在望时，又提出进一步推进“新政”改革的许诺。

战时繁荣引起美国就业人数急剧增加和工农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战前即已开始的工会运动与民主党的联姻战时有所加强。与此同时，由于美、苏的战时合作，又引起美国共产党内白劳德机会主义路线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对美国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尤其是战后，使其遭到严重削弱。

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近一百万黑人从南部农村移向北部和西部工业中心。黑人无产阶级队伍壮大，黑人的政治力量和战斗精神加强，为战后黑人运动高涨奠定了基础。

由于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罗斯福于194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连续四次当选的总统。但任职不到半年，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总统。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人所有主要经济部门。

〔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　为动员美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需要，1939年8月成立了战时资源委员会，由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位经理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领导，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研究。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总统成立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进一步扩军备战。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下设两个主要机构：一个是1941年1月成立的生产管理局，由威廉·努森和产联的西德尼·希尔曼共同领导，它的任务是配合总统推动和控制战时生产；另一个重要机构

是1941年8月建立的物价管理局，主要是管理物价。此外，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所属的其他机构还有：民防局、国防运输局、租借管理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全国战时劳工局、经济作战局和战时航运局等。1941年9月，又成立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它掌握国防生产、民用经济以及对英、俄物资供应和分配的大权。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两项重要的法案，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以动员经济从事军工生产。1941年12月通过的第一个战时权力法，赋予总统以全权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1942年3月通过的第二个战时权力法，赋予总统以全权根据国防需要在整个经济范围内优先分配资源。1942年1月16日，联邦政府又成立一个最高战时机构，即战时生产局，由唐纳德·纳尔逊任局长，担负起生产管理局和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职责。1942年10月成立经济稳定局，罗斯福总统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为该局局长，并授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最高指挥权，有权管辖战时生产局。1943年5月成立战时动员局，仍由詹姆斯·贝尔纳斯领导。他实际上成为有权协调一切战时计划和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的总统助理。美国国内经济终于全面处于联邦政府控制之下，战时生产迅速达到最高纪录。

〔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扩大军事工业方面的全部费用总共为60亿美元，其中只有6亿美元（即10%）是由国家支付的，主要用于造船业和化学工业，剩下90%的费用完全是靠私人资本。这一情况，使得生产军火的垄断组织在1920—1921年经济危机中遭受最大的损失。基于这一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垄断资本拒绝出资扩大军事生产机构，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承担大部分军事工业建设。1941—1945年，美国的基本建设费为450亿美元，其中国家担负的部分是282亿美元，即占总额的2/3。对于纯军事工业

的投资总额为220亿美元，其中由国家负担的部分是160亿美元，即占73%。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已拥有全部原子能工业、生产合成橡胶企业的96%、生产金属镁企业的90%、生产飞机和引擎的71%、生产铅等企业的58%、以及45个生产高辛烷航空用汽油工厂。这些工厂都拥有最新和最好的制造设备。政府还建成了钢铁厂、造船厂、热力和水力发电站、生产军火工厂，还铺设了把石油输往东海岸的3，800英里的石油管道。主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国家财产在国民财富中所占比重由1929年的10.4%，上升到1948年的15.8%。

〔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　194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亿美元，而联邦政府采购的商品和劳务共值60亿美元，其中军事采购为22亿美元，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1944年，联邦政府采购总额高达890亿美元，其中军事采购874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101亿美元的41.6%，相当于1940年军事采购的39.8倍。

1940—1946年联邦政府商品和劳务采购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10亿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		联邦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			
		军事采购	其　他	合　计	联邦采购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
1940	99.7	2.2	3.8	6.0	6.0
1941	124.5	13.8	3.1	16.9	13.6
1942	157.9	49.4	2.5	51.9	35
1943	191.6	79.7	1.4	81.1	42.3
1944	210.1	87.4	1.6	89.0	42.4
1945	211.9	73.5	0.7	74.2	35.0
1946	208.5	14.7	2.5	17.2	8.2

资料来源：1969年总统经济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采购了全部重工业产品的80%和一般工业产品的半数。联邦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如此巨大，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种情况，对美国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

战时大多数军事订货集中在最大的军事工业垄断组织手里。1940年6月至1944年9月，100家最大的军火承包商在军事订货中所占的份额为67.2%，而小企业所占的份额，只有2.2%。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在战争结束时报告说："由于军需采购政策的结果，5个利益集团现在控制着全国生产能力的30%"。

为刺激私人垄断资本扩大军工生产，美国政府在战时广泛推行为期5年的加速折旧的制度。这种制度保证垄断组织很快收回固定资本投资并获得大量利润。1939—1943年，公司纳税前利润从72亿美元增为279亿美元。尽管战时税率很高，1940至1945年，公司纳税后利润还达到620亿美元，平均每年103亿美元，约为1936—1939年间每年平均纯利55亿美元的两倍。

战时公司利润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合计
纳税前利润	94.7	165.9	232.8	279.3	264.5	212.2	1249.4
纳税后利润	69.5	95.3	111.4	121.8	116.8	105.2	620.0

〔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　战争期间，政府支出巨大，消费者收入增加，许多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联邦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是：增加税收，大力推销公债，管制物价和工资，实施物资定量配给制度。

珍珠港事件以前，罗斯福总统作了几次稳定物价的尝试都告失败。1941年8月成立物价管理局，由于该局的权力很小，物价继续上涨。美国参战后，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物价管制制度。1942年1月，国会通过物价紧急管制法，正式授权物价管理局

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规定对违章者予以处罚。由于农产品不受管制，这套新制度还是没有抑止住通货螺旋式膨胀。1942 年 10 月，国会在总统压力下通过稳定法。该法授权总统把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平价的 100%的水平上，并把工资和非农产品价格稳定在 1942 年 9 月 15 日的水平上。1943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发出“坚守阵地”的著名命令，授权物价管理局“对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最高限价”，非经法律许可“一概不得提高”。总统的命令从 1943 年 4 月到 1945 年 8 月总共执行了 28 个月左右。在这段时期内，零售价格只上涨 4.2%，批发物价提高不到 2%。这是战时物价管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然而，物价管制并没有完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黑市活动相当猖獗，违反物价管制法的事屡见不鲜，迫使政府在 1942 年开始对轮胎、汽油、天然气、食糖和咖啡实行定量配给。1943 年 3 月扩大到对各种罐头和包装商品实行定量配给。4 个月以后，又把这种制度扩大到肉类和油脂方面。到 1943 年中，有 95%的食品实行定量配给，456 个房租区的房租都冻结在 1942 年的水平上。

关于管制工资的政策，将在下面叙述。

〔*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 联邦政府鉴于在战争期间有保持货运和客运畅通无阻的必要性，制订了严格的国内运输管理条例，并接管了国际交通运输业务。联邦政府设立国防运输局，负责管理国内运输业务。该局出色地完成了客运和货运任务。1939—1944 年，美国国内铁路货运量增加 1.2 倍，客运量增长 3.2 倍，而运费率不高于 1939 年。

战时对外贸易部受政府监督和控制，使其为战争服务。联邦政府成立经济作战局，负责在中立国采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免这

些物资落入轴心国之手。为了免遭德国潜艇的袭击，美国输往英国和苏联的商品和借租物资都由海、空军组织护航队进行护卫。至于美国商船队以及在战争初期被扣押的敌国商船，则由联邦政府设立的航运公司经营。

〔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　在美国，科学研究国有化的过程要比英国缓慢些。虽然早在 1863 年美国就成立了国家科学院，但是，这个科学院没有附设任何科学研究所或任何科学实验室。因此，20 世纪一切发明都与它无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没有一个领导和协调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国家中心，科学研究和发明工作主要是在美国最大垄断组织的私人实验所中进行的。1939 年，国家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近5,00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指定用于发展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军事优势和战争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许多重大的科研任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私人垄断组织是不愿意也难于承担的，只有国家出面组织和投资才有可能进行。因此，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政府对科研工作的干预和资助大大加强了，国家成了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1941 年 6 月，美国成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由万尼瓦尔·布什任局长，有权批准或否决所有科研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5 个预算年度（1941—1945）里，联邦政府用于科学研究、发明和实验的经费共达 35 亿美元，仅为实现“曼哈顿计划”就集中 20 万工程技术人员，耗资 20 亿美元。如果没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是不可能首先造出原子弹的。

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

〔“新政医生”让位于“胜利医生”〕 1943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30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①]。罗斯福总统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他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在这整整5年期间里，除1941年8月12日，罗斯福同邱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1941年1月6日，他致77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1941年6月25日，总统颁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

① 约翰·布雷曼等编：《联邦新政》，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75，第270页。

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1941 年 11 月，《幸福》杂志在一篇综合评论中透露，当时美国有 3/4 企业家害怕罗斯福利用战争危机来达到国内改革目的。[①] 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1942 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②] 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③]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

---

① 约翰·布雷曼等编：《联邦新政》，第 272 页。

② 同上书，第 270 页。

③ 《美国历史杂志》第 55 卷（1968—1969），第 105—106 页。

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只是由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 1940—1941 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 1943 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 1943 年农民购买力比 1939 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 1939 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①]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1943 年 6 月，国会中的自由派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的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当弗朗西丝·珀金斯正在为社会保障改革准备起草一篇演说时，罗斯福要求她着重强调“这不是一项某些人所谓的‘新政’法案”。[②] 而且，他正在用预定增加的社会保障款项同参议员范登堡作交易，以换取他对外交政策的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在第 3 章第 5 节中已经提到过 1938 年中期选举后国会中保守力量加强的情况，兹不赘。罗

---

① 《美国历史杂志》，第 55 卷（1968—1969），第 271 页。

② 理查德·波伦伯格：《战争与社会：1941—1945 年的美国》，费城 1973 年版，第 87 页。

斯福本人在1940年总统选举的成功，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1942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47席，在参议院增加9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的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一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发誓要战胜“新政”；即使保守派不能战胜“新政”，他们确信至少能阻止进一步推动“新政”前进。

1943年1月第78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更加强了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消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公共工程局、全国青年处等机构，还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当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1944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经济权利法案〕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苏联红军接连取得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美英军队占领北非后，又在意大利南部登陆，迫使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美军在攻占所罗门群岛及吉尔伯特群岛后，正准备向马绍尔群岛进攻。同盟国已完全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3国首脑就加速击溃德国法西斯、尽早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还就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及其他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赢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和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

目标。[1]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M·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2]

1945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6，000万个工作岗位。[3]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

---

① 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文献史》，纽约：1966年，第89—90页。

② 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哈考特公司，1970年，第425—426页。

③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第496页。

定了基础，为1946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以追溯到1944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①

三、战时动员和战时繁荣

〔战时人力动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正规军的规模，从未超过和平时期美国人口总数的1‰。1939年欧战爆发时，美国军事力量还相对弱小，武装部队人员总数仅335,000人。为改变这种状况，罗斯福政府不断加强备战活动，前章对此已有阐述，兹不赘。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运动，实行全民总动员。国会立即通过一项新的兵役法，下令所有年龄在20岁至44岁之间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45岁至65岁之间的男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需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为了进一步扩充武装部队，1942年又把义务兵役的应征年龄降低到18岁。根据选征兵役法，在征兵局登记的总共有3,100万人，其中，有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在战争结束以

①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译本），下卷，第51页。

前，包括志愿兵在内，总共有1,514万名男女在军队中服役[①]，其中陆军1,042万人，海军3,883，520人，海军陆战队599,683人，海岸警备队241,902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空军力量获得惊人增长。1941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有29.2万人，9,000架飞机（其中只有1,100架适于作战），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男女就达230万人，飞机72,000架。

美国的海军，也从珍珠港事变后那种相对脆弱的局面，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夏，海军在编人员从337,349人增加到3,408,347人。海军陆战队由66,048人增加到484,631人，海岸警备队由25,336人增加到170,480人。1941年底至1945年底，海军拥有各种类型船舰由4,500艘增加到91,000艘。[②] 此外，在陆军后勤部队服务的有175万人。

战时1,500万公民参军服役，而且在照顾到最低民用需求同时，还要优先扩大战时生产，为军事工业找到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工人。因此，劳动力严重不足是战争期间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首先，靠吸取失业者求弥补。1940年美国仍有失业者812万，1944年下降到67万，其中大半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其次，吸收了近400万学龄青年参加劳动大军，其中许多人是受高工资的引诱而从中学退学的。再次，约有

---

① 与欧洲相比较，战时苏联最高动员兵力达2,200万，德国1,700万，英国1,200万。

② 1941年12月美国海军4,500艘船舰中，有战列舰17艘、航空母舰7艘、重型巡洋舰18艘、轻型巡洋舰19艘、驱逐舰和鱼雷艇200艘、潜水艇114艘。1945年底的91，000艘船舰中，有战舰24艘、大型巡洋舰2艘、航空母舰29艘、护航航空母舰73艘、重型巡洋舰23艘、轻型巡洋舰45艘、驱逐舰和鱼雷艇489艘、护航舰500艘、潜水艇274艘。

100万名退休老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某些地方，年逾60岁的老工人竟占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最后，吸收了约500万妇女从事各种民用生产，充当砌砖工人、铆工、细木工和以前妇女从未担任过的其他职业。女工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从27%上升为36.5%，从1939年到1944年，工厂里的女工人数增加一倍。此外，约有20万穿军装的妇女在军队中担任速记员、文书、技术员和密码员等职务，其中许多人被派往海外，使更多的男子有可能上前线。

尽管战时平民就业人数从1940年7月的4,801万增加到1943年7月的5,475万（其中在军工部门工作的大约1，040万），军火产量仍然满足不了迅速扩大的战争需求。为此，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把所有国防工业的工作周从40小时增加到48小时（后来在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甚至超过50小时），加班加点可以拿到一倍半的工资。同年，总统还颁布了一道“冻结”命令，授权战时人力委员会制止军工生产工人调换工作岗位，制止雇主之间相互挖走对方的劳工。

战时，南部的黑人和贫穷白人涌到北部和西部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农场进入工厂，因而使许多地方严重缺乏农业劳动力。罗斯福总统要求各州教育机关制定计划，安排中学生在每个学年中抽出一定时间，或利用暑假，帮助农场主种植和收获作物。在种植果树的地区，当水果成熟时，则动员当地的银行老板、肉店主人、律师、汽车修理店主、地方报纸编辑，实际上镇上一切身强力壮的男女，都出动去摘果子并送往市场。

1943年，美国国会起草过一项像英国那样的国民服役法，规定征集全体男子和女子充当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该法得到军方的支持，但遭到产业界和劳工的激烈反对，到1945年1月，年纪在26岁以下，身体属于一级甲类的青年，几乎没有什么储

备力量，有必要大量吸收从事军工生产的人参加武装部队，罗斯福总统再次呼吁国会通过这一法案，以便全面动员一切人力资源。由于纳粹德国在1944年底的反攻已被遏制和参议院的反对，这项法令还是没有通过。

〔战时军费的筹措〕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费增加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美国参战的时间也比前一次长，战费更是高得令人吃惊。

1941年至1945年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总计约为3,176亿美元，其中2,815亿美元（占总数的88.6%）直接用于战争。这笔庞大战费，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全部直接战费的8倍，其中用于陆军的有1,596亿美元，用于海军的有884亿美元，剩余部分分别用于美国海事委员会、战时航运总署、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联邦政府筹措这笔庞大战费，主要靠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两种办法。税收占44%，借款占56%。

1940年1月，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提高税率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国防需要。同年6月和10月，国会先后通过两个税收法，决定降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个人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此外，还提高了货物税、馈赠税、房地产税和超额利润税的税率。尽管如此，该年国家预算还是出现赤字27亿美元。

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正式参战后的第一个预算咨文中，建议用税收负担一半战费。1942年4月28日，总统又向国会提出，个人和公司利润“将被课以重税”；“每一个用得上的美元都应该为战争作出贡献”；在战争时期，“任何美国公民在纳税之后都不应该得到超过每年2.5万美元的纯收入。”①

①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第363页。

1942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1942年税收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税额最高涉及范围最广的税收法。这个新税收法将正常所得税从4%提高到6%，个人超额累进的所得税从77%提高到82%，并对所有624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者征收5%的胜利税。公司所得税从31%提高到40%，超额利润税则达到99%的最高纪录。它还增加了货物税，开征大量新税，大大提高遗产税和馈赠税。这个税收法最重要特点，是扩大了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它把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降低到单身汉500美元[①]，已婚夫妇1200美元。所得税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联邦税收的重要来源。1939年，大约只有400万人缴纳联邦所得税，1941年为1,300万人，1942年，新的税收法使缴纳所得税者增加到5,000万人。1943年的纳税法令，提出一项重要创新，规定由雇主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中，扣除所得税，集中上交。在1941至1946年期间，税收总额为1,560亿美元（占全部战费的44%左右），其中大半来自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到1944年，这两项所得税收入约占全部税收的76%。1943年以后，超额利润税收入占全部公司所得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全国战费的56%左右，靠向私人、银行和其他机构借款来筹措。从1941年5月1日罗斯福总统带头购买第一张E类公债的这一天起，到1946年1月3日竞购胜利公债的最后一美元存入美国国库时为止，美国财政部为筹措战费而出售的证券，共计1,857亿美元，其中7次战时公债和最后的胜利公债，约为1,569亿美元。其中2/3（1022亿美元）由公司认购，1/3（433亿美元）为个人认购，余数由商业银行认购。由于靠发行公债来筹措战

① 个人所得税免征标准从1939年的1,000美元减至1940年的800美元，1941年750美元，1942年至1943年的500美元。

费，致使联邦政府债务从1940年的450亿美元，上升到1945年2，780亿美元的战时高峰。

〔军火生产惊人增长〕　美国参战后，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千百万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用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汽车工业到乡村的装配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汽车工业几乎全都改为制造飞机、坦克、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军需产品，过去制造钟表、农具、印刷机、现金结算机、缝纫机、割草机和打字机的工厂，现在则在制造雷管、炮弹和机关枪。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美国政府下令停止私人建筑和小汽车生产，对汽油和汽车轮胎实行配给制，禁止制造像无线电收音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家庭用具，以便把每年用于私人建筑和小汽车生产的数千万吨钢材节省下来用于军事生产，使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力大规模地转到军事工业。

1939年，军需生产不到美国产品总量的2%；产品总量的70%左右直接作为民用，剩下28%除由政府采购外，用于资本积累和出口。到1944年，军需生产上升到40%，民用份额只占总产量的一半。美国参战时，当年美国军火生产总值仅84亿美元。1942年军火总产值迅速上升到302亿美元，等于德、意、日3国军事生产的总和。1944年，美国生产640亿美元以上的军火，几乎等于3个轴心国和美国的主要盟国军用产品的总和。1939年，美国飞机制造业雇用46,638人，生产飞机5,865架。1944年，该工业雇用210多万人，生产各种飞机96,369架，比1939年增产15倍。

战时美国军需生产的最大成就在造船业方面。1941年，商船的建造只有100万吨，1943年达到高峰，生产超过1,900万吨。在这段时期，美国在特拉华湾、普吉特海峡周围，在密西西

比河以及五大湖沿岸，建起140个船坞。一位60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泽，成为美国造船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把建造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由原来的200多天减为40天，创造了世界纪录。

从1940年7月1日到1945年7月31日，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支出为1，860亿美元。在这5年期间，美国工厂总共生产86,338辆坦克，160,000辆装甲车，240万辆军用载重汽车，297,000架飞机，9,000门重炮，1,740万支步枪、卡宾枪、手枪和大量弹药，64,500艘登陆艇，以及数千艘军舰和5，200万吨商船。这项庞大的军工生产并不是完全用于美国。在战争期间，美国为盟国提供了它生产的军备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美国经济走向战时繁荣〕　在军火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经济迅速走向战时繁荣。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高达2，136亿美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工业生产指数（1935至1939年为100）至1943年已增长到239，耐用工业品生产指数上升到360，机器生产增加3倍，运输设备增加7倍。特别令人注目的生产奇迹，是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合成橡胶新工业。日本征服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以后，美国所需天然橡胶的90%供应中断。橡胶短缺使整个战争活动有陷于瘫痪的危险。1942年8月6日，罗斯福总统任命以伯纳德·M·巴鲁克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9月10日，该委员会建议用化学方法从石油制造合成橡胶。罗斯福立即行动起来。到1943年底，美国就建立起合成橡胶工业。1944年年中已达到每年生产836,000吨的速度，而战前一年所进口的天然橡胶，只有50至60万吨。

农业摆脱了长期的生产过剩危机。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

国农业危机最为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各国对美国粮食、棉花等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大增。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农产品由过去长期积压转为供不应求。最初，农场主不敢大胆放手生产。1942 年联邦政府修改农业政策，由“新政”时期以来的限制生产改为鼓励增产，规定农产品价格的最高限额必须高于一般商品的价格。1943 年，美国成立战时粮食管理局，负责管理农业生产，直到战争结束为止。1940 至 1945 年，美国农业生产者从1,167 .1 万人下降到1,087 .3 万人，耕地面积只扩大 3%，但整个农业生产指数却因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药的改良、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杂交玉米的推广，从 1940 年的 112 增加到 1945 年的 136。农产品价格在 1939—1945 年之间上涨大约 118%。由于农业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升比工业品快，农场主的实际收入增加。1940—1945 年，美国农业的纯现金收入，从 23 亿美元增长到 94.58 亿美元，即增长 3 倍以上。农场主在战争年代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富裕，他们偿还了几十亿美元的抵押债务，以储蓄和证券的形式积蓄了大约 100 亿美元。

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工资从 24.2 美元增至 44.39 美元。战争结束时，持有公债的人就有 8,500 万，美国人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高达1,364 亿美元。美国《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著名的新闻广播员爱德华·R·默罗评论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

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独是在战场上打赢的，而且也是在实验

室和试验场中打赢的。”[①]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年6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任命卡内基学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任局长，负责协调和组织全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审查陆军部、海军部和政府其他部门制定的现行科研计划，发起并支持有关战争装备和手段的科学研究。

战前，美国的整个科研力量已形成各自独立的系统，即联邦政府实验室、工业实验室、高等院校和非营利研究机构。战争期间，美国利用政府的力量，首先将这4个分散而独立的科学研究系统联系在一起，由直属总统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进行集中统一的协调和管理，把全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设备充分动员起来，从而使美国科学家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战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使美国的科学技术跃居世界首位。

〔发展了雷达和防空自动控制火炮系统〕　为了遏制德军的空袭，美英组织科学家发展了雷达系统、防空自动控制火炮系统。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可以使空军开展有力的夜间截击；安装在巡逻飞机上，可以探测敌方飞机和海面潜艇的活动；装在轰炸机上，可以投弹更为准确。到1945年7月，仅美国武装部队就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雷达设备和价值7,100万美元的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设备。为对付希特勒的潜艇战，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与哈佛大学水下声学实验室共同研制成功更有效的反潜设备——所谓声纳或水下测声器。与此同时，美国于1942年在反潜部队中建立起由物理学家莫尔斯领导的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组成运筹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册，第191页。

组织，首先把运筹学运用于搜索潜艇，总结出了著名的扫率公式。这一公式成功地指导了反潜战斗，提高了反潜能力，减少了同盟国大西洋航运损失。为了提高火炮的命中率，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独家研制出无线电引信。这是一种安装在炮弹里的微型无线电装置。它在炮弹临近目标时自动引爆。1943 年美军对日军飞机作战时首先使用这种新武器——无线电引信。1944 年底，盟军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攻时，美国用无线电引信对付德国人，使美国的火炮威力大增，有效地压倒了德国地面部队，迫使德军撤回到原来阵地。

〔*航空技术的进步和航天技术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生产各种类型飞机约 40 万架，一跃成为世界航空大国。战争不仅要求增加飞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求提高飞机的性能和研制新型的飞机。战前的飞机主要是用活塞式内燃机做动力的螺旋桨式飞机。这种飞机的速度一般都比声速低。1941 年 5 月 15 日，英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飞成功，美国引进英国的喷气发动机，1945 年初研制成功轴流式压气喷气机。喷气式飞机的出现，标志着飞机进入亚声速和超声速的高速飞行阶段。战后，喷气式飞机逐渐取代了活塞式发动机飞机。

液体火箭是现代火箭技术的标志。战争爆发时，德国在火箭研究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到 1941 年底，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才着手执行一个庞大的研究规划。1942 年研制成功筒状火箭发射器，每射出一枚火箭，其威力足够摧毁一辆坦克，接着美国又研制出种类繁多的火箭发射器与火箭，有供飞机发射的，有供军舰轰击海岸用的，有供地面战斗和防空作战用的。一架载火箭的战斗机，其火力相当于一艘驱逐舰。德国战败后，美国抢先占领德国的火箭研究中心，俘掳了包括布劳恩在内的 130 多名火箭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领导了战后美国的火箭研制。火箭是空

间技术的基础，战时火箭的试制成功，为战后航天时代的到来和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奠定了基础。

〔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也加速了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战时的军事、生产和科研都有大量的复杂的计算问题，常常需要几万次、甚至几百万次的运算；而且，计算的速度与精确性也要求很高，传统的手摇机械计算机已不能适应需要。194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同阿伯丁弹道研究实验室共同负责，为陆军计算火力表，每一张表都要计算数百弹道的数据，一个熟练计算员用台式计算机计算一条飞行时间是60秒的弹道，要花20小时，200多位工作人员日夜计算也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的莫克利等青年物理学家便开始研制电子计算机。他们吸取了历史上许多科学家设计制造计算机的经验教训和数学、物理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于1942年8月提出了题为《高速电子管计算装置使用》的备忘录。它实际上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方案。

莫克利的方案受到军方的支持。1943年4月9日，弹道研究所决定投资40万美元支持莫尔电工学院研制这种新型计算机。经过两年的努力，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于1945年底研制成功，1946年初公开展示，取名为电子数值积分和计算机，英文缩写是ENIAC。该机使用了18,000个电子管，重达30多吨，占地170平方米。它每秒可做5,000次加法，或500次乘法，比继电器计算机快1,000倍，一小时工作量等于100个人工作两个月。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科技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电子计算机问世不久，就迅速成为现代控制系统的大脑和指挥中心，使人类开始从用机器制造机器向用机器操纵机器的目标迈进。

战争还大大促进了美国其他科技的发展。其中有威力更大的炸药和燃烧弹，有对付害虫的DDT及其他武器，有盘尼西林和

合成橡胶等等。但是美国科学家最伟大的成就还是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制订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它集中了欧洲和北美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动员了10万人员和庞大的工业及经济资源，耗资20亿美元，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用5年多的时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弹。这一武器的研制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最伟大成就之一，它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科学家在研制核裂变方面远远落后于德国人。1938年3月，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实验室里成功地进行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实验，终于出现物理学界期待已久的裂变效应。1938年12月22日，哈恩把关于发现核裂变的报告寄到《自然科学》杂志。

铀裂变的发现震惊了美国科学界。核物理学家早已了解原子的结构，并且知道原子裂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现已成为事实，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巨大能量的实验已突破，哪一个国家能够首先把它转为实用，就有可能制造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严重的危险是，裂变反应正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已经点燃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亲身遭受希特勒迫害而从欧洲移居美国的著名原子科学家，首先对原子能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及其对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最为敏感。他们相信，希特勒正在制造原子弹，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德国有了这种新型炸弹，希特勒就有可能统治世界或者毁灭世界。

1939年夏天，传闻德国6位最出色的核物理学家正在柏林

秘密开会，讨论利用原子科学的成果制造武器；德国政府未加任何解释，突然禁止铀矿从它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德国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U工程”，由铀学会的科学家担任指导，直接对柏林的陆军武器部负责。移居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等人获悉这些坏消息后非常担忧，开始讨论怎样促使美国政府注意德国可能抢先造出原子弹的问题。

1939年7月，西拉德到长岛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马上表示愿意帮助西拉德。接着，西拉德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和金融家亚历山大·萨克斯。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把爱因斯坦的信交给罗斯福总统，并亲自念给他听，还加以说明。罗斯福为萨克斯的论证所打动，断然决定采纳爱因斯坦的建议，支持研究原子弹的工作，并下令成立一个铀顾问委员会。从此，这一问题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1940年6月，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说服罗斯福总统建立由国防部门、各大学、私营工业代表组成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便在这个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它通过与有关大学的实验室订立合同的办法，同时执行16项研究原子能的计划。这时，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分离浓缩铀235和如何产生裂变连锁反应的实验性课题上。到1941年夏季，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大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通过连锁反应能使原子发生裂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寻找一种足够数量的裂变材料。以往的实验证明，铀235可以发生裂变和连锁反应，可是铀235在天然铀中不到1%，积累足够数量的铀235以制造原子弹，其可能性是渺茫的。这一问题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博士所解决。他用一架巨大的回旋加速器，将大量的铀元素铀238转换成一种新元素——

钚，钚也可以发生裂变和连锁反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认识到：要在战争期间将原子弹迅速付诸实用，分散在各大学的研究工作必须统一起来；从实验室研究阶段走向工程和生产阶段，必须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1942年8月11日，美国制订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9月17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该计划的总负责人。遵照美国政府为“曼哈顿计划”确立的两个原则：一、造出能够结束战争的原子弹供给美国军队；二、赶在德国人前头造出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必须高速进行。于是，格罗夫斯将军采取了以下有力措施。

第一，迅速建立精悍的领导核心。1942年9月23日，格罗夫斯正式上任后，成立了包括他在内的3人委员会，由总统科学顾问布什任主席。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指挥权，统由新计划领导机构曼哈顿工程区接管，任何人不得干预。重大问题，格罗夫斯可以通过布什向总统汇报。

第二，优先解决铀矿石供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铀矿石来源是在比属刚果。通过交涉，美国控制了比属刚果的铀矿石。

第三，集中欧美最优秀的科学家，联合起来和德国竞争。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邱吉尔同意美英两国合作研制原子弹，成立了美、英、加3国共同研制原子弹的联合委员会。同年12月，英国选派了以詹姆斯·查德威克为首的大约28名杰出的科学家参加曼哈顿计划。此外，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尼尔斯·博尔、匈牙利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利奥·西拉德都被吸收参加制造原子弹的行列。

第四，实行极端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新闻检查。这种保密程度，甚至严格到连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最高级官员事前都毫无所知。保安工作的主要对象，首先是针对纳粹德国，其次是针对苏联。

第五，组织特别情报小组。1943 年秋天，美国组织一个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特别军事情报小组。它的成员由军事人员和有军衔的具有原子科学知识的科技人员组成。阿尔索斯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德军在原子能方面的情报，包括铀矿来源，德国核物理学家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宅，核物理实验室和工厂的位置，以便判断德国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进展到什么程度。一旦有可能时，就抢先占有或摧毁他们。

第六，多管齐下，一齐上马。曼哈顿计划的主要内容：一是生产足够数量的裂变材料，二是设计和研制原子弹。怎样生产裂变材料，从理论上讲，当时有 5 种方法可以生产裂变材料铀 235 或者钚，但是实际上哪种方法都没有进行工厂设计和生产的可靠资料。为尽快生产足够数量的裂变材料和造出原子弹，格罗夫斯将军采取多管齐下的方针。他在华盛顿州的汉福特建立了采用石墨型反应堆分离钚的工厂；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先后建立了 3 种类型的工厂，分别采用电磁分离法、气体扩散法和热扩散法生产浓缩铀 235；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成立专门的实验室，由罗伯特·奥本海默负责，主要任务是设计和制造实战用的原子弹。

1942 年 12 月 2 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面，在费米的指导下，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可控的链式反应。橡树岭工厂在 1943 年初动工兴建，1944 年 3 月就生产出第一批浓缩铀 235。制造原子弹本身的工作，于 1943 年春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开始，经过两年多

的日夜奋战，1945 年 7 月 12 日，一颗试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7 月 16 日上午 5 点半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 50 英里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成功。

五、战时的美国工人运动

战时经济繁荣导致就业人数的扩大和失业率的下降。1940 年全国就业人数只有4,752 万，1943 年达到创纪录的5,447 万。失业人数由 1940 年的 812 万下降到 1944 年的 67 万。

战时就业人数增加得最多的是制造业部门。1940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078 万，1943 年达到1,738 万，增加 61%。新增加的工人大多数从事军需生产。1943 年 11 月，大约有 1，040 万人在军火工业部门工作。

战时就业、失业人数 （单位：千人）

时间	就业总人数	制造业就业人数	失业人数	失业率（%）
1945	52，820	15，302	1，040	1.9
1944	53，960	17，111	670	1.2
1943	54，470	17，381	1，070	1.9
1942	53，750	15，051	2，660	4.7
1941	50，350	12，974	5，560	9.9
1940	47，520	10，780	8，120	14.6

资料来源：《殖民地时代至 1957 年美国历史统计》，第 70、73 页。

战时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周工资 1939 年为 23.19 美元，1944 年增至 47.45 美元，这就等于每年工资从1,206 美元增至2,464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工资的提高，和工作周的平均长度约从 38 小时延长为 45 小时有关。每周超过 40 小时的加班工资以及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工资，分别按原工资 150% 和 200% 发给，从而大

大提高了工人的工资。1941—1945年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23.3%，而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周工资却提高70%。

工会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加强。1939—1945年，各工会会员总数约从900万增加为1，500万。美国工人阶级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不顾轴心国潜艇的袭击和飞机的轰炸，冒着生命危险担任运送军火支援前线和盟国的光荣任务；他们节衣缩食，带头购买战时公债；他们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到1944年底，仅在工会会员中间，参加军队的人数就达325万人。工会会员亲属和亲友参军的还有数百万。战时盟国军政领袖对美国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都一致予以充分肯定。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劳动节的演说中赞扬说，正是因为美国工人有决心，“方使我们能够获得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生产成就”。1944年2月7日，英国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登载在《美国劳工通讯》上的一封信中说，美国工人所取得辉煌生产成就，“不仅是对第8军的胜利的贡献，而且也是对盟国的事业的贡献。”对这些工人“不论怎样夸奖都不会过高。”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他的盟友举杯祝酒时热情地说，“没有美国的生产，联合国家决不能赢得这场战争。”

〔战时罢工运动〕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召集劳资双方代表会议，要求劳资双方通过自愿和合法的手段调解他们的分歧和冲突，以免影响战时生产。参加会议的双方代表一致保证：在战争年代里，工人不罢工，雇主不关闭工厂。1942年1月12日，总统建立一个调解劳资纠纷的新机构——全国战时劳工局。它负责制订战时劳工政策，对劳资纠纷具有最后裁决权。如果拒绝执行其裁决，它可以没收工厂，由政府经营。全国战时劳工局由威廉·戴维斯领导，由人数相等的官方、资方和劳方代表组成。它在战时处理了将近1.8万起劳资纠纷。

战时劳资纠纷主要发生在工资方面。1942年头几个月，生活费用上涨，伯利恒、扬斯顿、内陆和共和等钢铁公司的18万工人，要求按照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把钢铁工人的工资每天增加一美元。1942年7月16日，全国战时劳工局决定钢铁工人工资增加15%，理由是：自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的生活费用增长率为15%，因此，工会在此战争期间要求提高工人工资的幅度最多不得超过15%。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小钢集团公式”，并且得到1942年10月反通货膨胀法的追认。从此以后，就成为全国战时劳工局所沿用的工资政策。

这种冻结工资的政策引起工人们的不满，他们提出数据证明物价已经上涨15%以上，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工人的工资被冻结，而高薪者、发战争财者却没有照此办理，雇主的利润正在不断增加。工会要求全国战时劳工局修改它的工资政策，按照生活费用的实际增长对工资作相应的调整。但是，战时劳工局拒绝工会提出的要求，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从1942年1月1日到1945年8月14日，总共发生14,731次罢工，参加人数为674万人，损失了3,600万个劳动日。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和几乎要发生的全国性铁路工人大罢工。1943年5月1日，约翰·刘易斯领导的矿工联合会要求突破“小钢集团公式”，每天工资增加两美元。当企业主拒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时，他号召煤矿工人再度举行总罢工。总统接管了煤矿。6月11日，煤矿工人再度举行罢工，罗斯福总统以要求国会征召罢工者入伍相威胁，矿工们才复工。6月21日，刘易斯又以举行第3次罢工相威胁，才迫使政府同意为矿工每天增加工资1.5美元。同年12月，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也使政府接管铁路，由政府经营了3个星期。

战时罢工有其特点：一是罢工时间短，1942年平均每次罢

工时间为 12 天，1943 年为 5 天，1944 年为 5—6 天，而 1939 年是 13 天；二是损失小，罢工所损失的时间只不过是整个工作日（1943 年至 1944 年）的千分之一；三是大多数罢工都是未经工会领袖批准的自发性罢工；四是许多罢工是由于对工资的不满而发生的。

〔史密斯—康纳利法〕　战时罢工运动的高涨，在国会中引起很大不安，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削弱工会的权利，仅在 1943 年，美国国会就提出 61 份反劳工法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和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草拟的严厉的反劳工法案。1943 年 6 月 25 日，国会不顾罗斯福总统的否决，通过了战时劳资纠纷法（即史密斯—康纳利法）。这项法令，一直执行到战争结束，以后又延长了 6 个月。

史密斯—康纳利法加强了战时劳工局的权力，宣布在政府经营的军事工厂内，一切罢工均为非法行为，授权总统接管任何发生罢工的军事工厂；私营工业中的工人要举行罢工，必须事先通知政府，在为期 30 天的“冷却期”内，须经工人举行秘密投票后，才能决定工会是否可以罢工。该法还规定对发起罢工者提出刑事起诉，禁止工会组织对任何联邦政府官员的竞选运动提供捐款。1943 年史密斯—康纳利法的通过，说明国会中反劳工情绪日益增长，和反劳工团体的保守力量不断加强。该法削弱了 1935 年瓦格纳法赋予工会的权利，为战后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劳工立法树立了先例。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黑人

〔黑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夕，“黑人是最早和最热心斥责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人”。1935年，当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阿比西尼亚时，美国北部所有比较重要的黑人聚居区都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墨索里尼践踏别国主权的侵略罪行，全国黑人大会专门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中立法，对意大利实行禁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成立了黑人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有几百名黑人参加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美国分队，其中有数十名黑人战士为西班牙人民民主事业英勇捐躯。美国参战后，黑人报名参军者300多万人，正式入伍者117.4万人。1944年底，美国陆军中服役的黑人为70.2678万人，海军中为16．5万人，海岸警备队中0.5万人，海军陆战队中1.7万人。在海外服役者大约50万人，其中有20万在太平洋地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黑人士兵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黑人炊事兵多里·米勒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用机关枪打下4架敌机，荣获海军十字勋章。在意大利战线，完全由黑人组成的第92步兵师，因作战英勇而荣获1，200枚奖章。在太平洋地区，黑人组成的第93步兵师从所罗门群岛打到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一直在最艰苦的地区作战。在印度，近万名黑人士兵出色地完成修筑利多公路的任务。最值得赞扬的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99驱逐机中队和第332战斗机中队。前者战争期间在欧洲完成3，500次飞行任务，在空中击落敌机110架，在地面摧毁敌机150架，创造了美国驱逐机队的最佳成绩；后者由著名黑人战斗英雄小本杰明·O·戴维斯上校指挥，担任远距离护航，保证美国空军轰炸机深入巴尔干、波兰、罗马尼亚和德国执行轰炸任务，功勋卓著，荣获罗斯福总统颁发的集体嘉奖令。整个战争期间，有5位黑人荣获殊勋金十字勋章，88名黑人飞行员荣获殊功飞行十字勋章。许多白人军官都赞扬黑人士兵作战勇敢，美国陆军部也

不得不承认：黑人士兵“所得到集体和个人勇敢的表扬次数”，“按比例来说”，同他们并肩在全世界作战的白人所得的次数一样多。[①]

〔武装部队中的种族隔离〕　黑人士兵虽然在国外为反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而英勇作战，但他们自己却在美国武装部队中遭受隔离和歧视。在入伍文化测验中，白人15分即可入伍，黑人则需39分。在特斯基吉航空学院，有种族隔离的训练基地单独训练黑人驾驶员。黑人即使进入兼收黑人和白人的陆军军官学校，但结业后则编入完全实行种族隔离的部队。派往海外的黑人士兵，71%在后勤和运输部队服役，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黑人医护人员只限于在完全是黑人的陆军医院工作，甚至不容许他们在住有黑人和白人的混合医院中治疗黑人伤员。虽然科学已证明，一切人种的血液是相同的，但美国红十字会血库中黑人与白人的血分开保存。在战俘营里观看演出时，白人战俘营长竟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在广大黑人的坚持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陆军部被迫于1943年和1944年两次发布命令，禁止在换岗放哨方面，以及娱乐场所和交通方面实行种族歧视，但在南方的一些军营中，并未贯彻执行。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有28名黑人士兵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在南部城市，至少有4名黑人士兵被公共汽车司机杀死，4名被民警和警长杀死，杀人犯全都逍遥法外。黑人士兵忍无可忍，不断奋起反抗。在布罗格要塞、鲁宾逊营地、戴维斯营地、迪克斯营地等处，都发生过严重的种族冲突。在种族冲突中，黑人士兵杀死白人士兵，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判处死刑，但是白人士兵杀死黑人士兵，从未有一人被判处死

① 《纽约时报》，1945年1月1日。

刑，至多判处10年苦役。

〔黑人工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

美国黑人在大萧条时期受害最重，从“新政”立法得益最小。1940至1941年的国防景气，给他们带来好处也不多，因为黑人往往被排斥在蓬勃发展的军需工业之外。美国参战前夕，美国各地的种族偏见越来越厉害。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公开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密西西比州国会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有句名言，“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而美国国会，则不肯作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

早在1940年，黑人就开始组织起来，向国会、政府和实业界呼吁，要求在国防工厂取得平等就业机会，但是收效甚微。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主席A·菲利普·伦道夫对总统威胁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下去，他就要号召5万名黑人工人向华盛顿进军以表示抗议。总统犹疑不决，于是伦道夫便决定在7月4日组织游行示威。罗斯福总统害怕工人上街游行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而且会被纳粹分子的宣传机构所利用，终于在1941年6月25日让步，发布著名的第8802号行政命令，规定雇主和劳工组织均有责任向一切工人提供全面和公平参加防务企业的机会，不得由于种族、信仰、肤色或出生国籍不同而有所歧视。根据这项命令组成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由总统任命1名主任委员和4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有权对种族歧视的申诉进行调查。它建立了15个地区办事处，从1943年至1946年，审理了大约8,000起控告案，举行了30次公共听证会。由于黑人的不断斗争，加上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和产联的努力，战时黑人就业取得新的进展。1940年的100万名失业黑人，几乎全部就业。在制造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中，黑人就

业人数从1940年的70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145万人。黑人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增加一倍。黑人工会会员人数，则从1940年的50万人，增至1945年的125万人。

大批黑人从南部农村进入城市工业区后，种族关系更为紧张。1943年6月20日，在底特律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种族冲突，造成25名黑人和9名白人死亡，500人受伤，上千人无家可归。联邦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黑人被捕者多达1300人，1944年8月在费城发生的种族冲突，引起运输工人罢工，全城陷于瘫痪状态，联邦军队被调来"恢复秩序"。在这些斗争中，尽管黑人遭到牺牲和挫折，但黑人在战争年代所显示出来的英勇不屈、顽强反抗的战斗精神，为60年代黑人运动的高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七、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机会主义的斗争

〔*白劳德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厄尔·白劳德是"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堪萨斯州，早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20年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6年出访莫斯科，担任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1930年洛夫斯顿被撤销党的总书记职务后，由白劳德任美共中央执行书记。1932年威廉·福斯德作为美共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患了心脏病，不能工作，白劳德获得了党的全部领导权，从1934—1944年一直担任美共总书记。1935—1940年间，他还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早在30年代中期，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观点就开始露头。1934年，在美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白劳德宣称"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鼓吹要把"共产主义和杰斐逊的民主传

统结合起来"。1935 年，共产国际第 7 次代表大会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1936 年，美共第 9 次代表大会就决定无条件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白劳德公开鼓吹"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这就表明了白劳德在建立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思想。

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美国共产党立即改变原来的反战立场，要求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给予苏联、英国以全力的援助。由于美、英、苏面临共同的敌人而暂时结成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美英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意援助苏联，白劳德就立即作出结论，认为美苏从此就是可靠的同盟国了。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和战后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德黑兰宣言》公布后，从 1943 年 12 月到 1944 年 9 月，白劳德发表了许多讲演和文章，吹捧《德黑兰宣言》。最突出地反映白劳德主义的代表作是 1944 年出版的《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他抹煞当代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矛盾，认为《德黑兰宣言》是"全部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转折点"，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胜利与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并宣扬世界的前途取决于两个最大强国的"友谊、谅解和合作"；他鼓吹"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年轻的资本主义"，可以例外地不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制约；他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因而鼓吹阶级合作，歌颂自由企业，主张通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他抹煞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盲目崇拜资产

阶级民主，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第三党的存在。

〔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机会主义的斗争〕　白劳德的机会主义首先遭到美共主席威廉·福斯特的批判。1944 年 1 月 20 日，福斯特在《给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德黑兰决议没有消灭美帝国主义"，罗斯福政府"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政府，只不过是稍微受点自由主义牵制的政府罢了"；"只是由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他们才勉强赞成德黑兰协议。"[①] 但白劳德利用总书记的职权，把福斯特的这封信扣压下来并对全党隐瞒了。

1944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美共在纽约市召开党的第 12 次代表大会，根据白劳德的建议，未经讨论就通过了解散美国共产党的提案。这次党代会只开了几分钟就告结束。接着，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成立大会。当时只有福斯特站在反对的立场，因此，他的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被撤销，而由白劳德接替，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会长。这样，白劳德就把一个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非政党组织。白劳德机会主义不仅给美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黑人运动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恶劣影响。

1945 年 4 月，法共总书记雅各·杜克洛在法共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上，发表了一篇"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的文章，对白劳德机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5 月 24 日，美共《工人日报》发表了杜克洛的文章。1945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福斯特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美共第 13 次代表大会），清算了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线，解散了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决定重建

---

① 《政治月刊》，1946 年 7 月号。

美国共产党，恢复了福斯特全国委员会的职务，撤销白劳德的领导职务。1946 年 2 月，白劳德被开除出党。此后，他直接投靠资本家去了。

战后美共在反对白劳德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却使党内左倾思潮比以往更为严重。“美国例外论”是白劳德机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片面夸大美国的特点，认为美国可以例外地不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制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予以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但这决不等于说就可以不从美国国情出发，而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简单地使用反对“例外论”的武器，将一切敢于独立研究、大胆探索美国实际和特点的思想观点，不论正确与否，统统斥之为鼓吹“美国例外论”，“背叛马列主义”，就会严重地阻碍美共党员的思想解放，使一些正常的有益讨论被扼杀，并使党犯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党对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错误分析，表现为多次以教条主义的片面方法预言危机的来临，夸大危机的后果，没有注意研究战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而是从传统的经济理论出发，认为危机一到，就会出现像 30 年代那样的大萧条，阶级斗争就会全面激化，结果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和策略屡显失误。正如美共领导人丹尼斯 1956 年 4 月在美共中央（扩大）全会上所作报告指出：“非常明显，自从 1945 年以来，我们党在绝大多数形势分析与斗争策略上所犯的错误主要具有左倾宗派主义性质。”

第 十 章

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美国军事和外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美、英和苏联不得不暂时结成反法西斯的战时联盟。为了便于指挥盟国的军事行动和协调盟国的军需物资，美英在华盛顿设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及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美英荷盟军联合司令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始终坚持美英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商订的联合作战的战略方针，欧洲战场是主要战场，希特勒德国是最主要的敌人，打败德国是盟国的首要任务。在兵力部署、军需品分配和作战上都服从先欧后亚、德国第一的原则。为了维持英苏对德作战，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予英国和苏联等国以大量的物质援助，真正起到"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作用。美国派出同轴心国作战的军队高达1，200万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协调了军事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太平洋上的逐岛作战则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挥130万大军横扫西欧，乔治·佩顿（亦作巴顿）将军在北非立下赫赫战功。总之，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以及欧洲第二

战场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对击溃德、意、日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美、英、苏3国政府首脑战时相互通讯频繁，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了3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协商解决了许多重大军事和政治问题。然而，在反法西斯大同盟内部，由于3大国各自追求的战略目的不同，美、英同苏联之间，美、英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前期集中表现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后期突出表现在对战败国的处置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上。

一、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邦、哥斯达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波兰政府也相继对日宣战。中国也向日、德、意宣战。战争席卷和波及了世界4/5的人口。

美国的参战，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大大加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邱吉尔后来写道："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希特勒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已注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得粉碎……。当然，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期……。但是对于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为我们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觉。"①

〔阿卡迪亚会议和《联合国家宣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担心美国可能放弃先前同意的"首先对付德国"的战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上册，第448页。

略，而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日本。12月9日，邱吉尔提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审议“整个作战计划”和“生产与分配问题”的会议，罗斯福热情支持这个建议。1941年12月22日，邱吉尔一行到达华盛顿，参加一星期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两国军事参谋人员的讨论一直继续到1942年1月14日。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盟国的战略。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双方重申两国参谋人员早先作出的决定，确认德国始终是最主要的敌人，打败德国是盟国的首要任务，因为德国控制着比日本雄厚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人力资源。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因此，盟国将把对德作战摆在优先地位，把欧洲作为主要战场；而对太平洋方面，在纳粹政权被抑制住之前，则采取守势。为了统一指挥今后盟军的一切军事行动，在华盛顿设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英、美、荷盟军联合司令部。会上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各种供应问题，决定成立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等5个联合机构，统筹同盟国在军火、船运和原料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美国总统还决定扩充1942和1943年武器生产的计划，并承认苏德战场的极端重要性。12月28日，他撤销了珍珠港事变后发布的关于暂停向苏联供应的命令。

阿卡迪亚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起草一份所有参加反轴心国战争的国家所必须接受的原则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罗斯福赞同、经与邱吉尔和苏联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写成的。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的和经济的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保证相互合作，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宣

言》的发表，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进一步壮大和加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苏英同盟条约和苏美互助协定〕　为了加强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5月2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苏英同盟合作互助条约》，为期20年。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在同德国及其仆从国作战中，互相给予军事及其他一切援助与支持，未经双方同意，决不与希特勒政府及其仆从国进行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这个条约从根本上改善了英、苏关系，对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具有重大意义。

1942年6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继续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提供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批准转让或提供之防御物资、防御设备与防御情报"；苏联也应"以其所能"向美国提供类似的援助。据统计，从1941年下半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运往苏联的租借援助价值为108亿美元，几乎占美国一切租借援助总额的1/4。[①] 其中大约一半是飞机、坦克、军用汽车和其他军火——包括大约15，000架飞机、7，000辆坦克、52，000辆吉普车、385，000辆卡车和35，000辆摩托。此外，还对苏联租借大量通讯器材，包括422，000部军用电话机和足够环绕地球50多圈的电话线。

美国对苏租借出口大约1/3是扩充苏联军工生产的原材料和

---

① 从1941年3月11日至大战结束，美国共向盟国提供了价值471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国得到286亿美元，苏联得到108亿美元，法国得到26亿美元，其他国家得到51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从国外取得价值为170亿美元的原料、食品和劳务费用补偿。

重要设备，其中包括几十万吨装甲钢板、钢材、铜、锌等金属和价值5亿美元的机床、发电机和整个的轮胎厂和轧铝厂。杜鲁门吹嘘说："如果没有美国供应的这些装备，俄国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① 但是，有的苏联学者却贬低美国租借援助的作用，说是"苏联所得租借援助仅及英国的1/3"，"就其价值来说，没有超过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生产总值的4%。"② 任意夸大或贬低美国租借援助的作用都是片面的。美国的租借援助，对苏联在东线战胜希特勒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它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与苏联政府签订关于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并向苏提供大量援助，是因为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当权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和敌人，援助苏联抗德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1941年9月11日，马歇尔将军说，"向德国人发起成功的地面进攻的最好机会"取决于"在俄国保持一个主动的战场。"只有它才拥有"足够的人力，而且处于离中心较近的有利位置……。〔因此〕有效地武装俄国军队……将是联合的大国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③ 1942年3月11日，罗斯福对摩根索说："没有什么比俄国人被打败更糟糕的了……。我宁可丢掉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东西，也不愿让俄国人失败。"④ 杜鲁门说得更坦率：美国继续援助俄国"有几个原因。同俄国人交手的敌人每增多一个，同我们对垒的敌人就减少一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还很渺茫，我们需要俄国人在那里帮助我

---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1卷，第519页。
② 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莫斯科：1975，第4卷，第642页。
③ 达莱克：前引书，第425页。
④ 同上书，下册，第486页。

们。”①

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阶段

〔日本的闪电战和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的失利〕　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还出动大量海陆空军，兵分5路，齐头并进，向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许多岛屿发动突然进攻。

第1路。由本间雅腈中将指挥的驻台日军第14军向菲律宾进攻。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首都马尼拉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它是美、日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战略要地。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从台湾起飞，突袭吕宋岛，一举炸毁美国停放在马尼拉附近克拉克和尼古拉机场上的半数飞机。12月10日，日本空军又摧毁了马尼拉湾的甲米地海军基地。从此，日军完全掌握了制空、制海权。接着，日军先后在菲律宾许多地区登陆，美军节节败退。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把美、菲军队撤退到马尼拉湾两侧的巴丹半岛上，自己则迁到巴丹半岛的最南端科雷吉多尔岛上。

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3月17日，美国政府担心麦克阿瑟成为日本俘虏，命令他把军队交给乔纳森·温斯特将军指挥，让他自己到澳大利亚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4月9日，日军占领巴丹半岛。次日，骇人听闻的“死亡行军”开始。被俘的美、菲军被迫在烈日下长途步行1，000余公里。他们不堪酷热、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死亡数千人。5月6日，美军投降，日本占领了菲律宾。

第2路。由驻九龙的日军第23军向香港进攻。1941年12月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2卷，第328页。

12 日，日军向香港英军守备队发出最后通牒。当英军拒绝投降后，日军于 18 日深夜在香港登陆。25 日，日军占领香港。

第 3 路。由驻印度支那半岛的日军第 15 军向泰国和缅甸进攻。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越过泰国国境发起进攻，第二天就占领泰国首都曼谷。接着向泰国北部和缅甸边界推进。1942 年 3 月 8 日，日军占领仰光，然后分 3 路向曼德勒推进。4 月 29 日，日军攻占腊戍，切断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5 月 28 日，英军通过丛林进入印度，日军随即占领缅甸。

第 4 路。由驻印度支那半岛的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第 25 军向马来亚和新加坡发起进攻。1941 年 12 月 8 日拂晓，日军在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的哥达巴鲁登陆，迅速占领克拉地峡。12 月 10 日，日军击沉英国远东舰队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取得海空控制权。次年 1 月 7 日，日军攻入马来亚首府吉隆坡。2 月 8 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在新加坡登陆。2 月 15 日，英守军司令白西华中将率英军 10 万人向日本投降。

第 5 路。由驻海南岛的今村均中将指挥的日军第 16 军向荷属东印度群岛进攻。1942 年 2 月，日军占领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帝汶和苏门答腊等岛屿。3 月 1 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在爪哇岛登陆。3 月 12 日，荷印总督和军队向日本投降。

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到 1942 年 5 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英、荷在远东的部队，相继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关岛和威克岛，控制了约 1.5 亿人口和 38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此前侵占的中国领土和朝鲜、印度支那，总面积达 7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5 亿左右。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失利的原因是：美英统治集团长期对日本的法西斯侵略奉行绥靖政策，战前麻痹轻敌。首战失利之

后，产生畏敌怯战的失败主义情绪，使整个部队丧失战斗力；美、英、荷长期在东南亚实行殖民统治，使他们同当地人民处于对立地位，不敢武装和依靠当地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英美在这一地区部队多数是在当地招募的雇佣军，训练、装备很差，战斗力很弱。反之，日军则在战前有周密准备，作战时陆海空军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各个击败；而英美军队则缺乏协调一致的统一指挥，陆海空军互不配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美国在太平洋上取得主动权〕　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遭到重大挫折之后，立即进行战略协调，采取一系列反对轴心国的对策。1942年1月6日，美英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保证全面协调两国的作战努力。2月下旬，罗斯福向邱吉尔建议重新划分美英作战地区，英国负责印度和印度洋，美国负责整个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月，美国调整在太平洋地区的指挥机构，将太平洋战场分为两大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上将任总司令，太平洋战区由尼米兹海军上将任总司令。与此同时，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海、空军力量也得到加强，连续轰炸了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基地。

1942年4月18日，由詹姆斯·杜利特尔上校率领的16架美国中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空袭东京，然后飞到中国基地降落，这次空袭震动了日本。1942年5月7日至8日，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从拉包尔出发，经过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珊瑚海时，由于日本海军指挥部的秘密通话被美军截获，遭到美国海军航空兵的意外攻击。在这场历时两天的战斗中，战斗完全由空军进行。结果，日本损失军舰5艘，飞机100架和约3,000人。美军损失军舰两艘，飞机20架和500人。这是日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首次受挫，入侵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被迫推

迟，入侵澳大利亚的计划化为泡影。

珊瑚海战斗之后，日军暂停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战行动，转而企图夺取夏威夷群岛以西1，200英里的美军在中途岛的作战基地，以便切断美国在太平洋的交通线，并在夏威夷群岛建立日军基地。为此，日本派出一支庞大突击舰队，准备在中途岛与美国进行决战。美国由于截获并破译了日军秘密电报，尼米兹把他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调到中途岛海域。1942年6月4日至5日，双方海军航空兵展开激烈战斗，结果日军惨败，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型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和飞机275架。美国则仅损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飞机100架。中途岛战役为太平洋战场的一次关键战役。它是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海军第一次遭到失败，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军丧失了它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太平洋上海战的主动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

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作战胜利的鼓舞下，美军积极准备发起有限攻势。美国海军司令欧内斯特·金选择瓜达卡纳尔岛作为在南太平洋的第一个进攻目标。该岛位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占领该岛不仅可以制止日本南下威胁澳大利亚，并可保护美国在西南太平洋上的供应线。于是，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美日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长达半年之久的瓜岛争夺战。结果日军伤亡25,000人，损失舰艇24艘，飞机600架，大大超过盟军的损失。1943年2月7至8日夜间，日军被迫撤离该岛。瓜岛之战暴露了日本国力不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海空军建设远不如美英力量雄厚等弱点。从此日军被迫处于战略守势，美军由防御和局部进攻转为全面进攻。

三、美英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场的胜利

〔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　早在1941年12月，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曾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1942年6月，邱吉尔偕同英国总参谋长等再次访问华盛顿，重申“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而反对1942年在法国本土登陆。1942年7月24日，当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霍普金斯访问伦敦期间，经过多次协商，美英双方决定于1942年秋天在北非登陆（密码代号由体育家改为火炬）。7月25日，罗斯福总统正式批准这个计划。8月13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并向他发出作战指令，其目的在于协同盟军完全控制从大西洋到红海的整个北非。

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统帅的美英联军分别在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奥兰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登陆。盟军登陆时，仅在卡萨布兰卡周围遭到法军的激烈抵抗。法国维希政府首脑贝当元帅于11月9日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当德国军队于11月11日侵入未被占领的法国土地时，维希政府立即垮台，“一贯忠于”贝当和强烈亲法西斯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让·达尔朗海军上将接管法属北非领地。为了免除法军的抵抗，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服当时正在阿尔及尔探亲的让·达尔朗与盟军合作。鉴于盟国部队的优势，德国对法国的全面占领，达尔朗接受美英条件，命令所有法国军队停止抵抗。11月13日，盟军同以达尔朗为首的法国陆海空军达成最后协议，北非法国的军政官员同盟军合作。作为交换条件，盟军承认达尔朗

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1]。因此，美英联军在当地居民的支援下得以长驱直入，于11月底占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直逼比塞大和突尼斯城下。

德国为了扼守北非，以便在此牵制住美英军队，在美英军队开始登陆后，立即将驻西欧的部分德军从海空两路调往突尼斯。至1943年3月，集中在突尼斯境内的德意联军共有14个师又两个旅，但各部队的人员和装备缺额很大，后勤供应很困难，又处于两支盟军之间，态势十分不利。而此时美英联军的总兵力，已达20师又4个独立旅，人员和装备齐全，处于明显的优势。1943年4月20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指挥英军第8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艾森豪威尔指挥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战斗，于5月7日分别占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5月13日，德意军队25万人全部投降，盟军占领整个北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粉碎了德、日法西斯在中东和印度会师的狂妄野心，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对北非战役的胜利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由于非洲的军事行动表示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苏、美同盟。"[2]

〔卡萨布兰卡会议和美法关系〕　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及双方主要军事参谋人员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高级会议，协调两国的欧洲和太平洋战略，并就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的作战行动作出决定。罗斯福曾试图邀请斯大

---

① 艾森豪威尔同达尔朗的协议在英国和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对。反对者指责这项协议"卑鄙地抛弃了联合国家必须为之战斗的原则"，是"美国同维希政府中最反动分子相勾结"。11月17日，罗斯福发布同意艾森豪威尔—达尔朗协议声明，他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使战争获胜的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

②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326页。

林参加会议，但此时正值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决定性攻势，他说前方军务繁重，一天也不能离开苏联。

在讨论对德战略时，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极力主张在1943年扩大地中海战场；在北非战役结束后，盟军腾出力量攻击西西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美国军方则倾向于及早全力以赴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登陆，反对英国的地中海战略。但罗斯福本人倾向于英国人意见。

对于太平洋的行动计划，美国参谋长们力主在瓜岛海战获胜后，继续在西南太平洋进攻所罗门群岛、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再在中太平洋进攻吉尔伯特、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英国人竭力反对这种铺开的作战，指出这可能会把战略重点从德国转向日本。他们力主在击败德国之前，太平洋方面应保持静态的防御战。但罗斯福全力支持继续保持太平洋和远东的攻势，英国被迫作出让步。

会议最后决定，1943年优先考虑的作战计划是：首要目标是攻占西西里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确保大西洋的交通安全；加强对德战略轰炸，继续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力量，把在法国登陆的行动推迟到1944年；执行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计划，以击退日军来犯和支持中国。会议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总司令，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为副总司令。在1月24日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首次提出盟国将迫使轴心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和邱吉尔还力促戴高乐和吉罗合作来共同领导法属北非的事务。在对待法国的政策上，美国和英国从1940年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邱吉尔认为，戴高乐是法国抗战不可缺少的象征，英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一贯支持夏尔·戴高

乐将军及其在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美国则同德国控制的维希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把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看作“大英帝国马厩里喂养和训练的赛马”。罗斯福不愿自由法国染指北非战役，建议在北非登陆成功之前绝不向戴高乐透露任何消息。美英在北非登陆后，艾森豪威尔同维希政府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达成协议，引起英国和戴高乐的强烈抗议。1942 年 12 月 24 日，达尔朗被暗杀后，美国又转而支持从纳粹监狱逃出并同维希政权关系不密的亨利·吉罗将军。这样，就使伦敦支持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集团与美国支持的承继达尔朗的吉罗将军之间，展开一场争夺法国领导权的斗争。戴高乐不断要求承认他为法国的惟一合法代表，英国外交部企图组织一个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罗斯福告诉邱吉尔，他决心避作任何这样的许诺，“因为法国人民还没有机会把政治权威授给他。”

后来，罗斯福考虑到希特勒已占领整个法国，维希政权不复存在，吉罗将军是“一名头脑相当简单的士兵”，缺乏行政管理能力，而戴高乐在法国和北非的威望不断提高，即将在法国采取的军事行动需要法国人民的支持。迫于这种形势，罗斯福才和邱吉尔达成妥协，请戴高乐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由吉罗和戴高乐共同领导法属北非的事务。尽管戴高乐最后作出让步，同意在摄影记者面前同吉罗握手，但并没有缓和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厌恶之情。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没有通知邱吉尔，就和吉罗秘密签署两个文件——安法协议，保证美国和英国援助吉罗保留全法国在军事、经济、财政和精神上的利益；给予他“一切便利”，团结全法国反对德国的人于一个当局之下。当邱吉尔在 2 月获悉这些协议时，他坚持要修改安法协议，把戴高乐也包括进去。

罗斯福厌恶戴高乐的原因是：他反对戴高乐复活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计划，主张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非达喀尔和印度支那

从法国殖民地的地位改为美国军事控制下的联合国家托管地；他反对戴高乐采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为法国独裁的政治领袖，主张建立一个顺从美国意志的法国政府；他厌恶戴高乐力争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张由美、苏、英等大国主宰世界，法国在战后只能起次要作用。此外，英国想在战后领导一个欧洲国家集团，戴高乐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得到英国的坚决支持，罗斯福怀疑他是英国的工具。由此可见，战时的美法矛盾是战后戴高乐推行反霸抗美，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历史根源。

〔*美英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投降*〕 1943 年 7 月 10 日，美英军队乘北非战役胜利，德军忙于同苏军进行库尔斯克会战无暇顾及地中海战区之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西西里岛东南部 180 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实施空降和海上登陆。参加这次战役的首批部队，具有运载 16 万人的3,000 艘舰艇、14,000 辆各种车辆、600 辆坦克和1,800 门大炮。这支先头部队的后面，每日每夜紧随着成千上万的后续部队。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美英联军在第一天就夺取了许多登陆场和重要目标。7 月 12 日，美、英联军主力全部登陆，占领该岛南部。此后，美英军队向北推进，击溃意大利军队，并将德军赶往意大利本土。8 月 17 日，占领全岛，为进攻亚平宁半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意大利在北非、地中海、西西里岛的接连遭到惨败，加深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国内反法西斯运动日益高涨。1943 年 7 月 25 日，意大利发生震惊世界的政变。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突然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并以“保护安全”为名，将这个法西斯头目软禁起来。由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新政府，立即派出特使与美、英进行秘密谈判，表示意大利政府要反戈一击，与盟国一道作战。

墨索里尼垮台后，美、英两国在如何确定意大利投降条件和

政体形式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罗斯福赞成一项仅仅限于军事问题的停战条款，邱吉尔却竭力要求罗斯福采纳他的内容繁多的停战计划：停战协定除包括军事条款外，还将包括政治和经济条款。另一方面，邱吉尔希望维持意大利的君主立宪政体，承认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意大利现政府的权威，罗斯福则表示反对。在 1943 年 8 月举行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邱吉尔竭力申辩，如果不给予某种程度的承认，巴多格里奥政府就会垮台，意大利部队就不会抵抗德国，或者意大利就会赤化，从而使罗斯福改变看法。9 月 3 日，巴多格利奥政府同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同日，英军从西西里岛强渡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半岛南端登陆。9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广播停战宣言全文，意大利正式投降。9 月 9 日，由马克·克拉克将军统帅的美国第 5 集团军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岛登陆。10 月 13 日，巴多格利奥政府对德国宣战，美、英、苏 3 国政府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交战的一方。

墨索里尼垮台和意大利对德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的解体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大胜利。它导致意大利舰队缴械，使盟国得以完全控制地中海。它给盟军提供了前哨空军基地，用以轰炸巴尔干和中欧；它使英、美军队处于极有利的进攻地位，为今后在法国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 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苏德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取得重大胜利。战争主动权已完全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转入反法西斯同盟国手里。形势的转折给同盟国提出一系列新问题，美、英、苏 3 大国从各自立场和利益出发，迫切希望举行大国首脑会议，协调作战行动，并就战后安排问题交换意

见。特别是罗斯福，他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急于想同斯大林本人磋商战后一切问题。

1943年8月19日，罗斯福和邱吉尔从魁北克联名打电报给斯大林，建议举行3国首脑会谈，以便在这“战争的关键时刻共同探讨整个局势。”8月24日，斯大林表示，可先举行3国外长会议，罗斯福立即表示同意。

〔莫斯科外长会议〕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美、英、苏3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目的是加强主要同盟国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并为召开3国首脑会议作准备。对罗斯福来说，莫斯科外长会议还提供一个削弱共和党的大好机会。他需要抢在其他准备于1944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之前，宣布战后维护和平的主张。因此，美国国务卿赫尔主张把维护和平的四国宣言，列为议事日程上优先考虑的事项。但是，苏联人希望外长会议首先注意“缩短战争的办法”或着重讨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他们反对四国宣言。罗斯福和赫尔决心要维护“四大国概念”，坚持要把中国包括到四大国之列；他俩一致认为，“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在赫尔的压力下，苏联同意美国提出的《中、美、苏、英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3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字。宣言宣称：4国在战时的联合行动“将为建立和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尽速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会议公报宣布，3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的合作问题。更使罗斯福感到高兴的是，10月30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明确地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认为，苏联卷入对日作战，将减轻美国依赖中国基地的程度，又可

减少苏联乘盟国在远东作战之机在欧洲扩张的可能性。莫斯科外长会议为3巨头德黑兰会议奠定了基础。

〔德黑兰会议〕　莫斯科外长会议后，罗斯福仍旧希望亲自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坚持要在德黑兰会谈，罗斯福则由于航程10倍于斯大林，竭力主张在开罗举行。斯大林宣称他准备把会谈推迟到来年春天，暗示他此时不可能离开苏联。罗斯福比斯大林更加迫切地感到有及早会谈的必要，因此让步了。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1次3国首脑会议，史称德黑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经过一番争论之后，11月30日，美英方面正式通知苏联，霸王战役将于1944年5月发动，并在法国南部发起一个支援战役。斯大林保证，苏军将在大约同一时期发动攻势，以阻止德军向西线调兵。罗斯福还告知斯大林，将在最短时期内任命霸王战役总司令。至此，盟国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争论才告解决。这是德黑兰会议取得的主要成就。

其次，3巨头讨论了分割德国的问题。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和消除斯大林的忧虑，罗斯福提议把德国分成5个小国，即：尽可能加以削弱和缩小的普鲁士；汉诺威和德国西北地区；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黑森和莱茵河南部地区；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地区。此外，基尔运河和汉堡地区、鲁尔和萨尔地区应置于国际托管或联合国控制之下。邱吉尔对此表示反对，并重提过去的老观点，建议把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从德国分裂出来，再把德国南部诸省与中欧多瑙河沿岸国家合并成一个多瑙河联邦。斯大林早就意识到，这种联邦计划的目的，是限制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因此，他立刻反对邱吉尔的建议，说它是虚伪的和危险的，说德国很可能获得控制这种联邦的权力，从而再次成为欧洲

大陆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威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早已表明，他宁愿要一个由许多小国组成的德国，主张匈牙利和奥地利必须各自独立存在。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德国从前分成107个省的时候没有对文明构成那么大的危险。”邱吉尔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就转换了讨论题目。最后，3国首脑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由欧洲咨询委员会研究。

罗斯福还提出了建立一个以联合国家为基础的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问题。这个世界性组织包括：一个由35至40个会员国组成的机构，将定期在各地召开会议，以制订各项建议；一个包括美、英、苏、中在内的10国执行委员会，将处理一切非军事性问题；第三是由美、苏、英、中4大国组成的“四个警察”机构，“将有权直接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突然出现的紧急状况。斯大林和邱吉尔一样，倾向于建立区域性委员会。不过，在会谈最后一天，罗斯福说服斯大林接受了他的关于建立“世界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组织的想法。

会议还商讨了波兰疆界问题。苏联原则上同意邱吉尔提出的声明，波兰国家应在寇松线和奥德河线之间。罗斯福在1944年总统竞选中需要几百万美籍波兰人的选票，因而不愿参加有关波兰边界的“任何决定”。

会议最后通过了《德黑兰宣言》。3国首脑表示决心：“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和平时期都将共同合作。”斯大林答应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离开德黑兰时乐观地相信，他在国内外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已经获得重大进展。他公开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得很好”，但他后来私下又对内阁成员说，使“俄国人和我们亲如手足”是个“难办的”事情。他怀疑苏联是否有对日作战的决心，也不相信斯大林会接受他的

建立战后联盟的计划。[①]

五、美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经过

〔美、英、苏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　前已提到，在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各自追求的战略目的不同，美英同苏联之间，美英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而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又集中在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与地点问题上。

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首先是苏联提出来的。早在1941年7月和9月，斯大林就几次致函邱吉尔，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军将30至40个师调离东线，以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但英方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苏联和英国，而且也关系到美国。1942年4月1日，罗斯福为避免苏联单独与德国媾和，保持苏联继续作战，鼓舞美英士气，阻挠英苏就边界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批准了陆军参谋部制订的"西欧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建议，在英国集结48个师的兵力和5,800架飞机，于1943年4月1日前后，从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向法国北部海岸实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向德国施加压力。该计划将意味着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马歇尔将军认为，西欧是美英发动攻势的最好战场，法国是通往德国心脏的捷径，美英对西欧的进攻，将对苏联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而苏联的继续参战，对打败德国至关重要。

1942年4月8日至14日，马歇尔将军和霍普金斯带着这个

---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下册，第626页。

计划到达伦敦，同邱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磋商。英国方面原则上同意美国的计划，然而，邱吉尔却明确提出重大的保留意见。他认为，1942 年美、英最好的作战方案，是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即实施体育家（后改为火炬）作战计划。

1942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初，莫洛托夫访问英美。他强调苏德战场形势危急，要求盟国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他还说，如果 1942 年不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可能给苏联一个毁灭性打击。“如果你们迟迟不决，你们最终将不得不在战争面前首当其冲。”于是，罗斯福总统授权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我们期望今年开辟第二战场。”6 月 12 日，美苏和英苏分别公布“关于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圆满的协议。”但是，邱吉尔又向莫洛托夫递交备忘录，指出英国正在为登陆进行准备，到时候能否实施，我们无法许下任何诺言。6 月 18 日，邱吉尔匆匆赶到华盛顿，公开提出在北非登陆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坚决反对英国政府上述意见。他声明，“我的目的是再次要求英国人集中力量打击德国，如这被证明不行，就马上转向太平洋。”

马歇尔想用太平洋第一的战略来阻止英国人和总统放弃体育家计划。然而罗斯福却通知马歇尔不能接受他们向太平洋转移的建议，并派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去伦敦同英国商讨 1942 年的作战行动。7 月 24 日，美英双方商定，1942 年秋天在北非登陆。1942 年 11 月 8 日，火炬计划付诸实施。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再次被搁置起来。斯大林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1943 年 5 月 12 日至 25 日，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及其三军参谋长们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关于战略问题的重要会议，决定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新代号为霸王计划）推迟到 1944 年春天执行。

三叉戟会议的决定，激起了苏联愤怒的反应。斯大林在

1943年6月11日给罗斯福的电函中抱怨说：美英曾于年初保证于1943年8月或9月强渡海峡，现在又把进攻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开辟第二战场的一再推迟，给正在孤军鏖战的苏军造成罕见的困境，将在苏联人民和军队中引起一种“灰心丧气的消极印象”。他气愤地说，苏联政府不能同意这项决定，因为“这项决定是在既没有苏联政府参预又未经任何联合讨论下作出的头等大事，而且这项决定可能严重影响今后战争进程。”[①] 6月24日，斯大林在给邱吉尔的信中，措词更为强烈。他列举种种事实证明邱吉尔没有履行诺言。宣称“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来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②]

1943年8月11日至24日，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加拿大举行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调整战略。会上争论的焦点，还是第二战场问题。美方认为，两国应信守三叉戟会议决定，以霸王战役（即登陆西欧）为主，在人力物力资源的分配上，霸王战役应有优先权。英国人不敢公开反对1944年实行霸王行动计划，但他们却强调有必要通过在此之前的地中海作战以减少德军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实力。邱吉尔声称，如果法国北部的德军超过12个师，或者盟国在进攻时没有取得对德军的空中优势，他将推迟横渡海峡的突击。邱吉尔实质上是不赞成霸王战役，他一心向往的是实现巴尔干计划，即打垮意大利，拉拢土耳其参战，然后进军巴尔干，阻止苏军解放东南欧，保住英国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和东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的传统利益，保障英帝国和东方联系的生命线。美国在欧洲的主要战争目标首先是挫败德国统治欧洲的企图；其次是，在打败德国之后，与苏联争夺欧洲的霸权。德国是

---

①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讯集》，第2卷，第69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37页。

欧洲的心脏，法国是通往德国的捷径。为迅速取胜，美国军政首脑决定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登陆。巴尔干计划主要对英国有利，美国当然不愿为其火中取栗。争论结果，会议还是确定，霸王作战计划将是盟国在欧洲的首要任务，大体上将于1944年5月1日开始实施。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的美、英、苏3国政府首脑德黑兰会议，终于正式否定了邱吉尔的巴尔干计划，最后决定美、英军队将于1944年5月发动霸王战役。至此，这一牵涉战时盟国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才告解决。

〔美、英在诺曼底登陆〕　1944年夏，整个战局对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极为有利。日本陆军深陷中国大陆，海、空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败；意大利政府已经投降，盟军已控制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上通道；德军在东线开始全线崩溃，苏军的反攻矛头已指向柏林；西欧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高涨，德军在各占领国已立脚不稳。美、英空军从1943年起，就对德国及其占领国实行战略轰炸。1943年投弹207,600吨，1944年投弹915,000吨。总计盟军投在德国的炸弹炸死335,000人，炸伤78万人，摧毁或损坏房屋550万幢，破坏了2,000万人的基本公用事业设施。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德国的工业生产、军队部署和士气。到1944年初，大约有77%的德国人对战争失去信心。在盟国登陆前夕，法国基地上的德国飞机只剩下500架，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残存的德国舰艇也寥寥无几，盟军完全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所有这些，都为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罗斯福认识到，如再不采取主动就会失之过晚，苏军不仅能出现在柏林和布达佩斯，而且能出现在巴黎和米兰。为了尽快打败德国，并与苏联争夺欧洲，美、英当局决定立即履行在德黑兰会议上承诺的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即在法国诺曼底地区

实施大规模的登陆战役。

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总的企图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成功后，随即发动攻势占领法国西北部，并与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配合，向德国腹地进攻，协同苏军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

1944 年 6 月 6 日，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参加盟军共 36 个师，总兵力约 288 万人。其中陆军 153 万人；空军飞机13,700 余架，其中轰炸机5,800 架，战斗机4,900 架，运输机（包括滑翔机）3,000 架；海军各型舰艇9,000 余艘，其中登陆艇4,000 艘。德军在西线的地面部队共 58 个师，空军飞机 500 余架，海军舰艇 200 余艘。其中防守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只有 6 个师又 3 个独立团，地面部队不超过 9 万人。战役持续 43 天。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对于美、英在西欧成功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44 年 7 月 25 日开始，美、英军又先后向德军发起进攻，夺取诺曼底的战斗，很快转成夺取法国的战斗。经过整整一个月，除布列塔尼半岛的几个港口外，盟军闪电般地占领了整个法国西北部，残余德军则撤回到齐格菲防线。8 月 15 日、美、法军又在法国南部登陆，开始执行"龙骑兵行动计划"，并与其他部队一起，向德国边界急速推进。8 月 25 日，美国与法国爱国者密切配合，未经大规模战斗，攻占了法国首都巴黎。从 6 月 6 日盟军开始登陆到 8 月 25 日，德军有 3 个元帅和 1 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离职，有 1 个集团军司令、3 个军长和 15 个师长被击毙或被俘。德军损失人员 40 多万、坦克1,300 辆、军车 2 万辆、迫击炮 500 门、火炮1,500 门、飞机3,000 余架。从 9 月 15 日起，盟军在西欧的整个战线已由法国西北部扩大到南起地中海北至莱茵河口的广大地区。至此，盟军不仅攻占了法国，还夺取了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占领卢森堡，并从亚琛越过德国边界。1944

年12月，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突破美、英军防线纵深达90公里（正面达100公里）。不久，在苏军的配合下，盟军组织了反击。到次年1月，终于将法西斯德军全部赶回到反扑前原来的防线。

六、1941年至1944年美国的对华政策

〔*罗斯福政府的积极援华抗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的基本战略仍然是“先欧后亚”，先大西洋后太平洋，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德国；同时在德国失败之前，指望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拖住和削弱日本，以便日后美国能用尽量小的代价来击败它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为此，罗斯福政府制订了在先欧后亚原则下维持中国继续抗战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的实际含义是，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的援助，美国将不派地面部队来华参战，但为了使中国不致于沦亡，避免蒋介石政府退出战争，美国给予蒋介石政权以一定程度的实际援助，使中国继续抗日，以牵制20个师团以上的日军。

在1942和1943年，罗斯福政府为维持中国继续抗战，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只限于作出有限反应的消极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援华抗日政策。

第一，提议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答应中美结成军事同盟。1941年12月，罗斯福答应蒋介石关于中美结成全面军事同盟的要求。同月，美、英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提议组织盟军中国战区。他说服英国人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盟军最高统帅，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在蒋介石与驻印度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之间建立联系。根

据马歇尔推荐，罗斯福派遣美国陆军最好的高级指挥官之一——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任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指挥在华美军和可能拨给的中国军队。史迪威受命来华，开始了中美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第二，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1942年1至4月，罗斯福总统多次高度赞扬英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的时间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顽强和勇气，"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又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持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①] 罗斯福的讲话，博得美国人民最热烈、发自内心的掌声。1942年，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有80%到86%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合作。[②]

第三，扩大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太平洋战争发生前，1941年3月11日美国通过租借法，罗斯福就指示代表美国总统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劳克林·柯里重新制订美国新的援华方案。同年5月6日，罗斯福政府正式宣布把中国纳入租借法援助范围。到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又批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6月2日，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主体租借协定》（又称《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据此，美国在抗战时期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8.457亿美元的租借物

①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第344、345、361页。

②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中），下册，第474页。

资。美国驻华空军第 14 航空队直接配合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

第四，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废除种族主义的排华法。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新约，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与 1901 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之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驻兵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1943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国会应总统的要求，通过一项法案，废除 1882 至 1913 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它规定中国移民在限额范围内可以进入美国，在美华侨可以入籍。尽管这一行动在当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它可以帮助美国"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又是对中国人民一着有意义的友好表示。

第五，开辟援华空运航线。1942 年 3 月 8 日，日军攻占仰光，切断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通道滇缅公路。为使中国继续抗战，美国开辟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到昆明的中印空运航线，把援华物资经印度源源不断地空运中国。到 1944 年底，驼峰空运运输量比滇缅公路运输的最高峰还多得多。

第六，打通连接中印的缅北公路。1943 年底，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以中国驻印军为主力的中美联军从印度向缅甸推进，在英军和从云南出击的中国军队的配合下，于 1944 年 8 月一举攻占缅北军事重镇密支那，收复缅北大部分地区，使连接中印的缅北公路得以完工通车，重新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

第七，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1943 年 10 月，在美、英、苏 3 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赫尔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坚持把中国作为《中美英苏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签字国，提高中国作为 4 大国之一的地位。1943 年 11 月 22 至 26 日，中、美、英 3 国首脑举行第一次开罗会议，罗斯福特地安排好让蒋介石在他和邱吉尔到达时抵开罗，并把中国问题列入议程

的首位。在开罗，罗斯福建议公开宣布："应当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攫夺和侵占的太平洋一切岛屿，应当把日本从中国窃据的一切领土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他答应争取斯大林赞同这个开罗宣言，并要蒋介石同意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①]，以换取斯大林同意对日作战和同国民党政府合作。最后，罗斯福宣称他支持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战后的国际组织。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对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巩固中、美抗日联盟，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促进中国内部团结和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罗斯福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收复失地的权利，并非仅仅出于对中国感情上的关怀与同情。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战时和战后利益。在短期内，这样做会鼓舞中国人的士气，避免国民党政权崩溃，保证中国不退出战争，以便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去对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对手日本。其长远目标是，罗斯福总统希望以此换取蒋介石效忠，在战后远东问题上和联合国组织中，美国同苏联、英国发生政治性争执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美国完全一致地行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战争期间几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国民党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这一边"。[②] 1943年2月，宋美龄曾私下向罗斯福保证，国民党政府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美国的政策。同时，利用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开创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为美国商

---

① 这自然是损害中国主权的。

②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92页。

人开辟供几代人贸易的庞大中国市场。

罗斯福还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帮助他实现战后的国际托管计划。邱吉尔抱怨说，罗斯福的把戏是：一方面要使中国仍然基本上属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中国作为一个“站在美国方面增添其声势的帮手，以便清除大不列颠海外帝国。”[①]

〔史迪威来华使命与美蒋矛盾〕　1942年3月，史迪威将军受命来华，就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中国战区参谋长，援华租借物资统制人和滇缅路监督人等多项要职[②]。史迪威来华前，1942年12月29日，美国陆军部宣布他的使命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协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这表明：“使中国继续作战”，从军事上迅速击败日本，是美国军方最优先考虑的事项。1942年2月9日，罗斯福给史迪威的指示是：“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③] 这番话不仅表达了罗斯福政府“维持中国作战”的军事目标，而且包含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目标。

史迪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重视其使命的军事意义。他在华任期内，为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日不遗余力。他制订了盟国合作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在印度和昆明重新训练和装备国民党部队，先后指挥过两次缅甸战役，收复北缅，建成雷多战略公路。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囤积物资、

---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第93页。

② 约瑟夫·W·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一生中5次前来中国。1911年首次来华。1921年又来中国，专门学习汉语3年。1926年后任美军驻天津部队参谋长、司令官，1932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1941年任美军第13兵团司令，1942—1944年是他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长期的在华经历，使史迪威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较好的了解。

③ 白修德编：《史迪威文件》，纽约，1948，第36页。

准备内战的错误政策；他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行政效率极低，并对伪军政部公开盗卖军用物资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他控制援华租借物资，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逼其抗日；甚至要求美国政府改变片面的援蒋政策，用租借法案武器武装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在史迪威将军的推动下，1944 年 7 月，由包瑞德担任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开始为期不长的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根据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细致考察，向美国政府提出大量比较客观的正确估计中国局势报告，揭露了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的许多事实，同时赞扬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①] 是一股在形成中的更强大更可靠的抗日战斗力量。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将援助国民党改为援助共产党。”[②] 可惜这些真知灼见没有为美国政府所采纳，美国政府一直把宝押在国民党身上，以致造成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历史性错误，影响深远。

为了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史迪威将军还要求改革国民党军队，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指责蒋介石“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史迪威在其任期内，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专制独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对中国友好的、耿直的将军的光辉形象。”[③] 中国人

---

①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4。中国》，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第 551 页，第 618 页。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4。中国》，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第 551 页，第 618 页。

③ 王炳南：“我所认识的史迪威将军”，《中国建设》，1983 年第 4 期。

民一直记念着史迪威将军，把他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美友好的象征。但是，史迪威的所作所为，都被蒋介石视为危及他的独裁统治。因此，史迪威来华后，与蒋介石在关于改造国民党军队、对华租借法案物资的统制权、缅甸作战的战略与计划、装备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导致美国政府被迫召回史迪威。此即所谓“史迪威事件。”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与蒋介石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即提出由他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5军和第6军，蒋介石表面同意这一要求，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几次撤消史迪威执行进攻战略的命令，因而导致盟军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史迪威认为缅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指挥中国部队的实权”和蒋介石“愚蠢和怯懦的指挥。”因此他觉得，如要打败日本，首先必须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排除蒋介石对指挥的干预。要求指挥权的努力几乎贯穿于史迪威任期的始终，一直是史迪威与蒋介石冲突的焦点。

1944年4月至12月，日本对国民党战区发动豫、湘、桂战役，河南全线崩溃，长沙、衡阳相继陷落，设在南方的一连串美国空军基地落入敌手。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引起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美国对此十分忧虑，惟恐国民党战场的危机可能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担心在未来的国共较量中，苏联进行干涉，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从而危及美国战时和战后远东政策目标的实现。为稳定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把共产党军队纳入盟国共同抗日的战斗中去，1944年6月和8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先后来华“斡旋”国共双方，调和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同时，1944年夏国民党部队大溃败使罗斯福认识到：史迪威要

求掌握国民党军队指挥权的建议，是有利于盟军对日作战的。因此，他支持得到马歇尔大力支持的史迪威的意见，同意提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从7月到9月，罗斯福先后5次致电蒋介石，敦促他交出军队指挥权，由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电报还威胁说，如果继续拖延，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

罗斯福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两大难题：一是要他交出军权；二是在抗战中要联合共产党人。他深信，顺从罗斯福的要求，就会危害自己的生存。为了抵制罗斯福的方案，蒋介石首先采取软顶策略，一方面表示原则上同意给史迪威指挥权，一方面又强调需要“一个准备时期”，故意拖延时间。软拖不成，他又转而采取硬抗的办法，决定把史迪威去掉，既可以避免同罗斯福直接发生冲突，并可避免失掉美援的可能性。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形势，由被动地位转为采取主动行动，坚决要求罗斯福解除史迪威的一切职务，另派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他给罗斯福写的信指出：“只要我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我认为，毫无疑问，我有权要求召回一位我不信赖的军官。”[①] 赫尔利在这场争吵中决心支持蒋介石。他告诫罗斯福：“如果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②] 在蒋介石软顶硬抗的情况下，罗斯福拒绝采取马歇尔和史汀生曾经劝他采取的强硬路线，而是采纳了赫尔利的建议：牺牲史迪威，支持蒋介石。10月18日，罗斯福发出召回史迪威的命令。两天以后，即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中国，经印度返回美国。史迪威使命就此宣告结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继任驻华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

---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下册，第709页。

②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2，第287—288页。

新参谋长，但不要求负责指挥中国军队。

罗斯福决定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不是着眼于军事。随着太平洋上跳岛作战取得迅速发展，特别是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后，美国的B—29轰炸机能从那里起飞袭击日本，中国空军基地对美军的价值大为下降。同时，苏联多次保证将参加对日作战，又可指望苏军迫使在华的日军投降，罗斯福不必担心在攻克日本本土后，还需美国在中国进行一场地面大战。罗斯福迁就蒋介石，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担心在史迪威的问题上直接对抗会加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失去蒋介石的支持会损害他的战后世界计划。同时在国内，罗斯福正在第4次竞选总统，他承受不起"失去中国"的政治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害怕苏联插手中国局势，更不愿看到出现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于是，经过各方面的估量，最后还是支持和迁就蒋介石，以避免因国民党垮台将会出现的国际国内难题。

史迪威事件的发生，是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联共抗日到扶蒋限共转变的起点，是美国一直奉行的坚决扶蒋方针发展的必然结果。《纽约时报》评论说，史迪威从中国被召回，乃是"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是美国消极地支持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所信任"的政府[①]。史迪威使命的失败，表明抗战时期比较友好的中美关系基本结束。

七、雅尔塔会议和德国的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5年2月，苏联红军已将德国法

① 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1970，第506页。

西斯军队从斯大林格勒赶回到柏林郊区，并从纳粹德国的野蛮统治下解放了波兰和东欧的大部分，为在东线彻底击溃德军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在西线，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被彻底粉碎，美、英部队重新部署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摩泽河以北向鲁尔发动攻势。意大利战区的盟国部队正在准备北进。德国法西斯3面受围，眼看失败已成定局，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但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仍拥有500多万武装人员，占领着朝鲜、中国、印度支那、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大片土地。当时美国军方估计，在德国战败后，仍需苦战18个月，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可能还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同时，随着战争的胜利进展，美、英和苏联之间在欧洲地区的矛盾和互不信任越来越明显。如不及时协商解决，有导致盟国分裂的危险，也妨碍战后联合国的建立。在这重要时刻，协调盟国的战略计划，加强盟国的团结，商讨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及战后世界的安排，成为美、英、苏急待解决的问题。罗斯福建议尽早举行3国首脑会晤，正是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提出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3国政府首脑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偕同他们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8天会议，史称克里米亚会议，或雅尔塔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很重要的国际会议。

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两个主要目的是：协调盟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争取获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要保证；就联合国的原则问题达成协议，把美、英、苏的战时同盟发展为战后的和平合作。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有对付苏联人的一整套战略。他不打算告诉斯大林任何关于原子弹的事；准备同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讨价还价；对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下来的有关联合国的问

题，则准备作些让步；在东欧问题上，他对于使斯大林改变路线不抱任何希望，并准备达成协议，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美国的舆论，而不是从苏联手中夺取这个地区。他坦率地承认，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他还说，俄国人在东欧有力量，要把他们赶走显然是不可能的。

〔德国问题〕　雅尔塔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3国首脑在原则上达成分割德国的协议。会议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拟定的关于美、英、苏3国分区占领和管理德国与“大柏林”的协定：苏联占领德国东部，英国占领德国西北部，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会议还决定在柏林设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便协调处理德国的工作。邱吉尔从英国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出发，极力主张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斯大林认为法国在战争中贡献太少，不应给予法国在战后事务中以平等的发言权。罗斯福原来支持斯大林的意见，后来考虑到苏联力量日益强大，美国公众舆论不会允许美军留驻欧洲超过两年以上；过分削弱德国，不让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都不符合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为填补因德国溃败和美国撤军所形成的力量真空，利用德、法在欧洲大陆上抗衡苏联，罗斯福改变了主意，同意装备8个以上的法国师并建立由法国负责的对德占领区。最后，因罗斯福从中斡旋，斯大林也同意从英、美占领区中划出一个地区让给法军占领，并将邀请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关于德国赔偿问题，苏联提出在10年内由德国以实物支付总额为200亿美元的赔偿计划，按贡献大小和损失多少的原则分配，其中50%应归苏联。邱吉尔警告不要重蹈上次大战后在赔偿问题上的覆辙，反对在专家们研究出合理的德国赔偿能力之前定出任何具体数字。罗斯福声称，除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外，美国不要德国任何赔偿，也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那样再借钱给德

国。经过讨论，美、英同意建立一个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赔偿委员会，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研究关于德国赔款的数额和方法问题。

〔波兰和东欧问题〕　波兰问题是会议激烈争论的主要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波兰边界西移问题和波兰政府组成问题。苏联代表提出，战后波兰国界，东边基本上按寇松线划界，西边应以奥德河和西尼斯河为界，用德国领土来补偿波兰。东部边界问题在会议上没有引起多大争论，罗斯福同意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疆界，但希望位于寇松线以东的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仍归波兰。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美、英则坚持以奥得河—东尼斯河为界，反对苏联把波兰西疆延伸到西尼斯河的提议。结果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仍是悬案，"应待和会解决"。

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美、英和苏联之间展开一场更为激烈的斗争。当时波兰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在战争初期就在伦敦建立的波兰流亡政府，受到美、英的承认和支持；另一个是1944年7月在卢布林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初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受到苏联的支持[①]。罗斯福说，美国社会舆论反对承认卢布林政府，因为它不代表大多数波兰人民。美国希望建立一个由波兰5个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民族统一政府。邱吉尔赞同罗斯福的建议，但斯大林却不予支持。他说，波兰对苏联来讲不仅仅是荣誉问题，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德国人在最近30年内曾两次利用波兰作为进攻俄国的走廊，苏联需要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来保护它自己不受另一次德国的侵犯。

① 1945年1月2—5日，苏联正式承认波兰临时政府。

他坚持要美、英承认设在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波兰临时政府事实上已在波兰全境行使职能，面对这难以逆转的现实，美、英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让步。2月10日，3国外长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① 至于怎样改组，雅尔塔会议没有具体解决。会议授权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卡尔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临时政府成员以及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磋商，以改组现政府。这个改组后的政府应保证尽速通过普选与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自由选举。这份宣言是经过精心安排，故意写得含含混混的。罗斯福的首席军事助理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看完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最后协议时说，这个协议"太灵活了，以致苏联人不受技术上阻挡就能够从雅尔塔一直延伸到华盛顿。"② 会议还通过了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由美、英、苏3国政府共同协助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美国人设想出这个宣言来作为1944年邱吉尔和斯大林谈妥的'势力范围'交易的一种解毒剂。"③

〔联合国问题〕　雅尔塔会议主要围绕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大国否决权的使用问题和关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原来苏联坚持主张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在一切问题上拥有全面的否决权，美、英则反对某一大国成为争端当事国时拥有投票权。后来，美国为打破僵局而提出一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6页。

②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下册，第731页。

③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第559页。

项折衷方案，规定5个常任理事国在一切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但对提交安理会审议的争端，任何争端当事国对于安理会是否要审理这一争端则无投票权。也就是说，一个大国不能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讨论问题，但可以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邱吉尔对此表示同意，苏联也接受了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的美国方案。这是雅尔塔会议最具体的政治成就，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个让步。同时，苏联收回了头年秋天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时要有16票的要求，只希望有2个或3个加盟共和国，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由于邱吉尔为了把英帝国各自治领域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而强烈支持苏联的要求，罗斯福最后只得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实际上是给苏联3票表决权。

〔远东问题〕　罗斯福在讨论远东问题时采取了主动。他首先关心的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最后安排。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罗斯福提出："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必然对我们的太平洋作战提供最大的援助。"俄国击败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从西伯利亚东部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中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航运，可减少美军在远东的重大牺牲。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是，争取苏联卷入对日作战，可限制它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和赢得莫斯科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2月8日，罗斯福和斯大林讨论和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并就此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后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作为交换，罗斯福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将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

岛群岛交还苏联，苏联表示要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对雅尔塔会议的评价〕　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它对协调盟国最后战胜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有重大关系，为战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和国际间的冲突播下了种籽。因此，雅尔塔会议又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和美国历史上最引起争论的一次会议。

战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人指责罗斯福过分天真或不现实，轻信斯大林的诺言，把波兰和东欧出卖给苏联帝国主义，并在远东向共产主义作毫无意义的投降，还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略要地"给了"苏联。罗斯福的雅尔塔政策"被看作是美国外交上的一大错误"。"雅尔塔实际上等于是另一次慕尼黑。"[①] "对许多国家来说，雅尔塔是一个叛卖的象征。"[②] 罗斯福对苏政策的辩护者则说，雅尔塔协议是必要的和现实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除了接受妥协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美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正和日本作战，而俄国则不然；原子弹还是一个未知数。为加速结束对日战争和减少美军伤亡，罗斯福认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至关紧要的。在欧洲，"俄国人已经进入东欧。英国和美国可能想把他们赶走，但是，要想通过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将波兰和罗马尼亚从共产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即使是提出这样的建议，两国人民和士兵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塔不

---

① 塞缪尔·N·贝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霍尔特公司，1955，第899—900页。

② 1985年2月3日合众国际社回顾当年雅尔塔会议的评论。

得不考虑的两个基本事实，而斯大林却因此占了便宜。”[①] 直到今天，围绕雅尔塔协定的争论尚在继续。1984 年 8 月 17 日，里根总统对波兰裔美国人说：“我们坚决反对把雅尔塔协定理解为是表明美国同意将欧洲划分成不同势力范围的任何解释。”法国总统密特朗要求“找出一条摆脱雅尔塔协定的出路。”中国学者也纷纷谴责雅尔塔协定是一项肮脏的分赃协定，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但是，苏联为证明战后的欧洲边界是合理的，总是不断地援引和颂扬雅尔塔协定，把雅尔塔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②] 我们认为，雅尔塔协定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直接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是错误的，是非法的，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德国的投降〕　　由于阿登地区反扑的失败，西线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消耗了希特勒最后的飞机储备及一些最优秀的师团；同时东线苏军云集奥得河畔，准备向柏林冲击，德军不得不把西战场半数以上的装甲师和大批坦克调到苏德战场对付苏联的进攻。在两线夹攻的不利形势和盟军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德国军民丧失了斗志，再也不能阻止盟军向莱茵河挺进。1945 年 3 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突破齐格菲防线，从瑞士边境直到北海都打到莱茵河畔。实际上，美国第 1 集团军第 9 装甲师凭着一次侥幸的机会，早在 3 月 7 日就在波恩南面的雷马根渡过莱茵河，在对岸建立了第 1 个桥头堡。3 月 23 日，美英主力部队开始强渡莱茵河。4 月 1 日，北部蒙哥马利的部队与中部布雷德利的部队会师，从而形成对鲁尔区的包围，被围困的德军达325,000 人。

渡过莱茵河，包围鲁尔区后，美、英在军事战略上产生了严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中册，第 257—258 页。

②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伦敦：1953，第 563 页。

重分歧。邱吉尔认为，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苏维埃俄国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阵线来阻止它的向前推进”；“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深入到东方。”[1] 因此，英国坚决主张集中兵力，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和布拉格，以便在打败德国后与苏联讨价还价，迫使苏联履行关于波兰的协议。但是，艾森豪威尔从军事角度出发，决定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不是柏林，而是突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一带推进。这样可以把德国军队分割成两半，切断柏林和德国南部之间的联系，阻止希特勒退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西部山区和森林地带，然后回师直袭易北河北部，夺取波罗的海和北海各港口。

3月28日，艾森豪威尔把他的策略直接用电报告知斯大林，斯大林欣然同意，但邱吉尔却心急如焚，赶紧于4月1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命令盟军最高司令进攻柏林。4月2日，他又写信给艾森豪威尔，重申占领柏林的重要性：“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与俄国人握手的地方应该越往东越好。”[2]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争辩说，他的计划从军事上说是正确的，而且他还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估计，要强攻德国首都，至少要有10万美军死亡。马歇尔将军也不愿为了纯粹政治上的目的而让美国人送命。

4月16日，苏军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很快便摧毁了德军在奥德河和尼斯河沿岸的防线。18日，苏军强渡奥得河与尼斯河，占领什叶罗夫高地；在鲁尔区被围困的325，000名德军的残余部分向盟军投降。19日，美军占领莱比锡。25日，美苏

---

① 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伦敦：卡斯尔公司，1954年版，第400页。

② 邱吉尔：前引书，第409页。

军队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上会师，德国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27日，苏军攻入柏林市中心，与德军进行激烈巷战。28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被处决。29日，陷于绝望和恐惧的希特勒写下遗嘱，指定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继任政府首脑，并兼武装部队总司令。4月30日，苏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到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同日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军完全停止抵抗，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率残部投降。5月4日，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荷兰、奥意边境和德国南部的德军，都向英美军队投降。5月7日凌晨2点41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代表残存的德国海陆空军到设在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总部向美英盟军无条件投降。5月8日深夜，在柏林近郊的苏军司令部正式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凯塞林元帅等三名德国陆海空将领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同日，杜鲁门总统代表美国，邱吉尔首相代表英国，宣布欧洲战争结束(即欧洲战争胜利日)。

八、1944—1945年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与日本的投降

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也加快了战争速度。从1943年夏秋起，美军即开始向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各岛屿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突破了日军在太平洋正面的外围防线，获得控制太平洋中部的舰队停泊场和空军前进基地。到1944年夏初，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兵力已占压倒优势，海军力量比日本帝国舰队强5倍。于是，美军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日本的内防御圈发起

强大攻势，其中对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以及距日本本土最近的硫黄岛和冲绳岛进攻，是4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作战行动。

〔美军攻占塞班岛〕　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大岛。马绍尔群岛失守后，日军便退守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企图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美军前进。塞班岛是日军这一新防线的重要一环。为夺取西太平洋的海空控制权，切断日本本岛与南太平洋诸岛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下一步向帛琉、菲律宾、台湾和小笠原群岛进攻打开通路，并为对日本本土实施远程轰炸创造条件，中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决定绕过防守坚固的加罗林群岛，直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1945年6月15日凌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强大舰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开始在塞班岛南部海滩登陆。当晚便占领了登陆场，上岸部队达2万人。但在尔后扩大登陆场的战斗中，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直到美国第5舰队在马里亚纳海域大败日本海军之后，日军得不到增援，驻塞班岛的日海军第1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大将和守岛司令斋藤义次中将绝望自杀；3，000残余日军发动决死冲锋，大部分被美军歼灭，美军才于7月7日宣布占领塞班岛。

当美军进击塞班岛时，一支由9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及其他舰只组成的庞大日本舰队由菲律宾驶来，进行截击。6月19至20日，双方在马里亚纳海域及其上空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和空战。日本舰队遭到惨败，3艘航空母舰和两艘油船被击沉，4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1艘油船受重创，损失飞机450架，从而完全失去了制海权和制空权。8月1日，美军占领塞班岛以南的提尼安岛。8月10日，美军占领被称为日本海上长城心脏的关岛，从而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内防御圈，使

日本本土及其西南诸岛，以及日本所占领的台湾和菲律宾均处于盟国正面进攻威胁之下。日本军国主义者惊恐万状，东条内阁被迫辞职。

〔美军攻占莱特岛〕　1944年夏、秋，当海军上将尼米兹统率的美军中太平洋部队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和帛琉群岛，正在肃清中太平洋通向菲律宾的航线时，西南太平洋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部队也对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相继占领新几内亚西北海岸外的瓦克德岛、比阿克岛及其他岛屿，最后于9月占领摩罗泰岛。至此，美军中太平洋部队和西南太平洋部队按预定计划，即可在菲律宾群岛会师。

美军对太平洋军事战略的下一步骤如何发展，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尼米兹海军上将、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认为进攻日本应取道中国台湾，赞成绕过菲律宾而占领台湾。麦克阿瑟则发誓要收复他在1942年失去的菲律宾。他认为在台湾登陆是冒险的，而一旦攻克吕宋岛，则可完全绕开台湾而直接进攻冲绳岛。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罗斯福于1944年7月赴珍珠港会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以解决分歧。他支持麦克阿瑟的方案。

1944年9月中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越过棉兰老岛，首先从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登陆，以便将防守菲律宾群岛的日军分割成两部分，为尔后北攻吕宋岛、南取棉兰老岛创造有利条件。莱特岛登陆作战由麦克阿瑟负责实施，太平洋舰队提供海空支援。

1944年10月20日，美国第6集团军在第7舰队和第3舰队的支援和掩护下，开始在莱特岛东岸登陆。日本海军将领十分清楚，美国征服菲律宾将意味着日本帝国的垮台，因为它将切断日本本土与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日本失去宝贵的石油和其他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日军决定

全力以赴来阻止美国在莱特湾的进攻。10 月 24 日和 25 日之间，双方舰队在苏里高海峡、萨马岛附近和恩加尼奥角海面，接连发生 3 次海战。这 3 次战斗总称为莱特湾海战，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海战，双方参战舰只达 282 艘之多。在这场海战中，日军损失 4 艘航空母舰、3 艘战列舰、9 艘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这次战争结局对日本人来说是灾难性的，日军的航空母舰全部被歼，联合舰队从此失去远洋作战能力。1945 年 1 月 9 日，美军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的仁牙因湾登陆。2 月 25 日，美军攻占马尼拉市。5 月中旬，菲律宾群岛的战斗行动基本结束。在整个菲律宾战役中，日本损失 40 多万人和9,000 架飞机。

〔美军攻占硫黄岛和冲绳岛〕　硫黄岛地处东京和塞班岛之间，北距东京1,200 公里，南离塞班岛1,100 公里，是日本与马里亚纳群岛空中联系的惟一中继基地，又是日军抗击中太平洋美军的前沿防线。岛上有 3 个机场，美军一旦占领硫黄岛，可置整个日本于中程轰炸机的袭击范围之内。由于战略地位重要，美军在攻占莱特岛之后，决定越过台湾，攻占离日本更近的硫黄岛，以便为进攻日本本土扫清障碍。1945 年 2 月 19 日晨，美军开始在该岛登陆。由于岛上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利用坚固而隐蔽的工事进行顽抗，使美军遭受很大损失。经过一个多月浴血奋战，美军死伤21,000 多人，日军被击毙25,000 多人。3 月 26 日，美军才占领全岛。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

美军在进攻硫黄岛的同时，即着手准备进攻冲绳岛。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距日本西南仅 350 英里，是掩护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1945 年 4 月 1 日，美军开始对冲绳岛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采取绝望的自杀战术进行疯狂抵抗，即由满载炸弹的“神风飞机”对美国军舰和运输船进行自杀式攻击。双方

经过近3个月激烈战斗，直到6月21日，美军才宣布占领冲绳岛。在此次战役中，日军伤亡11万余人，被俘9,000余人，损失飞机8,000余架。美军伤亡75,000余人，损失飞机760余架。冲绳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实施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至此，美军全部摧毁了日本本土的外围防线。

〔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 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美国军事力量逐渐集中到太平洋。从1944年6月开始，美国战略空军B—29型超级空中堡垒从中国基地起飞，袭击了九州的钢铁厂。从1944年11月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对日进行大规模轰炸开始，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美国飞机投到日本本土诸岛的炸弹，总共约16万吨，炸死33万日本平民，炸伤近50万人；炸毁251万幢房屋和66个城市稠密建筑区的40%。空袭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1945年7月，日本的石油提炼能力减少83%，航空发动机工厂的生产能力减少75%，电子与通讯设备工厂减少70%，军火工厂则大约减少30%。加上美国重新占领了菲律宾，攻占了冲绳，日本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它的许多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沿海重要港口先后被封锁，石油和粮食不能进口，原料极端缺乏，日本法西斯统治已面临绝境。但日本军国主义者仍不甘心灭亡，一方面期待苏联政府进行调停，幻想在有利条件下谋求妥协，以保住军国主义势力；一方面又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准备在本土实行决战。1945年2月至5月间，日本在国内实行3次动员，拼凑了进行本土决战的陆海军总兵力240万人。

在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一个月以前，美国陆军部草拟的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是：1945年11月在日本本土的极南部——九州——登陆，1946年春天再在本州靠近东京的关东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登陆，大约要到1946年深秋才能迫使日本投降；美军

为此要付出伤亡100万人的代价。[1] 当时，有人认为，如果原子弹成功地制造出来，并付诸运用，就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减少美军伤亡。但是，为彻底击溃日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如何使用原子弹？在参加曼哈顿计划的高级军官和科学家中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为代表，极力主张原子弹一旦制成，立即在日本投掷。理由是美国政府把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投入曼哈顿计划，就是为了用它来更快地结束战争。德国的投降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没有理由改变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计划。另一派以艾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为代表。这些科学家是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移居美国的。1939年他们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首先造出原子弹。现在世界形势大为改观，希特勒不仅未能造出原子弹，而且即将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绝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杀伤性极大的武器。1945年4月，正当他俩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罗斯福总统时，却传来了罗斯福突然逝世的消息。

1945年4月25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白宫第一次听取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汇报。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说，预期在4个月内，原子弹的试制很可能获得成功。随后杜鲁门任命一个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首的包括军政界首脑和最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责成他们研究在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6月1日，史汀生部长代表该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一旦条件具备，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不必事前提出警告；目标应该是能明显表现原子弹强大破坏力的地方和尽可能靠近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军需生产中心。杜鲁门总统完全赞同高级

---

[1] 亨利·史汀生："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载《哈泼斯》月刊，1947年2月号。

军事顾问们的建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应用它"，"我们必须用原子弹来袭击敌人"。至于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则由我作最后决定。"[1]然而，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着眼于道义上的考虑，预见到未来的种种危险，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或者建议投掷在无人居住的地区作为对日本人的示威和警告。1945 年 6 月，德国籍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匈牙利籍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以及其他一百多名高级科学家先后联名上书华盛顿。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让这种毁灭性的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到人类身上，美国就会失去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并将会加速军备竞赛。"但是，杜鲁门的决定，没有因科学家的反对而改变。

1945 年 7 月 16 日，即杜鲁门抵达波茨坦的第 2 天，他获悉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美国拥有这种战争武器，"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2] 7 月 17 日，史汀生又专程飞到波茨坦，向总统汇报爆炸试验的全部详情。在此后几天之内，杜鲁门同美国代表团高级官员研究了对日使用原子弹的细节和策略。为了抬高美、英和苏联进行谈判的实力地位，杜鲁门有意识地对斯大林进行了一次试探。他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态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当时离杜鲁门 5 码远、极其注意斯大林面部表情的邱吉尔对此大失所望。

1945 年 7 月 24 日，杜鲁门以美国陆军部长的名义，指令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波茨将军派遣第 20 航空队第 5、9

---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 1 卷，第 357 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 1 卷，第 352 页。

混合大队，于1945年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4个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与此同时，杜鲁门又对日本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政治攻势。1945年7月26日，在他的建议下，由美、英、中3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从柏林发出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明确提出，必须严惩日本战犯，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必须实施《开罗宣言》的条件：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指定的小岛；允许日本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最后，它义正词严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①] 7月27日至8月1日，盟国在日本各城市上空散发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他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而每次警告之后，紧跟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猛烈袭击。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一片混乱。以外相东乡茂德为代表的文职人员，主张待机决定；受武士道影响极深的日本军方则主张采取强硬态度。7月28日，铃木首相发表声明说："政府不认为（公告）有何重大价值，只能不予理睬。吾等惟有誓将战争进行到底。"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认为这是日本当局公开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决定按原计划对日本使用原子弹。7月29日，斯大林为了加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地位，希望美国与其他盟国正式发表声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杜鲁门这时已秘密决定使用原子弹，为了贬低苏联参战的作用，运用外交辞令，婉言加以拒绝。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1颗用

---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1卷，第325页。

于战争的原子弹，当量2万吨梯恩梯。只是几秒钟的功夫，广岛市中心4.4平方英里的地区化作一片废墟。这时广岛人口为343,000人，当日死者为78,150人，负伤和失踪者为51,408人。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原子弹的声明，并警告日本人："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之雨从天而降，类此之物世所未见。"日本军队仍拒绝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苏军从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同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当日死者为23,753人，伤者为43,020人。美国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的参战，对日本统治集团震动很大。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向美、英、中、苏发出乞降照会：如果天皇地位不变，它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条款。8月11日，杜鲁门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但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必须将统治国家的权力移交给盟军最高统帅，下令全体日军就地停战并交出武器。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同盟国的要求。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电台亲自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帝国总参谋部代表梅津美治郎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以及中、苏、英等国代表面前，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了。但杜鲁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迄今仍是近代世界历史上作出的最有争议的政治和军事决定之一。美国政府官员反复强调，虽然投掷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但却减少了美军和日本更大的伤亡，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促进了日本政府的迅速投降。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认为，杜鲁门费了不少脑筋作出的对

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最后决定，“将永远被认为是无比勇敢和聪明的行动。”[1] 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辩解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种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2] 然而，有些美国军事领导人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纷纷提出异议。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后一再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为迫使日本投降而使用原子弹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在那时，日本无疑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李海海军上将、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空军上将以及邱吉尔和别的一些英国领导人也持同样看法。另外一些科学家和外交家则从政治上着眼来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布莱克特指控说，美国政府抢在苏联参战之前匆忙对日使用原子弹，“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苏外交冷战的最初一次大规模作战。”[3] 国务卿贝尔纳斯明确地声明说，亮出原子弹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更加驯服。苏联官方学者甚至认为：“无论从战略上或战术上看，都没有任何必要使用原子弹。所以说，使用原子弹基本上只带有政治色彩，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显示其原子威力，以便在解决远东问题上削弱苏联的地位；而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更大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结论是：“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只有“苏联的参战，消灭了日本黩武主义者手中的王牌”，“才决定了战争的结局。”[4]

---

① 莱斯利·格罗夫斯：《现在可以说了》，原子能出版社，1978，第223页。

②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册，第537—538页。

③ 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文献史》，纽约，1966，第2页。

④ 〔苏〕C. A. 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4卷，莫斯科，1975，第720—722页。

客观地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美国、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斗争的结果。虽然各个国家在对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积极程度、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不同，但不能把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归功于美国某些人吹嘘的两颗原子弹或者苏联学者强调的苏联红军的参战。

事实是，战争进行到 1945 年 7 月，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已面临绝境。德国在欧战中的失败，使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上陷于彻底孤立；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消耗日本军事力量数百万人；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节节胜利，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的庞大舰队，切断了日本与东南亚的联系；美军对日本本土岛屿的轰炸、炮击和封锁，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国内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有些日本上层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期望通过苏联从中斡旋，同美、英进行和谈，要求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但日本军方顽固派不甘心灭亡，还试图作最后一次较量。这时，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确起了一个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崩溃和日本政府迅速投降的作用，缩短了对日作战的时间，减少了日本、美国和中国人的牺牲。

第十一章

美国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从 1929 至 1945 年，美国经历了 1929 至 1933 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局部质变，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大踏步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美国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随着发生深刻变化，是必然的。在这一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将论述其中的一些主要变化。关于社会结构，我们将讨论人口的增减、构成与分布，家庭结构，产业结构和美国公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关于上层建筑，我们将讨论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的演变。对于政治制度的变化，我们将重点论述总统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大和联邦制的演变。教育方面，我们将主要讨论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的变化。宗教方面，我们将主要讨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各宗教派别的影响，特别是新正教的流行、社会福音运动的复兴和保守派和右派的反击。学术思想方面，我们将主要讨论哲学和社会科学几种主要学科的发展情况。文学艺术方面则着重阐述俄国十月革命、大萧条和反法西斯运动引发的美国文学艺术的新阶段。

一、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 1929 至 1945 年，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大战时期。下面我们对人口、家庭、产业、阶级等结构的变化进行简要的阐述。

〔**人口的增减、构成与分布**〕 19 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到大萧条年代更为加剧。1910 年出生率为 30.1‰，1930 年降为 21.3‰。30 年代后半期浮动于 18.5‰至 19‰之间。1930 至 1940 年间，美国人口由 12,318 万上升至 13,212万[①]，增长率只 7.3%，不到 20 年代人口增长率的一半，约为 1900 至 1910 年增长率的 1/3。即使是这样的增长，主要还不是由于正常的移民与出生率的升高，而是由于医药卫生状况的改善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的显著下降。1930 年，美国人口的死亡率为 11.5‰，1940 年降为 10.8‰。美国男女的估计寿命，从 1930 年的 59.7 岁，上升到 1940 年的 62.9 岁。这样，美国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增加，从 1930 年的 5.4%，上升到 1940 年的 6.9%。而 14 岁以下的儿童数，1940 年却少于 1929 年 334 万。

从 30 年代起，美国人口中白人和本国出生的人的比例较以往为大。1920 年，美国黑人、印第安人、东方人等非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2%，1929 年降为 10.2%，1940 年保持这一比例。白人中，外国出生的在 1930 年占总数的 12.7%，到 1940 年减为 9.7%。

20 年代美国农村人口加速流向城市的趋势，大萧条初期虽曾暂时逆转，但随着 1935 至 1937 年繁荣的出现，大量农村人口

---

① 此数字不包括军人在内。包括军人在内为13,260 万。

又涌向城市。到1940年，美国农业地区人口仅占43.5%，而实际住在农场上的只有23%。美国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使美国各地区的人口有所变化。1930至1940年间，美国东北部人口只增加4.5%，中北部只增加4%，而南部则增加10.1%，西部增加16.7%。佛蒙特、南达科他、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等州的人口都减少了。出现最大规模失业者迁移的地区，是南方的农业区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及边疆州的荒野地区。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的失业煤矿工人和小自耕农向北迁移到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密歇根等州的大工业中心。很多南部黑人和白人漂泊到上述地区以及东部城市。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阿肯色等州干旱地区的农民家庭向西迁移，很多人前往加利福尼亚，致使该州人口超过纽约州而居全国首位。

在这种人口流动的总趋势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黑人从南部向北部和中西部的流动。直到1920年，所有黑人的85%居住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南，但到1940年，几乎24%的黑人居住在南方以外地区，而这不过是1940年以后黑人巨大迁移运动的开端。

1939年欧战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美国参战，美国人口出生率由下降转为上升，从而开始了持续15年多的上升趋势。出生率上升是从1940至1941年选征兵役制的实施开始的。从1940年到1946年，美国人口出生率由19.4‰上升到23.3‰。

出生率增长的结果，虽然死亡率从1940年的10.8‰上升为1945年的11.0‰，美国人口总数却从1940年的13,260万增加到1945年的14,050万，1946年的14,190万。其增长率远较30年代的为高。

1940年以后，美国人民种族构成中非白人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扭转了，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改善了非白人处境。1945和1946年，非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4%和10.5%，较1940年高0.2%和0.3%。至于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的百分比，则在1940年以后继续不断下降。

1940年以后，繁荣激起自西进运动高潮以来美国空前的人口流动。虽然东北部、大平原诸州和南方部分地区人口比全国总人口增长得更慢，但其他地区人口则有显著增加。从1940至1950年，太平洋沿岸各州人口增长率最高，约增加48%。在这10年中，农村人口继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56.5%上升到59.6%，增加1,500多万。同期，黑人大规模地从南部向北部、西部城市和从南部农村向南部城市移动。其结果，南部黑人只增加3%，东北部则增加50%，北部中央各州增加57%，西部各州更增加275%。

〔家庭结构的变化〕　大萧条期间，"由于传统的丈夫赚钱养活妻子的情况下夫妻两人扮演的相对角色不再能扮演下去，那些靠丈夫的职业与收入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家庭，精神上所受的冲击更加剧烈。失业的丈夫感到羞愧，具有一种'败下阵来'的苦恼。妻子不能理解，一再询问，'为什么你不出去找个工作？'丈夫们要求社会工作者向他们的妻子解释：简直找不到任何工作。有些丈夫离开了家，从此无音讯；另一些丈夫借酒浇愁；极少数人自杀了。有一个丈夫因愤怒与屈辱失去理智，在听到他的妻子接受了邻居的食物后，几乎将她打死。"[①]

许多丈夫虽然失业，但还是放不下架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家，妻子只好出面乞求帮助，或申请救济。更多的妻子走出家庭，谋求职业。特别是那些适合于妇女或男子不愿干的工作。

---

① 萨拉·M·埃文斯：《生而自由：美国妇女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89，第198—199页。

"尽管人们对职业妇女——特别是已婚的——具有偏见，但在大萧条期间，她们在总劳动力中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都有所增加。1930年，妇女占总劳力的24.3%；1940年上升为25.1%。同样，面临萧条年代歧视的已婚职业妇女，1930年只有28.8%，1940年却增加为35%。"[1] 还有不少妇女虽未走出家庭，却在家里从事生产。她们缝补和改制衣服及床上用品，种植蔬菜、水果，制造罐头和肥皂等。在这样的家庭中，由于妻子取代了丈夫的养家人的角色，往往也就成为家长。

同样，虽然罗斯福"新政"禁止童工，但为了生存，许多家庭子女、特别是儿子，也设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儿子有工作而父亲没有，那么儿子就开始成为权威人士，至少在家庭发生纠纷时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总之，儿子成了自己的主人，而父权的概念以及传统的对父母权威的尊重和害怕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2]

由此可见，在大萧条期间，许多传统的父权制核心家庭的结构改变了，夫权父权丧失，往往是妻子成为稳定家庭的核心人物。

除家庭内部结构变化外，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突出地位也在逐渐动摇。"尽管家庭和家仍然是美国人生活的精神、心理和物质基础，但它的突出地位日益受到威胁。朝着与家庭结构无关的专门职业的转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家庭作用的减小和学校作用的加强，日益加剧的地理与代际的流动，以及利用闲暇时间不同方式的影响等联合起来，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和家的控制

---

① 罗伯特·麦克尔文：《大萧条：1929至1941年的美国》，纽约：时代图书公司，1984，第182页。

②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译本），上卷，第233页。

力。……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扭曲了每个家庭得以稳定的内部韵律，引起了使老一代不得安宁的冲突。”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劳动力缺乏，职业妇女人数迅速增加，由战争开始前的不足1,000万，增到1945年的1,650万，占民间劳动力的36%左右，而且进入了各种男人的传统职业，如重工业、国防工业和机关与企业中白领阶层。在这增加的650万职业妇女中，75%是已婚的。此外，还有大批妇女参加武装部队。劳力缺乏还吸引大量青少年参加工作。1940至1944年，有125万中学生中途退学。1944年，14至15岁少女参加工作的，为1940年的4倍。有的青少年虽未参加工作，但因父母不在家，也得不到必要的教导。总之，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由于妇女独立、男人不在家和青年人的挑战改变了家庭生活。青年和家长之间由于不景气状态而出现的紧张关系在战争年代进一步加剧了。新出现的职业使得家庭关系进一步松弛了；家庭迁到新的地区，也许是进入全新的文化教养地区，加速了这一过程。在德国、意大利或日本血统的家庭中，青年人更加重视他同时代的社会价值使家庭结构变得更加紧张。在战争的头几年，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等大城市的青年犯罪行为增加了，少年犯罪在战争第二年以后有明显上升。这就是说，美国家庭结构在大萧条期间的变化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加深了。

〔产业结构的变化〕　美国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包括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又称广义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商业，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交通、运输及公用事业，服务行业及政府和政府企业。从1929年到1940和

---

① 约翰·克拉克等：《20世纪美国的三代人：家庭、社区与国家》，美国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77，第157页。

1945年，这三大产业的产值变化不小。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从1929年的83亿美元、277亿美元和518亿美元，降为1940年的62亿美元、268亿美元和487亿美元；到1945年，又分别上涨为149亿美元、590亿美元和1，073亿美元。但是，各产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除第一产业有明显降低外，第二、三产业产值变化不大，见下表。

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

产业别	1929	1940	1945
总　额	100.0	100.0	100.0
第一产业	9.5	7.6	8.2
第二产业	31.5	32.8	32.6
第三产业	59.0	59.7	59.2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虽然变化不大，但是，第二、三产业中各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却有明显变化。比如，第二产业中，只有制造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是上升的。1929年为24.9，1940年为27.3，1945年为28.7。矿业和建筑业则一般呈下降趋势：矿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1929年为2.2，1940年为2.3，1945年下降为1.4；建筑业1929年为4.3，1940年为3.2，1945年为2.4。同时，制造业中的几种工业标兵，也有不同变化。20年代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重要单个因素的汽车业，1929年生产各种汽车533万余辆，以后由于大萧条和武器生产的需要，大体呈下降趋势：1942年剧降至104万多辆，1945年只有73.8万余辆。1929年，电力、电机与电器已成为美国经济中第二重要部门。同年电力生产为1,170亿千瓦小时，1940年增为1,800亿千瓦小时；涡轮发电机、电动机、电器产值1929年超过23亿美元，1939年降为17亿多美元；从1929至1940年，

美国有收音机的家庭数增加百分之百，1940年有2,850万家庭有收音机。1940年以后，美国电力生产增长迅速，成为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并使电器和电子两项相对新兴工业，在战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活力，对美国生活产生深刻影响。1929年，美国生产飞机6,193架，以后10年均未达此数，到1940年才增为12,804架，1944年增为96,318架，1945年仍达97,714架。化学工业资本在1929年为39.42亿美元，1937年减为35.37亿美元，1948年剧增为91.09亿美元。

第三产业中，只有政府机构与企业产值呈上涨趋势。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1929年为5.8，1940年为10.8，1945年为20.3；[①] 服务行业、金融与不动产业及交通运输业等，都呈下降趋势；批零售商业则变化很小。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如我们在8、9两章中所阐述，美国在备战和参战过程中，逐渐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军事部门成长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军事部门过去就有，并且与供给它以必需商品的企业公司有联系。但在30年代，军事部门仅只是美国生活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而这个由军事建制及其供应者组成的复合体只是经济体制中的一个小部门。在战争年代，这个复合体惊人地成长，而且有些官员希望它在和平到来时仍然保持其重要性。"[②]

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当然深深改变了美国第二产业的结构。而且还有人认为，"罗斯福在为国家安全而斗争时，经常是以最少牺牲美国人以取得最迅速胜利为宗旨，这就使美国科学界

---

① 如果从政府支出计算，则其在国家收入中所占百分比，1929年为12.12，1940年为23.12，1945年为51.33。

② 理查德·S·柯肯德尔：《全球大国：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利坚》，纽约：克诺普夫公司，1980，第3—4页。

和工业界对执行国家政策负起与军事部门一样的重担。从而，这种新的紧急状态加固了联邦行政部门、大公司和军事部门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力。战时经历在这3者之间建立牢固共同利益以增进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为后来的所谓科学—军事—工业复合体奠定了基础。”①

〔美国公民社会地位的变化〕　　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看，罗斯福就任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按照一种类型人口的意志办事。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族信新教的有产白人。从罗斯福时代起，新的集团逐渐见了天日。这不仅是他们得到以往得不到的好处，而且被承认在美利坚共和国中有他们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20年代统治美国的企业界的地位，几乎被大萧条完全摧毁。在那个繁荣的10年，企业家是美国工商业文明的英雄人物，而到大萧条期间，所谓“企业家的新纪元”已烟消云散；企业家们自以为是的作风受到无情嘲笑，他们的领导地位垮台了，往往被人们看作骗子或者傻瓜。

企业界以外的人物、特别是从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现在成为社会中坚，有了权力。这些人在20年代往往感到低人一等，至今耿耿于怀，常常抓住有利时机使企业家当场出丑。

此外，由于罗斯福“新政”不仅管束企业界，而且向“被遗忘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使得大规模生产的农民、产业工人和一些特殊少数民族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有所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罗斯福政府把大企业家请回首都管理战时经济，他们的社会地位又逐渐恢复。不过，其他各集团已经上升的社会经济地位，大都保存了下来，工人、农民的经济

① 诺曼·A·格雷布纳：《全球大国时代：1939年以来的美国》，纽约：威利父子公司，1979，第41—42页。

地位还有所上升。

二、政治制度的演变

1929—1945年间，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过渡，美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权分立制的变化〕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3个部门彼此独立又互相制衡，人们习称为"三权分立制"。"但国会明显居于支配地位。建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实际情况大致如此。"① 至于最高法院，在内战后的数十年内，其"正统地位和权力似乎比总统更巩固地建立起来。总统总的说来是软弱的，并且没有赞成过明确的立法纲领"②；"直到1933年，总统很少直接向司法权挑战。"③ 但如前所说，1933年3月罗斯福执政后，他的政府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需要，实行"新政"，大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急剧扩大联邦政府职能、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因而使三权分立制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总统与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1933年罗斯福在首次就职演讲中说，他希望行政与立法权的正常平衡，完全足以应付美国面临的空前任务，但在必要时，他将请求国会让他运用广泛的总统权力对付紧急情况，这种权力要像美国被外敌侵略时国会授予总统的权力一样大。罗斯福认为，"总统有权力按照公民利益的需

---

①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99页。

② 〔英〕约翰·D·李斯：《总统与最高法院：从"新政"到水门事件》（中译本），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第4页。

③ 〔英〕约翰·D·李斯：《总统与最高法院：从"新政"到水门事件》（中译本），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第5页。

要采取行动，即使法律没有明文授权，有时甚至违反法律的规定。"[①] 在他的任期内，为了克服大萧条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他的确是按照他所理解的公众利益的需要，广泛扩充了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大体说来，可分为4个方面。首先是扩大了总统的立法职能。19世纪时，国会一直注意维护其立法权不受侵犯。20世纪以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位总统曾利用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破例向国会提出过实际上的立法草案，并利用支持政府议员的核心小组这类机制以制订他们赞助的法律。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常采用这种办法，使他起的立法作用，和作为一个行政首脑的作用，无何区别。他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伴之以立法草案；他给国会各委员会和委员写信，敦促他们通过法案；他还授权助手们作为总统说客到国会活动。到他任期终了时，国会已习惯于听从他的指导，经常期待行政部门提出方案来进行审议[②]。从1933至1943年，国会通过的重大法案，几乎都不是国会创始的。此外，罗斯福对国会立法行使否决权的次数特别频繁。他以前的所有美国总统行使否决权的总数为1,131次，罗斯福一人就行使过635次。所以有的史学家说，"罗斯福很快就使自己扮演着议长的角色。"[③]

其次，通过一系列"新政"立法，并根据这些立法设立许多独立机构和政府各部附属机构，罗斯福作为行政首脑的职能大增。他有权管理金融、财政、企业、劳工、农业、犯罪等各种社会经济工作，举办联邦救济事业和政府企业，进行一些抑制资

---

① 转引自李道揆：前引书，第401页。

② 参阅克林顿·罗西特：《美国总统职位》，纽约：西格内特版，1956，第81—84页。

③ 乔治·H·斯考："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总统权力的扩张"，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第2页。

本、扶助工农的改革。特别是1939年9月8日改组法通过后，罗斯福同日发布第8248号总统命令，设立了总统行政办公厅，下设6位行政助理、白宫办公室、预算局（自财政部移来）和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这就使总统职位更加制度化，“变成一个20世纪的行政管理工具；它使在职总统有个公平机会经受住紧张状态的考验，并作为三权分立政府的单人一方行使宪法授与的职权；它降低了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多设行政首脑的论点（仍有人不时提出）[①] 的意义；它使我们确信总统职位将在出现需要采取断然手段处理问题时经受得住。还可以说，第8248号行政命令使总统职位免于瘫痪，也没有必要根本修改宪法。”[②]

总之，罗斯福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职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他使白宫成为美国政府的核心。从1933至1943年，他就发布总统命令3,556项。当然，他也是美国“大政府”的始作俑者。罗伯特·林格在70年代末指出，“自1930年以来，单单联邦官僚机构约莫扩大了500%。”[③]

第三，罗斯福扩大了总统的外交职能。如第7、8、10等章所说，由于意见分歧或紧急情况需要，罗斯福往往绕过国会和国务院处理外交事务。1933年与苏联建交，基本上就是罗斯福个人外交的结果。美国参战前，为了遏制德、日、意侵略活动和援助受侵略国家，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进行了援助英、法、中、西班牙的秘密活动，积极促进修改中立法，并通过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与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整个战争年代，罗斯福行使了首席外交官的权力。他多次与英国首相温斯顿·邱

① 在美国制宪期间，曾有一派人主张多设行政首脑。

② 克林顿·罗西特：前引书，第100页。

③ 罗伯特·J·林格：《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22页。

吉尔会晤，两次与邱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会晤。……罗斯福的活动主要是秘密的，没有征询国会的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塑造未来世界的重大决定。"①

最后，罗斯福扩大了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比如，1940年罗斯福以超龄军舰换取英国在西半球海军基地的协定，就是绕过国会与邱吉尔直接签订的。当时美国政府司法部长为他的这种大胆扩权行为辩护说：这是作为总司令的总统的合法权限。导致日本进攻珍珠港的那些事件，更使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以总统身份行使了广泛权力。他促使基本上仍是孤立主义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他发布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军队开往格陵兰和冰岛；他让美国海军打着巡逻队的幌子前往北大西洋护航。美国参战以后，他不独以总司令的身份加强和控制美国的经济，甚至发布命令，将10万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送进集中营。

总之，如许多美国史学家所说，罗斯福是现代美国总统制的创始人。

国会的演变。如以上所说，从罗斯福执政起，国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行政部门所取代。同时，国会也受到最高法院的制约。1935至1936年间，罗斯福"新政"初期的重要立法，几乎全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不过，虽然如此，国会仍然是美国政府决策程序的一个重要中心。特别是随着"新政"的实施，国会议程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任务日趋繁重。国会工作人员的队伍日益扩大。1933年1月23日，上年国会通过的宪法第20条修正案，得到足够数量的州的批准。此修正案规定，国会每年至少必须开会一次，开会日期除国会以法律另行规定外，应于1月3日正午开始；而且，新当选的议员任期，不再从

① 乔治·H·斯考：前引文，《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第4页。

当选后的3月4日开始，而是从1月3日国会开会时开始。比以往提前了两个月。至于国会工作人员队伍，1930年时，参议员共雇用280人，众议员共雇用870人；到1947年，前者增为590人，后者增为1，440人。参众两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30年分别为163人和112人；到1947年，增为232人和167人。

除任务加重和队伍扩大外，国会还寻找机会限制总统权力，以便对它失去的政府中的主导地位有所补救。1932年，国会开始使用立法否决权，就是国会在一项法律中写进这样的内容：总统或行政机构据该法采取的行动和制定的条例，必须得到国会同意方可付诸实施，国会可以在一定限期内以两院联合决议、一院决议、甚至一个委员会决议否决该行动或条例。罗斯福执政后，国会使用过这种立法否决。但由于“新政”立法受到欢迎，从1932到1939年，只使用过5次。

另一种限制总统权力的新办法，是由政党领袖召开国会会议。1939年欧战爆发前后，那些反对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人，担心他在国会休会期间采取的措施导致美国卷入战争，于是促使国会在1939、1940年不断地开会，1941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美国参战后，1942年国会开会346天，1943年1至7月开会184天。由于议员们感到实在需要一个假期，“政党的领袖们就为两院‘有条件’休会作出了安排。决议规定国会从1943年7月8日开始休会，9月14日复会，或者在接到复会通知3天后复会，看哪一种情况先发生而定。关于复合通知，决议规定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何时认为召集会议对立法有必要何时就可以召集各该院开会。……决议还进一步规定，‘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联名向参议院秘书和众议院干事提出国会复会以讨论立法的书面申请’，国会应立即复会。……

“依照这个先例，国会可以随时安心休会，只要多数党或少数党领袖一发令可以立即复会。实际上，国会可以使它的会期可长可短，完全不受总统召集特别会议的愿意的束缚。”①

1945年，国会第一次对自身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检查，并认识到要想赶上权力膨胀、行为逼人的行政部门，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方法现代化以适应现代条件。2月间，国会成立两院联合委员会，就国会改革问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后来国会通过了以此委员会报告为基础的1946年国会改革法。②

此外，1929—1945年间，关于国会制度改革值得一提的还有：按照1930年国会规定，从1932年起，根据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分配了各州众议员名额；按照1929年通过的一条规则，参议院必须改变其习惯于秘密办事的原则，公开处理一切事务，除非特别决定要保密；1935、1938和1940年，国会对几种特殊类型的院外活动人员（比如，为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服务的，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制订了立法，进行限制。

司法部门的演变。如第3章第4节所阐述，1935至1936年间，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运用司法复审权废除了“新政”初期国会根据总统提议通过的所有重要立法，但从1937年起，在时势要求和全国舆论压力下，最高法院逐渐改变态度，认为应根据社会经济情况变化，对宪法作较灵活的而不是严格的解释，应该让国会和行政部门根据新情况制定新法律和新政策。因此，在运用司法复审权时由积极行动主义转为克制主义，不再凌驾于国会和行政部门之上随意废除“新政”立法，却转而支持“新政”立法。

---

①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上册，第115—116页。

② 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第191—192页。

特别在外交方面，由于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有一项判决，认为总统职位是联邦政府对外关系的惟一职能机构，即使是罗斯福行使无宪法根据的权力，也未受到最高法院的任何直接挑战。[①]

〔联邦制变化〕　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即联邦与各州的分权制；联邦行使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力，和根据最高法院解释可以从授予权力合理引申出的"默示权力"，各州则行使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保留权力"。[②] 这种联邦制实行的前150年间，虽历有变革，但变化不大。人们称之为传统的联邦制。只是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这才"标志着传统的联邦主义的终结。……联邦政府介入传统属于州权范围的经济和社会领域，通过'新政'的实践，在基本方面实际上已被美国人民所接受，在罗斯福以后，不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举了。"[③]

按照宪法第6条规定，虽然联邦地位高于各州，但在传统联邦制时期，联邦与各州政府相对独立，分别执行不同职能，史称二元联邦主义。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联邦权力急剧膨胀，它高于各州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从前属于州权范围内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工业管制、劳资关系等，联邦政府都有干预的合法权力。这种联邦和州政府相互依赖、共同执行许多职能的联邦制，史称合作联邦主义。一般说，在联邦和各州共同实施各项计划时，由联邦拨款和制订政策，州和地方政府则负责执行和管理。

联邦高于各州地位的确立，联邦介入州权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州的职能的缩小；"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社会经济生

---

① 参阅〔英〕约翰·D·李斯：前引书，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第9—10页。

② 具体分权情况，参阅李道揆：前引书，第57—59页"联邦和州的分权表"。

③ 邓蜀生："美国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北京：三联书店，1983，第460页。

活变化较灵活地解释宪法的作法，同样给予联邦和州政府以更大的自由。联邦介入州权力范围，也不是联邦政府取代州政府，而是执行共同任务。此外，还出现并发展了处理共同问题的州际活动。在国会同意下，各州已签订许多涉及两个或更多州的协约，包括事项有：桥梁建筑、洪水防治、石油生产、工资管理、制止犯罪、减少水质污染和保护海生鱼类等。各州还可以不经国会同意制订统一法律相互授予特权，或规定在特殊事务上对各州公民给予同样待遇。为此，成立了一些州际管理机构，和州长会议、州政府理事会、美国城市协会、美国县协会等常设的协会性组织。

〔政党制度的变化〕　　美国是一个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因为它经常有两个大党和若干小党；而大党又如此庞大，以致那些小党常被人忽视。[1]

作为两党制，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并未引起什么变化，这个时代实行的仍然是两党制。但是，两党制本身是有变化的。有一位美国教授说，30 年代初美国“政党划分沿着地理界线。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北部与西部地区，而民主党主要是个南方党。这种政治上的地方主义……美国人称之为区域主义。在 1932 年以前，政党间界限分明，区域色彩极为浓厚，以致共和党几乎在南方各州不复存在，而民主党在北部与西部各州的实力非常微弱。……1932 年以来，这种制度在逐渐瓦解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的政党划分。”[2] 1932 年大选，“民主党在北部与西部地区所获的选票有了惊人的增加……在北方的 12 个重要的州中所获选票，从 250 万增加到1,350 万。……已成为全国性

① 在全国大选中，各小党得票总和，通常不到总票数的 5%。

② E.E. 沙特施奈德：“美国的政党制度”，载斯蒂芬·K·贝利编《美国政治与政府》（汉英对照），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第 114 页。

政党。罗斯福在一连4次的大选中，次次以全国绝大多数票当选……。另一方面，共和党在南方所获的选票也急剧增加，从1942年的70万增加到1960年的480万。"[①]

从地方性政党变为全国性政党，乃是一种表面现象。这位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罗斯福时代，"民主党有倾向成为一个政府的政党，而共和党则趋向于成为一个工商业者的政党"；民主党政府要求建立足够强大的民主制度，足以抵销大企业的影响，保护美国式的自由；共和党虽然也维护民主制度，但它主要扮演着保护自由企业制度的角色。[②] 英国学者维尔则说，由于1932年以来美国政治生活的变化，"两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还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党描绘为工人的党，而把共和党看作大企业的党，也就是对富人比对穷人更有利的党。"[③]

以上两种说法都不准确。我国陈其人教授等的论点是比较科学的[④]。他们认为，这种美国政治史学界通常称为"第五政党体制"[⑤] 的新型两党制，是美国实行"新政"以后形成的两党制。这种两党制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和罗斯福时代以前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如本书头几章所指出，30年代以来民主党已经认识到，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必须在保证垄断资本利润的同时，适当改善工人、农民、各少数民族以至资产阶级

---

① E.E. 沙特施奈德："美国的政党制度"，载斯蒂芬·K·贝利编《美国政治与政府》(汉英对照)，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第115页。

② 参阅沙特施奈德：前引书，第117—118页。

③ 〔英〕M.J.C. 维尔：《美国政治》(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74页。

④ 参阅所著：《美国两党制剖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5章。

⑤ 美国政治史学界大都认为，从杰斐逊创建民主共和党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政治史可分为5个发展期，亦即5个政党体制；1936年以后政党体制是第五政党体制。

其他阶层的社会经济处境。否则就难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润和政治统治。这就是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的根本原因。“新政”促成了罗斯福联盟——以自由派垄断资产阶级为首的包括工人、农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城市贫民的联盟，成为30年代以来民主党较长时期统治的社会基础，也使民主党成为一个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为争取选民，共和党从30年代中期起，也不得不适应这种时代潮流，适当地逐渐向“新政”靠近。因此，1936、1940、1944、1948年大选，共和党政纲都部分掺进了“新政”内容，1952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走容允“新政”纲领的中间道路。

（这就是罗斯福时代形成的美国新两党制。）

三、教育的危机与变革

1929—1945年间，美国教育总的趋势是有所发展的，但大萧条和战争都曾给教育造成危机，降低过教育质量和在校学生人数，也引起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现就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演变情况分述如下。

〔学前教育〕　一般而言，约从1920年起，美国许多公立学校便有了幼儿园[①]，也逐渐出现为4岁以下儿童设立的托儿所。自此以后，特别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

---

① 此前美国幼儿园一般是按照德国幼儿园创始人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的理论与实践创办的，是一种独立于正规教育体系的机构，强调玩玩具、做游戏，不属于公立学校。经过约翰·杜威等人的不断批评，到1920年左右，这种福禄培尔式幼儿园逐渐为一种新型幼儿园所取代。这种幼儿园根据杜威思想，强调社会知识，使儿童了解自己周围环境，使儿童有目的地学习，在“做”中学；认为最有效益的教学法是承认和发展教学活动与儿童周围现实世界相联系的教学法。这种幼儿园不再强调有别于正规学校，却成为进入小学一年级的预备教育机构。

为了使母亲们能离家就业，日益支持学前教育。

罗斯福时代的幼儿园，像20年代幼儿园一样，其教学目标是根据爱德华·桑代克的“刺激—反应”心理学或联结主义理论[①]确立的，即养成正确的习惯，亦即养成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习惯。达到这种教学目的教学法，则是应用威廉·基尔帕特里克设计的“完成项目法”，也就是由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作出选择，有目的地做成某种事情：或者是建设性的，比如造一只船，写一封信；或者是欣赏性的，比如听音乐、看图画；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比如让儿童观察“是否降过露水”；或者是获得某种程度技能的，比如读或写外文。这种教学法既强调学习社会知识，也要符合儿童的意愿或品性。但是，由于当时强调教育的社会效益，又强调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可量性，幼儿园教师们特别致力于使儿童适应社会，力求自己项目设计的精确性和可量性，这样，便往往忽略了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其结果，使得“作为福禄培尔运动特征的那种严格程式化和以教师为中心（甚至以理论为中心）的现象，成为20和30年代幼儿园的特征。不过，现在这种严格程式化，是科学心理学和计量法的严格程式化。”[②]

〔中小学教育〕　大萧条和战争都使中小学深受影响。不过，直到1932年，美国人还是极力维持住了图书设备和教职工薪金。1932年教育经费开始紧缩，到1933—1934学年度末，教育事业几致不能维持。然而，由于失业青年数量庞大，他们除学校外无处可去，大萧条只降低了教育质量，注册和在校学生数不

---

① 这种理论认为，对特定刺激的行为反应是通过“尝试与错误”过程形成的，而这一过程促成刺激和最满意的反应之间的神经联结。

② 罗伯特·丘奇、迈克尔·塞德拉克：《美国教育解说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第341页。

独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找工作较容易，青少年就业的多[①]，中小学注册和在校人数有所减少。现将这一时期美国中小学学生注册及在校人数列表如下。

美国中小学注册及在校学生人数

（1928—1946）

年份	注册学生数				公立学校在校学生数	
	总数	公立学校		非公立学校	平均每日上学人数	注册学生平均上学日数
		学生数（包括幼儿园的）	占5至17岁人口百分比			
1928	27,810,309	25,179,696	81.5	2,630,613	20,608,353	140.4
1930	28,329,059	25,678,015	81.3	2,651,044	21,264,886	143.0
1932	29,061,403	26,275,441	82.0	2,785,962	22,245,344	144.9
1934	29,162,732	26,434,193	81.6	2,728,539	22,458,190	145.8
1936	29,005,873	26,367,098	83.4	2,638,775	22,298,767	146.3
1938	28,662,591	25,975,108	84.4	2,687,483	22,298,200	149.3
1940	28,044,589	25,433,542	85.3	2,611,047	22,042,151	151.7
1942	27,179,002	24,562,473	84.2	2,616,529	21,031,322	149.6
1944	25,757,907	23,266,616	80.4	2,491,291	19,602,772	147.9
1946	26,124,441	23,299,941	80.5	2,824,500	19,848,507	150.6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D.C.，1961，第207页。

由上表可见，在罗斯福时代，美国中小学注册学生数和实际上学人数1934年达到顶点，以后逐年下降，到1944年达到最低点，1946年才又开始上升。

小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法，大体与幼儿园的相似。约翰·杜威、爱德华·桑代克和威廉·基尔帕特里克的理论与实践，对教

① 当时美国法律虽然禁止童工，但实际上并未禁绝。

师、家长和学校行政人员具有深刻影响。家长—教师协会是罗斯福时代美国小学的显著特征。这些协会是杜威和基尔帕特里克领导下的进步派教育工作者发起组织的，它们注重实验活动，主张让儿童参与以及广泛运用车间、实验室及其他物质设备，这无疑是适合于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的，比只从书本学习是一种进步。

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只对小学教育具有间接影响，但各州教育部门为提高小学教育质量，承担起颁发教师证书的责任，并开始把读完 4 年大学作为领取教学证书的先决条件。

中学情况较复杂。1918 年全国教育协会的报告确定了中等教育的七大基本原则：促进健康、培养职业适应性、掌握获取事业成功的基本方法、成为合格的家庭成员、善用闲暇、成为良好公民和具有道德品性。这些基本原则不独影响着 20 年代的中学教育，也影响着罗斯福时代的中学教育。但是，罗斯福时代的中学教育也有其特点。

首先，大萧条期间，失业青年多，许多人责难中学未能使青年人对就业作好准备。批评者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职业教育，过于专门化，只注重一技之长，不能培养一专多能人才，而 30 年代工业经济已发展到一种程度，使得大多数工种都是半熟练性质的，只需几星期训练就可以担任。因此，这种主要培养手艺人的职业教育，不能解决需要一专多能劳动者的大萧条年代的青年失业问题。于是，30 年代的教育工作者日益发展一种可称为“就职前通用教育”的教学法。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人养成劳动习惯，具有自我进行人格调整的能力，让他们学习对许多不同职业都有用的一般技能，为他们找到某种特定职业时学习专门技能打下基础。

其次，20 和 30 年代的进步派和现代主义派教育工作者都强调中学教育的“社会性”，反对强调传统学术课程。他们不断攻

击学院规定的入学资格，因为这种规定的资格被认为是迫使中学太重视历史、英语、数学和外语的原因。他们反对强调书本学习，死记硬背；要求帮助学生从经验、现实生活学习。在这方面，他们和进步时代教育工作者并无不同。但是，有些历史学家认为30年代和20年代进步教育强调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20年代由于1919年成立的进步教育协会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这一类中学比较发达。但这一时期进步派教育工作者并未形成新的理论。30年代出现一批大多数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联系的教育思想家，他们为提倡致力于社会变革或社会重建的教育，力图“接管”进步教育协会。他们攻击20年代的进步教育协会是个人主义者的温床；它对个体儿童的强调，使他们无视社会知识的需要。领导这场攻击的是乔治·康茨。他在1932年出版的《学校敢于建立新社会秩序吗?》中说，教师们必须断定新的、较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最后以此教导学生；教师们不要怕被人指责为灌输知识；进步教育的弱点就在于它未能详细阐明一种社会福利的理论，如果说它有理论的话，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

大萧条期间，康茨及其一伙的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他们在进步教育协会的力量也日益加强，扩大了这个原以上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协会的会员人数。不过，这种教育哲学的争论，对日常教学工作说来，未免太抽象、太精细，不易付诸实行。30年代大多数中学实行的进步或现代教学法，不是聚焦于儿童或聚焦于社会的一种学说的产物，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基尔帕特里克的“完成项目法”的变种。这种教学法，在使个体学习者摆脱隔离状态以培养适应社会生活能力时，体现了现代主义派教育工作者反对抽象而无关紧要的学术训练的态度。

第三，30年代中学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两种

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一种是城市的、世界主义的、多相的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一种是农村的、纯一的、原教旨主义的和传统的。中学一般受地方社区控制，大都维护后一种价值观。但是，城市、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学校，泛滥于报纸、杂志、电影、广播中的那些流氓、土匪、性感明星、甚至欧洲准法西斯式青年，在诱惑着一些中学生倾向于性生活、酗酒、异想天开、狂放不羁，厌恶艰苦劳动，不愿承担公民责任。因此，学校不得不应社会要求，千方百计关心学生社会生活，防止学生脱离常规，以便维持现状。

第二个问题，也是中学更关心的问题，乃是青年人对美国经济情况的不满。"学校甚至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导他们尊重现状，鼓励学生不要对现制度产生怀疑……。学校不得不更谨慎地防止激进思想渗入课程内容……。公众将日益增长的学生支持工人要求与和平运动的示威游行看成是这种激进主义的证据。美国人已开始恐惧地询问是否美国会出现真正的'学生运动'；而学校的任务是防止它发生。"[1]

第三个问题是青少年犯罪。1939 年有学者报道，美国因重罪而被拘捕的人中，只 10%超过 30 岁[2]。20 岁以下青年人被捕的数量惊人地增长。虽然几乎人人都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萧条，而不是学校，但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社会一样，认为学校应对此有所作为。因此，中学就很自然地增加了"监护"的责任：把千千万万闲散青年多留在学校一段时间，一方面防止他们异化、激进和犯罪，一方面减轻劳动市场压力，直到他们能找到工作、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工人。

---

① 罗伯特·丘奇与迈克尔·塞德拉克：前引书，第 370—371 页。

② 多罗西·C·费希尔：《我们的青年》，纽约，1943，第 37 页。

中学作为一种“监护”机构，把学生留在学校直到18或20岁，让他们干甚么呢？在大萧条年代，只让他们学习书本知识是会使他们厌烦的；而如前所说，传统职业教育又难以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他们也不会满足。有些“分析人员具有一种几乎是神秘的信念，认为体力劳动将会恢复青年人在20、30年代已被严重损毁的某些原始而本质的价值观念。结果，这些分析人员就不可避免地转向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全国青年处的经验。那些渴望学校承担起监护作用的人们，特别想把教育和有偿的公共服务工作结合起来；许多人提倡强制18至20岁男女青年参加寄宿劳动营。”① 但是，由于举办这种劳动营比办中学耗资较多，由于萧条年代无法为所有较年长中学生找到有偿的公共服务工作，这种设想无法实现。后来，是战时繁荣才暂时解决了这个中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学教育工作者一方面全面参加战时活动，比如不断举办职业训练学校，提供学习国防工业技能的短期训练课程；加速教育进程，使男青年较迅速地穿上军服，等等。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战后又出现经济危机，大批青年人失业，因而继续研究和发展中学的监护任务。他们为了给这种消极的监护任务披上一种积极外衣，宣称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把学生禁闭在学校里直到找到工作，而是要教育学生作好生活准备。这里的所谓“生活”，主要不是“谋生”，而是关于家庭、育儿、花钱习惯、闲暇利用等问题。这种潮流，后来发展为40年代直至50年代初的生活调整运动。

这种运动的高潮，体现于1946年建立的青年生活调整教育

---

① 罗伯特·丘奇与迈克尔·塞德拉克：前引书，第373页。民间资源保护队就是这样的劳动营。

委员会的活动之中。生活调整教育强调身体、精神、情绪的健康，帮助青年人解决当前青春期的问题和预见成年期的问题，提供叫人勤劳而不是特殊职业技能的工作经验，以及发展使个人取得成就和在闲暇时间得到满足的活动技巧。这种教育，主要是针对那些上不了高等学校和不大可能通过职业教育获得工作的中学生的，这类中学生约占中学生总数的 60%。

罗斯福时代的教育思想家中，有一个以威廉·巴格利为首的本质主义学派。这个学派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忽视了超越个人直接经验的、包含全人类文化共同本质的间接经验的学习，而这种间接经验的学习恰恰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他们曾在 1938 年成立与进步教育协会对峙的组织。但是，在大萧条与战争的影响下，他们的理论与活动只能是一股支流。

〔高等教育〕　大萧条与战争都曾给高等教育以严重影响，在 1934 和 1944 年形成两个倒退期。但是 1942、1943 年通过的两个士兵权利法，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从 1945 年起大批进入高等院校，使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现将罗斯福时代高等学校总数和注册学生数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美国高等学校总数和注册学生数

(1930—1946)

年份	学校数	注册学生数 (1000)			
		总数	占18至21岁人口百分比	本科生	研究生
1930	1,409	1,101	12.42	1,054	47
1932	1,460	1,154	12.62	1,028	78
1934	1,418	1,055	11.20	964	71
1936	1,628	1,208	12.50	1,129	79
1938	1,690	1,351	13.96	1,270	91
1940	1,708	1,494	15.68	1,388	106

（续表）

年份	学校数	注册学生数（1000）			
		总数	占18至21岁人口百分比	本科生	研究生
1942	1,720	1,404	14.68	1,319	85
1944	1,650	1,155	12.73	1,100	59
1946	1,768	1,677	20.84	1,556	121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第210页。

第一次“新政”期间高等教育虽有所倒退，但从第二次“新政”起又迅速发展。到1940年，“引起一些严肃的关于民主国家中高等教育作用的新问题，还不可避免地迫使高等院校领导人修改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简言之，高等院校不再几乎专门培养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也成为训练男女青年准备将来从事工、商及其他事业的场所。”①

除这些变化外，教育思想也经历着显著变化。约翰·杜威发表《民主政治与教育》一书时，“学院接受杜威思想较慢。但是，美国大萧条年代提供一种气候，使学院也受杜威思想冲击。它们引进了‘核心课程’计划；名为美国文明、美国研究或美国文化这样一些课程，试图将数种传统课程内容与解决实际问题课程统一起来。这种称为进步教育运动的运动，似乎造成一种结果：它将各学科的传统教学内容冲淡到一种程度，只要学到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可用于对付某种日常问题，人们便认为这种知识已经够了。”② 由于这种原因，有些学院便大刀阔斧地改变课程设置和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册，第329页。

② 保罗·韦斯特迈耶：《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查尔斯·托马斯出版社，1985，第130—131页。

教学方法。比如，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提出一种论点：闲暇对个人自我充分发展带有根本性。因此，该院认为学生和朋友打网球，像和教授讨论问题一样重要；教授对学生不指定课外作业，只鼓励学生研究永久性问题和人类的利益。还有些新学院，就是按照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建立起来的。比如，1932 年佛蒙特州建立的本宁顿学院，它将课程设置与课外活动（工作与游戏）、课堂教学与取得经验统一起来。该院在聘任教授时，不是看他的学识，而是看他是否具有丰富的经验。

由于以上原因，这一时期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过于分散、专门化和注重实用，忽视了学生的全面教育和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引起许多批评。1930 年出版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美国、英国、德国大学》，批判进步主义教育将学术从属于功能主义，也许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抨击当时教育的著作。新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诺曼·福斯特，也批评进步主义教育忽视学术性。1931 年，约翰·H·C·纽曼则从正面论述"大学的概念"，认为大学是个教授全面知识的场所，旨在使学生成为上流人士，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能力和对事物作出公正评价的能力。

批评进步主义教育的人士中，最著名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 1929 至 1945 年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哈钦斯，和 1933 至 1953 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B·科南特。哈钦斯一直提倡通才教育，反对过多的非教学活动和过分专门化。总的来说，他反对进步主义教育、特别是职业主义教育。除出版《美国高等学术》（1936）、《服膺自由的教育》（1943）等著作宣传自己观点外，还在芝加哥大学禁止足球比赛和兄弟会，用全面考试衡量学生学习成绩，并要求学生阅读历史上"伟大的著作"。科南特指示负责研究高等教育的哈佛委员会说，造就优秀公民的核心问

题，是受优秀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仅仅学到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培养判断力和优美情趣；不仅学数学、自然科学和读书方面的基本技能，还要学历史、艺术、文学和哲学。1945年，哈佛委员会写出报告：《自由社会的全面教育》。该报告要求高等教育要有共同立场、一致目标；要学习关于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以了解形成美国思维方式的知识力量；要教育大学生理解与欣赏美国民主政治、理解与承认人的尊严和人对人的责任；当然，也要尊重实证科学。

这样，主张以完整课程体系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人们，逐渐取得了胜利，并预示着罗斯福时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宗教的演变

“1929年大崩溃后，20年代以来宗教不景气现象更加显著。失业与饥饿不会导致群众宗教的复兴，不过减少了美国宗教生活的肤浅性和自我矜持。‘新政’期间，随着国民自信心的恢复，基督教出现某种发展现象。欧洲秩序的崩溃，希特勒的兴起，以及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挑战，使得美国人重新关注起包括宗教传统在内的国民遗产来。尽管战争动员干扰了新正教已经煽起的复兴运动，但是，夫离子散的家庭的忧虑，‘为战争尽力’引起的社会混乱，的确刺激起对宗教的明显而更强有力的兴趣。战区流行一句话：‘散兵坑内没有异教徒。’在数百万伤亡将士家中和许多国内教堂里，也可以这样说。从这种意义来看，‘战后复兴’

在停战以前很久就开始了。”①

〔教徒、教会变化情况〕　　从大萧条开始，全国教徒总数增长缓慢。到 1937 年，增长速度稍快。美国参战以后才增长更快。现将罗斯福时代教徒总数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美国宗教团体成员变化情况

(1931—1945)

年　　份	教　徒　总　数　(1000)
1931	59,798
1933	60,813
1935	62,678
1936	55,807*
1937	63,848
1940	64,502
1942	68,501
1944	72,493
1945	71,700**

资料来源：《殖民地时代至 1957 年美国历史统计》，第 228 页。

在 3 大宗教中，新教徒仍占优势，其次是天主教。以 1936 年为例，教徒总数55,807,000 人中，新教徒就有31,251,000 人，罗马天主教徒为19,914,366 人。新教徒中，又以浸礼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人数较多；前者近 950 万，后者约 700 万。

除教徒人数变化外，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无疑对宗教生活具有巨大影响。生活的深重苦难使得各种各样的人寻找替罪羊

---

① 西德尼·阿尔斯特伦：《美国人民宗教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第 950 页。

* 据《基督教先驱报》报道，1936 年美国教徒总数为 63,222,000。

** 此数字只包括成员在 5 万以上的宗教团体成员数。

和万应灵丹：种族主义与民族仇恨加深了；阶级对抗尖锐了；政治与宗教观点倾向极端了；常常在旗帜上附上基督十字架的煽动家开始聚集信徒了。旧日的群众信念呈崩溃之势，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赎罪力，“企业宗教”信徒成群流失，自动进步的信仰烟消云散①。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多样化精神复兴。由于认识到整个国家处于苦难之中，美国人获得一种新的民族自我觉醒。同病相怜使大量美国人具有一种新的团结意识，并采取集体行动；工人、农民、小企业人员、老年人及其他人等联合起来，民族与种族纽结变得更有意义。这种新的激情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当一些主要大教派仅能保持其原有成员时，也许是由于大萧条使失去人权的人皈依宗教，原教旨主义教派、罗马天主教圣灵派和基督教圣灵降临派人数大增，显出某种复兴迹象。比如，1926至1936年，拿撒勒会教徒由63,558人增为136,227人；神召会信徒由47,950人增为148,043人。最具有全基督教性质的是：主要由于对联邦教会理事会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主义不满，各种“原教旨主义的”教会要求联合的愿望。这种情绪的冲动，使得1940年组成了高度战斗性的美国教会理事会和1941年不那么具有排他性的全国福音派新教会协会。

在较老的教派中，由于国民觉醒和民族团结等原因，导致几次重要的教会合并。南、北卫理公会抛弃前嫌，并拉拢一些较小派别，于1939年合而为一（两个黑人卫理公会未加入）。4个较小德裔教会——（旧德裔改革派、福音派会议、福音教会和联合会友会——）曾举行合并会议，但因前两个和后两个差异太大，

① 西德尼·阿尔斯特伦：《美国人民宗教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第920页。

总合并未成，1934年前两个合并为福音派与改革派教会，后两个到1946年才合并为福音联合会友会。与此情形相似，1931年也合并成两个不同性质教会：老新英格背景的公理会和基督教会。

〔新正教在美国的传播〕　20年代时，自由主义在美国新教会领袖中几乎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接受进化论，同意用科学的历史法考证《圣经》，不再用神学解释《圣经》和宣传福音，而且满怀希望地期待在人世间早日建立上帝王国。20年代末至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危机和德、日、意的法西斯运动，使得在人世间建立上帝王国的希望破灭，而且宗教权威面临危机，于是，宗教思潮开始反对自由主义，逐渐皈依新正教。

新正教起源于欧洲，20年代在美国也有些皈依者，30年代信仰的人更多，而且出现一些有成就的神学家。他们的思想感情受社会不公正、政治与宗教乌托邦、教规束缚等等问题的折磨和影响；他们的灵感来源于许多地区各种极不相同的思想家。有些人抗议背教和异端，有些人却谴责正统派的骄傲。在这里讨论所有这些变种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沃尔特·劳里，他是个圣公会教徒、欧洲新正教著作的译者；有道格拉斯·霍顿，他是公理会教徒，也是欧洲新正教著作译者。除这些美国人外，还有两位来自德国神学家——威廉·保克和保罗·蒂利希。他们对美国新正教神学作出了特别有力的贡献。但是，美国最著名新正教神学家却是尼布尔兄弟；他们的著作，最能表明美国新正教的原动力、性质和目的。

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和H·里夏德·尼布尔都曾在其父任职的德国福音教会神学院学习，并同进耶鲁大学深造，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伦理学教授。赖因霍尔德较多地卷人社会伦理学中的实际问题，里夏德则更是一位从事神学研究的神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两

人都有渊博的史学知识，深深关注着西方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并赋予当代理论问题以巨大的分析力量。尽管所用方法不一，但两人都研究由人类的历史性与有限性、教会对社会的适应和绝对道德判断的试探引起的问题，也研究由道德的空虚与形式化、人类傲慢以及理想主义的天真等等危险引起的问题。

1929年，赖因霍尔德发表《一个驯服的犬儒主义者笔记本中的讲演》，里夏德发表《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前者谴责具体的社会弊端与工业的残酷，还批评当时宗教教育为"最近的谎言"；后者揭示教会与历史的牵连，阐明阶级、种族、国家和经济因素如何分裂教会，以及美国宗教的主流如何深深陷入中产阶级的成见。1932年，两人又都有著作发表，赖因霍尔德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也许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投下的对内部结构最具有破坏性的炸弹。"① 他在此书中认为个人和有组织的集团的道德潜力是不同的，人们应时刻记住后者的严格局限性。他认为主权国家、公司、工会据其天性几乎完全不可能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因此社会伦理学的道德立场必需是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罗斯福时代美国新教的极端实用倾向和政策问题不断变化，有人怀疑，美国新正教历史如此与赖因霍尔德传记纠缠在一起，是否说明美国新正教运动的基本目标，是修订社会福音教义。

赖因霍尔德的神学思想后来还有发展，但其根本内容见于他1941—1943年发表的《人的天性与命运》一书。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直攻击进步的概念和"历史是基督"的观点，认为人同时是圣哲也是罪犯，既是动物也是创造者，在历史之中可又超越历史。他尤其要求人们充分觉察到人类罪孽的深重。没有一个

---

① 西德尼·阿尔斯特伦：前引书，第941页。

美国人像他那样改变了美国过时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福音教义。

除以上所述，当然还有些人对美国新正教运动作出过贡献。大体上说，到 1939 年美国主要神学家的一系列自传性文章在《基督世纪》上发表后，新正教运动掀起的真正变化已经显现出来了。

总的说来，新正教批评自由主义只赞美人类而不赞美上帝，忽视人类的罪恶在历史上制造的无穷危机。这样，人类在经济苦难和战争面前，精神上就会一无所有。新正教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尊严、人类的罪孽以及上帝维护和选拔耶稣基督的慈恩。从这方面看，它是正统派。但是，新正教不反对进化论，也赞成用科学的历史法考察《圣经》。从这方面看，它是现代派。总之，新正教是为了克服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期美国宗教危机在美国传播开来的。

新正教是一次神学变革，主要是一次知识活动。它不是一种统一的运动，对各教派的影响也深浅不一，但它对美国宗教、特别是神学教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社会福音运动的复兴〕　社会福音运动是 19 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快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20 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衰落下去。30 年代，虽然新正教在新教中日益得势，但“1920 至 1940 年间，社会福音运动取得它 20 世纪最伟大胜利之一，那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正式认可和赞助它的事业。”① 1919 年，该教会认可约翰·A·瑞安神父制定的《社会重建：问题综述与纠正办法概要》。这个文件赞成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并参与工业占有与管理。此后不久，主教们建立起全国天主教福利理事会和一个美国教士统治集团的特别委员会，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上册，第 332 页。

以协调教会的思想和工作。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深，相当一部分教会领导人重新相信社会福音教义。1931 年，浸礼会全国大会赞同后来“新政”提出的一些社会改革措施。1932 年，北方长老会社会与工业关系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报告，美国面临大危机，他们对资本主义原则能否保证全面繁荣表示怀疑；圣公会教士提出的社会改革措施，远比后来“新政”实施的更为彻底；卫理公会的教会形势委员会在全体大会上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根据的掠夺原则进行了全面谴责。1934 年，卫理公会全国青年理事会在第一次全国理事会上，甚至认可社会主义，责备“新政”的“半瓢水”法案，并散发誓词：“我将生命交给基督，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

总之，由于几乎所有教派都日益愿意以批评态度公开谈论社会问题，关于工业和平与世界秩序的乌托邦式的陈词滥调，逐渐让位于对经济灾难与权利分配不公的原因的现实关注。这样，30 年代代表大多数新教教派发言的联邦教会理事会，便在 1932 年大大修改了它原来采取的社会信条，肯定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与社会计划的必要性。1933 年初，《基督教世纪》抱怨当选总统也许会像胡佛那样极端保守。同年第一次百日“新政”以后，联邦教会理事会主要成员、公理会本森·兰迪斯发表《美国第三次革命》一书。他虽然担心“新政”只关心经济复兴，不大有助于国际合作，但他却自诩罗斯福政府实施的许多政策，乃是 20 年来教会（或自由主义教会）所提倡的。

有些更激进的教派间联合团体也在活动。和好联谊会从 1928 年起开始注意社会问题，1933 年起特别致力于劳工事业，强烈支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甚至询问信徒在社会正义受威胁时是否该用暴力。1930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基督徒联谊会，在其 1931 年宣言中公开谈论阶级斗争，并警告：如果不消除社

会不平等，将出现“阶级战斗”；它还激烈批评罗斯福第一次“新政”不彻底，并鄙视自由主义者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

1936年11月，为了协调各教会的自由主义和激进团体，并在缺乏这种团体的教派中组织这样的团体，又成立了争取基督教民主政治联合委员会。

社会福音运动的成就是，社会基督教在教会中争取到前所未有的地位：那些要求社会改革甚至社会革命的人，可以在教会中建立机构、提出纲领、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多数教徒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有更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对促进罗斯福“新政”有一定作用。但是，教徒们从未走到选民的前面，而且大多数社会福音运动的文献，还多少具有种族不平等的色彩。

〔*保守派和右派的反应*〕　即使时世再艰难，教会中的保守派也是不甘心认输的。在那些自由主义的声音最响亮的中产阶级大教派中，社会保守主义活动更积极，有时还走向极端。由于不喜欢联邦教会理事会的新社会信条，许多教会中组织起对抗运动。1935年，洛杉矶一个巨大而富有的公理会中，有个极端保守派牧师詹姆斯·W·法菲尔德，为了促进基督教徒的个人主义的事业，组织起一个精神动员会。1936年，卫理公会中有人发起教外信徒的宗教运动，从事于类似活动。1938年，南部浸礼会大会声明：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在美国，不应有激进社会主义与不信神的共产主义的地位，目前广泛流行的为它们进行的宣传，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千方百计地加以防止和抵制。”[1] 在全国各地的虔信派或信仰复兴派教会中，对教徒的通常忠告是忍耐、祷告、和勒紧裤带。至于人们如何选

[1] 转引自罗伯特·M·米勒：《1919—1939年美国新教与社会问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8，第118页。

举，则被认为是公民的私人事务。

罗伯特·米勒在检查了所有新教期刊后，得出一个清晰印象：1932年选举中，这些期刊几乎都赞成胡佛；1936年选举中，虽然不那么明显，它们是支持兰登的。比较一下这些期刊在1928、1932和1936年提倡什么，米勒十分清楚地发现，新教编辑们倾向那些关注禁酒或天主教信仰的候选人，远胜于他们倾向关注失业与饥饿问题的候选人。1936年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罗斯福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中，大多数新教徒是选举兰登的。有趣的是，它还表明，卫理公会教徒78%选举兰登，而65%的南部浸礼会教徒则投罗斯福的票。[①]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概括：除可靠南部外，教徒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比起他们教会公开宣布的信条来，对他们的投票行为，具有更大影响。

在罗斯福时代关于美国应在国内国际走什么道路的纷争中，还曾出现过一种表面只对“变样了的生活”感兴趣的宗教运动，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一种强大的、轰动的、保守的力量。它的创建人和领袖弗兰克·布克曼是一个具有虔信派背景的路德教会牧师。他声称受上帝之命，要通过道德上重新武装运动来改造世界。他的传教办法是：或者在大学校园，或者在世界各首都，总是集中注意那些成功的人，那些有权、有势和有威望的人。他根据“有好食品就有好基督徒”的理论，在舒适的或慷慨施与的地方组织“别墅招待会”。他把那些思想相同的人聚在一起，用一种不拘礼节的方式，引导他们在“四个绝对标准”——诚实、纯洁、无私和挚爱——的熏陶下，通过“五C”[②] ——信任、信服、

① 转引自罗伯特·M·米勒：前引书，第117—123页。

② 信任、信服、忏悔、皈依、持续等的英文为：Confidence，Conviction，Confession，Conversion，Continuance。它们的第一个字母均为C。

忏悔、皈依、持续，达到一种“上帝指引”的生活。

30年代，由于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和其他许多显贵的庇护，这个运动在全世界出了名（或说是臭名彰著），而且逐渐带有政治色彩。在出席人数日益拥挤的道德上重新武装运动集会上，反对共产主义和亲法西斯主义成为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它的爱国活动，这个运动的形象比以前好些。不过，此时它已变成一个富裕而复杂的组织，失去了早期使它强有力的那种亲切关系。战后，这个运动逐渐失势了。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过更嚣张一时的右派宗教运动，如威廉·佩尔利的银衫团、杰拉德·温罗德的基督教信仰保卫团、查尔斯·库格林神父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从休伊·朗继承下来的分享财富社等。不过，这些我们在第3章中都叙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变化（续）

五、社会科学界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变化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高阶段，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纷繁而尖锐，促使学术界不断反思。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出路何在？意、德、日法西斯主义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文明准则，威胁着人类命运和前途。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社会科学界思想活跃、频频出现新气象是很自然的。现就几种主要学科的发展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哲学〕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占美国哲学支配地位的，是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学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它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S·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20世纪上半叶，杜威系统地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和道德、教育、政治、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使实用主义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影响遍及国内外。他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工具主义。

1884年，杜威获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开始服膺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19、20世纪之交转向实用主义。他和詹姆斯一样，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纯粹经验或原始经验。但是，他认为他的经验主义与以往经验主义不同。以往经验主义是使用非经验方法得来的，它将客体和主体、心和物看成是分离的和独立的，承认物质和精神、自然和经验的对立，是一种二元论；他的经验主义是使用经验方法得来的，它超出物质和精神、自然和经验的对立，从而也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就克服了二元论。

杜威不仅和詹姆斯一样，认为经验既包括人的主观意识及其活动，也包括自然界；他还更进一步，认为有机体能作用于环境，促使环境发生变化，环境变化又反作用于有机体，从而使有机体受到自己行动后果的影响。这种行动与环境的密切联系，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就是他称为的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

“杜威表面上强调‘经验’与‘自然’的统一，实质上是把物质的自然界‘统一’（吞并）于主观的经验或意识之中。因为像詹姆斯一样，他否认事物于经验之外的存在，而把它们说成是原始经验的改造物。”① 他的经验的自然主义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论。

在认识论方面，杜威发展了詹姆斯的“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工具主义。他认为原始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定、纯粹偶然的世界。因此，认识的任务不是掌握客观规律以预见未来，而是将零乱、模糊、不确定的原始经验，改造成系统、明确、稳定的东西，以应付环境变化。他认为知识是行动（应付环境）的工具，所有的概念和学说都是一样，其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

---

① 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33—34页。

根据这种工具主义的观点，杜威和詹姆斯一样，认为真理不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是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具有效用。他说，真理就是效用。

为了给詹姆斯的“真理等于有用”论披上一层科学的、客观的外衣，杜威强调工具是人类创造并使用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事物；人通过工具在自然过程中干涉着并且真正改变着自然的性质和关系。其次，杜威强调真理之具有效用不是对个人而言，作为观念的真理的标准的效用是对公众的效用。不过即使如此，只要不承认真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杜威的“真理等于有用”论就不能脱离主观唯心论。

杜威的方法论是他提出的思想的五个步骤：一是感到困难；二是寻找疑难；三是提出假设；四是根据假设推理；五是通过行动以检验假设。“胡适曾把五步骤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有时他更简说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符合杜威的原意。”[①] 这五个步骤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所谓实验—探索的方法，也是他的实践观。

这种五步法并不是毫无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根据，但杜威却用“刺激—反应”这种行为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来解释这五个步骤，遂使这种方法论排斥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的作用，排斥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以及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杜威的社会历史观与早期实用主义者运用实用主义原则论证社会历史问题的传统有关，尤其是詹姆斯的多元宇宙观为他的多元社会历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杜威扩大了实用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的领域。杜威不承认社会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认为社会是多元的、无定形的；社会的发展变

---

①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87页。

化决定于人性和文化两方面的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且由于这种交互作用极其复杂，社会的发展是没有规律的。

由于具有这种多元社会历史观，杜威虽然侈谈社会改革，甚至享有社会改革家美名，但他提倡的社会改革不得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认为以往的所有社会政治理论有一个共同错误，即以一般观念概括特殊情境，使个别、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服从一般的、抽象的社会政治概念，而人们需要的却正是解决这些个别、具体的问题。因此，杜威认为需要一系列解决具体的特例问题的行为方法。因为“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现象都是特殊的，人们应付特殊境遇的方法也总是特殊的。人们因为要不断地行动，需要不断地制定行动的方法，不断进行实验和探索。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需要的不是一般理论，而是实验—探索的方法。”①

为了提倡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杜威强调教育在社会改良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过程就是培养道德过程、天赋的智慧和感情的基本倾向发展过程；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儿童的本性和倾向，让儿童的内在个性得以自由发展。这种教育理论，当然是以先验论的人性论为基础的。

有的学者评论杜威哲学说，“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他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杜威尽管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工具主义，但其本身是人本主义。”②

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无

①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96页。

② 王守昌、苏玉昆：《现代美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85页。

可置疑的。“在阿瑟·M·施莱辛格的《罗斯福时代》第1、2、3卷（纽约，1957—1960）中，以及在几乎每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不像施莱辛格那样坚持）中，罗斯福被说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①] 虽然说这话的保罗·康金不同意这种评论，但他还是承认实用主义的内容包括了罗斯福的某些信念，而且肯定“新政”派中有大批实用主义者和近于实用主义者的人，就连约翰·杜威本人也是一个“新政”派。

罗斯福时代其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的哲学流派，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它是语言分析哲学的早期形式，本世纪20年代起源于维也纳，所以也称维也纳学派。它的创始人是德国的莫里茨·施利克。1929年，他曾到美国讲学。到30年代，随着鲁道夫·卡纳普等一批奥、德逻辑实证主义者到美国避难，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传入美国。从1936至1952年，卡纳普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过他们一伙人的大力倡导，逻辑实证主义日益在美国广泛传播，逐渐取代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的主导地位，使美国成为这一哲学流派的中心。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现代物理学到30年代已进入微观世界的研究，具有高度数学化、抽象化特点，促进了戈特利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立的数理逻辑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学科或工具性学科。实用主义虽具有生活化、商业化优点和效用，但缺乏科学性。所以，当以实证主义数理逻辑化为特征的逻辑实证主义出现时，实用主义虽仍在美国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一个流派，它就逐渐失势而让位于逻辑实证主义。

卡纳普是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系统地阐述了逻辑

---

① 保罗·康金：《新政》（中译本），武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3，第6页。

实证主义的观点。他像一般分析哲学家一样，反对形而上学，认为这一领域的所有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把哲学变成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他在解释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时，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把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对科学内容经验证实结合起来。他强调尊重事实，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均起源于经验，也必须由经验来证实。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

20年代时，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相信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认为一切科学概念和命题所表现的事物最后都可分割为原始的、彼此独立而且不可再分割的经验，主张由语言结构推论世界结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认为，只能够用惟一的一种正确语言来描述世界；这就是理想的语言，它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是相同的。但到30年代，卡纳普认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新逻辑由于追求"正确性"而受到妨碍，于是提出了宽容原则，断定有许多可以接受的语言。"卡纳普的语言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者相同，但他否认他们的图像的意义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这一个联系环节。卡纳普贯彻了逻辑原子论者关于哲学是元语言的活动这个观点。依他看，哲学语句不再谈到世界，却是谈到语言的。但要是人们把语言的约定论（承认有无数可能的和同样正确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就不可能由语言结构谈论到世界结构了。……这就提示了这个新的标准：只当一个哲学语句是谈语言的，而不是谈世界的，它才是可以接受的。"①

卡纳普的哲学以语言分析方法和宽容原则为基础；这个方法保证哲学并不提供直接关于世界的事实，这个原则更保证哲学根本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事实。因此，哲学"必须满足于语言的或元理论的工作。哲学家能够继续对于要在不同情况中使用的语言

① 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正文第5—6页。

构架提出建议。关于某一语言形式对某一目的是否有用，他更能够作出合理的决定。”[1] 不过，卡纳普并不考虑日常语言和它的多种用途。哲学家要建议和评价的语言形式是各种人工语言，如欧氏几何和非欧氏几何，经典数学和直觉主义数学等等。研究日常语言和它的各种用途的，是其他逻辑实证主义者。

逻辑实证主义传入美国后，除由卡纳普等人广泛传播外，有些美国哲学家将之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其较著名的例子为克拉伦斯·刘易斯的概念的实用主义、查尔斯·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和珀西·W.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刘易斯运用实用主义观点着重讨论了逻辑问题。他认为原始经验是杂乱无章的，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将之系统化地构造成为科学对象，但在此系统化过程中必须遵守逻辑规则。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关于符号（或指号）的一般理论的符号学（或指号学）；一是关于价值的一般理论的价值学。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莫里斯还把指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3 个部分，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各只强调符号过程的某一方面，而他则把这 3 个方面合成一体。”[2]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强调逻辑分析不同，而强调操作分析。他将操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操作，即实验室的操作；一种是广义的操作，即除实验操作之外，还包括非仪器操作，主要指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活动。在布里奇曼看来，任何不与操作相联系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超出操作活动范围之外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创始于 30 年代、与分析哲学有一定联

---

① 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正文第 8 页。

② 同上书，编者引言第 5 页。

系的哲学流派——普通语义学，曾一度广泛流行。它强调把语言哲学的某些原理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

除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两个主要流派外，罗斯福时代美国哲学界还出现过艾尔弗雷德·N. 怀特黑德的过程哲学。它认为万物皆流变，而且这种流变是持续的；这种持续不是循环，而是新生事物产生的过程。其次，这一时期一度流行过自然主义哲学。从总的倾向来说，自然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哲学的传统，与实在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认为原则上一切现象都能够根据自然原因或原则予以解释；认识上的断定只有通过科学的逻辑经验方法才能确立，这种科学方法不应看作是一种神秘的过程，而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思想活动的继续。它适用于对一切存在事物的研究，其中包括意识和社会现象。当时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有罗伊·W·塞拉斯、莫里斯·柯恩和欧内斯特·内格尔等，也有人认为杜威亦属此派。在 30 年代，自然主义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和乔治·桑塔亚纳批判实在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到 40 年代，随着实用主义和批判实在主义的衰落，年轻一代自然主义者逐渐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30 年代也很流行，但只是在共产党人和一些同情共产主义的进步人士中间，没有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经济学〕　罗斯福时代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是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的。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经济学受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影响极深，鼓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但是，当 19 世纪末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前夜，这种经济学就日益失去人心，出现一些叛逆者；他们起而反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

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1]，而且以他们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影响着公共舆论。这种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虽不断受到老派经济学人的抵制，但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新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迅速加快。到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反对旧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于知识的、社会学的和地理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反古典经济学的新经济学流派纷陈，其中带头的一个强有力学派，人称制度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创建于20世纪初并流行至30年代中，但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活动在整个罗斯福时代都具有影响。这个学派的首要人物是索尔斯坦·维布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当然他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他的确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企业的前提是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品不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出售并得到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制订和执行法律，从事军事、警务、外交等活动，主要涉及企业关系，即金钱上的利害关系；创作文艺主要是迎合资产者的需要。他不讳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制度必然和新的社会生活条件发生冲突，“机械操作”和“获取利润的投资”之间发生矛盾。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非自然的、不均衡的、不和谐的。维布伦还对资本主义商业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说它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引起了萧条。他称金融资本巨头为“有闲阶级”，是发展现代工业的

---

① 比如，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中，有一批年轻的创建人如亨利·C·亚当斯、约翰·B·克拉克、里查德·T·伊利、埃德蒙·J·詹姆斯等。他们在德国学习时就意识到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并在美国经济学会建会的原则宣言中指出：我们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积极扶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该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弗朗西斯·A·沃尔克虽反对社会主义，但也反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

障碍；他们和大公司一道，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他们彼此间斗争也十分残酷。

“但是，他最坚持而有效的攻击，是对准古典正统学说的；这种学说具有牛顿思想的静态平衡的偏见，可笑的泛灵论和享乐主义的心理学，资料的正规化，和经济变迁的神学观点。”①

维布伦虽无直接门徒，但他的思想通过克拉伦斯·E·艾尔斯对罗斯福时代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艾尔斯最重要著作《经济进步理论》成为维布伦那一代和战后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韦斯利·C·米切尔是制度学派3巨头的2号人物。维布伦加强了他对抽象理论的厌恶，并形成作为经济行动过程的商业周期的视野，和他重建经济学心理学基础的动力。1920年，他成为全国经济研究局第一任局长。后来，该局的许多出版物成为20世纪美国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主要实证资料。他参加过当代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调查。他对智力能对“社会工程”作出贡献的信念，反映了杜威工具主义哲学的影响。

约翰·R·康芒斯是制度学派的第3号人物。他是著名劳工史学家、非常成功的政策制订者和社会科学理论家。他一方面研究劳工史，一方面指挥文官制度改革、公用事业管理、失业保险和小额贷款的调查，并在调查中充分注意既得利益的问题。他的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后来体现在威斯康星州的立法之中，使该州成为经济、社会事务的实验室，并为联邦和其他州立法工作所广泛仿效。“新政”期间，他的一些学生对这类立法作出了显著贡献。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1934）对

---

① 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80，第1卷，第477页。

正统经济学作了补充。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太局限于牛顿学说和个人主义。而他则强调团体行动的作用，或“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

整个说来，制度学派的居于首位的维布伦虽未能提供代替传统学说的进一步的学说，但米切尔和康芒斯确实对应用经济学的范围、方法、实证材料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他们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学的不断攻击，使人们对马歇尔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日益失去了兴趣。

罗斯福时代反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经济学派，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我们在第5章最后一节中曾对之有所论述，并且提到，罗斯福本人开始是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但他的政府中却有些人相信。凯恩斯的思想不仅鼓舞了经济干预论的提倡者，而且刺激了经济学家从政的需要。这种趋势在“新政”期间日益加强，到1946年根据就业法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更表明：就制订政策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使职业经济学家成为掌权人。

当时，美国宣传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经济学家，是阿尔文·汉森。原来，他是支持萨伊定律而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后，从1937年他在哈佛大学起，他逐渐改变了看法。通过他的财政政策讲习课和《是完全复兴还是停滞?》（1938）、《财政政策与商业周期》（1941）、《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1947）等书，在使凯恩斯主义成为战后职业经济学正统学说方面，他出力最多。

另外，美国有些经济学家虽未受凯恩斯影响，却也主张在萧条时期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购买者收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威廉·T·福斯特和沃迪尔·卡钦斯。

尽管从30年代后期起，凯恩斯主义已无疑成为美国经济学

和经济政策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同于甚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流派。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芝加哥学派。早期芝加哥学派虽然在萧条时期有某些与凯恩斯主义类似言论，但总的来说，它是与凯恩斯思想背道而驰的。它主要是一个倡导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形成的学派。30 年代它的 3 位主要代表人物中，雅各布·瓦伊纳的经济思想完全与罗斯福的观点相冲突；弗兰克·赖特怀疑对早期“新政”具有影响的制度学派的思想，而且敌视“新政”式社会改革建议，使人们往往把他和 60 年代坚决反对“新政”传统的后芝加哥学派首要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联系起来；亨利·西蒙斯是一个主张公民充分自由权的学者，赞成将扩大货币发行量作为克服萧条的政策，但是反对随意性经济干预。”①

此外还应一提的是，罗斯福时代产生了计量经济学。它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把可计量的复杂现象抽象化为为数不多的变量。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关于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结合成单一方程式或联立方程组，用以表示现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或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

〔政治学〕　在美国政治学发展史上，1921 至 1945 年常被称为关于科学主义争论的时期。19 世纪末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流行，以约翰·W. 伯吉斯和阿瑟·F·本特利为首的少数政治学家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到本世纪 20 年代初，科学主义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界形成一股潮流，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查尔斯·梅里亚姆。1921 年，梅里亚姆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美国政治研究的现状”一文，力主采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方法及成果

① 参阅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 481 页。

以改革政治学研究。1925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未来美国政治学将以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年，他发表《政治的新局面》一书，提出用科学方法分析政治现象，建成新政治科学。他认为以往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能够发现并提出许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要经过精确的资料计量和检验，其所需要采用的方法，就是统计学和心理学分析。

梅里亚姆认为新政治科学运动将促使人类明智地控制政府机构的运转过程，从而消除政治行为中的浪费，减少或者消除各种动乱因素。

和梅里亚姆一起提倡新政治科学的代表人物中，威廉·芒罗强调发掘政治行为的基本法则、即所有现象的最一般的形式的可能性；认为如果政治学家放弃同哲学家的密切联系，采取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就能清楚地发现这些法则。乔治·卡特林认为政治学只关心手段，不关心目的，可能成为一种可加预测的科学。他还认为像经济学研究抽象的经济人一样，政治学可以研究抽象的政治人；政治学应研究权力，政治舞台可看作权力市场。

梅里亚姆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和他的同事及学生哈罗德·拉斯韦尔、斯图亚特·A·赖斯和昆西·赖特等人形成一个芝加哥学派。在罗斯福时代，梅里亚姆发表的重要著作有《政治力量：它的构成和影响》（1934）、《政治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1936）、《政治学导论》（1939）、《什么是民主》（1941）、《公开和隐蔽的政府》（1944）和《系统政治学》（1945）。除赖斯的《政治学的计量法》出版于1928年以外，拉斯韦尔和赖特的主要著作，都是30、40年代发表的。

梅里亚姆等倡导的政治学科学化主张提出以后，美国也有不少政治学家表示反对。因此，新政治科学运动虽然为行为主义政

治学[1] 奠定了基础，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全盛时期，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反对政治学科学化的政治学家中，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比尔德、爱德华·S·科温等人。他们对于政治学研究追求客观性、采用量化方法、寻找规律和法则等主张并不反对，但他们对政治学研究不关心道德和价值观的主张很反感，认为离开了道德目标，政治学研究就不会有伟大的创造性；而且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作为政治学家也是历史学家的比尔德，更强调历史研究法是通向人类心灵的惟一途径，人只能根据过去以推测未来。

政治学界这场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在罗斯福时代达到了高潮。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除上述经验取向的政治学研究外，"在本世纪的大部分年代中，政治哲学主要是靠吃老本……。例如……被称为'政治理论'的东西，几乎全部是为以前的政治哲学家作注解。"[2]

这里，我们简要谈谈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政治哲学是怎样吃老本的。不过，"吃老本"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沿着19世纪后期以来皈依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们的足迹，进一步放弃自由放任主义，更坚定地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明确承认政府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比如，查尔斯·比尔德在30年代初发现有些经济巨头利用粗朴的个人主义这个名词"作为借口以回避自己责任、将目前萧条归罪于政府干

---

① 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研究投票行为、选举及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国际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

②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69页。

预、并企图逃脱对自己不利的某些税收和管理规则”时，他不是一般地批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而是举出19世纪后期以来的15个具体事例，说明政府干预是时势使然；企业界并非反对政府干预，只是反对对它们不利的干预；而且，只要对它们有利，即使违反它们口头宣扬的个人主义信条，它们也要求政府干预。他还坦率地指出，到30年代初，英、美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并不真正相信他们自己的信条。英国自由党人投票主张实行失业救济的原因，要么是他们背叛自己信仰，要么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让失业者挨饿，他们可能有一天会被钉死在灯架上。美国宣扬粗朴的个人主义的企业家，也并不主张让事态自然发展，却同意赡养饥民。看起来，他们对粗朴的个人主义的信仰正在动摇，或者是他们坚持个人主义的勇气，赶不上他们维护个人主义的愿望。

比尔德还进一步分析了粗朴的个人主义者上述自欺欺人行为的原因。他说，粗朴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在英国发展工业初期，在我国披荆斩棘、开荒垦殖时期，个人主义是推动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喧嚷个人主义的人们的心中，剥去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藻，这种信条意味着获得金钱；仅此而已，岂有他哉！而且，我们城市所蒙大部分羞辱，和玷污我们联邦政府的大多数丑闻，都可以归因于这一信条。……”因此，不管这种信条在原始农业与工业时期起过多大作用，它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它曾经有用过，今天却成为社会的威胁。[①]

粗朴的个人主义这一信条，在美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

---

① 参阅查尔斯·比尔德：“粗朴的美国个人主义的神话”，转引自霍华德·津恩编：《新政思想》，第1—10页。

源，是维护自由放任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比尔德对它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应该说他在推进“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政治哲学方面，比起前人来更为鞭辟入里。

约翰·杜威在“自由主义的前途”一文中[①]，也通过历史主义地分析自由主义，对这种政治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自由主义是美国另一种强有力的维护自由放任主义的社会思潮。杜威认为这种传统的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时，应让位于支持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主义。他分析道，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英国的自由主义是反抗寡头政府的，这以后的英国自由主义是反对政府对经济冒险事业自由的限制的。这两种自由主义都认为政府行为与人们所希翼的自由互相对立。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在美国殖民地反英时期和拓殖时期，不独得到坚持，而且加强了。19世纪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又将自然法的概念加到了天赋权利之上，认为社会事务中像物质世界一样，也有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的性质是经济的，而政治上的法律则是人为的、因而是虚假的。这样，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便被认为是违反了个人固有的自由和自然法则（供求律即其一例）。

杜威认为，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在18、19世纪对促进社会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但它有个根本性缺点，就是没有历史相对性的观念。它把个人看成是某种既定事物，其本身是圆满的；把自由看成是个人已有事物，为使它自我表现，只需除去外部限制就可以了。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哲学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哲学中，这些关于个人与自由的特殊思想被确认为是绝对的、永久的真理，适用于任何时空。

---

① 此文载美国《哲学杂志》1935年第22卷第9期，第225—230页。

杜威认为这种否认历史相对性的绝对主义，是早期自由主义容易堕落为假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他用1934年成立的自由同盟和前总统胡佛提出的社会思想来说明这种假自由主义，认为他们宣扬的一些言词，虽然和少数人用来反抗压迫措施所用言词相同，但意义则迥异；原来用于促进社会变革的思想，当他们被用来阻止进一步社会变革时，就走了样。这就证明早期自由主义将它们思想看作具有绝对性和永久性是有害的。没落的自由派就因此坚持用自由放任主义来表达自然秩序本身。其结果是贬损了个性的概念，使得许多自己正为一种更博大而充分的个性发展作斗争的人们，却将个人主义看作一种表示鄙视与谴责之词；与此同时，许多人对于企业界无限制地使用自由一词造成的罪恶，除用暴力进行变革以外，看不到纠正的可能性。这种将自由等同于个人与政府互相对立的历史趋势已酿成恶果。它产生于专制政府时期，却在政府已非专制政府而且在理论上成为人民仆人的时期，仍然影响着人们，使其按照个人与政府互相对立的原则思维和行动。

杜威认为，这种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是错误的。剥离了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不是现成的、固定的，而是在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养成的。它也认识到，社会条件可能限制、扭曲、甚至阻抑个性的发展，因此很注意影响粗朴的个人成长的社会制度的运行。其次，这种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与自由的内容是随着时间变迁的；时间变了、社会变了，新的个人需要新的自由；为了获得这种新的自由，就要进行实验。

以上的论述表明，杜威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个人需要的自由，不再是对企业界的自由放任，不再等同于个人与政府的相互对立。杜威的这种理论，不独使罗斯福时代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自由主义，而且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哲学作出了贡献。

除比尔德和杜威以外，瑟曼·阿诺德、罗伯特、麦基弗、沃尔特·李普曼等人也对“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福利国家”的政治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如亨利·康马杰所说，罗斯福时代像美国历史上有些时代一样，“主要的政治哲学家一直都是政治活动家而不是著名学者或学会会员。”① 他认为罗斯福是当时主要政治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曾4次得到美国大多数人民投票认可，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承认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相互依存关系，竟然将不虞匮乏自由和免于恐惧自由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列于同等庄严地位。

〔法学〕　在罗斯福时代，法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没落，社会学法学跃居法学的支配地位。

亨利·康马杰说，美国“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把它那牛顿学说的特点保持得最久；它极其成功地抵制了进化论和经济现实主义的影响。它那学术上的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晚至30年代中期，联邦法院法官麦克雷诺兹还断言对资金和通货行使最高权力就是违反自然法。……

“自然法的一些概念具有的力量和韧劲是美国学术史上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个现成的法学体系最适合于把统治权限制到只能发挥消极作用、把财产权提高到和人权处于同等地位或赋予现行处理经济问题的习惯做法以实行法律制裁之权。”② 这种法学上的保守主义使得美国人的司法制度简直成为一种宗教，在制定政策时以宪法上的考虑取代政治上的考虑，在判断立法时根据抽象的法治标准而不是根据明智而有益的实用主义标准。

---

① 亨利·S·康马杰：《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509页。

② 亨利·S·康马杰：前引书，第529—530页。

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法学虽让位于历史法学，但这种转变不是质的转变，因为历史法学像自然法学一样，认为法是发现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历史法学也躲在一些抽象的概念里，不过他们的抽象概念是关于社会、习惯和历史的抽象概念，不是自然法学的宇宙作用的抽象概念。

历史法学取得支配地位后，由于需要渊博的历史知识，使得法学日益成为法学家的禁脔，日益专业化而缺少人道主义精神，脱离人民群众与现实生活。它和自然法学传统一道，使得美国法学界长达半世纪之久沉湎于机械法学的幻想之中，一旦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事实同法学的理论与假设发生冲突，事实必须给理论和假设让路。这样，美国政府里必须面对和处理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立法和行政部门与受机械法学支配的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便日益紧张，使得政治变革与政治实验几乎陷于停顿。

“关于法院行使这种特权的问题，对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熟悉188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的法院案卷，就不可能产生怀疑。在长达40到50年期间，政治战场上到处是被司法之剑砍倒的社会福利法的尸体。其间的情况人们非常熟悉，无须详细重述。”①

这种不顾社会经济情况变化的机械法学，是不可能不引起实事求是的法学家们的反对的，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奥利弗·W·霍姆斯。他在1881年出版的《习惯法》中就宣称法律的生命不是推理而是经验，任何法律理论的首先要求是适应社会的发展，达到某种社会目的。后来，在1882至1932年州和联邦最高法院的长期法官生涯中，他一直实践这种新的、持异议的法学理论，他写的判决意见都是维护联邦权力、立法实验和个人自由的重大原则的。总之，他是社会学法学的先驱。

---

① 亨利·S·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第546页。

继霍姆斯而起的是罗斯科·庞德。从1910到1947年，他一直在哈佛大学从事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法学的思想，写出了美国版本的社会学法学。他认为上个世纪是从理论方面研究法律，现在是坚持将社会学的研究同法律的研究联系起来为立法作准备；上个世纪认为比较法学是从事明智的立法工作的最佳基础，现在法学界认为还必须更多研究法律的社会作用及法律的应用效果。

社会学法学不只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还具有实质性内容。它认为法律的真理是能通过经验找到的、是相对的和可以创造的；最好的法律是为实用而制定的，是能充分为社会服务的；法律要依靠社会，而不能脱离社会；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和实施，可以继续不断地改进，是社会工程学的一个恰当课题；法律既关心个人利益，也关心集体的社会利益；对于个人自由，除非是作为更大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自由的一部分，法律不能予以保护。社会学法学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法律的基本原理，适合于城市体制的社会生活的实际、工业体制的经济生活的实际和平等主义体制的政治生活的实际。”①

庞德虽非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但他创造了、特别是在法律界创造了一种有利于接受社会学理论的舆论气氛。这种气氛不独使法学界在一代人之久的时间内，主要是阐述庞德的见解，也使社会学法学的影响更深地渗入司法界。比如，霍姆斯在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时，虽然按照社会学法学原理写判词，但他的意见往往只是少数派意见，不一定能成为判例。经过庞德造成的这种气氛，再加上路易斯·布兰代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及其门徒们的大力支持，社会学法学在1937年罗斯福总统与联邦最高法院

---

①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第560页。

那场重大斗争之后，实际上已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理论。

〔社会学〕　在1945年出版的《20世纪社会学》一书中，罗伯特·法里斯简述了到当时为止的美国社会学发展史。[①] 他指出，从2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这25年，是美国社会学领域标准化的时期。1921年出版的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的《社会学导论》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社会的相互作用、交流、社会过程、竞争、冲突、同化、适应、人格、集体行为等概念，都是通过此书获得其社会学意义的；后来的大多数社会学教科书，都深受此书的影响；它各章提出的研究课题，为许多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指出了方向。

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其一般特色的同时，由于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由于美国社会学一开始便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出现某些特殊的研究方向。现择要简述如下。

城市生态研究。　美国大工业城市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增长较快。比如芝加哥自1837年设市以来不到100年，人口便达300万。同时，美国城市成长受传统与宗教影响极小，其建立模式几完全由世俗生活、特别是对具有商业价值的空间的竞争所决定。因此，在美国较容易探索城市成长规律和城市化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芝加哥大学以社会学系为首的各社会科学系积累了关于芝加哥市的大量基本资料，可以对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有益的研究。他们运用城市生态研究法作出显著成绩的，是关于犯罪（包括青少年犯罪）、家庭解体、自杀、精神失常、政治混乱以及与人口动态统计相联系的事件的研究。

种族与文化关系。　美国是一个由外来移民开拓建设而成的

---

① 罗伯特·法里斯："美国社会学"，乔治·吉尔维奇和威尔伯特·穆尔编：《20世纪社会学》，纽约：哲学书屋，1945，第538—561页。

国家，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域，其种族构成复杂，背景迥异，因此难以同化，到罗斯福时代仍是个全国性重大问题。除各方关心外，特别需要社会学进行客观的研究。

社会学对种族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包括：描绘与阐释移民迁移、适应、同化过程，敌对与冲突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活动。这种研究范围很广泛，不仅包括国内各地区甚至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的种族关系的研究，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种族关系的研究。其最重要成果是1937年发起的对美国黑人问题进行的全面研究。为避免偏见影响，这个研究由瑞典学者贡纳尔·米达尔领导。1944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美国的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政治》。

社会心理学。　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生理反应，而不是人类行为，因此对社会学关系不密切。不过，它虽主要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却孕育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并对社会学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对此作出最大贡献的学者有杜威、乔治·米德、查尔斯·库利和埃尔斯沃思·法里斯。他们将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连结起来，使得早年以生物决定论为基础研究人类行为的企图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从观察人类婴儿的可塑性和多变性开始，他们指出心灵特征和人格是怎样在社会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而证实：因为人是在社会集团中生活的，所以人是一种社会存在。

地区主义社会学。　霍华德·奥德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发展了一种地区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出版了《美国南部地区》一书。它研究的地区大于州；具有鲜明的地理、经济与文化特色，很容易彼此区别。其他大学也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但大多数是南部各州的大学；而且由于南部在经济组织、文化生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到罗斯福时代还保持着许多与美国其余地区不

同之处，可以想象，南部社会学家对地区主义最敏感，并对发展这种社会学最感兴趣。然而，这种社会学的出版物，有时并不客观，带有地区的情绪。

农业社会学。　农业社会学不是从对社会的科学调查中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一种精心筹划的、使农民得益的收买活动。国会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无疑是为了农民的选票。其结果，或者是赠与土地，或者是向农学院提供资金以发展与农村生活福利有关的社会学教学与科学研究。这样，美国农业社会学的教授，就比任何其他社会学分支的教授为多。不过，农业社会学所作贡献，是赶不上它所耗经费和所雇教授人数的。

变革社会学。　美国社会学工作者特别重视技术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关于这方面最大量的研究工作，是威廉·F.奥格本进行的，或由他鼓动起来的。他的《社会变迁》一书，自1922年出版以后，直至整个罗斯福时代，都是社会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奥格本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称为文化；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一般说，往往是物质文化变迁引起非物质文化变迁，但非物质文化也可反过来引起物质文化变迁。当物质文化变迁以后，如果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不随着变迁，就会出现文化脱节现象，使社会失调。反之亦然。

在罗斯福时代，社会学为加强自己的科学性，在方法论上做了很多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是，据日益增多的社会学家看法，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是计量法。这个方法从20年代中期起20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长足发展。美国有一批热心人认为，到40年代，已经是建立计量社会学的时候。第一个为计量社会学勾划出体系的人，是斯图亚特·C.多德。他在1942年出版了《社会的范围》一书。

〔人类学〕　　20世纪早期，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人类学

家弗朗茨·博亚斯，由于他在美国博物学博物馆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由于他对当时流行的文化、语言、体质人类学的系统批判，他在美国人类学界占有支配地位，他的著作为美国关于种族与文化决定论的现代人类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他怀疑传统人类学的一些范畴，主张相对论式的历史观点；他不大愿意进行理论概括，强调实证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人类学研究许多是博亚斯的学生进行的。当他们早年主要研究西部保留地内的残余部落时，他们被称为美国历史学派。他们研究的中心内容，是文化要素的地理分布与历史传播。罗伯特·洛伊和莱斯利·施皮尔的著作，以及克拉克·威斯勒和 A.L. 克罗伯的文化区域概念，是这些研究的范例；而其最优秀成果，则是克罗伯的《北美土著的文化与自然区域》(1939)。可是，当20年代晚期大学人类学系成为主要研究机构，而且现场调查方法开始受到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利诺夫斯基的影响时，从博亚斯传统中产生了其他研究方向。一方面有以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1934) 为代表的整体文化的综合研究，和玛格丽特·米德等人作出重要贡献的文化与人格相关发展的研究；另一方面有日益强调土著民族文化适应性的研究，这方面代表人物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

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所有人类学家，包括与博亚斯关系不大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拉尔夫·林顿在内，都是强调文化概念的。不过在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出现了一种与社会学结合的研究倾向。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从1931至1937年在那里任教。雷德菲尔德从1934年起也一直任职于芝加哥大学。他是这方面的著名领袖，既是人类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通过他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成功地将这两门学科的系统知识糅合在一起了。

〔历史学〕　苏联史学家指出，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开始反对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理论”和“地区论”，到20—30年代就越离越远了；取代特勒历史学说的，是以查尔斯·比尔德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①]。美国史学家约翰·海厄姆也认为比尔德学说在罗斯福时代占美国史学支配地位，但说法不同。他认为特纳和比尔德的史学都属于进步主义史学。这个学派产生于进步时代，强调历史的社会、经济方向，重视美国争取民主的斗争过程，致力于社会变革和进步[②]。该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居美国史学的支配地位。从一开始，它就认为史学内容应像生活本身一样宽广，不能像此前“科学史学”那样主要只研究政治史或立足于宪法的制度史。因此，这一时期发表的极少数政治史书籍，比如约翰·希克斯的《平民党人的起义》（1931）和霍华德·比尔的《决定性的年代》（1930）都着重写政治行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经济史著作大多是经济学家写的；史学家虽忙于对历史作经济解释，但他们却无意写经济史。

1931年美国历史学会召开的两次关于美国史研究的规划会议，加强了进步史学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要求。两次会议都确定：美国史研究最迫切的任务，是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政治、军事和宪法的研究以外。它们的具体建议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小册子《美国的历史学：急需与机会》中。

进步主义史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不断扩大“人民”这一概念。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史学史中的“普通人”乃是一

---

①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下册，第1177—1183页。

② 参阅约翰·海厄姆：《美国专业史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第171—183页。

个抽象的形象；除了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典型以外，几乎看不见。这种典型形象不能展示美国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是美国人民光荣之一的多样化形象。到20、30年代，许多年轻学者深深受到不同环境中各种特殊集团具体经历的吸引，往往设身处地地写起自耕农、契约奴、牛仔、传教士、印第安人和移民来。这样，进步史学工作者就把美国人民丰富的形象具体化了。

进步史学工作者还反对战争年代那种十足的美国主义，引起了研究美国社会中各种宗教与民族集团的兴趣①。首批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中西部深受特纳影响的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W·斯威特。他将主要新教集团和政治与社会势力联系起来，修订了旧时以教派为中心的"教会史"。他的所有著作，包括受到广泛阅读的《美国宗教史》（1931）在内，都特别强调边疆的民主化影响。

与这些史学家扩大美国历史基础的同时，另一些史学家正对美国整体历史进行新的综合。这类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派首要代表查尔斯·比尔德和他夫人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一书。比尔德1913年发表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已使他对美国史学具有重大影响。到此书出世，更奠定了他在罗斯福时代美国史学界领导地位②。

比尔德虽然承认自己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的保守派史学家甚至称其学说为"马克思学派"，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美国文明的兴起》的价值在于："它大大拓宽了传统历史著作的狭窄的视角，把文化史看成是整个社会

---

① 但还未引起研究黑人的兴趣。

② 当然，奠定比尔德在史学界领导地位的，还不只是这本巨著。在1948年逝世前，他一共写出300多篇论文，出版过60部著作。

生活的历史，力图展现文明这个‘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全貌……’……是对学院式的历史著作的一个突破，出版后对读者产生巨大吸引力，一再重版并增订。在比尔德逝世以后，有的美国报刊曾投票推选这部书为阐释美国民主制的最佳著作。”① 它“描绘了美国历史全部过程中一种不断更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占支配地位的少数企业人员和他们的各种对手特别是英国统治阶级、美国农民和工人以及南部种植园主之间进行的。从这种观点看，杰克逊民主就成为农民和工人的反叛，而内战就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北部企业人员把种植园主贵族赶下了台。比尔德在写这些历史时，对那些被击败的集团没有表示遗憾。他赞美那种由获取与钻研精神引起的勇敢事业与技术革新，并说明每一次动乱——作为因或果——都使民主政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比尔德将许多教育、文化、社会活动和这些政治与经济力量联系起来……详细阐述科学与现世价值的进步，而且只要可能，就力求将物质的和理想的现象紧密联系起来。”②

除比尔德外，其他对美国史进行综合研究的较著名进步主义史学家，还有阿瑟·M.施莱辛格和弗农·L.帕林顿。施莱辛格和狄克逊·R·福克斯合编的《美国生活史》（13卷，1927—1943），有意识地贬低了美国历史中的政治因素，全面考察了触及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各种事态和影响。帕林顿的《美国思想的主流》（3卷本，1927，1930）把美国思潮系统地纳入经济背景之中。他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但他坚持认为：美国思想的伟大传统是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只有开口不离激进思想的人才最有美国

---

① 罗荣渠："略谈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史学著作"，第4页。载《美国文明的兴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约翰·海厄姆：《美国专业史学》，第193—194页。

味。他所重视的是美国“自己固执的讲实际的激进主义”，亦即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认为，“只要恰当地阅读杰斐逊和埃默森[①] 的书，就会明白这两个人的思想比他们可能从国外引进的任何思想都适于解决20世纪美国的各种问题。”[②]

正当这些进步主义史学家着力描绘美国的进步历史画图时，美国进步的道路上不幸多歧，特别是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使得一部分美国史学家放弃了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他们往往被称为修正派。首先，他们重新审查了进步史学家关于独立战争和内战的学说。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并不像比尔德说的是争夺经济利益的长期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是要求独立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大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独立战争的爆发乃是偶然的，是英国政府犯错误的“悲惨”结果。这个学派中的一些最保守的史学家，还公开抨击进步主义史学关于内战的观点；他们否定内战有任何积极成果，并宣扬“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查尔斯·拉姆斯德尔、詹姆斯·G·兰德尔和艾弗里·克雷文等人，将奴隶制解释为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分析北部和南部的经济矛盾，将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归结为生活方式、伦理和思想意识范围内的冲突。他们企图宣扬这样一种思想：平稳的进化会导致和平地废除奴隶制，而内战造成的问题却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此外，罗斯福时代还出现过另一个保守的历史学派——企业学派。这个学派导源于20年代成立的企业史学会。它公开宣称历史科学有为企业界需要服务的使命，编写了一些大肆吹捧垄断资本家和垄断组织的著作，比如阿伦·内文斯的《1784—1934年

---

① 拉尔夫·W·埃默森（1803—1882）是美国哲学家、诗人、评论家。

②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第441页。

纽约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历史》(1934)、《约翰·洛克菲勒：美国企业的英雄年代》（两卷本，1940）和N·格拉斯、亨里埃塔·拉森合著的《美国企业史汇编》(1939)。

更耐人寻味的是，由于30年代国内外的风云变幻，比尔德自己也逐渐淡化了经济决定论，转而皈依多元史观和历史的相对主义。他开始探索美国文明的内在精神。1934年，他在《国家利益观》中第一次试图说明什么是整体的"国家利益"。1935年，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再版前言中说，他只是认为：在社会的巨大转变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基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但他并未说过或写过"所有的历史"可以用经济关系加以说明。1939年，他宣称像自然界中电闪先于雷鸣一样，人世事务中，思想的光辉常先于人类社会变迁[①]。1942年，他又出版了《美国精神》一书，作为《美国文明的兴起》的补充，此书描述美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的动力，显示文明的内在本质而不是外形。1943年，他在《共和国》一书中，大谈特谈宪法的伟大思想，而对制宪者的经济利益几乎不提了。1945年，他在早日出版的《政治的经济基础》中又加了一章，在对经济观点的再考虑一节中说，"我们当然可以采用这样的公式，如'经济居先并且决定政治'，但是……这种公式是站不住脚的。"[②]

比尔德不独从经济史观转变为多元史观，他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

---

① 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美国在半道上》，纽约：麦克米伦，第2卷，第860页。

② 转引自李世洞："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第39页。

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①] 他甚至认为，"倘若人类发现揭开他们全部历史的法则，人类就会关进自己智慧的囚牢，毫无办法把它改变，就会发现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成了超乎人类的选择和意志之上的定案。"[②]

但是，从总的情况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毫无疑问，即使有多种不同宗派，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仍然公开地忠于进步主义史学观点。他们中大多数人明白无误地坚持进步的基本信念……大多数人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现实主义的'解释；许多人仍然将社会视为自然之流的巨大的延伸。"[③] 而且，40 年代初还出版了两种研究美国思想史的重要的进步主义史学书籍：拉尔夫·加布里埃尔的《美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历程》（1940）和默尔·柯蒂的《美国思想的成长》(1943)。

还应提到的是，在罗斯福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取得比较显著进展。这些史学家注意探索和论述美国社会发展规律，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没落性，阐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Z·福斯特的主要史学著作虽然出现于战后，但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从布赖恩到斯大林》（1937）、《工人生活片断》（1939）和《劳工与战争》（1942）等书。其他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还有安娜·罗彻斯特的《劳工和煤矿》（1931）、《美国的统治者：金融资本的研究》(1936）和《美国平民党运动》（1943），詹姆斯·艾伦的《美国黑人问题》（1936）、《黑人的解放》（1938），《重建、争取民主的战斗》（1937），安东尼·宾巴的《美国工人阶级史》（1934），赫伯

①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第 448 页。

②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第 448 页。

③ 约翰·海厄姆：《美国专业史学》，第 209 页。

特·莫雷斯的《18世纪的美国自然神教》(1934)和《为美国自由而斗争》(1944),赫伯特·阿普特克的《内战中的黑人》(1938)、《1526—1860年间美国黑奴的起义》(1939)和《美国革命中的黑人》(1945)等。

六、文学艺术的新阶段

怀疑、迷惘、悲观和离经叛道,是20年代美国文艺的基调。到罗斯福时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和30年代的大萧条、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涨、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分不开的。

以文学而言,美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认为,"3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愤怒与怜悯——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浪费了资源、瘫痪了精力、腐化了人民的心灵的经济,他们怜悯的则是这一经济制度下的牺牲者。"[①] 苏联史学家认为,30年代"危机所引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涨,吸引了大批作家直接参加到无产阶级保卫自身权利的运动中去。所有这一切在颇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文学中的力量对比,在美国文学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②] 我国学者说,"30年代虽以左翼文学为主流,但并不能一统美国文学的天下。"[③]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文学队伍逐渐瓦解。大体上说,反法西斯主义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

从艺术方面看,情形似稍有不同,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但真正取得重要成就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流派。

---

① 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第367页。

②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下册,第930页。

③ 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下册,第6页。

〔左翼文学运动〕　美国文学界被广泛吸引入左翼运动的过程，是从1929年10月第一批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建立开始的。这种俱乐部致力于阐释、宣传和实行革命文艺的原则和义务，到1932年已有13个，出版6份地方杂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成员代表会议。到1934年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出席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1,200名成员。1935年改组为美国作家联盟，30年代后期召开了4次美国作家大会，影响日益扩大。1937年第二次大会时，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一些美国第一流作家也参加了。

左翼作家的活动阵地，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群众》杂志。1935年，它发行25，000份，1936年12月一期特刊发行达10万份。迈克尔·戈尔德等编的《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一书于1935年出版，它收入了63位美国作家[①]的散文、诗歌、报道、剧本和文学评论。由此可见，当时美国左翼文学具有相当的声势。

小说。　20年代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西奥多·德莱塞在30年代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向知识分子发出了渗透着高尔基式的热情号召：和群众团结起来，参加他们争取树立较好较公道的制度的斗争。30年代他虽因积极参加政治、社会活动，没有再写出像《美国的悲剧》那样的小说，但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所说，他开了30年代左翼小说的风气。

30年代最有成就的左翼小说家，当推约翰·斯坦贝克、约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法雷尔和厄斯金·考德威尔等人。斯坦贝克最优秀小说大都发表在30年代。“从这些作品看，他的同情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者、被奴役者和受害者一边。……

① 不过，到30年代末，这些作家一半以上回到了资产阶级文学的怀抱。

“斯坦贝克最优秀的作品富于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诗意美。他……让自己眷恋大自然的感情流动在字里行间，形成一种亲切自然、清新可喜的艺术风格。

“30年代末，斯坦贝克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扩大了视野，满怀激情地写出了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破产农民团结斗争的史诗。”①

斯坦贝克第一部受欢迎小说是《煎饼坪》(1935)，描写流浪汉之间的友谊和他们幽默、乐观、单纯的性格，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第二部是《人与鼠》(1937)，描写劳动人民的梦想、他们之间真挚动人的友谊以及他们悲惨的命运。他最有影响的小说，则是1939年发表的《愤怒的葡萄》。它以大萧条期间大批农民的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描写俄克拉何马州一家农民祖孙三代向西逃荒的故事。它出色地表现了处于绝境的流浪农业工人的善良本性，和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怒火。小说出版后，引起各州统治者的恐慌，发动他们的宣传机构力图抹杀小说的成就，并禁止小说发行，有的御用文人还写了《快乐的葡萄》这类书籍来抵制它的影响。但是，现实主义文学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愤怒的葡萄》在俄克拉何马州发行量就超过了最畅销小说《飘》，进步评论界认为它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中最重要作品之一。1962年，斯坦贝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也是得力于这部小说。

多斯·帕索斯在20年代初具有“迷惘的一代”的反战倾向，但后来的作品中日益增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1926年，他参加《新群众》杂志的编辑委员会，1932年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对左翼文学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1930)、《1919年》(1932)和《巨富》

① 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243—244页。

(1936)。这部小说规模庞大，从美国国内写到国外，反映了世纪初到大萧条这30年左右美国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书中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不过，它主要写的是个人在各方面失败；比起作者以往类似小说来，表现出更深刻的愤怒和失望。英国的美国文学史作者马库斯·坎利夫说："这本书狠狠地告了美国一状。假如多斯·帕索斯只是提出问题，骂骂资本家，然后描绘一通工人天堂的远景便算了事，那么，这本书到今天也许就不值一读了。可是，……结尾时，他反而写了一个无名的流浪者，……一个普通人，他在一条什么地方都到不了的公路上伸出大拇指，想搭一辆便车。"①

这本书不独内容包罗万象，体裁也有所创新，它利用了新闻短片、传记和摄影机镜头等3种手法。

30年代末，多斯·帕索斯逐渐脱离左翼阵营，再也没有创作出具有重要影响的小说。

法雷尔像多斯·帕索斯一样，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30年代后期因与美国共产党在文艺路线上发生分歧，脱离了左翼阵营。他写的是他在其中长大的、住在芝加哥南部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后裔，代表作是《斯塔兹·洛尼根》三部曲：《少年洛尼根》(1932)、《斯塔兹·洛尼根的青年时代》(1934)和《审判日》(1935)。洛尼根小时候受过天主教家庭关于原罪的教育，亲朋都鼓励他学好，但是他在周围粗野环境影响下向坏的方向发展，染上酗酒、赌博、追逐女人等恶习；少年时已开始堕落，青年时逐渐变成一个流氓，险些入狱，后来虽遇上一个女人爱他并竭力挽救他，但他积习难改，染上重病，大萧条开始后成为无业游民，

---

① 〔英〕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中英对照本)，香港1983年版，下册，第274页。

死时仅 29 岁。

法雷尔说他的这部作品写的是“普遍的精神贫困”；并说，如果我的作品表现出憎恨，那么这种憎恨不是针对人民，而是针对使人民变成禽兽、产生精神和物质贫困的社会条件。

厄斯金·考德威尔是南部小说家，他较好短篇小说集如《跪在上升的太阳下》（1935）、《佐治亚的小伙子》（1943）与长篇小说《七月的风波》（1940），都是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它们较深刻地反映了南部的种族压迫与佃农的赤贫处境。

考德威尔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烟草路》（1932）。这部小说中尽管生物学主义因素很强烈，但它描绘出了南部农民赤贫生活感人至深的画面。1934 年，它被改编为剧本，曾在纽约舞台上演 7 年半之久。

黑人左翼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赖特。他从小生活贫穷，备受凌辱，深感自己是“弃儿”和“局外人”，对社会和周围的白人世界既恨又怕。大萧条期间靠社会救济过活，1932 年参加美国共产党。他摆脱了 20 年代黑人文艺复兴时期黑人作家的局限性，往往能用现实主义笔墨深刻揭露生活的底蕴，描绘美国大城市阴暗面，向社会提出控诉和抗议。

1938 年，赖特的中篇小说集《汤姆叔叔们的孩子们》出版，获得了声誉。1940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土生子》。这部长篇小说和他 1945 年出版的《黑孩子》一起，是描写美国城市和非城市黑人生活的两部具有永久价值的社会小说。他在小说中深入剖析黑人犯罪活动与美国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黑人的野蛮凶暴既非天性，也非民族特性，而是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社会制度造成的。总之，他将对美国社会制度愤怒的控诉体现在一个描写黑人青年犯罪故事的寓言里。小说出版后十分畅销，次年即改编成戏剧，在百老汇上演，不久又拍成电影。不仅赖特

因此书而成为最有声望的黑人小说家，许多评论家还认为此书的出版才奠定了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它不仅震动了美国文坛，也震撼了美国社会。“白人们一向认为黑人奴性十足，可以任意凌辱，现在却对黑人刮目相看，开始有了畏惧之心。”①

赖特成名后，逐渐与美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政策发生分歧，1944年退出美国共产党。

此外，左翼小说家迈克尔·戈尔德和杰克·康罗伊虽积极从事左翼文学运动，但他们的小说却具有教条气息，可读性不强。另一些20年代著名小说家30年代所写小说，也受到左翼小说影响，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希望之外》（1932）和海明威的《有的和没有的》（1937）。

戏剧。　“美国戏剧比小说更能跟着时代改变。这时（指大萧条时代），在美国小说界，弗洛伊德让位给了马克思，美国戏剧也是如此。作家们不再以个人精神上的自由为写作的主题，转而描写经济上的不公平。”② 在这些左翼剧作家中，由表现主义转入现实主义的埃尔默·赖斯和约翰·霍华德·劳森可以说是奠基者，克利福德·奥德茨、莉莲·赫尔曼、艾伯特·马尔兹、西德尼·金斯利、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等人，则是代表人物。

赖斯1923年发表的成名之作《加算机》，从社会学角度全面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对人的压迫与戕害，在国际上享有盛名；1929年发表的《街景》，描写美国社会对少数民族的压迫，真实地再现了贫民窟里小人物卑琐的日常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悲剧事件。这两个剧本虽发表于20年代，但都接近于30年代暴露性的作品。劳森20年代描写工人罢工的戏剧虽然是表现主义的，

---

① 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333—334页。

② 〔英〕坎利夫：《美国的文学》，第294页。

但1937年发表的、展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有组织斗争的《进行曲》，已具有现实主义地处理社会主题的特色。这两位作家的剧作奠定了美国社会剧的基础。

奥德茨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年轻剧作家，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最重要代表，曾一度加入美国共产党。他1935年发表的《等待左派》一剧，描写纽约汽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以极大义愤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采用了活报剧形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使他一举成名。同年，他还写了《醒来歌唱》和《失乐园》。描写大萧条年代小人物和中产阶级的痛苦挣扎。他后来的剧作中，1937年发表的《金孩子》和1938年发表的《射向月球的火箭》较有名。前者通过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被毁灭的故事，控诉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残酷性；后者深刻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压抑感。到40年代，奥德茨日益减弱以往的火样热情，让自己戏作迁就百老汇的浅薄观众。到冷战时代，他甚至向资本主义投降了。

莉莲·赫尔曼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剧作具有鲜明倾向性和是非感。她最有名的剧本是《小狐狸》(1939)。通过描写一个邪恶的家族，她"举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① 剧中女主角成为美国现代戏剧中著名的典型人物。她30年代另一部有影响的剧作是《未来的日子》(1936)，涉及当时美国社会最尖锐的问题：经济大危机、工厂倒闭和工人被解雇等日益深刻的劳资矛盾。这两部剧作在描写强有力的人物性格方面具有特色。

马尔兹在耶鲁戏剧学院毕业后就开始写剧本。1932年与人合作写的《忙得团团转》是揭露政治腐败的；1935年《黑矿井》

① 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年代》，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4，第262页。

描写西弗吉尼亚一个矿场矿工们的劳动、生活、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发展成的罢工；1936年的独幕剧《小兵希克斯》描写一个派去破坏罢工的士兵拒绝向罢工工人开枪，充满了革命激情。这些剧作虽然艺术上不很成熟，但当时在政治上起了作用。

金斯利的《死巷》（1935）用自然主义手法描述30年代贫民窟的可怕情景：在纽约一条死巷里，穷人与富人住宅紧邻，那里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剧中一个人物说：你住的地方极重要，它可以让你成长，也可以将你毁掉；我上学时，他们告诉我进化使动物变成人，但他们忘了说进化也能使人变成野兽。

马克思韦尔·安德森20年代即已成名，30年代逐渐向左转，用诗体写出了他最重要作品——《冬景》（1935）。他试图将工人斗争题材提到悲剧的高度，从抗议社会不平逐渐引申，用庄严的诗句更抽象地探索邪恶、正义、复仇等问题。他把剧中主人公抽象为资本主义邪恶的牺牲品，使之具有普遍的意义。

“尽管30年代左倾戏剧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大声疾呼，控诉社会不平，但对资本主义社会在艺术上做出高度概括的倒是并不直接抨击现实、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化石林》（1935），作者是罗伯特·舍伍德。”[①] 此剧寓意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有理想主义光辉的事物都已死亡，剩下的只有追求物质、放纵肉欲的卑俗世界。剧本用象征手法，比现实主义描写更深入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剧本。

戏剧的发展，是与剧院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因为剧作只有经过演出才能获得生命。20年代，美国已有些剧作者为摆脱商业剧院演出传统的束缚，自己建立小剧院，以便演出自己写作的剧

---

① 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142页。

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普罗文斯敦剧艺社小剧院和华盛顿广场剧团以及由后者改组成的互助剧社。这些小剧院虽不能取代商业剧院，但它们演出的剧作的作者名气大，因而对美国戏剧界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到了30年代初，由于互助剧院资产阶级倾向加强，一批进步青年演员在文艺界左倾潮流的冲击下，脱离了互助剧院，和一批大学戏剧系毕业生及其他小剧院活动分子一起，于1931年成立同仁剧院，主要演出30年代进步剧作家所写的社会剧，奥德茨的戏剧活动就是与同仁剧院分不开的。这个剧院一直奋斗到1941年才停止活动。

除同仁剧院外，美国各地还出现许多小剧院，其中大学的业余剧院在反百老汇保守传统的进步剧运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2年成立工人剧院同盟后，1933至1937年出现了工人剧院活动的高潮，宣传鼓动剧团数目逐渐增多。它们直接在工厂或工人俱乐部上演活报剧，演出的思想倾向性更加明朗。固定的工人剧院则上演左翼剧作家的大型作品。

由于失业演员和剧院工作人员众多，罗斯福政府还制订了联邦剧院计划，建立了158个联邦剧院。第3章第3节对此已有所叙述，这里不再重复了。

诗歌。 罗斯福时代，“诗歌前所未有地走出了象牙之塔，为炫耀美国历史而歌唱，议政论事，甚至用于街头宣传。”[①] 迈克尔·戈尔德、肯尼思·费林等人虽然写出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在当时获得了社会效果，但真正具有影响的左翼诗人，则是卡尔·桑德伯格、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威廉·C. 威廉斯、詹姆斯·兰斯顿·休斯等人。

桑德伯格是“芝加哥诗人”中最重要代表，20年代已经成

---

① 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年代》，第256页。

名。他的诗风清新，用的是20世纪美国人民群众口语，采用着以往认为不能入诗的题材。他歌颂工业文明，将大城市的声音和色彩化入诗中；他也写意境恬淡的风景诗；他还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和社会党干部，自称其诗的文化背景是现代工人运动。1936年，他对"新政"作出反应，发表了《是的，人民》。这是他的一部力作，里面收有散文、小品、逸事和诗歌多首。这些诗体现了他对人民力量的信心，加强了现实主义色彩，唱出了更强烈的战斗激情。

麦克利什20年代诗歌受到意象派影响。30年代大萧条和法西斯威胁使他转变了态度。1935年发表诗剧《恐慌》，描述了华尔街的崩溃和失业者的示威游行，1938年发表的《公开演说》，"明白宣布了他从事集体主义社会思想活动的意向。"[①] 1939年的"美国曾是希望"是一首朗诵式大众诗篇，1940年的"不负责任者"敦促文友们为民主而战斗。有的批评者认为这些诗空洞而具有教条气息。[②]

威廉斯从小喜欢惠特曼诗歌，但早期作品受意象派诗歌影响，20年代逐渐与意象派决裂。30年代政治上激进，被视为左翼文学同路人；文学上主张客观主义，不谈抽象思维，在诗中写具体事物。罗斯福时代他发表的诗歌多为抨击现实之作，如：《早期殉难者》(1935)、《亚当与夏娃与城市》(1936)、《诗全集》(1938)、《破折的跨度》(1941)和《楔子》(1944)。他说，他的诗有这样一种特征：就像外科医生在病人身上操作一样，人们通过眼前事物从个体看到宇宙。

---

① 詹姆斯·D.哈特：《牛津美国文学指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461页。

② 参阅〔英〕坎利夫：《美国的文学》，第312页。

休斯是著名黑人作家，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写诗。大学毕业时正逢大萧条，美国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的悲惨处境使他逐渐放弃了早期的唯美主义。1932年访问苏联后，又到上海会见了鲁迅先生。他的写作包括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但以诗最为有名。罗斯福时代他发表的重要诗集有《亲爱的死神》(1931)、《黑人母亲》(1931)、《梦乡人》(1932)、《新诗歌》(1938)、《哈莱姆的莎士比亚》(1941)。其中许多诗篇深刻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缺乏民主自由。

休斯成名后仍住在哈莱姆。他的创作与黑人生活息息相通，人们尊称他为"哈莱姆的桂冠诗人。"哈莱姆文艺复兴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阿兰·洛克认为，休斯的诗歌唱出了黑人群众的声音。

报告文学。 约翰·里德报道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为罗斯福时代的左翼报告文学树立了榜样。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3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满怀深情地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写了许多生动而真实的报道，增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后，到11月便出了5版，后来一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在全世界拥有亿万读者。史沫特莱的《中国人民的命运》(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中国在反攻》(1938)等书，热情洋溢地描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受到广泛欢迎。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得到普遍承认；就是海明威这样的文学巨匠，也将这些报告文学的片断选入了他所编著优秀战争作品文选之中。

［反法西斯文学］ 美国的反法西斯文学萌芽于30年代初。著名南部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曾说："我在1931年创造了格林。我没有想到，报纸上还未开始讲希特勒的时候，我已创造了

一个早于他的纳粹分子。"[①] 格林是一个具有三 K 党徒劣性的州国民警卫队上尉，只是法西斯分子的美国变种，所以福克纳似乎还不能称为美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带头人。1933 年，麦克利什为抗议将绘有列宁像的壁画从洛克菲勒财团大楼抹去，写出讽刺组诗"洛克菲勒先生城的壁画"。1937 年又写了广播诗剧《城市的陷落》，1938 年写了诗剧《空袭》，都是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作品。前面提到的 1934 年上演（1935 年出版）的罗伯特·舍伍德的《化石林》，由于暗示自由资本主义为法西斯主义取代，已具有反法西斯倾向。1936 年，舍伍德又发表《白痴的欢乐》一剧，用闹剧的形式深刻地揭露和严厉地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警告人们关于战争的威胁。

1935 年，辛克莱·刘易斯发表了他的反法西斯小说《这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虚构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统治美国的可怕故事，激励美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意识。1936 年，他又与人合作将之改编为剧本，同时在所有联邦剧院上演。仅在最初几星期，便吸引了全国 25 万以上的观众。这样，反法西斯文学才有了初步声势。30 年代后期，美国作家联盟召开了 4 次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全国大会，吸收了许多著名文学家入盟，更加强了反法西斯文学活动。西班牙内战期间，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曾受美国作家联盟委托，率领美国作家代表团前往访问，并曾任美国报纸驻那里的记者。他坚决站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一边。他 1938 年发表的剧本《第五纵队》和 194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都成为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品。后者不独描写了西班牙人民英勇的反法西斯战斗，还写了一个没有迷惘、失望情绪并能分清正义与

① 转引自〔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下册，第 947 页。

非正义战争的美国知识分子。如詹姆斯·哈特所说，小说涵蕴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论点："一个地方失去自由，意味着所有地方都没有自由。"[①] 著名女剧作家赫尔曼和女小说家多萝西·帕克也访问过内战时期的西班牙。赫尔曼的回忆录片断后来拍成电影，歌颂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不过，她最有名的反法西斯剧本是《守望莱茵河》(1941)。这是一部强烈谴责纳粹德国的作品，它创造了一个德国反法西斯地下工作者的动人典型。多萝西·帕克后来根据其在西、意、德等国人民反对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斗争中得到的生动印象，写成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共和国的士兵们》。

前面提到，黑人诗人休斯访问过苏联和中国。1937 年 8 月，他发表长诗"怒吼吧，中国"，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预言中国人民的觉醒。后来他还发表过向英勇反抗希特勒主义的苏联人民致敬的诗篇《斯大林格勒》。此外，欧文·肖的滑稽闹剧《温和的人民》(1939) 通过寓言说明：对法西斯主义只有进行斗争，因为对于他们说道理是没有用的；斯蒂芬·V·贝尼特的诗《午时恶梦》(1940)，警告美国要对付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这些都是相当有名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美国的民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团结起来。美国最大的作家们全都起来支持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②] 这自然更大大增加了反法西斯文学的声势。剧作家马尔兹 1940 年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潜流》。这部作品写的是组织汽车工人参加工会的斗争，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在美国作家们反映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它对产生法

---

① 詹姆斯·哈特：《牛津美国文学指南》，第 327 页。

②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下册，第 950 页。

西斯主义的原因的分析较深刻。美国参战以后，马尔兹继续着《潜流》的反法西斯路线，1944 年发表了小说《十字架与箭》，描写一个德国工厂工人帮助英国轰炸机的故事，向美国人民说明：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德国垄断组织的产物，并不像纳粹党徒所宣传的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二次大战期间，马尔兹还写了几部反法西斯的电影脚本。

1942 年，厄斯金·考德威尔发表《在通往斯摩棱斯克的道路上竭尽全力》。这是一部关于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斗的个人纪事，赞美了苏联各族人民的英雄气概。1943 年，辛克莱·刘易斯谴责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长篇小说《吉迪恩·普拉尼什》，也表现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著名小说家斯坦贝克也力图以自己著作参加反法西斯战斗。1942 年，他发表了两部关于第二次大战著作：《投炸弹》和《月落》。由于他当时任国防部顾问，小说材料多来自军方，书中未免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贡献。比如中篇小说《月落》是写挪威抵抗运动的，书中主人公是一个小城市市长。他坚信民主自由，拒绝与德军合作，因而被捕，成为英、美等国支持的抵抗运动的英雄。而人民群众的斗争则很少提到。世纪初就崭露头角的多产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也走着类似斯坦贝克的道路。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关于兰尼·巴德的系列小说：《世界的终结》（1940）、《两个世界之间》（1941）、《相互斗争的种子》（1942）、《门是宽的》（1943）、《总统代表》（1944）和《凶暴的好战分子的收获》（1945），都具有反法西斯的倾向。这个系列小说战后仍继续出版，但愈到后来，这位一度是工人阶级朋友的作家，不独愈益理想化美国政府的政策，还对共产党人进行粗暴攻击。

此外，1944 年还发表了两本较有影响的、大力宣传美国民

主精神的反法西斯作品：一本是约翰·赫西的《阿达诺之钟》；一本是哈里·布朗的《在阳光中行走》。

〔其他流派文学〕　左翼文学是30年代美国文学的主流，反法西斯文学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这并不排除罗斯福时代还存在其他文学流派。比如20年代兴起的“迷惘的一代”文学、南方文学、黑人文学，在罗斯福时代远未沉寂，时而还像流星一样划破天空。

迷惘文学。　前面提到，有些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由于大萧条和法西斯威胁，在30年代转变了态度，但还有些人“迷途而不知返”，仍然沉湎于20年代的文化气氛之中，写他们迷惘的作品。在小说方面，代表人物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威廉·福克纳。福克纳小说我们将在南方文学中叙述，这里谈谈菲茨杰拉德。这位作家未成名之前，爱上一位上层社会的美丽姑娘，期望一举成名，和她结为秦晋。他勤奋写作，如愿以偿。他最成功的小说都是20年代发表的。由于他们夫妇生活豪奢，收入虽丰，仍然入不敷出；加之他的妻子性情高傲，精神失常，使他受尽折磨。1934年，他以这种精神生活为背景，写成小说《夜色温柔》。小说写一位年轻有为的心理学家迪克沦落的故事。尼科尔·沃伦天生丽质，出身豪富，因遭其“一切都好”的父亲奸污而患精神分裂症，在治疗过程中爱上了医生迪克·戴弗。迪克接受了她的爱情，答应照顾她和她结婚，而且放弃了自己很有前途的事业。当尼科尔痊愈时，她却爱上了他们的朋友而逼他离婚。他只好酗酒浇愁，默默无闻地了却余生。用尼科尔姐姐的话说，他们家是为尼科尔买一位医生；尼科尔痊愈了，作为商品的医生就可以出卖了。像菲茨杰拉德20年代小说一样，这部小说对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势利、腐朽和堕落的揭露是很有说服力的，也写出了“美国梦”的幻灭。

继《夜色温柔》之后，由于病魔缠绕，在公众中声誉下降，菲茨杰拉德日益具有失落感，写了一些伤感性的文章，在他死后由埃蒙德·威尔逊于1945年结集出版，书名《崩溃》。他还将他作为好莱坞电影脚本作者时的生活片断写成最后一部小说《最后的大亨》（1941），描写一位大电影制片商的女儿美好希望幻灭的故事。不过，小说未写完作者便去世了，也是由威尔逊编辑出版的。

诗歌代表人物是托马斯·S·埃利奥特[①]、鲁宾逊·杰弗斯等。20年代初埃利奥特以“荒原”一诗而奠定他在英、美诗界的地位，1927年入英国籍，并改信英国国教；政治上是个保皇派，文学上是个古典主义者。20年代末起，他的诗日益浸透宗教气息，摆脱了往日的嘲弄语气和绝望情绪。在1930年发表的“圣灰星期三”中他表明：人生固然令人遗憾，但能从皈依上帝得到安宁。有人认为他不再迷惘了，实际上皈依上帝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1935年，埃利奥特开始创作《四重奏四阙》，到1943年才完成。这是一首宗教冥想长诗，中心思想是通过个人和历史事迹抒发对时空的虚妄感、对生命的幻灭感，阐明始终、生死、兴衰是周而复始的，只有皈依上帝旨意才能得救。30年代他还写过一些诗剧，1934年的露天表演剧《暗礁》，叙述教会遭遇的长期困难及其最后胜利；1935年写《大教堂的凶杀》，赞颂一位大主教为了神的事业而殉职的故事；1939年的《家属重聚》，描写一位贵族在旅途暗杀其年轻妻子后回家向家人忏悔，冀得心境安宁，但不成功，其母焦急万分，为他治疗的医生警告他：任何急剧情绪波动会致其母于死地。当他发现其母从他姨母那里夺走他父亲的往事后，他又离家去完成他赎罪的历程，而他

---

① 亦译艾略特。

母亲一直努力维持着的家庭和谐烟消云散了。

埃利奥特的诗歌表达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渴望安宁的思想感情，使他不独在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使他的诗风影响了一代英、美诗坛。

杰弗斯是个早慧的诗人，悲观厌世，嗜写暴力与不正当的性关系，被称为“非人道主义者”。30年代他连续发表诗集。《继承死者》（1931）是一部挽诗集，简明地表达了他的诗歌主题：终结生命的愿望、打碎人类的模型和逃向非人性的自然；《瑟索海岸及其他》（1932）的标题诗，描述一个加利福尼亚农民和他的情敌的致命暴力斗争；《把你的心脏抛给鹰吧及其他》（1933）的标题诗描写一个杀死亲兄弟的人，发现自己独处于一个人类之外的世界，那里只有自由而翱翔的凶猛之鹰；《最高点及其他》（1935）的标题诗重述了美狄亚[1]的悲剧故事；《你给我的如此劝告及其他》（1937）的标题诗是一出现代悲剧。1938年，他发表了《鲁宾逊·杰弗斯诗选》。

总之，杰弗斯诗歌的中心思想是：否定人类，皈依自然；强烈希冀摈弃罪恶的文明。

在戏剧方面，代表人物是尤金·奥尼尔。1920年他发表的《天边外》一剧，在百老汇上演取得巨大成功，获普利策奖，从此奠定了他第一流剧作家地位。此后他不断发表成功的剧作，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在罗斯福时代，1931年他发表的《哀悼》一剧，是他成功地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写成的现代心理悲剧，描写内战期间一位将军家40人的互相背叛、乱伦、复仇、残杀，最后剩下将军女儿把自

---

①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女巫，曾助其夫获得金羊毛，后被丈夫抛弃，她为了报复，杀了他丈夫后妻及其岳父和后妻生的两个儿子。

己关在府邸用比死还可怕的终身囚禁以惩罚自己。1934 年，他发表一部涉及现代宗教问题的剧作，此后致力于包括 11 部独立作品的戏剧系列，题为《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1936 年完成第一部《诗人的气质》，1938 年完成第二部《更庄严的大厦》。前者描写一个可笑的、无所归属的、生活在幻想中的自大狂；后者表现一个大家庭中两位女性的勾心斗角，并塑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变态心理的妇女形象。不过，此两剧都到战后才发表。

由于精力不济，奥尼尔担心他那雄心勃勃的 11 部戏剧系列难以完成，于 1940 年转而着手写一部自传性悲剧《长夜漫漫路迢迢》，1943 年又完成《私生子的月亮》。这两部剧也是战后才发表。他还写了一部发表于 1946 年的著名悲剧《卖冰人来》。

奥尼尔剧作时间很长，但从他剧作思想特点来说，乃属于“迷惘的一代”。他在自己剧作中力求阐明人已走入歧途，精神痛苦，毁灭自己，损害他人。他表达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性，创造了美国现代悲剧。他通过自己剧作中人物形象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总问题概括为缺乏美、精神价值和真正的人的意义。而且，从他的剧作来看，他究竟最需要的是什么，似乎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认为，“只要他有所追求，有所梦想，身上就有点精神，有点美。”[1]

南方文学。 20 年代起，南方文学界便很活跃，而且取得显著成就，但其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却很复杂。一般而言，南方文学的背景，是内战中南方失败、重建时期北方工业资本入侵引起的南部心理负担。因此，南方文学作家往往一方面诅咒其祖先胡作非为，犯下罪孽，使儿孙心理变态；另一方面对北方资本入

---

① 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 113 页。

侵恨之入骨，对那些“暴发户”极尽讽刺之能事。

南方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其首要代表人物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福克纳。他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种植园主后代的家庭里，曾祖父是地方史上传奇人物，到他父亲时家道中落。他像曹雪芹一样，对自己家庭从极盛到衰落的过程十分熟悉，他的小说大多是从这里汲取素材。1929至1936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发表了他最负盛名的5部作品：《喧哗与骚动》（1929）、《在我弥留之际》（1930）、《圣堂》（1931）、《八月之光》（1932）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1936年以后，福克纳小说进入成熟期。除出版一些短篇小说集外，还发表了长篇《村庄》（1940）。这些作品已稍逊于上期作品。从40年代后期起，他再也没有写出特别优秀小说。

福克纳20年代属于“迷惘的一代”，30年代仍未从迷惘之中走出来。《喧哗与骚动》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题思想是：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但没有任何意义。《在我弥留之际》虽然在技巧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但主要内容是描写一家南部人经历的一次可笑、可怕、可悲而又滑稽的遭遇，表现了作者的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思想。《圣堂》写一个有着明显病态和乖戾心理的人，对性行为描写特别露骨。《八月之光》写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被不合理的社会法规支配，受到愚弄和虐待，终于悲惨死去。《押沙龙、押沙龙！》和《喧哗与骚动》一样，都是写种植园主及其后代的，但对种植园主的揭露更为深刻，对种植园制度解体的必然性表现得更清楚。《村庄》写一个极端冷酷而狡猾的、从事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家。总之，在福克纳笔下很难找到对普通美国人的深刻同情，有的只是主观主义、宗教信仰、神秘主义和各种变态心理和乖戾行径。但是，他的小说描绘了美国南部复杂的历史社会图像，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社

会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小说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因而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具有重要性。

另一个重要南方小说家是托马斯·沃尔夫。他把南方浪漫主义、20年代文艺家的迷惘、拜伦和雪莱早期性格以及30年代各种事态融为一体。他短促一生共写过4部小说：《天使望故乡》(1929)、《时间与河流》(1935)、《蛛网与岩石》(1939)和《你再也不能回家了》(1940)。后两部是在他逝世后发表的。他的小说最具有个人特征，都是控诉他从内心感到特别不舒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而且愈到后来，他愈感到"敌人和时光一样古老，和地狱一样邪恶，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他总在寻求"一个父亲"——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此外，南方著名小说家还有写《夜骑》(1939)和《国王的全部人马》(1946)的罗伯特·P·沃伦、写畅销小说《飘》(1936)在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写《灰色骑士灰色马》(1939)和《斜塔》(1944)的凯瑟琳·A·波特。

南方戏剧家除前面提到的厄斯金·考德威尔外，还有多萝西与杜博斯·海沃德以及保罗·格林。前者在1927年发表的戏剧《波吉》，描绘了20年代城市贫苦黑人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后者1930年发表的《颂歌献给初升的太阳》，反映囚犯的痛苦生活，令人心悸，在30年代题材中独树一帜。

南方诗人以逃亡者集团为代表。这个集团起源于1922年田纳西州一所大学少数爱好文学的师生创办的《逃亡者》杂志。这些人以约翰·C·兰塞姆为首，包括他的学生艾伦·塔特、唐纳德·戴维森和前面提到的罗伯特·沃伦。他们其所以被称为逃亡者集团，是因为他们对内战前南方持有肯定看法，认为那时南方社会合乎人性；逃亡云云，乃是要避开北方工业的祸害。兰塞姆的诗不多，多发表于20年代，1945年出选集时收入42首。他的诗像

《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一样，主题是衰颓与死亡；万象皆空。塔特的重要诗作大都收入他1937年发表的《自选诗集》，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南部联邦死难将士颂”。它将内战时南方将士的骑士精神与当前空虚而忙碌的世界对照，发出“凡物必死”的叹惜，表现出自恋狂情结。他的宗教诗的代表作，是1944年发表的“灵魂的季节”，奉劝受苦受难的人皈依宗教。

黑人文学。 20年代出现以哈莱姆为中心黑人文艺复兴，或称新黑人运动。它的主要领导人是阿兰·洛克博士。1925年，他出版一部汇集年轻黑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集子《释新黑人》，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影响。他在序言中说黑人群众中有一种新的精神觉醒；他们粉碎了种族歧视的心理锁链，有了新的独立的人格。到大萧条期间，黑人的这种新觉醒迅速向左转，黑人文学作品也转向社会批评和抗议，部分黑人作家还参加了共产党，或成为党的同路人。除前面提到的理查德·赖特、兰斯顿·休斯外，文学作品达到一定高度的还有下面一些黑人作家。

阿纳·邦当青年时积极参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30年代初小说《上帝送来星期天》（1931）只写黑人放荡生活，是一种自然主义作品。1936年发表的《黑色雷霆》则写黑人起义，用形象化手法描绘了白人统治者的惊恐、残酷报复和起义者的英勇气概。1933年的短篇小说《夏日悲剧》，写一对黑人老夫妇因生活无着，开着破旧汽车投河自尽的悲惨故事，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左拉·N·赫斯顿也是黑人文艺复兴积极分子。她的主要著作是3部长篇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们盯视上帝》（1937）。小说用民间方言写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主题是黑人妇女爱情中的精神生活。主人公生活虽然优裕，但为了自卫打死丈夫使她终生心情不宁。

斯特林·布朗是黑人文坛上饶有声誉的作家，他的第一部诗集《南部路》（1932），采用黑人民歌、民谣形式，描绘出30年代南方黑人的生活和斗争，体现了黑人诗坛的进步传统。他还与人合编《黑人旅队》（1941），辑录了所有黑人作家长篇小说选段、短篇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文论以及民间文学，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黑人文集。

此外，罗斯福时代还有一些新觉醒的黑人作家发表过有影响的作品，比如弗兰克·M·戴维斯的诗集《黑人的诗》（1935）和《我是美国黑人》（1937）；梅尔文·B·托尔森的诗集《与美国约会》（1944）；罗伯特·海登的第一部诗集《屈辱心态》（1940）和玛格丽特·沃尔克的诗集《为了我的人民》（1942）。这些诗作都表现出高度种族觉悟，或者是倾诉黑人的悲惨生活，或者是歌颂黑人的昂扬斗志。

除以上流派外，罗斯福时代还出现过写异国情调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部分美国资产阶级作家赞扬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表演主义剧作家桑顿·怀尔德和小说家威廉·萨罗扬；以及颇有名气超级现代派诗人爱德华·E·卡明斯。

〔文学评论〕　罗伯特·斯皮勒等写道："文学评论的功能也许在于分析和界定影响着现存文学的各种力量，而不是推动新的文学创作。但是，如果是好的文学评论，就应两者兼而有之，因此，1925至1945年出现过活跃的、几乎是有组织的文学评论——一种与当时最优秀的创造性作品相互协调的评论——这件事，也许是那20年美国文学极端重要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1]

---

[1] 罗伯特·E·斯皮勒等：《美国文学史》（修正版），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6，第1358页。

1925（有人偏向1929）至1945年的文学评论不独十分活跃，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而且与此前的文学评论不同。1915至1925（或1929）年的文学评论，是反唯心主义、清教主义与“优雅传统”的；从事这种文学评论的是各种各样反对偶像崇拜的作家。到20年代下半叶，他们胜利了，在全国评论界和群众中传播着一种新的美学观点，其特点是现实主义、暴露黑暗和藐视权威。但是，传统主义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经济大危机和法西斯威胁又激发出新的文学创作取向，因此，罗斯福时代的文学评论就呈现出多家争鸣的局面。首先是新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争；他们的争鸣文章在1930年前后数年间弥漫于美国报纸杂志。

新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欧文·巴比特和保罗·E·莫尔。20年代初，他们已年过半百，他们维护传统观点的立场早已为人所知。但是，20年代的反传统潮流“逼着他们加强活动，肯定人文主义的价值，和少数几个信徒一起采用人文主义——有时还在前面冠以‘新’字——作为战斗旗帜。”[①] 巴比特提倡“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脱离宗教虽然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使人为了获得在宇宙中的地位，只去发展感情而不去发展思想。前者是自然主义，后者是浪漫主义；两者成为教育、美学、文艺的主要祸害。他所谓的“人的法则”，就是“敬畏神明与谦卑”与“人的内在生活及其加在人身上的特殊控制”，亦即新人文主义者假定的绝对事物——内在控制；有了这种内在控制，人就能达到均衡。莫尔着重从哲学角度阐明新人文主义观点，他认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人性的最高峰，一类是人性的

① 〔英〕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第317页。

最低谷。前者是真正的艺术的普遍性；后者乃是兽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表现的就是这种兽性。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表现人性的最高峰，作激情的主人，而不是其奴隶；真正的艺术决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

根据以上标准，他们对亨利·门肯、刘易斯、多斯·帕索斯等人的作品大肆攻击、谩骂；巴比特甚至毁谤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没有站在比动物行为更高的水平上。”

自由主义者、反对偶像崇拜者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范·W·布鲁克斯和门肯。他们两人都反对清教主义，反对脱离社会实际的优雅传统。门肯主张文学创作自由，支持当时受到攻击的新作家德莱塞等人。1930年，当新人文主义者举行笔谈并将笔谈文章结集为《人文主义与美国》出版后，受他们攻击的自由主义作家埃德蒙·威尔逊、马尔科姆·考利、肯尼思·伯克等人也将自己反驳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人文主义述评》，指出新人文主义者脱离实际，任意曲解遗产，表现出贵族老爷式的美学趣味，且有反民主气息。

1930年，逃亡者集团也出版了论文集《我的立场：南方与农业传统》。作者们除捍卫南方农业传统外，也揭露和谴责北方工业社会的种种罪恶，反对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传统。在这一方面，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反新人文主义的同盟军。

经过这场争论，由于新人文主义违反时代潮流，渐渐走向下坡路。

另一方面，由于左翼文学成为主流，30年代的左翼文学评论也活跃起来。不过，像左翼文学一样，左翼文学评论的队伍是相当复杂的。因此，左翼文学评论除与非左翼文学评论争论外，它的内部也有争鸣。1928年迈克尔·戈尔德主编《群众》杂志以后，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文学评论的文章日益增加。1930

年，他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批评颓废文学并号召作家抵抗现代主义影响的论文，引起广泛的反应，成为左翼文学评论活跃的开端。1933年，格兰维尔·希克斯发表（1935年修订）《伟大的传统》一书，宣称要使此后美国文学史符合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要求。此书引起激烈的争论。大体上说，希克斯、戈尔德等人是站在共产党的官方立场的，埃德蒙·威尔逊、肯尼思·伯克、詹姆斯·法雷尔以及《党派评论》诸撰稿人则持异议。他们不同意该书过分强调文学与经济规律的相互依存关系。1936年，法雷尔还因此发表《对文学评论的评论》一书，指出左派评论论点的疏漏，批评教条主义者，并且提出一些纲领性的纠正意见。其他持异议者也纷纷著书写文，反对教条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由于这些作者离美共官方立场愈来愈远，1939年，伯纳德·史密斯根据《伟大的传统》的思想路线，撰写并发表《美国评论中的诸种力量》一书，专门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评价整个美国评论界传统。

在这次争论中，持异议者确有违反左翼评论原则的地方，站在美共官方立场的评论也有过于简单化、教条主义的错误。到史密斯的书出版的这一年，也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一年，争论达到高潮。有些人仍然坚持正统观点，为苏联辩解，但许多人认为斯大林这种行为是背叛自己信仰，因而脱离了美共或马克思主义事业。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争论，不独引起左翼文学评论队伍的分裂，还使美国文学评论传统中一度消沉的唯美主义流派复兴。"1930年，唯美主义者发现自己大体站在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而且在此后15年间，当人文主义让位于道德教条主义、现实主义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时，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固执的中间

立场。"[1] 我们这里因篇幅关系，不讨论唯美主义文学评论的历史渊源，只简述它在罗斯福时代的发展。唯美主义评论也称新评论。它是一种"文学分析，主要集中于分析一个孤立文学作品（通常是一首诗）诸元素，因为它们照亮整体。它专注于语义学、韵律、意象、隐喻与表征，并研究这个作品的音调、结构和高潮，以说明一个作品的融合形式和内容，而不是去讨论这个作品与时代、传统以及作者全部作品的关系。"[2] 下面我们谈谈罗斯福时代新评论派的几位作家。伊沃·温特斯评论作品有《原始主义与颓废》（1937）、《胡话的解剖》（1943）等，主张文学应有经典样式、应有气派和节制，并含蕴道德判断。肯尼思·伯克著有《文学形式的哲学》（1941）和《题材语法学》（1945）等书，他用各种方法研究文学形式，希望找出一种可资使用的框架。理查德·P·布莱克默的文学论著有《双重动因》（1935）和《伟大的代价》（1937），对他研究的诗和散文的风格、形式、措词与结构进行细致的解剖，以评价其文学品格与影响。原来逃亡者集团中的约翰·兰塞姆、艾伦·塔特等人，30、40年代也属于新评论派。他们发行过《南方评论》（1935—1942）、《凯尼恩评论》（1939年开始发行）等刊物。塔特称其第一部评论著作为《保守论文集》（1936），表明他认为的一种原则的积极标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有保守的消极作用。他的第二部评论著作《疯狂中的理性》（1941）的主题是：道德秩序是与当代文学中的折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立的。兰塞姆将其一篇具有特色的文章的题目定为"征求一种本体论评论"，表明他渴望现代艺术与评论具有

---

① 罗伯特·E·斯皮勒等编：《美国文学史》，第1368页。作者这里所说"现实主义"与我们所说现实主义不一样。

② 詹姆斯·D·哈特：前引书，第528页。

一种建基于对现实的全面理解的玄学体系，将文学与事物的根本性质、特征及其关系尽可能完好地联结起来。

新评论由于将文学作品独立性、自足性加以绝对化，不能解决文学研究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它的好日子没有超过 50 年代。

〔造型艺术〕　1913 年军械库展览[①] 之后，很多美国艺术家接受了现代主义，但也有艺术家反对，他们赞成作为美国最持久的传统的现实主义[②]。20 年代时，现代主义逐渐衰落。“但是随着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多欧洲最有影响的现代派艺术家逃亡到了美国，通过他们的展览和讲授，一代年轻的美国人看到了自由体裁的抽象艺术、几何图形的抽象艺术、精确派艺术、超现实派艺术以及一些其他的新的流派。这次现代艺术真的流行起来。”[③] 因此之故，虽然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法西斯幽灵的威胁推进了美国的现实主义艺术，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艺术界却形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或形式主义）之间更加尖锐的斗争。

罗斯福时代盛行于美国的现代主义艺术，主要有 3 个流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微小；“它们的共同之点，首先是顽强地‘挣脱’生活，这是第一位的。在这种‘自我肯定’的美术中，不仅包括了一切‘自我表现’的个性和自我欣赏，而且，按照实际情况，从更广泛的意义说来，还有更深、更反动的倾向包含其中。这些倾向，不仅由美术家，也由 30 年代的美术批评家和博物馆工作者公然、明显地表现出

---

① 1913 年 2 月 17 日由画家、雕塑家协会组织，在纽约市一个军械库开幕的美术展览，是欧洲现代艺术在美国的首次展览。

② 一般说，除美国共产党艺术家外，美国人所称现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在内。

③ 见《美国文学艺术史话》（张金言等选译自卡罗尔·卡尔金斯编《美国史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1 页。

来了。"[①] 他们之中有人说，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代表"从唯物论的向精神方面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些作品作者对"宇宙秩序固有的直观感觉"，是"经过选择的特殊天赋"，其艺术"既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批评，总是像花一样地开放"；人民群众与民族文化的荣誉无缘，如果让"成千上万的人去画，油画就不能称之为艺术。"[②]

美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在20年代由马克斯·韦伯开始，它的基本方法是无限制地夸张和强调某种粗俗的自然主义细节，在抽象的构图中故意玩弄一套程式化的和不合逻辑的东西，并使之混杂在一起。除一些自学的艺术工作者外，罗斯福时代专业的表现主义艺术家有油画家约翰·卡罗尔、赫明·布卢姆等。雕塑家有哈斯顿·拉雪兹、约翰·B·弗拉纳根等。他们的作品虽然煊赫一时，但很难说美。比如布卢姆往往用自然主义手法去仔细分解露出内脏、经过解剖处理的尸体。

20年代出现的地方主义艺术，美国艺术界常将之列入现实主义流派，说它态度乐观，认为美国的真正力量在于中西部的俭朴美德。实际上，地方主义把自然主义的琐碎粗鲁和形式上过分渲染的浅薄表达力结合起来，目的在于赞扬具有保守性质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变种。它发现一系列业余作家的原始艺术作品，并大加吹捧。它的先驱是查尔斯·伯奇菲尔德，还有雷金纳德·马什这样一些同路人。前者描绘美国中西部城镇古老、丑陋而死板的建筑物，后者则将纽约普通人民表现成粗糙的、半动物的形态。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H·本

---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中译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第118页。

② 以上引文俱见〔苏〕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第119页。

顿、格兰特·伍德和约翰·S·柯里。本顿的作品，如“西部艺术——第2号壁画”（1932）、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壁画（1932）、杰斐逊城密苏里州政府大厦壁画等，表现出沉着、宁静和自然主义准确性，颜色鲜艳，但往往琐碎地、不协调地描写人和物，使其形体很像弯弯曲曲、生了锈的金属管或弄皱了的大橡皮球，显不出艺术的生动感。伍德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的哥特式”（1930），描绘艾奥瓦州一对老年夫妇迟钝而庄严地站在一座哥特式房屋之前，男的闷闷不乐，手持三齿镐，似乎是站在那里保卫他们那块小天地。柯里曾为托皮卡的堪萨斯州议会大厦作壁画（1938）。他的画中也呈现出粗野的生理表情和原始特点；有时，他甚至用畸形、丑陋、过分夸张生理现象的手法描绘极严肃的题材。比如，他就在画中丑化了黑奴的伟大保卫者约翰·布朗的形象。

30年代初，美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有乔治亚·奥基夫、彼得·布卢姆、伊丹·奥尔布赖特等。奥基夫从20年代起就画她所喜爱的奇特而神秘的主题，有的批评家称她的见解与“先验论的一伙”的见解相似。她作画像用放大镜对世界进行自然主义的观察，以导致她对宇宙的理解和浓厚抒情的追求。布卢姆和奥尔布赖特则更是在他们艺术活动中无休无止地运用他们怪异的幻想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巴黎学派的世界主义代表人物逃到美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班牙人萨尔瓦多·达利，他受弗洛伊德潜意识论的影响，将美国本土超现实主义者虚构出的全部作品远远抛在自己的后头。他以蔚蓝色天空作背景，画出汗毛粗如繁茂树枝的人脚，他让泛出的粘浆之中浮现出钟表、小提琴和人头，他使原子弹爆炸后变成巨大的、覆盖着一层电烫卷发的头形，等等。没有哪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像他那样受到大画商和纽

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吹捧，得到像他那样高得难以置信的评论。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现实主义却受到富有战斗精神的纯粹抽象主义浪潮的袭击。战前老抽象派画家阿瑟·达夫极力仿效外国主体派至上主义和达达派，用些碎纸片、锯末等粘贴在一起，或使彩色斑痕准确地扩散开来，就算是画。一群蓄着大胡子的青年人更进一步，借助喷雾器、拖把、小铲子，或者干脆用脚蘸颜色涂抹，画出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从豪富的“美国大叔”那里换取大钱，艺术家变得只关心是否有利可图了。这些青年人中有一位杰克逊·波洛克，他从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最后转向抽象主义，在罗斯福时代受到许多批评，但战后至50年代中期，他的画日益受到尊重。1956年逝世后，还成为抽象主义画家的大师。

现代主义或形式主义在雕塑中也有反映。前面曾提到表现主义的拉雪兹和弗拉纳根。不过，雕塑中的表现主义就整体而言，在通往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道路上，只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超现实主义与抽象主义雕塑家中，西奥多·罗德里克表面光滑、没有形体感的作品常使人的感官受到刺激，西摩·利普顿等的抽象作品是模仿动植物形体的，伊布拉姆·拉索、小亚历山大·考尔德等的作品，则是表现一种纯几何图形的抽象概念。考尔德不同于其他抽象派雕塑家之处在于：他发明的那些离奇古怪、灵活善动、由风力或马达带动的抽象作品，具有纯装饰的作用。不过，人们往往不将之看作雕塑，而看作杂技或魔术演员巧妙的特技。

罗斯福时代拥护现实主义的人，也许没有反对的人多；而且即使是拥护现实主义的人，有的也难免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构成罗斯福时代造型艺术史优秀、严肃而富有创造性内容的，乃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品。

20年代末开始在约翰·里德俱乐部活动的素描画家、讽刺画

家的作品，其中特别是政治题材版画，是一种新式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美国资本主义弊端进行了真正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力武器。它们大量运用寓意性的概括语言，造型简练庄重，使形象具有尖锐、准确的心理和戏剧效果。这类画家中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曼纽尔、威廉·格罗珀、弗雷德·埃利斯、雅各布·伯克等人，其中以曼纽尔最为突出。他的漫画如“工人拿去世界的六分之一”、“理想的士兵”、“工会民主的面孔”等，用完整集中的构图，简练的形象结构，严格鲜明的表现力，成为这类作品中的典型。格罗珀最成功的作品暴露了社会斗争的阶级本质，埃利斯揭露资产阶级和反法西斯作品具有强大的热情力量，伯克作品的内容广阔而丰富，足以打动人心。

罗斯福时代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雕塑家是威廉·佐拉奇。他20年代才从绘画转向雕塑，1929至1960年在纽约市从事雕塑的教学工作。他始终以深刻的人道主义作为雕塑艺术的基础，造型手法明确而严格，作品表现出的热忱和诗意激动人心。罗斯福时代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胜利”(1945)。这座雕塑浸透了明朗、果断的情感和对人的美德的赞颂，很好地体现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人道战胜黑暗势力的信念。象征“胜利”的姑娘的形体充满端庄、安详的美，但却包含一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力量。

其他现实主义雕塑家还有米歇尔·菲茨、乔·戴维森等人。

罗斯福时代现实主义油画家中，除以静物画著称的亨利·L·麦克菲和以柔和的抒情风景画著名的约瑟夫·巴列特外，最有代表性的是爱德华·霍珀、安德鲁·韦思和罗克韦尔·肯特。霍珀是敏锐、专心致志和富有抒情风格的画家，20年代中期才改习油画，代表作有“星期日清晨”(1930)、“布鲁克林的一间房”(1932)、“夜鸟”(1942)等。作者以尖锐而准确的观察，深深感

觉到围绕着现代人的环境与结构的节奏，甚至能在没有人的建筑物风景中觉察和揭示出人的感情和精神状态。他的风景画将完美的建筑平面图式的准确性同色调清秀、有时甚至是出乎意表的柔和结合在一起，富于诗意，但往往浸透着凄凉孤独之感。人们认为他的油画含蕴着生活的真理。

韦思从 1936 年起就举办个人画展，但他最著名的作品大都发表在罗斯福逝世以后。肯特是个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时代式的人物。他既是画家，也是作家、旅行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他创作时间很长，世纪初就已开始。最有力的一组风景油画是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完成的，描绘的是格陵兰岛的风景，内容广泛，色调柔和。他在爱斯基摩人坚实、粗壮的体态中找到一种严峻的美感，也以准确的感觉表现出到北极从事勘探的学者的史诗般的形象。他在 30 年代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用版画形式进行着反法西斯的斗争。从 20 年代末起，他为多种世界文学名著插图，形象地再现这些名著的思想和风格特点。总之，肯特的作品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的油画和版画树立了榜样。

有些造型艺术家虽然忠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作品却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比如菲利普·埃弗古德、本·香恩、杰克·莱文等人，他们往往把不合理的怪诞手法、公式化、歪曲真实形象等因素，带进他们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题材之中，损害了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

如第 3 章第 3 节所说，罗斯福“新政”期间曾几次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救济失业艺术家，仅 1935 年成立的工程振兴局实施的联邦艺术计划总共就雇佣 5，000 人，这对维持和发展美国艺术事业起了显著作用。这一计划包括在许多公共建筑物上绘制纪念性壁画；这些壁画颇受墨西哥壁画家克莱门特·奥罗斯科、迭戈·里韦拉等的影响，其题材比如罢工、罢工破坏者、面包线、分成

制农民、暴动群众、尘暴区、洪水侵蚀等，大都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意义。可惜的是，许多壁画也受到现代主义的不良影响，损害了它们感染力。

〔音乐〕　直到20世纪初年，美国作曲家仍仰欧洲音乐鼻息，在民族独立性方面落后于民间通俗音乐。后来，查尔斯·伊夫斯创造了一些新声，逐渐引起人们兴趣。到1923年，在纽约成立了美国作曲家联盟，致力于创作在精神和语言方面都属于美国的音乐。联盟出版《现代音乐》杂志，宣传那些未受到音乐界注意的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培养了一批新人：艾伦·科普兰、罗伊·哈里斯、亨利·考埃尔、罗杰·塞欣斯、沃尔特·皮斯顿和弗吉尔·汤姆森等。

在美国音乐界探索音乐的美国化道路时，一方面研究和吸收了英国移民的民间音乐、爵士音乐、黑人圣歌和布鲁斯乐，以及印第安人部落音乐，另一方面也受到欧洲现代主义音乐的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美国黑人创建的爵士音乐迅猛发展，到罗斯福当政时达到极盛。这里我们简要叙述一下罗斯福时代爵士乐发展过程及美国音乐的其他演变情况。

一般认为，爵士乐创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新奥尔良的一位黑人短号手查尔斯·博尔登。从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起，由约瑟夫·奥利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和一批黑人和白人乐队传到芝加哥、纽约、圣路易、堪萨斯等北方城市，并从1923年起通过留声机传到城郊以外美国各地的中产阶级，使30年代成为爵士乐的时代。

许多早期黑人爵士乐演奏人员不识乐谱，往往只是即兴演奏；乐队很小，一般为5至7人。到30年代，乐队变大了，它们的乐曲是由具有一定专业训练的作曲家如弗莱彻·亨德森、本

尼·卡特、爱德华·K·埃林顿这样一些人写的。埃林顿是爵士乐重要作曲家，他领导的乐队的咆哮似的演奏风格维持了许多年。

20年代在芝加哥爵士乐圈子中成长起来的本尼·古德曼，将黑人和白人爵士乐队的不同风格结合起来，使摇摆乐日益为人所称道。虽然这种音乐早就被用来形容节奏鲜明的爵士乐，但只是在1934年古德曼这位单簧管演奏家领导的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出后，摇摆乐才更加流行。有几个大型的白人管弦乐队，主要演奏古德曼将爵士乐和流行舞蹈音乐融于一体的作品，都被称为摇摆乐队。不过，当时最好的摇摆乐队，乃是来自堪萨斯城、由钢琴家威廉·巴锡领导的黑人乐队。

由于以上原因，30年代亦称为摇摆乐的时代。

"从30年代中期至1941年底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白人摇摆乐队使曾给以灵感的大型黑人管弦乐队变得暗淡无光。但是在40年代初期，纽约的一些黑人音乐家，临时搭班子在工作之余营业的俱乐部里'乱敲乱打'。出于对老一套的常规爵士乐的厌烦，他们便开始演奏错综复杂的新和声和新节奏。这种新的和声和节奏不同于以前的爵士乐，其基点不是旋律，而是相继进行的和弦。"[①] 在这种爵士乐中，萨克斯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莱斯特·扬、科尔曼·霍金斯和查利·帕克这样一些萨克斯管弦演奏者具有广泛影响。帕克和"快得发狂的"小号演奏者约翰·B·吉莱斯皮以及另一些爵士音乐家一道，发展成一种新风格的比鲍普乐。有人认为这种音乐是对当时商业化音乐的反抗，恢复作为一种创造性艺术家的爵士音乐家的个性。

比鲍音乐急速而奔放，犹如天马行空。它那种神经质的、狂乱的声音一旦站住脚，物极必反，不久就出现一种冷爵士乐。这

---

① 《美国文学艺术史话》，第122页。

种新音乐注重克制，感情不外露；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黑人小号演奏家迈尔斯·戴维斯和白人乐曲改编者吉尔·伊万斯。这种音乐的盛行，则是罗斯福时代以后的事。

古典音乐作曲家中，约翰·A·卡彭特是首批向民间音乐汲取营养的人物之一，他从1936年起专门从事作曲。乔治·格什温则是向爵士音乐汲取营养的杰出作曲家。他在20年代就为百老汇写了一些优美活泼的音乐作品。1935年，他将多萝西与杜博斯·海沃德描写南卡罗来纳黑人生活的小说《波吉》改编成歌剧《波吉与贝斯》，极其成功地将爵士乐和具有鲜明美国性格的歌剧交响乐综合起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外，在爵士乐与娱乐性轻音乐领域中，还有些与音乐表演和有声电影密切联系的成功作曲家。他们是杰罗姆·克恩、文森特·尤曼斯、科尔·波特、理查德·罗杰斯、杜克·埃林顿等。

由于罗斯福时代主要作曲家多在法国学习过，而且大批欧洲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因受法西斯威胁逃来美国，当时美国作曲家都多少受欧洲现代主义音乐的影响。其中有些优秀人物冲出了现代主义概念的圈子，踏上了广阔的反映美国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另外一些人则挣不脱现代主义观点的束缚，陷入空虚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形式主义的艺术试验，与现实主义愈离愈远。

在前一类作曲家中，最有影响的是艾伦·科普兰、罗伊·哈里斯等人。他们两人都曾在巴黎学习，但回美后不久就力图创作出“在精神和语言上都属于美国的”音乐。科普兰接触过工人、学生和芭蕾舞剧团（它们请他为以美国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写音乐），使他作品的风格日益明朗，与爵士乐或其他民间音乐有某种联系。他最优秀的作品有据美国民间素材写成的3部芭蕾舞曲：《少年比利》(1938)、《牧区竞技》（1942）和《阿巴拉契亚之春》

(1944) 以及据林肯演词而作的朗诵音乐《林肯素描》(1942)等。在他发表的关于音乐的书、文中，经常强调作曲家必须永远记住自己的听众，必须力求走上广阔的民主舞台。哈里斯回国后不久就克服了一度对形式主义的爱好，使他的作品渗透着对人民感到亲切和需要的音乐的追求。他写的乐曲种类很多，但最爱写的是交响乐曲和合唱乐曲。他的作品以宽广的旋律与对称的节奏为特色。在他的 12 部交响乐曲中，以第 3 部 (1937) 最受人欢迎。此曲用单乐章写成，以其抒情气氛与戏剧性的鲜明对比打动人心。此外，沃尔特·皮斯顿也曾就学于巴黎，罗斯福时代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音乐教科书和交响乐、室内乐作品，对当时古典主义风格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的交响乐曲中的第 3 和第 7 部，曾在战后获普利策奖。

这一类音乐工作者还对 30 年代音乐文化的普及工作和为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贡献。大萧条期间，大约有 5 万音乐工作者失业。仅 1935 年"新政"的联邦音乐计划，就雇用 15，000 人。这个计划的领导人尼古拉·索科洛夫的主要目的，是将尽可能高标准的古典音乐带给最广大的听众。他们演出约 15 万次，听众超过 1 亿。他们免费上音乐课，每月学生超过 50 万，其中大部分人是从来就无力进私人举办学习机构的。该计划还建立 38 个交响乐团、举办爵士乐队和牧歌小组，并在中央公园免费教授舞蹈。该计划还重视音乐的民族化，积极鼓励演出美国作曲家的作品，一次就在南部收集到 12 英寸黑人民歌唱片 419 张。

30 年代初，在纽约和其他城市出现了以"国际歌"作曲者皮埃尔·狄盖特命名的工人音乐俱乐部，纽约还成立了由科普兰任主席的作曲家协会，致力于团结进步作曲家以实现建立群众音乐文化的任务。协会会员创作了不少渗透着工人阶级思想的群众歌曲、合唱乐曲和清唱剧。除科普兰外，较成功作者还有马克·

布利茨坦、厄尔·鲁宾逊、保罗·克里斯顿和哈罗德·罗姆等人。布利茨坦是个天才音乐家，5岁即开始表演，20年代曾在巴黎和柏林学钢琴。他不独主张用艺术和法西斯作斗争，还写了讽刺歌剧《摇篮将摇起来》(1937)，以刻画资本主义的腐朽、社会的不公平与工人的团结。鲁宾逊为工程振兴局的影片《以力气换取酬劳》(1939) 所写“为美国人谱的通俗叙事曲”，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危机中鼓舞了听众。当然，它的广泛传播是很得力于著名进步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克里斯顿的“第一交响曲”由全国青年处的纽约交响乐队演奏，于1941年获音乐评论界奖。罗姆写的“发麻”证明，曲调优美的浪漫曲，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

黑人作曲家代表人物威廉·格兰特·斯蒂尔十分熟悉黑人民乐和黑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使他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感人至深。30年代他发表一系列著名作品，但以“美国黑人交响曲”(1931) 最受人欢迎。1940年他发表的清唱剧《他们把他吊死在树上》，充满了愤怒之情与激烈抗议。黑人歌唱家代表人物是特诺·R·海斯和玛丽安·安德森。前者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古典派歌唱家，后者是举世无双的女低音歌唱家。

还有两位城市化民歌作曲家兼歌唱家，也积极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这就是伍迪·格思里和皮特·西格。他们的民歌不是传统民歌，只是运用民歌体裁为阶级斗争服务。他们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都曾漫游全国，到工农群众中歌唱并搜集民歌素材。格思里后来成为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打击目标，但他最著名歌曲“这土地是你的土地”在60年代却成为民权运动歌曲。西格后来降低了他歌曲的激进成分，得到商业上的成功。

追求现代主义或形式主义的音乐家中，老一辈的有沃林福德·里格、弗吉尔·汤姆森、罗杰·塞欣斯等人，他们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应用欧洲传来的12音阶体系或其他“联结声音”的形

式主义手法。开始，他们的作品还被某些人认为是“超激进的”。但是，到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在新的系列手法或“具体音乐”这些最新技术成就相形之下，已被先锋派青年音乐工作者认为不时髦了。

先锋派音乐工作者大都出生于20世纪。他们极力追求新奇性与独特性，不仅否认音乐艺术的思想感情内容，而且致力于创建听众不懂的、像密码一样的音乐。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埃利奥特·卡特、约翰·凯奇和米尔顿·巴比特。卡特作品具有博学气氛与新颖的多层次复合节奏，40年代初开始成名。凯奇开发出一种建筑在“偶然因素”上的作曲学体系，创作乐曲的一切问题都用抽签或抛掷其他偶然标志的办法来解决。巴比特具有较深数学基础，主要致力于将12音阶体系发展成一种“总连续体系”或“总结构体系”。可以认为，这些音乐家似乎忽视了健全理性和艺术良心。但是，他们的音乐虽然脱离群众，却对战后美国音乐界产生重要影响。

乡村音乐或乡村与西部音乐起源于南部山区民间音乐。这种音乐又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民歌民谣发展而成的。20年代时，通过留声机和无线电广播得以流传。1927至1933年间，曾在铁路线上作工的吉米·罗杰斯是全国著名的乡村音乐歌唱家，有100多张唱片留传。他的音乐深受黑人布鲁斯乐的影响，以其“忧郁的约得尔歌曲”闻名。接着传播乡村音乐的是以A.P.卡特为首的卡特家族。这个家族于1927年开始其录音事业，直到1941年，他们一家8人组成歌唱团体，为唱片公司录制300余首歌曲，其中包括19—20世纪初的古老民谣、幽默歌曲、感伤歌曲和许多宗教歌曲，成为乡村歌曲的样板。门罗兄弟也表演乡村音乐，弟弟比尔·门罗更为有名。1932年他参加一个传统的谷仓舞表演团旅行演出，声望渐增。1936年为一唱片

公司录制第一批唱片，获得巨大成功。1938 年自组兰草乐队，为电台的广播节目演奏，极受欢迎。乡村音乐的典型乐器是提琴、班卓琴和吉他。

不过，乡村音乐的极盛期，则在 40 年代末。

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大事年表

(1929年至1945年9月)

1929年

1月1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任纽约州州长。在以后的4年间，他领导的州政府执行的政纲，日益类似他后来任总统时实行的"新政"。

1月15日 联邦参议院以85票对1票批准《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

2月11日 1924年的道斯计划在德国要求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经理欧文·扬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决定进行调整，称为扬计划，将德国赔款总额削减14%，59年付清，并由美、英、法、意、比5国共同建立一国际清算银行。扬计划还取消了协约国对德财政监督。

2月13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规定在今后3年内建造15艘万吨级巡洋舰的法案。

3月4日 赫伯特·C·胡佛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31任总统。

4月5日 政府宣布，实行禁酒法直接造成190人死亡，其中55人为政府执法人员。

4月16日 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有关农业救济与关税改革的建议。同日，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布，美国无意承认苏联政府。

5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总统使用搁置否决权不违反宪法。

6月15日 胡佛签署农产品销售法。该法规定建立一个超党派的联邦农业局，以便帮助农场主成立合作社，但该法未包括大多数参议员所期望的由政府对销售剩余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计划。

9月24日 詹姆斯·杜利特尔中尉首次驾驶全部由仪器操作的飞机飞行。

10月 第一批约翰·里德俱乐部成立，是为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发轫。

10月4日 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抵纽约，对美国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他会见了胡佛总统，并邀请美国参加英、法、意、日将于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

10月24—29日 股票市场崩溃、股值狂泻，损失惨重。

12月16日 胡佛签署一项降低所得税法案，使纳税人在1929年可少缴纳1.6亿美元的各项联邦所得税。

1930年

1月10日 胡佛总统重申其关于犯罪系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的论点。

3月6日 美国共产党领导举行的全国失业工人示威，参加人数总计约为125万，示威中心要求是失业救济与保险，反对削减工资，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4月22日 美、英、日3国代表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规定3国将海军实力保持5:5:3的比例；但一项例外条款规定，如果英国认为自身因法、意增强海军力量而受到威胁，则英国可以增强其海军实力。法、意曾参加谈判，但拒绝批准协议。

5月26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购买酒精饮料的人并不违反联邦法律或第18条宪法修正案。

6月17日 胡佛总统不顾经济学家们的反对，签署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该法将数百种进口商品的税率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胡佛争辩说，新关税将对经济窘迫的农场主有所帮助。

7月4日 美共在芝加哥召开各党派工人代表会议，成立全国失业理事会，为争取失业保险、现金救济，以工代赈，反对歧视黑人等而斗争。

7月13日 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宣布，占全国炼油能力80%的各家石油公司实行联合。此后各石油公司将采用一种新炼油法，从同样数量原油中，可提炼出多两倍的汽油。

8月8日 据农业部报告，密苏里、弗吉尼亚、印第安纳、密西西比等11个州干旱最严重。红十字会宣布，重灾区约有100万农户，除食物供应已

益减少外，又产生了失业和疾病问题。

9月3日 托马斯·爱迪生设计的电气火车客车第一次在新泽西州拉克瓦纳铁路公司的轨道上运行。

11月 辛克莱·刘易斯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美国文学家。

11月4日 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获得参、众两院一些席位及数州州长职位。

12月11日 合众国银行在纽约市歇业，成为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一次银行倒闭，近40万存户受到损失。

12月23日—26日 在纽约地区有6个营业所的切尔西银行和信托公司被迫关闭。3天后，南部和中西部6个州的20家小银行关闭。

1931年

1月19日 全国守法执法委员会主席乔治·W·威克沙姆说，国家将再也无法有效地执行禁酒法；执行该法的障碍在于酒类贸易的高额利润以及公众对禁酒法的冷漠或敌视态度。他建议修改第18条宪法修正案。

2月19日—26日 国会通过退伍军人补助费法，允许退伍军人向国家借款，其最高额可达他们1924年退役费的1/2，最高利率为4.5%。7天后，该法案虽经胡佛否决，国会再一次通过。

2月23日 国会通过法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田纳西河畔建立的马瑟肖尔斯发电厂和化肥厂提供资金，以便政府经营。胡佛在否决信中说他坚决反对政府经营任何旨在与民竞争的企业。

3月11日—12日 两党中进步派领袖在首都举行为期两天会议。他们要求胡佛放弃不干预政策，在第二天通过了主张降低关税，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提供失业保险等决议案。

5月27日 联邦农业局停止定期购买小麦的交易，并宣布结束其稳定价格的计划，表明胡佛农业政策的破产。

6月21日 胡佛总统为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建议延期一年偿付战争赔款和战债。后来在8月11日，18个国家在伦敦签署了同意他的建议的协定。

8月28日 富兰克林·罗斯福州长向纽约州议会提出咨文，要求州议会批准成立临时紧急救济署，由州政府担负起私人和地方救济机构无力再继续负责的救济重担。由于纽约州带了头，其他各州也陆续步其后尘。

9月—10月 800多家银行倒闭，银行恐慌加剧。私人开始储藏黄金。

10月1日 美国钢铁公司对22万工人削减工资10%。

10月4日—5日 克莱德·潘伯恩及其伙伴作首次横渡太平洋直达飞行，从日本起飞，经41小时13分钟抵华盛顿州的韦纳奇。

10月18日 托马斯·爱迪生逝世，终年84岁。

12月8日 总统致国会咨文要求增税以弥补1930至1931年财政年度9.02亿美元赤字，同时要求设立一个对银行、铁路公司及其他企业提供紧急贷款机构。

1932年

1月22日 1月16日得到国会特许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司正式成立，拥有资金5亿美元，并有权借贷免税证券，其数额可达15亿美元。其任务是向银行、铁路公司、大农场等提供贷款。

2月2日 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由国际联盟发起的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军备会议。胡佛总统提出有关裁军的广泛建议，但会议结束时，与会各国未能达成任何重大协议。

3月3日 第20条宪法修正案送往各州审批。该法案将当选总统的就职日期从3月4日提前至1月20日，并规定国会于1月3日召开会议。

3月23日 胡佛总统被迫签署诺里斯—拉瓜迪亚法。该法限制法院使用禁令以禁止罢工，还禁止签订“黄狗”合同，即雇主以受雇工人不参加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合同。但是，胡佛政府对该法执行不力。

5月29日—7月28日 退伍金远征军陆续到达首都。到6月间，共有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约2万至2.5万人，大多数住在华盛顿东南阿纳科斯蒂亚营地。6月17日，由于参议院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提前支付退伍金的法案，部分退伍军人离开了华盛顿。7月中旬，又从加利福尼亚来了一批退伍军人，在国会广场举行了游行，这一下激怒了胡佛政府，它派陆军参谋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亲自指挥武装部队运用残酷手段将这些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全部赶出华盛顿，并放火烧了他们营地，伤亡100余人。

6月27日—7月2日 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在第4轮投票中选举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众议院长议约翰·N·加纳为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说，我誓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7月11日 胡佛否决瓦格纳—加纳法案，并称之为"前所未有的滥用国家巨款的法案"，因为该法案规定由联邦拨款21亿美元举办建筑工程和失业救济。后来，该法案经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修订，才于7月21日由胡佛签署，称为1932年紧急救济与建设工程法。该法规定由复兴金融公司贷款3亿美元与各州作失业救济与以工代赈之用，利息3%，1935年7月偿还。但到1932年底，总共只贷出3,000万美元。

7月18日 美国与加拿大签署关于修建圣劳伦斯河出海航道的条约，以便沟通五大湖与大西洋，并利用水力发电，经费由两国平均负担。

8月16日 以米洛·雷诺为首在本年春组成的农民休假联合会宣布：在取得生产成本以前，不向市场运送农产品。许多农场主联合起来在公路上设置纠察线，拦阻送货卡车。后来这一以艾奥瓦州及其附近诸州为中心的运动遍及全国许多州，有几天甚至使纽约市的牛奶供应受到威胁。

10月31日 农业部年度报告表明：每一农民平均净收入约341美元，而1929年则为847美元；农民所必需的商品价格并不像他们的农产品价格那样跌得快。

11月8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获得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72张，大胜胡佛，当选为美国总统。国会大部分席位亦落入民主党人手中。

12月5日 艾伯特·爱因斯坦教授领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33年

1月2日 美国撤离驻尼加拉瓜的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

2月6日 将当选总统就职日期提前的第20条宪法修正案被正式宣布为宪法的一部分。

3月4日 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提醒国人说：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事是恐惧本身。他还宣称：我将使我国奉行睦邻政策。

3月5日 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在3月9日召开特别会议，并宣布3月6日至9日为全国银行休假日，禁止出口黄金、白银和货币。

3月9日 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并在4小时内通过紧急银行法。该法开始加紧了国家对银行、货币、信贷的控制与管理，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它还禁止储藏和出口黄金。

3月13日—27日 在这两星期中，拥有全国银行资产90%以上的全国75%以上的银行已开始营业。同期，约有10亿美元又重新存入银行，黄金又开始流回国库。

3月22日 罗斯福签署啤酒法。该法规定自4月17日起，啤酒及酒精最高含量不超过3.2%的酒将合法化，并规定每桶酒（31加仑）收税5美元。

3月31日 民间资源保护队成立，4月5日开始活动。它向18至25岁失业青年提供各种工程项目的职业，这些工程项目是用来保护和改善全国自然资源状况的。

4月21日 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到美国进行为期7天访问，罗斯福与之讨论战债与制止纳粹军事威胁等问题。

5月12日 罗斯福签署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哈里·霍普金斯被任命为署长。该署拥有经费5亿美元，作为紧急救济之用。同日，罗斯福签署农业调整法，成立农业调整局，目的在于减少主要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业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

5月18日 根据罗斯福签署的法案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对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实施区域性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计划。

5月27日 罗斯福签署提供证券实情法，加强对证券发行的监督与管理。

6月5日 国会联合决议支持罗斯福总统早些时候宣布的规定：政府和私人债务可用“法定货币”偿还，从而正式取消了美国的金本位制。

6月13日 建立房主贷款公司，帮助即将失去房产赎回权的房主。

6月16日 3项法案成为法律：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建立联邦监督下的工

业自我管理体系，并拨款33亿美元建立公共工程局；格拉斯—斯特高尔银行法规定将商业银行和它的投资机构完全分开，以防止银行利用存款或联邦储备系统资金进行投机，并规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农业信贷法规定对农业信贷活动进行调整。

7月—8月 全国工业复兴法签署后，工人为争取资方承认工会，加强了罢工活动。1933年上半年任何一个月，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均未超过603,000个工作日，7月却增至1,375,000个工作日，8月增至2,378,000个工作日。

8月1日 国家复兴管理局对所有同意遵守该局各项规定的企业发给蓝鹰徽章，悬挂在企业的营业地点或印在它的产品上，作为与政府合作的证明。

8月17日 劳工部长宣布，就业已达到1931年10月水平，工资发放额高于3月份。这说明，国家复兴管理局成立初期效果显著。

11月8日 建立民政工程局，以霍普金斯为局长，不到30天，该局的业务便兴旺发达起来，使400多万失业者及其家属有了谋生之道。

11月17日凌晨 在罗斯福的积极推动下，美国与苏联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

12月5日 犹他州成为第36个批准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州，禁酒法被正式废除。

12月24日 1、500名因反对世界大战而服徒刑的人根据罗斯福总统的一项法令恢复了公民权。

1934年

1月 弗朗西斯·E·汤生医生建立老人周转金公司，设想每月发给每一超过60岁的老人200美元政府养老金，限令当月用完，认为这样既可能解除老人贫困，又可繁荣经济。同月，休伊·朗建立共享财富社，提出共享财富计划。

1月8日 联邦最高法院以5对4票裁决维护明尼苏达州的一项延期偿付抵押贷款法。

1月31日 罗斯福总统为稳定美元含金量，将金价定为35美元1盎斯，美元含金量为它1933年以前价值的59.06%。

2月12日 罗斯福总统成立进出口银行以促进对外贸易，该银行被授权对出口商发放短期和长期贷款。

3月1日 巴拿马坚决要求美国根据1904年运河区条约的规定，以黄金支付运河区的租金，拒收支票。

3月5日 联邦最高法院以5对4票确认各州有确定牛奶价格的权力。

3月24日 国会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案。该法案规定，一俟菲律宾立法机关批准，菲律宾可于1946年宣布独立。

4月 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由支持罗斯福与“新政”逐渐变为反对罗斯福与“新政”。

4月12日 以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为首的奈委员会开始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发横财的武器制造与贩卖商及金融家的罪恶活动。

4月27日 上年12月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7届泛美会议上达成的反战公约，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3个国家签字。

5月—9月 在本年以要求承认工会为中心内容的1,856次罢工中，特别重要的4次发生在此期间。5月达到高潮的俄亥俄州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和5月开始的旧金山码头工人罢工与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是左派领导的，都取得了胜利或基本胜利。9月1日开始的100万纺织工人全国性罢工虽然规模巨大，但由于拒绝左派团体帮助，反而失败。

5月18日 国会通过6项控制犯罪的法律，其中一项规定：凡干涉或袭击正在值勤的联邦司法官员者，以反联邦罪论处。在此后半年中，4名臭名昭著抢劫杀人犯被警察和联邦特工人员击毙。

6月6日 罗斯福签署证券交易法。该法规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执行此法及1933年证券法，进一步管理证券市场。

6月12日 国会制订互惠贸易法，允许总统对同意降低美国商品进口税的国家降低关税。

6月25日 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宣布：有1，600万美国人在接受救济。

6月28日 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发放长期低利修理房屋贷款和建筑新房贷款。

8月 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组织——美国自由同盟成立。

8月1日—15日 美国正式结束对海地的军事占领。

10月25日 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一列火车以57小时从洛杉矶到达纽约市，创造一项火车速度纪录。

11月6日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又各增加9席。同日，内布拉斯加州首先实行立法机关一院制。

1935年

1月4日 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了加强社会改革的第二次"新政"。

1月29日 在库格林神父、赫斯特报系等煽起的群众反对浪潮中，参议院再一次否决了美国参加国际法庭的提案。

4月8日 国会通过紧急救济拨款法。

4月底5月初 美国商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与罗斯福总统决裂，并谴责"新政"。

5月1日—11日 罗斯福总统根据4月8日紧急救济拨款法的授权，于1日建立重新安置局，以帮助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6日建立工程振兴局，计划将500万无业男女投入劳动（实际上从未达到此数）；11日建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将电力输往农村地区。

5月27日 在这个所谓"黑色星期一"，联邦最高法院扼杀了3项"新政"立法，其中包括全国工业复兴法。

6月7日 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以便为适当使用全国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研究并提出计划。

6月26日 在工程振兴局中设全国青年处，帮助失业青年就业和在校青年半工半读。

7月5日 罗斯福签署全国劳工关系法或瓦格纳法，该法规定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提供政府帮助，并建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

8月14日 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规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险制度。

8月24日 罗斯福签署银行法，从而完成了确立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管理计划。

8月26日 罗斯福签署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惠勒—雷伯恩法），对大企业进行控制，而且在3年之内将使所有公用事业帝国解体。

8月31日 总统签署保守派激烈反对的税收法。同日，国会通过罗斯福勉强同意的中立法。

9月8日 路易斯安那州国会参议员、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上实力派人物休伊·朗遇刺身亡。

11月10日 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斯等人反对劳联不同意在基础工业中组织产业工会的政策，愤而脱离劳联，组成以刘易斯为首的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刘易斯并于23日辞去劳联副主席职务。

1936年

1月6日 联邦最高法院以6对3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宪。

1月中旬 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费尔斯通橡胶公司中出现一种新的、在建立产业工会中立过大功的斗争方式——静坐罢工。

2月10日 1934年路易斯安那州对报纸征税的规定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因此规定被认为违反出版自由原则。

2月29日 国会通过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以绕过联邦最高法院农业调整法违宪的判决，继续补助农民少种商品作物。

3月2日 美国和巴拿马签订一项条约，规定美国取消对巴拿马“独立与自由”的保护权，将巴拿马运河使用租金从25万美元增为43万美元。

6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以5对4票判决：纽约州的一项规定妇女与儿童最低工资的法律为违宪（其他17个州也有类似法律）。

6月23日—27日 民主党在费城举行代表大会，又一次提名罗斯福和加纳为正、副总统候选人。

8月3日 国务院通告：由于西班牙已进行内战数周，要求所有在该国的美国人立即离开。

8月11日 查尔斯·A·林德伯格与亚历西克斯·卡雷尔共同研制的、可用作

人工心脏的唧筒，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科学大会上展出。

9月25日 美国与英、法一致协议，固定并保持美元、英镑与法郎之间的汇率。

11月3日 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罗斯福获得选举人票523张，共和党艾尔弗雷德·兰登只获得8张，民主党在众议院几获得3对1的优势，在参议院96个席位中占75席，共和党只占16席；33个州长改选，民主党人当选的达26人。

12月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的销售量突破100万册。

1937年

1月8日 美国将中立法实用于进行内战的国家，对西班牙实行全面武器禁运。

2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一项非难社会保障法的上诉。

2月11日 由于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不愿用武力干涉，通用汽车公司只得屈服，持续44天的底特律汽车工人静坐罢工结束，公司答应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为惟一谈判代理人，有权与公司举行集体谈判以取得关于工资、工时等的协议。

3月2日 由于面临静坐罢工威胁，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子公司）签订了美国劳工运动史上也许是最重要合同。不久，所有美国钢铁公司的子公司都签订了类似合同，合同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增加了工资，缩短了工时。这样，1901年以来一直阻止在基础工业中组织工会的美国钢铁公司的领导作用结束了。

3月29日 联邦最高法院改变原来立场，判决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符合宪法。

4月22日 纽约市举行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和平示威。示威者声称将拒绝支持美国政府可能进行的任何战争。

5月1日 国会通过“永久中立法”以代替1936年中立法，除将军火武器禁运对象扩及任何进行内战国家外，还增加了“现购自运”条款。

5月30日 共和钢铁公司顽固反对工会化运动，勾结警察在其芝加哥工厂

附近向罢工者及其家属开火，打死10人。

7月22日 国会通过班克里德—琼斯农场租佃法，将重新安置局改为农场保障局，以帮助佃农成为土地所有者，资助小农保存其土地或撤出瘠地，并帮助农业季节工人。

同日，国会决定不讨论总统的司法改革方案。

8月 主要由于联邦政府大量削减开支，从本月起，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

9月1日 瓦格纳—斯特高尔国有住宅法得到批准，并在内政部设立国家住宅管理局，是向城市贫民提供适当住宅的长期运动的开端。

10月5日 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防疫演说”，主要是针对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但也涉及德、意法西斯侵略活动。

11月15日—12月21日 总统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要求通过几项“必不可少的”立法，如新农业调整法、工资工时法、行政部门改组法等，但一无所成。

12月12日 日空军在中国南京附近长江中炸沉美国炮舰帕内号。

1938年

1月3日 罗斯福在国会咨文中强调加强军事实力的必要性，着重指出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极可能使美国不得不自卫。同月28日，总统要求国会拨款建立能保卫两洋的海军。

1月22日 16家石油公司与30名经理因共谋规定中西部地区的汽油价格，被判有罪。

2月5日 美、英、法通知日本，除非日本保证不建造任何大于1936年伦敦海军会议规定的35,000吨的船只，否则3国也将建造此种船只。

2月16日 国会通过新农业调整法。除对按定额耕种土地而又遵守土壤保持方法的人给予津贴外，还实施“常平仓”计划，贷款给农民储存农产品以待善价。

4月 月初，英、法、美分别撤销驻奥地利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实际上承认德并奥。

5月17日 国会通过文森扩充海军法，规定增加海军吨位20%以上，并建立一支拥有3，000架飞机的海军航空队。

5月26日 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立，因其主席为马丁·戴斯，亦称戴斯委员会。原来要求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是反法西斯主义众议员，但在戴斯领导下，却成为一个主要反共产主义的机构。

6月24日 食品、药物、化妆品法获得通过，该法禁止作假广告、乱贴商标等商业恶习。

6月25日 罗斯福签署公平劳动标准法（亦称工资工时法）。该法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并禁止雇佣童工。

8月16日 罗斯福在其演说中向希特勒提出隐约警告：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自有主意。

9月21日 新英格兰及纽约州遭飓风袭击，造成特大破坏和600人死亡。

10月3日 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就9月30日英、法、德、意4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声明说，这是20年来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和法律的世界新秩序”的最好机会。

11月8日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众院81个席位，参院8个席位，并有13人当选州长。虽然它在国会中仍为少数派，但它与民主党保守派联盟得到进一步壮大。

11月15日 罗斯福严厉谴责纳粹政权残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并召回美驻德大使。

11月18日 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改组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选举约翰·刘易斯为主席，并宣布脱离劳联而独立。

12月19日 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积极推动下，罗斯福于11月30日批准对中国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并于本日落实。

1939年

1月4日—12日 总统在4日致国会咨文中发出重整军备的号召，指出应增加防御性武器以震慑轴心国。5日，他送交国会的1939—1940财政年度预算中，包括当年扩军计划所需的11.26亿美元。12日，他又在一份特别

咨文中要求国会在3年内追加5.25亿美元额外开支，大部用于扩充空军。

2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静坐罢工为非法。

4月3日 国会通过上年未获通过的联邦行政部门改组法。后来，罗斯福据此法在9月8日发布8248号行政命令，设立总统办公厅，下辖白宫办公室、预算局（财政部移来）和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还设6个行政助理。

4月11日 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的斗争中站在民主国家一边。

4月30日—10月31日 纽约昆斯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主题为“明天的世界”，会上展出了包括电视机在内的各种科学奇迹。

5月5日 南、北两个卫理公会抛弃前嫌，并拉拢一些较小派别，合而为一（两个黑人卫理会未加入）。

5月16日 纽约州罗彻斯特首先实行食品券计划，随后传到许多城市。受救济者持食品券可得到免费剩余农产品以补充其日常用粮的不足。

6月7日—12日 英王乔治六世及王后访美，罗斯福在此期间警告希特勒：一旦伦敦被轰炸，美国就参战。

6月28日 泛美航空公司首开美国与欧洲间客机定期航行业务。

7月26日 在公众与国会要求下，罗斯福决定通知日本，美国将于半年后废除1911年两国通商条约，日本反应强烈。

9月3日 罗斯福在谴责欧战时宣布：“美国仍将保持中立，但我无法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

9月8日 罗斯福宣布美国处于有限紧急状态，以便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防法规定的管理经济的权力。

9月23日—10月4日 美国发起在巴拿马城召开拉美国家外长会议，在加拿大以南大西洋岸周围300—1，000英里区域内建立一安全区（亦称中立区），由参加会议的21个共和国进行巡逻，不许有任何非美洲交战国的任何敌对行动。

10月21日 铀顾问委员会开会考虑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该委员会是10月11日总统收到爱因斯坦一封有关的信件后成立的。

11 月 4 日 罗斯福签署新中立法。此法撤销了 1937 年中立法中武器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并禁止美国船只与交战国贸易，美国人乘交战国船只旅行。

12 月 2 日 由于苏联进攻芬兰，美国宣布对苏联实行军事物资道义禁运，10 日又贷给芬兰 1，000 万美元。

1940 年

1 月 3 日 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指出，他希望美国人中鸵鸟式人物少一些，因为鸵鸟把头钻进沙里对它的生命安全没有好处。他还要求国会拨款 18 亿美元用于国防。

1 月 26 日 美国拒绝同日本续订商约，但允许像条约有效时那样与日本进行贸易。

2 月 26 日 成立防空司令部，以便针对可能的袭击部署空防。

4 月 20 日 美国无线电公司展出一种用电子聚焦代替光聚焦的显微镜。

4 月 22 日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加利福尼亚州与亚拉巴马州禁止布置罢工纠察线的法律违宪，因为它违反第一条宪法修正案。

5 月 15 日 伊戈尔·西科尔斯基在美国展出第 1 架直升飞机。

5 月 16 日 前一日荷兰投降，罗斯福本日致国会咨文中要求增拨 11.8 亿美元国防费，并建议每年至少生产 5 万架飞机，建设一支拥有 5 万架飞机的空军，同时要求国会不要做任何阻碍或拖延向英、法交付美制飞机的事情。

6 月上半月 上旬起，美国已开始悄悄向英、法供应飞机等剩余军事物资。10 日，总统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抨击孤立主义观点，谴责意大利战争行动，表达援助英、法决心。15 日，他下令研究原子弹。

6 月 16 日 美国通知各轴心国，美国将不承认德国人接管法荷在拉美的殖民地。

6 月 28 日 国会通过史密斯法（或外侨登记法），要求 350 万外国人登记并按指纹；规定任何团体提倡或教导用暴力推翻政府为违法，任何人参加这种团体也违法。

7 月 15 日—19 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打破惯例，在民主党于芝加哥举行

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其竞选伙伴为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

7月26日 日本政府提出当前国策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同日，美国正式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润滑油和优质废金属。

8月27日—9月14日 国会击败各种修正案，通过一项选征兵役法，规定21岁至35岁男子均在选征之列。

8月29日 彼得·C·戈德马克在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展出彩色电视。

9月2日 美国与英国签订协议：美国将50艘驱逐舰交给英国，英国除保证决不放弃它的舰队外，还将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海地区英国领土上的海空军基地租与美国99年。

9月25日—26日 由于日军不听美国警告，于24日进入印度支那，关于拟议中的日、德联盟也得到证实，美国于25日宣布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并于26日发布总统命令，禁止输出各种型号废钢铁，还抽回美国在日投资。

10月12日 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公布后，美国经过一次外交政策的激烈争论，最后总统于本日发表演说称：无论欧亚两洲独裁国家怎么联合，美国人民、所有美洲国家人民都反对绥靖主义。

10月29日 1,600多万人根据选征兵役法进行登记，准备应征入伍。

11月5日 罗斯福以449张总统选举人票对共和党的温德尔·威尔基的82张选举人票当选连任。

11月30日 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罗斯福于当天宣布贷给中国国民党政府1亿美元，并决定购买6，000万美元的中国黑钨。

12月20日 成立生产管理局，以协调和加强军用与民用生产。

12月29日 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声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1941年

1月6日 在致国会咨文中，罗斯福再次声明：他决心使美国成为反侵略国家的兵工厂，同时指出战胜独裁者后意味着出现一个以人类四大自由

为基础的世界。这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1月29日—3月27日 英、美在华盛顿秘密举行联合参谋会议决定：如美国参与对德、对日或同时对德、日作战，美国军事卷入应先欧后亚。

2月19日 罗斯福批准将美国国债最高限额提高到650亿美元。

3月5日 巴拿马同意美国扩大巴拿马运河周围空防区的请求。

3月11日—12日 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并经总统签署。

3月17日 国家美术馆在首都华盛顿开放。

3月19日 成立国防调解委员会，帮助工会和资方对不同意见进行谈判，以防止罢工。

3月30日 海岸警卫队根据总统命令扣留当时留在美国港口的两艘德国船，28艘意大利船和35艘德国控制的丹麦船。后来在5月15日又扣留15艘法国船。

4月11日 成立物价管理局，以便规划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

4月21日 美、英、荷军官在新加坡会晤，讨论一旦日军进攻新加坡，3国如何协调军事行动。

4月25日 总统宣布将美国中立巡逻区扩大至美国海岸与西经25度之间的区域。由于国会孤立派谴责扩大巡逻区实际上是护航，与参战无异，总统特别强调了扩大巡逻区与护航的区别。

4月28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黑人乘坐火车待遇应与白人相同。

5月6日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中国纳入租借法援助范围。

5月27日 总统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

5月31日 杰克·柯克兰根据厄斯金·考德威尔小说《烟草路》改编的戏剧，在百老汇剧院上演3,180场之后停演。

6月11日—24日 11日传来美国货轮卢宾·穆尔号5月21日在非交战区被德国潜艇无故击沉的消息。14日—17日，总统下令冻结德、意在美国的全部财产。16日，德驻美所有领事馆全部关闭。16日—20日，停止向日本运送25万加仑润滑油；几天后，全部石油产品出口均受到管制。22日，意驻美领事馆全部关闭。同日德进攻苏联。24日，总统给予苏联

4,000万美元贷款，并答应援苏。

7月24日 各建筑工会与生产管理局达成劳方与政府之间的第一个协议，规定在紧急时期限制举行罢工的权利。后来在12月15日，该项政策扩大到所有战时工业部门。

7月26日 总统下令没收日本所有在美国存款，同时命令将菲律宾军队置于美国直接指挥之下。

8月14日 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举行会晤，并发表《大西洋宪章》。

9月9日—22日 9日，美国轮船蒙大拿号和塞萨号在冰岛附近被鱼雷击沉。11日，罗斯福命令海军攻击任何进入受美国保护的水域的德、意潜艇或军舰。22日，美国货轮桃红色之星号又在冰岛海域被击沉。

9月23日 纽约世界博览会为一定时密封容器举行仪式，容器中藏有关于20世纪文明的事例和资料，将在5，000年后打开。

11月7日 由于又发生几起德国潜艇袭击美驱逐舰事件，国会通过法律，废除1939年中立法中某些条款，以便武装商船。

12月7日—8日 7日晨日本空军突袭美国珍珠港，造成重大损失。8日，美对日宣战。不久，罗斯福答应蒋介石中美结成军事同盟的要求。

1942年

1月1日 26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同意《大西洋宪章》制定的目标,为打败轴心国作出努力,并保证不与轴心国家单独媾和。

1月3日 日军占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部队撤往马尼拉对面的巴丹半岛。

1月12日 罗斯福总统建立全国战时劳工局，以解决劳资冲突。

1月16日 成立战时生产局，以执行生产管理局和1941年9月成立的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任务。

3月 由于社会压力和军方建议，美国政府根据2月间总统的决定，开始将太平洋沿岸11.7万日本移民（其中2/3为美国公民）拘禁于内地10个集中营内，到9月份拘禁完毕。这些日本移民受到很不公平待遇。

4月9日—5月6日 日本军队于4月9日占领巴丹半岛。10日起，美国和

菲律宾战俘被迫在极艰苦条件下长途步行，数千人被折磨致死或被日军杀死，称为“死亡行军”。5月6日，最后一小批死守于巴丹一要塞的美军被击溃。

4月18日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美国飞机首次轰炸日本东京及其他城市，大大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

5月5日 美国开始实行食糖定量配给制，以后还对其他紧俏商品实行定量配给。

5月7日—8日 美国海、空军在珊瑚岛战役中首挫日军，使日军损失军舰5艘、飞机100架、兵力3,000，并使日军入侵澳大利亚计划成为泡影。

5月20日 成立民防局，训练平民在当地一旦发生空袭时进行紧急防卫。

6月4日—5日 美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大败日军，使日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型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和飞机275架，美军只损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飞机100架。这是一次关键性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8月7日 为保护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供应线，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登陆，与日军进行长达半年的激烈争夺战，于1943年2月9日完全控制该岛。

8月12日 美国制订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同日，派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参加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晤，讨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8月17日 美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欧洲大陆。

10月9日 美、英同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

10月21日 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税额最高涉及范围最广的税收法。

11月8日 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美、英联军40万人在法属北非若干地点登陆。

12月2日 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可控的链式反应。

12月21日 用广泛的科学研究有力地驳斥了种族优越论的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逝世，享年84岁。

1943年

1月12日—24日 罗斯福、邱吉尔与美、英主要军事计划人员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制订欧洲战争战略。在24日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阐述了盟国将迫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决心。

2月9日 总统宣布：美国各军工厂每周至少须开工48小时。

3月2日—5日 美军在俾斯麦群岛战斗中大创日军，使其损失10艘军舰、12艘运输船、100多架飞机和1.5万名兵员。

4月8日 总统发布命令，将工薪、物价冻结在目前水平上。

5月1日—2日 总统授权政府接管因矿工罢工而关闭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各无烟煤矿。次日，矿工联合会让矿工复工。

5月11日—6月2日 美军在日军占领的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经3周苦战，美军夺回前哨阵地。在此期间，德、意在北非的军队于5月13日全部向盟军投降。

5月22日 美国海军宣布，本年头20个星期美国生产700艘军舰，相当于上一年全国生产总和。

5月27日 在黑人斗争压力下，总统禁止在承包政府军工生产合同的任何工业部门实行种族歧视。

6月14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强迫中小学生向国旗敬礼违宪。

6月20日 底特律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造成25名黑人和9名白人死亡，500人受伤，黑人被捕者达1,300人。

6月25日 国会不顾总统否决，通过史密斯—康纳利法（战时劳资纠纷法），规定在任何军工部门中工会罢工为非法；而且工会打算举行任何罢工，必须在30天前发出通知。

7月10日—25日 10日—12日，美、英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19日，美国飞机轰炸罗马，墨索里尼向希特勒乞援。25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国王迫使墨索里尼辞职并加以软禁，由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接任首相，新政府立即派特使与美、英进行秘密谈判。

8月2日 美国政府宣布，自10月1日起，父亲们须应征入伍。

8月11日—24日 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各带参谋人员在魁北克市会晤，讨论盟军进军意大利和法国的计划，但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未确定。会议还同意建立东南亚统帅部，以英国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统帅。

10月19日—30日 美国国务卿、英国外相和苏联外长在莫斯科会晤，商谈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广泛指导原则，并为3国首脑会议作准备。

11月9日 44国在美国首都举行会议，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晤，保证战斗到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决定剥夺日本自1894年以来所获得的全部领土。

11月28日—12月1日 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会议，最后确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间，保证战时战后相互合作，更具体地确定战争目标。

12月17日 美国国会应总统请求，通过一法案，废除1882至1913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

1944年

1月16日 艾森豪威尔在英国设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师部，从事制订进攻欧陆的计划。

2月22日 马绍尔群岛全部被美军控制。

3月1日 美国航空部队的实力达到创纪录水平，共有240多万人和约8万架军用飞机。

4月22日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派美军观察团赴陕甘宁边区考察的要求。罗斯福是应坚决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兼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之请提出这一要求的。后来在7月间，美军观察团去了延安。

5月3日—8日 美国医学界出现两件大事：3日，《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发表一篇论文，透露了人工合成奎宁的研制情况，表明已有了治疗疟疾的代用品；8日，纽约19所医院建立了第一座眼库。

5月20日—22日 美共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通过解散美国共产党提案，并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成立大会。

6月6日　拂晓前，分乘5，300艘舰船渡过英吉利海峡的盟军在绵延60英里的诺曼底海滩登陆。

6月19日—20日　盟军在菲律宾海战斗中大挫日军，共击毁日本航空母舰3艘、其他各种船舰多只和飞机200多架。美军损失不大。

6月22日　总统签署士兵权利法（正式名称为军人重新安置法）。

7月1日　44国代表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为期3周会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7月19日—20日　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第4次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名哈里·杜鲁门为其竞选伙伴。

8月　费城发生的种族冲突使全城陷于瘫痪状态，黑人显出了英勇不屈的反对种族歧视精神。

8月14日　战时生产局同意有限地恢复若干在黑市以外难以买到的消费品生产。

8月21日—10月9日　美、英、中、苏代表在美国首都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计划建立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称为联合国。

8月25日　盟军解放巴黎。

9月8日　德国第一次向伦敦发射超音速、不可能被侦察到的V—2火箭(6月13日曾发射V—1火箭,该火箭可携带1吨炸药每小时飞行350英里)。

9月11日—16日　总统与邱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筹划打败德、日事宜，并就战后如何处理占领问题作出决定。

10月21日　蒋介石迫使史迪威离华返美。

11月7日　罗斯福以432张对99张总统选举人票击败托马斯·杜威，第4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11月24日　美国B—29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首次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袭——全面轰炸东京。

12月16日—26日　德军猛烈反攻比利时和卢森堡边界阿登森林美军，最后虽被制止，但双方伤亡共达数十万人。

1945年1月—9月2日

1月3日　众议院通过决议，将临时性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改为永久性

机构。

2月4日—12日 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晤，商谈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并达成协议。在一项秘密协定中，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直接干涉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是非法的，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2月19日—3月14日 美国以重大代价攻占硫黄岛，因该岛离东京仅750英里，可将日本全境置于中程轰炸机袭击范围之内。

3月3日 美国和19个西半球国家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谈，并签署查特佩克议定书，相互保证维护和尊重彼此领土和政治权利。

4月1日—7月2日 美国攻占距日本本土350英里的冲绳岛，计划从该岛大举进攻日本。

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逝世，由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

4月25日 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德军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德军防御迅速解体。

4月25日—6月26日 50个国家代表在旧金山开会，起草联合国宪章。

5月7日 凌晨2时41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代表残存的德国海陆空军向设在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盟军总部无条件投降。

7月16日 一颗实验型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多戈成功地爆炸。

7月17日—8月2日 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会晤，商讨德国的非纳粹化问题和即将开始的对德占领条款，并起草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7月26日—28日 威廉·福斯特领导清算了白劳德路线恢复美国共产党。

8月6日—9日 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1颗原子弹，造成巨大损失。9日，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9月2日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与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正式投降。

主要外文参考书目（包括中译本）

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外文书籍和文献，篇幅浩繁，不胜枚举。这里只能选列我们了解到而且认为最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局限于、也不包括所有本书参考的文献和书籍。

手稿与口述史料

纽约州海德公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所藏罗斯福、他的家人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的手稿、照片、影片等非常丰富，仅罗斯福白宫文件就有3,500多立方英尺（其他文件与档案约与此相等）。这些白宫文件分4大系列和许多较小系列，其中最重要的有：总统个人档案（President's Personal File），约9000夹；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档案（Alphabetical File），包括群众给总统来信1,500万封；官方档案（Official File），包括政府各部、各"新政"机构以及属员给总统的正式与非正式报告；总统秘书档案（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选择较严，量较少，但对研究罗斯福政府外交极有参考价值；记者招待会（Press Conferences）材料，除1,000多次记者招待会记录外，还包括一些接见企业界人士、宗教界与青年界领袖、以至国会议员等记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档案（Record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约200立方英尺，对研究罗斯福历次竞选运动甚有参考价值。其次，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罗斯福时代手稿也很丰富。有关口述史料，则多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料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不一一列举，可参阅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此书和下举4书的原文书名、出版时间与地点，见"其他书

籍”部分）的参考文献目录，其中手稿（Manuscripts，包括口述史料）部分共分12类：罗斯福与新政派的、国会议员的、胡佛与保守反对派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关于农业的、关于劳工的、关于进步与激进思潮的、关于外交的、关于州政的、记者们的、以及杂类。每一类都列出重要人物文稿、口述史料及其收藏处。弗兰克·弗雷德尔1990年出版的《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书提到的手稿与口述史料更新更丰富，但未专列，只见于各章注释。有关胡佛外交的原稿资料，可参阅罗伯特·菲雷尔：《大萧条中美国外交：胡佛—史汀生外交政策》第302—308页。有关罗斯福外交的原稿资料，可参阅弗雷德里克·马克思第三：《沙漠大风：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第405—409页。后两书中都列有其他有关国家资料。有关罗斯福对战后美国政治影响的手稿与口述史料，可参阅威廉·洛克滕堡：《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阴影下》第249—254页（此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有中译本，书名《总统身后》）。

政府和团体文件汇编、统计资料集、各种公报

American Neutrality Polic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6th Congress, 1st Session（《美国中立政策：第76届国会第1次会议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记录》），首都华盛顿，1939

Bently, Eric, ed.,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Excepts from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埃里克·本特利编：《叛国罪30年：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材料摘编》），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71

Bernstein, Barton J. and Allen J. Matusow,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巴顿·J·伯恩斯坦与艾伦·J·马图索：《杜鲁门政府文献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6

Birley, Robert, 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4, *1914—1939*（罗伯特·伯利编：《美国历史演说与文献》，第4卷（1914—1939）），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国情普查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1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统计摘要》),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每年出1本。

Commager, Henry S.,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亨利·S·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献》),第6版,纽约:阿普尔顿公司,1958

Communist Party of U.S.A., Election Platform, 1936 (《美国共产党1936年竞选纲领》),纽约,1936

The 9th Convention Resolutions (《美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决议》),纽约,1936

Congress,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7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39Vols. (国会文件:第7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珍珠港袭击事件联合调查委员会听证记录》,共39卷),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6

Congressional Record (《国会记录》),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28—1945年部分

Congress'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Investiga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Hearings Pt. 1: Economic Prologue* (国会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力量集中的调查。听证记录第1部分:经济前言》),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39

Investiga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经济力量集中的调查: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与建议》),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1

Daily Proceeding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CIO, 1939—1944 (《1939—1944年产联历届代表大会议事录》),1946—1955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Yearbook of Agricultures*, 1929—1945 (农业部:1929—1945年《农业年鉴》),首都华盛顿,1929—1945

Agriculture Statistics, 1936—1957 (1936—1957年《农业统计资料》),首都华

盛顿，1936—1958

Department of Commerce，*A Social - Economic Groupings of the Gainful Workers in the U. S. A.*（商业部：《美国有酬工人的社会—经济集团》），首都华盛顿，1933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国务院：《1918—1945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1—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1942—1945. 4 Vols.（《1942—1945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部分》，共4卷），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6—19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Cairo and Tehran*，1943（《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文件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1941—1942*，and Casablanca，1943（《美国对外关系：1941—1942年华盛顿会议和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文件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8

Fro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1943（《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华盛顿会议与魁北克会议文件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 2Vols.（《1931—1941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本部分》。共两卷），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马尔他会议与雅尔塔会议文件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Quebec*，1944（《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魁北克会议文件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1933—1939*（《1933—1939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苏联部分》），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1945*（《1929—

1945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3—1969

Peace and Wa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31—1941(《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3

Press Releases（《新闻发布》)，首都华盛顿，1931—1939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1—8 (*1938—1945*)（《1938—1945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8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39—1946

Election Platfo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940（《1940年美国共产党竞选纲领》)，纽约，1940

Garraty, John A. and Robert A. Divin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约翰·A·加勒蒂与罗伯特·A·迪万：《20世纪美国：当代文献与舆论》)，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68，第V-Vi篇

Heffner, Richard 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理查德·A·赫夫纳：《美国文献史》，纽约：新美国图书公司，1976，第25—28章

Inter-American Conference for Maintenance of Peace. Report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U. S. A.（《美国代表团在美洲各国维持和平会议上的报告》)，首都华盛顿，1937

Johnson, Donald Bruce, Compi., *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1840—1972*（唐纳德·B·约翰逊编：《1840—1972年全国性政党纲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28—1944年历次大选部分

Labor Research Association, *Labor Fact Book*, 1—7（劳工研究协会编印：《劳工实况》，第1—7集。纽约，1931—1945

Lewis, E. A., Compi., *Neutrality Laws*（E. A. 刘易斯编：《中立法汇编》)，首都华盛顿，1951

Neutrality, Peace Legislation and our Foreign Polic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Senate, 76th Congress, 1st Session（《中立，和平立法与我们的外交政策：第76届国会第1次会议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记录》)，首都华盛顿，193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46. Selected Documents（《1946年巴黎和会文件

选》)，首都华盛顿，1947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with Studies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附有联邦政府行政管理研究资料的委员会报告》)，首都：政府印刷局，1937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Unemployment and Other Interstate Industrial Problems（《失业与其他州际工业问题会议议事录》，阿尔巴尼市，1931〔注：参与会议的有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纽约等州州长〕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总统社会发展趋势研究委员会公报：《美国新近社会发展趋势》)，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33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17—1955（《美国劳联年会议事录公报（1917—1955)》)，首都华盛顿，1917—1955

Resolutions of the 10th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 S. A., The Democratic Front, the 1938 Election, Party Building（《美国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决议：民主阵线、1938年选举、党的建设》)，纽约，1938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and Roger Bruns, eds., *Congress Investigations: A Documentary History, 1792—1974*（小阿瑟·M·施莱辛格与罗杰·布伦斯编：《国会调查报告：1792—1974年文献史》)，纽约：切尔西家族出版社。1929—1945年部分

Senate, *Violations of Free Speech and Rights of Labor*.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1936—1940*（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小组委员会1936—1940年听证记录：《违反劳工自由言论与权利的情况》)

Statutes at Lar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taining the Laws and Concurrent Resolutions and Treatie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ther than Treaties and Proclamations（《美国普通法规汇编（包括法律、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条

约以及条约与声明以外的国际协定)》)。本书系国会授权、在国务卿指导下编纂、印刷并出版。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各卷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美国与中国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这一时期)》),首都华盛顿,1949〔注:亦称《中国问题白皮书》〕

Woodward, E. L., and Rohan Butler,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2 (〔英〕E. L. 伍德沃德与罗汉·巴特勒编:《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献》,第2辑,伦敦,1946—1979

Workers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National Election Campaign Committee. *The Platform of the Class Struggle. National Platform of 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 1928 (美国工人(共产)党全国竞选委员会:《阶级斗争纲领:工人(共产)党1928年竞选政纲》,纽约,1928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Fin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 (工程振兴局:《联邦紧急救济署最后统计报告》,政府印刷局,194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附《开罗会议的摘要记录》,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注:此摘编是从美国方面记录译出的。美方记录有几种版本,和苏联记录有所出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文献》,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李巨濂、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

文集、通信集、回忆录、日记

Berle, Beatrice, and Tvavis Beal Jacobs, eds., *Navigating the Rapids*, 1918—

1971: *The Papers of Adolf A. Berle*（比阿特丽斯·伯利与特拉维斯·B·雅各布斯编:《穿越急流，1918—1971：阿道夫·A·伯利文件集》），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1973

Beneš, Eduard, *The Memoirs of Dr. Eduard Beneš*.（〔捷〕爱德华·贝内什：《爱德华·贝内什博士回忆录》），伦敦：艾伦与昂温公司，1954

Blum, John M., ed.,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3Vols.（约翰·M·布卢姆编:《摩根索日记选》，共 3 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9，1965，1967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想像的代价：亨利·A·华莱士 1942—1946 年日记》），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3

Bowers, Claude G., *My Mission to Spain*（克劳德·G·鲍尔斯：《出使西班牙记》），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54

Bullitt, Orville H., ed., *For the President, Personal and Secre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William C. Bullitt*（奥维尔·H·布利特编：《致总统私人秘函：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威廉·C·布利特通信集》），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2

Campell, Thomas M., and George C. Herring, Jr., eds., *The 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43—1946*（托马斯·M·坎贝尔与小乔治·C·赫林编：《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 1943—1946 年日记》），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5

Carmichael, Donald S., ed., *F. D. R. Columnist: The Uncollected Column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唐纳德·S·卡迈克尔编:《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未辑录的专栏文章》），芝加哥：佩莱格里尼与卡达希公司，1947

Davies, Joseph E., *Mission to Moscow*（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记》），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41

Djilas, Milova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米洛万·吉拉斯:《与斯大林谈话》），纽约：哈考特，1962

Dodd, William E., Jr., and Martha Dodd, eds.,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933—1938*（小威廉·E·多德和马撒·多德编：《多德大使1933—1938年日记》），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1

François - Poncet, André, *The Fateful Years: The memoirs of a 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1931—1938（安德烈·弗朗西斯－蓬斯：《带来灾难的年代：一位法国大使1931—1938年出使柏林回忆录》），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9

Freedman, Max, ed., Frankfurter and Roosevelt: Their Correspondence, 1928—1945（马克斯·弗里德曼编：《弗兰克福特与罗斯福：他们1928—1945年通信集》），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67

Galbraith, John K.,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约翰·K·加尔布雷思：《我们时代生活回忆录》），波士顿：霍顿公司，1981

Grew, Joseph C., *The Turbulent Era*（约瑟夫·格鲁：《动荡时代》），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2

Hachey, Thomas E., ed., *Confidential Dispatches: Analyses of America by the British Ambassador, 1939—1945*（托马斯·E·阿谢编：《机密电讯：1939—1945年英国大使对美国的分析报道》），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新大学出版社，1974

Hassett, William D., *Off the Record with F. D. R. 1942—1945*（威廉·D. 哈西特：《1942—1945年与富兰克林·罗斯福非正式谈话》），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8

Hooker, Nancy H., ed., *The Moffat Papers: Selections from the Diplomatic Journals of Tay Pierrepont Moffat, 1919—1943*（南希·H·胡克编：《莫法特言论：杰伊·P·莫法特1919—1943年外交日记选》），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

Hoover, Herbert, *Memoirs: 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3*（赫伯特·胡佛：《1920—1933年任商业部长与总统期间回忆录》），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1

Memoirs: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41*（——：《1929—1941年大萧条时

期回忆录》)，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

Hotz, Robert, ed., *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 Chennault*（罗伯特·霍茨编：《战士之路：克莱尔·陈纳德回忆录》)，纽约，1949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2Vols.(《科德尔·赫尔回忆录》，共两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8

Ickes, Harold L.,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3Vols.(《哈罗德·L·伊克斯秘密日记》，共3卷)，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53—1954

Israel, Fred L., ed., *The War Diary of Breckinridge Long: Selections from the Years 1939—1944*（弗雷德·L·伊斯雷尔编:《布雷肯里奇·朗战时日记：选自1939—1944年部分》，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6

Kennan, George, *Memoirs, 1925—1950*（乔治·凯南:《1925—1950年回忆录》，纽约：矮脚鸡出版社，1969

Kimball Warran F., e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3Vols.（沃伦·F·金布尔编：《邱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

Kutler, Stanley I., *Looking for America: The People's History*（斯坦利·I·柯特勒：《对美国的期待：人民史》)，纽约：诺顿公司，1979，第2卷，第6篇

Lash, Joseph, ed., *From the Diaries of Felix Frankfurter*（约瑟夫·拉希编:《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日记选》)，纽约：诺顿公司，1975

Lochner, Louis P., ed.,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路易斯·P·洛克纳编:《戈培尔1942—1943年日记》)，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48

Louchheim, Katie, ed., *The Making of the New Deal: The Insiders Speak*（卡蒂·洛凯姆编：《"新政"的形成：知情者言》)，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

May, Ernest R.,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欧内斯特·R·梅编：《了解敌人：两次世界大战前敌情估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

McElvaine, Robert S., *Down and Out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letters from the Forgotten Men*（罗伯特·S·麦克尔文：《大萧条时期的沉沦者：被遗忘者的

来信》)，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3

Millis, Walter,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沃尔特·米利斯编：《福雷斯特尔日记》)，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51

Myers, William S., ed., *The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威廉·S·迈尔斯编：《赫伯特·胡佛的国务文书和其他公文》)，共两卷)，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34

Nixon, Edgar,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3Vols.（埃德加·尼克松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外交事务》，共3卷)，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69

Perkins, Frances, *The Roosevelt I Knew*（弗朗西丝·珀金斯：《我所认识的罗斯福》)，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46

Ribbentrop, Joachim Von, *Ribbentrop Memoirs*（〔德〕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回忆录》)，伦敦：韦登费尔德与尼科尔森，1954

Roosevelt, Eleanor, *This I Remember*（埃莉诺·罗斯福：《我所记得的》)，纽约：哈珀出版社，1949

Roosevelt, Elliot, ed., *F. D. R: His Personal Letters*. 4 Vols.（埃利奥特·罗斯福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私人书简》，共4卷)，纽约：迪尤尔、斯隆与皮尔斯，1947—1950

Roosevelt, Franklin D., *The Public Papers of Governor Franklin D. Roosevelt*. 4 Vols.（《富兰克林·D·罗斯福州长公文集》，共4卷)，纽约州奥尔巴尼：J. 布莱昂公司，1930—1939

Rosenman, Samuel I.,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3 Vols.（塞缪尔·I·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共13卷)，纽约：拉塞尔与拉塞尔，1938—1950

Terrill, Tom and Jerrold Hirsch, ed., *Such as Us: Southern Voice of the Thirties*（汤姆·特里尔与杰罗尔德·赫希编：《我们处境如此：30年代南部的呐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8

Vandenberg, Arthur H.,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小阿瑟·H·范登堡：《范登堡参议员私人文件》)，波士顿，1952

White, Theodore H., ed., *The Stilwell Papers*（西奥多·H·怀特编：《史迪威文件》），纽约：威廉·斯隆，1948
〔德〕尼古拉·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日记》，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英〕温斯顿·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6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975
休·吉布森编：《齐亚诺日记》（1939—1943），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英〕《麦克米伦回忆录》，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2卷
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德〕保尔·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苏联外交部编：《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其 他 书 籍

马克思：关于英国国家、资本家和劳工间相对关系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2卷，第205—209页
恩格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论述，见上书第3卷，第316—318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第2卷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第4、5、11节，同上书，第3卷
列宁："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列宁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8，第18卷

列宁："论修改党纲"第7节，《列宁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9，第26卷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俱载《斯大林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

斯大林："在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第13卷

Adams, Frederick C., *Economic Diplomacy: The Export – Import Ban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4—1939*（弗雷德里克·C·亚当斯：《经济外交：1934—1939年间进出口银行与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76

Adams, Walter and Horace Gray, *Monopoly in America*（沃尔特·亚当斯与霍勒斯·格雷：《美国的垄断公司》），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5

Adler, Selig, *The Uncertain Giant: 1921—1941——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Wars*（塞利格·艾德勒：《1921—1941年间变化不定的巨人——两次世界大战间美国外交政策》），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5

Aglietta, Michael,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 S. Experience*（迈克尔·阿列塔：《一种资本主义调整的理论：美国经验》，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1979

Ahlstrom, Sydney E., *A Relige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西德尼·E·阿尔斯特伦：《美国人民宗教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

Allen, Frederick L.,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wenties*（弗雷德里克·L·艾伦：《仅仅是昨天》），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46

——, *Since Yesterday: The Nineteen – Thirties in America*（——：《昨天以来》），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65

Allswang, John M., *The New Deal and American Politics*（约翰·M·奥尔斯王：《"新政"与美国政治》），纽约：约翰·威利公司，1978

Anderson, Kristi,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Majority, 1928—1936*（克里斯蒂·安德森：《1928—1936年间民主党多数的创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9

Arndt, H. W., *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 – Thirties*（H. W. 阿恩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利，1965

Badger, Anthony J., *The New Deal: The Depression Years, 1933—1940*（安东尼·巴杰尔：《"新政"：1933—1940年的萧条年代》），伦敦：麦克米伦，1989

Bailey, Thomas A., and Paul B. R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托马斯·A·贝利与保罗·B·瑞安：《希特勒面对罗斯福：不宣而进行的海战》），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

Baskerville, Stephen W., and Ralph Willett, eds., *Nothing Else to Fear: New Perspectives on America in the Thirties*（〔英〕斯蒂芬·W·巴斯克维尔与拉尔夫·威利特编：《别无所惧：30年代对美国的新看法》），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5

Beard, Charles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1932—1940*（查尔斯·A·比尔德：《*1932—194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过程》），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

Beard, Charles A., and Mary Beard, *America in Midpassage*（查尔斯·A·比尔德与玛丽·比尔德：《美国在半途上》），纽约：麦克米伦，*1939*

Bellush, Benjamin, *Franklin D. Roosevelt as Governor of New York*（本杰明·贝拉什：《作为纽约州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

Bemis, Samuel F.,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塞缪尔·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6*。胡佛与罗斯福时期部分

Bennett, David H., *Demagogues in the Depression: American Radicals and the Union Party, 1932—1936*（戴维·H·贝内特：《萧条时期的蛊惑家：1932—1936年间美国极端分子与联盟党》），美国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8

Berle, Adolf, and Gardiner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与世界公司，1967

Bernstein, Irving,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ers, 1920—1933*（欧文·伯恩斯坦：《困乏的年代：1920—1933 年美国工人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

Turbulent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33—1941（——：《汹涌澎湃的年代：1933—1941 年美国工人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1

Block, Fre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弗雷德·布洛克：《国际经济失调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

Blum, Albert A.,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艾伯特·A·布卢姆：《美国劳工运动史》），首都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1972

Blum, John M., *Roosevelt and Morgenthau*（约翰·M·布卢姆：《罗斯福与摩根索》），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0

Bohlen, Charles 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查尔斯·E·波伦：《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纽约：诺顿公司，1969

Bonnet, Clarence E., *History of Employer's Associ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克拉伦斯·E·邦尼特：《美国雇主协会史》），纽约：范泰吉出版社，1957

Braeman, John, Robert H. Bremner, and David Brody, eds., *The New Deal: The National Level*（约翰·布雷曼等：《联邦"新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

——, *The New Deal: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约翰·布雷曼等：《州与地方"新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

Brinkley, Alan, *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阿伦·布林克林：抗议之声：休伊·朗、库格林神父与大萧条》），纽约：克诺普夫公司，1982

Brogan, Denis, *The Era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 Chronicle of the New Deal and Global War*（丹尼斯·布罗根：《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新政"与全球战争编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52

Browder, Robert P., *The Origins of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纽约，1953

Burner, David, *The Politics of Provincialism*（戴维·伯纳：《地方主义的政治》），纽约：克诺普夫，1968

Burns, James M.,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6

——, *Roosevelt: Soldier of Freedom*（——：《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70

Campbell, Christiana M., *The Farm Bureau and the New Deal: A Study in the Making of National Farm Policy, 1933—1940*（克里斯蒂安娜·M·坎贝尔：《农业合作社与"新政"：1933—1940年全国农业政策形成的研究》），美国便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2

Castells, Manuel,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曼纽尔·卡斯特尔斯：《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

Cates, Jerry, Insuring Inequality: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in Social Security, 1935—1954*（杰里·凯茨：《保证不平等：1935—1954年社会保障工作的行政领导》），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2

Chambers, Clarke, *Seedtime of Reform: American Social Service and Social Action, 1918—1973*（克拉克·钱伯斯：《改革的酝酿时期：1918—1973年美国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措施》），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管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

Charlton, Michael, *The Eagle and the Small Birds*（迈克尔·查尔顿：《鹰与小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

Church, Robert R., and Michael W. Sedlak,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罗伯特·丘奇与迈克尔·W·塞得拉克：《美国教育解说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

Civilian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for War*（民用生产局：

《战时工业动员》)，首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7

Clark, John G., etc., *Three Genera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Family, Community, and Nation*（约翰·G·克拉克等：《20世纪美国的3代人：家庭、社区与国家》)，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77

Cobb, James C, and Michael V. Namaroto, *The New Deal and the South*（詹姆斯·C·科布与迈克尔·V·纳马罗托：《"新政"与南部》)，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4

Cochran, Bert, *Labor and Communism: The Conflict that Shaped American Unions*（伯特·科克伦：《劳工与共产主义：形成美国工会的冲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

Cochran, Thomas C., *The American Business Syste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托马斯·C·科克伦：《美国企业体制：历史的透视》)，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Cohen, Theodore,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西奥多·科恩：《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纽约：美国自由出版社，1987

Cole, Wayne S.,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1932—1945*（韦恩·S·科尔：《1932—1945年间罗斯福与孤立主义者》)，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3

Collins, Robert M.,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1929—1964*（罗伯特·M·科林斯：《1929—1964年间企业对凯恩斯的反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

Conrad, David E., *The Forgotten Farmer: The Story of Sharecroppers in the New Deal*（戴维·E·康拉德：《被遗忘的农民："新政"时期分成制农民的处境》)，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5

Cuff, Robert 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罗伯特·D·卡夫：《战时工业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

Davis, Mike,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迈克·戴维斯：《沉溺于美国梦的人们》)，伦敦：弗索，1986

Degler, Carl. N., *Out of Our Past*（卡尔·N·德格勒：《源于往昔》），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59

——，ed.，*The New Deal*（——编：《"新政"》），芝加哥：四边形图书公司，1970

De Santis, Hugh, *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1933—1947（休·德桑蒂斯：《沉默的外交：1933—1947年间美国对外工作、苏联与冷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Divine, Robert A.,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罗伯特·A·迪万：《罗斯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9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莫里斯·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纽约：国际出版社，1973

Dozen, Donald, *The Monroe Doctrine, Its Modern Significance*（唐纳德·多泽：《门罗主义的现代意义》），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普夫，1965

Dubofsky, Melvyn, and Warren van Tine, *John L. Lewis: A Biography*（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约翰·L·刘易斯传》），纽约：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68

Dunbar, Anthony, *Against Grain: Southern Radicals and Prophets*（安东尼·邓巴：《违反常情：南方的激进派与先知》），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81

Eccles, Marriner S., *Beckoning Frontier*（马里纳·埃克尔斯：《召唤的边疆》），纽约：克诺普夫，1951

Einaudi, Mario, *The Roosevelt Revolution*（马里奥·埃瑙迪：《罗斯福革命》），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7

Emmerich, Herbert, *Federal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赫伯特·埃默里奇：《联邦组织与行政管理》），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71

Evans, Sara M.,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萨拉·M·埃文斯：《生而自由：美国妇女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89

Feingold, Henry, *The Politics of Rescue: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ocaust, 1938—1945*（亨利·范戈尔德：《救援政治：1938—1945年罗

斯福政府与大屠杀》)，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0

Feinmen, Ronald L., *Twilight of Progressivism: The Western Republican Senators and the New Deal*（罗纳德·L·范曼：《进步主义的黄昏：西部共和党参议员与"新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

Feis, Herbert, *Churchill - Roosevelt - Stalin: The Way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赫伯特·菲斯：《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所走的道路和他们追求的和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

Ferrell, Robert H.,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Hoover - Stimson Foreign Policy, 1929—1933*（罗伯特·H·菲雷尔：《大萧条中美国外交：1929—1933年胡佛－史汀生外交政策》)，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

Firestone, John M., *Federa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during Business Cycles, 1879—1958*（约翰·M·费尔斯通：《1879—1958年经济危机周期联邦收入与支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

Fisher, Dorothy C., *Our Young Folks*（多萝西·C·费希尔：《我们的青年人》)，纽约，1943

Fite, Gilbert C., *Cotton Fields No More: Southern Agriculture*, 1865—1980（吉尔伯特·C·菲特：《棉田无增：1865—1980年南部农业》)，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4

Freidel, *Frank*, *Franklin D. Roosevelt*, 4 Vols.（弗兰克·弗雷德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共4卷)，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52，1954，1956，1973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应运而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90

Friedman, Andrew L., *Industry and Labo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安德鲁·L·弗里德曼：《工业与劳工：阶级斗争活动与垄断资本主义》)，伦敦：麦克米伦，1977

Friedman, Milto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1980

Fusfeld, Daniel R.,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al（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与“新政”的起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

Galbraith, John K., *The Great Crash*, 1929（约翰·K·加尔布雷思：《1929年大崩溃》），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1

Gellman, Irwin F.,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1933—1945*（欧文·F·格尔曼：《睦邻外交：1933—1945年美国的拉美政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

Glyn, Andrew, and Bob Sutcliffe, *Capitalism in Crisis*（安德鲁·格林与鲍勃·萨克利夫：《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纽约：潘西昂，1972

Goldman, Eric F., *Rendezvous with Desting: A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n Reform*（埃里克·F·戈德曼：《应运而兴：美国现代改革史》），纽约：克诺普夫，1952

Graebner, Norman A., *The Age of Global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39*（诺曼·A·格雷布纳：《全球大国时代：1939年以来的美国》），纽约：威利父子公司，1979

Graham, Otis L., *Towards a Planned Society*（奥蒂斯·L·格雷厄姆：《走向有计划的社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

Greenberg, Edward S., *Serving the Few: Corporate Capitalism and the Basis of Government Policy*（爱德华·S·格林伯格：《为少数人服务：合作资本主义与政府政策的基础》），纽约：威利公司，1974

Greer, Thomas H., *What Roosevelt Though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托马斯·H·格里尔：《罗斯福所思：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58

Haber, Carole, *Beyond Sixty - five: The Dilemma of Old Age in America's Past*（卡罗尔·哈伯：《65岁以上：美国以往老年人的难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Haberler, Gottfried, *The World Economy, Mon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戈特弗里德·哈伯勒：《1919—1939年间世界经济、货币与大萧条》），首都华盛顿：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1976

Haglund, David G., *Latin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 S. Strategic Thought, 1936—1940*（戴维·G·哈格隆德：《1936—1940年间拉丁美洲与美国战略思想的转变》），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84

Halasz, Nicolas, *Roosevelt through Foreign Eyes*（尼古拉斯·豪拉斯：《外国人心目中的罗斯福》），纽约：范·诺斯特兰德，1961

Hamby, Alonzo L., ed., *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阿朗索·L·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纽约：朗曼公司，1981

Hansen, Alvi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阿尔文·汉森：《完全复兴还是停滞?》），纽约：诺顿，1938

Hargrove, Edwin C., and Paul K. Conkin, TVA: *50 Year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埃德温·C·哈格罗夫与保罗·康金：《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基层民主政治50年》），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3

Harris, Seymour E., *The New Economics: Keynes' Influence 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西摩·E·哈里斯：《新经济学：凯恩斯对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影响》），纽约：克诺普夫，1952

Hart, James 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詹姆斯·D·哈特：《牛津美国文学指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

Hawley, Ellis W.,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埃利斯·W·霍利：《"新政"与垄断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

Herring, George, *Aid to Russia 1941—1946*（乔治·赫林：《1941—1946年对俄国的援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

Higham, John,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约翰·海厄姆：《美国专业史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83

Hirshfield, Daniel S., *The Lost Reform: The Campaign for Compulsory Health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2 to 1943*（丹尼尔·S·赫什菲尔德：《未实现的改革：1932至1943年美国义务健康保险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

Hafstadter, Richar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美国政治传统和创建它的人们》），纽约：克诺普

夫，1949

Hoover, Herbert, *American Individualism*（赫伯特·胡佛：《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佩奇公司，1922

Huberman, Leo, *We, the People*（利奥·休伯曼：《我们人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

Huthmacher, J. Joseph,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J. 约瑟夫·休思梅彻：《罗伯特·F·瓦格纳参议员与城市自由主义的兴起》），纽约：雅典娜神殿，1971

Huthmacher, J. Joseph, and Warren I. Susmen, eds., *Herbert Hoover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J. 约瑟夫·休思梅彻与沃伦·I·萨斯曼编：《赫伯特·胡佛与美国资本主义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申克曼出版社，1973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Emerging Coali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当代研究所：《美国政治中正涌现出的各种联盟》），旧金山：当代研究所，1978

Jackson, Kenneth T.,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肯尼思·T·杰克逊：《禾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Jeffreys - Jones, Rhodri, and Brace Collins, eds., *The Growth of Federal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英〕罗德里·杰弗里斯 - 琼斯与布鲁斯·科林斯编：《美国历史上联邦权力的增长》），英国爱丁堡：苏格兰学术出版社，1983

Jessop, Bob, *The Capitalist State*（鲍勃·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纽约大学出版社，1982

Johnson, James P., *The Politics of Soft Coal: The Bituminous Industry from W WI* through the New Deal（詹姆斯·P·约翰逊：《烟煤政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新政”的烟煤工业》），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9

Karl, Barry Dean,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in the New Deal*（巴里·D. 卡尔：《“新政”时期行政部门的调整与改革》），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

Kecskemeti, Paul, *Strategic Surrender: The Politics of Victory and Defeat*（保罗·凯克斯基梅蒂：《战略屈服：胜与败的政治》），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

Kessler－Harris, Alice, *Out to Work: The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受雇妇女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

Keynes, John M., *The End of Laissez－faire*（〔英〕约翰·M·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伦敦：霍格思，1926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 年处于萧条中的世界》），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

Kirby, John B., *Black Americans in the Roosevelt Era*（约翰·B·柯尔比：《罗斯福时代的美国黑人》），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0

Kirkendall, Richard S., ed., *The New Deal: The Historical Debate*（理查德·S·柯肯德尔编：《"新政"：历史上的争论》），纽约：约翰·威利公司，1973

Klehr, Harvey, *The Heyday of American Communism: The Depression Decade*（哈维·克莱尔：《美国共产主义的全盛期：萧条的 10 年》），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4

Kolko, Gabriel,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加布里尔·科尔科：《美国现代史中的主流》），纽约：哈珀与罗，1976

Kroos, Herman E., *Executive Opinion: What Business Leaders Said and Thought on Economic Issues, 1920's—1930's*（赫尔曼·E·克鲁斯：《经理们的意见：20 年代—30 年代企业界领袖对经济问题的言论与思想》），纽约：道布尔戴，1970

Kubek, Anthony, *How the Far East War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1949*（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怎样丢的：1941—1949 年美国政策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建立》），芝加哥：勒涅里，1963

Ladd, Everett C., Jr., and Charles D. Hadley,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小埃弗雷特·C·莱德与查尔斯·D·哈德利：《美国政党体制的转变》），纽约：诺顿，1975

Lash，Joseph P.，Dealers and Dreamers：*A New Look at the New Deal*（约瑟夫·P·拉希：《实干家与梦想家：对"新政"新看法》），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88

——，*Eleanor and Roosevelt*（《埃莉诺与罗斯福》），纽约：诺顿公司，1971

——，*Roosevelt and Churchill，1939—1941：The Partnership that Saved the West*（《1939—1941年的罗斯福与邱吉尔：挽救了西方的伙伴关系》），纽约：诺顿，1976

Lekachman，Robert，*Ages of Keynes*（罗伯特·莱卡奇曼：《凯恩斯时代》），纽约：兰登书屋，1966

Leuchtenburg，William E.，*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1932—1940*（威廉·E·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

In the Shadow of FDR（《在罗斯福的阴影下》），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

Levine，Rhonda F.，*Class Struggle and the New Deal：Industrial Labor，Indutrial Capital，and the State*（朗达·F·莱文：《阶级斗争与"新政"：工业劳工、工业资本与国家》），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88*

Lewin，Ronald，*The American Magic*（罗纳德·莱温：《美国的魔术》），纽约：法勒、斯特劳斯与吉鲁，*1982*

Lowitt，Richard，and Maurice Beasley，eds.，*One Third of a Nation*（理查德·洛维特与莫里斯·比斯利编：《一国的三分之一》），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1*

Lubell，Samuel，*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塞缪尔·卢贝尔：《美国政治的前途》），纽约：哈珀与罗，*1965*

Maddux，Thomas R.，*Years of Estrangement：American Relations with Soviet Union，1933—1941*（托马斯·R·马达克斯：《疏远的年代：*1933—1941*年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出版社，*1980*

Mc Andrew，William J.，Canada，*Roosevelt，and the New Deal：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 (〔加〕威廉·J·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 *30* 年代的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对改革的态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 *1967* 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Magrass, Yale R., *Thus Spoke the Moguls* (耶尔·R·马格拉斯:《豪贵们如此说》),马萨诸塞州剑桥:申克曼,*1981*

Mandel, Ernest, *Late Capitalism* (〔英〕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1975*

Marks Ⅲ, Frederick W., *Wind Over Sand* : *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 (弗雷德里克·W·马克斯第三:(《沙漠大风: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8*

McElvaine, Robert S.,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 *1929—1941* (罗伯特·S·麦克尔文:《大萧条:1929—1941 年的美国》),纽约:时代图书公司,1984

Miliband, Ralph, *Marxism and Politics* (〔英〕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Miller, Robert M., *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Social Issues*, *1919—1939* (罗伯特·M·米勒:《1919—1939 年美国新教与社会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8

Milton, David, *The Politics of Labor*: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New Deal* (戴维·米尔顿:《从大萧条到"新政"间美国的劳工政治》),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2

Moley, Raymond, *After Seven Years* (雷蒙德·莫利:《7 年以后》),纽约:哈珀出版社,1939

——, *The First New Deal* (《第一次"新政"》),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66

Moore, Wilbert E., ed.,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威尔伯特·E·穆尔编:《20 世纪社会学》),纽约:哲学书屋,1945

Mulder, Ronald, *The Insurgent Progressives in the Senate and the New Deal*, 1933—

1939（罗纳德·马尔德：《1933—1939 年参议院中造反的进步派与“新政”》），纽约：加兰，1979

Murray, David, *Modern Indians: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英〕戴维·默里：《现代印第安人：20 世纪的美国土著》），英国美国学学会，1982

Murray, Robert K., Red Scare（罗伯特·K·默里：《红色恐怖》），明尼阿波利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55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e*（国家资源委员会：《美国经济结构》），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利公司，1966

Neumann, William L., *America Encounters Japan: From Perry to MacArthur*（威廉·L·纽曼：《美国面临日本：从佩里到麦克阿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3

O' Connor, Raymond G., *Diplomacy for Victory: FDR 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雷蒙德·G·奥康纳：《争取胜利外交：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无条件投降》），纽约：诺顿，1971

Offe, Claus, *Disorganized Capitalism*（克劳斯·奥费：《解体的资本主义》），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

Offner, Arnold A.,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tics and World Politics, 1917—1941*（阿诺德·A·奥夫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17—1941 年美国外交政策与世界政治》），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6

Ogburn, William F., ed., *Social Change and the New Deal*（威廉·F·奥格本编：《社会变迁与“新政”》），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Patterson, James T., *America's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1900—1980（詹姆斯·T·帕特森：《1900—1980 年间美国反贫穷的斗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Deal*（《国会保守主义与“新政”》），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67

——, The New Deal and the States: Federalism in Transition（——：《“新政”与

各州：转变中的联邦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

Payne，Howard C.，etc.，*As the Storm Clouds Gathered：European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霍华德·C·佩恩等：《山雨欲来：30年代欧洲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感觉》)，达勒姆城：穆尔，1979

Pells，Richard H.，*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Cultur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Years*（理查德·H·佩尔斯：《激进想象与美国梦：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想》)，纽约：哈珀与罗，1973

Perrett，Geoffrey，*America in the Twenties*（杰弗里·佩雷特：《20年代的美国》)，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82

Piven，Frances F.，and Richard A.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How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弗朗西丝·F·派文与理查德·A·克洛沃德：《穷人运动：他们是怎样成功的、怎样失败的》)，纽约：潘西昂，1977

Pogue，Forrest C.，*George C. Marshall*，Vol. Ⅱ（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第2卷)，纽约：瓦伊金，1966

Porter，Glenn，ed.，*Encyclopa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3Vols.（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共3卷)，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80

Poulantzas，Nico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英〕尼科斯·普兰特扎斯：《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1975

Pratt，Julius W.，*Cordel Hull，1933—1944*，2Vols.（朱利叶斯·W·普拉特：《1933—1944年间的科德尔·赫尔》，共两卷)，纽约：斯库尔出版社，1964

Rauch，Basil，*The History of the New Deal*（巴兹尔·劳赫：《"新政"史》)，纽约：创造时代出版社，1944

Robinson，Edgar E.，*The Roosevelt Leadership，1933—1945*（埃德加·E·鲁宾逊：《1933—1945年罗斯福的领导》)，美国费城：利平科特，1955

Rollins，Alfred B.，Jr.，*Roosevelt and Howe*（小艾尔弗雷德·B·罗林斯：《罗斯福与豪》)，纽约：克诺普夫，1962

——，ed.，*Depression，Recovery，and War*：1929—1945（小艾尔弗雷德·B·

罗林斯编：《萧条、复兴与战争：1929—1945》)，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6

Romanus, Charles F.,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查尔斯·F·罗曼努斯与里利·森德兰：《史迪威使华》)，首都华盛顿：陆军部，1953

Rosen, Elliot A., *Hoover, Roosevelt, and the Brains Trust: From Depression to New Deal*（埃利奥特·A·罗森：《胡佛、罗斯福与智囊团：从大萧条到"新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

Rosenman, Samuel I., *Working with Roosevelt*（塞缪尔·I·罗森曼：《与罗斯福共事》)，纽约：哈珀出版社，1952

Rosenof, Theodore, *Dogma,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西奥多·罗斯诺夫：《教条、萧条与"新政"》)，纽约州：肯尼卡特出版社，1975

Rossiter, Clinto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克林顿·罗西特：《美国总统职位》)，纽约：西格利特，1956

Rothbard, Murray,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默里·罗思巴德：《美国大萧条》)，美国新泽西州：D．范诺斯特兰特公司，1963

Saloutos, Theodore, *The American Farmers and the New Deal*（西奥多·萨劳托斯：《美国农民与"新政"》)，艾奥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

Scharf, Louis, *To Work and to Wed: Female Employment, Feminism,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路易斯·沙尔夫：《工作与结婚：女性就业、争取女权运动与大萧条》)，康涅狄格州韦斯特彼特：格林伍德，1980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Age of Roosevelt*, 3Vols.（小阿瑟·M·施莱辛格：《罗斯福时代》，共3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7，1959，1960

ed., History of U. S. *Political Parties*, 4Vols.（——编：《美国政党史》，共4卷)，纽约：切尔西书屋与鲍克出版公司，1972

Shannon, David A., ed., *The Great Depression*（戴维·A·香农编：《大萧条》)，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0

Shewmaker, Kenneth, *Americans and the Communist Chinese, 1927—1945*（肯尼

恩·休梅克：《1927—1945 年美国人与共产党中国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

Shover, John L., *Cornbelt Rebellion: The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约翰·L·肖弗：《玉米带叛变：农民休假协会》)，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5

Sitkoff, Harvard, *A New Deal for Blacks*（哈佛·西特科夫：《为黑人实行的"新政"》)，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Sombart Wermer,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沃默·松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纽约：怀特普莱恩斯：M. E. 夏普公司，1976

Spiller, Robert E., etc.,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罗伯特·E·斯皮勒等：《美国文学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6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赫伯特·斯坦：《美国财政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

Steward, Dick, *Trade and Hemisphere: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and Reciprocal Trade*（迪克·斯图尔德：《贸易与半球：睦邻政策与互惠贸易》)，美国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75

Stewart, William J., Compiler, *The Era of Franklin D. Roosevelt*（威廉·J·斯图尔特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1974

Stimson, Henry L., and Bundy McGeor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亨利·L·史汀生与麦克乔治·邦迪：《论和平时期与战时的积极服务》)，纽约：哈珀，1948

Sweezy, Paul S.,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保罗·S·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哈珀，1959

Taylor, Albion G., *Labor Polici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阿尔比恩·G·泰勒：《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劳工政策》)，纽约：阿诺，1973

Taylor, Grakam D., *The New Deal and American Indian Tribalism: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1934—1945*（格雷厄姆·D·泰勒：《"新政"与美国印第安人部族制：1934—1945 年印第安人调整法执

行情况》)，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0

Tindall, George B.,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1933—1945*（乔治·B·廷德尔：《1933—1945 年新南部的出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7

Tomlins, Christopher L., *The State and Unions: Labor Relations, Law, and the Organized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0—1960（克里斯托弗·L·汤姆林斯：《国家与工会：1880—1960 年美国劳工关系、法律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Tuchman, Barbara W.,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巴巴拉·W·塔奇曼：《1911—1945 年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历》)，纽约：矮脚鸡出版社，1970

Tugwell, Rexford G.,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A Biography of Franklin D. Roosevelt*（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民主主义的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传》)，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57

Utley, Jonathan,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乔纳森·厄特利：《1937—1941 年走向对日作战》)，美国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5

Volpe, Paul A.,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Banking Crisis*, 1931—1933（保罗·A·沃尔普：《1931—1933 年国际金融与银行危机》)，首都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45

Walters, Raymond, *Negro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Recovery*（雷蒙德·沃尔特斯：《黑人与大萧条：经济复兴问题》)，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1970

Ware, Susan, *Beyond Suffrage: Women in the New Deal*（苏珊·韦尔：《没有选举权："新政"时期的妇女》)，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Warren, Frank A., *An Alternative Vision: The Socialist Party in the 1930's*（弗兰克·A·沃伦：《一种供选择视野：30 年代社会党》)，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74

Wecter, Dixon, *The Ag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年代》)，纽约：麦克米伦，1964

Weiner, Richard P., *Cultural Marxism and Political Socialozy*（理查德·P·韦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学》），加州贝弗利希尔斯：塞奇，1981

Westmeyer, Paul,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 Education*（保罗·韦斯特迈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查尔斯·托马斯出版社，1985

Whitaker, Arthur P.,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阿瑟·P·惠特克：《西半球概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4

White, Graham J., *FDR and the Press*（格雷厄姆·J·怀特：《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闻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

Williams, William P., *American - Russian Relations, 1781—1947*（威廉·P·威廉斯：《1781—1947年美俄关系》），纽约，1952

——,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史轮廓》），纽约：新观点出版公司，1973

Zieger, Robert A.,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Unions, 1920—1985*（罗伯特·A·齐格尔：《1920—1985年美国工人与工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

Zinn, Howard, *New Deal Thought*（霍华德·津恩：《"新政"思想》），纽约：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66

史蒂芬·K·贝利编：《美国政治与政府》，汉英对照本，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

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中译本，上、下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查尔斯·A·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约翰·罗伯特·布卢姆等编：《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英〕F. L. 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苏〕亚·鲍·恰科夫斯基：《未完成的画像》，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苏〕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中译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亨利·S·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保罗·康金：《"新政"》，中译本，武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3
〔英〕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中英对照本，下卷，北京：美国大使馆文化处，1983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上、下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译本，上、下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苏〕H·C·德拉基列夫主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共性与特性》，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吉尔伯特·C·吉姆与E. 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沈阳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0
《美洲政治史纲》，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共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苏〕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1939—1959)》，中译本，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63
〔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
奥尔登·哈奇：《罗斯福外传》，中译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英〕F. C. 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伊·卡恩：《中国通》，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苏〕B. 柯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法〕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译本，上、下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英〕约翰·D·李斯：《总统与最高法院：从"新政"到水门事件》，中译本，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3
威廉·E·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注：未附参考文献目录〕
《总统身后——从杜鲁门到里根》，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注：未附参考文献目录与索引〕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中、下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上、中两册
〔德〕卢特威：《罗斯福传》，中译本，上海：西风社，1941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1、2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法〕安德鲁·莫鲁瓦:《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英〕C. A. 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译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
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高尔登·普朗格:《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中译本,北京:长江出版社,1990
罗伯特·J·林格:《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日〕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中译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H. N. 沙依特、H.G. 瓦特、H. U. 福克纳:《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J. T.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中译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小阿瑟·M·施莱辛格编:《美国民主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上、下两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上、下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译本,上、中、下3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苏〕H. B. 西瓦切夫、E. 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中译本,武汉市: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艾琳·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中译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中译本，两卷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大战前夕，1939 年》，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欧洲的重组》，中译本，上、下两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托马斯·F·特罗伊：《历史的回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和发展》，中译本，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日〕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
美国农业部编：《美国农业一百年》，中译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英〕M. J. C. 维尔：《美国政治》，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苏〕H. H. 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7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A

B

G

H

J

K

L

P

R

S

T

W

Y

Z